

赵慧芝 著

古代科學家傳 上

中外名文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古代科学家传(上)

赵慧芝 主编

目 录

序	王奎克	(1)
前 言	赵慧芝	(1)
李 冰传		
——《史记》卷二九	金 菁译	(1)
墨 子 鲁 班传		
——《史记》卷七四	赵慧芝译	(4)
张 苍传		
——《史记》卷九六	赵 荣译	(12)
扁 鹊传		
——《史记》卷一〇五	金 菁译	(17)
仓 公传		
——《史记》卷一〇五	吴宁欧 齐鲁仁译	(27)
刘 安传		
——《史记》卷一一八	雒启坤译	(59)
西门豹传		

- 《史记》卷一二六 范楚玉译 (82)
- 赵 过传
 - 《汉书》卷二九 赵慧芝译 (87)
- 卜 式传
 - 《汉书》卷五八 曾雄生译 (91)
- 张 騫传
 - 《汉书》卷六一 范楚玉译 (96)
- 召信臣传
 - 《汉书》卷八九 金 菁译 (105)
- 杜 诗传
 - 《后汉书》卷三一 夏经林译 (109)
- 贾 逵传
 - 《后汉书》卷三六 李 申 杨素香译 (117)
- 崔 颉传
 - 《后汉书》卷五二 曾雄生译 (126)
- 张 衡传
 - 《后汉书》卷五九 赵慧芝译 (137)
- 蔡 伦传
 - 《后汉书》卷七八 赵慧芝译 (161)
- 郭 玉传
 - 《后汉书》卷八二 万 芳译 (165)
- 韩 康传
 - 《后汉书》卷八三 郭 健译 (168)
- 王 景传
 - 《后汉书》卷七六 夏经林译 (170)
- 班 昭传
 - 《后汉书》卷八四 赵慧芝译 (176)

华佗传

——《三国志·魏书三》卷二九……………单菁菁译(182)

马钧传

——《三国志·魏书三》卷二九……………范楚玉译(194)

陆绩传

——《三国志·吴书》卷五七……………李申 杨素香译(201)

王蕃传

——《三国志·吴书》卷六五……………李申 杨素香译(204)

裴秀传

——《晋书》卷三五……………曹婉如译(207)

刘智传

——《晋书》卷四一……………李申 杨素香译(217)

皇甫谧传

——《晋书》卷五一……………傅芳译(219)

束皙传

——《晋书》卷五一……………李申 杨素香译(244)

葛洪传

——《晋书》卷七二……………赵慧芝译(260)

虞喜传

——《晋书》卷九一……………李申 杨素香译(269)

何承天传

——《宋书》卷六四……………金文馨译(274)

祖冲之传

——《南齐书》卷五二……………李迪译(286)

崔灵恩传

——《梁书》卷四八……………冯时译(294)

顾野王传

- 《陈书》卷三〇……………赵慧芝译(297)
- 高允传
- 《魏书》卷四八……………冯时译(301)
- 阚惔传
- 《魏书》卷五二……………李仲均译(356)
- 李业兴传
- 《魏书》卷八四……………冯时译(358)
- 晁崇传
- 《魏书》卷九一……………冯时译(371)
- 孙僧化传
- 《魏书》卷九一……………李迪译(374)
- 殷绍传
- 《魏书》卷九一……………冯时译(376)
- 周澹传
- 《魏书》卷九一……………万芳译(381)
- 李脩传
- 《魏书》卷九一……………万芳译(383)
- 王显传
- 《魏书》卷九一……………万芳译(386)
- 崔彧传
- 《魏书》卷九一……………万芳译(391)
- 徐之才传
- 《北齐书》卷三三……………万芳译(393)
- 宗懔传
- 《周书》卷四二……………冯时译(404)
- 姚僧垣传
- 《周书》卷四七……………万芳译(408)

褚 该传

——《周 书》卷四七 万 芳译 (420)

裴 矩传

——《隋 书》卷六七 范楚玉译 (422)

宇文恺传

——《隋 书》卷六八 范楚玉译 (438)

何 稠传

——《隋 书》卷六八 范楚玉译 (443)

袁 充传

——《隋 书》卷六九 冯 时译 (450)

刘 焯传

——《隋 书》卷七五 冯 时译 (460)

刘 炫传

——《隋 书》卷七五 冯 时译 (465)

庾季才传

——《隋 书》卷七八 刘次沅译 (477)

耿 询传

——《隋 书》卷七八 冯 时译 (485)

张胄玄传

——《隋 书》卷七八 冯 时译 (489)

许智藏传

——《隋 书》卷七八 万 芳译 (500)

徐文伯传

——《南 史》卷三二 万 芳译 (502)

徐嗣伯传

——《南 史》卷三二 万 芳译 (506)

祖彥之传

——《南 史》卷七二 李 迪译 (510)

陶弘景传

——《南 史》卷七六 单菁菁译 (512)

序

王奎克

我们中国科技史工作者一向有个宏愿，那就是，写出一部较完整的中国古代科技人物传记集。6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今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曾出版一本《中国古代科学家》，当时筚路蓝缕，只集成薄薄的一册，可说是这一伟大工程的前奏。其后又准备出第二集，不料编写未竟十年浩劫已经开始，于是工作戛然而止，连已完成的部份原稿都不知去向了。时至今日，情况已大不相同。恩格斯早已说过：“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邓小平同志最近更进一步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党和政府更据此发出加速科技进步和科教兴国的号召，实在是一项英明、正确的战略决策。这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自然主要由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担负起来，而我们科技史工作者也要为此加一把劲，努力作出更多的贡献。赵慧芝同志于学报编辑工作之余，又殚精竭虑地主编《文白对照二十五史分类传记》中的《科学家传》，现在已经编写、翻译竣事，这就是一项新的、极有价值的贡献。这是一部宏编巨制，与过去所出的薄薄一

小册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喜见此书大功告成，愿在这里说几句话。

在大多数西方科学史家的心目中，中国古代科技除造纸、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四大发明之外，似乎只有某些美术工艺和农业技术较为见长，其他都是一片空白，无足称道。这种见解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我国封建社会延续时间较长，近代实验科学起步较晚，这是事实；但我国古代在科技方面贡献之多，与其他古文明相比有过之无不及，这也是事实。可是我国古代究竟有哪此发明创造，有哪些科技人物，则不仅国外学术界（英国的李约瑟博士是例外）所知甚少，即在国内也普遍存在着数典忘祖的现象。幸而我们拥有几千年来连续不断、记载颇为完整的史籍，可以从中发掘出大量有关科技人物的史料，使我们对先民的科技活动和光辉贡献还能有所了解。不过应当指出，由于儒家思想反对“奇技淫巧”，无视科技进步对历史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二十五史中关于科技方面的记载相对来说是颇不充分的。历代史家为帝王将相以及“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的文人学士们立传，叙述唯恐不详；而对科技家的生平事迹和发明创造，却不肯多费一些笔墨，除少数官高名重、兼有其他身份者外，往往叙述简略，甚至三言两语一带而过。古代史家们这种偏见，当然给后世读者造成很大困难。本书编者、译者遇到这种情况，能根据其他古籍作出必要的补充，对读者确有很大帮助，这也是本书的一大优点。

二十五史卷帙浩繁，将其中科技人物传记剔出来汇编成书，并将古文原文译为白话，这是一项前人未敢尝试的繁难

工作。想不到赵慧芝同志能在百忙中首开其端,制定规划,组织人力,并亲自参加编写、翻译工作,克服了种种困难,最后取得圆满成功。从这上、中、下三册的内容来看,中国古代声名较著的科技人物都已包罗在内,对于科技史研究者以及所有想了解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读者,都是一部有参考价值的好书。

我和慧芝同志共事多年,对她的工作了解较深。她做《自然科学史研究》和《中国科技史料》两种刊物的编辑工作,倾注全力,认真负责,早已受到好评。与此同时,她还做了不少研究工作。她对中国近现代科技史,尤其是对中国科学社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两学术团体的研究,是具有开拓性的,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后来,她又对中国古代科技史和古今科技人物进行了不少新的研究,不断有新作问世。最近她以本书白话译稿多篇见示,并告诉我全书已近完成,嘱代作小序,实在令我感到不胜惊讶,因为在两种刊物编辑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同时主编完成这部大书,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二十年来,慧芝同志全身心地投身于中国科技史事业,无论在编辑工作或研究工作上都取得了巨大成果,这是十分可喜的;而她始终以锲而不舍、勇于攀登的精神,孜孜不倦地从事工作,这种精神更是难能可贵的。希望她再接再厉,勇猛精进,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她取得更大的成就!

1994 年 10 月 28 日于北京中关村

前言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各族人民以其勤劳和智慧，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在世界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留存有数千年连绵不断的历史记录和文化遗产。在悠久而辉煌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中，科学技术成就绚丽夺目，曾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居于世界的领先地位。英国科学史家贝尔纳（I. D. Bernal）在他的《历史上的科学》“为中译本写的序”中说，中国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著名的英国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J. Needham）博士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中也指出，中国“在 3 到 13 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世界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科学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中译本）。这些评价绝非溢美之辞，而是基于深入研究得出的科学论断。

我是一名科学史工作者，每当学习、研究我国古代科学家、发明家和他们的著作时，总是油然升起一股敬意和民族

自豪感，受到鼓舞和鞭策。中华民族是如此勤奋、智慧、自强和富有创造精神，能够创造辉煌灿烂的过去，曾走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前列，那么在今天，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正确的路线和指导思想，只要我们继承和发扬先贤的传统与精神，就一定能够创造和建设更加美好的未来。祖先能做到的事，我们也一定能够做到，而且应该做到。我们不能愧对祖先，更不能愧对后人！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特别是中青年能学习、了解我们祖先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杰出成就，以及他们为祖国的科学事业，不畏艰险、勇于攀登的革命精神，对人类文明发展曾经作出过的巨大贡献，从中受到启迪和激励，以增强民族自豪感、自信心，振兴中华，再创辉煌。这就是我编辑本书的主要目的。

记述我国古代科学家和发明家及其成就的资料，蕴藏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在浩繁的中国古籍中，《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是历代官修史书，历史学家称之为“正史”，是记载中国上下五千多年历史的极为珍贵的鸿篇巨著，是中华民族的一座伟大的“文化长城”。

将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中的历代主要科学家传记收集起来，以文白对照的形式，编辑成专书，这是前人尚未做过的工作。收入本书的科学家和发明家计三百多人。就学科而言，涉及到古代天文学、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化学、地

理学等基础科学和农学、医学、药理学、冶金、机械、建筑、水利等各技术科学。毫无疑问，这些科学家和发明家，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灿烂群星，是研究和学习中国古代科技史不可或缺的、最基础的重要资料。汇历代主要科技人物于一书，为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人提供便利，这是我编辑本书的又一目的。

如此众多的科学家、发明家，如此广泛的科学领域，当然不可能一一列述其成就和贡献。我只想举几个突出的例子，以说明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在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地位。

人们所熟知的造纸法、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四大发明，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贡献已为世界所公认。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一书中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人民出版社，1979年中译本，第103页）英国著名科学家、哲学家弗·培根（F·Bacon）在他的《新工具》一书中也说：“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指印刷术）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指火药）是在战争方面，第三种（指指南针）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力量和影响都仿佛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3页）而造纸术的发明和革新，

又极大地推动了文化知识的传播和提高，它对人类文明进化的意义更是难以估量的。所以，四大发明被视为中华文明的象征。但是，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发明创造，对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远远不止于四大发明，还有许许多多，这里就本书所收科学家略举数例以说明。

先秦时期的著名医学家扁鹊，医术高超，在公元前 5 世纪就已经全面地应用“望、闻、问、切”技术诊断病症，尤其擅长切脉，开创了中医脉学理论的先河；他已熟练地运用针刺法、热熨法、服药法等多种方法兼用的综合疗法；他所提出的“六不治”医疗原则，反映了他高尚的医德和坚持在医学中涤除巫术的唯物主义观点。这些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也是独领风骚的，对后世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扁鹊学派。

战国末期的著名水利专家李冰，主持修建的都江堰防洪灌溉工程，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型水利工程之一。其规划、设计和施工，都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创造性。它的建成，使成都平原从此成为水旱从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都江堰建成至今已两千多年，仍然能有效地进行防洪、灌溉，继续为民造福。这在世界水利史上，是无与伦比的。

东汉时期杰出的天文学家和机械技术专家张衡，于公元 117 年就研制成功世界上最早的机械性计时器——水运浑天仪；于公元 138 年又第一个创造测定地震的仪器——候风地动仪。他撰写的《录宪》是世界古代天文学名著之一，其中提出了不少极有价值的见解，例如：他的宇宙起源论与现代宇宙演化学说的精神相通；“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的宇

宙无限性的精辟论述，与当代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相合；他指出日、月的角直径为周天的 $1/736$ ，即为 $29' 24''$ ，与近代测定值仅差 $2'$ 左右；科学地阐释了月食的成因，在张衡之前尚无明晰的解释。对此李约瑟给予很高评价，认为从此建立起正确的月食理论；张衡还指出日、月五星离天有远近，“近天则迟，远天则速”，这与古希腊的天文学思想遥相媲美；他对流星和陨星产生原因的解释及其科学思想，是西方古代天文学中所没有的。

东汉末三国初期的著名医学家华佗，是使用全身麻醉技术成功地进行外科手术的世界第一人，比西方使用麻醉剂技术要早一千六百多年；他的“五禽之戏”体育医疗技术，也是世界首创。

魏晋时期的著名地图学家裴秀创造的制图六体法和所绘制的《禹贡地域图》及《地形方丈图》，使我国地图学理论和地图绘制技术达到很高成就，西方学者将其与古代希腊著名地图学家托勒密（Ptolemy）相提并论。

晋代著名炼丹家和医药学家葛洪撰写的《抱朴子内篇》，是世界炼丹史上极重要的经典著述，其中记载了许多化学反应和炼制药物的配方。例如，他在世界上首次提出了化学反应的可逆性；发明了溶解黄金的“金液方”，其法绝妙无比，不仅前无古人，而且至今仍被采用，倍受化学家们称颂；记载了制取单质砷的方法，西方直到 13 世纪德国修道会学者、炼金术士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才从化合物中分离出单质砷，比葛洪晚了九百多年。在其医学著作中关于砂虱病（即恙虫病）的论述，不仅比美国医生帕姆 1878 年的记载

早一千五百多年，而且和一千六百多年之后的现今认识基本一致；他有关天花的论述比阿拉伯医生雷撒斯早五百多年。

南北朝时期的著名数学家祖冲之将圆周率的精确度推算到小数点以后的第六位数。这一密率值不仅在世界上最早提出而且是最精确的，至今仍在全世界被采用。在欧洲，德国人奥托和荷兰人安托尼兹得到这一结果，是在一千多年后的16世纪。

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关于地磁偏角的论述，比意大利哥伦布的发现早四百多年；他进行的声学共振实验，比西方类似的实验早七百多年；他创制和首倡的十二气历（一种纯阳历制度），与19世纪英国气象局采用的肖伯纳历实质相似；他在水利工程上发明的分段筑堰，逐段测量的方法，在当时世界上是相当先进的。

宋代医学家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是世界上最早的小儿科医学著作，比意大利巴格拉儿德医生的《儿科集》的问世早三百一十五年。

元代杰出的天文、水利学家郭守敬制造的测量天体坐标位置的“简仪”，其观测精度，西方直到三百年后丹麦天文学家第谷（B. Tycho）所研制的仪器才能与之媲美；他制定的《授时历》，其中对地球绕日一周的时间测定之精确度与实际值仅差26秒，与现行的公历相一致，但它比公历要早三百年。《授时历》中所使用的“招差法”也比欧洲的早四百年。“简仪”中的“圆轴”，是世界上最早关于滚动轴承的运用。

明代医学家李时珍用毕生精力所著的《本草纲目》，被誉为“东方医学巨典”，是世界药物学的宝库，已被译成英、俄、

日、德、法、拉丁等多种文字，广为传播，对世界医学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明代杰出的科学家和艺术家朱载堉，在乐律和数学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他最早地创建了十二平均律，并用等比数列算法解释其原理，从而彻底解决旋宫变调、和声演奏问题，比获得同一成果的欧洲数学家斯蒂文(S. Stevin)早二十年；他发明的律管管口校正方法及其计算公式，为现代音乐家所验证；他还最早地应用珠算进行开方计算、九进位和十进位的小数换算，比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G. W. Leibniz)发现和运用不同进位制(二进制)互相换算早一百多年；等等。

上述数例，皆为收入本书的科学家。其实在中国历史上，除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所载科学家和发明家之外，曾在某个或某些科学领域取得当时世界领先成就者，尚不乏其人。例如：

魏晋年间的杰出数学家刘徽于公元 263 年注释《九章算术》，该书中反映了他许多创造性的数学成就，影响深远，支配我国数学的发展一千多年，成为世界东方数学的代表作。

北魏时期的农学专著《齐民要术》的作者贾思勰，在公元 6 世纪就记述了在农业上实施轮作制以恢复和提高土壤肥力，并阐明豆类作物的肥效和不同轮作方法对谷物产量的影响。而在欧洲直到 18 世纪 30 年代英国人才开始推行绿肥轮作制。

南宋时期著名数学家秦九韶在其所著《算书九章》中关于高次方程数值解法和一次同余组解法，即“正负开方术”和“大衍求一术”，是当时世界数学所达到的最高水平，比英国

著名数学家霍纳创造的类似方法早五百多年。

元代数学家朱世杰在他的《四元玉鉴》中所创造的消去法，将多元高次方程组依次消元，最后只求一个未知数而解整个方程组的求解问题，这比西方同类问题的研究成果早四百多年；朱世杰对高阶内插法的研究成就也比西方 17 世纪数学家格雷戈里（J·Gregorg）和牛顿（I·Newton）的同类成果早三百多年。所以，20 世纪美国著名科学史家萨顿评价朱世杰说：“他所生存的时代的同时也是贯穿古今的一位最杰出的数学家。”

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所著的《徐霞客游记》，其中对石灰地貌的考察，比欧洲学者爱士倍尔早一百三十多年；对石灰岩地貌的分类比欧洲人璁曼的同类研究成果早两个多世纪。等等。

因此，科学家是否见之于正史，并不是衡量科学成就的标准。一些未列入正史的科学家和发明家的成就和贡献，也是璀璨的，辉煌的。不过，本书收入的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中的三百多位科学家和发明家，已覆盖了所有的学科，基本上反映了我国古代科学成就。除了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专业人员外，对一般读者来说是能够满足需要了。

需要说明的，一是明清时期，西学东渐，一些长期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传教士，由于努力介绍当时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对中国近代科学的新生起了积极的作用。因此，本书选取了其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传记，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一律按二十五史中人物所在卷次先后统一排列；二是正史中的科学家传记，多以叙述其生平和政治生涯为主，关

于他们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发明创造，一般讲得都比较简略，有些甚至就简单地提一下名字。之所以如此，与历代政府及史书的作者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之认识不无关系。为了让读者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他们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和这些发明创造的历史意义，也为了给对中国科技史愿意作进一步研究的读者提供线索，我们给每一位传主写了一篇“说明”，置于传记译文的前面。每篇“说明”，虽然文字很概括，长短不一，长的一千多字，短的几百字，但基本上都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传主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可以说是一篇“微型”的科学家传记。

全书采取原文（古文）与译文（白话）对照的方式，以期满足范围更为广泛的读者的需要。对从事科学技术史研究的专业工作者，汇二十四和《清史稿》中的主要科学家于一书，文、白兼备，无疑方便工作上的参考和使用。对有兴趣学习和了解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中等文化水平的人，可以越过古文的障碍，或借助文、白对照，克服阅读古文的困难。也许能够既学习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又提高了阅读古文的能力，一举两得。

将古文译成现代语体文，并非易事。特别是翻译关于科学技术的古文，更为艰难。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尽量采用直译的方法，力求将原文准确、通俗、流畅地翻译出来。但原文中有些地方，尤其是有关科技的特殊表述，直译过来很费解，甚至很难表达原意。凡是难以直译的地方，我们采取了意译的办法，即以尽可能精练简洁的现代语体文把原文的意思译出。为了使译文通顺、流畅、易懂，少数地方于原文之

外,按现代语体文的要求,以利于表达原意为原则,增加了一些文字。

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是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昆明、西安、郑州、长沙、呼和浩特等地的科学史研究部门和高等院校的科学史专家。没有他们的热情支持,本书是难以完成的。

在编辑本书的过程中,承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王奎克、陈久金、何绍庚、范楚玉、苟萃华、赵承译、曹婉如(以姓氏笔画为序)几位研究员和内蒙古师范大学李迪教授分别审阅本书中部分译稿,承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所李经伟、傅芳两位研究员协助邀请贵所一些学者承担了部分医学史家传的撰译工作,并审阅其稿件,在此一并致以诚挚谢意。

译者、编者都力图提高其质量,尽量不出或少出差错。尽管如此,但本书的选目还会有不当之处,译文也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祈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赵慧芝

1994年10月8日

李 冰 传

——《史记》卷二九

【说明】李冰，生卒年、籍贯不详。是战国（公元前 475—前 221 年）末期著名水利专家。李冰具有广博的天文、地理知识。他主持修建的都江堰综合性防洪灌溉工程，是我国保留至今的最古的水利工程，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水利工程之一。

都江堰建于岷江中游、四川灌县附近。岷江发源于四川西北的岷山，上游峡深谷幽、水流湍急。但到了中游的灌县附近，地势陡降、豁然开朗，江水如脱缰的野马直接冲入低平的成都平原，水势汹涌浩大，常常冲毁堤岸、淹没农田、伤及百姓，造成灾害。

李冰任秦蜀守（约公元前 277—前 250 年）期间，决心彻底治理岷江水患。为此，他亲自对岷江水情、地势进行实地勘察，制定出分洪减灾、引水灌田的治水方针。都江堰水利工程由宝瓶口、分水鱼嘴、飞沙堰三部分组成。李冰组织了上万民工，凿石开山，将灌县附近的玉垒山凿开一条二十米宽的口子，称为“宝瓶口”，将岷江水的一部分引入于此。又在灌县西北的岷江中心线上修筑了鱼嘴状的分水大堤，将岷

江一分为二。西面为外江，是岷江主流。东面为内江，江水通过宝瓶口，流向成都与川西平原，起着航运、灌溉、分洪三大作用。内江两侧又开凿许许多多的沟渠、河道，共同组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灌溉网络。沿江筑有防护堤，均就地取材，用装有卵石的大竹笼累叠而成，既方便了施工，又利用卵石间空隙减少了洪水对大堤的直接压力，提高了大堤的抗洪能力。飞沙堰是一个用来溢洪排沙的低堰，建在分水鱼嘴的尾部。当洪水冲来时，内江过量的水和泥沙就漫过“飞沙堰”流入外江，从而起到分洪减淤的作用，确保内江灌溉区的安全。

据《华阳国志》记载，在内江引水口，李冰还“作三石人，立三水中”，作为水尺，视水位在石人的部位高低，来测知内江进水流量，为整个都江堰工程的水位调节提供依据，从而合理有效地进行灌溉、防洪。

都江堰水利工程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创造性，它的建成，使成都平原约三百万亩良田得到灌溉，从此“水旱从人”，“沃野千里”，而使之成为“天府之国”。这项泽被子孙的伟大工程至今仍在发挥着重大作用，为世人称道。

都江堰是中外水利史上的一大创举，它反映了李冰具有高度的聪明才智，为人类作出了巨大的科学贡献。但遗憾的是正史未给李冰立传，仅在《史记·河渠书》中简介了他的事迹。本文参考《华阳国志》、《蜀志》等有关史料，并以《史记·河渠书》中一段记载代传予以评介。

蜀守李冰开凿离堆，消除沫水水害，又开凿两条江经过

成都。这两条江都可以行船，需要时则引水用于灌溉，老百姓都备受其益，河流所经过的地方，往往引用这河水作为灌溉农田的渠水。人们受益的地方即使以万亿计，也还是不能确切地计量出它的莫大价值。 (金 菁 译)

【原文】

……蜀守冰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飡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

墨 子 鲁 班 传

——《史记》卷七四

【说明】墨子，名墨翟（约公元前 468—前 376 年），鲁国（今山东西南部曲阜一带）人。一说是宋国人，曾长期居住过鲁国，后来为宋国的大夫。墨子从小承袭木工技术，聪明巧思，精于工艺器物制作。是春秋战国之际著名的政治思想家、科学家和技术专家。

墨子原先攻习儒学，因不满儒家烦琐之礼，而另立新说。他笃学有成，是墨家学说的创始人。他周游列国，聚徒讲学，有弟子三百余人，形成了以他为首的墨家学派，与儒家并立。《墨子》一书，共七十一篇，现存五十三篇，是墨家学派的著作总汇，它代表墨子的主要思想。墨子的主张反映于其中《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节葬》、《节用》、《非乐》、《非命》等篇中。他反对儒家的“天命”和“爱有差等”说，认为“执有命”是“天下之大害”，力主“兼相爱，交相利”，人不应有亲疏贵贱之分，应“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反对权贵“繁饰礼乐”，奢侈享受。重视劳动，强调“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统治者要关心改善劳动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

劳者得息、乱则得治”。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教育目的，尤重艰苦实践，遵守纪律。相传墨家弟子都以苦为乐，都能刻苦善战，赴汤蹈火，等等。这些政治主张在当时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墨子》中的《耕柱》至《公输》各篇，记述了墨子及其弟子的言行。《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六篇是墨家的哲学和科学著作，《备城门》以下十一篇，记载了防御战争和制造器械的方法。墨子善于运用科学技术来为自己的政治主张服务，如他制造出当时最先进的守城器械，用以说服楚王和鲁班放弃攻宋计划，而避免一场战争。

墨子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主要的有：在数学方面，给出了一系列高度概括而严密的数学概念命题和定义，如“倍”、“平”、“中”、“圆”、“正方形”、“点”、“线”、“面”、“体”等，其中平行线、圆、正方形的定义和欧几里得几何学中的定义相一致。他也是第一个对十进位值制进行总结和论述的人，受到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的高度评价；在物理学方面，正确地给出了“力”、“动”、“止”等定义。他是多种光学实验的第一人，知道了光的辐射和焦点等，他对几何光学研究早于希腊和印度。墨子提出的杠杆定理比阿基米德早二百年。对声音传播的研究，巧妙地用于城市的防守上；在宇宙论方面，他建立了时空理论，并认为在连续统一的宇宙中，物体的运动表现为在时间中的先后差异和在空间中的位置移动。并精辟地阐述了物质的本原和属性等；在机械制造方面墨子尤为精通，他制造过能飞行的木鸟，制造过运行迅速、省力、耐用的车辆。《墨子》书中

的《备城门》、《备水》、《备穴》、《备蛾》、《迎敌祠》、《杂守》等篇，详细介绍了他对各种兵器、机械和工程建筑的制造技术；此外，他在认识论和逻辑学方面的成绩也是非常突出的。因此墨子是先秦时代最杰出的科学家。但因后世统治者崇儒抑墨，使墨子科学思想未获充分发展，其墨学著作直到清中叶后才受到重视和研究。

鲁班，姓公输，名般，又称公输子、公输盘、班输、鲁般。生于公元前 507 年（一说公元前 489 年），卒于公元前 444 年之后，鲁国（今山东西南部）人，在楚国做官。他是春秋战国之际杰出的机械和建筑工程专家。

鲁班出身于世代工匠的家庭，又生活在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从小就跟随家人参加过许多土木建筑工程，他聪明灵巧，掌握了许多技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传说他一生有许多发明创造，散见于许多古代典籍中，主要的有：《物原》等书载，鲁班创造了墨斗、刨子、钻子、凿子、铲子、曲尺等木工工具，因而他被尊为木工的始祖；《墨子》中记有鲁班制作了攻城的云梯、水战用的钩拒等新式兵器，在战争有效地克敌致胜，发挥了很大作用。还削竹为鹊，飞到空中，三天不下来。《鸿书》记他制作过木鸢以窥宋城。《论衡》中记载他曾制作木车马、木人，备有机关，可用于战争；《世本》、《物原》还分别记载鲁班发明石碓、砮、磨、碾等农用机械以提高工效；《事物纪原》等书还记有民间传说，即鲁班曾主持建筑桥樑、房屋，创制安装门环的底座等；此外，他还创制了用钥匙开启的锁。设计出

用机械下葬封墓的方法，等等。都说明鲁班是中国科技史上的出色技师，是科学技术的先驱者之一。

墨子和鲁班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重要人物，但在“二十五史”中无专传，仅在《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中有一小节简介墨翟的文字，并在该节文字的注释中，引录了《墨子·公输》篇，该篇出色地表现了墨子才智、勇敢和反对战争的精神，是墨子“兼爱”、“非攻”、“节用”主张的具体生动的体现。也反映了墨子和鲁班具有高超的制造军械器物的技能。本书录译《史记》中关于墨翟的文字及其注释中的《墨子·公输》篇（《史记》所录略有删节，本文依有关文献作了增补），并在“说明”中补充简介墨子和鲁班的生平及其科学成就。

墨翟（即墨子），是春秋战国时代宋国的大夫，他善于防守和抵挡敌人，主张刻苦节俭，不奢侈浪费。有人说墨子与孔子是同时代人，也有人说他是孔子之后的人。

.....

《墨子·公输》中说：

公输盘（以下简称鲁班）为楚国制造一种攻城时用来登城的新式武器——云梯，这种器械造成后，将用来攻打宋国。墨子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亲自从鲁地到楚国游说，他在途中磨破了脚，撕下衣襟裹住，日夜兼程不休息，步行十天十夜，一股劲跑到楚国的都城——郢，来见鲁班。

鲁班说：“先生来有何见教？”

墨子说：“北方有人欺侮我，愿借你的本领杀之。”

鲁班听了不高兴。

墨子说：“请献千金。”

鲁班回答说：“我是讲道理的，并不杀人。”

于是墨子起身，向他再行礼拜，说道：“请让我向你
说几句话。我从北方听说，先生造云梯，准备攻打宋国，
宋国犯了什么罪？楚国多余的是土地，而不是人口，战
争将会杀戮本来就不多的人口，而去扩大多余的土地，这
是不明智的做法；楚国企图侵略宋国，这是不仁义的举
动，知道了这个道理而不去劝阻楚王，这是不忠的行为；
劝阻而达不到目的，这是没有力量的表现；义当不杀少
数人却去杀多数人，就是不懂得类推的道理。”

鲁班听了墨子的话觉得有理，默不作声。

墨子接着说：“既然觉得不对，攻打宋国的事何不作
罢？”

鲁班说：“那不可以，我已经在楚王面前说过帮助攻
克宋国了。”

墨子说：“那么，请介绍我见楚王。”

鲁班答应说：“好吧。”

墨子拜见了楚王，说：“今天有人在这里，舍弃自己
饰有文采的漂亮车子，欲想盗窃邻里的破车子；舍弃自
己刺绣精美鲜艳的丝绸衣服，而欲想盗窃邻里破旧的粗
布衣服；舍弃自己好饭好菜，欲想盗窃邻里的糠糟之食，
这是什么样的人呢？”

楚王回答说：“这个人一定是有偷东西的癖性。”

墨子说：“楚国的国土，方圆五千里，宋国的土地，方圆才五百里，这如同装饰美丽的漂亮车子和破旧车子一样；楚国有富饶的大泽，到处都有珍稀贵重的犀牛、兕兽、麋鹿，长江和银河里有丰富的鱼类、甲鱼、大鳖和扬子鳄，是天下富庶的国家，而宋国则是所谓没有山鸡、野兔和鲫鱼的贫穷国家，这如同好饭好菜和糠糟一样；楚国有长松、梓树、黄楸木、楠木、樟树，而宋国则无大树，这如同刺绣精美鲜艳的丝绸服装和粗布的破旧衣衫一样。我认为楚王决定以强大的楚国去攻打弱小的宋国，就如同上述的比较一样，是一种不仁不义的行为。”

楚王听了之后说：“你说得很好！即使有道理，但鲁班已经为我制造好云梯，必定要攻取宋国。”

于是墨子召见鲁班，请求当面试验一下进攻和防守的战术。墨子解开身上穿戴的衣带围作城池，以木片作为守城的兵器。鲁班一连九次用了随机应变的攻城方法，都为墨子所阻挡住。鲁班的进攻器械已经全部用完，而墨子的防御还是绰绰有余。

鲁班筋疲力尽，而恼羞成怒地说：“我知道如何对付你了！我不可说。”

墨子也说：“我也知道你要如何对付我了，我也不说。”

楚王听了，问究竟是怎么回事？墨子说：“鲁班的意思，不过是想杀我。因为杀掉我，宋国不能守，就可以进攻了。然而我的学生禽滑釐等三百人，已经持我设计制造的防守器械在宋城上等待着楚国的贼兵了。即使把

我杀掉，也是没有用的。”

楚王听后称赞说：“很好！我不进攻宋国就是了。”

（赵慧芝 译）

【原文】

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

《墨子》曰：

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自鲁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盘。

公输盘曰：“夫子何命焉为？”

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者，愿藉子杀之。”

公输盘不悦。

子墨子曰：“请献千金。”

公输盘曰：“吾义固不杀人。”

子墨子起，再拜，曰：“请说之。吾从北方，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国有余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

公输盘服。

子墨子曰：“然，胡不已乎？”

公输盘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

子墨子曰：“胡不见我于王。”

公输盘曰：“诺！”

子墨子见王，曰：“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轩，邻有敝簠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梁肉，邻有糠糟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

王曰：“必为有窃疾矣。”

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犹文轩之与敝簠也；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江、汉之鱼鳖鼃鼃，为天下富，宋所为无雉兔鲋鱼者也，此犹梁肉之与糠糟也；荆有长松、文梓、楸、楠、豫章，宋无长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臣以王之攻宋也，为与此同类。”

王曰：“善哉！虽然，公输盘为我为云梯，必取宋。”

于是见公输盘。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

公输盘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

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

楚王问其故。子墨子曰：“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

楚王曰：“善哉！吾请无攻宋矣。”

张 苍 传

——《史记》卷九六

【说明】张苍（公元前 256—前 152 年），汉代阳武人。初任秦御史，因罪逃亡。后跟随刘邦起兵，以攻臧荼有功，封为北平侯。先后担任汉朝计相、御史大夫、丞相等职。张苍精通律历，通晓图书典籍以及全国户籍等。任丞相时，为汉代确立了新的律历。《汉书》云：张苍“著书十八篇，言阴阳律历事。”《旧唐书》云：“汉兴，丞相张苍首创律历之学。”因此，他在中国天文历法史上是有一定贡献的。

丞相张苍，汉阳武县人，爱好律历。秦时，他任御史，负责四方文书。后因罪而逃亡。到刘邦西进路经阳武县时，张苍随从刘邦进攻南阳。张苍因犯法应杀头，脱衣伏法时，王陵见他身材高大、肥胖，皮肤雪白如葫芦，奇怪他为一漂亮的男子，便建议刘邦赦免了他。于是，他又随刘邦西入武关，直抵咸阳。刘邦被立为汉王，去汉中，又北进关中。陈余打败常山王张耳，张耳归降刘邦，刘邦便派张苍为常山郡守。张苍随淮阴侯攻赵地，张苍擒获了陈余。赵地平靖后，刘邦任命张苍为代郡相国，以防备边疆外敌侵扰。不久，又改任张

苍为赵相，辅佐赵王张耳。张耳死后，他又辅佐赵王敖。后又改任代相，辅佐代王。燕王臧荼叛乱，汉高祖刘邦亲率大军围歼，张苍以代相的身份配合高祖出兵攻击臧荼有功，高祖六年被封为北平侯，有食邑一千二百户。

张苍后升任计相，一个月后，又改升列侯任主计，达四年。当时萧何任丞相，因张苍自秦代即任柱下史，熟悉国家图书典籍等，而且张苍又擅长计算、律历，所以，让他以列侯身份居于相府，负责郡国来的上计事项。黥布反叛而亡，汉朝立皇子长为淮南王，张苍为相辅佐他。汉十四年，张苍被授为御史大夫。

.....

张苍与绛侯等人拥立代王作了皇帝（孝文皇帝）。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丞相灌婴去世，张苍任丞相。

自汉朝初建至孝文帝，二十多年，正当国家刚建立，将校公卿都是军人担任。张苍任计相时，即推算律历，因高祖刘邦是十月进军霸上，所以不改秦代以十月为年初的旧习惯。推算五德循环之运，认为汉代正值水德的时候，因而崇尚黑色亦不改变。按音律调理乐器，以此为据确定律令，就是天下工匠各业，都有一定的工艺规范，到张苍一当丞相，就很快制定相应的律令历法。所以，汉谈律历的，实际始于张苍。张苍喜欢书，没有他不看的，也没有他所不懂的，而尤其是在律令历法上，最为擅长。

张苍曾受安国侯王陵的恩德哺育，到张苍成了有地位的人时，仍经常象侍候父亲那样对待王陵。王陵死后，张苍为丞相，例假时，常常先向王陵夫人敬献食品礼物，然后才回

家。

张苍任丞相十多年，鲁人公孙臣上书说，汉为土德时，它的标志是应有黄龙出现。皇帝将这一意见转给张苍，张苍认为这个意见是错的而不予以理睬。事后，黄龙出现于成纪，于是皇帝任命公孙臣为博士，起草土德的历法制度，并改年号。张苍由此自认为材力不足，而以年高有病为借口，少理朝政。张苍曾任命一人为中侯，那人却中饱私囊，奸滑无法，皇帝为此批评了张苍。张苍便以有病的原因而辞去丞相职务。张苍任丞相十五年而免职。孝景帝五年，张苍去世，追谥为文侯。他的儿子康侯袭封爵位，景帝八年康侯去世。康侯的儿子类又袭承侯位，八年因遇诸侯丧事礼仪失当而获罪，被取消了封国爵位。

最初，张苍的父亲身高不足五尺，到生张苍，张苍身高八尺多，为侯、做丞相。张苍的儿子身材也高大，到他的孙子时，身高仅六尺多，因犯法失去侯爵。张苍辞去丞相后，年老，口中已无齿，以女子作为乳母，整天吃奶生活。他的妻妾有几百人，凡曾怀孕的人都不再与之同居。张苍活了一百多岁而去世。

(赵 荣 译)

【原文】

张丞相苍者，阳武人也。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有罪，亡归。及沛公略地过阳武，苍以客从攻南阳。苍坐法当斩，解衣伏质，身长大，肥白如瓠，时王陵见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斩。遂从西入武关，至咸阳。沛公立为汉王，入汉中，还定三秦。陈余击走常山王张耳，耳归

汉，汉乃以张苍为常山守。从淮阴侯击赵，苍得陈余。赵地已平，汉王以苍为代相，备边寇。已而徙为赵相，相赵王耳。耳卒，相赵王敖。复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击之，苍以代相从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户。

迁为计相，一月，更以列侯为主计四岁。是时肖何为相国，而张苍乃自秦时为柱下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苍又善用算律历，故令苍以列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者。黥布反亡，汉立皇子长为淮南王，而张苍相之。十四年，迁为御史大夫。

.....

苍与绛侯等尊立代王为孝文皇帝。四年，丞相灌婴卒，张苍为丞相。

自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会天下初定，将相公卿皆军吏。张苍为计相时，绪正律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时本以十月为岁首，弗革。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吹律调乐，入之音声，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无下作程品。至于为丞相，卒就之，故汉家言律历者，本之张苍。苍本好书，无所不观，无所不通，而尤善律历。

张苍德王陵。王陵者，安国侯也。及苍贵，常父事王陵。陵死后，苍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后敢归家。

苍为丞相十余年，鲁人公孙臣上书言汉土德时，其符有黄龙当见。诏下其议张苍，张苍以为非是，罢之。其后黄龙见成纪，于是文帝召公孙臣以为博士，草土德之历制度，更元年。张丞相由此自绌，谢病称老。苍任人为中候，大为奸利，上以让苍，苍遂病免。苍为丞相十五岁而免。孝景前五

年，苍卒，谥为文侯。子康侯代，八年卒。子类，代为侯，八年，坐临诸侯丧后就位不敬，国除。

初，张苍父长不满五尺，及生苍，苍长八尺余，为侯、丞相。苍子复长。及孙类，长六尺余，坐法失侯。苍之免相后，老，口中无齿，食乳，女子为乳母。妻妾以百数，尝孕者不复幸。苍年百有余岁而卒。

扁 鹊 传

——《史记》卷一〇五

【说明】扁鹊（公元前401—310年），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医学家。原名秦越人，因其医术高超，人们使用古代传说中黄帝时代的名医——扁鹊来称呼他。

扁鹊高明的医术，首先表现在对疾病的诊断上，他已经全面地应用了中医的“望、闻、问、切”诊断技术，扁鹊称之为“望色、听声、写影和切脉”。扁鹊尤其擅长切诊，司马迁认为是扁鹊开创了中医实践中脉学理论的先河，故在《史记》中指出“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

扁鹊高明的医术，还表现在他已能在疾病治疗中熟练地运用多种方法兼用的综合疗法。如治疗虢国太子病症一例，他便采用了针刺法、热熨法和服汤药等法。

扁鹊遍游各国行医救人，不但擅内科，还能根据各地民间的需要“随俗为变”，从事妇科，小儿科，耳、眼等五官科疾病的治疗。据记载，扁鹊还精于外科手术，而且应用了药物麻醉来进行手术，注重对疾病的预防。这些不仅说明扁鹊医术高明，医学知识渊博，同时这也反映了当时医学分科专门化的发展情况。

扁鹊还提出了“六不治”的医疗原则，更表现了他医德的高尚。其中“信巫不信医”不治，正是他在医疗实践中坚持的巫、医分家的唯物主义立场。

另外，扁鹊还著有《扁鹊内经》等医学著作。

扁鹊是勃海郡鄆县人，姓秦，名越人。他年轻时曾做过别人家宾馆的主管。客人长桑君经过宾馆时，只有扁鹊认为他不平凡，常常很恭敬地接待他。长桑君也知道扁鹊不是寻常之人。他在宾馆进出了十多年，乃叫扁鹊来私下坐谈，他悄悄地说：“我有秘方，现在年老了，想传授给您，您不要泄露出去。”扁鹊恭敬地回答：“是。”于是他取出怀中的药交给扁鹊说：“这个药要用未落地的雨水、露水服用，三十天后就能洞察事物了。”于是他取出自己全部的秘方书交给扁鹊后，人忽然不见了，大概并非凡人吧。扁鹊按照他的话服药三十天，就能隔墙看到另一边的人。凭着这种本领看病，能看清五脏中所有的病结，只是以切脉为名罢了。他有时在齐国行医，有时在赵国行医。在赵国时称为扁鹊。

晋昭公时期，大夫们势力强盛而王室的力量薄弱，赵简子做晋国的大夫，专断国事。简子生病了，五天来不知人事，大夫们都很害怕，于是找来扁鹊。扁鹊进去看了病出来，董安于向他询问病情，扁鹊说：“血脉之病可以医治，你们何必大惊小怪！过去秦穆公也曾这样，七天才醒。醒来的那天，告诉公孙支和子舆说：‘我到天帝那里去了，非常快乐。我之所以在那里久留，是因为天帝正好对我有所教诲。天帝告诉我：晋国将要大乱，历经五代而不安宁，其后将要在诸侯中称霸，

霸主不久死去。霸主的儿子将使你们国家的男女不再离别。’公孙支记录并收藏了这段话，于是秦国史册上出现了这些事情的记载。晋献公时期的内乱，晋文公的称霸，晋襄公在殽山大败秦军归国后的骄奢淫逸，这些都是您所听说过的。现在主君的病也和秦穆公一样，不出三天必将好转，好转后一定有话要说。”

过了两天半，简子醒过来，告诉大夫们说：“我到天帝那里很快乐，和众神在天中游玩，乐声不绝舞蹈不断，不象三代时期的舞乐，乐曲声优美动人。有一只熊想来拉我，天帝命令我射它，我射死了熊。有只黑过来，我又射中了它，黑死了。天帝很高兴，赏赐给我两个盛器，都有配套器具。我看见一个小孩在天帝旁边，天帝送我一只翟犬，说‘等到你的儿子长大了就把翟犬赏给他。’天帝告诉我：‘晋国将一代一代衰弱，历七代后国家灭亡。嬴姓人将在范魁以西大败周人，但是还是不能拥有这块土地。’”董安于听了这番话，记录并收藏起来。并把扁鹊的话告诉简子，简子赐给扁鹊四万亩地。

后来扁鹊经过虢国，虢国的太子死了。扁鹊到虢国宫庭门前，问最喜好医术的中庶子：“太子得的是什么病？国中举办祭祷以消灾免祸的活动规模如此不同一般？”中庶子说：“太子的病是血脉不调，交错阻碍，不能畅通，突然发作，表现在体外，实际却是内脏受到了伤害。体内精气不能抵御病邪，邪气聚积在体内而不能发散，因此阳脉松弛而阴脉紧张，所以突然昏厥死亡。”扁鹊问：“他死在什么时辰？”回答说：“从鸡鸣到现在。”扁鹊问：“收敛了吗？”回答说：“没有，他

死了还不到半天。”扁鹊说：“请禀报说我是齐国勃海的秦越人，家在郑县，未曾仰见虢君风采，拜见并侍奉于他。听说太子不幸死去，我能使他活过来。”中庶子说：“先生不是在骗我吧？你凭什么说可以使太子复生呢？我听说上古时代，有个叫俞跗的医生，治病不用汤药、酒剂、簠针、砭石、导引、按摩、药物热敷，一诊断就知道病情的症候，根据五脏的部位，于是切开皮肤，剖开肌肉，疏通经脉，结扎筋腱，按摩脊髓和脑部，触动膏肓，理通横隔膜，清洗肠胃、洗涤五脏，修炼精气，改变形体。先生的医术能象这样的话，那么太子可以复活。不能象这样而想使太子复活，连小孩子也不能相信。”好久，扁鹊仰天长叹说：“你所用的治疗方法，好似从管子里看天，从缝隙中看花纹。我行医看病，不用等到诊脉、查看气色、听辨声音、观察形态，就能说出病源在什么地方。知道病人阳分的症状，就可以推知病人阴分的症状；知道病人阴分的症状，就可以推知病人阳分的症状。体内的病会反映在体表，病人又不是在千里之外，能诊断的方法很多，不能局于一隅。你认为我说的话不真实，可以进去试诊太子，应该听到他的耳鸣声而且鼻翼在煽动，顺着他的两腿至阴部，应当还有体温。”

中庶子听了扁鹊的话，目瞪口呆，于是进去把扁鹊的话报告给虢君。虢君听了大为惊讶，来到宫廷中门接见扁鹊，说：“我久闻您的高尚医德，但是没能前去拜见。先生经过我们这个小国，幸运地来为我们治病，偏僻小国的我真是太荣幸了。有先生在，太子可以救活，没有先生，太子就会被人世抛弃埋于沟壑，永远远去不能复生。”话没说完，就哭泣抽咽得呼

吸困难，神志恍惚，泪流不止，泪珠涌动，挂在睫毛上，悲痛得不能自制，容貌都变了样。扁鹊说：“象太子这样的病，是所谓的“假死症”，是由于阳气进入阴分，胃受到扰动与缠绕，经脉受损害，络脉被阻塞，分别下于三焦、膀胱，因此阳脉下坠不升，阴脉上争不降，两气交会，阻塞不通，阴气上逆，而阳气向内运行，阳气在内向下鼓动而不能升起，在上在外的阳气被隔绝而不能发挥作用。身体上部络脉的阳气已断绝，下部枢纽的阴气已经破坏，阴气破坏，阳气断绝，面容失色，脉搏混乱，所以身体静止得象死人一样。太子没有死。由于阳气侵入阴气而阻隔了脏气的可以救活，由于阴气侵入阳气阻隔脏气的就会死亡。凡是这几种情况，都在五脏厥逆时突然发作。良医可以治愈，庸医则疑惑不决。”

扁鹊就叫弟子子阳磨利针和砭石，用来刺百会穴。过一会儿，太子苏醒了，就叫子豹用五分剂的熨药，用八减之方的药物混合煎煮，用来交替熨贴两胁下面。太子坐起来了。再进一步调适阴阳气血，仅服了二十天的汤药就康复如初。所以天下人都以为扁鹊能使人死而复生。扁鹊说：“越人不能使死人复活，这是他本身应该能活过来。我不过能促使他恢复起来罢了。”

扁鹊经过齐国，齐桓侯把他当作客人招待。扁鹊入朝拜见齐桓侯，说：“您有病，在皮肤和肌肉之间，不治疗病会加深。”齐桓侯说：“我没病。”扁鹊退出，齐桓侯对左右人说：“医生贪图功利，想把没病的人也算治好当作自己的功劳。”五天后，扁鹊又去拜见齐桓侯，说：“您有病到血脉，不治恐怕会加深。”齐桓侯说：“我没有病。”扁鹊退出，齐桓侯很不高

兴。五天后，扁鹊又去拜见，说：“您有病在肠胃之间，不治疗将会加深。”齐桓侯不理睬。扁鹊退出，齐桓侯很不高兴。又过五天，扁鹊再去拜见，望见齐桓侯就退走了。桓侯派人问这是什么原因，扁鹊说：“病在皮肤和肌肉之间，是汤药和熨药的效力所能达的；病在血脉，是针灸的砭法的效力所能达到的；病在肠胃，是药酒的效力所能达到的；病在骨髓，即使是掌管生死的神也无可奈何了。现在桓侯病已到骨髓，我因此不再请求给他治病。”五天后，桓侯发病，派人召请扁鹊，扁鹊已逃走了，桓侯于是就死了。

如果聪明人预先察觉还未显露的病，能让好医生及早治疗，则病可以治好，身体可以存活。人们所担忧的，就是疾病太多。而医生所担忧的，是怕治病的方法少。所以疾病有六种情况不好治疗：骄横恣纵不讲道理，是一不治；轻视身体看重钱财，是二不治；衣着饮食不能调节适当，是三不治；阴阳血脉混合，五脏之气不定，是四不治；身体非常瘦弱，不能服用药物，是五不治；迷信巫术，不相信医学，是六不治。有这其中一种情况，就非常难治疗。

扁鹊名闻天下，经过邯郸，听说当地重视妇女，就做妇科医生；经过洛阳，听说周地人爱护老人，就当治耳、目及四肢痹痛的医生；来到咸阳，听说秦国人喜欢孩子，就做儿科医生，随着各地风俗改变行医科别。秦国太医令李醯自知医术不如扁鹊，派人刺杀了他。至今天下谈论脉学的人，都遵循扁鹊的理论和方法。

(金 菁 译)

【原文】

扁鹊者，勃海郡郑鄆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时为人舍长。舍客长桑君过，扁鹊独奇之，常谨遇之。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余年，乃呼扁鹊私坐，间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扁鹊曰：“敬诺。”乃出其怀中药予扁鹊：“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忽然不见，殆非人也。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为医或在齐，或在赵。在赵者名扁鹊。

当晋昭公时，诸大夫彊而公族弱，赵简子为大夫，专国事，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于是召扁鹊。扁鹊入视病，出，董安于问扁鹊，扁鹊曰：“血脉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尝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孙支与子舆曰：‘我之帝所甚乐。吾所以久者，适有所学也。’帝告我：‘晋国且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公孙支书而藏之，秦策于是出。夫献公之乱，文公之霸，而襄公败秦师于殽而归纵淫，此子之所闻。今主君之病与之同，不出三日必间，间必有言也。”

居二日半，简子寤，语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罍来，我又射之，中罍，罍死。帝甚喜，赐我二笥，皆有副。吾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壮也以赐之。’帝告我：‘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将大败周人于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书而藏之。以扁鹊言告简子，简子赐扁

鹄田四万亩。

其后扁鹊过虢。虢太子死，扁鹊至虢宫门下，问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国中治穰过于众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气不时，交错而不得泄，暴发于外，则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气，邪气畜积而不得泄，是以阳缓而阴急，故暴蹶而死。”扁鹊曰：“其死何如时？”曰：“鸡鸣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齐勃海秦越人也，家在于郑，未尝得望精光侍謁于前也。闻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无诞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闻上古之时，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醴酒，鑿石挢引，案扞毒熨，一拨见病之应，因五藏之输，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脑。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漱涤五藏，练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则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婴之儿。”终日，扁鹊仰天叹曰：“夫子之为方也，若以管窥天，以郄视文。越人之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病应见于大表，不出千里，决者至众，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为不诚，试入诊太子，当闻其耳鸣而鼻张，循其两股以至于阴，当尚温也。”

中庶子闻扁鹊言，目眩然而不睞，舌挢然而不下，乃以扁鹊言入报虢君。虢君闻之大惊，出见扁鹊于中阙，曰：“窃闻高义之日久矣，然未尝得拜謁于前也。先生过小国，幸而举之，偏国寡臣幸甚。有先生则活，无先生则弃捐填沟壑，长终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嘘唏服臆，魂精泄横，流涕长潸，忽忽承眊，悲不能自止，容貌变更。扁鹊曰：“若太子病，所

谓‘尸蹶’者也，夫以阳入阴中，动胃缠缘，中经维络，别下于三焦、膀胱，是以阳脉下遂，阴脉上争，会气闭而不通，阴上而阳内行，下内鼓而不起，上外绝而不为使，上有绝阳之络，下有破阴之纽，破阴绝阳，（之）色（已）废脉乱，故形静如死状。太子未死也。夫以阳入阴支兰藏者生，以阴入阳支兰藏者死，凡此数事，皆五藏蹵中之时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

扁鹊乃使弟子子阳厉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有间，太子苏。乃使子豹为五分之熨，以八减之齐和煮之，以更熨两胁下。太子起坐。更适阴阳，但服汤二旬而复故。故天下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扁鹊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

扁鹊过齐，齐桓侯客之。入朝见，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谓左右曰：“医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为功。”后五日，扁鹊复见，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不悦。后五日，扁鹊复见，曰：“君有疾在肠胃间，不治将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不悦。后五日，扁鹊复见，望见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问其故。扁鹊曰：“疾之居腠理也，汤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针石之所及也；其在肠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虽司命无奈〔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后五日，桓侯体病，使之召扁鹊，扁鹊已逃去。桓侯遂死。

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早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医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

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

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雒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秦太医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鹊也，使人刺杀之。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

仓 公 传

——《史记》卷一〇五

【说明】仓公姓淳于，名意，生于公元前 205 年（一说公元前 216 年），卒年不详。齐临菑（今山东淄博市东北）人，活动于西汉初期。因曾当过齐国太仓长，故又称太仓公，省称仓公。他年轻时先学医于公孙光，后从师公乘阳庆。两位名师将家藏重要医书，如《经脉上》、《经脉下》、《四时阴阳重》、《顺逆》、《黄帝脉书》、《扁鹊脉书》、《上经》、《下经》、《揲度》、《药论》等全都传授给他。由于名师指点，加上自己的勤奋学习，终于掌握了黄帝、扁鹊等人的医术，成为能“诊病决生死”的名医，到处流动行医，为人治病。他辩证审脉，治病多有效验，深受人们敬佩。

仓公精良高明的医术，受到各侯国统治者的重视，为使用方便，都争相聘他到自己身边。仓公对此很反感，于是离开齐国，周游各国。此时期，齐文王患病，无良医及时治疗而死，齐王家族诬告仓公擅离职守，因此，于汉文帝四年（公元前 176 年），仓公犯罪应该受刑，押送长安。他五个女儿中最小的女儿缇萦随父西行，并上书文帝，愿意贬为官奴，以赎父刑。文帝被她的精神所感动，予以特赦，而使仓公免

受肉刑。在中国医学史上，仓公的主要成就有二，一是首创医案，这篇《史记·仓公传》记载了仓公行医的二十五例医案，记录了他治病的真实情况，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病史记录。它不仅为后世医案记录树立了模式，而且对临床医学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二是通过长期的医疗实践，摸索出简便有效的“寸口”切脉诊断法，即只切候上肢腕部的动脉，便能诊断病症，并开创了中医以寸口脉象分候内脏病症的先河。这种切脉法一直沿用至今。中国古代经脉学说的重要典籍《难经》，有人认为是仓公所撰。此外，他高尚的医德，也为后世医者树立了榜样。

太仓公，是齐国都城粮仓的长官，临醜（今山东淄博）人，姓淳于，名意。年轻时代喜好医药方术。汉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另向同郡元里的公乘阳庆拜师。阳庆已经七十多岁了，没有儿子，让淳于意全部抛弃他的旧医术，再把自己的秘方传给他，传授黄帝、扁鹊的诊脉书，以及根据面部五色诊断疾病的方法，知道人的生死，判断疑难病症，确定是否可以治愈，还有谈论药理的书，非常精妙。淳于意学习了三年，给别人治病，判断生死大多数有效验。然而到诸侯国四处行游，不以家为家，有时不替人治病，病人中有许多怨恨他的。

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时，有人上书告发淳于意，因为他犯罪应该受刑，用传车押着西去长安。淳于意有五个女儿，跟随着他哭泣。淳于意很生气，骂道：“生孩子不生男孩，紧急关头没有可使用的人！”这时小女儿缇萦伤感父亲的话，

就跟随父亲西行。她上书说：“我的父亲做官吏，齐国称赞他廉洁公平，如今犯法应该受刑。我深切地悲痛被处死的不能复活，而受刑体残的人不能再复原，虽然打算改过自新，没有道路可走，最终得不到改过自新的机会。我愿意投入官府为奴婢，来赎父亲的刑罪，使他得以改过自新。”这封书信皇帝知道了，皇帝怜悯她的心情，这一年也废弃了肉刑法令。

淳于意住在家里，有诏书询问他治病决断生死灵验的有什么人？病主叫什么名字？

诏书询问太仓长臣子淳于意：“医术有什么特长，以及能治什么病？有没有医书？都是从哪里学来的？学了几年？曾经有效验，是哪个县哪个里的？患的什么病？用医药治他的病，情况都怎么样？都全部回答。”臣子淳于意回答说：

从我年轻时起，就喜好医药，医药方试于病人大多数不灵验。到了高后八年，遇见了我的老师临醜元里公乘阳庆。阳庆年岁七十有余，我得以侍奉他。他告诉我说：“全部抛弃你的医书，你的医书不正确。我有古代有学问的先辈医师遗传的黄帝、扁鹊的脉书，根据面部五色诊断疾病，知道人的生死，决断疑难病症，确定可以治愈的方案，以及医药理论书籍，非常精妙。我家富裕，心里喜欢你，想全部把我的秘方医药书教给你。”我就说：“太幸运了，这不是我所敢希冀的。”我马上离开坐席再次跪拜请求，接受了《脉书上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等秘书，加以阅读、理解和体验，大约一年左右。第二年就去试验，有成效，然而还没有达到精益求精。大约侍

奉我的老师三年左右，就曾为人医疗，诊断病情，决断生死，有成效，医术已经精良。现在阳庆已死去十年左右，我又从师学习了满三年，今年我三十九岁。

齐国侍御史成自己说得病头痛，我诊他的脉，告诉他说：“你的病情严重，不能说出来。”于是就走出来，单独告诉成的弟弟昌说：“这是得毒疮病，在体内长在肠胃之间，五天后会肿起来，八天后呕脓死亡。”成的疾病得自于酒色。成便如期死了。我所以知道成的疾病，是我切诊他的脉时，得到了肝脏有病的脉气。反映肝脏的脉气重浊而沉静，这是内关的疾病。脉法说：“脉长而且弦，不能随四季变化的，他的病根在于肝脏。脉和是肝的经脉有病，脉不规则是肝的络脉有病。”脉和肝的经脉有病的，其病得自于筋髓。脉不规则而突然中止的，疾病得自于醉酒后行房事。我所以知道五天后毒疮肿起，八天后呕脓死去，是因为切他脉时，发现少阳经络的脉象出现代脉。出现代脉说明少阳经脉有病后，又发展到了少阳络脉，由络脉主病。病势遍及全身，人就死亡了。当时，左手寸口脉的关部一分处出现代脉，所以内热而脓未发作，达到五分处，就到了少阳脉位的界限。到第八天，就呕脓死亡。所以代脉到达二分处而脓疮发作，到了最高界限而毒疮肿大，脓尽泄而死，热气上行就薰蒸阳阴经脉，烧伤小络脉，小络脉变动就使络脉交结处出现病情，络脉交结处出现病情，继而就糜烂崩溃了，所以络脉之间交相阻塞。热气已经上行，到达头部而摇动，所以头痛。

齐王二儿子的所有婴儿中最小的儿子患病，叫我诊他的脉，我告诉说：“是气膈病。这病使人烦闷，吃不下饭，常常呕出胃沫，病得自于心中忧愁，时常厌食。”我就给他配制下气汤让他喝，一天就膈气下消，两天能吃饭，三天病就痊愈了。我所以了解小孩子的病，是因为诊他脉，感觉到了心病的脉气，心脉重浊、急躁而轻浮，这是阳气郁结的疾病。脉法说：“脉来时频繁迅速，脉去时艰难，来去感觉不同的，病根在心脏。”浑身发热，脉象强盛，这是重阳，阳热过重，心神摇荡。所以烦闷，吃不下饭，就是络脉有病，络脉有病则血液向上冲出，血液向上冲出的要死亡。这病是心中悲伤引发的，病得自于忧虑。

齐国郎中令循患病，许多医生都认为是逆气进入胸腹，而采取针刺治疗。我给他诊断说：“这是涌疝，让人不容易解大小便。”循说：“不能解大小便三天了。”我给他喝火齐汤，第一次喝了能解大小便，第二次喝了大小便畅通，第三次喝了病痊愈了。病得自于房事。我所以知道循的病是因为诊他的脉时，右手寸口脉气急迫，感触不到五脏的病气，只是右手寸口脉大而数。脉数是中焦、下焦积热汹涌，左手脉数是热往下行，右手脉数是热往上行，左右手的寸口各部都没有五脏病脉，所以说是涌疝。体内积热，所以尿是赤色的。

齐国的中御府长信患病，我去诊他脉，告诉说：“这是热病的脉气。然而由于天热出汗，脉搏略有衰弱，不会死亡。”我说：“这病得自于用流水洗浴而感到非常寒

冷，过后就发烧。”信说：“嗯，对的。去年冬天，替齐王出使楚国，到达莒县阳周水过，莒县的桥梁毁坏严重，我就揽住车辕不想渡水，马惊了，便掉了下来，我的身体淹没水中，几乎死去。小吏员立刻来救我，我从河水中出来后，衣服湿透了，过了片刻身体感到寒冷，寒冷过后热得如同火烧，到现在不能遇寒。”我就给他配制了液汤火剂退热，第一次喝了汗消失了，第二次喝了烧退了，第三次喝了病止住了。让他接着服药，前后二十天左右，身上没有病了。我所以知道信的病情，是因为诊他的脉时，发现他的脉都属于阴脉。脉法说：“热病中阴阳交相错乱的是死亡病症”。我诊切的脉象，阴阳并不交相错乱，但都属阴脉。全是阴脉的，脉象顺畅清静的可以治愈，他的体热虽然没有全部消除，还是可以活命。肾的脉气有时微浊，在寸口依稀可以感触到，这是体内有水气。肾本来是主管水的代谢，根据这一点了解了病情。一段时间失治，就会转变为时寒时热病。

齐王的太后患病，叫我去诊脉，我说：“这是风热袭入膀胱，大小便困难，尿色赤红。”我让她服用火剂汤，第一次服用后可以大小便，第二次服用病痊愈了，小便和从前一样。这种病得自于大小便时宽衣出溻。所谓“溻，就是脱去衣服而汗被吹干受凉。我所以知道齐王太后的病情，是因为我诊她的脉，感触到手腕湿润，受了风。脉法说：“脉象沉又大又坚，脉象浮又大又紧的，病根在肾。”触摸太后的肾脉却相反，脉象粗大而急躁。脉象粗大，是膀胱有病，脉象急躁，是体内发热而尿赤红。

齐国章武里的曹山跖患病，我诊他的脉，说：“这是肺消瘵，加上寒热症。”立刻告诉他说：“必定死亡，无法治疗。应适当地进行调养，这是不能治疗的病。”医书上说：“三天后该发狂，妄自起来乱走，想要乱跑，五天后死亡。”果然就如期死去。曹山跖的病得自于大怒后便行房事。我所以知道曹山跖的病情，是因为我诊他的脉，发现肺热。脉法说：“脉象不平稳，跳动无力，是身体衰败。”这是五脏从上部的心肺，到下部的肝肾罹病，所以诊脉时，脉象不平稳而出现代脉。脉象不平稳，血液不停留在肝脏。代脉是脉搏紊乱和剧烈跳动一起发生，忽然急躁，忽然粗大。这是肺肝的络脉被破坏了，所以必定死亡，无法医治。之所以另外加上寒热症，说明病人如死尸一样神散肉脱。死尸一样的人，身体已经毁坏。身体毁坏的人，不能用针灸和服药来治疗。我没有前去诊断时，齐国的太医先诊治过曹山跖的病，灸他足上少阳经脉的穴位，让他服用半夏丸，病人立刻大量腹泻，腹中虚弱。又灸他的少阴脉，这就很厉害损伤了肝的阳刚之气。破坏病人的元气达到这种程度，因此病人另外增加了寒热症。之所以三天后该发狂，是因为肝脏的一条络脉横过乳下，连结阳明经脉。所以肝脏的这条络脉被损坏，累及阳明经脉，阳明经脉被损伤，就会发狂乱跑。之所以五天后死亡，是因为肝脏与心脏相距五分，肝脏的元气五天消耗完，元气消耗完，人也就死了。

齐国的中尉潘满如患有小腹疼痛病，我诊他的脉，说：“这是遗留腹中的气体积聚成痼痛。”我立刻对齐国

太濮饶、内史繇说：“中尉再不自己停止房事，三十天就会死去。”后来过了二十多天，尿血而死。这病得自于饮酒后行房事。我所以知道潘满如的病情，是因为我诊他的脉深沉、细小、微弱，三种阴脉突然汇合，这是脾脏有病的脉气。右手寸口脉象非常紧张、细小，呈现出痼痛的脉象。根据人体五脏相克制的次序，所以推断三十天后死亡。三种阴脉聚集在一起出现的，符合三十日死的规律。三种阴脉不聚集在一起出现的，很短时间断定生死。三种阴脉出现一次，代脉出现一次的，近期死亡。潘满如三种阴脉聚集在一起出现，所以如上所说尿血而死。

阳虚侯的丞相赵章患病，叫我去。许多医生都认为受了寒。我诊他的脉，说：“这病是迴风。”所谓迴风，饮食下咽后，常常呕出来。医书上说：“五天后死亡”，后来十天才死。这种病得自于饮酒。我所以知道赵章的病情，是因为我诊他的脉，脉象来的滑，是内风病的脉。饮食下咽常常呕出来，按医书上说五天死亡，这都是前面说的“分界法”。过了十天才死去，之所以超过了期限，是因为赵章喜爱稀粥，所以胃气充实，胃气充实，所以超过了死期。我的老师说：“能够容纳消化谷物的过期死亡，不能容纳消化谷物的不到期限就会死亡。”

济北王患病，叫我诊他的脉，我说：“这是风厥，胸内烦闷。”立刻配制了药酒，服用完了三石，病痊愈了。这病得自于出汗时人伏在地上。我所以知道济北王的病情，是因为我诊他的脉时，感觉到了风邪的脉，心脉

重浊。根据病理，疾病进入人体肌表，卫外的阳气消失了，而阴寒之气侵入体内。阴寒之气进入体内扩张开，寒气就往上逆，而热气下流，所以胸内发闷。知道病人出汗后伏在地上，是因为我诊他的脉，脉气阴邪。脉气阴邪，必定是疾病已进入体内，服用药酒后，病邪随着汗水出来了。

齐国北宫司空的夫人出於得了病，许多医生都认为风邪进入体内，病根在肺，刺出於足少阳经脉进行治疗。我诊她的脉，说：“患的是气疝病，影响到膀胱，大小便困难，而尿赤红。这种病遇寒就小便失禁，让人腹胀。”出於的病得自于想要小便而没有去小便，接着行房事。我所以知道出於的病情，是因为我诊她的脉粗大而充实，脉来时艰难，这是厥阴经脉变动而发生的病。脉来的艰难，是因为疝气影响了膀胱。腹之所以肿，是因为厥阴经的络脉结系在小腹。厥阴经脉有病，络脉结系的地方出现变动，出现变动就会腹胀。我灸她的足上厥阴经络，左右各一处，小便就不失禁，尿也变清，小腹不疼痛了。又另配制火齐汤让她服用，三天疝气消失，就痊愈了。

从前济北王的乳母自己说足心发热而烦闷，我告诉她：“这病是热厥。”就刺她的足心各三处，按住针孔，不让血渗出来，病立刻痊愈。这病得自于饮酒大醉。

济北王叫我给各位侍女诊脉，到了女子竖，表面看竖没有病。我告诉永巷长说：“竖伤脾，不能劳累，按常规应该春天呕血死亡。”我告诉济北王说：“这位才女竖有什么本事？”济北王说：“她的才能是喜好技术，有许

多技能，能从旧技术中创造出新意，往年从民间买来，花了四百七十万钱，买了同样的四个人。”济北王说：“莫非她有病？”我回答说：“竖的病很严重，在死亡的范围中。”济北王把竖叫来审视，她的颜色没有变化，认为不会像说的那样，不卖给其他诸侯。到了春天，竖捧着剑跟随济北王去厕所，济北王离开厕所，竖落在后面，济北王派人去叫她，她倒在厕所，呕血而死。这种病得自于流汗。流汗的，按规律体内病重，毛发、面色润泽，脉搏并不衰弱，这也是内关一类的病。

齐的中大夫有龋齿病，我灸他左手阳明经脉，立刻给他配制了苦参汤，每天用三升漱口，前后五、六天，病痊愈了。这病得自于受风，以及躺着睡觉张着嘴，吃饭后不漱口。

醜川王的妃嫔怀胎难产，来叫我。我前往，让她服用一小撮莨菪药末，用酒送服，不一会就生出来了。我又诊她的脉，脉搏急躁。急躁的还有遗留的病，就让她服用一剂硝石，阴道出血，血像豆粒那么大，大概有五、六枚。

齐国丞相门客的奴仆跟随主人上朝走进王宫，我看见他在宫门外吃食物，审视他的脸色带有病气。我立刻告诉了宦官平。平喜好诊脉，在我这儿学习，我就把门客奴仆的病指点给他，告诉他说：“这是伤脾的病，应到春天阻塞不通，不能饮食，根据常规到夏天泄血死亡。”宦官平就前去告诉丞相说：“您门客的奴仆有病，病情严重，死期指日可待。”丞相说：“你怎么知道的？”回答说：

“您上朝时进入宫内，您门客的奴仆在宫门外吃个没完，我和仓公站着，仓公就指给我说，像这样的病会死亡。”丞相立刻叫来门客告诉他说：“您的奴仆有没有病？”门客说：“我的奴仆没有病，身体没有疼痛的地方。”到了春天果然病了。到了四月，泄血死亡。我所以知道奴仆的病情，是因为脾病普遍地压制五脏，伤脾的颜色交错出现在脸上各个色部，这种伤脾的颜色，看上去枯黄，仔细审视好像死草一样的青灰色。许多医生不了解，认为肚子里有大虫，不知道是伤脾。之所以到春天因病死亡，是因为脾胃病患者面色发黄，黄是土色，脾土经受不住肝木的疏达，所以到春天死亡。之所以到夏天才死亡，是因为脉法说：“病已经严重而脉象顺畅清静的叫内关”，内关一类的病，病人不知道疼痛，心情急躁，然而没有痛苦之感。如果增加一种病，便死在春天二月。如果愉快，顺其自然，可以延长一个季节的生命。之所以四月死亡，是因为我诊断病人时，他心情愉快，顺其自然。心情愉快，顺其自然的，人体还比较肥胖。奴仆的病得自于多次流汗，在火上烘烤，而又出门到外面遇上大风。

醜川王患病，叫我诊脉，我说：“郁热之气上行的‘厥’病，上部病情严重，头痛身热，让人烦闷。”我就用冷水拍他的头部，刺他足上阳明经脉，左右各三处，病症立刻消失。这病得自于洗发后就躺下睡觉。诊断如上所说，之所以称‘厥’，是因为头部发热，一直到肩。

齐王黄姬的兄长黄长卿设酒筵请客，叫我去。各位客人入座，没有上酒食，我看见王后的弟弟宋建，告诉

说：“您有病，以前四、五天，您的腰、胁疼痛，不能俯仰，又不能小便。不赶快医治，病就会侵入肾脏。趁着病邪还没有进入五脏，赶快治疗。病邪现正在肾部，这就是所说的肾脾。”宋建说：“是的，我过去有腰脊痛的病。四、五天前，天下雨，黄家的各位女婿看见我家仓廩下的基石，就去搬弄，我也想效法他们，虽然学他们的样子，却举不起来，我又放下了。黄昏时，腰脊疼痛，不能小便，到现在没有痊愈。”宋建的病得自于喜欢拿重东西。我所以知道宋建的病，是因为我审视他的脸色，颧骨部位颜色发干，肾部和腰围以下大约有四分部位枯干，所以知道他前四、五天发病。我就配制柔汤让他服用，十八天左右病痊愈。

济北王姓韩的侍女患有腰背痛，发冷发热，许多医生都认为是寒热病。我诊脉后说：“内寒，来不了月经。”就使用甯药，马上来了月经，病痊愈了。病得自于想要男子而又得不到。我所以知道韩侍女的病情，是因为我诊她的脉时，切到了肾的病脉，脉象艰涩而不连续。脉象艰涩而不连续的，来月经很艰难，所以说她来不了月经。她的肝脉强直而又细长，超出左手寸口，所以说她想要男子而又得不到。

临醜汜里女子薄吾病得很厉害，许多医生都认为患了严重的寒热病，会死去，没有办法医治。我诊她的脉，说：“这是蛲虫聚集成块。”这种病，病人腹部大，皮肤又黄又粗，触摸病灶病人感到难受。我让病人饮服一小撮芫花，排出几升蛲虫，病痊愈了，三十天恢复如故。蛲

虫病得自于寒湿，寒湿气严重郁积不能散发，变化为虫。我所以知道薄吾的病情，是因为我诊她的脉，摸她的尺肤部，尺肤部粗糙，而毛发有光泽，这是有虫的迹象。她面色润泽，是因为内脏没有感受邪气，没有重病。

齐国的淳于司马患病，我诊他的脉，告诉说：“得的应当是迴风病。迴风病的症状，食物咽下喉咙后，就拉出来。病得自于吃饱饭后迅速奔跑。”淳于司马说：“我到王家吃马肝，吃得非常饱，看见酒端上来，就离去了。乘马很快地跑回家，立刻泄了几十次。”我告诉说：“调制火剂汤和米汁服用，七、八天应该痊愈。”当时医生秦信在旁边，我离开后，秦信对身旁的阁都尉说：“淳于意认为淳于司马得的是什么病？”回答说：“认为是迴风，可以治愈。”秦信就笑着说：“这是不知道病情。淳于司马的病，按常规九天后死亡。”九天后没有死，淳于司马家又叫我去。我前去询问病况，全都象我诊断的一样。我就开了一方火剂汤与米汁一起让他服用，七、八天病就好了。我所以知道病人能治好，是因为我诊断他的脉时，摸他的脉，完全和常规相符，病和脉相顺应，所以他不会死。

齐国中郎破石生病，我为他诊脉，告诉说：“肺受伤了，不能治了，会在十天后的丁亥日尿血死去。”就在十一天后，尿血而死。破石的病，是由于从马上摔下来，栽在硬石头上得来的。我所以知道破石的病，是因为诊他的脉，感受到肺阴脉，脉来的散乱，几次脉膊跳动都不一致，面部又出现心压制肺的颜色。我所以知道他从马

上摔下来，是因为诊他的脉，触摸到了反阴脉。反阴脉进入虚里，乘肺脉。肺的脉位出现了散脉，因为心压制肺，原来的面色就发生了变化。之所以不和预料的死亡日期相符，是因为老师说：“病人能吃得下饭就会超过死期，吃不下饭不到死期就会死去。”这个人爱吃黄黍，黄黍补肺，所以病人超过死期。病人所以尿血，是因为诊脉法说：“病人调养时喜欢安静，血从下流出而死，病人调养喜欢活动，血从上流出而死。”这个人喜欢安静，不急躁，又长时间坐着不动，趴在小桌子上睡觉，所以血从下部泄出。

齐的侍医遂病了，自己炼制五石服用。我前去拜访他，他对我说：“我得了病，很幸运能得到你的医治。”我就为他诊断，告诉说：“你得的是内热病。医药理论书上说：‘内热不解小便的，不能服用五石。’石药药性猛烈，你服用它后，小便次数就会减少，赶快不要服用。从面部颜色来看，将要出现疮肿。”遂说：“扁鹊说‘性寒的石药可以治疗阴虚的病，性热的石药可以治疗阳虚的病。’药石有阴阳寒热的不同方剂，所以内有热，就有阴性石药配制的柔和药剂治疗，内有寒，就用阳性石药配制的猛烈药剂治疗。”我说：“你所说的谬误得太厉害了。扁鹊虽然这么说过，然而一定要仔细诊断，确定用药数量标准，建立各方面的规则，衡量得失，结合色与脉、表与里、有余与不足、顺与逆的规律，斟酌病人动态静态与呼吸是否协调，才可以决定怎样利用石药。医书理论说：‘热病潜伏在内，寒病反应在外表的，不能使用性烈

的药和石针’。烈性药进入体内，邪气就更加聚积，而蕴结在内的郁热更加深重。诊法说‘少阴寒病反应在外，少阳郁火蓄积在内的，不能使用性烈的药’。烈性药进入体内就撼动阳气，阴虚更加严重，阳气愈益显露，邪气流动，层层盘聚围困在腧穴周围。迅速发展成毒疮。”我告诉他以后一百多天，果然形成毒疮，发作在乳头上部，侵入锁骨上窝，导致身亡。这就是所说的医学理论只是讲述大体情况，一定要掌握其中的要领。拙劣的医生有一处没有学到，就失去了条理，颠倒了阴阳。

齐王从前为阳虚侯时，病情严重，许多医生都认为是气上逆。我诊脉后，认为是脾病，病根在右肋下面，大的像倒着放的杯子，令人气喘，气向上逆行，不能饮食。我就让他喝火剂粥，六天后，气就下行。就又让他改服丸药，前后六天左右，病痊愈了。这病得自于房事。我诊断病人时，不知道用什么经脉理论解释这种病，大体了解这种病所发生的部位。

我曾给安阳武都里成开方诊脉，成开方自己说没有病，我对他说将被沓风病所折磨，三年后四肢失去正常功能，令人喑哑无音，喑哑无音便会死亡。现在听说他的四肢已失去正常功能，喑哑而未死。这病得自于频频饮酒，又遇上剧烈的风邪。我所以知道成开方的病情，是因为我为他诊断，脉搏与脉法、奇咳术上说的“脏气相反的是死症”相合。摸他的脉，感觉到了肾反肺的脉象，按常规来说三年死亡。

安陵阪里的公乘项处患病，我诊他的脉，说：“这是

牡疝。”牡疝位于胸膈下面，向上连结肺。这病得自于房事。我对项处说：“千万不要作劳累的事情，作劳累的事情一定会呕血致死。”项处后来踢球，腰部寒冷，出了很多汗，立刻呕血。我又诊他的脉，说：“该在明天傍晚死去。”到时就死了。这病得自于房事。我所以知道项处的病情，是因为我诊切的脉感触到了反阳脉。反阳脉进入虚里，项处第二天死去。一方面能摸到反阳脉，一方面疝痛连结肺部，这便是牡疝。

臣子淳于意说：“在其他地方诊脉预言判断生死情况和医治好的疾病很多，时间长远，许多都忘记了，不能全部记忆，不敢对答。”

询问淳于意：“你所医治的病，病名大多数相同而诊断结果有差别，有的人死亡，有的人没有死亡，这是为什么？”回答说：“病的名称大多数相类似，不能全弄懂，所以古代圣人创立脉法，确定标准，建立原则，衡量得失，依据规矩，协调阴阳，区分人们的脉象，给予各种名称，与天地相适应，参考人体情况，因此才能区别百病，使它们有所差异。精于医术的人能把各种病区分开来，医疗乏术的人把各种病混同在一起。然而脉法不能全部灵验，诊断病人要利用以分度脉的方法进行区别，才可能把相同的病名区别开，说出病根所在的部分。如今我诊治的病人，都有诊断记录。我之所以把病症加以区别，是因为我拜师学习医术，刚刚学成，老师死去，因此在簿册上记录我诊治的情况，以及预测生死的日期，观察治病得失是否与脉法相合，所以到现在我知道得很清楚。”

询问臣子淳于意：“你所判断的病人生死期限，有时与期

限不合，是什么缘故？”回答说：“这都是饮食喜怒不合常规，或者不应该服用药物，或者不应该针灸，因此不按期死亡。”

询问臣子淳于意：“你的医疗技术水平能明了病情，知道生死期限，能够讲出药物哪些该用，哪些不该用，诸侯王和大臣曾有人询问你吗？在齐文王患病时，不求你诊治，是什么缘故？”回答说：“赵王、胶西王、济南王、吴王都派人来叫我，我不敢前往。齐文王患病时，我家境贫穷，想要为人治病，又实在害怕官吏留住我任命为御医，所以把户籍迁移到附近邻居名下，不治家产，出外行游，访问擅长医术的人，服侍他，经历了很长时间。我拜见了好几位老师，完全学到他们的特长，全部领悟了他们医书的内容，又能分析判断。我住在阳虚侯国，便侍奉他。阳虚侯去朝见，我跟随他去往长安，因此得到机会诊治安陵项处等人的疾病。”

询问臣子淳于意：“你知道齐文王为什么得病不起？”淳于意回答说：“没有看到文王的病情，然而私下听说文王气喘、头痛、目不明。我心里分析，认为这不是病。我认为身体肥胖而精力蓄积，身躯活动，骨肉互相不适应，所以气喘，不应该医治。脉法说：‘年龄二十脉气旺盛，应当跑动，年龄三十应当快步走，年龄四十应当安静地坐着，年龄五十应当安静地息卧，年龄六十以上元气应当深藏’。文王年龄不足二十岁，正当脉气旺盛而行动徐缓，不顺应天道四时的自然规律。后来听说医生给他针灸，病情立刻加重，这是判断病情的错误。我分析病情，认为是正气外争而邪气内入，这不是年轻人所能康复的，因此文王死去了。对于脉气旺盛的人，应该调节饮食，选择天气晴朗的日子，或驾车，或步行，开阔心

胸，使筋、骨、肉和血脉调合，排除多余的精气。所以年龄二十，称作‘易贺’，形体变化阶段，按常规不应当用砭法灸法治疗，用砭法灸法治疗会导致脉气奔腾。”

询问臣子淳于意：“你的老师阳庆从什么地方学来的医术？齐国诸侯是否知道他？”回答说：“不知道阳庆是从哪位老师那里学来的。阳庆家很富有，擅长医术，不肯为人治病，应该是由于这一缘故不被人知道。阳庆又告诉我说：‘千万不要让我的子孙知道你学了 my 的医术’。”

询问淳于意：“你的老师阳庆为什么看中你，而喜爱你，愿意把医术全部传授给你？”回答说：“我没有听说老师阳庆擅长医术。我所以知道阳庆，是因为我年轻时喜欢各家的医术，我试验阳庆的医方，多数灵验，效果极好。我听说醴川唐里公孙光擅长使用留传下来的古代医方，我就前去拜谒他。得以服事他，学习医方、阴阳变化，以及口授心传的医疗方法，我全部接受并记录下来。我想把他的其他精妙医方全部学习过来，公孙光说：‘我的医方都传授完了，对你不会吝惜。我身体已经衰老，不要再服事我了。这是我年轻时学习来的妙方，全部送给你，不要教给别人。’我说：‘得以服事在您眼前，得到全部秘方，幸运极了。我死也不敢妄自传授给别人。’过了不久，公孙光生活闲暇，我深入地分析医方的原理，公孙光看见我说的是百世不易的精辟之论，老师高兴的说：‘你一定会成为国医。我所擅长的医术都荒疏了，我的同胞兄弟住在临醴，擅长医术，我比不上他，他的医方特别奇妙，不是世人所能听到的。我中年时代，曾经想学习他的医方，阳庆不答应，说‘你不是可以学习医方的人’。必须和你一起去

见他，他该会了解你喜爱医方。他这个人也衰老了，他家中很富有。’当时没有去，正遇上阳庆的儿子阳殷来献马，通过老师公孙光向齐王进献马匹，因此我与阳殷关系友好。公孙光又把我嘱托给阳殷说：‘淳于意喜欢医术，你一定细心地对待他，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儒士。’公孙光就写信把我嘱托给阳庆，因此我知道了阳庆。我服事阳庆很恭谨，由于这个原因阳庆很喜欢我。”

询问臣子淳于意说：“官吏和百姓曾有人从师学习你的医术，等到学习完了，全部得到你的医术吗？是什么县什么里的人？”回答说：“临醕人宋邑。宋邑向我学习，我用五脏脉的诊法来教他，有一年多的时间。济北王派太医高期、王禹来学习，我教他们经脉上下分布情况和异常的络脉结第情况，讨论身上腧穴部分，以及脉气在体内上下出入邪正逆顺的情况，来选择合适的石针治疗方案，确定砭灸治疗穴位，有一年多时间。醕川王当时派太仓署负责马政的长官冯信向我请教医术，我教他顺逆两种按摩手法，讨论分析用药的规则，鉴定酸、苦、甘、辛、咸五味药性，以及组合方剂和调制汤药的方法。高永侯家丞杜信喜爱切脉，到我这里学习，我教他掌握人体各处经脉分布情况和五脏脉的诊法，有两年多时间。临醕召里的唐安到我这里来学习，我教他五脏脉的诊法和人体各处经脉分布情况，以及奇咳术，四季随着阴阳变化的道理，没有学成，被任为齐王的侍医。”

询问臣子淳于意：“诊断疾病，判断生死，能全部没有差错吗？”淳于意回答说：“我医治病人，一定首先诊他的脉，才对他进行治疗。脉象衰败和与病情相悖的不能医治，脉象顺

应的才予以治疗。如果心里没有精确地掌握脉象，把预断死亡期限的病看作可以医治，经常出现差错，我不能全部无误。”

太史公说：女子不论美丽或丑陋，进入宫廷就被妒忌；士人不论贤能还是不贤能，进入朝廷就被怀疑。所以扁鹊由于他医术高明而被害，仓公于是匿迹自隐而被判刑。缙萦上书朝廷，父亲后来得以安宁，所以老子说：“美好的东西是不祥之物。”难道说的是扁鹊这类人吗？像仓公，可以说是很接近了。

（吴宁欧 齐鲁仁 译）

【原文】

太仓公者，齐太仓长，临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医方术。高后八年，更受师同郡元里公乘阳庆。庆年七十余，无子，使意尽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甚精。受之三年，为人治病，决死生多验。然左右行游诸侯，不以家为家，或不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

文帝四年中，人上书言意，以刑罪当传西之长安。意有五女，随而泣。意怒，骂曰：“生子不生男，缓急无可使者！”于是少女缙萦伤父之言，乃随父西。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续，虽欲改过自新，其道莫由，终不可得。妾愿入身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书闻，上悲其意，此岁中亦除肉刑法。

意家居，诏召问所为治病死生验者几何人也，主名为谁。

诏问故太仓长臣意：“方伎所长，及所能治病者？有其书

无有？皆安受学？受学几何岁？尝有所验，何县里人也？何病？医药已，其病之状皆何如？具悉而对。”臣意对曰：

自意少时，喜医药，医药方试之多不验者。至高后八年，得见师临菑元里公乘阳庆。庆年七十余，意得见事之。谓意曰：“尽去而方书，非是也。庆有古先道遗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生死，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书，甚精。我家给富，心爱公，欲尽以我禁方书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谒，受其脉书上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揲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禁书，受读解验之，可一年所。明岁即验之，有验，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尝已为人治，诊病决死生，有验，精良。今庆已死十年所，臣意年尽三年，年三十九岁也。

齐侍御史成自言病头痛，臣意诊其脉，告曰：“君之病恶，不可言也。”即出，独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内发于肠胃之间，后五日当臃肿，后八日呕脓死。”成之病得之饮酒且内。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脉，得肝气。肝气浊而静，此内关之病也。脉法曰：“脉长而弦，不得代四时者，其病主在于肝。和即经主病也，代则络脉有过。”经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里。其代绝而脉贵者，病得之酒且内。所以知其后五日而臃肿，八日呕脓死者，切其脉时，少阳初代。代者经病，病去过人，人则去。络脉主病，当其时，少阳初关一分，故中热而脓未发也，及五分，则至少阳之界，及八日，则呕脓死，故上二分而脓发，至界而臃肿，尽泄而死。热

上则熏阳明，烂流络，流络动则脉结发，脉结发则烂解，故络交。热气已上行，至头而动，故头痛。

齐王中子诸婴儿小子病，召臣意诊切其脉，告曰：“气鬲病。病使人烦懣，食不下，时呕沫。病得之心忧，数忤食饮。”臣意即为之作下气汤以饮之，一日气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诊其脉，心气也，浊躁而经也，此络阳病也。脉法曰：“脉来数疾去难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热，脉盛者，为重阳。重阳者，遏心主。故烦懣食不下则络脉有过，络脉有过则血上出，身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忧也。

齐郎中令循病，众医皆以为蹶入中，而刺之。臣意诊之，曰：“涌疝也，令人不得前后溲。”循曰：“不得前后溲三日矣。”臣意饮以火剂汤，一饮得前后溲，再饮大溲，三饮而疾愈。病得之内。所以知循病者，功其脉时，右口气急，脉无五脏气，右口脉大而数。数者中下热而涌，左为下，右为上，皆无五脏应，故曰涌疝。中热，故溺赤也。

齐中御府长信病，臣意入诊其脉，告曰：“热病气也。然暑汗，脉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当浴流水而寒甚，已则热。”信曰：“唯，然！往冬时，为王使于楚，至莒县阳周水，而莒桥梁颇坏，信则揽车辕未欲渡也，马惊，即堕，信身入水中，几死，吏即来求信，出之水中，衣尽濡，有间而身寒，已热如火，至今不可以见寒。”臣意即为之液汤火剂逐热，一饮汗尽，再饮热去，三饮病已。即使服药，出入二十日，身无病者。所以知信之病

者，切其脉时，并阴。脉法曰：“热病阴阳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阴。并阴者，脉顺清而愈，其热虽未尽，犹活也。肾气有时间浊，在太阴脉口而希，是水气也，肾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时，即转为寒热。

齐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诊脉，曰：“风痺客脬，难于大小溲，溺赤。”臣意饮以火剂汤，一饮即前后溲，再饮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漘，漘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齐王太后病者，臣意诊其脉，切其太阴之口，湿然风气也。脉法曰：“沈之而大坚，浮之而大紧者，病主在肾。”肾切之而相反也，脉大而躁。大者，膀胱气也；躁者，中有热而溺赤。

齐章武里曹山跗病，臣意诊其脉，曰：“肺消痺也，加以寒热。”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适其共养，此不当医治。”法曰：“后三日而当狂，妄起行，欲走；后五日死。”即如其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内。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脉，肺气热也。脉法曰：“不平不鼓，形弊。”此五脏高之远数以经病也，故切之时不平而代。不平者，血不居其处；代者，时参击并至，乍躁乍大也。此两络脉绝，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热者，言其人尸夺。尸夺者，形弊；形弊者，不当关灸郢石及饮毒药也。臣意未往诊时，齐太医先诊山跗病，灸其足少阳脉口，而饮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虚；又灸其少阴脉，是坏肝刚绝深，如是重损病者气，以故加寒热。所以后三日而当狂者，肝一络连属结绝乳下阳明，故络绝，开阳明脉，阳明脉伤，即当狂走。后五日死者，肝与心相去五分。故

曰五日尽，尽即死矣。

齐中尉潘满如病少腹痛，臣意诊其脉，曰：“遗积瘕也。”臣意即谓齐太仆臣饶、内史臣繇曰：“中尉不复自止于内，则三十日死。”后二十余日，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内。所以知潘满如病者，臣意切其脉深小弱，其卒然合合也，是脾气也。右脉口气至紧小，见瘕气也。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阴俱抟者，如法；不俱抟者，决在急期；一抟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阴抟，溲血如前止。

阳虚侯相赵章病，召臣意。众医皆以为寒中，臣意诊其脉曰：“迴风。”迴风者，饮食下嗑而辄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后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赵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脉，脉来滑，是内风气也。饮食下嗑而辄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为前分界法。后十日乃死，所以过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脏实，中脏实故过期。师言曰：“安谷者过期，不安谷者不及期。”

济北王病，召臣意诊其脉，曰：“风蹶胸满。”即为药酒，尽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济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脉时，风气也，心脉浊。病法“过入其阳，阳气尽而阴气入”。阴气入张，则寒气上而热气下，故胸满。汗出伏地者，切其脉，气阴。阴气者，病必入中，出及瀾水也。

齐北宫司空命妇出于病，众医皆以为风入中，病主在肺，刺其足少阳脉。臣意诊其脉，曰：“病气疝，客于膀胱，难于前后溲，而溺赤。病见寒气则遗溺，使人腹肿。”出于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内。所以知出于病者，

切其脉大而实，其来难，是蹶阴之动也。脉来难者，疝气之客于膀胱也。腹之所以肿者，言蹶阴之络结小腹也。蹶阴有过则脉结动，动则腹肿。臣意即炙其足蹶阴之脉，左右各一所，即不遗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为火剂汤以饮之，三日而疝气散，即愈。

故济北王阿母自言足热而懣，臣意告曰：“热蹶也。”则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无出血，病旋已。病得之饮酒大醉。

济北王召臣意诊脉诸女子侍者，至女子竖，竖无病。臣意告永巷长曰：“竖伤脾，不可劳，法当春呕血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竖何能？”王曰：“是好为方，多伎能，为所是案法新，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万，曹偶四人。”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对曰：“竖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视之，其颜色不变，以为不然，不卖诸侯所。至春，竖奉剑从王之厕，王去，竖后，王令人召之，即仆于厕，呕血死。病得之流汗。流汗者，法病内重。毛发而色泽，脉不衰，此亦内关之病也。

齐中大夫病龋齿，臣意炙其左大阳明脉，即为苦参汤，日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风，及卧开口，食而不嗽。

醜川王美人怀子而不乳，来召臣意。臣意往，饮以莨菪药一撮，以酒饮之，旋乳。臣意复诊其脉，而脉躁。躁者有余病，即饮以消石一剂，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

齐丞相舍人奴从朝入宫，臣意见之食闺门外，望其色有病气。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为脉，学臣意所，臣

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伤脾气也，当至春鬲寒不通，不能食饮，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时入宫，群之舍人奴尽食闺门外，平与仓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而谓之曰：“公奴有病不？”舍人曰：“奴无病，身无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气周乘五脏，伤部而交，故伤脾之色也，望之杀然黄，察之如死青之兹。众医不知，以为大虫，不知伤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气黄，黄者土气也，土不胜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脉法曰“病重而脉清者曰内关”，内关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无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顺，及一时。其所以四月死者，诊其人时愈顺。愈顺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数出，炙于火而以出见大风也。

醜川王病，召臣意诊脉，曰：“蹶上为重，头痛身热，使人烦懣。”臣意即以寒水拊其头，刺足阳明脉，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发未圻而卧。诊如前，所以蹶，头热至肩。

齐王黄姬兄黄长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见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胁痛不可俯仰，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肾。及其未舍五脏，急治之。病方今客肾濡，此所为‘肾脾’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黄氏诸倩见建家京下方石，即弄之，建亦欲效之，效

之不能起，即复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见其色，太阳色乾，肾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发也。臣意即为柔汤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

济北王侍者韩女病要背痛，寒热，众医皆以为寒热也。臣意诊脉，曰：“内寒，月事不下也。”即甞以药，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韩女之病者，诊其脉时，切之，肾脉也，啬而不属。啬而不属者，其来难，坚，故曰月不下。肝脉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

临醜汜里女子薄吾病甚，众医皆以为寒热笃，当死，不治。臣意诊其脉，曰：“蛲瘕。”蛲瘕为病，腹大，上肤黄粗，循之戚戚然。臣意饮以茺华一撮，即出蛲可数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蛲得之于寒湿，寒湿气宛笃不发，化为虫。臣意所以知薄吾病者，切其脉，循其尺，其尺索刺粗，而毛美奉发，是虫气也。其色泽者，中藏无邪气及重病。

齐淳于司马病，臣意切其脉，告曰：“当病迴风。迴风之状，饮食下嗑辄后之。病得之饱食而疾走。”淳于司马曰：“我之王家食马肝，食饱甚，见酒来，即走去，驱疾至舍，即泄数十出。”臣意告曰：“为火剂米汁饮之，七八日而当愈。”时医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谓左右阁都尉曰：“意以淳于司马病为何？”曰：“以为迴风。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马病，法当后九日死。”即后九日不死，其家复召臣意。臣意往问之，尽如意诊。臣

即为一火剂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诊其脉时，切之，尽如法。其病顺，故不死。

齐中郎破石病，臣意诊其脉，告曰：“肺伤，不治，当后十日丁亥溲血死。”即后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堕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脉，得肺阴气，其来散，数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堕马者，切之得番阴脉。番阴脉入虚里，乘肺脉。肺脉散者，固色变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师言曰“病者安谷即过期，不安谷则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过期。所以溲血者，诊脉法曰：“病养喜阴处者顺死，养喜阳处者逆死”。其人喜自静，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

齐王侍医遂病，自练五石服之。臣意往过之，遂谓意曰：“不肖在病，幸诊遂也。”臣意即诊之，告曰：“公病中热。论曰：‘中热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为药精悍，公服之不得数溲，亟勿服。色将发臃。”遂曰：“扁鹊曰‘阴石以治阴病，阳石以治阳病’。夫药石者有阴阳水火之剂，故中热，即为阴石柔剂治之；中寒，即为阳石刚剂治之。”臣意曰：“公所论远矣。扁鹊虽言若是，然必审诊，起度量，立规矩，称权衡，合色脉表里有余不足顺逆之法，参其人动静与息相应，乃可以论。论曰：‘阳疾处内，阴形应外者，不加悍药及邳石。’夫悍药入中，则邪气辟矣，而宛气愈深。诊法曰：‘二阴应外，一阳接内者，不可以刚药。’刚药入则动阳，阴病益衰，阳病益箸，邪气流行，为重困于俞，忿发为疽。”意告之

后百余日，果为疽发乳上，入缺盆，死。此谓论之大体也，必有经纪。拙工有一不习，文理阴阳失矣。

齐王故为阳虚侯时，病甚，众医皆以为蹶。臣意诊脉，以为痹，根在右胁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气不能食。臣意即以火剂粥且饮，六日气下；即令更服丸药，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内。诊之时不能识其经解，大识其病所在。

臣意尝诊安阳武都里成开方，开方自言以为不病，臣意谓之病苦沓风，三岁四支不能自用，使人暗，暗即死。今闻其四肢不能用，暗而未死也。病得之数饮酒以见大风气。所以知成开方病者，诊之，其脉法奇咳言曰“藏气相反者死”。切之，得肾反肺，法曰“三岁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项处病，臣意诊脉，曰：“牡疝。”牡疝在鬲下，上连肺。病得之内。臣意谓之：“慎毋为劳力事，为劳力事则必呕血死。”处后蹴踘，要蹶寒，汗出多，即呕血。臣意复诊之，曰：“当旦日日夕死。”即死。病得之内。所以知项处病者，切其脉得番阳。番阳入虚里，处旦日死。一番一络者，牡疝也。

臣意曰：“他所诊期决死生及所治已病众多，久颇忘之，不能尽识，不敢以对。”

问臣意：“所诊治病，病名多同而诊异，或死或不死，何也？”对曰：“病名多相类，不可知，故古圣人为之脉法，以起度量，立规矩，悬权衡，案绳墨，调阴阳，别人之脉各名之，与天地相应，参合于人，故乃别百病以异之，有数者能异之，无数者同之。然脉法不可胜验，诊疾人以度异之，乃

可别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诊者，皆有诊籍。所以别之者，臣意所受师方适成，师死，以故表籍所诊，期决死生，观所失所得者合脉法，以故至今知之。”

问臣意曰：“所期病决死生，或不应期，何故？”对曰：“此皆饮食喜怒不节，或不当饮药，或不当鍼灸，以故不中期死也。”

问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论药用所宜，诸侯王大臣有尝问意者不？及文王病时，不求意诊治，何故？”对曰：“赵王、胶西王、济南王、吴王皆使人来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时，臣意家贫，欲为人治病，诚恐吏以除拘臣意也，故移名数左右，不修家生，出行游国中，问善为方数者事之久矣，见事数师，悉受其要事，尽其方书意，及解论之。身居阳虚侯国，因事侯。侯入朝，臣意从之长安，以故得诊安陵项处等病也。”

问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状？”臣意对曰：“不见文王病，然窃闻文王病喘，头痛，目不明。臣意心论之，以为非病也。以为肥而蓄精，身体不得摇，骨肉不相任，故喘，不当医治。脉法曰：‘年二十脉气当趋，年三十当疾步，年四十当安坐，年五十当安卧，年六十已上气当大董。’文王年未满足二十，方脉气之趋也而徐之，不应天道四时。后闻医灸之即笃，此论病之过也。臣意论之，以为神争而邪气入，非年少所能复之也，以故死。所谓气者，当调饮食，择晏日，车步广志，以适筋骨肉血脉，以泻气。故年二十，是谓‘易贺’，法不当砭灸，砭灸至气逐。”

问臣意：“师庆安受之？闻于齐诸侯不？”对曰：“不知庆

所师受。庆家富，善为医，不肯为人治病，当以此故不闻。庆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孙知若学我方也。’”

问臣意：“师庆何见于意而爱意，欲悉教意方？”对曰：“臣意不闻师庆为方善也。意所以知庆者，意少时好诸方事，臣意试其方，皆多验，精良。臣意闻醜川唐里公孙光善为古传方，臣意即往谒之。得见事之，受方化阴阳及传语法，臣意悉受书之。臣意欲尽受他精方，公孙光曰：‘吾方尽矣，不为爱公所。吾身已衰，无所复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与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见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传人。’居有间，公孙光间处，臣意深论方，见言百世为之精也。师光喜曰：‘公必为国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产处临醜，善为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闻也。吾年中时，尝欲受其方，杨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也”。胥与公往见之，当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给富。’时者未往，会庆子男殷来献马，因师光奏马王所，意以故得与殷善。光又属意于殷曰：‘意好数，公必谨遇之，其人圣儒。’即为书以意属阳庆，以故知庆。臣意事庆谨，以故爱意也。”

问臣意曰：“吏民尝有事学意方，及毕尽得意方不？何县里人？”对曰：“临醜人宋邑。邑学，臣意教以五诊，岁余。济北王遣太医高期、王禹学，臣意都以经脉高下及奇络结，当论俞所居，及气当上下出入邪正逆顺，以宜邾石，定砭灸处，岁余。醜川王时遣太仓马长冯信正方，臣意孝以案法逆顺，论药法，定五味及和剂汤法。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脉，来学，臣意教以上下经脉五诊，二岁余。临醜召里唐安来学，臣意教以五诊上下经脉，奇咳，四时应阴阳重，未成，除为齐王侍

医。”

问臣意：“诊病决死生，能全无失乎？”臣意对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脉，乃治之。败逆者不可治，其顺者乃治之。心不精脉，所期死生视可治，时时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太史公曰：“女无美恶，居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疑。故扁鹊以其伎见殃，仓公乃匿迹自隐而当刑。缙紫通尺牍，父得以后宁。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岂谓扁鹊等邪？若仓公者，可谓近之矣。”

刘 安 传

——《史记》卷一一八

【说明】刘安（公元前 179—前 122 年），沛郡丰（今江苏丰县）人，汉高祖刘邦之孙，袭父封为淮南王。他笃好儒学，爱好占侯方术，集天下道书，好读书鼓琴，善为文辞，才思敏捷。奉汉武帝命作《离骚传》。为人折节下士，曾“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集体编写了《鸿烈》（即《淮南子》），《汉书·艺文志》列为杂家。其内容以道家的自然天道观为中心，综合先秦道、法、阴阳等各家思想，认为宇宙万物皆由“道”所派生，“道”“覆天载地”，“高不可际，深不可测”，最终归结到“达于道者，反于清静，究于物者，终于无为”（《原道训》），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后以谋反事发自杀。

汉武帝时期（公元前 140—前 87 年），刘安积极组织和支
持变炼金属活动，据葛洪的《神仙传》载：刘安招致的数千
宾客中，最著名的有八公（有专门技术者），其中有“煎泥成
金、炼铅成银、水炼八石、飞腾流珠”者，即为炼丹术方士。
刘安主持纂修《内书》二十一篇（即现存《淮南子》），《外
书》甚重。《汉书》卷四十四说：“又有《中篇》八卷，言神
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黄白术，就是人造药金、药银

的方术。《汉书·刘向传》载：刘安还著有《枕中鸿宝秘苑书》，“书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驳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见。”颜师古注疏，说明这是一本藏在枕中的绝密的炼丹术实录。隋书和唐书还记载刘安有《淮南万毕经》、《淮南万毕术》、《淮南万毕书》，但可惜已佚。清人从《初学记》、《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书中辑录出的《淮南万毕术》，可能是这些书的残篇断语，其中载有一些长生不老及炼丹术思想的文字，如“云母入地，千岁不朽”，“曾青为药，令人不老”，“白青得铁，即化为铜”、“朱砂为录”等，表明这些书中确有伪黄金、白银的制造技术，并已发现了铁能置换铜的化学反应等等。这些史料充分说明刘安及其宾客穷究方术，对中国古代炼丹术及原始化学的发展曾作出过贡献。

《史记·刘安传》对其谋反之事记载甚详，可惜忽略了他在学术上的记述。

淮南王刘安天性喜欢读书、弹琴，却不喜欢捕鸟打猎或骑马驰骋、斗鸡走狗。他这样做，也是想暗中做些有德行的好事，以此来安抚百姓，使自己名扬天下。他经常为他父亲淮南厉王刘长的死感到怨愤，时时都想造反，却找不到机会。等到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139年），淮南王刘安入朝朝见汉武帝。刘安平时和武安侯田蚡（汉武帝的舅舅）私人关系很好。当时，田蚡在朝中任太尉，听说淮南王入朝，便出城到灞上迎接，相见后，对淮南王刘安说：“现在皇上还没有太子，大王您是高祖皇帝（指刘邦）的亲孙子，施行仁义，天下没有不知道的。假如皇上有一天去世了，除了大王您，谁还配

被立为皇帝呢？”刘安一听大喜，送给了武安侯许多金银财物。回去后，暗中交结宾客，安抚、笼络百姓，作准备谋反的事情。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天上出现了彗星，刘安心里感到很奇怪，有人劝刘安说：“以前吴王（指吴王刘濞）起兵时，天下也出现彗星，长有几尺，但却流血千里。现在彗星又出现，而且横贯天空，天下必然发生大的战争。”刘安心中认为，皇上没有太子，天下发生变故，各诸侯王都会起兵争夺天下。因此，他更加积极地打造刀剑兵器和攻城用的器具，积聚金钱，用来贿赂地方郡国和各诸侯国的游士和有奇异才能的人。聚在刘安身边的那些辩士中为刘安出谋划策的人，胡乱造作一些谣言，以讨刘安的欢心。刘安不但不悟，反而非常高兴，赏赐给他们许多金钱，并加紧造反的准备活动。

刘安有个女儿叫刘陵，人非常聪明，能说会道。刘安非常喜爱刘陵，经常给刘陵许多金钱，让刘陵到京城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去侦察朝中的动静，并联络汉武帝身边的人为内应。元朔三年（公元前126），汉武帝赐给淮南王刘安桌几和手杖，允许他不到京都朝见。刘安的王后叫荼，刘安十分宠爱她。王后生了太子刘迁，刘迁娶了汉武帝母亲王皇太后的外孙修成君的女儿为妃子。刘安暗中准备谋反的用具，怕太子妃知道而泄露此事，便和太子刘迁商议，使用欺骗手段，让太子假装不喜欢太子妃，三个月不和太子妃在一起住。然后，刘安假装对太子发怒，把太子和太子妃关在一起，整整关了三个月，太子始终不挨太子妃一下。太子妃不能忍受，要求离开，刘安便乘机上书道嫌，并把太子妃送了回去。王后荼、太子刘迁和女儿刘陵都得到刘安的宠爱，把持了淮南国

的政权，随意侵犯夺去百姓的田地和房屋，还随便抓人。

元朔五年（公元前 124），太子刘迁学习使用剑术，自认为谁也比不上自己，听说淮南国郎中令雷被善于使剑，便派人把雷被叫来，要和雷被比试剑术。在比试中，雷被一再地让着太子刘迁，但还是不慎而刺伤了刘迁。刘迁为此十分恼怒，雷被见自己闯了祸，非常害怕。当时，地方郡国有愿意参加军队的人，都要先到京都长安集中。雷被为了避祸，便表示自己愿从军去打匈奴。太子刘迁多次在刘安面前说雷被的坏话，刘安便让郎中令罢免雷被的职务，以此进行威吓，使后人不敢仿效。雷被无奈，便偷偷逃到京城长安，向汉武帝上书，辨明自己无罪。汉武帝下诏让廷尉和河南郡（治今河南省洛阳市）共同处理此事。河南郡奉诏进行调查之后，便下令逮捕淮南王太子刘迁。刘安和王后接到命令后，不愿意太子刘迁被抓走，便想调动军队造反，却犹犹豫豫，拖了十几天还没有定下来。恰在此时，汉武帝下诏令就地审理此案，而不用将太子刘迁抓到河南郡治审讯。这时，淮南国相因为寿春（淮南国治，今安徽寿县）丞秉承淮南王刘安的意思故意不发遣太子刘迁，感到十分恼怒，便上书弹劾寿春丞不执行皇帝命令，犯了不敬之罪。刘安向淮南相求情，淮南国相不予理睬。刘安也大怒，派人向上告发淮南国相，说淮南国相有罪。此事汉武帝交由廷尉审理。廷尉审理时，案情牵涉到了淮南王刘安，刘安派人打听朝中公卿的意见，朝中公卿大臣请求汉武帝逮捕淮南王。刘安知道后，大为恐慌。太子刘迁建议说：“汉朝的使者如果要逮捕大王，大王可以让人穿上卫士的衣服，持戟在庭中守卫，大王旁边的人一有动作，便

刺杀他们，我也派人刺杀淮南国中尉，然后举兵造反，那时也不晚。”当时汉武帝没答应公卿大臣逮捕淮南王的请求，而派汉朝的中尉殷宏到淮南国来就地调查审理。刘安听说汉朝使者到来，便照刘迁的话做了准备。汉朝中尉殷宏到达后，刘安见殷宏脸色非常和气，只向自己问讯为什么要罢免雷被的事，刘安自己觉得没有犯什么罪，便没有发令造反。中尉殷宏回朝后，把情况向汉武帝作了汇报。公卿大臣负责处理此案的人说：“淮南王刘安阻拦愿意奋击匈奴的雷被等人，拒不执行陛下的诏令，其罪应当弃市（在市场中被处死）。”汉武帝下诏不允许这样做。公卿大臣们又请求废掉淮南王刘安的王位。汉武帝也不答应。公卿大臣们又请求削去淮南国五个县之地。汉武帝下令只削去二个县。又派中尉殷宏到淮南国去赦免淮南王的罪行，处以削地的处罚。中尉殷宏进入淮南国地界，宣布去赦免淮南王。刘安开始听说朝中公卿大臣请求把自己处死，不知结果是要削地，听说汉朝使者到来，害怕来逮捕自己，便和太子刘迁商议准备按原计划刺杀使者，然后起兵。等使者到达后，却向刘安表示祝贺，刘安也因此没有行动。事情过后，刘安很为自己感到悲伤，说：“我行仁义之事却被削地，我真感到羞耻。”然而，淮南王在被削地之后，阴谋造反的活动更加积极。淮南国的使者从长安回来，如果胡说八道，说汉武帝没有儿子，汉朝廷很混乱，刘安便感到高兴，如果使者说汉朝廷很有秩序，汉武帝也有了儿子，刘安便大怒，认为这全都是妖言、假话。

刘安日夜和伍被、左吴等人查考山川地图，策划怎样调兵，怎样进攻。刘安说：“皇上没有太子，一旦驾崩，朝中大

臣必定征胶东王为帝，要不就是常山王，那时，诸侯都起来争夺天下，我怎么可以没有准备呢？而且我是高祖的孙子，亲自施行仁义，皇上待我仁厚，我可以忍耐，皇上去世之后，我怎么能脸朝北方去给傻小子当臣子呢！”

刘安坐在东宫，把伍被召来一起商议起兵造反的事，说：“将军请上前。”伍被听后，略带哀伤地说：“皇上已经宽容赦免了大王，大王怎么还说这种亡国的话！臣听说当年伍子胥劝告吴王夫差，吴王不听他的话，伍子胥便说：‘臣现在看到麋鹿野兽在姑苏之台游荡。’现在臣也看见大王的宫中长满荆棘，上面的露水都可以沾湿衣裳。”刘安听了大怒，下令把伍被的父母抓起来，关了三个月。然后，又召伍被来说：“将军答应我吗？”伍被回答说：“不，只是来为大王谋划一下。臣听说听力特别好的人在声音没发出之前就能听到，视力好的人在事物尚未出现就可以看见，所以圣人做一万件事，就成一万件事。在过去，周文王行动一次便在世上显现自己的成功，被列为三代名王，他是顺着上天的心意而行动，所以天下人不用相约便都追随他。这是近千年来可以看到的事实。一百年前的秦朝，近代的吴国和楚国（指吴王刘濞和楚王刘戊发动的“七国之乱”），也足以用来比喻国家的存亡。臣不敢躲避象伍子胥一样被杀戮的命运，但愿大王不要象吴王一样不听劝阻。过去秦朝断绝圣人之道，杀害方术之士，焚烧《诗》、《尚书》，抛弃礼仪仁义，崇尚欺诈强力，任意施用刑罚，从遥远的海边转运粮食到西河（今宁夏、内蒙古间由北而南的一段黄河）。在那个时代，男子奋力耕田，却连糟糠都吃不上；女子日夜纺线织布，仍衣不蔽体。派蒙恬率人修筑

长城，东西长达数千里，在外行军作战的军队经常有几十万人，死的人数都数不过来，千里大地上到处是死尸，流的血把大地都浇透了，百姓们的力量被用尽了，十家之中就有五家人想造反。秦始皇又派徐福到海中去寻求神异的物品，徐福回来后撒谎说：‘臣见到了海中的大神，大神说：“你是西边皇帝的使者吗？”’臣回答说：“是的。”“你来寻找什么？”’臣说：“想请神仙赐给延年益寿的药。”大神说：“你们秦王送的礼物太少，仙药只能看而不能拿走。”大神随即把臣等送到东南的蓬莱山上，看见了用灵芝搭成的宫阙，有一个神仙的使者长着龙的形状，浑身紫铜色，发出的光照亮天空。于是臣拜了两拜，问道：“我们应该把什么礼物献给神仙呢？”海神说：“要选一些童男童女和技艺高超的工匠送来，就可以得到仙药。”’秦始皇听后非常高兴，派童男童女三千人，带上稻、谷、菽、麦等五谷杂粮和各种工匠，由徐福率领去寻仙。徐福出海后，在海外找到一块陆地，上面有广阔的平原和山林川泽，徐福便留在那里，自己当了王而不再回来。于是，老百姓万分悲痛，思念自己的亲人儿女，十家就有六家人想造反了。秦始皇又派尉赵佗率军翻越五岭，去进攻百越。赵佗知道中国的百姓疲劳之极，也留在本地当起了王，不回来，又派人上书，请求派没有丈夫的女子三万去为出征的士兵补衣做饭，秦始皇派出了一万五千人。于是，天下百姓离心瓦解。想造反的人十家就有七家了。有宾客对高祖皇帝说：‘时候已经到了。’高祖皇帝说：‘再等等，应当有圣人在东南方起事。’不到一年，陈胜和吴广便发动了起义。高祖皇帝从丰沛（今江苏省沛县）起兵，振臂一呼，天下响应的人数都数不过来。

这是所谓的乘机而起，顺着秦朝的必然灭亡而起事。百姓盼望这样做，就象天气干旱时盼望下雨一样，所以高祖皇帝能在行军打仗中奋起而当上天子，功绩高过前代的圣王，而德传万世。如今，大王只看见高祖皇帝得天下的容易，却怎么不看看近代的吴、楚七国之乱呢？吴王刘濞被赐号为刘氏祭酒，以示他的尊贵，又不让朝见皇帝，把四个郡分封给他。地方有数千里，封地内有铜矿，采铜用来铸钱，又在东边海边煮海水为盐。长江上流可取来江陵（今湖北江陵）的大木做船，一条船的运载量抵得上中原几十辆车，国家富裕，人民众多。吴王又用珍珠、美玉、金银丝绸贿赂诸侯王和宗室大臣，惟独景帝的外婆家窦氏不贿赂。计划确定，谋略妥当，然后起兵向西进攻，却在太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城下大败，又在狐父（今安徽砀山北）战败，只好向东逃跑，到达丹徒（今江苏省镇江市东）时，被越人抓获，人被处死，国家也绝了后代，成为天下人的笑话。吴王率领那么多吴越地区的士兵造反，却为什么不能成功呢？是因为他逆天道而行，不识时务。如今，大王的士兵不到吴楚七国的十分之一，天下的安宁稳固却超过秦朝十万倍。所以，愿大王听从臣的意见。大王不听从臣的意见，如今便只能看到大王起事不成而计谋先泄露了出去。臣听说，商朝的微子经过故国时感到悲伤，于是做了一首《麦秀之歌》，哀痛殷纣王不听王子比干之言。所以《孟子》说：‘纣王贵为天子，死的时候连匹夫都不如’。这是因为纣王先自绝于天下，并不是他死的时候天下抛弃了他。现在，臣也暗自为大王抛弃千乘之王位不做而悲伤。大王若一定这样，请赐给臣一纸绝命书，让臣在群臣之前死在东宫

之中。”伍被这番话，说得淮南王刘安哀伤无比，气郁胸中，难以自持，泪流满面，随即起身踏着台阶离开了。

淮南王刘安有一个庶妻生的儿子叫刘不害，在刘安的儿子中年令最长，刘安却不喜欢他，并且，刘安、王后荼、太子刘迁等都不把刘不害当儿子或兄长。刘不害有个儿子叫刘建，人很有才能，也很有志气。经常怨恨太子刘迁不把自己的父亲当哥哥看待；又怨恨当时各诸侯都可以封自己的儿子为侯，淮南王刘安只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太子，而自己的父亲却独独不得封侯。于是，刘建便暗中结交宾客，准备告发击败太子，而让自己的父亲取而代之。太子刘迁知道后，几次把刘建抓来，用板子抽打。刘建详细地弄清了太子刘迁想杀害汉朝中尉的阴谋后，便派自己的心腹寿春人庄芷在元朔六年（公元前123）上书于汉武帝说：“药力强的药品虽然吃着苦，却有利于治病，忠诚的言语虽然听着不舒服却有利于办事情。现在，淮南王刘安的孙子刘建，才能杰出，淮南王的王后荼、荼的儿子太子刘迁经常迫害刘建。刘建的父亲刘不害没犯什么罪。他们却擅自把他抓起来，想杀害他。现在刘建在，陛下可以进行查问，刘建知道所有淮南国在暗地里干的事情。”书呈上去以后，汉武帝交给廷尉办理。廷尉又交给河南郡审理。当时，原辟阳侯审食其的孙子审卿和丞相公孙弘关系很好，他怨恨刘安的父亲淮南厉王刘长杀害了自己的祖父，便在公孙弘那里说了许多淮南王刘安的坏话。公孙弘听后，疑心淮南王有反叛的阴谋，便下令彻底调查审理这桩案子。河南郡审问了刘建，刘建所提供的情况牵涉到了淮南王太子刘迁及其党羽。淮南王刘安知道后，感到事情难

办，便想发动叛乱，问伍被说：“汉朝廷是治呢还是乱呢？”伍被说：“天下很安定。”刘安听了，很不高兴，对伍被说：“你凭什么说天下是安定的呢？”伍被说：“我暗中观察朝廷的政治，君臣之间的忠义，父子之间的亲情，夫妇之间的分别，长幼之间的秩序，都井然有序，皇上的作为都遵守古法，风俗纲纪没有什么缺失。满载着货物的富商大贾，周流天下，没有不通的道路，所以经商交易之道畅通无阻。南越向朝廷宾服，羌人和踰人都入朝纳贡，东瓯向汉朝投降。汉朝的军队拓地长榆塞，打开朔方之地，匈奴象折了翅膀伤了羽翼，失去援助，再也振作不起来。虽然赶不上古代的太平盛世，但仍然是治世。”刘安听了，不禁大怒，伍被赶紧谢罪，请求免于死罪。刘安又对伍被说：“山东（指华山以东地区）如果发生战争，汉朝廷必然派大将军卫青率军来镇压山东地区，您认为大将军卫青这个人怎么样呢？”伍被说：“臣有一个好友叫黄义，曾跟随大将军出征攻伐匈奴，回来以后，告诉我说：‘大将军对海内的士大夫彬彬有礼，对普通士卒很有恩惠，部下都乐意听从大将军的指挥。而且，大将军骑马上下山坡如飞一般，材力过人，骁勇无敌。’臣认为，大将军有如此才能，又多次率军出征，熟悉行军作战，实在是不好对付。等谒者曹明从长安出使回来，说大将军号令严明，和敌人作战勇猛过人，常身先士卒，冲锋杀敌。行军休息时，并还没有打好，必定要等士卒们都喝上了水，大将军自己才去喝水。撤军时，士卒们都已全部渡过大河（即黄河），大将军才最后一个渡河。皇太后赐给大将军的金银绸缎，大将军都分给将士们。这样的将军，就是古代的名将也不过如此。”刘安听了之后，一句

话也说不出来。

刘安看到刘建已经被带走审问，害怕国中的丑事就要因此暴露，便想发动叛乱，伍被又认为这样做不行。刘安便又问伍被说：“您以为吴王刘濞发兵选择是对呢还是错呢？”伍被说：“我以为是错误的。吴王本来已富贵荣华到了极点，却举事不当，被杀死在丹徒，脑袋和身子被扔到两地，子孙没有一个活下来的。臣听说吴王后来后悔之极。愿大王深思熟虑，以免将来象吴王那样后悔。”刘安说：“男子汉举事不成就死，不过抬手之间而已。而且，吴王哪里懂得造反？让汉朝将领在一天之内就有四十多个率军经过成皋之险（在今河南省荥阳县东北）。现在，我令楼缓先率军堵塞成皋关之口，让周被率军由颍川郡（治今河南禹州市）而下，堵塞轩辕关（在今河南省登封县西北）和伊阙（今河南省洛阳市南）关的道路，陈定调发南阳郡（治今河南省南阳市）的军队把守武关（在今陕西省商洛地区东南），河南郡太守所剩下的便只有雒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了，有什么可担忧的呢？然而这些地方的北面尚且还有临晋关（在今山西省临晋县南）、河东郡（治今山西省临汾市）、上党郡（治今山西省长治市）和河内郡（治今河南省武陟县）、赵国（今河北省邯郸市）。人们常说：‘堵塞成皋关口，天下的道路就不通了。’占据三川之险（即成皋关，秦代置三川郡，成皋关在三川郡境内），招抚山东地区的军队，象这样行动，您认为怎么样？”伍被说：“臣只看到其中的祸害，没看到其中的幸福。”刘安说：“左吴、赵贤、朱骄如（都是刘安的谋臣）等人都认为这样做会有福，十有九成把握，只有你认为有祸无福，这是为什么？”伍被说：

“大王的群臣和亲近的人当中平素能得部下拥戴、能指挥部下的人都已在以前的案子中被抓被关押进朝廷的监狱之中，剩下的人没有一个可用的。”刘安说：“秦朝时，陈胜和吴广没有立锥之地（连一寸大的土地都没有），聚在一起的只有不到千人，却从大泽之中起兵，奋臂一呼，天下响应，等向西进兵到戏（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士卒就已达一百二十万。如今，我的封国虽然很小，然而能当兵打仗的人可以有十多万，不象当年陈胜、吴广那样只有一些被谪戍的疲劳之众，手中的武器只有镰刀、凿子和棍棒，您凭什么说要我举事有祸无福呢？”伍被说：“过去，秦朝施行无道的政治，残害天下的百姓。动辄率上万辆车队巡视天下，又营建阿房宫，收取百姓收入的大半为赋税，还调发住在闾里左边的以前不服役的人去戍边服役，父子不能相恤，兄弟不能相救，政治苛暴，刑罚严峻，天下的百姓受尽了煎熬。百姓都伸着脖子张望，侧起耳朵倾听，悲痛地哭号，仰望苍天，拍着胸怨恨秦王朝，所以陈胜一呼，天下便群起响应。如今，皇上临制天下，海内一统，爱护天下的百姓，布德施惠。口虽然没有说话，声音却比雷霆还要响亮；命令虽未发布，德化却迅速有如神助；心中有所思虑，声威震动万里，臣下的应君上，就象人的影子和声响一般。而大将军卫青的才能又远超过章邯和杨熊。大王以陈胜、吴广来作比喻，臣认为是不对的。”刘安说：“就算您说的有道理，难道不能侥幸一试吗？”伍被说：“臣有一条愚蠢的计策。”刘安说：“怎么办？”伍被说：“现在，天下的诸侯没有异心，百姓也没有怨恨之气。汉朝新建的朔方郡（在今内蒙古呼河浩特以西地区，治今杭锦旗北）田地广阔，

水草丰美，迁徙到那里的人民仍不足以充实这块地方。臣的愚蠢计策是，可以伪造汉朝丞相和御史的奏书，声称要迁徙地方郡国的豪杰、侠士以及犯了耐罪（罪行较轻而不到被剪去头发，被称为耐）以上的人，赦令免除他们的罪过，还有家财值五十万钱以上的人，都要把他们和家属迁到朔方郡去，再调发士兵，将他们限期到达朔方的日期说得急迫一些。再伪造朝廷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诏狱的文书，宣称要逮捕地方诸侯的太子和宠幸的大臣。这样，则百姓怨愤，地方诸侯感到恐惧，然后大王派能说会道的辨士跟着去劝他们造反，这样或许还有十分之一的希望。”刘安听了说：“可以这样做。虽然您这样说，但我觉得还不至于到这一步。”于是，刘安便下令调官府奴隶入宫，制作皇帝的御玺，以及丞相、御史、大将军、军官、中二千石、都官令，都官丞等各级官吏的大印，以及旁边各郡的郡太守和郡都尉大印，汉朝使者用的法冠等，准备按伍被的计策行事。又派人假装犯了罪而向西逃到京都，去潜入大将军府和丞相府，一旦发兵，让他们立刻刺杀大将军卫青，劝说丞相投降，觉得干这些事很容易，象揭去人蒙在脸上的布一样轻松。

刘安想调发封国中的军队，害怕淮南国相和别的高级官员不听指挥，便和伍被商量，到时候先杀掉淮南国相和二千石官员，可以假装宫中失火，等淮南相和二千石官员去救火时，乘机刺杀他们。计议还没有确定下来，又想派人穿上抓捕盗贼的士卒的衣服，手持插着羽毛（表示十万火急）的檄文，从东方来，高呼说：“南越（即南越国，治今广东省广州市）的军队打到境内来了。”以便借机调动军队。于是，刘安

便派人到庐江郡（治舒，今安徽省庐江县西南）和会稽郡（治吴，今江苏省苏州市）境内抓捕盗贼，准备停当，还未出发。刘安问伍被说：“我举兵向西，诸侯中必定有响应我的，假使没有，那该怎么办？”伍被说：“大王可以向南收衡山国（治邾，今湖北省黄冈西北）的军队以进攻庐江，这样占有寻阳（今江西省九江市北）的水军船只，把守下雒城（今湖北省阳新县东）、东结九江之浦，断绝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市）之口（即今九江市附近的赣江入长江之口），派强弩（善于射箭的军队）临江而守，以防南郡（治今湖北省江陵市）的朝廷军队沿江东下。然后，向东攻占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和会稽郡，南面和南越国联合，从而纵横在江淮之间，这样还可以坚持一段时间。”刘安说：“好，没有比这更好的计策了。如果实在不行，我就逃到南越去。”

不久，汉朝廷尉把淮南王刘安的孙子刘建所说的供词牵连到淮南王太子刘迁的事上奏了汉武帝。汉武帝下令拜廷尉监为淮南国中尉，前去赴任并逮捕淮南王太子刘迁。廷尉监到达淮南。刘安听说后，便和太子刘迁商量，召来淮南国相和二千石官吏，想杀掉他们，然后发兵造反。召淮南国相，淮南国相应召而来；召淮南国内史，淮南国内史托言出门办事，没有来。召淮南国中尉，中尉说：“我只按皇帝陛下的诏令行动，不能去见大王。”刘安觉得只杀掉淮南国相，而内史和中尉不来，并没有多大作用，便没有动手，让淮南国相回去了。刘安犹豫不决，计谋未定。太子刘迁认为犯的罪不过是密谋刺杀汉朝中尉，而参予这个谋划的人已经死去，绝了口实，便对刘安说：“群臣之中可以任用的人已都被抓走，如今没有足

以一起举事的人了。大王若在这个时候举事，恐怕不会有什么结果。我愿意被他们抓走，前去会证。”刘安自己也偷偷想作罢，便答应了太子。太子刘迁便拔剑自杀，却没有死去。伍被见事已无望，便向官府自首，并上告淮南王图谋造反，供出了谋反的全部过程。

汉朝官吏接到报告，立即抓捕了太子刘迁和淮南王后荼，派军包围了王宫，并下令抓捕所有在国中的参与淮南王刘安谋反活动的宾客和党羽，搜到谋反的各种证据后，上奏汉武帝。汉武帝下令公卿大臣审理此案。经审理，此案所牵连的与淮南王刘安谋反有关的列侯、二千石官吏和地方豪杰达数千人，都被按各人罪行的轻重而加以处死。衡山王刘赐是淮南王刘安的弟弟，按法律应当连坐，有关官吏请求逮捕衡山王。汉武帝说：“诸侯王各自以自己的封国为本，不应当连坐。你们可以召集诸侯王、列侯等到京与丞相一起议断此案。”赵王刘彭祖、列侯臣让等四十三人经过讨论，都说：“淮南王刘安非常大逆无道，图谋反叛，证据确凿，应当伏法处斩。”胶西王刘端议论说：“淮南王刘安废除国家法律，专行邪辟之事，怀着诈伪之心，以扰乱下天，蛊惑百姓，背叛宗庙国家，妄作妖言。《春秋》说：‘为人臣者不能犯上，犯上就应杀头。’刘安比犯上之罪还要重，谋反的行动已很明显。臣端所见的刘安所作文书、符节、印绶、地图以及其它谋反用的东西非常清楚明白，非常大逆无道，应当依法治罪。而淮南国中的官吏在二百石以上以及与这个等级待遇相同的官吏、宗室近幸的臣属不在法网之中的，他们不能正确教导扶助淮南王刘安，都应当免去官职，削去爵位，不能再当官为吏。不是官

吏而涉及的人，应当罚出赎其死罪的黄金二斤八两。这样，可以章明刘安的罪行，使天下的人们明白为臣之人所应遵行的准则，而不敢再有邪辟背叛的想法。”丞相公孙弘、廷尉张汤等将他们的议论上奏汉武帝，汉武帝派宗正持天子发给的符节审讯刘安。宗正还未到淮南，淮南王刘安便自杀身亡。王后荼、太子刘迁等参与谋反的人都被处以族刑。汉武帝因伍被在劝谏刘安时多次称赞朝廷的美德，想不杀伍被。廷尉张汤说：“伍被第一个为刘安谋划造反，他的罪不能赦免。”伍被因此也被处死。淮南国也被除掉，而改为中央直属的九江郡。

（雒启坤 译）

【原文】

淮南王安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誉天下。时时怨望厉王死，时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时为太尉，乃逆王霸上，与王语曰：“方今上无太子，大王亲高皇帝孙，行仁义，天下莫不闻。即宫车一日晏驾，非大王当谁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遗武安侯金财物。阴结宾客，拊循百姓，为畔逆事。建元六年，彗星见，淮南王心怪之。或说王曰：“先吴军起时，彗星出长数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长竟天，天下兵当大起。”王心以为上无太子，天下有变，诸侯并争，愈益治器械攻战具，积金钱赂遗郡国诸侯游士奇材。诸辨士为方略者，妄作妖言，谄谀王，王喜，多赐金钱，而谋反滋甚。

淮南王有女陵，慧，有口辨。王爱陵，常多予金钱，为中谗长安，约结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赐淮南王几仗，不朝。

淮南王王后荼，王爱幸之。王后生太子迁，迁取王皇太后外孙修成君女为妃。王谋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内泄事，乃与太子谋，令诈弗爱，三月不同席。王乃详为怒太子，闭太子使与妃同内三月，太子终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书谢归去之。王后荼、太子迁及女陵得爱幸王，擅国权，侵夺民田宅，妄致系人。

元朔五年，太子学用剑，自以为人莫及，闻郎中雷被巧，乃召与戏。被一再辞让，误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时有欲从军者辄诣京师，被即愿奋击匈奴。太子迁数恶被于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后，被遂亡至长安，上书自明。诏下其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计欲无遣太子，遂发兵反，计犹豫，十余日未定。会有诏，即讯太子。当是时，淮南相怒寿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劾不敬。王以请相，相弗听。王使人上书告相，事下廷尉治。踪迹连王，王使人候伺汉公卿，公卿请逮捕治王。王恐事发，太子迁谋曰：“汉使即逮王，王令人衣卫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则刺杀之，臣亦使人刺杀淮南中尉，乃举兵，未晚。”是时上不许公卿请，而遣汉中尉宏即讯验王。王闻汉使来，即如太子谋计。汉中尉至，王视其颜色和，讯王以斥雷被事耳，王自度无何，不发。中尉还，以闻。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拥阂奋击匈奴者雷被等，废格明诏，当弃市。”诏弗许。公卿请废勿王，诏弗许。公卿请削五县，诏削二县。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罚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闻汉公卿请诛之，未知得削地，闻汉使来，恐其捕之，乃与太子谋刺之如前计。及中尉至，即贺王，王以故不发。其后自伤曰：

“吾行仁义见削，甚耻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后，其为反谋益甚。诸使道从长安来，为妄妖言，言上无男，汉不治，即喜；即言汉廷治，有男，王怒，以为妄言，非也。

王日夜与伍被、左吴等案舆地图，部署兵所从入。王曰：“上无太子，宫车即晏驾，廷臣必征胶东王，不即常山王，诸侯并争，吾可以无备乎！且吾高祖孙，亲行仁义，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万世之后，吾宁能北面臣事竖子乎！”

王坐东宫，召伍被与谋，曰：“将军上。”被怅然曰：“上宽赦大王，王复安得此亡国之语乎！臣闻子胥谏吴王，吴王不用，乃曰：‘臣今见麋鹿游姑苏之台也。’今臣亦见宫中生荆棘、露沾衣也。”王怒，系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复召曰：“将军许寡人乎？”被曰：“不，直来为大王画耳。臣闻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未形，故圣人万举万全。昔文王一动而功显于千世，列为三代，此所谓因天心以动作者也，故海内不期而随。此千岁之可见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吴楚，亦足以喻国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诛，愿大王毋为吴王之听。昔秦绝圣人之道，杀术士，燔《诗》《书》，弃礼义，尚诈力，任刑罚，转负海之粟致之西河。当是之时，男子疾耕不足于糟糠，女子纺绩不足于盖形。遣蒙恬筑长城，东西数千里，暴兵露师常数十万，死者不可胜数，僵尸千里，流血顷亩，百姓力竭，欲为乱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异物，还为伪辞曰：‘臣见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愿请延年益寿药。”神曰：“汝秦王之礼薄，得观而不得取。”即从臣东南至蓬莱山，见芝成宫阙，有使者铜色而龙形，光上照天。于是臣再拜问曰：

“宜何资以献？”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与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悦，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于是百姓悲痛相思，欲为乱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逾五岭攻百越。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于是百姓离心瓦解，欲为乱者十家而七。客谓高皇帝曰：‘时可矣。’高皇帝曰：‘待之，圣人当起东南间。’不一年，陈胜吴广发矣。高皇始于丰沛，一倡天下不期而响应者不可胜数也。此所谓蹈瑕候间，因秦之亡而动者也。百姓愿之，若旱之望雨，故起于行阵之中而立为天子，功高三王，德传无穷。今大王见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独不观近世之吴楚乎？夫吴王赐号为刘氏祭酒，复不朝，王四郡之众，地方数千里，内铸销铜以为钱，东煮海水以为盐，上取江陵木以为船，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两车，国富民众。行珠玉金帛赂诸侯宗室大臣，独窦氏不与。计定谋成，举兵而西。破于大梁，败于孤父，奔走而东，至于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绝祀，为天下笑。夫以吴越之众不能成功者何？诚逆天道而不知时也。方今大王之兵众不能十分吴楚之一，天下安宁有万倍于秦之时，愿大王从臣之计。大王不从臣之计，今见大王事必不成而语先泄也。臣闻微子过故国而悲，于是作《麦秀之歌》，是纣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纣贵为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纣先自绝于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窃悲大王弃千乘之君，必且赐绝命之书，为群臣先，死于东宫也。”于是王气怨结而不扬，涕满匡而横流，即起，历阶而去。

王有孽子不害，最长，王弗爱，王、王后、太子皆不以为子兄数。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气，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又怨时诸侯皆得分子弟为侯，而淮南独二子，一为太子，建父独不得为侯，建阴结交，欲告败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数捕系而榜笞建。建具知太子之谋欲杀汉中尉，即使所善寿春庄芷以元朔六年上书于天子曰：“毒药若于口利于病，忠言逆于耳利于行。今淮南王孙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迁常疾害建。建父不害无罪，擅数捕系，欲杀之。今建在，可征问，具知淮南阴事。”书闻，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时故辟阳侯孙审卿善丞相公孙弘，怨淮南厉王杀其大父，乃深购淮南事于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计谋，深穷治其狱。河南治建，辞引淮南太子及党与。淮南王患之，欲发，问伍被曰：“汉廷治乱？”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说，谓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窃观朝廷之政，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举错遵古之道，风俗纪纲未有所缺也。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宾服，羌僰入献，东瓯入降，广长榆，开朔方，匈奴折翅伤翼，失援不振。虽未及古太平之时，然犹为治也。”王怒，被谢死罪。王又谓被曰：“山东即有兵，汉必使大将军将而制山东，公以为大将军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黄义，从大将军击匈奴，还，告被曰：‘大将军遇士大夫有礼，于士卒有恩，众皆乐为之用。骑上下山若蜚，材干绝人。’被以为材能如此，数将习兵，未易当也。及谒者曹梁使长安来，言大将军号令明，当敌勇敢，常为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须士卒尽得水，乃敢饮。军罢，

卒尽已度河，乃度。皇太后所赐金帛，尽以赐军吏。虽古名将弗过也。”王默然。

淮南王见建已征治，恐国阴事且觉，欲发，被又以为难，乃复问被曰：“公以为吴兴兵是邪非也？”被曰：“以为非也。吴王至富贵也，举事不当，身死丹徒，头足异处，子孙无遗类。臣闻吴王悔之甚。愿王孰虑之，无为吴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吴何知反，汉将一日过成皋者四十余人。今我令楼缓先要成皋之口，周被下颍川兵塞轘辕、伊阙之道，陈定发南阳兵守武关，河南太守独有雒阳耳，何足忧？然此北尚有临晋关、河东、上党与河内、赵国。人言曰‘绝成皋之口，天下不通’。据三川之险，招山东之兵，举事如此，公以为何如？”被曰：“臣见其祸，未见其福也。”王曰：“左吴、赵贤、朱骄如皆以为有福，什事九成，公独以为有祸无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群臣近幸素能使众者，皆前系诏狱，余无可使用者。”王曰：“陈胜、吴广无立锥之地，千人之聚，起于大泽，奋臂大呼而天下响应，西至于戏而兵百二十万。今吾国虽小，然而胜兵者可得十余万，非直适戍之众，饥馑棘矜也。公何以言有祸无福？”被曰：“往者秦为无道，残贼天下。兴万乘之驾，作阿房之宫，收太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父不宁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民皆引领而望，倾耳而听，悲号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陈胜大呼，天下响应。当今陛下临制天下，一齐海内，泛爱蒸庶，布德施惠。口虽未言，声疾雷霆，令虽未出，化驰如神，心有所怀，威动万里，下之应上，犹影响也。而大将军材能不特章邯、杨熊也。大王以陈胜、吴广喻之，被以为过矣。”王曰：

“苟如公言，不可徼幸邪？”被曰：“被有愚计。”王曰：“奈何？”被曰：“当今诸侯无异心，百姓无怨气。朔方之郡田地广，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实其地。臣之愚计，可伪为丞相御史请书，徙郡国豪杰任侠及有耐罪以上，赦令除其罪，产五十万以上者，皆徙其家属朔方之郡，益发甲卒，急其会日。又伪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诏狱书，逮诸侯太子幸臣。如此则民怨，诸侯惧，即使辨武随而说之，傥可徼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虽然，吾以为不至若此。”于是王乃令官奴入宫，作皇帝玺、丞相、御史、大将军、军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汉使节法冠，欲如伍被计。使人伪得罪而西，事大将军、丞相；一日发兵，使人即刺杀大将军青，而说丞相下之，如发蒙耳。

王欲发国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听。王乃与伍被谋，先杀相、二千石，伪失火宫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杀之。计未决，又欲令人衣求盗衣，持羽檄，从东方来，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发兵。乃使人至庐江，会稽为求盗，未发。王问伍被曰：“吾举兵西向，诸侯必有应我者。即无应，奈何？”被曰：“南收衡山以击庐江，有寻阳之船，守下雒之城，结九江之浦，绝豫章之口，强弩临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东收江都、会稽，南通劲越，屈疆江淮间，犹可得延岁月之寿。”王曰：“善，无以易此。急则走越耳。”

于是廷尉以王孙建辞连淮南王太子迁闻。上迁廷尉监因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闻，与太子谋召相、二千石，欲杀而发兵。召相，相至；内史以出为解。中尉曰：“臣受诏使，不得见王。”王念独杀相而内史中尉不来，无益

也，即罢相。王犹豫，计未决。太子念所坐者谋刺汉中尉，所与谋者已死，以为口绝，乃谓王曰：“群臣可用者皆前系，今无足与举事者。王以非时发，恐无功，臣愿会逮。”王亦偷欲休，即许太子。太子即自刭，不殊。伍被自诣吏，因告与淮南王谋反，反踪迹具如此。

吏因捕太子、王后，围王宫，尽求捕王所与谋反宾客在国中者，索得反具以闻。上下公卿治。所连引与淮南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杰数千人，皆以罪轻重受诛。衡山王赐，淮南王弟也，当坐收，有司请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诸侯各以其国为本，不当相坐。与诸侯王列侯会肆丞相诸侯议。”赵王彭祖、列侯臣让等四十三人议，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无道，谋反明白，当伏诛。”胶西王臣端议曰：“淮南王安废法行邪，怀诈伪心，以乱天下，荧惑百姓，倍畔宗庙，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无将，将而诛’。安罪重于将，谋反形已定。臣端所见其书节印图及他逆无道事验明白，甚大逆无道，当伏其法。而论国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当皆免官削爵为士伍，毋得宦为吏。其非吏，他赎死金二斤八两。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复有邪僻信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汤等以闻，天子使宗正以符节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刭杀。王后荼、太子迁诸所与谋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辞多引汉之美，欲勿诛。廷尉汤曰：“被首为王画反谋，被罪无赦。”遂被诛。国除为九江郡。

西门豹传

——《史记》卷一二六

【说明】西门豹，复姓西门，名豹。生卒年不可考，只知是战国（公元前 475—前 221 年）时人。魏文侯曾任他为邺（今河北临漳西南邺镇）令。西门豹关心民生疾苦，到任后就破除当地“河伯娶妇”的迷信活动，并率领老百姓开凿水渠十二条，引漳水灌溉农田，土壤得到改良，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使邺地老百姓得“以给富足”。西门豹也因而扬名天下，流芳后世。

漳水渠，又叫做“西门渠”。邺地正处在漳水由山区进入平原的地带，由于地形和降雨的原因，漳河水有猛涨暴落的特点，因而经常泛滥成灾。西门豹率民凿成的漳水十二渠，是多渠口的有坝取水，后代的情形是十二个堰，十二个口，十二条渠，渠口都有闸门控制。而这完全有可能就是沿袭战国时的旧制。汉代，曾有人想把十二渠合并，遭到老百姓的强烈反对。由此可见漳水十二渠效益显著。漳河水含有大量的细颗粒泥沙，富含有机质，引水灌田，不仅可以补充农作物的需水量，并能够填淤加肥，从而使原来两岸的盐碱地得到改良。邺地的田地，自开凿漳水十二渠后，就“成为膏腴，则

亩收一钟”了。

魏文侯时候，西门豹做邺地方的长官。他到邺就任后，召集地方年老长者，向他们询问老百姓的生活情况。年老长者说：“人们主要困苦于给河伯娶妇，所以都很贫穷。”西门豹问原因何在？回答说：“邺地掌教化的乡官三老，还有分工管事的廷掾，因此每年要向老百姓收取聚拿钱财。收取的钱财有几百万，把其中的二、三十万用给河伯娶妇，余下的钱他们就和巫祝瓜分拿回自己家去了。到给河伯娶妇的时候，巫挨家察看，见到谁家姑娘长得比较漂亮，就说她应当做河伯的妻子，下定礼聘取。先让她沐浴干净，穿上用绮、缙等丝绸新做的衣服，与家人分开居住，以使身心洁净。在漳河上有专门修建的祭祀用宫殿，里面张挂着橘红和红色的帷帐，姑娘就居住其中。每天供给酒食，过了十多天，大家一起来给她装饰打扮。然后让她坐到一张嫁女用的床席上，抬送浮放河中。开始床席浮在水上，流行几十里就沉下去了。有女儿长得比较漂亮的人家，怕大巫祝代河伯来取走，所以大多带着女儿逃亡到远方去。因此城里更加空空荡荡，人少而且贫穷。这种情况由来已久了。老百姓俗话说：‘就是不为河伯娶妇，也是水来漂走财物，人被淹死’。”西门豹说：“到给河伯娶妇的时候，希望三老、巫祝和父老们都去送姑娘到漳河上，并要来通知我。我也去送送姑娘”。众人都说：“可以”。

到了河伯娶妇那天，西门豹准时赴约去到漳河上。三老、官员们、地方豪绅和乡里父老都来了，前来观看的人有三、二千。那祝巫，是一年老的妇人，年纪已有七十。跟随她的女

弟子有十来个，都穿著单的绸衣，站在大巫的身后。西门豹说：“把河伯的妇叫来，让我看看是美还是丑？”人们把姑娘扶出帐帷，来到西门豹面前。西门豹看了一眼，回头对三老、巫祝、父老们说：“这姑娘长得不好，麻烦大巫婆到水中去向河伯报告，我将找个更漂亮的姑娘，后天送去”。便命令士兵把大巫婆抱起来投到了漳河中。过了一会，说：“巫婆怎去这么久啊！弟子该去催促一下”。就把一个弟子投到了河里。过了一会，又说：“弟子怎的也去这么久啊！再派一个人催促”。又把一个弟子投入了河中。先后总共把三个弟子投到了漳河里。西门豹说：“巫婆的弟子是女的，不会说话，麻烦三老代为去说一下”。又把三老投到河水中。西门豹帽子前面插着笔以示尊敬，同时弯腰作揖，向河站着等了好久。旁观的长老和胥吏都很惊恐害怕。西门豹对他们说：“巫婆、三老都没有返回来，怎么办？”他想要再派廷掾或乡绅一人到河中去催促。这些人都跪下来叩头，叩得头皮破了，额上的血流到地上，脸色则像死灰。西门豹说：“好，暂且留着等待一会儿”。过了一会，西门豹说：“廷掾站起来，向大家宣布说：河伯留客太久，今天停止，你们都回家吧。”邺地的胥吏们和老百姓都很惊恐害怕，从此以后，再也不敢提起为河伯娶妇的事。

西门豹接着就发动老百姓开凿了十二条河渠，引漳河水灌溉农田，田地都得到了灌溉。当时，老百姓修建水渠稍有烦苦，就不想把修渠工程继续下去。西门豹说：“可以与老百姓分享成果，而不能与他们始共忧患。现在父老子弟虽然认为我使他们吃苦受累，然而百年以后，他们的子孙会想到我说的话的”。直到今天，邺地的人都得到河水灌溉的利益，老

百姓因而能够得以富足，十二渠南北向跨越过车马行走的交通大道。到汉朝建立，地方长官胥吏认为十二渠桥跨越交通大道，相互靠得太近，不可照旧。想要把渠合于一起，将到交通大道处合三渠而建立一桥。邺地父老百姓不肯听从长官胥吏们的话去做，认为这是西门君所修建的，贤君定下的法式是不可以更改的。地方长官胥吏最终也就听任搁开此事。所以，西门豹做邺地长官，名闻天下，恩泽流传到后世，是没有止尽的时候的，难道可以说他不是一个有德行的大官嘛！

（范楚玉 译）

【原文】

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豹往到邺，会长老，问之民所疾苦。长老曰：“苦为河伯娶妇，以故贫”。豹问其故，对曰：“邺三老、廷掾常岁赋敛百姓，收取其钱得数百万，用其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与祝巫共分其余钱持归。当其时，巫行视小家女好者，云是当为河伯妇，即聘取。洗沐之，为治新缯绮縠衣，閒居斋戒；为治斋宫河上，张缦绛帷，女居其中。为具牛酒饭食，行十余日。共粉饰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数十里乃没。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为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远逃亡。以故城中益空无人，又困贫，所从来久远矣。民人俗语曰‘即不为河伯娶妇，水来漂没，溺其人民’云。”西门豹曰：“至为河伯娶妇时，愿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来告语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诺。”

至其时，西门豹往会之河上。三老、官属、豪长者、里父老皆会，以人民往观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年

已七十。从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缁单衣，立大巫后。西门豹曰：“呼河伯妇来，视其好丑。”即将女出帷中，来至前。豹视之，顾谓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烦大巫姬为入报河伯，得更求好女，后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姬投之河中。有顷，曰：“巫姬何久也？弟子趣之！”复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顷，曰：“弟子何久也？复使一人趣之！”复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门豹曰：“巫姬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烦三老为入白之。”复投三老河中。西门豹簪笔罄折，响河立待良久。长老、吏傍观者皆惊恐。西门豹顾曰：“巫姬、三老不来还，奈之何？”欲复使廷掾与豪长者一人入趣之。皆叩头，叩头且破，额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门豹曰：“诺，且留待之须臾。”须臾，豹曰：“廷掾起矣。状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罢去归矣。”邺吏民大惊恐，从是以后，不敢复言为河伯娶妇。

西门豹即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当其时，民治渠少烦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然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孙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给足富。十二渠经绝驰道，到汉之立，而长吏以为十二渠桥绝驰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驰道合三渠为一桥。邺民人父老不肯听长吏，以为西门君所为也，贤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长吏终听置之。故西门豹为邺令，名闻天下，泽流后世，无绝已时，几可谓非贤大夫哉！

赵 过 传

——《汉书》卷二九

【说明】赵过，汉武帝时代（公元前 140—前 87 年）人。生卒年、籍贯均不详。大约在汉武帝征和四年（公元前 89 年），担任搜粟都尉，掌管国家军粮，指导农业生产。是汉代著名的农业革新家。《汉书·食货志》记载了他在农业技术方面的创造和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赵过大力提倡和推广代田法。这是适应干旱土地增产的耕作方法。即在田中开沟作垄，在沟里播种作物种子，出苗以后，进行中耕除草，同时用垄上的土培壅苗根。第二年再调换沟与垄的位置，仍用上法进行耕种培育。这样逐年轮番耕作，既可抗旱保，又可以使地力获得休养恢复，以达增产目的。

二是赵过大力推广牛耕和他发明创造的高功效的播种机——耧车，以适应代田法中的整地、中耕和播种的需要。崔寔在所著《政论》中介绍其耕作方法说，赵过“教民耕殖，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使焉。日种一顷，至今三辅尤赖其利。”其中所说“三犁”就是三脚耧车，车下面设有三个开沟器。播种时，用一头牛拉着耧车，一人扶耧，

种子盛在耒斗里，耒斗通空心的耒脚，耒脚在平整好的土地上开沟进行条播。它能同时完成开沟、下种、盖土三道工序，一次播三行，一日可播种一顷田，而且播种均匀，行距一致，大大提高了播种效率和质量。据《齐民要术》记载，当时赵过耒车传到敦煌，使用后，劳力节省一半，产量增加五成。

赵过是中国科技史上的重要人物。但正史无传，故以《汉书·食货志》所载其事迹代传予以介绍。

汉武帝刘彻到晚年时，后悔过去曾出兵讨伐，忙于战争之事，于是封丞相为富民侯。颁发诏书说：“如今当务之急的事，就是要大力发展农业。”他任命赵过担任搜粟都尉。赵过能用代田法耕种土地，一亩田开凿三条水沟，每年轮番代换休耕，因此称为代田，这是古代的耕作方法。尧舜时代周族的始祖和农官后稷最早在田野中开凿水沟，耕地用两个翻地农具耜，两人一组并排耕作，宽度一尺深度一尺叫做圳，长度以一亩田地的长为限。一亩地开有三条水沟，一百亩地则有三百条水沟。将种子播种在沟中，在种苗生出叶子以后，要锄去田埂上的杂草，在锄草时田埂上的土也因锄松而自动落到沟中去，这样便可以为苗培土，有助于禾苗的生根发育。因而《诗经·小雅·甫田》中说：“又除草又培土，黍子、谷子生长茂盛。”芸，就是除草；耆，就是为苗培土，促进苗根生长。这里所说的就是当禾苗稍微长大以后，每次除草就能为苗根培土，到了天气炎热的时候，田埂被除平了，植物的根也长深了，便能抗风耐旱，因而使作物生长茂盛。

赵过使用代田法，其耕地、除草、播种所使用的农具，都

很方便灵巧。通常十二个农夫能耕种一千二百亩田地，也就相当于汉代的五百亩田地，用双犁并排耕作，需要两头牛和三个人操作，一年每亩的收获往往超过用一般方法耕种土地收成的一斛（即十斗）以上，如果善于用此法耕作，则会获得双倍的收成。赵过派遣专人到太常官和三辅官所管理的田地教授这种耕作方法，掌管租税钱粮盐铁的大农令派遣会制造种田农具的工匠奴仆，同他一起从事这件事，为赵过制造种田用的器具。郡守派遣县长、县令、乡官和擅长农业、有生产经验的人接受这些新式的农具，学习耕种使用和新的育苗方法。有的农民苦于耕牛不足，不能及时耕田，无法赶上两季的雨水灌溉，因此平都县令光教赵过用人力拉犁耕种。赵过奏请任用平都县令光为搜粟都尉丞，教百姓互相换工拉犁。如果率领的人多，每天可耕种田地三十亩，人少的则可耕种十三亩。因此许多田地都被开垦出来了。赵过让离宫的士兵开垦离宫内墙和外墙之间的空地，试验种植，所收获的谷子，都比它旁边的田地每亩多收一斛以上。皇帝诏命受爵封的人要用代田法耕种三辅地区（三辅辖境相当于今陕西省中部地区）的公田。又教周围边境郡县和居延城（今甘肃张掖）的人使用代田法耕种田地。这以后边境的郡县，河东郡（今山西沁水以西，霍山以南地区）、弘农郡（今河南黄河以南，宜阳以西的洛河、伊河流域以及陕的洛水、丹水流域）、三辅地区、太常（指宗庙、诸陵间的土地）等地的农民都因采用代田法耕种而获得利益，用较少的劳力而获得较多的谷子。

（赵慧芝 译）

【原文】

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下诏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一亩三圳。岁代处，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圳田，以二耜为耦，广尺深尺曰圳，长终亩。一亩三圳，一夫三百圳，而播种于圳中。苗生叶以上，稍耨陇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诗》曰：“或芸或芋，黍稷隤隤。”芸，除草也；芋，附根也。言苗稍壮，每耨辄附根，比盛暑，隤尽而根深，能风于旱，故隤隤而盛也。

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五顷，用耦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过使教田太常、三辅，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民或苦少牛，亡以趋泽，故平都令光教过以人輓犁。过奏光以为丞，教民相与庸輓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亩，少者十三亩，以故田多垦辟。过试以离宫卒田其宫嫫地，课得谷皆多其旁田亩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辅公田。又教边郡及居延城。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

卜 式 传

——《汉书》卷五八

【说明】卜式，汉武帝时人，生卒年不详。河南人。以善于养羊出名。他曾将自己的养羊经验概括为十二个字，即“以时起居，恶者辄去，毋令败群。”相传卜式著有《养羊法》一书，但早已亡佚。真正使卜式名垂青史的是卜式的爱国精神，当时汉正与匈奴交战，卜式致富不忘国家，多次将自己养羊所积累起来的财富捐献给国家，用以支援反击匈奴的战争，并一度受到朝廷的赏识，从缙氏令一直官至御史大夫。

卜式，河南（即黄河以南）人。从事农牧生产。家有小弟，小弟长大后，卜式从家里分了出来，一人只分得羊一百多头，其它田地、住宅、财物全部给了弟弟。卜式进山放牧，十多年后，羊发展到一千多头，并买了土地和房子。但他的弟弟却已彻底破产，卜式便将自己的财产几次重新分给了弟弟。

当时，汉正在与匈奴打仗。卜式上书，表示愿意将自己家财产的一半拿出来，支援边疆。皇帝派了使者来询问卜式：

“你想做官吗？”卜式说：“我从小牧羊，不习惯做官，也不愿做官。”使者又问：“难道是你家有什么冤屈，打算上告吗？”卜式回答说：“我平生与人相处没有什么争执，本地有贫穷的人，我借给他钱，有品行不端的人，我教育他，和我居住在一处的人都顺从我，我有什么原因会蒙受冤屈呢？”使者说：“这样的话，你想要什么呢？”卜式说：“皇帝在消灭匈奴，我认为贤能之人应该为了民族气节而英勇就义，有财物的人应该捐献出来，只有这样匈奴才可以消灭。”使者将所听之言向上做了报告。皇帝又将此转告丞相桑弘羊。桑弘羊说：“这不是人的真情。不法分子不可因为教化而扰乱法制。希望陛下您不要答应。”皇帝没有答复，几年以后卜式这件事就做罢了。卜式回乡后，重新又经营起了畜牧业。

一年多以后，正好赶上匈奴浑邪等投降，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大，库存的钱粮也已耗尽一空，贫苦老百姓大迁移，都依赖地方政府提供给养，但不能得到满足供应。卜式又拿出钱二十万给河南太守。用以分给移民。河南将帮助穷人的富人向上做了汇报，皇帝认出了卜式的姓名。说：“这就是以前想捐献一半家财支援边疆的人。”便赐给卜式每年十二万钱，用以免除四百人的戍边，卜式又将其全部交给了政府。当时，富豪们都抢着藏匿自己的财产，只有卜式还愿意捐献出家财。皇帝这才认为卜式是个始终如一的人，便召见卜式，于是任命他为中郎，赐给他左庶长的爵位和十顷田地，通报全国，以他为榜样，号召老百姓向他学习。

起初，卜式不愿担任中郎，皇帝说：“我有羊在上林苑中，想命令你去放牧。”尽管卜式已经当上了中郎，却仍然穿着布

衣草鞋去放羊。一年多后，羊又肥又壮且繁殖很快。（有一次）皇帝经过他放羊的地方，对他给予了表扬和夸奖，卜式说：“不仅是放羊，治理老百姓也是如此。按时作息，不好的就去除，不要使它败了一个群体。”皇帝对他的话很感惊奇，想试试让他去治理百姓。于是任命卜式为缙氏（今河南偃师县）令，缙氏的老百姓都很顺从他；后卜式又任成皋县令，并兼管漕运，考核结果得了最佳。皇帝因卜式朴实忠厚，拜他为齐王的老师，转而又做了丞相。

正好又赶上吕嘉谋反，卜式上书说：“我听说君主有愧，臣子该死。群臣应该不惜牺牲自己以尽到保全君主的责任，才能低下的人应该献出自己的财产以支援军队，这才是使国家强大，敌人不敢进犯的办法。我愿意和我的儿子，以及临淄懂得射箭、博昌知道驾船的人一道，请求执行任务，并愿意为此而牺牲，以尽到臣子的责任。”皇帝把他当做贤者，并下诏书说：“我听说以德报德，以正直报怨屈。现在全国不幸，正处于战乱之中，各郡县的诸侯没有一个挺身而出以直报怨的人。齐相卜式平素躬耕田亩，不求名利。畜牧繁殖增多便分给自己的弟弟，而自己又重新进行繁殖。从不为物质利益所迷惑。以前北方边境有军事行动，他上书支援政府。前些年，西河一带年成不好，他又带领齐地的人民捐献粮食。今天他头一个自告奋勇，请求参战，虽然仗还没有打起来，可以说他的节义已在其中表现出来了。特赐给卜式关内侯的爵位，四十斤黄金和十顷田，通告全国，使大家都清楚知道此事。”

汉武帝元鼎（公元前 116—前 111 年）中，征召卜式取代

石庆的御史大夫。卜式上任以后，说郡国不经营盐铁，而船又有税，（这种做法）可以废除。皇帝从此就不喜欢卜式了。第二年又赶上封禅大典，卜式又不懂文辞，被贬为太子太傅，而由儿宽代替他。卜式在享尽天年之后而死。

（曾雄生 译）

【原文】

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为事。有少弟，弟壮，式脱身出，独取畜羊百余，田宅财物尽与弟。式入山牧，十余年，羊致千余头，买田宅。而弟尽破其产，式辄复分与弟者数矣。

时汉方事匈奴，式上书，愿输家财半助边。上使使问式：“欲为官乎？”式曰：“自小牧羊，不习仕宦，不愿也。”使者曰：“家岂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与人亡所争，邑人贫者贷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从式，式何故见冤！”使者曰：“苟，子何欲？”式曰：“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有财者宜输之，如此而匈奴可灭也。”使者以闻。上以语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轨之臣，不可以为化而乱法，愿陛下勿许。”上不报，数岁乃罢。式归，复田牧。

岁余，会浑邪等降。县官费众，仓府空，贫民大徙，皆仰给县官，无以尽贍，式复持钱二十万与河南太守，以给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贫民者，上识式姓名，曰：“是固前欲输其家半财助边。”乃赐式外繇四百人，式又尽复与官。是时，富豪皆争匿财，唯式尤欲助费。上于是以式终长者，乃召拜式为中郎，赐爵左庶长，田十顷，布告天下，尊显以风百姓。

初，式不愿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为郎，布衣草屨而牧羊。岁余，羊肥息。上过其羊所，善

之，式曰：“非独羊也，治民亦犹是矣，以时起居，恶者辄去，毋令败群。”上奇其言，欲试使治民。拜式缙氏令，缙氏便之；迁成皋令，将漕最。上以式朴忠，拜为齐王太傅，转为相。

会吕嘉反，式上书曰：“臣闻主媿臣死。群臣宜尽死节，其弩下者宜出财以佐军，如是则强国不犯之道也。臣愿与子男及临醜习弩、博昌习船者请行，死之以尽臣节。”上贤之，下诏曰：“朕闻报德以德，报怨以直。今天下不幸有事，郡县诸侯未有奋繇直道者也。齐相雅行躬耕，随牧蓄番，辄分昆弟，更造，不为利惑。日者北边有兴，上书助官。往年西河岁恶，率齐人入粟。今又首奋，虽未战，可谓义形于内矣。其赐式爵关内侯，黄金四十斤，田十顷，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元鼎中，徵式代石庆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言郡国不便盐铁而船有算，可罢。上由是不说式。明年当封禅，式又不习文章，贬秩为太子太傅，以儿宽代之。式以寿终。

张 骞 传

——《汉书》卷六一

【说明】张骞（？—公元前 114 年），西汉时汉中成固（今陕西城固）人。官至大行，封博望侯。张骞曾二次通西域，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较大影响。“西域”一词，开始出现于西汉。所指地区范围很广泛，包括我国新疆、中亚细亚、印度、伊朗高原、阿拉伯和小亚细亚等地。

张骞第一次通西域，在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 138 年）。汉武帝为了实现“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就派张骞去西域，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张骞出陇西（郡治今甘肃临洮），途径河西走廊，被匈奴人擒获，羁留在匈奴十余年才找到机会逃脱，继续西行，到了大宛（在今费尔干纳盆地）。然后经康居（在锡尔河流域）、大月氏、大夏（在阿姆河以南兴都库什山以北）。最后取道昆仑山北麓东返，又为匈奴所擒获。后来，匈奴发生内乱，找得机会逃回长安。张骞这次通西域，前后时间达十三年之久，历尽千辛万苦，得到了有关西域的丰富地理知识。除他亲身经历的地方外，还间接了解到乌孙（在伊犁河、楚河、巴尔喀什湖、伊塞克湖一带）、奄蔡（在咸海、里海北面）、安息（在伊朗高原）、条支（在两河流域）等国

的情况。元狩四年（公元前 121 年），张骞第二次通西域，任务是联络乌孙夹攻匈奴。他到乌孙后，分别遣副使数十人，分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今印度）、于阗（今和田）、扞深（即扞弥，在今于田克里雅城）等地。元鼎二年（公元前 115 年），张骞返回长安。过了一年多就去世。他遣派的副使都圆满地完成任务。自此，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完全打开，使者和商人往来络绎不绝。张骞通西域，在历史上意义重大，不仅促进了我国和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丰富了中国人的地理知识，扩大了中国人的地理视野。^①

张骞，是汉中地方的人，建元期间（公元前 140—前 135 年）任郎官。当时，有匈奴投降汉朝的人说：匈奴攻破了月氏王，把他的头髑当作饮器用。月氏人逃亡到他地，很怨恨匈奴，只恨没有其他国家能和他共同攻击匈奴。汉朝廷正考虑出兵灭胡的事，听到这样的话，就想与月氏通使，而道途必须经过匈奴，于是召募能够出使的人。张骞以郎官的身份应召，出使月氏，与堂邑氏部落的奴隶甘父一起道出陇西。路经匈奴，被匈奴人擒获，送去见单于（匈奴的王称“单于”）。单于说：“月氏在我国北面，汉朝怎么能够得以与他通使？我想要派人去越国，汉朝肯听从我的意思吗？”单于把张骞羁留在匈奴十余年，给他娶了妻，并生了儿子。然而张骞始终手持着汉朝出使的符节而不丢失。

① 参考《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科学出版社，1984 年。

因居住地方在匈奴西边，张骞就和一起出使的下属逃往月氏，向西走了几十天，到达大宛。大宛听说汉朝物资富饶，早想与汉交通而苦无门路可得，见到张骞很高兴，问张骞要到什么地方去。张骞说：“我是为汉朝出使月氏而被匈奴阻挡住道路的，现在好不容易才逃出来，只有请你派人路上护送我了。如果能够返回汉，汉朝廷一定会赠送给你大量财物。”大宛认为他的话有道理，就遣送张骞，为他派了翻译响导，抵达康居。康居又传送到大月氏。大月氏王已被胡人所杀，他的夫人被立为王。既而大月氏使大夏臣服于他并统治了其地区。这里土地肥饶，少敌国侵略，大月氏一心只想安享太平，又以为离汉朝很远，所以没有一点向胡人报复的意思。张骞从大月氏到大夏，自始至终没有能弄清楚月氏的主要意图。

在大夏逗留了一年多，要回汉朝。沿着南山，从羌中回汉朝途中，又一次被匈奴擒获。拘留了一年多，匈奴单于去世，国内发生纷乱，张骞带着胡妻和堂邑父一起逃离回到了汉朝。汉武帝拜封张骞做太中大夫，堂邑父为奉使君。

张骞平时为人，坚忍有毅力，待人厚道宽大，蛮夷人都敬爱他。堂邑父是胡人，善长射箭，在穷急的时候就射禽猎兽以供食用。张骞初去西域时，有百余人随从，去西域十三年后，只有二人得以返回汉朝。

张骞亲自经历的国家有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间接听人传说的周围五、六个大国家的地形、出产等情况，也都向武帝一一作了汇报。

张骞说：“我在大夏时，见到了邛竹杖、蜀布，问当地人是怎么得到这些的？大夏国的人说‘我们的商人到身毒国去

贩运来的。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大约数千里，那里的习惯是世代定居在一个地方，和大夏相同，但比较卑湿暑热。那里的人骑象作战。其国土面临大水’。因而我估计，大夏距离汉朝一万二千里，位处西南。现在身毒又位于大夏东南数千里。而有蜀地出产的物品，那它距离蜀不会太远的。现在出使大夏，要从羌中经过，路途险恶，羌人又讨厌不欢迎；少许北上，则是匈奴占领地区；从蜀中去，路径合适，又没有盗贼。”武帝听说大宛和大夏、安息等国都是大国，多奇物异产，人们世代定居，与中国风俗很多相同，而且这些国家军事力量不强，看重汉朝的财物；他们的北面则是大月氏、康居等国，军事力量较强，可送给财物施之以利，诱使他们入朝。如果真能不出兵马而使他们归属汉朝，则可以扩大疆土万里，重视殊方远国，招致不同习俗的人，使威德遍布四海。武帝喜乐自得地认为张骞说的很对。就下令负有伺隙行事使命的使者们，从蜀犍为出发，四路并出：出陇，出葭、出徙、邛，出僰。四路都各走出了一二千里。北方受阻截于氐、葭，南方受阻于僰、昆明。昆明等部族，没有君主长上，擅长攻击抢掠，常常杀掠汉朝使者，最终没得以开通。但是听说昆明之西大约千余里，有骑乘象的国家，叫滇越，蜀的商人间或有出卖滇越物产或去过那个国家的，于是汉朝因寻找通大夏的道路而始得以通滇国。起初，汉朝想要沟通西南夷，因花费太多而停止。到张骞说可以通大夏，于是沟通西南夷的事又提了出来。

张骞以校尉身份随从大将军霍去病攻打匈奴，知道何处有水草，军队因而得以不受困乏，朝廷于是封张骞为博望侯。

这一年是元朔六年（公元前 123）。二年后，张骞任卫尉，和李广同出右北平攻打匈奴。匈奴包围住李广，军队死伤较多，而张骞也因援救迟到，罪当斩，终以功折赎罚被贬为平民。这一年，骠骑将军霍去病攻破匈奴西边，斩杀数万人，军抵祁连山。这年秋天，浑邪王率部众向汉朝投降，由是金城、河西以西，并南山到盐泽，都空无匈奴人了。匈奴虽时有巡逻侦察的人来，但很少了。后二年，汉朝把匈奴单于赶到大漠以北的地方去了。

武帝几次向张骞询问大夏等国的情况。这时张骞已失去爵位，因而说：“我居住匈奴时，听说乌孙王叫昆莫。昆莫的父亲难兜靡本来和大月氏都居住在祁连、敦煌之间，是小国家。大月氏攻杀了难兜靡，侵夺其地盘，老百姓逃亡到匈奴。他的儿子昆莫刚生下来不久。昆莫的傅父乌孙大将军（布就翎侯）抱着他逃了出来，把他藏匿在草丛中，出去找寻食物回来，看见狼在喂昆莫奶汁，又有乌鸦衔着肉在他身旁飞翔，以为是天神降生，就带着昆莫归顺匈奴，单于喜欢而留养了他。到昆莫成年，单于把他父亲原有的部民交还给他，让他率领兵将，屡次建立战功。这时，月氏被匈奴打败，就向西攻打塞王，塞王向南方远徙，月氏就留居那里。昆莫已刚强有力，请求单于让自己去报父仇，因而向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再次西迁，迁移到大夏地方。昆莫治理安辑当地民众，就留住下来，兵力稍强大，适逢匈奴单于去世，不再愿意臣服于匈奴。匈奴派兵攻打，没有取胜，更认为他有神帮助，因而远远离开了。现在单于刚被汉所困，而昆莫控制的地方也空无人。蛮夷依恋故地，又贪爱汉朝物品，如趁这时机送给

乌孙厚礼，提出让他东移到故地居住，汉朝再下嫁公主为单于的夫人，结拜成为兄弟之国，事事就会听从于汉朝。如此则断了匈奴的右臂。既与乌孙连结和好了，自乌孙以西的大夏等国都可招来为国外之臣。”武帝认为张骞所言极是。就拜张骞为中郎将，带领三百人，每人配备骑乘的马二匹，牛羊以万计，携带的金银丝绸价值数千万，张骞的副使也多持有出使符节，以便沿途可派遣去其他国家。张骞到了乌孙，把汉皇帝的指示告知了乌孙王，没有得到决定性的答覆。所说话语记载在《西域传》中。张骞派遣副使出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乌孙发派翻译响导送张骞，有乌孙使者数十人，马数十匹相随张骞来汉，报谢汉皇帝，并趁此了解汉朝情况，知道汉朝国土广大。

张骞返回汉以后，封为大行。过了一年多，张骞去世。又过一年多，他派遣去交通大夏等国的副使，大多与那些国家的使者一起来汉，于是西北的国家开始与汉朝相往来。自张骞开始通西域，以后出使的使者都称博望侯，以便取信于外国，外国因此相信汉朝。以后，乌孙终于与汉朝结为姻好之国。

（范楚玉 译）

【原文】

张骞，汉中人也，建元中为郎。时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而怨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陇西，径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单于曰：“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留骞十余岁，予妻，有子，然骞持

汉节不失。

居匈奴西，骞因与其属亡向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译道，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夫人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

留岁余，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余，单于死，国内乱，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拜骞太中大夫，堂邑父为奉使君。

骞为人疆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穷急射禽兽给食。初，骞行时百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

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

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其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俗，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则大月氏、康居之

属，兵疆，可以赂遗设利朝也。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天子欣欣以骞言为然。乃令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陇，出葭，出徙、邛，出焚，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氏、葭，南方闭嵩、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滇越，而蜀贾间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初，汉欲通西南夷，费多，罢之。及骞言可以通大夏，乃复事西南夷。

骞以校尉从大将军击匈奴，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乃封骞为博望侯。是岁元朔六年也。后二年，骞为卫尉，与李广俱出右北平击匈奴。匈奴围李将军，军死亡多，而骞后期当斩，赎为庶人。是岁骠骑将军破匈奴西边，杀数万人，至祁连山。其秋，浑邪王率众降汉，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匈奴时有候者到，而希矣。后二年，汉击走单于于漠北。

天子数问骞大夏之属。骞既失侯，因曰：“臣在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亡置草中，为求食，还，见狼乳之，又乌衔肉翔其旁，以为神，遂归匈奴，单于爱养之，及壮，以其父民众与昆莫，使将兵，数有功。时，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请单于报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复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众，因留居，兵稍疆，会单于死，不肯复朝事匈奴。匈奴遣兵击之，不胜，益以为神而远之。今单于新困于汉，而

昆莫地空。蛮夷恋故地，又贪汉物，诚以此时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其势宜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天子以为然，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斋金币帛直数千钜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国。骞既至乌孙，致赐谕指，未能得其决。语在《西域传》。骞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乌孙发译道送骞，与乌孙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

骞还，拜为大行。岁余，骞卒。后岁余，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然骞凿空，诸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是信之。其后，乌孙竟与汉结婚。

召信臣传

——《汉书》卷八九

【说明】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寿春人。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于西汉元帝初元至竟宁年间（公元前 48 年—前 33 年）。

汉元帝时期，召信成历任零陵、南阳太守，他为人勤奋，胸有方略，非常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常常亲自出入于农田之间，鼓励农民辛勤耕作。在南阳时，他巡视郡中水泉，开挖沟渠，兴建了几十处水门堤闸，其中以六门堰和钳卢陂最为著名。六门堰又叫穰西石堰，在今河南邓县城西 1.5 公里处。它壅遏湍水，形成水库。又先后开设六处水门引水溉田，沿途形成二十九个陂塘，灌溉面积达穰县、新野、涅阳三县，计五千多顷农田。钳卢陂在邓县城南三十公里处，溉田三万多顷。

召信臣不仅重视兴修水利，同时也非常注重管理。他建立了一套灌溉用水制度，“为民作均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分争。”在他的领导管理下，南阳水利得到大大发展，处处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民得其利，蓄积有余”。“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百姓爱戴地称他为“召

父”。

召信臣之后，东汉杜诗也曾为南阳太守，并同样重视农业生产，惠政于民。民间并称他们为“前有召父，后有杜母”。因而后世称颂为民造福的地方官为“召父杜母”。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寿春人，以明经甲科出任郎中，后出补谷阳长，又因考核优秀，迁任上蔡长。他治理地方时爱民如子，受到百姓们的称颂。后提升为零陵太守，因为生病而辞官归乡。身体康复后又征封为谏大夫，后又迁任南阳太守，和在上蔡时一样治理有方。

召信臣为人勤奋努力，胸有方略，喜欢为百姓谋福利，希望百姓们生活富足。他亲自劝导百姓重视农业耕作，常常出入于农田之间，累了就在野外休息，很少有安居的时候。他巡视郡中水泉，开通沟渠，修筑了几十处水门堤闸，用来推广农田灌溉，使灌溉面积年年增加，多达三万顷。广大农民从中受益颇多，家家粮食都有富余。召信臣还为百姓灌溉用水订立了制度，并将之刻在石碑上立在田边，以防止纠纷。他下令禁止婚丧嫁娶追求奢华而铺张浪费，提倡节俭。府县的官家子弟有游手好闲、不务农事的，召信臣都严加申斥，命令改正。特别严重的则追究法律责任，以昭示众人，予以警戒。他所造成的良好社会风气大力推行，郡中百姓无不努力耕田种植庄稼，以往背井离乡的百姓纷纷回来，使户口成倍增长，偷盗、刑事诉讼这一类的事情几乎没有了。官员、百姓都非常爱戴召信臣，尊称他为“召父”。荆州刺史上奏朝廷，说召信臣为老百姓兴修水利，南阳郡因此而富足，朝廷赐他

黄金四十斤以示表彰。后迁任河南太守，政绩常常名列第一，又数次获得朝廷赏赐黄金。

竟宁元年（公元前 33 年），征封为少府，官位列于九卿之一。他奏请朝廷不要再大事修缮像上林等地皇上很少驾临的偏远宫馆。又奏请把宫中乐府、戏班、兵弩器物削减大半。当时皇家官园中冬天利用温室种植葱、韭菜等蔬菜，供宫中食用。房屋四周都是，日夜蓄火升温，使植物得以生长。召信臣认为这些都是不合时令的东西，有伤于人，不宜于供给宫中食用，其它一些不合时令的食物，也都奏请取消，每年节省开支数千万。

召信臣年老时在官位任职中去世。

元始四年（公元 4 年），皇上下诏祭祀那些为民谋利的已故官员士卿。蜀郡推选了文翁，九江郡推选了召信臣。过年时，九江郡二千石率领所属官员举行祭奠礼，祭祀于祠堂和召信臣墓前。而南阳郡也为召信臣建了祠堂。

（金 菁 译）

【原文】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寿春人也。以明经甲科为郎，出补谷阳长。举高第，迁上蔡长。其治视民如子，所居见称述。超为零陵太守，病归。复征为谏大夫，迁南阳太守，其治如上蔡。

信臣为人勤力有方略，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躬劝耕农，出入阡陌，止舍离乡亭，稀有安居时。行视郡中水泉，开通沟渎，起水门提阕凡数十处，以广溉灌，岁岁增加，多至三顷。民得其利，畜积有余。信臣为民作均水约束，刻石立

于田畔，以防分争。禁止嫁娶送终奢靡，务出于俭约。府县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为事，辄斥罢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视好恶。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吏民亲爱信臣，号之曰召父。荆州刺史奏信臣为百姓兴利，郡以殷富，赐黄金四十斤。迁河南太守，治行为第一，复数增秩赐金。

竟宁中，征为少府，列于九卿，奏请上林诸离远宫馆稀幸御者，勿复缮治共张，又奏省乐府黄门倡优诸戏，及宫馆兵弩什器减过泰半。大官园种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瓦，昼夜爇爇爇蕴火，待温气乃生，信臣以此皆不时之物，有伤于人，不宜以奉供养，及它非法食物，悉奏罢，省费岁数千万。信臣年老以官卒。

元始四年，诏书祀百辟卿士有益于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应诏书。岁时郡二千石率官属行礼，奉祠信臣冢，而南阳亦为立祠。

杜 诗 传

——《后汉书》卷三一

【说明】杜诗，字君公，两汉之际河内郡汲县人，生年不详，卒于公元 38 年。西汉时曾任河内郡功曹史，入东汉后担任过侍御史、成皋县令、沛郡都尉、汝南郡都尉等职，建武七年（公元 31 年）始任南阳郡太守。杜诗在南阳七年，为政清廉，以致病故后竟无钱办理丧事。他对南阳郡的经济发展、人们生活富足出力尤大，他组织农民“修治陂池，广拓土田”，发展冶铸工业，制造农具，大大提高了生产力，使南阳出现了“比室殷足”的局面，人们把他比作自己的母亲。

杜诗在我国科技史上的贡献除兴修水利以外，还在于他研造出“水排”。冶铸离不开鼓风，冶铸业的发展有赖于鼓风技术的提高。鼓风技术的重要方面就是鼓风动力问题。最初的鼓风动力是人力，后来发展到使用畜力。鼓风设备称作“排”，也作“橐”。所谓“马排”、“牛排”，就是应用马，牛为动力的鼓风装置。杜诗的“水排”就是利用水流的动力来运作鼓风的冶铸装置。这种以水力替代人力和畜力的方法，在冶铸史上是一项出色的发明。使用杜诗的“水排”，大大地提高了冶铸生产力，出现了史书上所谓“用力少，见功多，百

姓便之”局面。杜诗为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杜诗字君公，河内郡汲县（今河南省北部）人。杜诗年轻时已显露才华能力，在做河内郡功曹史时，就以公正平允著称。更始（公元23—25年）年间，他被征召到大司马府。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一年被三次升迁做了侍御史，到洛阳督察。当时驻守洛阳的将军萧广放任纵容手下军士，横行乡里，平民百姓惶恐不安。杜诗告诫萧广改邪归正，萧广仍不悔改，杜诗遂将萧广击杀，并将情况上奏朝廷。为此，世祖皇帝召见了杜诗，赏赐了棨戟，并派他出使督察河东郡，以便诛伐贼寇杨异。杜诗赴职刚到大阳县，就听说贼寇计划将要渡河北去。于是迅速与长史焚烧了他们的渡河船只，部署河东郡部队，带领骑兵突袭贼寇，斩杀了杨异等人，剿灭了贼寇。杜诗被拜为成皋县县令，在成皋就职治事三年，各方面政绩颇为卓著。又迁升为沛郡都尉，继而转任汝南郡都尉，所到之处没有不称赞其治行政绩的。

后汉建武七年，杜诗迁升为南阳郡太守。杜诗生性简俭节省，国事政务处理清楚平允。他用剿诛残暴来树立威望，善于策划谋略，节省爱惜百姓力役。杜诗制作了用于冶炼铸造的以水为动力的鼓风设备——水排，大大提高了生产力，用水排铸造农业器具，节省了劳动力，提高了功效，极大地方便了老百姓。杜诗又修治了陂池，广泛地开拓耕田，南阳郡内家家户户均富足殷康。当时人们将杜诗与为民兴利的前南阳太守召信臣相比拟，所以南阳郡有句话叫做：“前先有召信

臣这个父亲，后来有杜诗这个母亲。”

杜诗以为自己并没有什么功劳，对长久担任大郡的太守感到不安，想要将郡守之位让给对朝廷有功劳的臣子，于是就上奏朝廷本章，他的上疏说道：

“皇帝陛下您辅助上天的职司，完成了大的事业，偃息刀兵而修明文教，诸军班师，天下和平，万代受福，这真是普天下之幸运呀。只是那北方的匈奴尚不知晓您的大明大德，虐恣中国的西陲、北陲、侵扰我中原，使我边陲军民资财损耗空虚，不能自己维持正常生活，我惟恐威武勇猛的将士虽然勤勉，但长久不得解甲收弓的休息。长久的勤勉得不到平息则会产生不满，长久的辛劳得不到休整则会发生怨恨，怀有不满怨恨的军队是很难再让他们完成功业的。据我的察看，那些将帅功臣的希求愿望，不过是到内地郡县休息驻足一下，然后再戎装出发赴命疆场，岂敢有什么怨恨不满呢。臣下认为‘军队克敌制胜就在于将士们的同心和睦，而不在于军队人数的众寡’，皇帝陛下虽然念记着北方边陲的稳固，但还是应当在使用人臣将帅上稍微注意一点他们的调换更迭。以前汤武善于御使众臣，所以出师有名，没有因忿怒而出击征讨的。皇帝陛下起兵征讨已有十三年了，将帅兵士都和睦欢悦。现今如果能让内地郡守去守备边陲的军事壁垒，将帅们自然会自勉自励；对兵士的优待，能与宫禁中值宿警卫相比，兵士们作战自然会勇猛百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天下海内已经安定，人们各自看重自己的性命，自大臣以下，都怀念安乐的乡土，不能同

等地对待功劳就不能勉励人们效劳，也就无从劝勉臣民了。皇帝陛下如果能诚心诚意地空缺出几个郡守的职位，来等待那些整军的将帅赴职，再用优宽的待遇与丰厚的赏赐给予久久服役的兵士们。若能如此，沿缘边陲的戍屯军队将士就会竞相忘死效命疆场，防守城池要塞的兵吏会不辞劳苦，使烽火及时明亮，守备坚固。圣明君主的政治，是依据人心而为之的。现在轻信任用愚钝浅薄之人，阻塞断绝了功臣的希望，这确实是不适宜的。

臣子杜诗暗自思忖，自己的才能也就勉强能做个功曹之类史吏，恰好遇逢皇帝陛下开创伟大的事业，贤能俊杰为之在外征战效力，朝中内郡则显空缺乏人，我蒙受了超乎应有的恩泽，禄养供给了我这个不胜任的人，我奉行职守没有什么功效，却长久地窃居职位取得俸禄，这使得那些有功之臣不满愠怒，的确令人惶恐不安。建武八年时，我就曾经请求退让出自己的职位给那些有功有德的人，皇帝陛下，对我恩泽有加，没有准允我的请求。臣子杜诗蒙受朝廷恩惠颇深，不敢草率虚伪地提出请求，确实是不胜任职而提出请求的。请求朝廷让我退出南阳大郡的职位，授与较小的官职。等到我年龄大些、经验丰富些了，能够胜任那些繁重的工作了，如果任用我杜诗会有些好处的话，再授与我重要的职位，即使是分颁珪玉授爵封侯，我也不会辞让的。请皇帝陛下怜悯我。”

汉光武帝刘秀爱惜杜诗的才能，就没有允准杜诗的奏章。

杜诗素来喜好推举贤能之士，几次进荐当时的知名人士，

如清河的刘统和做鲁阳长的董崇等人。

当初，朝廷的各种禁令规章还比较简单不健全，只是用加盖玺印的文书就能调动兵马，没有虎符之类的信物。杜诗针对这种情形上疏朝廷，说道：“我听说军队兵马是国家的凶器，圣贤之人对此十分慎重小心。以前的制度规定，发兵出征一定要以虎符为凭，其它的军队调动征集也要有竹使。符节两两相合，取义在信，以此来显示国命的重要、命令的持重威严。近来调动军队，只是用玺书或诏令就行了，如果奸逆之人诈言伪行，则无从知道他们的真伪。我认为军队还在发展壮大，逆贼鞑虏还未被殄灭，向郡国征兵调将，应该慎重，可以建立虎符调兵的制度，以便杜绝奸逆作乱的念头。以前在战国时有个信陵君，他身为魏国公子，威望倾倒邻近之国，即便如此他也要偷借调动兵马的虎符，来解救秦军对赵国的包围，如果不是当初信陵君曾为魏王的宠妃如姬报过杀父之仇，如姬为他盗出虎符的话，信陵君救赵的功劳也就不会存在的了。事情有时需要烦复不能省略，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虎符调兵这类事就属于此类吧。”皇帝同意他的奏章，并指示照此办理。

杜诗虽然奉职在外，却能尽心竭力为中央朝廷着想，随形势的发展，及时奉献出他的直言良策。杜诗在南阳郡任太守七年，政治教化大行其道。建武十四年，因派遣家客为他的弟弟报仇，杜诗为此被征问，适逢他因病亡故。司隶校尉鲍永上书朝廷说，杜诗为官清廉，家无田无宅，没有钱财办理丧事。皇帝诏令用南阳郡官邸为杜诗办理丧事，并为此拨调绢丝千匹。

（夏经林 译）

【原文】

杜诗字君公，河内汲人也。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称。更始时，辟大司马府。建武元年，岁中三迁为侍御史，安集洛阳。时将军萧广放纵兵士，暴横民间，百姓惶忧，诗敕晓不改，遂格杀广，还以状闻。世祖召见，赐以棨戟，复使之河东，诛降逆贼杨异等。诗到大阳，闻贼规欲北度，乃与长史急焚其船，部勒郡兵，将突骑趁击，斩异等，贼遂翦灭。拜成皋令，视事三岁，举政尤异。再迁为沛郡都尉，转汝南都尉，所在称治。

七年，迁南阳太守。性节俭而政治清平，以诛暴立威，善于计略，省爱民役。造作水排，铸为农器，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广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时人方于召信臣，故南阳为之语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

诗自以无劳，不安久居大郡，求欲降避功臣，乃上疏曰：

“陛下亮成天工，克济大业，偃兵修文，群帅反旅，海内合和，万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譬圣德，威侮二垂，陵虐中国，边民虚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将虽勤，亦未得解甲歃弓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劳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师，难复责功。臣伏睹将帅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于内郡，然后即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以为‘师克在和不在众’，陛下虽垂念北边，亦当颇泄用之。昔汤武善御众，故无忿鸷之师。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将帅和睦，士卒鳧藻。今若使公卿郡守出于军垒，则将帅自厉；士卒之复，比于宿卫，则戎士自百。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咸怀乐土，不仇其功而

厉其用，无以劝也。陛下诚宜虚缺数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复厚赏，加于久役之士。如此，缘边屯戍之师，竟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辞其劳，则烽火精明，守战坚固。圣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诚非其宜。

臣诗伏自惟忖，本以史吏一介之才，遭陛下创制大业，贤俊在外，空乏之间，超受大恩，牧养不称，奉职无效，久窃禄位，令功臣怀愠，诚惶诚恐。八年，上书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许放退。臣诗蒙恩尤深，义不敢苟冒虚请，诚不胜至愿，愿退大郡，受小职。及臣齿壮，力能经营剧事，如使臣诗必有补益，复受大位，虽析珪授爵，所不辞也。惟陛下哀矜！”

帝惜其能，遂不许之。

诗雅好推贤，数进知名士清河刘统及鲁阳长董崇等。

初，禁网尚简，但以玺书发兵，未有虎符之信，诗上疏曰：“臣闻兵者国之凶器，圣人所慎。旧制发兵，皆以虎符，其余征调，竹使而已。符第合会，取为大信，所以明著国命，敛持威重也。间者发兵，但用玺书，或以诏令，如有奸人诈伪，无由知觉。愚以为军旅尚兴，贼虏未殄，征兵郡国，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绝奸端。昔魏之公子，威倾邻国，犹假兵符，以解赵国，若无如姬之仇，则其功不显。事有烦而不可省，费而不得已，盖谓此也。”书奏，从之。

诗身虽在外，尽心朝廷，说言善策，随事献纳。视事七年，政化大行。十四年，坐遣客为弟报仇，被征，会病卒。司

隶校尉鲍永上书言诗贫困无田宅，丧无所归。诏使治丧郡邸，赙绢千匹。

贾逵传

——《后汉书》卷三六

【说明】贾逵（公元 30—101 年），字景伯，西汉初年卓越的政论家贾谊的九世孙。他精通儒经、历法。汉章帝时，他曾奉命组织了一次对历法的讨论和修订。他综合了讨论的结果，上奏皇帝。由于他的意见非常重要，《续汉书·律历志》的作者大量摘录了他的言论，载入《律历志》。

贾逵首先是个古文经学家。当时荒诞的讖纬学说流行，古文经学家多不信讖纬，桓谭因此被流放，死在路上。贾逵本不信讖纬，他为了给自己的学术争地位，竟附会说，《左传》所说，刘累是唐尧之后，刘累的后代一支仍姓刘，一支姓范。后来姓刘的住在秦国，姓范的回到晋国（按：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及《左传文公十三年》）。这就证明了图讖所说刘氏是尧的后裔。贾逵的附会使《左传》得到了皇帝的承认，立于学官，而贾逵也因此升了官。《后汉书》作者论及此事，认为是很可悲的。

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今陕西凤翔县）。他的九世祖父是贾谊，汉文帝时，当过梁王的太傅。贾逵的曾祖父贾光，

是常山太守，汉宣帝时因为是二千石俸禄的级别，从洛阳迁到了扶风。他的父亲贾徽，跟刘歆学习《左传》，兼学《国语》、《周官》，又跟涂恽先生学习《古文尚书》，跟谢曼卿先生学《毛诗》，著《左氏条例》二十一篇。

贾逵完全继承了父业，年少时就能诵读《左氏传》和《五经》本文。并以《大夏侯尚书》教人。虽然他从事的是古文经学，也兼通五家《谷梁传》的学说，从儿童时期开始，他就一直在太学里，所以不懂人情世故。他身高八尺二寸，诸位儒士们都说他是：“问事不休贾长头”。他性情和蔼、活泼，思想单纯。但远见卓识有大节。尤其精通《左传》、《国语》，著《左传解诂》《国语解诂》共五十一篇。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他写了一道奏章，把著书献给皇上，汉明帝很重视他的著作，让人抄写出来，收藏在国家图书档案馆里。

曾一度有神雀聚集在宫殿和官府中，头上的羽毛五彩缤纷。皇帝感到奇怪，就问临邑侯刘复，刘复不能够回答，就推荐贾逵，说他知识渊博，通晓万物。于是皇帝就召见了贾逵相问。贾逵回答说：“以往武王完成了他父亲的大业，凤凰在岐山鸣叫；宣帝的威德降服了戎狄，神雀云集，这是胡人要投降的征兆啊。”于是皇帝下令在兰台赐给他笔和纸，让他作《神雀颂》，任命他为郎，和班固一起校勘整理国家的秘密藏书。侍候在皇帝左右，以随时回答各种问题。

肃宗即位，注意儒家学说，尤其喜好《古文尚书》、《左氏传》。建初元年（公元76年），诏令贾逵在北宫的白虎观和南宫的云台讲学。皇帝欣赏他的学说。让他说出《左氏传》的大义比《公羊传》和《谷梁传》高超的地方。贾逵于是逐条

向皇帝上奏道：

臣认真地摘出《左传》中明显见长的三十件事，都是讲君臣大义和父子纲纪的。其余《公羊》相同的十有七八。或文字简略小有区别，但于大体无妨。至于祭仲，纪季、伍子胥、叔术们的事，《左氏》的用意着重于君臣父子，《公羊》则多崇尚权变，它们的用意悬殊，确实是非常辽远。而《左传》受冤枉被压抑天长日久，没有人肯替它辩白。

臣在永平年间曾向皇上进言，讲《左传》与图讖相合的地方。先帝不遗弃我这个山野村夫，听取采纳了我的意见，让我写了《左传解诂》收藏在图书档案馆里。建平年间，侍中刘歆，想把《左传》立于学官。他事先没有广泛宣传《左传》的大义，而是轻易地给太常写了一封信，仗着自己的理由充足，批评驳斥儒生们。儒生们心中不服，一起排斥《左传》。孝哀皇帝不愿违背众人心意，所以把刘歆调出京城，去作河内太守。从此以后，《左传》被攻击，成为众人的仇敌。到了光武皇帝，他奋起那独到的明察卓见，兴立《左传》、《谷梁传》于学官，偏又遇上这两家的大师都不懂得图讖，所以又令中途废弃。凡是要留存先王之道的，关键在于能使政局稳定，百姓治理。如今《左氏》崇尚君父，卑弱臣子，让主干强大，枝条柔弱，劝人行善，戒备作恶。都说得非常明了，非常深切。意思非常正确，论说又非常合理。况三代事情有所不同，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增加或减少，所以先帝博观各家学说，并都有所采纳。关于《周易》，国家立

有施家学派和孟家学派，以后又立梁丘学派。《尚书》，国家立有欧阳学派，后来又立大、小夏侯两派。现在三传的差异，也应该用这个办法处理。还有《五经》各家学说，都不能证明图讖所说刘氏是尧的后代，唯独《左氏》有明确的文字。《五经》家们都说颡顓代替了黄帝，因而尧不能为火德。《左传》则以为是少昊代替黄帝，就是图讖所说的帝宣。如果让尧不能为火德，那么汉也不能为火德。《左传》中讲的这些话，补益实在很多。

陛下有天一样的明察，建树了大圣人的根本。改革年号，纠正历法，为千秋万世树立了榜样。所以有数以百计的麟凤出现，非常多的吉祥征兆。但还是从早到晚认真勤奋地用心于“六艺”，研究入细入微，处处都精审细核。如果再留意一下废弃的学问，来扩大圣上的明见，那就差不多再没有遗漏的学问了。

贾逵将奏章呈给皇上，皇帝非常称赞，赏赐给他布一百匹，衣服一套，并让贾逵从研究《公羊》的严、颜两家中选拔高才生二十名，教授《左传》。每人给竹简、纸张，《春秋》、《左传》各一份。

贾逵的母亲常有病，皇帝想赐给他一点钱，但校书的人多，不好明加赏赐，所以特地拿了二十万钱让颍阳侯马防转交给他。皇帝对马防说：“贾逵母亲有病，这位先生在外边又没有交往。总这么穷，就会像伯夷、叔齐一样饿死在首阳山啦。”

贾逵多次对皇帝说，《古文尚书》和《春秋》、《左传》以及《尔雅》，它们的意思相通。皇帝就让他撰写欧阳、大夏侯、

小夏侯这三家在《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中观点的异同，贾逵写了三卷，皇帝认为写得很好。又令撰写《齐诗》、《鲁诗》、《韩诗》和《毛诗》的异同。并作了《周官解故》。提升贾逵为卫士令。建初八年（公元83）诏令所有儒家学派各自选拔高才生，学习《左传》、《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从此，这四种经就广泛流传于世。贾逵选拔的弟子及门生都被任命为千乘王国郎，从早到晚在黄门公署中学习，学者们都非常的羡慕。

和帝即位后，在永元三年（公元92），任命贾逵为左中郎将。永元八年（公元96）又任命为侍中，兼骑都尉，成为在皇帝左右的近臣，并兼管档案部门及其他接近皇帝的部门，非常受信用。

贾逵推荐东莱司马均，陈国汝郁，皇帝立即征用他们，并加以优待。司马均、字少宾，安于贫穷，好学上进，隐居教书，（过去）不接受朝廷要他做官的诏命。他的诚实信用传遍全州。乡里人如果发生争执，总要让他们拿少宾来起誓。理屈的就不敢说话了。他官职做到侍中，后因年老有病，申请退休，皇帝赐他以大夫的俸禄回归故里。汝郁，字叔异，性情仁慈、孝顺，父母去世后，他就隐居于山林江湖。后来不断提升，一直作到鲁国的相，以德行教化人民，百姓们非常称赞他。流亡的人回乡的有八九千户。

贾逵所著的经传注疏以及论文有一百多万字，又作了诗、颂、诔、书、连珠、酒令等共九篇。学者们尊奉为楷模。后世称他为通儒。然而他不修小节，受到当时人们的讥讽，所以他做不了大官。永元十三年去世（公元101），享年七十二

岁。朝廷怜惜他的逝世，封他的两个儿子为太子舍人。

评论说：郑兴，贾逵的学问，流行数百年，成为儒者宗奉的楷模，只是由于某种原因罢了。桓谭因为不善长图讖而被流放。郑兴用言词搪塞才免于死罪。贾逵能牵强附会，相比之下他算最显贵啦。作为皇帝，这样地对待学术，可悲啊！

（李 申 杨素香 译）

【原文】

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也。九世祖谊，文帝时为梁王太傅。曾祖父光，为常山太守，宣帝时以吏二千石自洛阳徙焉。父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又受《古文尚书》于涂恽，学《毛诗》于谢曼卿，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

逵悉传父业，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虽为古学，兼通五家《谷梁》之说。自为儿童，常在太学，不通人间事。身長八尺二寸，诸儒为之语曰：“问事不休贾长头”。性恺悌，多智思，倜傥有大节。尤明《左氏传》、《国语》，为之《解诂》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献之。显宗重其书，写藏秘馆。

时有神雀集宫殿官府，冠羽有五彩色，帝异之，以问临邑侯刘复，复不能对，荐逵博物多识，帝乃召见逵，问之。对曰：“昔武王终父之业，鹳鸛在岐，宣帝威怀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征也。”帝敕兰台给笔札，使作《神雀颂》，拜为郎，与班固并校秘书，应对左右。

肃宗立，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建初元年，诏逵入讲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帝善逵说，使发出

《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逵于是具条奏之曰：

臣谨擦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其余同《公羊》者十有七八，或文简小异，无害大体。至如祭仲、纪季、伍子胥、叔术之属，《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其相殊绝，固以甚远，而冤抑积久，莫肯分明。

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与图讖合者，先帝不遗刍蕘、省纳臣言，写其传诂，藏之秘书。建平中，侍中刘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论大义，而轻移太常，恃其义长，诋挫诸儒，诸儒内怀不服，相与排之。孝哀皇帝重逆众心，故出歆为河内太守。从是攻击《左氏》，遂为重仇。至光武皇帝，奋独见之明，兴立《左氏》、《谷梁》，会二家先师不晓图讖，故令中道而废。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且三代异物，损益随时，故先帝博观异家，各有所采。《易》有施、孟，复立梁丘，《尚书》欧阳，复有大小夏侯，今三传之异亦犹是也。又《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讖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五经》家皆言颡项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讖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其所发明，补益实多。

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圣之本，改元正历，垂万世则，是以麟凤百数，嘉瑞杂沓。犹朝夕恪勤，游情《六艺》，研机综微，靡不审核。若复留意废学，以广圣见，庶几无所遗失矣。

书奏，帝嘉之，赐布五百匹，衣一袭，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

逵母常有疾，帝欲加赐，以校书例多，特以钱二十万，使颍阳侯马防与之。谓防曰：“贾逵母病，此子无人事于外，屡空则从孤竹之子于首阳山矣。”

逵数为帝言《古文尚书》与经传《尔雅》诂训相应，诏令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逵集为三卷，帝善之。复令撰《齐》、《鲁》、《韩诗》与《毛诗》异同。并作《周官解故》。迁逵为卫士令。八年，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朝夕受业黄门署，学者皆欣欣羡慕焉。

和帝即位，永元三年，以逵为左中郎将。八年，复为侍中，领骑都尉。内备帷幄，兼领秘书近署，甚见信用。

逵荐东莱司马均、陈国汝郁，帝即征之，并蒙优礼。均字少宾，安贫好学，隐居教授，不应辟命。信诚行乎州里，乡人有所计争，辄令祝少宾，不直者终无敢言。位至侍中，以老病乞身，帝赐以大夫禄，归乡里。郁字叔异，性仁孝，及亲歿，遂隐处山泽。后累迁为鲁相，以德教化，百姓称之，流人归者八九千户。

逵所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又作诗、颂、诔、书、连珠、酒令凡九篇，学者宗之，后世称为通儒。然不修小节，当世以此颇讥焉，故不至大官。永元十三年卒，时年七十二。朝庭愍惜，除两子为太子舍人。

论曰：郑、贾之学，行乎数百年中，遂为诸儒宗，亦徒

有以焉尔。桓谭以不善讖流亡，郑兴以逊辞仅免，贾逵能附会文致，最差贵显。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

崔寔 传

——《后汉书》卷五二

【说明】崔寔（约公元103—170年），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东汉冀州安平（今河北安平县一带）人。出身名门望族，其先辈崔朝、崔骃等都先后在朝廷做官。然而，到了崔寔以后，家道开始衰落，崔寔的父亲死后，崔寔为了安葬，变卖田宅，结果使得仅有的资产耗散一空。从此崔寔变得穷困潦倒，只得以酿酒贩卖为生，当时的许多人都因此而讥笑他，他却矢志不改。对崔寔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母亲刘氏，刘氏是个知书达理的慈母，后来崔寔在五原任太守时所取的政绩，就与他母亲经常给他传授在政治上如何统治百姓的道理分不开。崔寔两度做议郎，在东观（皇家图书馆）著述作文，和诸儒博士杂定五经，后又两次出任地方太守，先是在五原（今内蒙古自治区河套以东至山西偏关西北一带地区，治所在今包头市西北），后是在辽东。

据史料记载，崔寔的著作一共有十五篇之多，除《政论》以外，崔寔还著有《四民月令》，这是中国著名的古农书之一，是在前人和自己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写成的。“四民”指的是从事士、农、工、商四种职业的人，“月令”是指这四种

职业的人在一年十二个月中每个月所应该做的事情，如耕耘收获，植桑养蚕，纺织印染，加工酿造，宗教祭祀，文化教育，饮食卫生，交易买卖等等，该书继承了西汉《汜胜之书》所提到的一些内容，但是在某些方面也有新的发展，如书中所谓的“别稻”（即水稻的移栽）和树木的压条繁殖，就是古农书中最早记载，崔寔对于中国传统农学的贡献不仅仅是具体的科技成就，而主要在于他首创了以月令写作农书的先例，这也就使得《四民月令》成为古农书中最早的月令体农书，从而也就奠定了崔寔在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上的地位。

崔寔，字子真，又名崔台，字元始。年少的时候不爱说笑也不好动，只喜欢读典籍。父亲过世，他隐居墓侧守孝。守完孝后，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同时征举他，但他都没有出任。

汉桓帝初年，下令公卿郡国推举非常孝道，而且有独特品行操守的人。经郡里的举荐，崔寔被公车征召。由于不善于对答皇帝的问题，改职为郎。崔寔对于政治体制非常了解，他的管理才能也是绰绰有余。在一篇名叫《政论》的论文中，他论述了当时熟习的事数十条，针砭时弊，切中要害，话虽然巧辩却很正确，受到世人的称赞。仲长统说：“凡是为君主者，都应该抄写一份，放在自己的坐旁。”这篇文章写道：

从尧舜帝和汤武王开始，就都依赖明哲者的辅佐和博识事物的大臣。因为有皋陶进献谋划所以才有唐虞的兴盛，伊尹作《伊训》、箕子作《洪范》，殷商和周朝才得以强大。以后继位的那些君主中，想要为国家复兴建

立功业者，何尝不依赖圣贤哲人的谋略呢！大凡国家不能得到正常的治理，都是由于君主长久习惯于国家的安定局面，社会风气日益败坏而毫无觉悟，政治统治日渐衰败不加改革，对社会动乱和危机习以为常，视而不见。或沉湎于自己的嗜好，放纵自己的欲望，不考虑国家大事；或对规劝和教诲充耳不闻，相信虚假的谎言而忽视真实的事情。或有分歧之处犹犹豫豫，没有主见而无所适从。受到信任的宠臣只知道领取俸禄，默不作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被疏远了的忠臣，却因为地位低下，说了也没人听。就这样上面的朝廷纲纪日益松弛，下面的智士仁人则郁郁不得志。多么可悲啊！

自从汉朝建立以来，已有三百五十多年了，政治腐败，上下级官吏玩忽职守，懒惰松懈，社会风气败坏，人们弄虚作假，老百姓担心害怕。大家都在重新考虑振兴国家的办法。那么拯救国家的办法，难道一定得沿袭尧舜时的作法才行吗？我们的目标在于修补已冲决的大堤，扶正已倾斜的支柱，根据形势进行裁定取舍，最终就是要将这个世界置于和平安宁的环境中。所以圣明的君主执掌大权，应该根据所遇到的时势来制定不同的制度，步骤的差别，各有各的安排。不能强人所难，不能不干当务之急的事而去羡慕道听途说的东西。所以孔子对叶公谈关于招徕远方的人民的事，对哀公时则答以君临治理人民，对景公时则以节制繁文缛礼作答。并不是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而是每个国君当务之急的事有所不同。所以开国君主，往往要创立新的制度；而中兴国家的君王，

亦要不时地纠正过失。当年盘庚为殷商而忧患的时候，采取了迁移都城来治理老百姓的办法；周穆王有缺点过错的时候，甫侯出来为他纠正刑法。世俗之人拘泥于书本上的记载和古人成法，不懂以权力制治，对于自己听到的总觉得了不起，而对于自己亲眼见到的事实忽视了，怎么可以与这些人来讨论国家大事呢？！所以进谏的人，虽然合乎圣德，却常常受到牵制。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由于顽固的人不懂时事变化，习惯于自己所见到的，连享受胜利的成果都不知道，更何况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只不过会一切按既定方针办事而已。有的达官贵人沽名钓誉，嫉贤妒能，羞愧于谋略不是自己所出，就写文章或发表讲话，对人家的道理进行攻击。这些人由于寡不敌众，便被抛弃了。虽是稷和契复生，也将会处于困境。这也就是贾生（谊）之所以受到绛侯（周勃）、灌婴的排挤，屈原之所以慷慨悲歌，抒发自己满腔忧愤的原因。象文帝的开明、贾谊的贤能、周勃、灌婴的忠诚，都有这样的悲剧，况且是其余的人呢？！

衡量人的能力和品德操行，这是《春秋》一书中的大义。现在既然不能全盘地仿效三皇五帝，但是可以以齐桓公和晋文公的王霸政治作参考。应当用重赏深罚来控制，用严明的法律来约束。假如不是最高尚的德行，严厉则天下太平，松缓则天下大乱。用什么来证明是这样的呢？近来孝宣皇帝就非常清楚君臣之道，懂得如何统治的道理，所以制定严峻的刑法，使为非作歹的奸邪不轨之徒闻风丧胆，海内太平无事，天下清静。他的功勋

荐献于宗庙，得享中宗的称号。从实际效果的统计来看，比孝文帝还要好。等到元帝即位，大多实行宽缓的统治，最终遭到破坏和损失，统治的权威开始丧失，就成了给汉家王朝埋下祸根的皇帝。政治统治的得与失，从这里就可看出来。昔日孔子纂修《春秋》，褒扬齐桓公的业绩，赞美晋文公的成就，感叹管仲的功勋。难道不是赞美文、武之道吗？那真是通晓事物变化，拯救弊端的道理呀。所以圣明的人能与时俱进，顺应历史的潮流。而庸俗之士却苦于不知时势变化，以为结绳记事时代约法，可以用来重新治理秦朝散乱的社会秩序，挥舞夏禹时代的兵器，可以解救汉高祖刘邦的平城的白登山之围。

熊经鸟伸这样的体育活动，虽然是延长寿命的方法，但却不是治疗伤寒病的办法。呼吸吐纳这样的气功运动，虽然也是长寿之道，却不能将断骨续接。治理国家的方法和人注意身体健康的方法一样，平安时就要注意保养，有病了就要进行治疗。刑罚是治理动乱的药物；道德教育是维持太平的养料。如果用德育去消除残暴，就好比用营养品治疗疾病；如果用刑罚去维持太平，就好比用药物给病人提供营养。现在我们承继了历代统治所遗留下来的弊病，正处在一个灾难频仍的时代。从数个世代以来，政治统治过于宽恕，就象驾马放松了缰绳，马嘴脱离了马嚼子，横冲直撞，大路变得不平而又倾斜。正要通过衔木、马辔、车辕来控制奔马以挽救它，那儿管得上马车行走时和谐的铃声和清脆的节奏呢？当年高祖刘邦命令丞相萧何作“九章律”，其中有灭三族的律令，

黥（脸上刺字）、劓（割掉鼻子）、斩趾（砍去脚指）、断舌（割断舌头）、梟首（悬头示众），合称之为“具五刑”。文帝虽然废除了肉刑，应当处以劓刑的改鞭笞三百下，应当砍断左脚指的改为鞭笞五百下，应当砍断右脚指的改为处死刑。断右脚指的固然是丢掉了生命，被鞭抽打的人也往往被打死，虽然名义上是减轻了刑罚，其实还是杀头。那个时候，老百姓希望恢复肉刑。至汉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便下诏令说：“鞭笞与重罪没有区别，侥幸不死，也不可做人了。”便定下法律，减轻鞭笞和敲打的刑罚。从此以后，受鞭笞之刑的人能保全性命。按这来说，文帝是加重刑罚，而不是减轻刑罚，是以严厉而求得太平，而不是以宽缓求得太平的。如果定要实行这句话的话，应当大大地确定根本，使统治者效法五帝，仿照三王。清除秦朝的旧俗，依照先哲圣人的风范，放弃那种苟且偷全的政策，追随并查考古代的踪迹，恢复五个等级的爵位，建立井田制。然后再选举象稷契、伊、吕那样的人为辅佐。音乐响起来，而凤皇飞舞，石头（打击乐）敲起来，则百兽起舞。如果不这样的话，只会造成许多祸害罢了。

后来太尉袁汤，大将军梁冀官府都要征召崔寔，他都没有答应。大司农羊傅、少府何豹上书推荐崔寔，说他才能大本领高，适宜在朝廷做官。崔寔被征召担任议郎，升职为大将军梁冀府的司马，并与边韶、延笃等一道在东观从事写作。

出任五原（今内蒙包头市西北）太守。五原的土壤适合种植柰麻，但是民间却不知道纺织，老百姓冬天没衣穿，铺

垫一些细草，就睡在里面，看见官吏来了，就披着草出来。崔寔到这里上任后，下令出售储备，用来作为织布、缝纫的原料和工具，并进行培训，使百姓得以免除寒冷之苦。这个时候，匈奴经常进犯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朔方（今内蒙古杭锦旗北），烧杀抢掠当地的官吏和老百姓，以至于在一年之中多次逃难。崔寔整顿军队，锻炼士兵，严守烽火台，加紧巡逻，匈奴不敢再来侵犯。因此，崔寔常把边疆守备放在第一位。

因为有病的缘故被征拜为议郎，重新又与各位儒学博士一道共同选定《五经》。正好又碰上梁冀获罪被判刑，崔寔因曾在梁冀府上做过幕吏，被免职，且遭到几年的禁锢。

当时鲜卑族多次进犯边境，皇帝下诏三公推举有勇有谋的人才。司空黄琼推荐崔寔，担任辽东太守。在赴任的途中，听到母亲刘氏病故的消息，他便上书请求回家安葬母亲并守孝。崔寔的母亲是个有风范和德行的贤惠女子，她博览群书，知书达理。当初，崔寔在五原做太守的时候，母亲常常教育他如何管理老百姓，崔寔取得好的政绩，其中就有母亲的帮助。守孝完毕后，他又被召拜任尚书。崔寔因为当时正值天下大乱，充满危机，借口有病不能工作，数月之后被罢免回家。

起初，崔寔父亲死的时候，他变卖掉家中田宅，修建父亲的坟墓，立了墓碑，撰文为他父亲的一生歌功颂德。安葬好了以后，资产耗尽一空，崔寔因穷困便以酿酒贩卖为生。当时的许多人因此而讥笑他，可他却终不改变。做买卖赚的钱够用就行了，不求多有剩余。到当官以后，历次在边疆地区

任职，就更加贫困。建宁（公元168—171年）中病故。死时家徒四壁，屋中空空如也，以致于没有钱用以安葬，还是光禄勋杨赐、太仆袁逢、少府段颍为他置备的棺材葬具，大鸿胪袁隗为他树碑立传，歌功颂德。崔寔一生所写作的碑、论、箴、铭、札、七言、祠、文、表、记、书等等共十五篇。

（曾雄生 译）

【原文】

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少沈静，好典籍。父卒，隐居墓侧。服竟，三公并辟，皆不就。

桓帝初，诏公卿郡国举至孝独行之士。寔以郡举，征诣公车，病不对策，除为郎。明于政体，吏才有余，论当世便事数十条，名曰《政论》。指切时要，言辩而确，当世称之。仲长统曰：“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其辞曰：

“自尧舜之帝，汤武之王，皆赖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皋陶陈谏而唐虞以兴，伊、箕作训而殷周用隆。及继体之君，欲立中兴之功者，曷尝不赖贤哲之谋乎！凡天下所以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渐敝而不悟，政寝衰而不改，习乱安危，忼不自睹。或荒耽嗜欲，不恤万机；或耳蔽箴诲，厌伪忽真；或犹豫歧路，莫适所从；或见信之佐，括囊守禄，或疏远之臣，言以贱废。是以王纲纵驰于上，智士郁伊于下。悲夫！”

自汉兴以来，三百五十余岁矣。政令垢玩，上下怠懈，风俗彫敝，人庶巧伪，百姓嚣然，咸复思中兴之救矣。且济时拯世之术，岂必体尧蹈舜然后乃理哉？期于补衽决坏，枝柱邪倾，随形裁割，要措斯世于安宁之域

而已。故圣人执权，遭时定制，步骤之差，各有云设。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闻也。盖孔子对叶公以来远，哀公以临人，景公以节礼，非其不同，所急异务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辄创制；中兴之主，亦匡时失。昔盘庚愍殷，迁都易民；周穆有阙，甫侯正刑。俗人拘文牵古，不达权制，奇伟所闻，简忽所见，乌可与论国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虽合圣德，辄见掎夺。何者？其顽士暗于时权，安习所见，不知乐成，况可虑始，苟云率由旧章而已。其达者或矜名妒能，耻策非己，舞笔奋辞，以破其义，寡不胜众，遂见摈弃。虽稷、契复存，犹将困焉。斯贾生之所以排于绛、灌，屈子之所以摭其幽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贾生之贤，绛、灌之忠，而有此患，况其余哉！

（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义。今既不能纯法八（世）〔代〕，故宜参以霸政。则宜重赏深罚以御之，明著法术以检之。自非上德，严之则理，宽之则乱。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轨之胆，海内清肃，天下密如。荐勋祖庙，享号中宗。算计见效，优于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政道得失，于斯可监。昔孔子作《春秋》，褒齐桓、懿晋文，叹管仲之功。夫岂不美文、武之道哉？诚达权救敝之理也。故圣人能与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变，以为结绳之约，可复理乱秦之绪，“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围。

夫熊经鸟伸，虽延历之术，非伤寒之理；呼吸吐纳，

虽度纪之道，非续骨之膏。盖为国之法，有似理身，平则致养，疾则攻焉。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罚理平，是以药石供养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运之会。自数世以来，政多恩贷，馭委其轡，马骀其衔，四牡横奔，皇路险倾。方将柑勒鞅鞞以救之，岂暇鸣和銮，清节奏哉？昔高祖令萧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斩趾、断舌、梟首，故谓之具五刑。文帝虽除肉刑，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当斩右趾者弃市。右趾者既殒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虽有轻刑之名，其实杀也。当此之时，民皆思复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诏曰：“〔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民）〔人〕。”乃定律，减笞轻捶。自是之后，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轻之也；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也。必欲行若言，当大定其本，使人主师五帝而式三王。荡亡秦之俗，遵先圣之风，弃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踪，复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后选稷契为佐，伊吕为辅，乐作而凤皇仪，击石而百兽舞。若不然，则多为累而已。

其后辟太尉袁汤、大将军梁冀府，并不应。大司农羊傅、少府何豹上书荐寔才美能高，宜在朝廷。召拜议郎，迁大将军冀司马，与边韶、延笃等著作东观。

出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织绩，民冬月无衣，积细草而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寔至官，斥卖储峙，为作纺绩、织纆、练缙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是时胡虏连入云中、朔方，杀略吏民，一岁至九奔命。寔整厉

士马，严烽候，虏不敢犯，常为边最。

以病征，拜议郎，复与诸儒博士共杂定“五经”。会梁冀诛，寔以故吏免官，禁锢数年。

时鲜卑数犯边，诏三公举威武谋略之士，司空黄琼荐寔，拜辽东太守。行道，母刘氏病卒，上疏求归葬行丧。母有母仪淑德，博览书传。初，寔在五原，常训以临民之政，寔之善绩，母有其助焉。服竟，召拜尚书。寔以世方阻乱，称疾不视事，数月免归。

初，寔父卒，剽卖田宅，起冢茔，立碑颂。葬讫，资产竭尽，因穷困，以酤酿贩鬻为业，时人多以此〔讥〕之，寔终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余。及仕官，历位边郡，而愈贫薄。建宁中病卒。家徒四壁立，无以殓敛，光禄勋杨赐、太仆彭逢、少府段颎为备棺槨葬具，大鸿胪袁隗树碑颂德。所著碑、论、箴、铭、荅、七言、祠、文、表、记、书凡十五篇。

张 衡 传

——《后汉书》卷五九

【说明】张衡（公元 78—139 年），字平子，东汉南阳郡西鄂（今河南召县石桥镇）人，东汉时期的著名科学家和文学家。早年游学长安，后就读于京都洛阳太学。精通五经、六艺，才学出众。曾两度担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等工作十四年之久。阳嘉元年（公元 132 年）升任侍中。晚年任河间相（治所在今河北献县东南）、尚书。他一生精力充沛，勇于创新，在天文、历法、数学、地理、机械、仪器制造以及文学等许多领域，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张衡总结前人的工作经验，创制了我国古代第一台自动的天文仪器即水运浑象仪。这种仪器十分精巧，并令人信服地验证了浑天说的正确性。他还撰有天文学名著《灵宪》。此书认为宇宙是在演化的，其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其前一阶段长期渐变的结果，而且前后两个阶段又是由突变的方式相衔接的。另外，张衡还认为“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这是关于宇宙无限性的精辟论述。他还认为日、月、五星运动速度快慢不同，是由它们离天远近决定的，“近天则迟，远天则速”，反映了他具有日、月、五星与地球的距

离有远近的科学观点。并第一次正确地解释了月食的成因,认为月光是日光的反照,月食乃因月球进入地影而成。对于陨星和彗星,张衡也有较科学的论述,他认为陨星原是与日、月一样绕地球运行的天体,只是当其运动失去常态时,才从天上下降而成为陨石。并把彗星与恒星相区别,将其归于五大行星的范畴内,亦即把彗星归于太阳系内的天体,这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认识。

张衡对恒星进行过长期的观测和统计工作。他把全天星空划分成 444 个星官,计得 2500 颗恒星(这里不包括他从航海者那里得知的在南半球看到的星宿)。这一工作不仅超过了石申、甘德的同类工作,而且亦非他同时代的人甚至后人可相比的。

张衡还曾致力于历法问题的研究。他在这方面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关于黄道宿度和赤道宿度之间换算的方法。张衡的这一研究成果,后来被刘洪最先引进他所编制的《乾象历》中,对后世历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张衡还长期致力于地震研究,公元 132 年,他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架地震仪——地动仪。据记载,此地动仪曾成功地记录了公元 138 年发生在甘肃的一次强烈大地震,证明了张衡地动仪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张衡还研究过地理学,曾撰有《地形图》一卷,其中可能附有地形图,据载此书一直流传到唐代。在数学方面,他著有《算罔论》,对圆周率、球体积的计算法等问题作了研究,所采用的 $\pi = \sqrt{10} = 3.162$, 是当时比较精确的一个数值。

张衡又是汉代著名的文学家,他有不少诗词歌赋之作流

传于世，如《四愁诗》、《二京赋》、《思玄赋》、《温泉赋》、《归田赋》等 20 多篇，其中以《二京赋》、《思玄赋》尤为著名。张衡对文字训诂也颇有研究，著有《周官训诂》一书。他还是一位画家，曾被入列为东汉六大名画家之一。

张衡，字平子，是南阳郡西鄂县人。其世代祖先多是有显著名望的家族。祖父名张堪，任蜀郡（今四川成都）太守。张衡少年时就善于写文章，他曾到故都长安城及其周围的三辅地区（今陕西中部一带）游览考察，后来到京都洛阳，在最高学府太学里学习，故精通《诗》、《书》、《礼》、《易》、《春秋》五经，通晓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他虽学识渊博，才华出众，但不骄傲，也没有自以为超过别人的情形。喜欢过平淡安静的生活，不爱与一般人交往。汉和帝永元年间（公元 89—104 年），地方上曾推举他为孝廉，他辞而不就。三公官府连续几次招聘他去做官，他都不去上任。当时国家太平时间较久，从王侯以下的文武百官，没有一个不过分奢侈的。于是张衡模仿班固作的《两都赋》（按：即《西都赋》和《东都赋》），撰著《二京赋》（按：《西京赋》和《东京赋》），借此以委婉曲折的语言劝谏朝廷。他精心构思两赋的内容，文句附益综合，历时十年才写成功。他的文章很多，惜未全部刊出。大将军邓骘爱慕他的才华，屡次招他进京做官，都被他拒绝了。

张衡具有机械制作方面的技巧，尤其善于研究天文、阴阳和历算。平时爱好并沉溺于扬雄的《太玄经》之中，他对崔瑗说：“我学习《太玄经》，才知道扬雄极妙的天文哲学和

天文历法知识,《太玄经》可与《五经》相题并论,不象记载传闻一类的书,使人难以深究阴阳之学,这是汉王朝建立二百年来难得的好书。再过二百年,大概更将完善!所以作者的学问技艺,必然留传于世,这是符合常理的。至汉王朝建立四百年时,玄学一定要兴盛起来。”汉安帝素常听说张衡擅长天文历法及阴阳之学,便由公车官署特别征召,授予郎中官职,后又升为太史令。于是他就研究和考核日、月、星辰及天体运行规律,以北斗确定四时,创制浑天仪(按:用以观测和计算天体位置的仪器),撰著《灵宪》(关于阐明天地的形成、结构,日、月、星辰的运动等问题的著名天文学著作)和《算罔论》(关于网罗天地而计算之书),其论述都很详细明确。

汉顺帝刘保(公元126—144年在位)初年,张衡再次变换官职,后来又官复原职,仍任太史令。他不羡慕为世所用,所任官职,常常多年不迁升。他曾免去太史令职位,五年后又恢复原职。于是他用设主客问答的文体,撰写《应间》一文,来回答别人因他未能升高官而引起的非难,以表示自己决心致力科学,不攀权贵的志向,该文说:

有非难我的人说:原来听说从前有作为的人首先从事的是下学人事,上知天命,辅佐君王治理国家,管理百姓,这样才叫有所作为。听到了圣人的道理,立刻就实行它。所做所为,以表明美好的声誉。因此,伊尹想使君王成为尧、舜一样的贤明君王,使百姓也象生活在尧、舜时代一样,他难道是说说而已吗?不过是必定要表明真心的情志罢了。咎单、巫咸,实在是守护殷商王

朝的贤臣，申伯、樊仲，实在是护卫周宣王的卿士，穿礼服上朝，是为了吉祥。他们有不朽的事迹，其功绩世代代留传下来，不是非常伟大的吗？！且学问只是用来谋求利益，而且要积聚富贵。做官以推行政令，富了要实施仁爱，施行仁爱政通令行，所以《周易·系辞上》称这是“大业”。事物本质之美是凭其外表的花纹表现出来的，植物开花之后才能结出果实，器物依靠精美的雕刻装饰才能成为上等物品，人只有穿戴华贵的衣冠，乘坐上乘的车马，才能显示尊荣。你的品行合乎“德”的标准，而且自身走上正道，坚信实行仁爱，严格要求自己，技艺广博精深，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求得出仕，这何以会是久远的啊！以往就曾长久地任太史令不得升迁，现在又回来担任原职。虽然老子说委曲才能保全自己，前进如同后退，然而还是需要以不进来争取前进的。一定是你的技艺有所缺陷，而且学非所用，因此就出现面对要过河而渡船却没有桨的情况。而白白地锐意钻研天文历法，作浑天仪，著《灵宪》，显示出了独特的智慧，但对治国理民又有何用呢？因此，我曾被见识浅陋的儒生诽谤。涉水时，水深需要把衣服揭到腰带以上，水浅则需要把衣服揭到膝盖以上，自己的行为顺应时俗才合乎道理，为何要贪婪图支离益的屠龙技术，而去学习那不切实际的技艺呢？你能制造经过机械传动，而令木人击鼓记载里程的记里鼓车，能制造独自飞行的木雕机械，自己却不能飞黄腾达，而又返回到原来的史官职位上，为什么不能调整机械使自己也顺利高飞晋升呢？过去有位

周文王，自己求得多种福分。人一生成就就在于勤奋，不奋斗就没有收获。为什么不委屈一下你自己在技术方面的才能，以获得别人的赞美来取胜世人呢？鸟儿栖身在高大的树上，才能唱出金玉之声，求仕者获得高的位置，才能振扬德音，用今后的功勋来洗刷以前的耻辱。如果刚愎乖戾不顺世人之情，那么试想还会有谁来同情你呢？

我对这些人的答复说：为什么观看到的同一事物而见解不同呢？人格高尚的人不惧怕地位不受尊崇，而惧怕道德不崇高；不耻于奉禄多少，而耻于知识不渊博。所以技艺应该学习，而且要努力地去学习它。天子高悬爵位，谁能得到它则全在于命运，或许不去追求它的反而自己来了，或许渴望得到它的反而达不到目的，苦苦追逐没有益处，因此有见识的人面对它而并不总是想着它。自己总想靠侥幸得到荣禄是危险的，那是十分贪婪人的行为，还没有得到就早已丧失掉了。想以小有所屈而获得较大的利益，议论的人对此无不指责，这种为满足欲望而损害志向的行为，谁说不是羞耻的呢？心里怀疑食物来路不正，就是餐具里盛有美味的食品也不愿意吃，爰旌督就是这样做的。思想上认为毫无疑问的合理之事，就是给予满百兼金（即为价倍于一般的金）也不疑忌推辞，孟轲就是这样做的。具有某种品质或技能的人，有些脱去粗陋衣服而穿上官员礼服（即指春秋时的卫人宁戚），有些抛弃铁锹和筑墙的木杵而当了官（指殷代的民间传说），根据德能授予官爵，按照功绩受到相应的奉禄。贡献力量，获得功劳，凭借功劳，接受某种禄位。

开天辟地之初，天体运行规律还不清楚，吉祥和凶险之事常常交错在一起。人类因此处于蒙昧状态之中。黄帝为此感到悲惨。其宰相风后，于是明白了原因，通过对宇宙中日、月、星三辰的考察推究，追寻天体运行变化与人间祸福的相应关系，规划整理节气历法，然后认识到自然界的运动变化有一定的规律，这是风后所做的。在黄帝之子少昊清阳的晚期，确实有的人乱了德行，人神混杂纷扰，不能辨别名分，少昊之子重，颛顼之子黎又帮助颛顼对其进行治理整顿，日月按规律顺序排列，这是重、黎所做的。人各有自己的本领和技能，依照技艺委以职务，鸟师少昊以鸟名官，对其名称加以区别，四位叔叔分掌三种官职，每一官职各有专掌之事，数件事情不能同时成功。白天长夜间短，太阳在南则影子在北。天都不能使昼夜相等，阳光和影子同一方向，人又怎能兼容并备呢？那些黑龙，遇到适当生活的夏季，就乘云腾空而舒展开鳞甲生气勃勃地翱翔，这是龙最快乐的生活季节，到了冬季就钻到泥里盘曲地潜伏着，避免受到伤害。文王之子周公能够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故制定礼乐制度以治理天下，就惧怕教训者没有遵循，有人不受其管理压束。孔丘一生未能遇到认识自己才能和抱负的君主而导致自己的政治主张不能实现，所以才著述《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儒家经典，以等待后世君主来实行它，而且唯恐有一件事自己没有想到，使那种事没有规范。周公姬旦与孔子所处境遇不同，怎么能一样地对待事物呢？

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兵车象竞赛似地驱使着去打仗，君主象旗帜上的附属品一样成为装饰的东西，随时可以被更换，老百姓一会儿属这个君主统管，一会儿又属另一个君主统管，无所依附。秦兵围郑，郑伯派烛之武夜里从城墙上用绳子拴着吊下去说秦，而使秦伯退兵；燕将守聊城，齐人久攻不下，鲁仲连写信系在箭上射入城中，燕将阅后自尽而停止了军事行动；战国时，合纵说客苏秦往则各诸侯国联合，连横说客张仪来则各诸侯国又分离，连兵拒秦则安，诸侯分离，独自讨秦则被各个击破。各诸侯国举棋不定，以致安危无常，关键在于游说的人。这些都说明得到人才就能胜利，失去人才就会犯错误。樊哙率诸将闯入内宫，进见汉高祖刘邦，刘邦岔开两腿、边洗脚边召见酈食其，酈食其指出，你想诛灭暴秦，就不应该这样对待长者，于是刘邦向酈食其道歉。当此时机，乃需要君臣相应。如果能同心合力，时常同情体恤人民的疾苦，受各诸侯国百姓的拥护，就能够稳定帝位，这都是因为获得了谋臣的帮助。所以，一个普通人的谋画，能建立各自的功勋，司马迁作的《史记》都有所记载，其灿烂的功绩依不同情况，记载得清清楚楚。干旱之神退走了，能兴云作雨的神龙才能在太空翱翔；朝廷的舞乐兴盛了，军队的舞乐就停息了；当盛夏之时，鸛火也退至酉位，寒冰凝结的季节，鼃鼃就冬眠了，现在，皇帝的恩惠普遍地润泽人间，国家统一，各地的质、剂等不同贸易券契都通用了，如果还没有功夫去完成著述，还谈得上建立什么功劳！立事有

三，即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其次立言。立言即为著述，是立事中最末一项，如果最末的立言之事的希望不能达到，哪里还能希望达到立德与立功呢！

现在士大夫如天上的云彩，读书的人象树木一样成林，仕途顺利的人意气发舒，得意洋洋；仕进无路的人居于穷乡僻壤，心情抑郁，会有什么样的遭遇难以预测，还是趋吉避凶为好。世界是变化的，习俗千差万别，事物错综复杂，不能顺应事实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而用同一尺度去衡量复杂的事物，那就如同刻舟求剑，守株待兔一样了。冒着羞愧而放任心愿，必然要发生无道德的行为，这是有道德修养的人决不会去做的。越王勾践所作的“冒愧逞愿”之事，结果使帝王基业几乎不能长久地相传下去。用巧妙的手段很快达到不正当的目的，我不愿走那样的路，谋求晋升官职，苟且求容，我不愿缩着肩膀去奉承讨好，取悦于别人的赏识，虽有犀牛皮制造的坚舟及劲桨，别人渡河了，我却尚要等待。为人处事只有尊奉自然和顺的原则，恪守忠实笃厚的信条，做官食禄，得之不以为荣，不得不以为耻。对名利视而不见，心中便不会失去清明，身处低位而不忧愁，这确实是具有高尚道德的人所时刻注意的事。正要以天老为师而地典为友，和他们一样具有不同流俗，清高傲岸的态度，黄帝的臣子尚且不足以羡慕，哪里还赞扬殷商时的贤臣彭咸和周聃（即为老子李聃）。我的生活态度与世不同，虽然只自己一人如此，但仍坚持不懈地追求。您担忧朱泚漫的才能不能得到应用，我却恨轮扁的斫轮技艺

不能用语言来传授给别人。你看到雕琢成器的木雕能独自高飞，怜悯我不能升迁高官而再次任史官之职，我却感叹你丢弃井底之蛙的固陋之见，却又去迁就鸱鸢嗜好腐鼠的口味，可悲你先笑而后又号哭啊。

斐豹杀掉了督戒，烧掉了丹书；礼至把国子挟着扔到城外，作了记载功绩的铭刻；弦高用牛群犒赏来犯的秦兵，而使之退敌；墨翟用解带为城制止攻宋，而保全了城市；贯高以正辞独自承担罪责，而显示了高尚的道义；苏武被匈奴扣留，持汉节牧羊直到节旄尽落，表现了效汉的忠贞气节；蒲且擅长使用射鸟短箭，而显露出高超的技巧；詹何的钓鱼技术，达到了精妙的地步；弈秋以高妙的棋术，而获得了声誉；王豹因善于唱歌，而名声流传。我前进不能把名字与立德、立功者并列，后退不能和上述的斐豹等人一样。担忧三皇之书《三坟》已经消亡，惋惜八卦之书《八索》没有人整理。期望推究前人的榜样，如且如老子任柱史一样，虽在朝廷为官，但淡泊恬退如同隐居。将美玉藏在木匣中等待识货者，按照颜回出仕与隐居的态度对待自己的进退，连晋、楚那样富裕也不羡慕，敢于以此告诫于挚友。

汉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张衡又创制了测定风向和地震方位的候风地动仪。这种仪器是用纯铜铸造而成的，圆径八尺，上有隆起圆盖，外形象一个酒坛子，仪体的外表刻有篆体文字以及山、龟、鸟、兽等图形，仪体内部的中央立着一根能作惯性运动的摆柱，连着指向东、西、南、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八个方向的八根横杆，安装着连动的

机关枢纽，仪体外部八个方向铸有八条龙，每个龙头朝下，嘴里都各衔有一个铜球，对应于每个龙头的下方铸有八个蟾蜍，都张着嘴准备承接铜球。其内部的构件都巧妙地牵制着，起灵活的传动作用，这些都隐蔽地装在如同酒坛子的仪体里面，盖上外盖则周围紧密无缝。如果发生地震，地动仪内的摆柱因此受到振动，触击某一个方向的横杆而发动其他机械，使相应的龙头张开嘴巴吐出铜球，落在下面铜蟾蜍的嘴中，两者相撞时发出很大的响声，监视地动仪的人因此就知道发生了地震。某个方位的地震使一条龙内的机械发动，而其他七条龙头不动，从吐出铜球的那条龙头所指的方向，便可测知地震发生的方向。事实证明，实际地震情况与在地动仪上测到的地震情况完全吻合，据前代文献所记载，当不知道有地震发生的时候，曾经有一条龙机发动而没有感觉到有地震现象，京城的学者们都惊疑张衡的地动仪不灵验。几天以后，官方传达消息的驿卒到来，陇西（今甘肃临洮县一带）果真发生了地震（即为发生在公元138年2月3日，这是世界地震史上第一次被测定的地震），于是大家都佩服这种仪器精准巧妙。从此以后，便命令史官用这个方法开始记载地震情况。

那时国家政事日渐败坏，皇帝的统治大权落到了外戚与宦官手中。张衡因此向皇帝呈上奏折，陈述这些事情说：“唯有陛下通达的智慧和美好的德行，受到人民敬仰，本应承受天意继承皇位，但中途遭到颠覆，帝王的美德一度被埋没了。今得以迅速升迁，登上至高无上的皇位，正如人们所说，将要登上崇高位置的人，必定是先要经历一番艰难困苦。亲身经历过艰难困苦的人才能知道百姓的疾苦，历经过很多的艰

险难易的人才能明辨事物的真伪，所以能处理种种事务，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所有的事都能处理得很妥当，政绩显著，诸业兴盛。怪不得神灵赐给福禄，百姓给予荣誉。而今天下人事对立局面未得解决，灾祸不断发生，神灵虽然遥远，但暗地相合的儆戒就在眼前。仁政赐福，淫乱降祸，就像影子和声音一样随之而来。注重恩惠道德就会产生美好的结果，坚持过错就会带来祸患。通向天堂的道路虽然遥远，但吉祥和凶恶的事是可以看见的。近代的郑众、蔡伦、江京、樊丰、周广、王圣等人都是可以效法。所以，恭敬俭朴、威严禁忌、必受到福气。奢侈荒淫，谄媚怠慢，很少不被杀戮的。记取以往的经验教训，可以作为以后的借鉴。情欲胜过天性，随欲而行，不知回首，难道只是不贤吗？中等才能的人都是如此。假若不是贤达，见有所得不考虑它是否符合道义，积累坏事而成罪过，其罪是不可原谅的。当初假使能瞻前顾后，做事谨慎周到，将前事当成镜子而引以为戒，则怎么能落入凶险灾难的境地呢？高贵宠幸的臣子，大家都敬仰，臣子有罪过，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赞扬美好的事，非难丑恶的事，大家的想法都是一样的。怨恨之言充满四海，神明降其祸害邪僻。常年雨水不充足，反思有什么过失，正如《洪范》书中所说：‘国君行为有差错，则出现久旱不雨。’担心群臣穷奢极欲，昏庸地越过法典和礼教，从下面影响到上面，因此加速了灾祸的到来。前年（为汉顺帝永元三年，即公元128年），国都洛阳发生地震，山崩地裂，地震的强烈破坏，给震区人民造成严重的灾难。君以静治于前，臣以动治以后，威望出自君主，不趋于下级，是合乎礼治施行的政治。我内心很担心圣上对

治理国家的事有懈怠情绪，制度、政令不是完全出于皇帝一人，不能下决心政专于己，让群臣与圣上具有同样的威望。君威不可分于他人，君德不能让别人共有，正如《洪范》中所说：‘臣下如擅专威福和美食，就有害于国家。’上天监察甚明，虽然离得很远也不遗漏。上天以灾异警示于人，前后已有数次了，但未看出有什么改变，所以灾祸反复出现。自然不是圣人，就不可能没有过失。希望陛下考虑，所以才考察古代率由旧章，不要使驾馭臣下的刑德八柄（即君主驾馭臣下的八种手段。《周礼·天官·大宰》：‘以八柄诏王馭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贵；二曰禄，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夺，以馭其贫；七曰废，以馭其罪；八曰诛，以馭其过’），不由天子。如果恩泽都由皇上施给下面，事事依据礼制，礼制完善了，奢侈越轨的行为就不会发生，事情合理相宜就没有凶患过失。然后神灵也因为天下治理恰当，而灾祸消除不会再有了。”

东汉开国之初，汉光武帝刘秀善于用图讖来预言治乱兴废和吉凶得失，到东汉的明帝刘庄、章帝刘烜，还是效法祖先，加以陈述。刘秀建立东汉，振兴汉朝之后，儒家学者都争先恐后学习宣扬神学，迷信图讖和纬书，并且还加附以迷惑人的妖言邪说。张衡认为图讖和纬书都是虚妄之言，不是圣人的说法，于是向皇帝上疏说：“我听说圣人明确审定阴阳历法以确定吉凶，重视用龟甲和蓍草占卦，同时也采用九宫（即为中央宫加上卦的八宫）的方法占卦，通过天象以验证人事间的吉凶之道，一直都是这样做的。有的是观察星辰运行合乎规律或不符合规律，来确定造成气候寒暖变化的原因，有

的是根据龟甲和蓍草的占卦、策问情况而进行吉凶判断，女巫男觋装神弄鬼祈祷预言吉凶，他们这样做的根据，其道理是各不相同的。事先确定各种现象所预示对应的吉凶祸福，然后再以事实去证验，因为一些有知识的人推崇它，所以称之为讖书。讖书开始出现的时候，知道它的人很少，从汉朝代替秦朝，经过激烈的战争才建立汉朝，功成业就，可谓是件大事情，就是在这个时期，尚没有出现图讖之学。如西汉时期的经学家夏侯胜、眭弘等人，都以讲阴阳灾异等学术而闻名，在他们的著述中，没有一句讲讖书的事。西汉的经学家和目录学家刘向、刘歆父子，所领导校订的国家秘藏图书，查阅审定的所谓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九家之学术著作，也没有讖说的记录。汉成帝和汉哀帝之后，才开始听到讖说之言。《尚书》记载上古帝王唐尧命令部落首领鲧治理洪水，鲧用了九年时间而绩业无成，被杀死在羽山，大禹奉首领虞舜之命继续治理江河、兴修水利，获得了成功。而《春秋讖》却说是由名叫共工的人治理的洪水。凡图讖之书都说黄帝讨伐蚩尤，而唯独《诗讖》一书认为是“蚩尤失败，然后是唐尧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输般与墨翟（墨子）的故事，其事出自战国时期，并非是春秋时代的事情。该书又说“另外有个益州”，而益州（今四川境内）的建置始于汉代。长安周围三辅地区的帝王坟墓，历代都可知道。至于讖书图中的内容终止于汉成帝时。同一卷书，几件事前后说法互相矛盾，圣人的言语势必不能象这样的。恐怕一定是一些弄虚作假的人要挟世人，以骗取资财。过去有位在宫廷任侍中之职的贾逵（字景伯，是天文学

家和经学家)，他曾摘录讖书中互相矛盾的事三十余件，那些宣扬图讖的人都不能解答。至于王莽篡夺汉朝的王位，给西汉造成莫大的祸患，八十卷所谓讖纬之书为什么没有预言而引起人们的戒备？由此可见，图讖纬书形成于西汉哀帝刘欣和平帝刘衍之际。而且《河图络书》（共十五卷）和《六艺》（共三十六卷）的篇幅，著录已经固定，后人想加上讖纬之说，是不容许轻易改动的。东汉永元（公元89—105年）年间，清河郡的讖纬学者宋景根据历史记载推测，预言要发生水灾，并且虚妄地说，他很清楚地看见了伏羲氏传给大禹平治水土的玉简。有些人以至于放弃家产，逃往山上，以避水灾。后来都没有应验，于是又重新采取以往已发生过的事，用来作为验证。至于东汉顺帝刘保恢复帝位，讖纬家们也未能预先知道。所以，讖纬之说是欺骗世人、有害风俗的虚妄之言，以此来欺瞒皇上和达官贵族，事情的真假十分明显，不如将其揭露和禁止。何况律历、卦候、九宫、风角之卦占，常常能够得到应验。世人就是不肯学习，而且竟然认为是不可信的。就好象绘画家，实际存在的东西难以画得像，而虚假的东西可以随意乱画，别人不好讲究。应该把收藏的图讖之书，一概严令禁绝使用，才能使正邪不再有所混乱，各种典籍就无缺点和受到玷污了。”

张衡于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升迁为公车司马令侍中，皇帝召引他到自己所住的宫内任职，他在皇帝左右，常以含蓄的语言议论政事，并给予暗示和劝告。皇帝曾问张衡天下有什么憎恨厌恶的事情，宫中的太监们害怕所作的坏事被告发而毁掉自己，都用眼睛看着他，于是张衡未用真话对答而

离开。宦官竖子们唯恐日后会有所祸患，索性都在皇帝身边说他的坏话。

张衡常常图谋自身安全之事，认为吉凶之间具有依赖转换关系，其结果难以预测。于是就撰著《思玄赋》，用以宣扬、寄托自己的感情和志向。

汉顺帝刘保永和（公元136—141年）初年，张衡出任诸侯国河间（今河北献县东南）相。当时河间国王刘政态度骄横，各种设施超出了与自己身份相应的规定，不遵守制度法令；又有很多豪强大族，也和河间王一样做出不合法度的事。张衡一到任，严明法律，整顿法度，暗中查明奸党的姓名，很快将这些人捉拿归案，于是从上到下的人都规规矩矩，没有人敢再做越轨的事，人们都称颂他对国家政事治理很好。任职三年时，上书请求退休，未获允准，被征召授以尚书之职，协助皇帝管理文书等事。东汉永和四年（公元139年）逝世，终年六十二岁。

著有《周官训诂》，崔瑗认为与诸儒生不能有什么不同。张衡又想继孔子之研究、解释《周易》所作的《彖》、《象》之书尚未完成的部分，遗憾的是最终未能完成。他还著有诗、赋、铭、七言、《灵宪》、《应间》、《七辩》、《巡诣》、《悬图》等共三十二篇。

汉顺帝永和年中，谒者仆射刘珍、校书郎刘翬等人在洛阳南宫东观从事著作，修撰《汉记》，据此制定汉代的礼仪制度，他们上书请求张衡一同参加研究和论述其事，恰巧此时刘珍、刘翬二人相继逝世了，因而张衡常常因此叹息，想最终完成这件事情。他在做侍中期间，上疏请求允许他专门

从事东观的修撰事业，收拾整理遗文，全力继续修撰《汉记》。又条陈司马迁、班固所记叙的与典籍不相符合的事有十多项。还认为王莽传中只应该记载他篡位的事就足已了，至于逐年逐月记录国家大事及灾祥，宜放在《元后本纪》中。又认为淮阳王刘玄即位，为大家所公认。刘玄于光武帝刘秀初年为将军，然后即皇帝位，所以应该以更始年号建于光武年号之初。多次上书，始终不被采纳。到了后人著述的时候，都不详备，对此人们感到很遗憾。

范晔评论道：崔瑗称颂张衡说：“技术穷究天地，制作和自然造化相同。”他“数术”与“制作”的精巧细密难道能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吗！推究张衡设计制作浑天仪和候风地动仪的巧夺天工的构思，似乎天地都无法包蕴他的灵秀之气；运用心思制作候风地动仪等机械，世界上任何人的智慧都不能与他相提并论，所以说他的思路深刻精微，是人的智慧在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礼记·乐记》上说：“德行先建立起来，而后技艺才能方能获得发展。”衡量张衡这种才智思虑，难道仅仅是“艺”吗？他的技艺精巧，对德行又有什么损害呢？

范晔称赞说：天、地、人三才之理，本当相通，但人的性灵却多有所蔽，所以很少有人能穷究天地之理的。张衡则近者能推究各种“数术”技艺，远者又能钻研出深奥不易被人知道的规律法则。如果没有深刻悠远的思考，怎么能够如此明晰、清楚呢？

（赵慧芝 译）

【原文】

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也。世为著姓。祖父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属文，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常从容淡静，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文多故不载。大将军邓骘奇其才，累召不应。

衡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常耽好《玄经》，谓崔瑗曰：“吾观《太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数，乃与《五经》相拟，非徒传记之属，使人难论阴阳之事，汉家得天下二百岁之书也。复二百岁，殆将终乎？所以作者之数，必显一世，常然之符也。汉四百年，《玄》其兴矣。”

安帝雅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遂乃研核阴阳，妙尽璇机之正，作浑天仪，著《灵宪》，《算罔论》，言甚详明。

顺帝初，再转，复为太史令。衡不慕当世，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自去史职，五载复还，乃设客问，作《应间》以见其志云：

有间余者曰：盖闻前哲首务，务于下学上达，佐国理民，有云为也。朝有所闻，则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是故伊尹思使君为尧舜，而民处唐虞，彼岂虚言而已哉，必旌厥素尔。咎单、巫咸，寔守王家。申伯、樊仲，实干周邦，服袞而朝，介圭作瑞。厥迹不朽，垂烈后昆，不亦丕欤！且学非以要利，而富贵萃之。贵以

行令，富以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称以“大业”。质以文美，实由华兴，器赖彫饰为好，人以舆服为荣。吾子性德体道，笃信安仁，约己博艺，无坚不钻，以思世路，斯何远矣！曩滞日官，今又原之。虽老氏曲全，进道若退，然行亦以需。必也学非所用，术有所仰，故临川将济，而舟楫不存焉。徒经思天衢，内昭独智，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尝见谤于鄙儒。深厉浅揭，随时为义，曾何贪于支离，而习其孤技邪？参轮可使自转，木雕犹能独飞，已垂翅而还故栖，盍亦调其机而铄诸？昔有文王，自求多福。人生在勤，不索何获。曷若卑体屈己，美言以相剋？鸣于乔木，乃金声而玉振之，用后勋，雪前吝。婞很不柔，以意谁靳也？

应之曰：是何观同而见异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是故艺可学，而行可力也。天爵高悬，得之在命，或不速而自怀，或羨旃而不臻，求之无益，故智者面而不思。跼身以徼幸，固贪夫之所为，未得而豫丧也。枉尺直寻，议者讥之，盈欲亏志，孰云非羞？于心有猜，则簋飧饌脯犹不屑餐，旌督以之。意之无疑，则兼金盈百而嫌辞，孟轲以之。士或解裋褐而袭黼黻，或委垂筑而据文轩者，度德拜爵，量绩受禄也。输力致庸，受必有阶。

浑元初基，灵轨未纪，吉凶纷错，人用臃朦。黄帝为斯深惨。有风后者，是焉亮之，察三辰于上，迹祸福乎下，经纬历数，然后天步有常，则风后之为也。当少昊清阳之末，实或乱德，人神杂扰，不可方物，重、黎

又相颡颥而申理之，日月即次，则重、黎之为也。人各有能，因艺授任，鸟师别名，四叔三正，官无二业，事不并济。昼长则宵短，日南则景北。天且不堪兼，况以人该之。夫玄龙，迎夏则陵云而奋鳞，乐时也；涉冬则渥泥而潜蟠，避害也。公旦道行，故制典礼以尹天下，惧教诲之不从，有人〔之〕不理。仲尼不遇，故论《六经》以俟来辟，耻一物之不知，有事之无范。所考不齐，如何可一？

夫战国交争，戎车竞驱，君若缀旒，人无所丽。烛武悬绁而秦伯退师，鲁连系箭而聊城弛柝。纵往则合，横来则离，安危无常，要在说夫。咸以得人为臬，失士为尤。故樊哙披帷，入见高祖；高祖踞洗，以对酈生。当此之会，乃鼙鸣而鼙应也。故能同心戮力，勤恤人隐，奄受区夏，遂定帝位，皆谋臣之由也。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长谋之，烂然有第。夫女魃北应龙翔，洪鼎声而军容息；溽暑至而鹑火栖，寒冰沍而鼃鼃蛰。今也，皇泽宣洽，海外混同，万方亿醜，并质共剂，若修成之不暇，尚何功之可立！立事有三，言为下列；下列且不可庶矣，奚冀其二哉！

于兹搢绅如云，儒士成林，及津者风撼，失涂者幽僻，遭遇难要，趋偶为幸。世易俗异，事执舛殊，不能通其变，而一度以揆之，斯契船而求剑，守株而伺兔也。冒愧逞愿，必无仁以继之，有道者所不履也。越王勾践事此，故厥绪不永。捷径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进苟容，我不忍以歛肩，虽有犀舟劲楫，犹人涉印否，有须

者也。故亦奉顺敦笃，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获不吝。不见是而不愠，居下位而不忧，允上得之常服焉。方将师天老而友地典，与之乎高睨而大谈，孔甲且不足慕，焉称殷彭及周聃！与世殊技，固孤是求。子忧朱泚曼之无所用，吾恨轮扁之无所教也。子睹木雕独飞，愍我垂翅故栖，吾感去蛙附鹄，悲尔先笑而后号也。

斐豹以毙督燔书，礼至以掖国作铭；弦高以牛犒退敌，墨翟以綦带全城；贯高以端辞显义，苏武以秃节效贞；蒯且以飞矰逞巧，詹何以沈钩致精；弈秋以棋局取誉，王豹以清讴流声。仆进不能参名于二立，退又不能群彼数子。愍《三坟》之既颓，惜《八索》之不理。庶前训之可钻，聊朝隐乎柱史。且韞椟以待价，踵颜氏以行止。曾不嫌夫晋、楚，敢告诫〔诫〕于知己。

阳嘉元年，复造候风地动仪。以精铜铸成，员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尊，饰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外有八龙，首衔铜丸，下有蟾蜍，张口承之。其牙机巧制，皆隐在尊中，覆盖周密无际。如有地动，尊则振龙，机发吐丸，而蟾蜍衔之。振声激扬，伺者因此觉知。虽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寻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验之以事，合契若神。自书典所记，未之有也。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后数日驿至，果地震陇西，于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后，乃令史官记地动所从方起。

时政事渐损，权移于下，衡因上疏陈事曰：“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继体承天，中遭倾覆，龙德泥蟠。今乘云高跻，磐

桓天位，诚所谓将隆大位，必先倥偬之也。亲履艰难者知下情，备经险易者达物伪。故能一贯万机，靡所疑惑，百揆允当，庶绩咸熙。宜获福祉神祇，受誉黎庶。而阴阳未和，灾眚屡见，神明幽远，冥鉴在兹。福仁褐淫，景响而应，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虽远，吉凶可见。近世郑、蔡、江、樊、周广、王圣，皆为效矣。故恭俭畏忌，必蒙祉祚，奢淫谄慢，鲜不夷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夫情胜其性，流鄙忘反，岂唯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贤，不能见得思义，故积恶成衅，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顾后，援镜自戒，则何陷于凶患乎！贵宠之臣，众所属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讥恶，有心皆同，故怨癘溢乎四海，神明降其祸辟也。顷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则《洪范》所谓“僭恒阳若”者也。惧群臣奢侈，昏逾典式，自下逼上，用速咎征。又前年京师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人忧也。君以静唱，臣以动和，威自上出，不趣于下，礼之政也。窃惧圣思厌倦，制不专己，恩不忍割，与众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范》曰：‘臣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国。’天鉴孔明，虽疏不失。灾异示人，前后数矣，而未见所革，以复往悔。自非圣人，不能无过。愿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旧，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若恩从上下，事依礼制，礼制修则奢僭息，事合宜则无凶咎。然后神望允塞，灾消不至矣。”

初，光武善讖，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讖言。衡以图纬虚妄，非圣人之法，乃上疏曰：“臣闻圣人明审律历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杂之以九宫，经天验道，本尽于此。或观星辰逆顺，寒燠所由，或

察龟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术也。立言于前，有征于后，故智者贵焉，谓之讖书。讖书始出，盖知之者寡。自汉取秦，用兵力战，功成业遂，可谓大事，当此之时，莫或称讖。若夏侯胜、眭孟之徒，以道术立名，其所述著，无讖一言。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亦无讖录。成、哀之后，乃始闻之。《尚书》尧使鲧理洪水，九载绩用不成，鲧则殛死，禹乃嗣兴。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黄帝伐蚩尤，而《诗讖》独以为‘蚩尤败，然后尧受命’。《春秋元包》中有公输班与墨翟，事见战国，非春秋时也。又言‘别有益州’。益州之置，在于汉世。其名三辅诸陵，世数可知。至于图中讖于成帝。一卷之书，互异数事，圣人之言，势无若是，殆必虚伪之徒，以要世取资。往者侍中贾逵摘讖互异三十余事，诸言讖者皆不能说。至于王莽篡位，汉世大祸，八十篇何为不戒？则知图讖成于哀、平之际也。且《河洛》、《六艺》，篇录已定，后人皮傅，无所容篡。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历纪推言水灾，而伪称洞视玉版。或者至于弃家业，入山林。后皆无效，而复采前世成事，以为证验。至于永建复统，则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势位，情伪较然，莫之纠禁。且律历、卦候、九宫、风角，数有征效，世莫肯学，而竞称不占之书。譬犹画工，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诚以实事难形，而虚伪不穷也。宜收藏图讖，一禁绝之，则朱紫无所眩，典籍无瑕玷矣。”

后迁侍中，帝引在帷幄，讽议左右。尝问衡天下所疾恶者。宦官惧其毁己，皆共目之，衡乃诡对而出。阉竖恐终为其患，遂共谗之。

衡常思图身之事，以为吉凶倚伏，幽微难明，乃作《思玄赋》，以宣寄情志。

永和初，出为河间相。时国王骄奢，不遵典宪；又多豪右，共为不轨。衡下车，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上下肃然，称为政理。视事三年，上书乞骸骨，征拜尚书。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

著《周宫训诂》，崔瑗以为不能有益于诸儒也。又欲继孔子《易》说《彖》、《象》残缺者，竟不能就。所著诗、赋、铭、七言、《灵宪》、《应间》、《七辩》、《巡诰》、《悬图》凡三十二篇。

永初中，谒者仆射刘珍、校书郎刘翬等著作东观，撰集《汉记》，因定汉家礼仪，上言请衡参论其事，会并卒，而衡常叹息，欲终成之。及为侍中，上疏请得专事东观。收捡遗文，毕力补缀。又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又以为王莽本传但应载篡事而已，至于编年月，纪灾祥，宜为元后本纪。又更始居位，人无异望，光武初为其将，然后即真，宜以更始之号建于光武之初。书数上，竟不听。及后之著述，多不详典，时人追恨之。

论曰：崔瑗之称平子曰“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斯致可得而言欤！推其围范两仪。天地无所蕴其灵；运情机物，有生不能参其智。故〔智〕〔知〕思引渊微，人之上术。记曰：“德成而上，艺成而下。”量斯思也，岂夫艺而已哉？何德之损乎！

赞曰：三才理通，人灵多蔽。近推形算，远抽深滞。不有玄虑，孰能昭晰？

蔡 伦 传

——《后汉书》卷七八

【说明】蔡伦，字敬仲。湖南耒阳人。生年不详（约出生于公元 53—60 年间），卒于公元 121 年。是著名的古代造纸技术专家。

蔡伦十几岁时就到京城洛阳皇宫里当太监，历经东汉的明帝刘庄、章帝刘炟、和帝刘肇、殇帝刘隆和安帝刘祜五任皇帝，服事宫廷五十余年。他聪明好学，为人机巧。受到历代皇帝的恩宠和重用，由任宦官中的低职小黄门，逐步升为较高官职的中常侍、尚方令、长乐太仆等。曾参于朝廷政务，掌管宫廷御用手工作坊，监管东观经典校勘等事。他监造了质地精良的宝剑及其他军械器物，为后世所效法。他在科学上最突出的贡献是总结了西汉以来用丝、麻等纤维物质造纸的经验，改进了造纸技术，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张。

东汉以前，重要典籍都是用简牍或缣帛作书写材料得以流传的。而竹简体大笨重，缣帛又稀少昂贵，都不是理想的书写材料。蔡伦本身很喜欢读书，深知简、帛给读书人带来不便，因而潜心研究造纸术。他首先用树皮、麻头、废旧的

麻布和鱼网等作为原料，通过精工细作，终于造出了优质而适用于书写的植物纤维纸。这种纸张的出现，从此引起了世界书写材料的革命。蔡伦作为杰出的造纸术改革家，立下了丰功伟绩，永留青史。他的造纸技术，不但提高了纸的质量，而且开拓了造纸原料的新领域，变废为宝，扩大了原料来源，降低了成本，便于推广应用。这是一种划时代的革新，它大大地促进了世界科学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的文明和进程。

蔡伦，字敬仲，桂阳郡耒阳（今湖南耒阳县）人。他从东汉明帝永平（公元58—75年）末年開始到京城皇帝妃嫔所住的宫掖任职，东汉建初（公元76—83年）年中，其官职为小黄门。到汉和帝刘肇即位，升任中常侍，参与国家军政机密大事。

蔡伦很有才学，做事尽心竭力，敦厚慎重。多次直言直谏皇帝，而冒犯皇帝的威严，以求纠正皇帝的过错。每到官员休假时期，他总是闭门谢客，思索难以解决的问题或到农村游览。后来又兼任尚方令。东汉永元九年（公元97年），掌管制造供皇帝及朝廷内使用的宝剑和各种器物。经他监制的宝剑和器物，无不坚固精巧，被后世的人们所效法。

自古以来，文字多写在被串联起来的竹简上，而把用以写字的细薄的丝织品叫做纸。但是缣帛一类丝织品价格太贵而竹简太重，不便于人们使用。于是蔡伦对此作了创造性的思考改进，他用树皮、麻头、破布、鱼网等为原料制造出新式的纸。东汉元兴元年（公元105年），蔡伦将他创造的纸敬

献给皇帝，获得皇帝的喜爱和赞扬。自此以后，人们都用蔡伦的方法制造纸张，并广为采用，所以，天下人称他创造的纸叫“蔡侯纸”。

东汉元初元年（公元 114 年），邓太后以蔡伦长期伺候在宫中有功，封他为龙亭侯，赐封国三百户。后来在太后所居长乐宫任掌管皇帝车马之事的长乐太仆。元初四年（公元 117 年），安帝以传世的儒家经典著作中解释的文字多不够正确，于是便选派博学多闻、通晓古今的谒者刘珍和五经博士良史到京城洛阳东观，校订这些经学著作中的谬误，命令蔡伦监督管理其校勘之事。

汉章帝窦后临朝听政时，蔡伦曾受窦后微词暗示，诬陷安帝祖母宋贵人（她后来被迫自杀）。邓太后去世以后，安帝开始亲自处理日常政务，并追究旧事，便下诏令蔡伦自己到廷尉处认罪和接受处罚。蔡伦感到受耻辱有伤自尊，于是洗浴后整理自己的服装，穿戴好衣帽，服毒自杀了。于是所赐龙亭侯及其封国全部都被取消了。（赵慧芝 译）

【原文】

蔡伦，字敬仲，桂阳人也。以永平末始给事宫掖，建初中，为小黄门。及和帝即位，转中常侍，豫参帷幄。

伦有才学，尽心敦慎，数犯严颜，匡弼得失。每至休沐，辄闭门绝宾，暴体田野。后加位尚方令。永元九年，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

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

下咸称“蔡侯纸”。

元初元年，邓太后以伦久宿卫，封为龙亭侯，邑三百户。后为长乐太仆。四年，帝以经传之文多不正定，乃选通儒谒者刘珍及博士良史诣东观，各雠校（汉）家法，令伦监典其事。

伦初受窦后讽旨，诬陷安帝祖母宋贵人。及太后崩，安帝始亲万机，敕使自致廷尉。伦耻受辱，及沐浴整衣冠，饮药而死。国除。

郭 玉 传

——《后汉书》卷八二

【说明】郭玉，广汉洛地（今四川广汉县）人。生卒年不详。师事程高，为涪翁再传弟子，擅长针灸。东汉和帝时，郭玉任太医丞。由于他治病往往一针而愈，皇帝对他的医术颇感惊奇，曾验证郭玉的本领。令手腕长得象女人一般美的近臣与女子混杂一起藏于帐后，各伸出一只手让郭玉切脉。郭玉诊出脉有男女，不是一人。皇帝感叹他医术确实高超。

郭玉为人仁慈，医德高尚。对待穷人或是地位低的病人都能尽心医治，且很快取效。然医治达官贵族却疗效不显，皇帝问其故，他说为贵人治病有四难：自行其事；自身调养不慎；筋骨不强壮，不能耐受药力；好安逸厌恶劳动。其说为皇帝及后世医家赞同。著有《针经》、《诊脉法》二书流传于世。

郭玉，广汉洛地人。最初，有一位不知从何处来的老人，常常在涪江钓鱼，因而人们称他涪翁。涪翁以乞食为生。当他遇见患病之人，便给予针刺、砭石治疗，往往获得良好效果。因此著有《针经》、《诊脉法》流传于世。他的弟子程高

追随他多年，涪翁才把医术传授于他。程高后来也隐匿行迹，未出来做官。郭玉年轻时即拜程高为师。学习医方、诊法，以及六微和研究阴阳变化的技术。东汉和帝时，郭玉官任太医丞，治病每每获显著疗效。皇帝很惊奇他的医术，于是命手腕长得嫩美的男性近臣与女子混杂一起，藏于帐幕后让郭玉各诊其脉候，然后问郭玉他们的疾病情况。郭玉说：“脉象显现左阳右阴，有男有女，好象是不同性别之人。我怀疑其中的原故。”皇帝听后赞叹他医术高超。

郭玉仁善不傲，即使贫穷地位低微的病人，也必定全心尽力而医。然而医治显要贵人，有时却不能治愈。皇帝于是让贵人身着贫贱衣服，变换住处，如此郭玉给予针刺治疗后很快病愈。皇帝召郭玉追问其中原因。郭玉回答：“疾病医治讲究医理，人体肌肤腠理极其细微，针刺砭石治病要随着气血运行应用技巧，若有丝毫差错就会失败。医生治病的神术掌握于心手之间，可以用心领会而无法以语言表达。贵人地位显赫，居高临下，我心怀恐怖侍奉他们，如此治疗有四难：“贵人按自己的意志行事而不信任我，这是一难；自身调养不慎，这是二难；筋骨不强壮，不能承受药力，这是三难；好安逸厌恶劳动，这是四难。针刺深浅有一定分寸，有时也会超越限度，如果再有恐惧心理，加之要求自己过于谨慎，我自己的治疗意图尚且不能完全实施，如此于疾病有何益处可言呢？这就是为什么不能治好他们疾病的原因。”皇帝对郭玉的回答表示赞同。郭玉后来因年老而卒，死时仍在官任上。

(万 芳 译)

【原文】

郭玉者，广汉洛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钓于涪水，因号涪翁。乞食人间。见有疾者，时下针石，辄应时而效，乃著《针经》、《诊脉法》传于世。弟子程高寻求积年，翁乃授之。高亦隐迹不仕。玉少师事高，学方诊六微之技，阴阳隐测之术。和帝时，为太医丞，多有效应。帝奇之，仍试令嬖臣美手腕者与女子杂处帷中，使玉各诊一手，问所疾苦。玉曰：‘左阳右阴，脉有男女，状若异人，臣疑其故’，帝叹息称善。

玉仁爱不矜，虽贫贱厮养，必尽其心力，而医疗贵人，时或不愈。帝乃令贵人羸服变处，一针即差。召玉诘问其状，对曰：‘医之为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贵者处尊高以临臣，臣怀怖慑以承之，其为疗也，有四难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将身不谨，二难也；骨节不疆，不能使药，三难也；好逸恶劳，四难也。针有分寸，时有破漏，重以恐惧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犹不尽，何有于病哉！此其所为不愈也。’帝善其对。年老卒官。

韩 康 传

——《后汉书》卷八三

【说明】韩康，又名恬休，字伯休。东汉京兆霸陵（今陕西长安）人。民间著名医生。不愿做官，长期隐居民间。他亲自入山采药，售于长安，口不二价，三十余年，不改其常。因后世人知其姓名，遂避入霸陵山中。桓帝以其医术高明，曾多次以礼聘之，仍隐居不仕。

韩康字伯休，又名恬休，京兆霸陵（今陕西长安）人。祖上是望族大姓。经常到名山中采药，在长安市上发卖，口不二价，达三十余年。有一次，一女子向韩康买药，韩康坚持原价不肯让步。那女子生气地说：“你难道就是韩伯休吗？真的口不二价吗？”韩康感叹地说：“我本来想隐姓埋名，现在连小女子都知道有我这个人，还卖什么药呢！”于是隐居到霸陵山中。因为用博士官车几次征召韩康，都不来，于是桓帝准备了币帛作为礼品，用专车聘请他。使者奉桓帝之命找到韩康，韩康迫不得已就答应了。他辞退专车，乘坐牛拉的柴车，在凌晨先于使者出发了。到达亭上，亭长因为被皇帝征召的韩康要经过这里，正派人夫牛马修路造桥。等看到韩康

头束丝巾，驾着柴车，他们把他当作一个老农，就派人来夺他的牛。韩康立刻丢开柴车给他。过了一会儿，使者到了，才明白被夺去牛的老农就是被皇帝征召的人。使者想奏请皇帝杀掉亭长，韩康说：“这是我自己给他的，亭长有什么罪呢？”于是平息了此事。韩康在中途逃遁隐居去了，享尽其寿命。

(郭 健 译)

【原文】

韩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采药名山，卖于长安市，口不二价，三十余年。时有女子从康买药，康守价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韩伯休那？乃不二价乎？”康叹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药为？”乃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车连征不至。桓帝乃备玄纁之礼，以安车聘之。使者奉诏造康，康不得已，乃许诺。辞安车，自乘柴车，冒晨先使者发。至亭，亭长以韩征君当过，方发人牛修道桥。及见康柴车幅巾，以为田叟也，使夺其牛。康即释驾与之。有顷，使者至，夺牛翁乃征君也。使者欲奏杀亭长。康曰：“此自老子与之，亭长何罪！”乃止。康因〔中〕道逃遁，以寿终。

王 景 传

——《后汉书》卷七六

【说明】王景，字仲通，东汉乐浪郡人。他年轻时学习《周易》，博览群书，喜好天文术数学问。曾任徐州刺史、庐江太守等职。他的突出成就是在水利方面。东汉永平二年，即公元 59 年，王景主持黄河治理、汴渠修复工程。他领导数十万民工，修筑了从河南荥阳向东至山东千乘海口的一千多里长的黄河大堤；对于汴渠，他采取开凿山阜、截弯取直、疏浚河道、修固堤防、兴修水闸的方法治理。全部工程历时一年。此后的八百年内，黄河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决溢改道，与这次对黄河中下游较为彻底的治理有很大关系，这是中国水利工程史上的一大盛事。

王景，字仲通，是乐浪郡的人。他的上世八代祖王仲，本来是琅邪不其人。王仲喜好道术，明了天文。吕氏家族作乱的时候，齐哀王刘襄谋划发兵讨吕，曾数次询问王仲。到了济北王刘兴居谋反时，曾想把军队交他领导，王仲惧怕灾祸波及，就渡海向东来到乐浪的山里，因此定居。父亲王闳，是郡中的三老。更始皇帝刘玄战败，当地人王调杀死了郡守

刘宪，自称为大将军、乐浪太守。建武六年（公元30年），光武皇帝刘秀派遣太守王遵率兵征伐王调。兵马到了辽东，王闾与郡决曹史杨邑等人一起杀了王调，迎接王遵，因此朝廷把他们都封为列侯，只有王闾推辞了爵位。皇帝认为其人奇异，可以任用，就征辟他到朝廷来，王闾在途中因病而亡。

王景年轻时学习《周易》，于是他看了很多的书，他又喜欢天文术数的学问，他秉性深沉而多怀技艺。他被征辟到司空伏恭府任职，当时有人荐举王景能治理水利，显宗皇帝诏令王景与将作偁者王吴共同修建浚仪渠。王吴使用王景的壩流之法，河水就再也没有成灾。

当初在汉平帝时，黄河在汴河一带决口，没有来得及修复。建武十年，阳武令张汜上书建议：“黄河泛滥业有许多年，济渠由于长期浸毁，也决口了，被水淹没的县约有数十个，修筑起来，是很麻烦费力的，其事却不难做。应当改造修护河堤，来使百姓安居乐业。”奏书上呈后，光武皇帝很快就征发役卒。正准备开展河防的修建时，浚仪令乐俊又上书说：“以前汉武帝元光年间，人口繁盛，顺沿河堤之处皆开垦种植，瓠子河决口之后，几乎二十多年，没有能及时地堵塞。现在人家稀少，而土田广阔，虽然未加修筑，它的患害犹堪承受。而今刚刚打完仗，就兴征民役，劳苦怨恨一定增多，民众就不堪忍受了。还是等到平安的时候，再来商议这件事吧。”光武皇帝得到这个上书，就停止了修堤工程。后来汴渠向东漫漫，越来越广，原来的水闸，都被淹在河里，兖州、豫州的百姓怨恨叹息，认为这是县官们一味兴修其它的工程，而不优先考虑人民所急迫的工程。永平十二年，朝中讨论修筑汴渠的

事情，皇帝召见王景，向他询问准备治理的河段的地理形势，王景陈述了各处地势是否具有危害性，答对敏捷。皇帝很满意，又因为王景曾修建浚仪渠，很有成绩，就赏赐给王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和钱帛衣物。夏天，征发役卒数十万人，派遣王景和王吴修理渠道，筑建堤防，从荥阳向东到千乘海口一千多里长。王景研究计算沿途地形，开凿山岭，劈破砥绩山，开直和堵截沟洫，在重要的地方设立防堤，疏通壅塞积滞，每隔十里建立一个水闸，根据需要使水流或洄流或径注，不再出现决溃和漏水的患害。王景尽管节约劳役减少用费，但工程费用还是要以上百亿的钱计算。第二年夏天，整个渠道建成。皇帝亲自巡行视察，诏令沿河的郡国都设置管理河堤的官吏，如同西汉以前的制度一样。王景因此而闻名，王吴和所有下属官员都增加一级的俸禄。王景被升任三级为侍御史。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跟从皇帝车驾到东方巡行视察，到了无盐，皇帝嘉赞王景治理河渠的功劳，任命他为河堤谒者，并赐赏他车、马、缣、钱等物。

建初七年（公元82年），王景迁升为徐州刺史。先此杜陵杜笃上奏《论都赋》，想要皇帝将首都迁回长安。听到此事的老者们，都被拨动了怀念故土的情感，没有不眷恋地佇立向西眺望。王景以为宫殿祖庙已经建好，深恐人们疑虑不安，正遇到当时有神雀等一些祥瑞出现，他就作了《金人论》，颂赞洛阳的美好，天人的符应，其文辞优美，殊可采集。

第二年，他迁任庐江太守。先此之前当地百姓不懂得用牛耕种，致使土地大有余力，但粮食经常不够吃。庐江郡内有楚相孙叔敖时建起的芍陂稻田。王景就督领吏役百姓，整

治荒芜废地，教民使用牛耕，从此垦殖开辟的土地倍增，郡境之内人皆富足。王景立石碑铭刻誓言，以使人们知道伦常律禁。他又训教命令人们学习养蚕纺织，并且制定有关的法令，这些都写在乡亭，庐江至今还流传他的文章。王景死于任上。

当初，王景认为《六经》所记载的，都有占卜筮卦，做事情举止活动，都要询问蓍草龟甲，但是众多的书籍相互牴牾，所说的吉凶甚至相反，王景于是研究整理众多的数术之书，以及葬送、造宅、五行禁忌之法、风水算命相面之类，把适合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内容，汇集成《大衍玄基》。

(夏经林 译)

【原文】

王景字仲通，乐浪郡人也。八世祖仲，本琅邪不其人。好道术，明天文。诸吕作乱，齐哀王襄谋发兵，而数问于仲。及济北王兴居反，欲委兵师仲，仲俱祸及，乃浮海东奔乐浪山中，因而家焉。父闳，为郡三老。更始败，土人王调杀郡守刘宪，自称大将军、乐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遣太守王遵将兵击之。至辽东，闳与郡决曹史杨邑等共杀调迎遵，皆封为列侯，闳独让爵。帝奇而征之，道病卒。

景少学《易》，遂广窥众书，又好天文术数之事，沈深多伎艺。辟司空伏恭府。时有荐景能理水者，显宗诏与将作谒者王吴共修作浚仪渠。吴用景壩流法，水乃不复为害。

初，平帝时，河、汴决坏，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阳武令张汜上言：“河决积久，日月侵毁，济渠所漂数十许县。修理之费，其功不难。宜改修堤防，以安百姓。”书奏，光武即

为发卒。方营河功，而浚仪令乐俊复上言：“昔元光之间，人庶炽盛，缘堤垦殖，而瓠子河决，尚二十余年，不即拥塞。今居家稀少，田地饶广，虽未修理，其患犹可。且新被兵革，方兴役力，劳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须平静，更议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后汴渠东侵，日月弥广，而水门故处，皆在河中，兖、豫百姓怨叹，以为县官恒兴佗役，不先民急。永平十二年，议修汴渠，乃引见景，问以理水形便。景陈其利害，应对敏给，帝善之。又以尝修浚仪，功业有成，乃赐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及钱帛衣物。夏，遂发卒数十万，遣景与王吴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景乃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洫，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景虽简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明年夏，渠成。帝亲自巡行，诏滨河郡国置河堤员吏，如西京旧制。景由是知名。王吴及诸从事掾史皆增秩一等。景三迁为侍御史。十五年，从驾东巡狩，至无盐，帝美其功绩，拜河堤谒者，赐车马缣钱。

建功七年，迁徐州刺史。先是杜陵杜笃奏上《论都赋》，欲令车驾迁还长安。耆老闻者，皆动怀土之心，莫不眷然佇立西望。景以宫庙已立，恐人情疑惑，会时有神雀诸瑞，乃作《金人论》，颂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采。

明年，迁庐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余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遂铭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训令蚕织，为作法制，皆著于乡亭，庐江传其文辞，卒于官。

初，景以为《六经》所载，皆有卜筮，作事举止，质于蓍龟，而众书错糅，吉凶相反，乃参纪众家数术文书，冢宅禁忌，堪輿日相之属，适于事用者，集为《大衍玄基》云。

班 昭 传

——《后汉书》卷八四

【说明】班昭，一名班姬，字惠班，生卒年不详。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是汉代著名的才女，通晓文史、天文历算之学。因她学问广博，时人号称她为“曹大家”。她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位有才华的女史学家和科学家，也是参与写二十五史唯一的女作者。

班昭出身于官宦和文史学术世家，曾祖父班况，汉成帝刘骜时（公元前32—前7年）任越骑校尉，祖父班稚，在汉哀帝刘欣时（公元前6—前1年）是广平太守。父亲班彪，东汉光武帝刘秀（公元25—57年）初年被举为茂才，先后任徐县县令等职。班彪酷爱古代文化，博古通今，才华出众，曾著《后传》五十六篇，作为《史记》的续篇。哥哥班固，更博通典籍，穷究诸子百家学说，成为一代通儒，他在其父所撰《后传》的基础上，编著了鸿篇巨著《汉书》。班昭在家庭文化熏陶下，继承家学，也博学多才。汉章帝刘炟建初（公元76—84年）中，班固所著《汉书》基本完稿，但其中的“八表”和“天文志”未来得及完成就去世了，汉和帝刘肇于永元（公元89—105年）年间，诏令班昭到东观藏书阁继续

完成这部书，后来又令马续协助班昭工作。班昭等受命协助撰成的是：《异姓诸侯王表》、《诸侯王表》、《五子侯表》（上、下）、《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外戚恩泽侯表》、《百官公卿表》（上、下）、《古今人表》，计十卷八个表和一卷《汉书·天文志》。这些志表，简明扼要，是研究西汉的重要史料。

班昭还多次被征召入宫帮助皇后及各嫔妃、贵人学习，“从曹大家受经书，兼天文、算数”等学；有时帮写赞颂文章等；邓太后临朝执政时，她参与商量朝政等大事。

此外，班昭还著有《女诫》，分《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篇。阐述封建社会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道德标准，影响深远。后收入《四女书》，称《闺阁四书集注》。她还撰写赋、颂、铭、注等十六篇。

班昭享年七十多岁。她去世以后，其儿媳丁氏将她的著述编辑成文集，并撰《大家赞》一篇附在文集中，以弘扬她的事迹。

正史无班昭专传，这里以《后汉书·列女传》中所记予以介绍。

扶风（今陕西）人曹世叔的妻子，是同郡人班彪的女儿，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学问广博，才能高超。曹世叔去世早，班昭为人有气节，行为有准则。她的哥哥班固著述《汉书》，其中的八种表和《天文志》没有写完就逝世了，汉和帝下诏书令班昭到东观藏书阁继续写完这部书。皇帝多次征召

她到皇宫，令皇后和各贵人以她为师，跟她学习，号称曹大家。每当有人向朝廷贡献奇异贵重的礼品时，就诏令曹大家为之作赞颂的文章。到邓太后临朝执政时，她参与商量国家政事。因为他经常出入宫廷，又勤勉地为之效劳，皇帝特封她的儿子曹成为关内侯，后来官升任到齐相。当时《汉书》刚传出来，很多人不能通读，同郡的马融伏案于阁下，跟随班昭学习《汉书》。后来又诏令马融的哥哥马续继班昭完成这项工作。

汉安帝刘祜永初（公元106—113年）年中，邓太后的哥哥邓骘大将军因为母亲去世，上书请求回家守孝，太后想不批准，便问班昭。班昭因此上疏说：“下人心想，皇太后陛下亲自提倡盛行美德，兴隆唐虞的政治，打开四门而听觉就会灵敏，采狂妄者不达事理的言论，接纳割草打柴者的浅陋谋略，鄙妇昭已愚昧老朽，身处清明盛世，竟敢不披露肝胆，以效万一之劳。鄙妇听说人们的谦让精神，其品德最为高尚。因此，典籍、墓碑记述其美好事迹，神明为之降福。过去伯夷、叔齐离开国家，天下的人都佩服他们廉洁高尚；太伯离开隰地，孔子赞扬他三次谦让，所以，使美好的德行发扬光大，扬名后世。《论语》说：‘能以礼让为国家利益考虑，在从政者中几乎没有。’由此说来，提倡诚意的谦让，具有深远的意义。现在四位舅舅（即指邓骘、邓恂、邓弘、邓闾）深沉地执意坚持忠孝之道，自己提出引退，但太后因为边境还没有安静太平，故而拒绝他们的请求；假如此后有丝毫的过错，而失去今天谦让的美德，惟恐谦让精神不会再有了。鄙人凭借和太后有缘能经常相见，故才敢冒死而竭诚地提出愚昧的鄙见。

自己知道此言不足以采纳，只是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为了表示如虫蚁般的一点真诚的心意。”太后采纳了班昭的意见，答应了邓鹭的请求。于是邓鹭兄弟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住宅。

班昭著《女诫》七篇，有助于教导和训诫女子。文章说（摘译文章开篇一段话）：

鄙人愚昧缺少见识，接受能力不敏捷，承蒙先父的宠爱，依靠母亲和老师教导。十四岁时，嫁给曹世叔为妻，力主平常家务。到今天已经四十多年了。战战兢兢，小心谨慎，常常惟恐被斥逐受辱，以增加父母亲的羞耻，成为内外的累赘。日夜操劳费心，勤恳处事而不敢说劳累，从今往后，才知道要免去了操劳担忧。我本性粗疏，无知而固执，教育子女没有素养和经验，常担心子谷（儿子曹成的字号）辜负和有辱清明的朝廷。出乎意料地皇帝给予恩惠，超常地赏赐金印紫绶，实在不是鄙人平日所期望的事。男儿已能为自己谋事，我不再为他担忧。但伤神的是女儿们正当嫁人的时候，而平时没有循循善诱地进行训导教诲，没能让她们懂得妇女的礼教，怕她们出嫁以后不能被夫家宽容，让祖宗蒙受耻辱。我如今因病行动凝滞，性命没有保障，每当念及女儿们的事，往往因此而感到惆怅。利用空闲时间，写了《女诫》七章，希望诸位女儿各抄写一遍，多有补益，使之对你自身有所帮助。从今以后，希望以此互相勉励！

.....

马融认为《女诫》写得好，命令妻子和女儿学习这几篇

文章。

班昭姐妹曹丰生，也有才学，为人又贤惠，写书信给班昭，讨论有关《女诫》问题。文笔辞语都很可观。

班昭七十余岁去世。皇太后穿着素色衣服举行哀悼，派人监督护理丧事。班昭所著赋、颂、铭、诔、问、注、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共十六篇。她的儿媳妇丁氏为她编辑成文集，又写了一篇《大家赞》，歌颂班昭的事迹。

(赵慧芝 译)

【原文】

扶风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学高才。世叔早卒，有节行法度。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帝数召入宫，令皇后诸贵人师事焉，号曰大家。每有贡献异物，辄诏大家作赋颂。及邓太后临朝，与闻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关内侯，官至齐相。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后又诏融兄续继昭成之。

永初中，太后兄大将军邓骘以母忧，上书乞身，太后不欲许，以问昭。昭因上书曰：“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辟四门而开四聪，采狂夫之瞽言，纳刍荛之谋虑。妾昭德以愚朽，身当盛明，敢不披露肝胆，以效万一。妾闻谦让之风，德莫大焉，故典坟述美，神祇降福。昔夷齐去国，天下服其廉高；太伯违邠，孔子称为三让。所以光昭令德，扬名于后者也。《论语》曰：‘能以礼让为国，于从政乎何有。’由是言之，推让之诚，其致远矣。今四舅深执忠孝，

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静，拒而不许；如后有毫毛加于今日，诚恐推让之名不可再得。缘见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虫螭之赤心。”太后从而许之，于是鹭等各还里第焉。

作《女诫》七篇，以助内训。其辞曰：

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余宠，赖母师之典训。年十有四，执箕帚于曹氏，于今四十余载矣。战战兢兢，常惧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劳，而今而后，乃知免耳。吾性疏顽，教导无素，恒恐子谷负辱清朝。圣恩横加，猥赐金紫，实非鄙人庶几所望也。男能自谋矣，吾不复以为忧也。但伤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它门，取耻宗族。吾今疾在沈滞，性命无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怅。闲作《女诫》七章，愿诸女各写一通，庶有补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勸勉之！

……

马融善之，令妻女习焉。

昭女〔媛〕妹曹丰生，亦有才惠，为书以难之，辞有可观。

昭年七十余卒，皇太后素服举哀，使者监护丧事。所著赋、颂、铭、诔、问、注、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凡十六篇。子妇丁氏为撰集之，又作《大家赞》焉。

华 佗 传

——《三国志·魏书三》卷二九

【说明】华佗，又名旉，字元化，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生卒年不详。

华佗一生致力于医疗实践，他长期在民间行医，为人民解除病痛。他的医术非常高明，不但在内科、妇科、小儿科、针灸上造诣颇深，更精于外科，并在世界上最先发明了全身药物麻醉法。华佗在当时已能成功地进行腹腔肿瘤摘除、胃肠吻合等大手术，他是我国历史上明确记载的第一个实施开腹手术的外科医生。为减轻病人痛苦，保证手术的顺利进行，华佗精心研制发明了一种全身麻醉剂——麻沸散。病人在手术前先服用他配制的“麻沸散”，就可“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全身麻醉术的发明，使原来许多难以进行的大型外科手术成为可能。它不仅使外科手术的治疗范围大大扩展，为人类战胜病痛提供了新的手段，也同时开拓了医学发展的新领域。这是对世界医学史的重大贡献。华佗也因此被尊为我国外科医学的鼻祖。

华佗还非常重视疾病的预防。他积极提倡劳动和体育锻炼，并为此创造了一套用于保健养生的体操，叫做“五禽

戏”。这套体操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活动姿态，让人体各部分都得到适当的运动。将体育锻炼与医疗相结合，这在今天仍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据说华佗曾著有《观形察色并三部脉经》一卷，《枕中灸刺经》一卷，《华佗方》十卷，《华佗内事》五卷，但都没能流传下来，这是我国医学的一个重大损失。华佗的弟子有吴普、李当之及樊阿等人，他们继承了华佗的部分经验及知识。吴普、李当之皆精本草，分别著有《吴普本草》和《李当之本草经》。

华佗为中华医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仅受到我国历代人民的传颂，而且在世界医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

华佗，字元化，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又名萆。在徐州一带游历求学，通晓几种经典，沛国相陈珪推荐他作孝廉，太尉黄琬征召他都不去。华佗通晓养生之术，当时人们认为他年近百岁却貌似壮年人。华佗还精于开处方用药，他治疗疾病，配制汤药只用几种药物。他对药剂的份量心中有数，不需要经过秤量，药煮好了就让病人服用，并告诉他们服药多少及其注意事项，药吃完病就好了。如果需要针灸，不过选一、两个穴位，每处不过灸七、八灼，病就消除了。如果需要扎针，也不过选一、两个穴位。下针时便问病人：“针感是否触及到了某处，如果针感到了，就告诉我。”病人说：“已经到了。”随即拔针，病痛也随之消除。如果疾病积结在体内，扎针、吃药都达不到效果，必须用手术切除的，便让病人喝下麻沸散，一会儿病人就象醉死一样失去知觉，华佗

于是就开刀取出患结。病如果是在肠子里，就切开肠子进行清洗，再缝合腹部，敷上药膏。四五天就好了，不再疼痛，病人自己也没什么感觉，一个月之内，伤口就长好了。

原甘陵相的夫人怀孕六个月，腹中疼痛不安，华佗为她诊脉，说：“胎儿已经死了。”让人用手探摸胎儿的位置，在左边的是男胎儿，在右边的则是女胎儿。摸的人说：“在左边。”华佗于是配汤药打胎，果然打下一个男性胎儿，病也就好了。

县吏尹世苦于四肢软弱无力，骨关节疼痛，口中干燥，不愿意听到别人的说话声，小便也不通畅。华佗说：“试着服用滚热的汤药，出汗则能痊愈；不出汗，则三天后死亡。”于是立即给他服用热汤药，但他不出汗，华佗说：“五脏的元气已经断绝了，他会哭着断气。”果然和华佗所说的一样。

府吏倪寻、李延一起来华佗处求医，两人都是头痛、身体发烧，病的症状相同。华佗说：“倪寻应当服药下泄，李延应当服药发汗。”有人问为何两人治疗方法不同，华佗说：“倪寻的病是内伤饮食而致，李延的病是外感风寒所致，所以应当用不同的医疗方法治疗。”就分别给了不同的药物，第二天一早两个人就都病好起床了。

盐渎的严昕和几个人一起拜访华佗，刚到，华佗问严昕：“您身体好吗？”严昕说：“自己觉得和平时一样。”华佗说：“从脸上看您有急病，不要多喝酒。”严昕等人呆一会儿就回去了，走了几里路，严昕突然头晕目眩掉下车，人们把他扶起来，用车送回家，到家第二天半夜就死了。

前督邮顿子献生病已经好了，又去请华佗诊脉，华佗说：“身体还很虚弱，尚未复原，不要做太劳累的事，如果行房事

就会死去。临死时，舌头会吐出几寸长。”顿子献的妻子听说他病好了，从百里之外赶来看他，当晚交欢，隔了三天，顿子献就发病了，正如华佗所说的一样。

督邮徐毅得病，华佗前去诊治。徐毅对华佗说：“昨天让医曹吏刘租在胃管上扎针以后，就很难受，咳嗽不止，想睡也睡不好。”华佗说：“针没扎到胃管，错扎在肝上了，以后饮食会一天天减少，五天后就会因无法救治而死亡。”结果和华佗说的一样。

东阳县陈叔山的小儿子两岁得病，泻肚子前总是先哭泣，一天天瘦弱下去。他来求问华佗，华佗说：“他母亲怀孕时，就需要阳气内养胎儿，现在母乳阴虚寒冷，小孩子受到母亲的寒气，所以病不能马上就好。”华佗给他了用四种药物配成的女宛丸，十天后病就好了。

彭城夫人夜里去上厕所，被毒蝎螫了手，痛得直呻吟，无法忍受。华佗让人烧热汤药，让夫人把手泡在里面，夫人终于可以睡觉了。只是要别人换几次汤药，保持药的温度，到天亮时病就好了。

军吏梅平得了病，被除名回家，家住在广陵，走了不到二百里，住宿在亲戚家。不久，华佗也偶然来到这户人家，主人请华佗给梅平看病，华佗对梅平说：“您如果早些见到我，病还不至于到这种地步。如今病已不可治了，赶快回去还能与家人相见，五天后就要死了。”梅平即时回家，死的日子正和华佗预计的一样。

华佗走路时，遇见一个病人，咽喉堵塞，很想吃东西却咽不下去，家里人用车拉着他准备去求医。华佗听见他的呻

吟声，停车前去看视，对他说：“刚才经过的路边有一家卖饼店，有蒜泥和醋，从那里买三升喝下，病自然就好了。”于是病人就照华佗说的做了，当时吐出一条寄生虫，挂在车边，准备去拜谢华佗。华佗还没回来，小孩子们在门前玩耍，迎面见了，相互说：“可能是遇见我们公公了，车边挂的寄生虫就是证明。”病人向前走到华佗家中就坐下，看见华佗家北墙上挂了约几十条这类的寄生虫。

又有一位郡守生病，华佗认为使他大怒一场病就能好，于是收了他很多钱却不给他治病，不一会丢下他就走了，还留下一封信骂他。郡守果然大怒，命令手下人把华佗捉住杀掉。郡守的儿子知道内情，嘱咐手下人不要追赶。郡守愤怒已极，吐出几升黑血，病就好了。

又有一位士大夫不舒服，华佗说：“您的病很重，应当剖腹切除。但是您的寿命也不过就是十年了，这病不会伤害到您的性命。如您能忍受十年的病痛，寿命也和疾病一同结束了。不必特地去割除。”士大夫不堪忍受病痛，一定要切除它。华佗于是为他作了手术，所患的疾病很快好了，但他最终还是在十年后死了。

广陵太守陈登得了病，胸中烦闷，面色发红，不想吃饭。华佗为他诊脉，说：“您胃里有几升虫子，快在体内形成痈疽了，这是吃生腥食物造成的。”随即配制了两升汤药，让他先喝一升，一会儿再全部喝完。过了约一顿饭的功夫，吐了大约三升虫子，红色的头还都在蠕动，半截身子象生鱼片一样，陈登的病就好了。华佗说：“这病三年后还会复发，遇到好的医生就可以救治。”果然象华佗所说的那样，三年后陈登又犯

病了，当时华佗不在，结果陈登就象华佗所说一样死去了。

太祖曹操听说以后，把华佗召去，让他经常在自己身边。太祖苦于头风病，每每发作，心乱眼花，华佗用针扎膈腧穴，手到病除。

李将军的妻子病得很重，叫华佗来诊脉，华佗说：“怀孕伤了胎，而胎儿没去掉。”将军说：“如你所说确实伤了胎，但胎儿已经打下了。”华佗说：“从脉象看胎儿还没有去掉。”将军不以为然。华佗就走了，妇人稍微有了好转。一百多天后，病又复发。又叫华佗去诊断，华佗说：“这个脉象的惯例是还有未产下的胎儿。上次应当生两个胎儿，一个胎儿先生出来，出血很多，后一个胎儿来不及出生，母亲自己感觉不到，别人也不明白，没有帮助接生，所以没生下来。胎儿死了，血脉不再营养胎儿，使胎儿干枯并附着在母亲的脊中，所以造成母亲的脊背常痛。现在应当给他服用汤药，并用针扎一个穴位，这个死胎一定会出来。”服用汤药和扎针以后，妇人疼得如同临产一样。华佗说：“这个死胎干枯已久，不能自己生出来，应当让人进行人工助产。”果然取出一个死了的男婴，手足齐全，颜色发黑，体长一尺左右。

华佗的高超医术，全都是这样的。但他本是读书人，却以行医为职业，心中常常后悔。后来太祖亲自处理国事，得了很重的病，便让华佗专门给他治病。华佗说：“这病短期内难以根除，要长期治疗，才能延长您的生命。”华佗离家很长时间，很想回去，因而对太祖说：“我刚刚收到一封家信，正想暂时回去。”华佗回家后，借口妻子有病，几次请求延长假期，没有返回。太祖多次写信传唤，又命令郡县官员要将华

佗遣送回来。华佗依仗自己的本领，讨厌吃侍候人的饭，还是不肯上路。太祖大怒，让人前去查看。如果华佗的妻子果真有病，就赐给他四十斛小豆，再宽限他一些假期；如果华佗说谎，就把他押送回来。于是华佗被逮捕关进许昌监狱，审讯后华佗认罪。荀彧请求太祖说：“华佗医术实在精深，关系着人的性命，应当宽恕他。”太祖说：“不必担忧，天下还怕没有这样的鼠辈吗？”终于判决华佗死罪，华佗临死时，取出一卷书给狱吏，说：“这书可以救活人。”狱吏害怕犯法不敢收，华佗也不勉强，要了火将书烧了。华佗死后，太祖的头风病还是没治好。太祖说：“华佗能治愈它，但这个小人却让我的病继续下去，想以此抬高自己的身价，然而我不杀这小子，他终究也不会为我除去这病根。”到后来太祖的爱子仓舒病危，太祖叹息说：“我后悔当初杀了华佗，让孩子这般痛苦地死去。”

当初，军吏李成苦于咳嗽，昼夜不能入睡，经常吐脓血，他把自己的病情告诉华佗向他请教。华佗说：“您患的是肠痛，咳嗽时吐的浓血，不是从肺里面出来的。给您两钱散剂，应当吐两升多脓血，吐完后自己保养，一个月就可以见到一些起色，好好调养，一年就可以健康如初了。过十八年会有一次小的发作，服用此散药，病就会痊愈。如果得不到这种药，仍然会死。”又给了李成两钱散剂。李成得到药后，过了五、六年，亲戚中有人也得了李成这样的病，对李成说：“你现在很强壮，我却就要死了，你怎么忍心收藏着并不急用的药，以备将来有病呢？先把药借给我，我病好了，再替你向华佗去要。”李成把药给了他。事后因故到谯县，正赶上华佗被拘押，

匆忙之中不忍心去求药。十八年后，李成旧病复发，无药可服，以致死去。

广陵的吴普、彭城的樊阿都跟随华佗学医。吴普按华佗的方法治病，治好了很多人，华佗对吴普说：“人体需要运动，但不应使身体过度疲劳。运动能使食物得到消化吸收，血脉流通，不得病，就象转动的门轴不会腐朽一样。所以古代长寿的人都做导引术，模仿熊攀援树木和鸛鹰回头顾盼的动作，伸展腰肢，活动各个关节，以求长寿。我有一种运动方法，叫做“五禽戏”，一是模仿虎，二是模仿鹿，三是模仿熊，四是模仿猿，五是模仿鸟。即能消除疾病，又能使手脚灵便，用这个当作导引术。身体不舒服，就起身做一种禽戏，便身上出汗沾湿衣服，再在身体上擦上一些粉，就会觉得身体轻便，食欲大增。”吴普常做“五禽戏”，活到九十多岁，耳聪目明，牙齿完整结实。樊阿擅长扎针，凡是医生都说背部和胸腹之间不可胡乱下针，即便要扎也不能深过四分，而樊阿在背部扎针往往深达一、二寸，在巨阙、胸臆等穴位下针深达五、六寸，而病往往都被治好了。樊阿曾向华佗请求服用有益于人体的药方，华佗传授给他漆叶青粘散。用漆叶屑一升，青粘屑十四两，按这个比例配药。据说长期服用，可以去除体内的寄生虫，利于五脏，使身体轻便，头发不会变白。樊阿依言而行，活到一百多岁。漆叶到处都有，青粘生长在丰县、沛县、彭城和朝歌等地。

（单菁菁 译）

【原文】

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人也。一名旉。游学徐土，兼通数经。沛相陈珪举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晓养性之术，

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又精方药，其疗疾，合汤不过数种，心解分剂，不复称量，煮熟便饮，语其节度，舍去辄愈。若当灸，不过一两处，每处不过七八壮，病亦应除。若当针，亦不过一两处。下针言“当引某许，若至，语人”。病者言“已到”，应便拔针，病亦行差。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割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间，即平复矣。

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腹痛不安，佗视脉，曰：“胎已死矣。”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则男，在右则女。人云“在左”，于是为汤下之，果下男形，即愈。

县吏尹世苦四支烦，口中干，不欲闻人声，小便不利。佗曰：“试作热食，得汗则愈；不汗，后三日死。”即作热食而不汗出，佗曰：“脏气已绝于内，当啼泣而绝。”果如佗言。

府吏倪寻、李延共止，俱头痛身热，所苦正同。佗曰：“寻当下之，延当发汗。”或难其异，佗曰：“寻外实，延内实，故治之宜殊。”即各与药，明旦并起。

盐渎严昕与数人共候佗，适至，佗谓昕曰：“君身中佳否？”昕曰：“自如常。”佗曰：“君有急病见于面，莫多饮酒。”坐毕归，行数里，昕卒头眩堕车，人扶将还，载归家，中宿死。

故督邮顿子献得病已差，诣佗视脉，曰：“尚虚，未得复，勿为劳事，御内即死。临死，当吐舌数寸。”其妻闻其病除，从百余里来省之，止宿交接，中间三日发病，一如佗言。

督邮徐毅得病，佗往省之。毅谓佗曰：“昨使医曹吏刘租针胃管讫，便苦咳嗽，欲卧不安。”佗曰：“刺不得胃管，误

中肝也，食当日减，五日不救。”遂如佗言。

东阳陈叔山小男二岁得疾，下利常先啼，日以羸困。问佗，佗曰：“其母怀躯，阳气内养，乳中虚冷，儿得母寒，故令不时愈。”佗与四物女宛丸，十日即除。

彭城夫人夜之厕，蛭螫其手，呻吟无赖。佗令温汤近热，渍手其中，卒可得寐，但旁人数为易汤，汤令暖之，其旦即愈。

军吏梅平得病，除名还家，家居广陵。未至二百里，止亲人舍。有顷，佗偶至主人计，主人令佗视平，佗谓平曰：“君早见我，可不至此。今疾已结，促去可得与家相见，五日卒。”应时归，如佗所刻。

佗行道，见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车载欲往就医。佗闻其呻吟，驻车往视，语之曰：“向来道边有卖饼家蒜齑蛇大酢，从取三升饮之，病自当去。”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枚，悬车边，欲造佗。佗尚未还，小儿戏门前，逆见，自相谓曰：“似逢我公，车边病是也。”疾者前入坐，见佗北壁悬此蛇辈约以十数。

又有一郡守病，佗以为其人盛怒则差，乃多受其货而不加治，无何弃去，留书骂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杀佗。郡守子知之，属使勿逐。守瞋恚既甚，吐黑血数升而愈。

又有一士大夫不快，佗云：“君病深，当破腹取。然君寿亦不过十年，病不能杀君，忍病十岁，寿俱当尽，不足故自割裂。”士大夫不耐痛痒，必欲除之。佗遂下手，所患寻差，十年竟死。

广陵太守陈登得病，胸中烦懣，面赤不食。佗脉之，曰：

“府君胃中有虫数升，欲成内疽，食腥物所为也。”即作汤二升，先服一升，斯须尽服之，食顷，吐出三升许虫，赤头皆动，半身是生鱼脍也，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后三期当发，遇良医乃可济救。”依期果发动，时佗不在。如言而死。

太祖闻而召佗，佗常在左右。太祖苦头风，每发，心乱目眩，佗针膈，随手而差。

李将军妻病甚，呼佗视脉，曰：“伤娠而胎不去。”将军言：“闻实伤娠，胎已去矣。”佗曰：“案脉，胎未去也。”将军以为不然。佗舍去，妇稍小差。百余日复动，更呼佗，佗曰：“此脉故事有胎。前当生两儿，一儿先出，血出甚多，后儿不及生。母不自觉，旁人亦不寤，不得迎，遂不得生。胎死，血脉不复归，必燥著母脊，故使多脊痛，今当与汤，并针一处，此死胎必出。”汤针既加，妇痛急如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宜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具，色黑，长可尺许。

佗之绝技，凡此类也。然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后太祖亲理，得病笃重，使佗专视。佗曰：“此近难济，恒事攻治，可延岁月。”佗久远家思归，因曰：“当得家书，方欲暂还耳。”到家，辞以妻病，数乞期不反。太祖累书呼，又敕郡县发遣。佗恃能厌食事，犹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检。若妻信病，赐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若其虚诈，便收送之。于是传付许狱，考验首服。荀彧请曰：“佗术实工，人命所悬，宜含宥之。”太祖曰：“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耶？”遂考竟佗。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烧之。佗死后，太祖头风未除。太

祖曰：“佗能愈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原耳。”及后爱子仓舒病困，太祖叹曰：“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强死也。”

初，军吏李成苦咳嗽，昼夜不寤，时吐脓血，以问佗。佗言：“君病肠臃，咳之所吐，非从肺来也。与君散两钱，当吐二升余脓血讫，快自养，一月可小起，好自将爱，一年便健。十八岁当一小发，服此散，亦行复差。若不得此药，故当死。”复与两钱散，成得药去。五六岁，亲中人有病如成者，谓成曰：“卿今强健，我欲死，何忍无急去药，以待不祥？先持贷我，我差，为卿从华佗更索。”成与之。已故到谯，适值佗见收，匆匆不忍从求。后十八岁，成病竟发，无药可服，以至于死。

广陵吴普、彭城樊阿皆从佗学。普依准佗治，多所全济。佗语普曰：“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不朽是也。是以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颈鸱顾，引挽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并利蹄足，以当导引。体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沾濡汗出，因上著粉，身体轻便，腹中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阿善针术，凡医咸言背及胸脏之间不可妄针，针之不过四分，而阿针背入一二寸，巨阙胸脏针下五六寸，而病辄皆瘳。阿从佗求可服食益于人者，佗授以漆叶青黏散。漆叶屑一升，青黏屑十四两，以是为率，言久服去三虫，利五脏，轻体，使人头不白。阿从其言，寿百余岁。漆叶处所而有，青黏生于丰、沛、彭城及朝歌云。

马 钧 传

——《三国志·魏书三》卷二九

【说明】马钧，字德衡，扶风（今陕西兴平东南）人。生卒年不详。三国时期著名的机械制造家。他曾在魏国担任给事中。《三国志·魏书》无传，但南朝裴松之引注引用了傅玄有关马钧在机械方面发明创造事迹的记述。西晋哲学家、文学家傅玄很敬重他，称之为“天下之名巧也”，并写有《马先生传》（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五十）。马钧一生设计制造出多种机械，著名者有下列几种：一是把几十综的旧式织绫机，一律改为十二蹀，从而简化了操作工序，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这种高效新式织绫机被广泛采用。其次是东汉毕岚发明一种水车，用于取河水洒道路。马钧在其基础上加以改进而创造的翻车（即龙骨车），可以灌溉园田，而且轻巧省力，儿童即能运转。以后又经过改进发展，龙骨车至今在中国有些地方仍在使使用。三是马钧善于制造兵器，他说能将诸葛亮发明的连弩加以改进，提高功效五倍。四是马钧刻苦钻研，制造出失传的指南车。又以木材制成轮，用水力驱动，通过传动机构而使“百戏”模型活动起来。所有这些，展示了马钧在机械传动设计与制造

方面的才能。

三国时，扶风地方的马钧，其灵巧高妙的构想和设计冠绝当代。傅玄的《马先生传》一文中介绍说：

马先生，是天下有名的技艺高明之人。少年时像常人一样游乐，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聪明才智。此时，既说不上聪明乖巧，又怎能谈得上有识见呢？他做博士时，家居清贫，开始考虑改进织绫机。不用介绍，大家就已知道他灵巧高妙的设计和创新。旧式织绫机，经线要分成几十组，每组经线由一“综”控制，每一“综”由一“蹀”操纵，五十综就需要五十蹀，六十综就需要六十蹀。他想，使用这种织绫机既浪费时间，功效又差，于是设计将之都改为十二蹀。织出来的花纹，奇异幻变都随织造者之创意，如同自然界景物一样逼真，层次变化无穷。名匠高手对之折服无言，又怎么敢说与之相比较。先生任给事中，与常侍高堂隆、骁骑将军秦朗辩论于朝堂上，他们谈到指南车，秦、高二人说古代根本没有，书上的记载全是虚构。先生说：“古代确有指南车。你们没有想到而已。其实何必要求之古代呢！”高、秦二人讥笑说：“先生名钧字德衡。钧，是器物的模型，而衡是称物轻重的。轻重没有标准，当然也就无物不是模型了！”先生说：“空言虚争无用，不如试着做起来容易见到效果。”高、秦二人将此禀告魏明帝。明帝下诏命先生制作，指南车果然制造成。这是一件异事。不用说，自此大家都佩服他的技艺高明。家居京都，城内有空地，可供开辟为菜园，

考虑到没有水用以灌溉，于是制作了翻车，让儿童推转，灌水自己倾倒，一出一入轮流更替，其巧妙高于一般灌溉器具的百倍。这是第二件异事。在造翻车之后，有人进献一种“百戏”模型给明帝。它可以作为陈设，但不能活动。明帝问先生：“能否使它活动起来？”回答说：“可以使之活动”。明帝说：“可以使它变得更精巧吗？”回答说：“可以使之更为精巧”。于是奉明帝诏命改进“百戏”。他用大木头雕断成轮形之物，放于平地上，暗中用水力驱动旋转。设计为女乐表演歌舞，以致能使木人击鼓吹箫。又制作山岳模型，使木人在其间跳丸掷剑，攀绳倒立，出入自在；另有百官行署，舂磨斗鸡，动作复杂，灵活多变。这是第三异也。先生见到诸葛亮发明可连续发射的连弩，说：“巧妙是巧妙，可还没有尽善尽美。”说若由他改进制作功效可提高五倍。又担心发石车的攻击效能，若敌方在城楼上悬挂湿牛皮，发石车发出的石块，即会被挡阻而失效，且石块又不能连续发射而至。于是他算计着制作出一轮，轮上系数十块大石头，用机械驱动大轮急速旋转，然后切断系石的绳索，则石块就连续飞击敌方城楼，使首尾像雷电而至。曾尝试着在车轮上系数十块砖，结果砖可飞数百步。有裴秀（地图学家）其人，是中原地方的名士，精通一般的自然常识。听说后不以为然。于是向先生发难诘问。先生口拙不予回答。裴秀自以为是抓住难得的机会，就滔滔不绝地说着。傅玄对裴秀说：“你的擅长是口才，弱点是缺少技巧；马先生擅长的是技巧，弱点是不善言谈。以你的专长，去

攻击他的弱点，则不得不屈服。如果以你的弱点去诘难他的专长，则一定也有不能解释之处。技巧，本来是一件小事，因有所不能解而向对方诘难不休，这种相互攻击，就相去太远了。乖巧于内而口拙于外，是马先生不予回答的原因。”傅玄见安乡侯曹羲，说到裴秀的言论，安乡侯同意裴秀的看法。傅玄说：“圣人具体备物，取人不是只采用一个尺度：有以精神取人的，有以辞令取人的，有据其行为而取人的。有以精神取人者，不用说真诚之心已先通达，当是以道德著称的颜渊一类人了。以辞令取人者，用善于察势、辩论为是非标准，当看重擅长辞令的宰我、子贡。以善于办事而取人，如政事方面有冉有、季路，文学方面则有子游、子夏。虽然圣人能明察洞透事物，如需用人时，也必须对之有所考试。所以对冉有、季路考试以政事，而以学问考试子游、子夏。像子游、子夏这样有学问的人尚须考试，何况在他们之下的人呢！为什么要考试？空谈事物常理不可能说得透彻，实行于具体事情，难以说透彻的事而通过考察就容易明白。现在假若马钧要制作的是国家之精器，军队之重要事物，只要花费十寻（古长度单位）木材，二个人力，不用经过多长时间，正确与否即可定。难以考较和容易验证的事却轻易用言语去抑制别人的异才，这就譬如用自己的智力承担天下之事，不改变常规去处理复杂的事物，所以大多失败了。马钧制作器物，因有所改进才得到更佳者，因最早的不一定完善。若是因不完善而不借鉴使用，那么稀世的技巧就无从出现了。同情者相

互妒嫉，同事者相互伤害，为一般人情所难免。所以君子不以人害人，必须以考试为衡石（称重工具）。丢弃衡石不用，会使美玉因之被诬为石头，楚国卞和所以抱着未经雕琢之玉而大哭啊。”于是安乡侯醒悟过来，就对武安侯讲，武安侯仍对之轻忽，结果没有加以考察。这本是容易考察的事情，且马钧技巧高明的声名已有定论，尚且被忽视，何况深山僻壤的有才之士，不知名未经雕琢之玉？后世的君子应有鉴于此啊！马先生的高妙技巧，虽然古代的公输般、墨翟、王尔，近世汉朝的张平子也不能超越他。公输般、墨翟都被用于当时，所以有益于世。平子虽然官为侍中，马先生虽然官为给事中，都不掌管工官，高明的技巧无用于世。用人不适合其才，闻贤不予考察使用，实在是太遗憾了！

裴子就是裴秀。安乡侯即曹羲。武安侯即曹爽。

（范楚玉 译）

【原文】

时有扶风马钧，巧思绝世。傅玄序之曰：

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少而游豫，不自知其为巧也。当此之时，言不及巧，焉可以言知乎？为博士居贫，乃思绀机之变，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旧绀机五十综者五十蹀，六十综者六十蹀，先生患其丧功费日，乃皆易以十二蹀。其奇文异变，因感而作者，犹自然之成形，阴阳之无穷，此轮扁之对不可以言言者，又焉可以言校也。先生为给事中，与常侍高堂隆、骁骑将军秦朗争论于朝，言及指南车，二子谓古无指南车，记言之虚也。先生曰：

“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远之有！”二子哂之曰：“先生名钧字德衡，钧者器之模，而衡者所以定物之轻重；轻重无准而莫不模哉！”先生曰：“虚争空言，不如试之易效也。”于是二子遂以白明帝，诏先生作之，而指南车成。此一异也，又不可以言者也，从是天下服其巧矣。居京都，城内有地，可以为园，患无水以灌之，乃作翻车，令童儿转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于常。此二异也。其后人有上百戏者，能设而不能动也。帝以问先生：“可动否？”对曰：“可动。”帝曰：“其巧可益否？”对曰：“可益。”受诏作之。以大木雕构，使其形若轮，平地施之，潜以水发焉。设为女乐舞象，至令木人击鼓吹箫；作山岳，使木人跳丸掷剑，缘绳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舂磨斗鸡，变巧百端。此三异也。先生见诸葛亮连弩，曰：“巧则巧矣，未尽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患发石车，敌人之于楼边县湿牛皮，中之则堕，石不能连属而至。欲作一轮，县大石数十，以机鼓轮为常，则以断县石飞击敌城，使首尾电至。尝试以车轮县瓠臂数十，飞之数百步矣。有裴子者，上国之士也，精通见理，闻而哂之。乃难先生，先生口屈不对。裴子自以为难得其要，言之不已。傅子谓裴子曰：“子所长者言也，所短者巧也。马氏所长者巧也，所短者言也。以子所长，击彼所短，则不得不屈。以子所短，难彼所长，则必有所不解者矣。夫巧，天下之微事也，有所不解而难之不已，其相击刺，必已远矣。心乖于内，口屈于外，此马氏所以不对也。”傅子见安乡侯，言及裴子之论，安乡侯

又与裴子同。傅子曰：“圣人具体备物，取人不以一揆也：有以神取之者，有以言取之者，有以事取之者。有以神取之者，不言而诚心先达，德行颜渊之伦是也。以言取之者，以变辩是非，言语宰我、子贡是也。以事取之者，若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虽圣人之明尽物，如有所用，必有所试，然则试冉、季以政，试游、夏以学矣。游、夏犹然，况自此而降者乎！何者？悬言物理，不可以言尽也，施之于事，言之难尽而试之易知也。今若马氏所欲作者，国之精器，军之要用也。费十寻之木，劳二人之力，不经时而是非定。难试易验之事而轻以言抑人异能，此犹以己智任天下之事，不易其道以御难尽之物，此所以多废也。马氏所作，因变而得是，则初所言者不皆是矣。其不皆是，因不用之，是不世之巧无由出也。夫同情者相妒，同事者相害，中人所不能免也。故君子不以人害人，必以考试为衡石；废衡石而不用，此美玉所以见诬为石，荆和所以抱璞而哭之也。”于是安乡侯悟，遂言之武安侯，武安侯忽之，不果试也。此既易试之事，又马氏巧名已定，犹忽而不察，况幽深之才，无名之璞乎？后之君子其鉴之哉！马先生之巧，虽古公输般、墨翟、王尔，近汉世张平子，不能过也。公输般、墨翟皆见用于时，乃有益于世。平子虽为侍中，马先生虽给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无益于世。用人不当其才，闻贤不试以事，良可恨也。

裴子者，裴秀。安乡侯者，曹羲。武安侯者，曹爽也。

陆 绩 传

——《三国志·吴书》卷五七

【说明】陆绩，生卒年不详。汉朝末年人。博学多才，在孙权的政权机构中作郁林太守（今广西玉林县），三十二岁去世。

陆绩是二十四孝者之一。“陆绩怀橘”，说的就是他五六岁时到袁术家作客的故事。《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舌战群儒”一节，陆绩也被作为群儒之一。他质问诸葛亮，然而诸葛亮一句“那不是怀橘的陆郎吗”，竟使他闭口吞声。

陆绩是个天文学家。他著的《浑天图》已不存在，但他拥护浑天说的言论却影响深远，经常被当时和以后的天文学家引用，甚至把他和张衡并提。陆绩曾造了一部浑天象即天球仪，形状像鸟卵，为椭圆。依浑天象，则黄道直径应长于赤道。测量天球大小，现在看来是很可笑的。但陆绩把浑天象做成椭圆，说明他已朦胧地觉得，天球（实际上是地球）不是正圆。这个认识是很宝贵的。

陆绩，字公纪，吴郡吴县人（今苏州市人）。父亲陆康，汉朝末年任庐江太守。陆绩六岁时，在九江袁术家做客，袁

术拿出橘子招待他。陆绩揣了三个橘子在怀里，离去时，向袁术拜别，掉在了地上。袁术对他说：“陆郎做客还要揣橘子吗？”陆绩跪下回答说：“想带回去给母亲吃。”袁术大为惊奇。孙策占据吴地时，张昭、张紘、秦松都是上宾，他们在一起议论，四海尚未太平，必须用武力镇压来平定天下。陆绩年龄小坐在末座上，他远远地大声说：“过去管仲辅佐齐桓公，九次和诸侯会盟，终于拯救了天下，而不用武力。孔子说：‘远方的人不服从，就要很好地修养自己的德行以感召吸引他们。’现在你们不讲求用道德怀柔的办法，而只崇尚武力，我虽年幼无知，可觉得心里不安。”张昭等人异常惊奇。

陆绩魁梧健壮，学识渊博，天文、历法和算术，没有不研究的。虞翻很早就已进入名流行列，庞统是荆州的有识高士，年龄也比陆绩大不少，他们都和陆绩友好。孙权执政时，委任他在主管奏议的部门工作。因为他说话太直而使孙权害怕。被调出去做郁林太守兼偏将军，给他二千兵。陆绩本来就有脚病，他的志愿是要作儒生雅士，领兵不是他的志愿。虽然有战事，但从不放弃著述。作《浑天图》，注释《周易》、《太玄》，都流传后世。自己预先知道要去世的日子，就写了遗言说：“汉朝的志士吴郡陆绩，从小攻读《诗经》、《尚书》，长大熟悉《礼》和《周易》，接受命令来到南方，身染疾病，困于灾祸，这意外的遭遇使我命不久长。唉，悲痛难忍”。又说：“从现在起六十年之后，‘车同轨，书同文’（天下统一）。遗憾我不能看到了。”三十二岁去世。他的大儿子陆宏，是会稽南部的都尉，二儿子陆叡，是长水的校尉。

（李 申 杨素香 译）

【原文】

陆绩字公纪，吴郡吴人也。父康，汉末为庐江太守。绩年六岁，于九江见袁术。术出桔，绩怀三枚，去，拜辞堕地，术谓曰：“陆郎作宾客面怀桔乎？”绩跪答曰：“欲归遗母。”术大奇之。孙策在吴，张昭、张紘、秦松为上宾，共论四海未泰，须当用武治而平之，绩年少未坐，遥大声言曰：“昔管夷吾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车。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今论者不务道德怀取之术，而惟尚武，绩虽童蒙，窃所未安也。”昭等异焉。

绩容貌雄壮，博学多识，星历算数无不该览。虞翻旧齿名盛，庞统荆州令士，年亦差长，皆与绩友善。孙权统事，辟为奏曹掾，以直道见惮，出为郁林太守，加偏将军，给兵二千人。绩即有羸疾，又意存儒雅，非其志也。虽有军事，著述不废。作《浑天图》，注《易》释《玄》，皆传于世。豫自知亡日，乃为辞曰：“有汉志士吴郡陆绩，幼敦《诗》、《书》，长玩《礼》、《易》，受命南征，遭疾遇厄，遭命不永，呜呼悲隔！”又曰：“从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车同轨，书同文，恨不及见也。”年三十二卒。长子宏，会稽南部都尉。次子叡，长水校尉。

王 蕃 传

——《三国志·吴书》卷六五

【说明】王蕃（公元 228—266 年），三国时代天文学家。学问渊博，志节高尚。因性情耿直，得罪东吴皇帝孙皓，被孙皓杀害。东汉末年，刘洪制订了当时最为先进的历法：《乾象历》，但未被采用。王蕃在东吴，极力推崇刘洪的历法，所以吴国一直用《乾象历》。王蕃根据《乾象历》中所体现的浑天说思想，造了一部浑天象，即天球仪，并根据天球仪测算了天球的大小。《晋书·天文志》、《宋书·天文志》都原文照录了王蕃关于天球形状、大小的论文。王蕃测量天球大小的工作现在看来十分可笑，然而科学多是在后人看来十分荒唐可笑的情况下不断前进的。尤为重要的，是王蕃打破了“周三径一”这个自古相传的数据。王蕃在自己的论文中明确指出：“考之径一不啻周三”。虽然他的数据很不精确，但对于后世圆周率数据的日益精确，具有碎冰开冻之功。

王蕃字永元，庐江人，博览群书，见多识广，兼通工艺制造以及术数之学。起初作尚书郎，后离职去官。孙休即位，与贺邵、薛莹、虞汜都作了散骑中常侍，也都兼任驸马都尉。

当时的舆论都认为是令人羡慕的清高显要的职位。作为使臣被派到蜀国，受到蜀人的称赞。回国后，作夏口的监军。

孙皓初年，又调入中央任常侍，和万顷官职相同。万顷和孙皓有旧交情。有个下等士人欺辱王蕃，万顷反说王蕃不自重，中书丞陈声，是孙皓的宠臣，屡次诽谤王蕃。王蕃气节高尚光明磊落，不会低眉顺眼看人脸色办事。时常违背孙皓的旨意。天长日久，于是受到责难。

甘露二年（公元266年），丁忠出使晋国回来，孙皓召集群臣大摆宴席。王蕃沉醉，伏在案上。孙皓怀疑他装醉，心中不快，让人把王蕃抬出去。不大一会儿，王蕃请求回来，酒还没有醒。王蕃生性威武严肃，行走起来和平素一样，孙皓勃然大怒，吆喝左右将王蕃斩杀于殿下。卫将军滕牧、征西将军留平为王蕃说情，没有得到应允。

丞相陆凯上书奏道：“常侍王蕃德行纯美，为臣忠顺，通晓天文、博识万物，在朝中处事，稳重可靠。真是国家的栋梁，大吴国的龙逢。过去为景皇帝作事，处理章奏诏命深得景皇钦佩和赞赏。称赞他是出类拔萃的人。而陛下却气愤他逆耳的言辞，厌恶他的直言不讳，在殿堂之下，杀死了他，尸体暴露丢弃，郡内的人都为之伤心，有识之士都为之悲哀。”他是这样的痛惜王蕃啊。王蕃死时，三十九岁。孙皓将王蕃的家属远迁到广州。两个弟弟，叫王著、王延，都能做精良的器械，郭马作乱，他们不为郭马作事，被杀害。

（李 申 杨素香 译）

【原文】

王蕃字永元，庐江人也。博览多闻，兼通术艺，始为尚

书郎，去官。孙休即位，与贺邵、薛莹、虞汜俱为散骑中常侍，皆加驸马都尉。时论清之。遣使至蜀，蜀人称焉，还为夏口监军。

孙皓初，复入为常侍，与万顷同官。顷与皓有旧，俗士挟侵，谓蕃自轻。又中书丞陈声，皓之嬖臣，数譖毁蕃。蕃体气高亮，不能承颜顺旨，时或迁意，积以见责。

甘露二年，丁忠使晋还，皓大会群臣，蕃沉醉顿伏。皓疑而不悦，舆蕃出外。顷之请还，酒亦不解。蕃性有威严，行止自若，皓大怒，呵左右于殿下斩之。卫将军滕牧、征西将军留平请，不能得。

丞相陆凯上疏曰：“常侍王蕃黄中通理，知天知物，处朝忠蹇，斯社稷之重镇，大吴之龙逢也。昔事景皇，纳言左右，景皇钦嘉，叹为异伦。而陛下忿其苦辞，恶其直对，梟之殿堂，尸骸暴弃，郡内伤心，有识悲悼。”其痛蕃如此。蕃死时年三十九。皓徙蕃家属广州。二北著、延皆作佳器，郭马起事，不为马用，见害。

裴 秀 传

——《晋书》卷三五

【说明】裴秀（公元 223—271 年），字季彦，河东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人。从小喜欢学习。十几岁的时候，就很有才华，时常得到人们的称赞。后来，经过推荐，大将军曹爽曾任他为黄门侍郎。司马懿诛曹爽，裴秀被罢官，但不久又为晋文帝司马昭所重用，任散骑常侍。在司马昭征讨诸葛诞时，裴秀随从出征，参与谋略，得胜而归。封为鲁阳乡侯，增给封地一千户。后又为司马昭处理政事，改革官制等，封为济川侯，给封地一千四百户。晋武帝得继帝位，多亏裴秀在司马昭面前为他讲好话。武帝即王位，任裴秀为尚书令；即位后，加左光禄大夫，封为钜鹿郡公，封地三千户。泰始四年（公元 268 年）官至司空，负责地官的职务，掌握全国土地、人口和地图等情况，这个职务与裴秀在地图学方面取得的成就有很大关系。

裴秀在学术上的重要成就是主持编制《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和他在撰写图序中提出的编制地图的六项原则，即“制图六体”。此外，他还把“旧天下大图”缩制为“方丈图”（或称“地形方丈图”）。著有《冀州记》、《易》及《乐》论，

而《盟会图》及《典治官制》两种，可惜没有完成。裴秀总结前人制图经验，在《禹贡地域图》序中提出的“制图六体”，为中国传统地图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裴秀别名季彦，河东（译者按：今山西）闻喜人。祖父裴茂，在汉代任尚书令。父亲裴潜，在三国时的魏国任尚书令。裴秀从小好学，有礼貌，八岁能写文章。叔父裴徽有名望，宾客很多。裴秀十几岁时，客人拜访他叔父后就去看望他。可是裴秀的生母是妾，嫡母宣氏瞧不起她。宴客时曾叫她奉饮食，客人见到她都起身致意。她说：“我这么微贱，客人看得起我，是因为我儿子的缘故啊！”宣氏得知后，才不再这么做。当时人们都说：“裴秀是青年中有领导才能的人。”

到过辽水地区的将军毌丘俭曾向大将军曹爽推荐裴秀，说：“裴秀身材魁伟而灵活，性格恬静，善于思考，记忆力强，学识渊博；在乡里中以孝友著称，远近闻名。很适宜辅佐大将军，赞助宏谋，宣扬教化。不仅可与子奇、甘罗相比，而且兼有颜回、冉求、子游、子夏的美德。”曹爽就任命裴秀为掾，沿袭父亲的爵位清阳亭侯，升任黄门侍郎。曹爽被诛，裴秀因为是他的部下，被罢官。不久，裴秀出任廷尉正，文帝时，任安东及卫将军司马，有关军国大事的意见，多被采纳。升任散骑常侍。

文帝讨伐诸葛诞时，裴秀和尚书仆射陈泰、黄门侍郎钟会都以行台的身份随从文帝，出谋划策。讨平诸葛诞之后，任尚书，加封鲁国乡侯，增封地一千户。常道乡公即位，参与议定政策，加封爵位为县侯，增封地七百户，任尚书仆射。魏

咸熙初年，改革法制官署。当时荀颀负责制定礼仪，贾充制定法律，裴秀负责改革官制。裴秀建议分爵位为五等，自骑督以上六百多人都受封。于是裴秀封为济川侯，土地四周计六十里，封地一千四百户，以高苑县济川墟作为侯国。

当初，文帝还未定后嗣时，曾经属意舞阳侯攸。武帝担心得不到继位，去问裴秀，说：“人有没有长相呢？”随即显示了自己相貌奇特的地方。裴秀后来就对文帝说：“中抚军（按：指武帝）受人爱戴，一表不凡，不是当臣子的相貌。”从而决定了继位的人。

武帝即王位后，授裴秀为尚书令、右光禄大夫，与御史大夫王沈、卫将军贾充都开建府第，加官给署中。武帝即位。加官左光禄大夫，封为钜鹿郡公，封地三千户。

那时任职安远护军的郝诩给老朋友的信中说：“我与尚书令裴秀相识，盼望他给予好处。”于是有官吏上奏皇帝免除裴秀的官，皇帝下诏说：“不能使别人不来打主意，这是古人也难免的。为自己谋好处，这是郝诩的过错，尚书令怎么能防止呢！你们不必追问了。”司隶校尉李喜又上奏说，骑都尉刘向给尚书令裴秀占据官府稻田，请求禁止裴秀这样做。皇帝诏书又表示裴秀辅佐朝廷政事，有功于王室，不能因有小毛病就淹没了大功劳，需要治刘向的罪不必禁止裴秀。

后来，皇帝下诏书说：“三司的任务，是帮助朝廷宣扬政教，安治下民。所以管理国家，规划政令，都要靠三司阐明道理，假如不是这样的人，就不要虚设这样的官。尚书令、左光禄大夫裴秀，博大宽宏，深思远虑，先皇帝重用他辅佐前届朝廷。我受先皇之命，让他辅佐大业，他功绩卓著，应授

予重要职位，才符合他的众多业绩。可任命裴秀做司空。”

裴秀的儒学深厚，见闻广博，并且关心国家大事，在文帝传位给武帝的时候，总汇纳言官的意见，所做的裁决，没有违背礼教之处。又因职务在地官，认为《禹贡》书中的山川地名，自古以来，多有改变。后人说法中有牵强附会的地方，就逐渐搞不清了。于是裴秀查阅过去的文献，有不确实的就不用，只有古代名称而现在没有的，都加以注明。撰著《禹贡地域图》十八篇，上奏皇帝，由秘书省收藏。在他写的序文中说道：

图书的设备，从来都是受重视的。自古把绘图象的制度流传下来，很有用。夏商周三代设置有这方面的官吏，职务由国史掌管。汉军占领了咸阳，丞相萧何全部接受了秦的图籍。现在秘书省既没有古代的地图，又没有萧何所得到的地图，只有汉代的舆地图和括地图等。这些地图都不设比例尺，又不考究方位，注记的名山大川也不全。虽然粗具规模，但都不精确，不能依据。关于遥远地区的不可靠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也不可取。

大晋朝兴起，天下一统，海内清平，从庸蜀（按：今湖北、四川境内）开始，深入到山川险峻的地方都已安定。文皇帝（按：即晋文帝）才命令官吏，编制吴、蜀地图。蜀地既已平定，把军队所经过地方的地区远或近，山川的险峻或平坦，道路的曲折或笔直，同地图和图书的记载比较，都没有什么差异。现在考证上自《禹贡》书中所记的山海河流，平原池泽，古代的九州，到现在的十六州，郡国县邑，疆界乡里，以及古代国家和盟会地

的旧名称，与其间的水路陆路等，绘制了地图十八篇。

绘制地图的原则有六：第一，叫做分率（按：即比例尺），用来辨识图上地域面积的大小。第二，叫做准望（按：即方位），用来摆正地物彼此的方位关系。第三，叫做道理（按：即路程），用来定人行道路的里程。第四，叫做高下（按：即高取下）；第五，叫做方邪（按：“即方取斜”）；第六，叫做迂直（按：即迂取直）；这三项原则要各因地制宜，用来校正地表的平坦或险峻的差异（按：即校正由于地表的平坦或险峻之不同而产生的地物间距离的差异）。地图上如果只有图形而没有比例尺，就无从知道地物间的远近之差；有比例尺而没有方位，虽然某一处是正确了，但是在其他地方必然会产生差错；有了方位而没有路程，那么在与山海所隔绝的地方，就不能表示彼此相通；有了道路的里程，而没有用高取下、方取斜、迂取直的方法进行校正，那么人行的路程数，必然与水平直线距离的数字不符，方位也就不准确了。所以这六项原则，都需要参照考虑。这样，图上地物的远近，取决于比例尺，地物彼此的关系，取决于方位，人行道路的里数，取决于路程，地物间的水平直线距离，取决于采用高取下、方取斜、迂取直的方法来计算。因此，虽然有高山大海的阻隔，远方异国的不同，高低曲折等情况，都不影响地物位置的确定。方位既然无误，那么曲直远近，就能够表示出来了。

裴秀曾经创建朝廷礼仪，制定很多刑律法规，朝廷多数照办，当作旧制。他在位四年，是当代著名的爵位最高的人。

本来服用寒食散，应该喝热酒，但他喝了冷酒，不幸于泰始七年（公元 271 年）逝世，终年四十八岁。皇帝的诏书说：“司空（按：即裴秀）德智兼备，举止文雅，辅佐皇朝，功业宏伟。正在他研制规章制度，作为准则的时候。不幸逝世，我十分悲痛。赐给棺、朝服一件、衣服一套、钱三十万、布一百匹。谥号称元。”

起初，裴秀认为尚书三十六曹等吏办事的准则和条例都不明确，应该使各级官员都有职责，但是没有来得及上奏皇帝就去世了。裴秀的朋友整理他的文稿时，得到他给皇帝上表的草稿谈到平定东吴这件事时写道：“孙皓残酷又暴虐，不及皇朝治世英明，兼并弱者，进攻昏庸。孙皓的子孙如果也和他一样，将不会称臣，局势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并非万分安定。我过去虽然多次说过，都没有变成皇帝的旨意。现在病体已经沉重，谨以尸体启奏。希望皇帝即时讨论，采取行动。”于是就封好上奏皇帝。皇帝下诏书传告说：“司空逝世，心中悲痛不已。又得到他上表的草稿，知道他虽已病危，仍不忘皇室，为国尽忠，为国担忧。感到更加悲痛，这件事应该与许多有贤德的人共同讨论。”

咸宁初期，裴秀与石苞等人都列为王公，在王室庙堂祭祀。裴秀有两个儿子：裴浚和裴颀。裴浚继承爵位，官至散骑常侍，去世较早。裴俊妾生的儿子裴憬不贤惠，另封他为高阳亭侯，让裴浚的弟裴颀继承爵位。（曹婉如 译）

【原文】

裴秀字季彦，河东闻喜人也。祖茂，汉尚书令。父潜，魏尚书令。秀少好学，有风操，八岁能属文。叔父徽有盛名，宾

客甚众。秀年十余岁，有诣徽者，出则过秀，然秀母贱，嫡母宣氏不之礼，尝使进饌于客，见者皆为之起。秀母曰：“微贱如此，当应为小儿故也。”宣氏知之，后遂止。时人为之语曰：“后进领袖有裴秀。”

渡辽将军毌丘俭尝荐秀于大将军曹爽，曰：“生而岐嶷，长蹈自然；玄静守真，性入道奥；博学强记，无文不该；孝友著于乡党，高声闻于远近。诚宜弼佐谟明，助和鼎味，毗赞大府，光昭盛化。非徒子奇、甘罗之侔，兼包颜、冉、游、夏之美。”爽乃辟为掾，袭父爵清阳亭侯，迁黄门侍郎。爽诛，以故吏免。顷之，为廷尉正，历文帝安东及卫将军司马；军国之政，多见信纳。迁散骑常侍。

帝之讨诸葛诞也，秀与尚书仆射陈泰、黄门侍郎钟会以行台从，豫参谋略。及诞平，转尚书，进封鲁阳乡侯，增邑千户。常道乡公立，以豫议定策，进爵县侯，增邑七百户，迁尚书仆射。魏咸熙初，厘革宪司。时荀颢定礼仪，贾充正法律，而秀改官制焉。秀议五等之爵，自骑督以上六百余人皆封。于是秀封济川侯，地方六十里，邑千四百户，以高苑县济川墟为侯国。

初，文帝未定嗣，而属意舞阳侯攸。武帝惧不得立，问秀曰：“人有相否？”因以奇表示之。秀后言于文帝曰：“中抚军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

武帝既即王位，拜尚书令、右光禄大夫，与御史大夫王沈、卫将军贾充俱开府，加给事中。及帝受禅，加左光禄大夫，封钜鹿郡公，邑三千户。

时安远护军郝诩与故人书云：“与尚书令裴秀相知，望其

为益。”有司奏免秀官，诏曰：“不能使人之不加诸我，此古人所难。交关人事，诤之罪耳，岂尚书令能防乎！其勿有所问。”司隶校尉李憺复上言，骑都尉刘尚为尚书令裴秀占官稻田，求禁止秀。诏又以秀干翼朝政，有勋绩于王室，不可以小疵掩大德，使推正尚罪而解秀禁止焉。

久之，诏曰：“夫三司之任，以翼宣皇极，弼成王事者也。故经国论道，赖之明哲，苟非其人，官不虚备。尚书令、左光禄大夫裴秀，雅量弘博，思心通远，先帝登庸，赞事前朝。朕受明命，光佐大业，勋德茂著，配踪元凯。宜正位居体，以康庶绩。其以秀为司空。”

秀儒学洽闻，且留心政事，当禅代之际，总纳言之要，其所裁当，礼无违者。又以职在地官，以禹贡山川地名，从来久远，多有变易。后世说者或强牵引，渐以罔昧。于是甄擦旧文，疑者则阙，古有名而今无者，皆随事注列，作《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奏之，藏于秘府。其序曰：

图书之设，由来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赖其用。三代置其官，国史掌厥职。暨汉屠咸阳，丞相萧何尽收秦之图籍。今秘书既无古之地图，又无萧何所得，惟有汉氏舆地及括地诸杂图。各不设分率，又不考正准望，亦不备载名山大川。虽有粗形，皆不精审，不可依据。或荒外迂诞之言，不合事实。于义无取。

大晋龙兴，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于庸蜀，采入其岨。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访吴蜀地图。蜀土既定，六军所经，地域远近，山川险易，征路迂直，校验图记，罔或有差。今上考禹贡山海川流，原隰陂泽，古之九州，及

今之十六州，郡国县邑，疆界乡阨，及古国盟会旧名，水陆径路，为地图十八篇。

制图之体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有图象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于山海绝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参而考之。然〔后〕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此之实定于〔准望，径路之实定于〕道里，度数之实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虽有峻山钜海之隔，绝域殊方之迥，登降诡曲之因，皆可得举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

秀创制朝仪，广陈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为故事。在位四载，为当世名公。服寒食散，当饮热酒而饮冷酒，泰始七年薨，时年四十八。诏曰：“司空经德履哲，体蹈儒雅，佐命翼世，勋业弘茂。方将宜献敷制，为世宗范，不幸薨殂，朕甚痛之。其赐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三十万、布百匹。谥曰元。”

初，秀以尚书三十六曹统事准例不明，宜使诸卿任职，未及奏而薨。其友人料其书记，得表草言平吴之事，其词曰：“孙皓酷虐，不及圣明御世兼弱攻昧，使遗子孙，将遂不能臣；时有否泰，非万安之势也。臣昔虽已屡言，未有成旨。今既

疾笃不起，谨重尸启。愿陛下时共施用。”乃封以上闻。诏报曰：“司空薨，痛悼不能去心。又得表草，虽在危困，不忘王室，尽忠忧国。省益伤切，辄当与诸贤共论也。”

咸宁初，与石苞等并为王公，配享庙庭。有二子：浚、颙。浚嗣位，至散骑常侍，早卒。浚庶子憬不惠，别封高阳亭侯，以浚少弟颙嗣。

刘 智 传

——《晋书》卷四一

【说明】刘智，西晋天文学家。生年不详，死于晋太康（公元 280—289 年）末年。他从一个贫寒的世家子弟成为德行纯正的儒者，后来作了朝廷重臣。

刘智根据《四分历》的方法，制订了一部历法，以泰始十年（公元 274 年）为历元，命名为《正历》。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称为《刘智历》。

《刘智历》每三百年比《四分历》减少一日，每年为 365.246 日，比《四分历》接近回归年的实际日数。但他说，自己所制历法的上元正是甲子朔日夜半冬至，此时日月五星的位置都在“星纪”。因此，他才真正找到了历法的开端。

（刘寔）的弟弟刘智，字子房，为人正派、素朴，具有兄长的品性。从小家里贫穷、简陋，常常去打柴谋生，但从不间断读书。终于作为一个儒者被人称道。历任中书、黄门、吏部郎，后调出做了颖川太守。平原管辂常常对人们说：“我和刘寔兄弟谈话，使人觉得精神振奋、思想清新，即是夜晚也不想睡。除此以外，即是在白天也想睡觉呢。”后来调回中央

做秘书监，兼南阳王的老师，后来又加封为散骑常侍，升任侍中、尚书，太常。著《丧服释疑论》，弄清了许多问题。太康（公元 280—289 年）末年去世，谥号为“成”。

（李 申 杨素香 译）

【原文】

（刘寔）弟智字子房，贞素有兄风。少贫窶，每负薪自给，读诵不辍，竟以儒行称。历中书黄门吏部郎，出为颍川太守。平原管辂尝谓人曰：“吾与刘颍川兄弟语，使人神思清发，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寝矣。”入为秘书监，领南阳王师，加散骑常侍，迁侍中、尚书、太常。著《丧服释疑论》，多所辨明。太康末卒，谥曰成。

皇甫谧传

——《晋书》卷五一

【说明】皇甫谧（公元 215—282 年），魏晋间著名医家。幼年名静，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肃灵台）人。年二十方发愤读书，随乡人席坦学习，勤学不倦。他家里贫穷，每每带着经书去干活，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成为当时著名的经学大师。他曾多次拒绝晋武帝的征召和乡人的举荐，在回答乡亲劝他应命去做官的《释劝论》中，指出了医学的重要性和他学习的决心。甘露（公元 256—260 年）年间他得了风痹症，更促使他发愤研读医书，于是习览经方，手不辍卷，遂臻至妙。他一生以著述为务，著作甚多，有《礼乐》、《圣真》诸论、《帝王世纪》、《玄晏春秋》、《年历》、《高士》、《列女》、《逸士》、《论寒食散方》、《针灸甲乙经》等。其中以《针灸甲乙经》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针灸甲乙经》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部针灸学专著。皇甫谧以《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为依据，采集和整理大量古代针灸文献资料，“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厘为十二卷”而成，命名为《针灸甲乙经》（又称《黄帝三部针经》、《黄帝针灸甲乙经》，简称《甲

乙经》)。该书问世后，一直被认为是学习针灸必读的古医籍，在国外，也有深远影响。日本早在奈良朝（公元710—784），就规定了《针灸甲乙经》为医学教育的必读教材之一。当今日本、朝鲜、法国等研究针灸学，仍以本书为主要参考资料。

《针灸甲乙经》对生理、病理、诊断、俞穴、治疗等针灸基本理论，作了系统的科学论述，它的产生，标志着针灸理论体系的确立与临床医疗实践的结合。《针灸甲乙经》的前六卷主要述针灸学的基本理论，后六卷为临床治疗部分。

皇甫谧，字士安，幼年名静，是安定朝那人，汉代太尉皇甫嵩的曾孙。皇甫谧出生后即过继给他叔父为子，随叔父迁居新安。他到二十岁还不好好学习，终日无节制的游荡，或有人以为他是呆傻人。曾经得到一些瓜果，即进呈给他的叔母任氏。任氏说：“《孝经》说：‘虽然每天用牛、羊、猪三牲来奉养父母，仍然是不孝之人。’你今年近二十，眼睛没有阅读过书本，心中不懂道理，没有什么可以安慰我的。”因此叹息说：“从前，孟轲的母亲迁居了三次，使孟子成为仁德的大儒；曾参的父亲杀猪使信守诺言的教育常存，难道是我没有选择好邻居，教育方法有所缺欠，否则你怎么会如此鲁莽愚蠢呢！修身立德，专心学习，是你自己有所得，我能得到什么呢！”因而面对皇甫谧涕泪交流。皇甫谧深受感动，并激发了他的志气，于是到同乡人席坦处学习，勤读不倦。他家很贫穷，他在亲自参加农业劳动时，每每带着经书去干活，以便在休息的时候能诵读，于是广泛的阅读了国家的重要文献和诸子百家学说。他性格沉静，很少欲念，开始有崇高的志

向，就以写作为事业，自号玄晏先生。著有《礼乐》、《圣真》等书。后来得了风痹症，仍不停的阅读和写作。

有人劝皇甫谧多和达官贵人交往，以博得好名声。皇甫谧认为“只有圣人才能出仕作官得到好名声，隐居田里也享有尧舜之道的美名，自己不是圣人，又何必接交达官贵人，为公事忙碌，然后得到名声呢”。他写《玄守论》来回答他们。说：

或有人对谧说：“人人都渴望得到富贵，人人都厌恶贫贱，为什么将自己的形体托付给贫穷而不想改变呢？况且有道的人所看重的是治理国家的学问，而一般的人则以及时享乐为美事。先生已年老齿衰，衣食亦不充裕，如为生计奔波死于溪谷，有谁会知道您呢？”

谧说：“人所最珍惜的是生命，修道所求的是形体的完备。生命和形体都不可为疾病所侵犯。若扰乱了形体以致损及性命，怎么能脱离贫贱而存富贵呢？我听说吃人家禄米的人就得分担人家的忧患，形体强壮的人尚不堪承受，何况我体弱多病呢！而且读书人经常是贫穷的，求道的人的确也常受到轻视，然处于贫穷之中而得到道的真谛，一辈子没有忧患，怎么能与为了追求富贵扰神耗精相比呢！另外，生时不为人知道，死时不被人惋惜，这样的人才是最得道的真谛的呀！聋哑的人，是天下最得道的人。一个人死了，天下的人都为他号啕大哭，因为他的死，对天下有很大的损失；有的人健在，全国的人都为之而欢欣鼓舞，因为他的健在，对全国人都有好处。然而，天下人的哭或笑，并不能使该死的人不死，该

生的不生。所以有至道至德的人，不会因外界影响而损益到他的死生。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体魄充实。如果为了挽回天下人的悲痛而去追求损害生命的名利，顺应全国人的心意去追求无益于身的富贵，这哪是道德的至高境界呢！只有不追求名利，才会无损于性命，身体就会更坚强；只有不求无益于身体的富贵，道行就会更深厚。身体坚强就不会损及生命，道行深厚就不会变浅薄。如果能保持坚实的身体，深厚的道行，将名利、富贵置之度外，看作只是形体表面的东西，那么我的道行是最完善的。”

于是，皇甫谧没有去做官。他潜心玩味经典册籍，甚至废寝忘食，故当时人说他是“书淫”。有人告诫他过于专心，将会耗损精神。皇甫谧说：“早晨学到了道理，黄昏死去也是值得的，何况生命的长短是上天预定的呢！”

叔父后来有了儿子，且已二十岁了，当时皇甫谧年四十，叔父儿子的生母去世了。于是皇甫谧回到了本宗。

城阳太守梁柳是皇甫谧父亲堂姊妹的儿子。当梁柳要去城阳赴任时，有人劝皇甫谧为他饯行。谧说：“梁柳未做官时探望过我，我都不出门迎送，吃饭也不过盐菜之类，贫穷的人不以酒肉来招待。现在他当了郡太守而以酒宴来饯行，是看重城阳太守的官职而看轻了梁柳本人，难道这符合古人的为人之道吗？那样做，我的心里会不安的。”

当时魏郡守曾召他充任上计掾，也曾举荐他为孝廉；景元初，相国也曾征召他，皇甫谧都不赴任。后来乡亲们都来劝他应召，他写了《释劝论》表达他的志向。该文辞说：

相国晋王征召我们三十七人，到泰始元年晋皇帝登位时，被征召的人都已到达，并都授予骑都尉之职，或赐以关内侯之爵位，有参预朝会的资格，受到如皇帝侍臣的待遇。只有我为疾病困扰，得不到国家的恩宠。同宗之人、父兄以及历次与我一起被征召的人们，都以为天下大庆，百姓有了依赖，我虽然没有参加登禅大典，也不应安于寝食，纵然有严重疾病，也应当投身效力。我仅以古今圣明王朝的制度为准则，无论事情大小，都要按具体情况而定，实在是力不从心，那里是怠慢呢！于是伏枕叹息说：“去当官的话，身份荣耀；退隐归家，可保全性命。如果我没有生病，躲避征召如巢父、许由之隐居箕山，尚且可以容忍，何况我实在是病重呢！所以在尧舜的时代，有识之人或隐迹于深山泽国，或如大禹过家门而不敢入。但咎繇之流却能出仕隐居两遂其愿，他们是遇到了好时机呀！所以，朝廷器重有功的臣子，百姓赞美实现自己志愿的有识之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哪！现今圣帝接位，皇朝兴旺，可与前代圣君明王同享盛名，皇帝的仁政是不会遥远的，我们也必然会遭逢古人那样的机遇。朋友或用一般的道理逼我去出仕做官，或因我不顺世情而为我担忧。我认为，上有宽容圣明的君主，下面一定有听从他旨意的人士，天网是那样的宽广，被罗入天网中或被遗留下来的人都是一样的，何以出仕的人要受到褒奖，而退隐的人要受到责难呢！”于是推究朋友和自己的言论，以解疑释难，命名为《释劝》。

朋友说：“听说天空日星高照才能导致光明，大地阴

阳通畅才能化生万物。所以黄钟按次序排列，律吕分形象正音。春天的花发萼开花，夏天才盛结果实，秋风逐去暑热，冬天才能结冰。人伦之道也是按照这个道理，顺应时机而发生发展。天地人相应，就像符契一样显明，故有识之士，或如在尧舜之时共同得到举用；或如伊尹为商汤迎于有莘；或如圣人为殷武帝夜梦所遇；或如姜太公渭水遇文王而舍弃垂钓；或如宁戚叩牛角而歌，得齐桓公之重用；或如伯里奚为秦缪公所赎，脱去布衣而事秦；或如郑子产甘冒毁谤使郑国安定；或如祈奚乘驷去见宣子以免叔向之罪；或如伍举与友蔡声子布荆坐地，共同商议归楚问题；或如张良从黄石处学得兵法知识。这些有识之士，都是遇到了明主，飞黄腾达，越格提升，声名日隆，远播四方，如清音充塞宇宙。由此看来，进取要及时抓住机会，为什么要屈志节而不伸展抱负呢？现在，以你的雄才大略，精于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又广泛研讨其他各种精微奥妙的道理有多年了。既然遇到了新帝接位之盛世，又逢取得禄利的时机，皇帝圣明，可以委属，同僚相遇，都是知己，这种清明的时代，正可以奋勇前进，大干一番，真是我们此生奋发有为、大展鸿图的时候。如果隐居山林，满腹才华没有显露，就像蛟龙潜藏于九泉之下，固执隐居念头，放弃了通向仕官之路，守着耿介之人的局限操守，不是与有道之士的志趣相违背吗？

而且，我听说招摇星辰晨昏交替运行是天体正常的表现，父母兄弟子次序有常则是人道安定。现皇帝的诏

命急切传来，委付地方官吏来谋画处理，而你不应召，则会招来上违背皇帝命令之罪，下使大家为之担忧。明智的人贵在随俗俯仰，又何必与众不同呢？许多贤士都随众出仕，你又何必固执己见？今天，和你一同被征召的人都已到京师，忙得饿了都顾不上吃饭，出仕朝庭，皆任高官，独你游息于陋屋，放浪形骸于世情之外，退隐于山林田院，鄙视荣华富贵，仁惠也不施于百姓，这种隐退行为并不合于至道，身为大病所困，性命难以保全。至如日神催促，星宿西坠，时光一去不复返，失去机会，后悔不及，还有什么登用可言！不在乎璧玉而珍视光阴，圣人们皆受此约束，而君命所召，来不及穿好衣服就赴任，是明智的人所遵守的规戒。你应该以古圣先贤之大法为借鉴，迎合圣朝虚心求贤的盛意，展开神灵的翅膀飞向凌云的天衢，到天池去洗濯鳞甲，推开天门，步入玉台，跨进紫宫的小门，陪伴着北辰，景况就大为改变，人才济济，如落英般繁荣。辅助唐虞一样的明主，教成如尧舜时期的风尚，宣布刑法搁置不用（无人再犯法）的政令，配以殷周时期的大臣，功勋将铭刻于景公钟上，以常理而论，在官则列鼎而食，不在官则为公卿大夫的家臣，不也都是美事吗！轻视黄金白银的光耀，忘却青紫之印绶，推辞尊贵的衣服，终年穿着破烂的粗布衣服，不苦吗？”

主人笑而答道：“嗨！你们可以说是只习惯于从表面看问题，隐士心理的深处就看不透了；只看到世俗之人的狭隘，就不明白圣皇宽广的胸怀，只郁循于规可以正

圆，矩可以正方，不知天地之大无所不包。所以说，天空幽远而清彻，大地宁静而广褰，天地包容万物、普被众生，我们生活于圣明之世，托天地之福。春天阳气上升而散发，冬天阴气下降而凝结，泰液池水含万物而化生光彩，元气未分，混沌为一，万物仰赖天地的化育，产生不同的发展规律和特性。所以，出仕为官的人享受朝廷的俸禄，隐退之士安居于山陵，寒来暑往顺序相移，四季遵循着一定规律交替而得其中，天地任运自然而动，形成物质世界的无穷变化。然而事物都是天然分定的，阳性的，阴性的，动的，静的都能按它们的本性正常发展。阴阳二气得以充分发挥作用，这就是所谓的大同；彼此没有抵触，没有乖迁，这就是至通。

至若春秋战国时期，狡诈的人，受到国君的重视；诚实的人，反而被视为无用，为权力而奔走，以利益求荣耀。故苏秦出使六国而说服六国纵合以抗秦，张仪则以连横政策游说六国与秦修好，赵国因有廉颇而名重于诸侯间，燕国则因乐毅将军的离去而衰弱，魏国因公叔没的离逝为齐、秦等国战败，孙臆受刖刑后为齐国所有，齐国得以安宁，越国任用范蠡、文种得称霸，楚王疏远了屈原为秦所颠覆。所以，国君的地位并不稳定，大臣也没有固定的名分，损仁义或以诚相待，有使国家衰败或强盛之别。冯谖弹剑而歌，感动了主人孟尝君；女宽说服魏舒，拒绝贿赂；项羽奋发拔山之力，仍兵败而自刎乌江；蒯通献策韩信与刘邦、项羽三分天下；东郭先生被田荣劫掠；颜阖以鲁王礼聘为耻而逃走。这种人皆是

背弃礼义丧失天真，是只图眼前朝夕荣辱的急性人，哪里是寻求事物规律变化的本性呢！

圣帝开创的王朝，功德可以和伏羲、神农并列，风化可和虞舜、夏禹媲美，希望柔和而舒畅，不希望分析明辨而相责；希望如水之滚滚渊源流长，不希望名声传播如荡涤之势；希望小心谨慎条分缕析地解决问题，不希望问题如同绳索结成死疙瘩而忧苦；希望知识广博无际，不希望窄而局限；希望人的道德深远谦退，初视未见而后明著，不希望明白显示如冰雪之洁白；希望用道德教化百姓，不希望事无巨细，一律绳之以法。所以见机而作的人，由于仕进而成其大功，喜欢隐居的人，也遂其所愿而不受强制。所以说，既懂得阳明也懂得阴暗，是懂得了天道之梗概；既知松弛，也知紧张，符合礼节的规定；知道世事的浮沉，也就兼得了道和礼的真谛。所以上有皇帝对有识之士谦恭接待之爱，下有并不出名的臣子；朝廷有聘用贤士的典礼，山野有避世的贤人。所以支伯以自己有幽忧之疾而拒绝唐尧的禅让，老子李耳乘牛车西去大秦，颜回以安居陋巷而成名，原思安于至贫而乐道，荣期以自己有三乐（指为人、为男和长寿为三乐）使孔子深为感动，黔娄终身为布衣不仕，段干木隐居守道于魏国，荆莱虽居江边仍有崇高志向，君平隐于卖卜，依耆龟以忠孝信义教人而有道名，四皓（指秦末束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四人，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故名四皓）有德，隐居于洛水之滨，郑真躬自耕种，世人钦佩他的清高，幼安避乱辽东，讲诗

书，明礼让，至今民人受到他的感化。这些人都保持着难以夺去的节操，坚持到底不回头的意志，遇到超俗的明主，便能成全他的志向。所以有能独自定计谋的人，就不与其他人商量；坚守不可动摇的信念，就不考虑众宾客的建议。因此，能放弃如同皇室戚属那样的华贵，追求内在道德的真谛，不走明显可达富贵的道路，而愿进入昏暗不明的世俗中，委婉随顺各种不同的情况，排除空虚寂寞而寄身于中，居住于没有事故发生的房屋，结交并不看重金钱利益的人。或轻如鸿毛，或重如泰山，损伤了他们，就得不到他们的辅助，而得到了他们，在实践中测试他们，更加觉得他们学识高深。这些人真是我们可以师法、可为表率的人。我因为疾病困扰而不能达到这一境界，你们议论我以前没有应召出仕作皇帝的‘侍臣’而使你们受到惊吓，我也怪你们只知计较寻常之理而不知折衷相处。

有才不为朝廷所用，会受到世人的责难；卧病多年，会为朝廷所抛弃。所以晋下军佐胥克患蛊疾，为正卿欲缺所废；伯牛生了病，孔子去探望时有所叹息‘这样的人竟生这样的病’。如黄帝创制了九针之经，岐伯有剖腹去肠之术，扁鹊经虢国而使太子起死回生，文挚用激怒法为齐王治病牺牲了生命，医和以医术显名于秦晋诸国，仓公阐发了汉皇秘典，华佗有独到的见识和精湛的技术，仲景制定的方剂流传后世。只恨我生不逢这些医家，故只好乞求申诉于圣明的皇帝之前。请求在朝廷簿录中去掉我的名字，原谅我抱病之体的痛苦，希望我诚恳之心

能感动上天，我在穷乡僻壤之处等待朝廷的罪责。”

后来武帝屡次下诏督促逼迫出仕朝廷，皇甫谧上书自称草野之臣说：“我因患尪痹症，迷恋道之旨趣，因为有病而归隐林泽山川之间，不熟习人伦礼法，常与鸟兽为伴。陛下到处求贤，连我这样不是贤人的人也被收取了。贤人皋陶脱去布衣当了官，不贤的人就远远的离开了朝廷。我只是个顽钝愚蠢的人，我吃晋王朝的粮食，享受着天下太平、击壤而歌的安乐生活，应该到京城去，在宫阙之外，高呼皇帝万寿无疆。而我因不良的品德，才招致灾祸，久为疾病所困，半个身子麻木不仁，右脚肌肉萎缩而变小，已有十九载。又因服寒食散，违背了服食的规则，反造成毒害，至今已有七年。盛冬时得袒露身体服食冰雪，暑天更觉烦闷，并伴有咳嗽气喘，或像患了温症，或又类似伤寒症，气急浮肿，四肢酸重。现在情况更为严重，生命危在呼吸之间，父兄见了离去，妻儿常待决别。如果迫于皇帝的权威乘车上路，则病痛更会加剧，所以只好不走仕进之路，将身待罪，俯伏枕上叹息。我听说《韶》、《卫》两种音乐不能同时演奏，《雅》、《郑》两种曲子也不能同时进奏，周时王叔（晋厉公）受离间计而杀郤子，自身反被牵连作为郤子同党而被捕；虞丘是贤者，但因多年未举荐贤良、斥退不肖为楚庄王夫人樊姬所讥笑（虞闻之而荐孙叔敖，楚得孙辅，三年而称霸）。所以，有地位的人和被统治者，在敬神典礼中用不同器皿，何况我这大麦糠皮的本质，怎能和菰米相糅和呢！一个平庸的人，穿着显贵的锦缎绸衣是不相称的。我听说与我一同被征召的人都已到达京师，只有臣我因有疾病，待罪床席，虽也贪图光明的前途，但惧怕

在路途丧命。即使我没有疾病，遇到这样的尧舜之世，我立志如巢父、许由高隐于箕山，亦应当可容忍。我听说上有圣明的皇帝，下就有敢于说出实情的大臣；上有宽容的政策，下就有能委婉表达心愿的人。只有陛下能留心才智之士和宽待我这样久病的人，希望能重新旌表奇才异能之士，从傅岩索请隐居的贤人，从渭水之滨请来（像姜子牙）垂钓的隐士，不使泥滓久久的混杂于清流之中。”皇甫谧的恳切言词，终于获得了准许。

过了一年多，又被举荐贤良方正，都不去。自己上书给皇帝要求借书，皇帝送给他一车书。他虽然患有重病，仍勤读不已。开始服寒食散，因身体素质与药性相抵触，常常困顿疲惫不堪，曾悲愤而想伏刃自杀，经他叔母劝阻而止。

济阴太守四川人文立，上书皇帝，认为任命贤士送礼物很麻烦，请求免去礼物币帛，皇帝下令从其所请。谧听说后叹息道：“亡国的大夫，不可和他计议国家存亡的大事，用他的建议，革除历代相传制度，怎么可以呢！用小小的束帛来作为聘用的礼节，是《易经》明确规定的，用玄色的玉帛征聘，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制度。所以孔子宣称夜以继日的努力学习以待前来请教的人，有道之儒者，就像宴席上的珍馐，等待帝王的召聘。真正的儒者，经过王者的三揖，方才进而出仕，说明招致贤士之难；一有微词诘责，便引身而退，说明贤士离去的容易。如殷汤礼聘伊尹，文王对于姜太公，或聘迎于莘之野，即任以国政；或载与俱归即立为军师，都只恐怕礼仪不够隆重，怎么会吝啬其花费之大呢！而且一种聘礼不具备，贞节的女子即觉得是一种耻辱，何况著名的贤士呢！

孔子说：‘赐呀！你爱的是羊，我爱的是礼仪’，放弃了礼会怎样呢？朝廷丧失贤士，就在于这种情况。

咸宁（公元 275—280 年）初年，又下诏说：“皇甫谧从容不迫，朴实自重，坚持学习，喜好古文献典籍，与世俗之人有完全不同的志趣，故任命谧为太子中庶事。”皇甫谧以病重固辞。开始，皇帝并不勉强他改变志向，不久以后又下诏征辟皇甫谧为议郎，后又补任命为著作郎。司隶教尉刘毅请任命皇甫谧为功曹，皇甫谧都不应允。写了有关葬送制度的论著，命名为《笃终》。说：

玄晏先生认为生死是大自然的规律，人理的必然趋势。按礼规定，六十岁时就制定寿具，直到九十岁，寿具各有不同的等级差别，在平日就准备好以防终日的到来，这哪里是世俗多忌讳的呢！我年令虽未到六十，然而为疾所困已十多年，屡次遇到丧亡的危难，精神形体都遭到损伤，濒危已多次了。我常常恐惧不知何时就夭寿而终，忧虑身后之事平时没有准备，所以大略地陈述我对葬送的真诚看法。

人所贪恋的，是生存；所厌恶的，是死亡。但虽然贪生，也不可能越过寿命期限；虽怕死，也不可能逃脱。人死了，精神活动停止，形体腐败消散，魂魄如大气一样，无处不到，所以气属于天，寄托于形体的生命终会达到极限，最终的尸体，应返回原来的真寂，所以，尸体应埋藏于地。神如果不再存在于人体，则与大气同升降；尸体不能长久的保存，则与大地合为一体。形体与神是不会不相合的，这与天地的性质一样；尸体与大地

合并，是返于本来真寂的至理。今天活着尚且不能保护七尺的躯体，为什么死了要隔上一个棺木呢？死后穿的衣衾反到肮脏了尸体，所用棺槨反使与大自然（土地）隔绝，所以桓司马自为石槨，三年未成，孔夫子说，还不如速朽为好；季孙与美玉同葬，就如暴露尸骸一般；华元等厚葬宋文公，《春秋》认为他们的行为不是臣子所为；杨王孙遗嘱裸葬，《汉书》认为他的这种做法远较秦始皇贤明。如果认为灵魂必定有知觉，则人与鬼虽有不同制度，但在黄泉的亲戚较活着的人多，他们必将会准备器物，用来接待死亡的人。今天若用活着的人的想法来比拟死了的人的思想，那就不是灵魂本来的意思了。如果灵魂本来就无知觉，则厚葬就是白白夺去活人的东西，消耗在毫无益处的死人身上，而且使奸诈之人生心盗取，反到招致暴露尸骸之祸，增加对死者的毒害。

葬的意思是藏。藏，是不想让人看见。而大做棺槨，又将生时的物品用来陪葬，就好像在路边埋了金子又写说明书在上面一样。虽然是极其愚蠢的人，也会笑话的。以丰厚的财宝厚葬死者使奸人生偷盗之心，或是打破棺材；或将尸体牵拽；或割断胳膊取下金镯；或按摸肠子探求珠玉。这种剖棺盗金玉，比之烧杀之刑，不更为惨痛吗？自古至今，没有不死的人，也没有不被发掘的坟墓。故张释之说：“假使其中有利可图，虽把棺槨封锢在南山的下面，还是有隙可钻的；假使其中无利可图，即使没有石棺槨，又有什么可发愁的呢！”这话实在是表述得很全面的，真可为我的老师。对死者加以厚葬，并不

是对死者的优待，而是活着的人自己要这么作，遂作出对生者死者都毫无益处的厚葬，使死者失去回归大自然的机会，聪明的人是不这么干的。《易经》说：“古代的葬法，以草覆盖死者，葬于荒野之中，也不积土为坟，也不种树以标其处。”所以死者能回归大自然，也不会伤害生者。

所以我希望早晨死，黄昏就葬；黄昏死，早晨就葬，不备棺木，不用布帛缠裹，不修饰，不沐浴，不缝制新衣服，口中珠玉也一概不用。我本来想裸体入坑，身体直接与土接触，恐怕亲人受世俗影响已久，要立时革除这种习俗很难，所以我今天粗略定下规矩。奢侈不过石椁，收敛只要不裸身体。气绝以后，即穿当时穿的衣服，以及过去用的旧幅巾，用粗席裹上尸体，用麻绳捆住尸首两头，将尸体停放床上。选择不能长粮食的地，挖深十尺、长一丈五尺、宽六尺的坑。挖坑完毕，将床抬到坑边，抽去床，将尸体下到坑中。生平所用之物，都不用随葬，只需带着《孝经》一卷，以表示不忘孝道，粗席之外，便直接接触土地。坑中土填到与周围地平，然后种上以前原有的草，使草继续生长在上面，不种树木、不芟除上面的杂草，使无迹象可知葬处，自己寻求也不能知道。不见可图之利，则奸人不会生偷盗之心，自始至终都不用恐惧，一千年也不需忧虑。尸体与大地融合，魂灵与元气合一，真是厚爱到极点。如果死亡日子有前后，不应该将后丧合前丧。祔葬的礼节自周公以后开始，并不是古代就有的制度。虞舜死后葬于苍梧之野，他的

二个妃子并没与他葬在一起，如果认为是一定之理，那何必有周礼呢。不需请教师工，不信卜筮之人，不拘泥于世俗之言，也不设置神主牌位，不要在十五日内早晚上供祭祀。祭祀不需到墓前，只须于每月初一日在家上供，一百日而止。上供也只需在日出前漏三刻和日入后漏三刻，不得在深夜。日常在家穿丧服，不需到坟屋去居住。古代并不崇尚构筑坟墓，是明智的作法。今天积土为坟，种树以标其处，都是愚蠢的。若不遵从我这规矩去做，是戮尸于地下，使死者又一次受到损伤。如果灵魂有知，必定冤恨悲伤不止，长久为抱恨之鬼。王孙子弟，可以以此为诫。死者的誓言是不可违背的，希望不要改变。

皇甫谧终究还是没去做官。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去世，当时年六十八岁。子童灵、方回等能遵其遗嘱去做。

皇甫谧著诗、赋、诔、颂、论、难六种文体的诗文甚多，还撰《帝王世纪》、《年历》、《高士》、《逸士》、《列女》等传及《玄晏春秋》等书，皆为世人所重视。门人挚虞、张轨、牛综、席纯，都为晋代著名的大臣。（傅芳译）

【原文】

皇甫谧，字士安，幼名静，安定朝那人，汉太尉嵩之曾孙也。出后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学，游荡无度，或以为痴。尝得瓜果，辄进所后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经》云：‘三牲之养，犹为不孝’。汝今年余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无以慰我。”因叹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岂我居不卜邻，教有所阙，何尔鲁钝之甚也！修

身笃学，自汝得之，于我何有！”因对之流涕。谧乃感激，就乡人席坦受书，勤力不怠。居贫，躬自稼穡，带经而农，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沈静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为务，自号玄晏先生。著《礼乐》、《圣真》之论。后得风痺疾，犹手不辍卷。

或劝谧修名广交，谧以为“非圣人孰能兼存出处，居田里之中亦可以乐尧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后为名乎。”作《玄守论》以答之，曰：

或谓谧曰：“富贵人之所欲，贫贱人之所恶，何故委形待于穷而不变乎？且道之所贵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时也。先生年迈齿变，饥寒不赡，转死沟壑，其谁知乎？”

谧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扰全道以损性命，安得去贫贱存所欲哉？吾闻食人之禄者怀人之忧，形强犹不堪，况吾之弱疾乎！且贫者士之常，贱者道之实，处常得实，没齿不忧，孰与富贵扰神耗精者乎！又生为人所不知，死为人所不惜，至矣！暗聾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号者，以为损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为益也。然则号笑非益死损生也。是以至道不损，至德不益。何哉？体足也。如回天下之念以追损生之祸，运四海之心以广非益之病，岂道德之至乎！夫唯无损，则至坚矣；夫唯无益，则至厚矣。坚故终不损，厚故终不薄。苟能体坚厚之实，居不薄之真，立乎损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则我道全矣。”

遂不仕。耽玩典籍，忘寝与食，时人谓之“书淫”。或有箴其过笃，将损耗精神。谧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况命之修短分定悬天乎！”

叔父有子既冠，谧年四十丧所生后母，遂还本宗。

城阳太守梁柳，谧从姑子也。当之官，人劝谧饯之。谧曰：“柳为布衣时过吾，吾送迎不出门，食不过盐菜，贫者不以酒肉为礼。今作郡而送之，是贵城阳太守而贱梁柳，岂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

时魏郡召上计掾，举孝廉；景元初，相国辟，皆不行。其后乡亲劝令应命，谧为《释劝论》以通志焉。其辞曰：

相国晋王辟余等三十七人，及泰始登禅，同命之士莫不毕至，皆拜骑都尉，或赐爵关内侯，进奉朝请，礼如侍臣。唯余疾困，不及国宠。宗人父兄及我僚类，咸以为天下大庆，万姓赖之，虽未成礼，不宜安寝，纵其疾笃，犹当致身。余唯古今明王之制，事无巨细，断之以情，实力不堪，岂慢也哉！乃伏枕而叹曰：“夫进者，身之荣也；退者，命之实也。设余不疾，执高箕山，尚当容之，况余实笃！故尧舜之世，士或收迹林泽，或过门不敢入。咎繇之徒两遂其愿者，遇时也。故朝贵致功之臣，野美全志之士。彼独何人哉！今圣帝龙兴，配名前哲，仁道不远，斯亦然乎！客或以常言见逼，或以逆世为虑。余谓上有宽明之主，下必有听意之人，天网恢恢，至否一也。何尤于出处哉！”遂究宾主之论，以解难者，名曰《释劝》。

客曰：“盖闻天以悬象致明，地以含通吐灵。故黄钟

次序，律吕分形。是以春华发萼，夏繁其实，秋风逐暑，冬冰乃结。人道以之，应机乃发。三材连利，明若符契。故士或同升于唐朝，或先觉于有莘，或通梦以感主，或释钓于渭滨，或叩角以干齐，或解褐以相秦，或冒谤以安郑，或乘驷以救屯，或班荆以求友，或借术于黄神。故能电飞景拔，超次迈伦，腾高声以奋远，抗宇宙之清音。由此观之，进德贵乎及时，何故屈此而不伸？今子以英茂之才，游精于六艺之府，散意于众妙之门者有年矣。既遭皇禅之朝，又投禄利之际，委圣明之主，偶知己之会，时清道真，可以冲迈，此真吾生濯发云汉、鸿渐之秋也。韬光逐藪，含章未曜，龙潜九泉，磴焉执高，弃通道之远由，守介人之局操，无乃乖于道之趣乎？

且吾闻招摇昏回则天位正，五教班叙则人理定。如今王命切至，委虑有司，上招迁主之累，下致骇众之疑。达者贵同，何必独异？群贤可从，何必守意？方今同命并臻，饥不待餐，振藻皇涂，咸秩天官。子独栖迟衡门，放形世表，逊遁丘园，不睨华好，惠不加人，行不合道，身婴大疾，性命难保。若其羲和促轡，大火西，临川恨晚，将复何阶！夫贵阴贱璧，圣所约也；颠倒衣裳，明所箴也。子其鉴先哲之洪范，副圣朝之虚心，冲灵翼于云路，浴天池以濯鳞，排阊阖，步玉岑，登紫阁，侍北辰，翻然景曜，杂沓英尘。辅唐虞之主，化尧舜之人，宣刑错之政，配殷周之臣，铭功景钟，参叙彝伦，存则鼎食，亡为贵臣，不亦茂哉！而忽金白之辉曜，忘青紫之班璘，辞容服之光粲，抱弊褐之终年，无乃勤乎？”

主人笑而应之曰：“吁！若宾可谓习外观之晖晖，未睹幽人之仿佛也；见俗人之不容，未喻圣皇之兼爱也；循方圆于规矩，未知大形之无外也。故曰：天玄而清，地静而宁，含罗万类，旁薄群生，寄身圣世，托道之灵。若夫春以阳散，冬以阴凝，泰液含光，元气混蒸，众品仰化，诞制殊征。故进者享天禄，处者安丘陵。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阴阳不治，运化无穷，自然分定，两克厥中。二物俱灵，是谓大同；彼此无怨，是谓至通。

若乃衰周之末，贵诈贱诚，牵于权力，以利要荣。故苏子出而六主合，张仪入而横势成，廉颇存而赵重，乐毅去而燕轻，公叔没而魏败，孙臆刖而齐宁，蠡种亲而越霸，屈子疏而楚倾。是以君无常籍，臣无定名，损义放诚，一虚一盈。故冯以弹剑感主，女有反赐之说，项奋拔山之力，蒯陈鼎足之势，东郭劫于田荣，颜阖耻于见逼。斯皆弃礼丧真，苟荣朝夕之急者也，岂道化之本与！

若乃圣帝之创化也，参德乎二皇，齐风乎虞夏，欲温温而和畅，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玄流，不欲荡荡而名发也；欲索索而条解，不欲契契而绳结也；欲芒芒而无垠际，不欲区区而分别也；欲粼粼而日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琐琐而执法也。是以见机者以动成，好遁者无所迫。故曰：一明一昧，得道之概；一弛一张，合礼之方；一浮一沉，兼得其真。故上有劳谦之爱，下有不名之臣；朝有聘贤之礼，野有遁窜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迹于西邻，颜氏

安陋以成名，原思娱道于至贫，荣期以三乐感尼父，黔娄定谥于布衾，干木偃息以存魏，荆莱志迈于江岑，君平因蓍以道著，四皓潜德于洛滨，郑真躬耕以致誉，幼安发令乎今人。皆持难夺之节，执不回之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独定之计者，不借谋于众人；守不动之安者，不假虑于群宾。故能弃外亲之华，通内道之真，去显显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尘，宛转万情之形表，排托虚寂以寄身，居无事之宅，交释利之人。轻若鸿毛，重若泥沉，损之不得，测之愈深。真吾徒之师表，余迫疾而不能及者也。子议吾失宿而骇众，吾亦怪子较论而不折中也。

夫才不周用，众所斥也；寝疾弥年，朝所弃也。是以胥克之废，丘明列焉；伯牛有疾，孔子斯叹。若黄帝创制于九经，岐伯剖腹以蠲肠，扁鹊造虢而尸起，文挚殉命于齐王，医和显术于秦晋，仓公发秘于汉皇，华佗存精于独识，仲景垂妙于定方。徒恨生不逢乎若人，故乞命诉乎明王。求绝编于天录，亮我躬之辛苦，冀微诚之降霜，故俟罪而穷处。”

其后武帝频下诏敦逼不已，谧上疏自称草莽臣曰：“臣以尪弊，迷于道趣，因疾抽簪，散发林阜，人纲不闲，鸟兽为群。陛下披榛采兰，并收蒿艾。是以皋陶振褐，不仁者远。臣惟顽蒙，备食晋粟，犹识唐人击壤之乐，宜赴京城，称寿阙外。而小人无良，致灾速祸，久婴笃疾，躯半不仁，右脚偏小，十有九载。又服寒食药，违错节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当暑烦闷，加以咳逆，或若温疟，或类

伤寒，浮气流肿，四肢酸重。于今困劣，救命呼吸，父兄见出，妻息长诀。仰迫天威，扶輿就道，所苦加焉，不任进路，委身待罪，伏枕叹息。臣闻《韶》《卫》不并奏，《雅》《郑》不兼御，故郤子入周，祸延王叔；虞丘称贤，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礼不同器，况臣糠粃，糲之雕胡？庸夫锦衣，不称其服也。窃闻同命之士，咸以毕到，唯臣疾疢，抱衅床蓐，虽贪明时，惧毙命路隅。设臣不疾，已遭尧舜之世，执志箕山，犹当容之。臣闻上有明圣之主，下有输实之臣；上有在宽之政，下有委情之人。唯陛下留神垂恕，更旌瑰俊，索隐于傅岩，收钓于渭滨，无令泥滓，久浊清流。”谥辞切言至，遂见听许。

岁余，又举贤良方正，并不起。自表就帝借书，帝送一车书与之。谥虽羸疾，而披阅不怠。初服寒食散，而性与之忤，每委顿不伦，尝悲悲，叩刃欲自杀，叔母谏之而止。

济阴太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贄为烦，请绝其礼币，诏从之。谥闻而叹曰：“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而以革历代之制，其可乎！夫‘束帛戈戈’，《易》之明义，玄纁之贄，自古之旧也。故孔子称夙夜强学以待问，席上之珍以待聘。士于是乎三揖乃进，明致之难也；一让而退，明去之易也。若殷汤之于伊尹，文王之于太公，或身即莘野，或就载以归，唯恐礼之不重，岂吝其烦费哉！且一礼不备，贞女耻之，况命士乎！孔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弃之如何？政之失贤，于此乎在矣。”

咸宁初，又诏曰：“男子皇甫谧沈静履素，守学好古，与流俗异趣，其以谧为太子中庶子。”谧固辞笃疾。帝初虽不夺

其志，寻复发诏征为议郎，又召补著作郎。司隶校尉刘毅请为功曹，并不应。著论为葬送之制，名曰《笃终》。曰：

玄晏先生以为存亡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故礼六十而制寿，至于九十，各有等差，防终以素，岂流俗之多忌者哉！吾年虽未制寿，然婴疾弥纪，仍遭丧难，神气损劣，困顿数矣。常惧天陨不期，虑终无素，是以略陈至怀。

夫人之所贪者，生也；所恶者，死也。虽贪，不得越期；虽恶，不可逃遁。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无不之，故气属于天；寄命终尽，穷体反真，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体，则与气升降；尸不久寄，与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与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之躯，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则衣衾所以秽尸，棺槨所以隔真，故桓司马石槨不如速朽；季孙玃璠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为华元不臣；杨王孙亲土，《汉书》以为贤于秦始皇。如令魂必有知，则人鬼异制，黄泉之亲，死多于生，必将备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况终，非即灵之意也。如其无知，则空夺生用，损之无益，而启奸心，是招露形之祸，增亡者之毒也。

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见也。而大为棺槨，备赠存物，无异于埋金路隅而书表于上也。虽甚愚之人，必将笑之。丰财厚葬以启奸心，或剖破棺槨，或牵曳形骸，或剥臂捋金环，或扞肠求珠玉。焚如之形（刑），不痛于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无不发之墓也。故张释之曰：“使其中有欲，虽固南山犹有隙；

使其中无欲，虽无石椁，又何戚焉！”斯言达矣，吾之师也。夫赠终加厚，非厚死也，生者自为也。遂生意于无益，弃死者之所属，知者所不行也。《易》称：“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是以死得归真，亡不损生。

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设棺椁，不加缠敛，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殓含之物，一皆绝之。吾本欲露形入坑，以身亲土，或恐人情染俗来久，顿革理难，今故粗为之制。奢不石椁，俭不露形。气绝之后，便即时服，幅巾故衣，以藁簑裹尸，麻约二头，置尸床上。择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长一丈五尺，广六尺，坑讫，举床就坑，去床下尸。平生之物，皆无自随，唯赍《孝经》一卷，示不忘孝道。藁簑之外，便以亲土。土与地平，还其故草，使生其上，无种树木。削除，使生迹无处，自求不知。不见可欲，则奸不生心，终始无怵惕，千载不虑患。形骸与后土同体，魂爽与元气合灵，真笃爱之至也。若亡有前后，不得移柩。柩葬自周公来，非古制也。舜葬苍梧，二妃不从，以为一定，何必周礼。无问师工，无信卜筮，无拘俗言，无张神坐，无十五日朝夕上食。礼不墓祭，但月朔于家设席以祭，百日而止。临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树，愚也，若不从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伤。魂而有灵，则冤悲没世，长为恨鬼。王孙之子，可以以为诫。死誓难违，幸无改焉！

而竟不仕。太康三年卒，时年六十八。子童灵、方回等遵其

遗命。

谧所著诗赋诔颂论难甚多，又撰《帝王世纪》、《年历》、《高士》、《逸士》、《列女》等传、《玄晏春秋》，并重于世。门人挚虞、张轨、牛综、席纯，皆为晋名臣。

束 皙 传

——《晋书》卷五一

【说明】束皙（公元 262—301 年），字广微。大约生于公元 261—262 年，死于公元 301 年左右。是西晋初年著名的学者、是文学家和天文学家。他参与整理魏安厘王墓出土的竹书，在学术上多有贡献。在天文学上的贡献主要是解释早上、中午太阳离人的远近问题。

束皙字广微，阳平元城人，是汉朝太子太傅疏广的后代。王莽末年，疏广的曾孙孟达为了避难，从东海迁徙到沙鹿山南面，因此将姓“疏”字，去掉了“疋”字旁，于是就改姓束。祖父束混，是陇西的太守。父亲束龛，是冯翊太守，都很有名气。

束皙博学多识，和兄长束璆都很有名。小时到国学里学习，有人问博士曹志：“当今谁最好学？”曹志说：“阳平的束广微好学不知疲倦，没有人能比得上的。”回到家乡，被察为孝廉，举为茂才，他都没有应召。他哥哥束璆娶石鉴的侄女为妻，后来又将她丢弃，石鉴很生气，就告诉州郡官府不得聘任束璆。束皙也因此久久不得作官。

太康(公元281—289年)年间,郡里大旱,束皙为家乡人民求雨,第三天,果然下了瓢泼大雨,众人都说是束皙的精诚感动了上帝,为他作歌唱道:“束先生,通神明,请求上帝三日,甜美的雨水飘零。我们的黍子可发育,我们的谷子可长成。怎么报答他呢?祝他不老长生。”束皙和卫恒交情深厚,听说卫恒遇祸去世,就从本郡到卫恒家去吊丧。

束皙曾著《劝农》及《饼》等赋,文词粗俗、平淡,被当时的人们瞧不起。而他的性格谦和退让,潜伏不外露,不求荣华利禄,著《玄居释》来模仿《客难》,文章这样写道:

束皙闲坐厅堂,弟子罗列两旁。正要放下帷帐,认真撰考文章,倚案运气清嗓。吮笔润毫,铺陈词藻,考证异同,撰写高论。旁边的人上前一步问道:“我听说,大道贵在变化圆通,懂道的人可应付无穷。世道混乱,就拯救它的纷扰;天下太平,就扶助它的隆盛。整顿起天然纲纪,以帮助政务的千头万绪;快乐如五帝的时代,发扬那三皇的世风。活着普天下都高兴他的存在;死后所有人都哀悼他的命终。所以君子委屈自己发扬大道,不以主动参与而羞耻。上国有不追求怎能得到的话语,《周易》有跃起以求进取的词句;有莘氏的老者伊尹扛上铜鼎用作饭的道理去游说商汤,齐国的宁戚在大路旁唱《白水》之歌以求感动桓公。如今先生沉浸于大道,潜心于学术,巍然若高山耸立,研深能通达精微,博览有深刻独见。夜里忘掉了睡眠;白天思想也驰骋高远去深思,历经一年又一年,志气高昂不衰减。鳞甲羽翼丰满却更加伏卧不动,学术精优却不去用世。而是想合上箱盖,辞

去议价，蟠居泥淖，藏而不露，永远收敛那琳琅四射的光芒，藏身在穷山恶水之间。正当尧舜的时代却去羡慕隐士长沮，在治理有方的国家却和宁武的作法相反。学问如此渊博，处世却如此迷惑，愚拙的我对此不以为然。

如果士人升迁必须有人提携，作官必须自己营求，趋炎附势之流就会全被提拔，而山林隐居的贤人就无法得到任用。宫院庭府走的都是纨绔子弟，荒山野岭留下的有白发的老叟。为何不通过冯子都请求霍光的提拔，站在船头泛舟于洪流，脚踏彩云使潜伏的蛟龙害怕，放射光芒让深藏的小鱼惊游。徒然蟠居于泥淖陷阱，眼看着有通天大道不走，学问深厚而身外穷困，为什么要守这僻地荒丘。

况且年岁不会照顾谁，时光就象快马飞奔，有去无回。机会难以得到，却容易失去。先生难道不知《周易》有“犹豫就会后悔的”爻词，忘了交友就应抓紧进行的句子。并不是要让你登临海岸去抑制那东流的江河，站在虞泉边上去招回那西山的落日。只是由于你胆小蜷曲成了枷锁，自己把儒学作成了桎梏；把伟大高尚的道囚禁在斗室之中，使身体在茅屋草棚之中受苦。怎能比得上托身于权臣贵戚，凭借那官势威力，选择那茂盛的芳林栖身，想飞不必用自己的双翼。夜宿有七位美女作陪，早上享有五座大鼎供奉美食。整顿朝纲使天下太平，扶助五常使法令贯通。这比起你吃糠咽菜，一辈子自己隐匿起来不求进取怎么样呢？”

束皙答道：“坐下，我要用君子之道开导你，向你说

明处世的道理，你要正正经经地接受教导，恭恭敬敬地听我述说我的志趣。

当初混沌始开，天地并立，太阳晚上隐退，月亮白天敛迹；长羽毛的在森林中飞翔，子在泥沼中摆尾；事物都按自己的本性安居，士人则以坚持志向为乐。有的抛弃荣华富贵住进深山石洞，有的推开喷香的小门去追求发迹。在野的，像龙的潜伏；在朝的，像凤的群集。虽然事迹不同，但都坚守大道，没有贵贱之分。一定要安于自己的本业，不要互相羡慕。后稷和殷契奋力发挥才能去贯彻大道，巢父和许由洗了耳朵去逃避禅让。他们都留下了不朽的名声，一起登上了那贤人之榜。比较他们的名誉，谁优谁劣？何必贪恋与那两代八位用世的贤人为伍，而不愿与那七位隐士同类呢？况且道的表现，相反其实相通，士人的志向各不相同，我就是要排在那隐居者的队尾，不能听从您的高论。连那为聘请我而用草裹轮的车子都不屑看，那里还谈得上攀附权臣贵戚呢？

昔日周朝、汉朝衰落，那样的时代难以存活。当你看到福的苗头，跟来的就是灾祸。早上你徜徉在巍峨的宫殿之中，晚上就会掉进那怪石嶙峋的沟壑；白天欢笑夜里悲叹，早上花开黄昏花落；忠诚不能保全自己，灾祸的到来难以琢磨。所以士人都不愿作官，争先恐后地奔赴山野。有的故意糟践自己的名誉；有的坚持不吃朝廷的俸禄。把从政者看成被装进锦盒剔了肉的乌龟，把作官看作祭祀时用作牺牲的牛犊，公孙弘痛哭流涕要辞去宰相，杨雄在朝廷之上论述归隐的好处。

现在伟大的晋朝祥和兴盛，天地之间太平安静，蜂儿收起了自己的毒刺，虎豹收敛起自己的兽猛，各种刑罚不再使用，美妙的音乐盈耳动听。君主没有野蛮无理的愤怒，臣子没有钻营禄位的申请，上下和谐相处，守礼安分，唯道是从。朝廷里有能角触坏人的神兽，宫殿旁有指示奸佞的灵草；忠诚可以使你避免灾祸灭顶，顺从可以使你保全俸禄恩宠。

是啊，进取并没有危险，而我却一心追求寂寞安闲，只是顺从自己的本性。两种选择都是对的，之所以舍弃那一方，而对这一方有兴趣，是为了服从自己的志向。再说，无为可以解除天下的纠纷，淡泊可以救国家于危难；在职的难于事事都办得好，建议的也有些话不被采纳。翟璜不能将西来的侵略者驱逐，陈平、周勃也不能使刘如意登上皇位。段干木安卧家中却使秦师退避，四皓应聘就使戚姬泣悲。象这些事情应舍弃什么坚持什么，应何去何从呢？难道能说山岭上的林木就芳香，谷底的野草就只有臭气！守本分顺本性，只是由于天然禀赋。鸟儿不向乌龟借甲壳，鱼儿不向野兽借脚走；又何必嘲笑孤竹（伯夷叔齐）的贫穷，羡慕齐景公的富有！以无官为耻而放纵欲望，愿意穿华丽的皮裘与锦绣。如果能约束自己，只有一石粮食的储蓄也会觉得富足；假若放纵欲望，就是山海一样的财富也会觉得不够。有高尚道德的人，身为普通百姓也同样荣耀；忘记了伦理道德的人，即是作万乘的君主也同样的耻辱。我将要研究六经来教导世人，信守寂寞来压制歪风；到海角与郑玄老人作伴，到

偏僻的蜀地与严遵先生相从。况且有人把太空当作使万物运转的车子，把墓地看作繁华的闹市，我要使灵魂在不争的林子里遨游，使心房成为“无追求”的境地。荣华利禄不能弄乱我的清醒，深深的忧愁不能干扰我的美梦。抛弃那夸耀贪恋的荣华，拣起那急于求进者抛弃的道德，除去那圣人典籍中的杂草，使所有的言论统一于最高的大道，在山丘田园之中保持我鞋子的素白，背朝着那些官服而长久隐居，请您在千年以后来考察我的学业，不必把我今天的话信以为实。”

张华见了他的文章，大为惊奇。石鉴死，王戎就征召束璆，张华也任命束皙作自己的助手，后来又被司空、下邳的王晃征召。张华作司空，又任命他在刑部供职。

当时要发展农业，束皙发表议论说：

“我拜读了诏书，由于府库空虚，关内饥荒，要大力发展农业，以求粮食丰产，这真是虞舜勉励大禹努力的意思。然而农业丰收是可以作到的，其途径有三条：第一，天时要不出差错，第二要不失去地利，第三要充分发挥人力。如果真是春季没有雨水，秋季又大雨滂沱，水旱不均，到处祈雨。即使让羲和来管理政事，后稷亲自务农，使地界明确，杂草不生，也不能使仓库有千万石的蓄积。但地利可以由人的智谋产生，人力可以督促招致。诏书的意思，是要尽到这个努力的吧。

如今天下的城池数以千计，吃闲饭的人多，他们放弃本业，不事生产，没有租税的负担。统计全国，亏空的租税当数以万计。可以严格申明这个界限，让有关部

门认真检察。一个人不交租税，郡县长官要受处罚，这样人力就可以从事农业。

又每州管十郡，地少人多，河南中原一带尤其如此，但猪羊和牛马的牧场到处都有，应完全废除，让那些无田的人耕种。地少的人家，虽然有人不断分出迁往他处，但在家的还不少。那些牧人不愿在荒郊野外，他们贪恋于人间繁华之地，所以都说北部不适宜放牧，这是不对的。查古今以来的说法，都认为马的产生，在河北北部。大批的牧羊，都来自渤海一带。放猪的歌谣，起源于钜鹿，这就是证据。可以把所有的牧人都迁到那里，充实那里的土地。让马牛猪羊在空旷而没有庄稼的地里吃草。吃闲饭的人得到了由国家分配的土地。这是地利可以得到充分利用的。过去鲁僖公让马匹处于郊外的旷野，史克因此称颂他，老子认为让马儿耕田才是有道的国家，大约是因为利益所在吧。又比如汲郡的吴泽，良田几千顷，但由于泥沼遍地，人们不能耕种。听当地人说，都认为排水的工程并不困难。排掉盐碱成为良田，获利很大。但豪强大族，却因为这样一来捕不到丰盛的鱼虾，就编造各种理由说服地方官，到底使污水不能放掉。这也是‘谷口’一类的歌谣，史书上就有记载。我认为应再让各地讨论，详细制订今天的办法。荆州、扬州、兖州、豫州，沼泽之地，沟渠堤岸的便利，一定多有类似这种情况的，这最是不必等待天时就可获得丰收的。因为这些地方的云雨产生于铁锹土筐之内，茂盛的庄稼产生于开沟泄水之中。不必祭祀早晨的朝霞而雨水到来，祭祀山

川让涝停息。所以两个周国曾因为西流的河水而发生争执，史起爱护漳渠的灌溉效果，这说明地利的重要。应明令四州刺史，让他们认真视察，如实汇报。

过去魏国把三郡人家迁往阳平、顿丘一带，现在人丁兴旺，共有五六千家。两郡土地面积小，我认为可以让他们重回西部，以充实边疆。恩准他们十年不纳税，以安慰他们不愿迁徙的情感。这样一举两得，边境充实，内地宽裕，增加穷人的产业，以开辟西部的土地，这又是对农业大有利的事。”

调任佐著作郎，撰《晋书·帝纪》及十种《志》，升为博士，其著述活动一如既往。

起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掘了魏襄王的墓，有人说是安厘王的冢，得到几十车书简。其中有《纪年》十三篇，记载夏朝以来直到周幽王被犬戎所灭，用记事相衔接，到三家分晋。魏国的事一直说到安厘王二十年。这是魏国的史书，大致与《春秋》有许多记载互相照应。其中有与经、传非常不同的，那是说夏代比商代长久，益要排斥启的君主地位，启杀了益。太甲杀了伊尹，文丁杀了季历。从周接受天命，到穆王为止，总共百年，并非穆王活了一百岁。幽王灭亡以后，共伯和代理天子执政，不是两个相共同和谐执政。其中《易经》有两篇，与《周易》的上下经一样。《易繇阴阳卦》两篇，与《周易》大致相同，《繇辞》则大不一样。《卦下易经》一篇，和《说卦》相似但不一样。《公孙段》二篇，讲公孙段与邵陟谈论《周易》的事。《国语》三篇，讲楚国和晋国的事。《名》三篇，像《礼记》，又像《尔雅》、《论语》。《师春》一

篇，讲的是《左传》中那些有关卜筮的事，“师春”好像是写书人的名字。《琐语》十一篇，是各国占卜、占梦，妖怪和看相的书。《梁丘藏》一篇，先叙述魏国的世代，接着讲山陵藏的金玉。《缴书》二篇，论述弋射之法。《生封》一篇，讲帝王们封的东西。《大历》二篇，邹衍谈天一类的东西。《穆天子传》五篇，讲周穆王周游四海，见到了帝台，西王母。《图诗》一篇，是图画的赞语一类。又有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等，一共七十五篇。有七篇书简折坏，不知题名。冢中还有铜剑一柄，长二尺五寸。漆书都是蝌蚪一样的文字。刚开始掘冢的人点着竹筒照明，以搜寻宝物。等到官府来收交，多是烧剩的竹筒，残缺的书札。文字已经残缺，无法再整理出次序。晋武帝把这些书交给图书档案部门校定顺序，考证归属，并用现在的文字写下来。束皙在著作部门，得以看到这些竹简，分门别类，解释疑问，都有证据。升任尚书郎。

晋武帝曾问挚虞，三月三日到水边祓除不祥。有什么意义。挚虞答道：“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三月一日生了三个女儿，到三日都死去了，村人觉得奇怪，就招呼他一起到水边洗浴，祓除不祥。并借此让盛满酒的杯子在水上飘流。其来由就是这样。”晋武帝说：“果真如你所说，那这不是好事。”束皙上前说道：“挚虞年轻书生，难以知道这事的原委，请让我回答。过去周公建成洛邑以后，借流水让酒飘流，所以一首遗诗说道：‘插上羽毛的酒杯顺水飘流’。还有秦昭王三月三日在河曲摆宴席，看见一个金人捧着水心之剑对他说：‘让君王占领西夏’，于是称霸诸侯。因此确定了三月三日在河水弯曲之处

摆宴的节日。西汉东汉沿袭这个传统，都作为盛大聚会的日子。”晋武帝听了非常高兴，赏给束皙五十斤黄金。

当时有人在崇山下得到竹简一枚，上面有两行蝌蚪文，互相传看，没有能认识的。司空张华来问束皙，束皙说：“这是汉明帝显节陵中的策文”。经验证果然如此，当时的人们都佩服他的知识渊博。

赵王伦为相国，请他作记室。束皙就托病辞掉官职，教授学生。四十岁去世。元城市里因此停业。他的学生朋友为他在墓旁立了碑。

束皙才学博大通达，他所著的《三魏人士传》、《七代通记》、《晋书·帝纪》及《志》，在战乱中散失。他著的《五经通论》、《发蒙记》、《补亡诗》及文集数十篇，流行于世。

(李 申 杨素香 译)

【原文】

束皙字广微，阳平元城人，汉太子太傅疏广之后也。王莽末，广曾孙孟达避难，自束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疏之疋，遂改姓焉。祖混，陇西太守。父龛，冯翊太守，并有名誉。

皙博学多闻，与兄璆俱知名，少游国学，或问博士曹志曰：“当今好学者谁乎？”志曰：“阳平束广微好学不倦，人莫及也。”还乡里，察孝廉，举茂才，皆不就。璆娶石鉴从女，弃之，鉴以为憾，讽州郡公府不得辟，故皙等久不得调。

太康中，郡界大旱，皙为邑人请雨，三日而雨注，众谓皙诚感，为作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请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酬之？报束长生。”皙与卫恒厚善，闻恒遇祸，自本郡赴丧。

尝为《劝农》及《饼》诸赋，文颇鄙俗，时人薄之。而性沈退，不慕荣利，作《玄居释》以拟《客难》，其辞曰：

束皙闲居，门人并侍。方下帷深谭，隐几而吟，含毫散藻，考撰同异，在侧者进而问之曰：“盖闻道尚变通，达者无穷。世乱则救其纷，时泰则扶其隆。振天维以赞百务，熙帝载而鼓皇风。生则率土乐其存，死则宇内哀其终。是以君子屈己伸道，不耻干时。上国有不索何获之言，《周易》著跃以求进之辞。莘老负金铉以陈烹割之说，齐客当康衢而咏《白水》之诗。今先生耽道修艺，巍然山峙，潜朗通微，洽览深识，夜兼忘寐之勤，昼骋钻玄之思，旷年累稔，不堕其志。鳞翼成而愈伏，术业优而不试。乃欲阖牖辞价，泥蟠深处，永戢琳琅之耀，匿首穷鱼之渚，当唐年而慕长沮，邦有道而反宁武。识彼迷此，愚窃不取。

若乃士以援登，进必待求，附势之党横擢，则林藪之彦不抽，丹墀步纨袴之童，东野遗白颠之叟。盖亦因子都而事博陆，凭鹳首以涉洪流，蹈翠云以骇逸龙，振光耀以惊沈鲰。徒屈蟠于陷井，眊天路而不游，学既积而身困，夫何为乎秘丘。

且岁不我与，时若奔駟，有来无反，难得易失。先生不知盱豫之讖悔迟，而忘夫朋盍之义务疾，亦岂能登海湄而抑东流之水，临虞泉而招西归之日？徒以曲畏为桎，儒学自桎，囚大道于环堵，苦形骸于蓬室。岂若托身权戚，凭势假力，择栖芳林，飞不待翼，夕宿七娥之房，朝享五鼎之食，匡三正则太阶平，赞五教而玉绳直。

孰若茹藿餐蔬，终身自匿哉！”

束子曰：“居！吾将导尔以君子之道，谕尔以出处之事。尔其明受余讯，谨听余志。

昔元一既启，两仪肇立，离光夜隐，望舒昼戢，羽族翔林，蠕蛸赴湿，物从性之所安，士乐志之所执，或背丰荣以岩栖，或排兰闼而求入，在野者龙逸，在朝者凤集。虽其轨迹不同，而道无贵贱，必安其业，交不相羨，稷契奋庸以宣道，巢由洗耳以避禅，同垂不朽之称，俱入贤者之流。参名比誉，谁劣谁优？何必贪与二八为群，而耻为七人之畴乎！且道睽而通，士不同趣，吾私缀处者之末行，未敢闻子之高喻，将忽蒲轮而不眄，夫何权威之云附哉！

昔周汉中衰，时难自托，福兆既开，患端亦作，朝游巍峨之宫，夕坠峥嵘之壑，昼笑夜叹，晨华暮落，忠不足以卫己，祸不可以预度，是士讳登朝而竞赴林薄。或毁名自污，或不食其禄，比从政于匣筍之龟，譬官者于郊庙之犊，公孙泣涕而辞相，杨雄抗论于赤族。

今大晋熙隆，六合宁静。蜂蛰止毒，熊羆辍猛，五刑勿用，八紘备整，主无骄肆之怒，臣无綏纓之请，上下相安，率礼从道。朝养触邪之兽，庭有指佞之草，祸戮可以忠逃，宠禄可以顺保。

且夫进无险惧，而惟寂之务者，率其性也。两可俱是，而舍彼趣此者，从其志也。盖无为可以解天下之纷，澹泊可以救国家之急，当位者事有所穷，陈策者言有不入，翟璜不能回西邻之寇，平勃不能正如意之立，干木

卧而秦师退，四皓起而戚姬泣。夫如是何舍何执，何去何就？谓山岑之林为芳，谷底之莽为臭。守分任性，唯天所授，鸟不假甲于龟，鱼不借足于兽，何必笑孤竹之贫而羨齐景之富！耻布衣以肆志，宁文裘而拖繡。且能约其躬，则儋石之稻以丰，苟肆其欲，则海陵之积不足；存道德者，则匹夫之身可荣，忘大伦者，则万乘之主犹辱。将研六籍以训世，守寂泊以镇俗，偶郑老于海隅，匹严叟于僻蜀。且世以太虚为舆，玄炉为肆，神游莫竟之林，心存无营之室，荣利不扰其觉，殷忧不干其寐，捐夸者之所贪，收躁务之所弃，剃圣籍之荒芜，总群言之一至。全素履于丘园，背纓纓而长逸，请子课吾业于千载，无听吾言于今日也。”

张华见而奇之，石鉴卒，王戎乃辟璆。华召暂为掾，又为司空、下邳王晃所辟。华为司空，复以为贼曹属。

时欲广农，暂上议曰：

伏见诏书，以仓廩不实，关右饥穷，欲大兴田农，以蕃嘉谷，此诚有虞戒大禹尽力之谓。然农穰可致，所由者三：一曰天时不愆，二曰地利无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无霖霖之润，秋繁滂沱之患，水旱失中，雩禳有请。虽使羲和平秩，后稷亲农，理疆畛于原隰，勤蔗汎于中田，犹不足以致仓庾盈亿之积也。然地利可以计生，人力可以课致，诏书之旨，亦将欲尽此理乎？

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废业占空，无田课之实，较计九州，数过万计。可申严此防，令监司精察，一人失课，负及郡县，此人力之可致也。

又州司十郡，土狭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马牧，布其境内，宜悉破废，以供无业。业少之人，虽颇割徙，在者犹多，田诸菀牧，不乐旷野，贪在人间。故谓北土不宜畜牧，此诚不然。案古今之语，以为马之所生，实在冀北，大贾牂羊，取之清渤，放豕之歌，起于钜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诸牧，以充其地，使马牛猪羊吃草于空虚之田，游食之人受业于赋给之赐，此地利之可致者也。昔雅骅在垆，史克所以颂鲁僖；却马务田，老氏所以称有道，岂利之所以会哉？又如汲郡之吴泽，良田数千顷，泞水停沔，人不垦植。闻其国人，皆谓通泄之功不足为难，舄鹵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强大族，惜其鱼捕之饶，构说官长，终于不破。此亦谷口之谣，载在史篇。谓宜复下郡县，以详当今之计。荆、扬、兖、豫，污泥之土，渠塉之宜，必多此类，最是不待天时而丰年可获者也。以其云雨生于畚插，多稔生于决泄，不必望朝济而黄潦臻，崇山川而霖雨息。是故两周争东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利之重也。宜诏四州刺史，使谨按以闻。

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阳平顿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狭，谓可徙还西州，以充边土，赐其十年之复，以慰重迁之情。一举两得，外实内宽，增广穷人之业，以辟西郊之田，此又农事之大益也。

转佐著作郎，撰《晋书·帝纪》、十《志》，迁转博士，著作如故。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

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厘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论《易》。《国语》三篇，言楚晋事。《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缴书》二篇，论弋射法。《生卦》一篇，帝王所封。《大历》二篇，邹子谈天类也。《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图诗》一篇，画赞之属也。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冢中又得铜剑一枚，长二尺五寸。漆书皆科斗字，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詮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暂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迁尚书郎。

武帝尝问挚虞三日曲水之义，虞对曰：“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为怪，乃招携之水滨洗祓，遂因水以泛觴，其义起此。”帝曰：“必如所谈，便非好事。”暂进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请言之。昔周公成

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云‘羽觞随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见金人奉水心之剑，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诸侯，因此立为曲水。二汉相缘，皆为盛集。”帝大悦，赐皙金五十斤。

时有人于嵩高山下得竹简一枚，上两行科斗书，传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张华以问皙，皙曰：“此汉明帝显节陵中策文也。”检验果然，时人伏其博识。

赵王伦为相国，请为记室。皙辞疾罢归，教授门徒。年四十卒。元城市里为之废业，门生故人立碑墓侧。

皙才学博通，所著《三魏人士传》，《七代通记》，《晋书》《纪》、《志》，遇乱亡失。其《五经通论》、《发蒙记》、《补亡诗》、文集数十篇，行于世云。

葛 洪 传

——《晋书》卷七二

【说明】葛洪（公元 284—364 年），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江苏句容人。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炼丹家、医学家和道教理论家。他出生于官宦家庭，其祖父、父亲都曾在三国时期的吴国做官。葛洪少年丧父，家境中落，但贫困而好学。青年时发奋攻读经史，潜心学业，以不仕为荣。后拜郑隐、鲍玄为师，开始研读道教和炼丹著作，学习神仙方术，同时兼攻医学。太安二年（公元 303 年），石冰起义，葛洪曾以世家子弟被荐为将兵都尉，率兵讨伐，因军功受封关内侯。还担任过主簿、司徒掾、谏议参军等官职。此后朝廷一再封赐，但葛洪锐意探究学问，都推辞了。他曾两度南行广州等地，在游历中接触过数百名流俗道士，对他后来热衷道教很有影响。晚年入广东罗浮山修道炼丹，直到逝世。

葛洪一生著述甚丰，总计有数百卷之多，主要有《抱朴子》、《五函方》、《肘后要急方》、《神仙传》、《西京杂记》等。

炼丹术又称金丹术，是炼制所谓使人长生不老的仙丹和制造贵重金银的方术。炼丹家的理论无疑是荒谬的，但他们的炼丹活动，实质上是研究物质变化的客观规律，从事改变

物质属性的原始化学实验工作，可以说炼丹术是近代化学的原始形态。葛洪《抱朴子》是我国道教和炼丹术的重要典籍，它分为内外篇，内篇二十卷，专论仙道，外篇五十卷，专谈儒术。该书反映了葛洪内神仙外儒术的思想，它成为后来道教的基本理论之一。其中《抱朴子内篇》中的《金丹》、《仙药》、《黄白》三卷，介绍了汉魏以来的重要丹经和二十多种炼丹方法。首次提出了化学反应的可逆性；观察并记载了金属的取代作用，即置换反应；记载了很多植物药和矿物药的性质与功用；介绍了制造各种伪金银的方法；强调人在物质变化中的主观能动作用；提出了宇宙万物由气生成，精神依存于形体的朴素唯物论，等等，都说明了葛洪在化学发展史上是有很大大贡献的。

葛洪在医学上成就也是多方面的，他著有多种医书，留下来的《肘后要急方》中收集了各种简便易行的医疗技术和单验方，极便于群众利用；首次记载了许多急性、慢性传染病，有些是世界医学史上的最早记录，如天花、流行性钩端螺旋体病、黄胆性传染肝炎、恙虫病、结核病等；发现并记载下多种寄生虫病及传染病，如恙螨虫病、血吸虫病、疟疾、狂犬病、马鼻疽病等。在症状学方面，除上述病症外，还对不同类型的脚气病、“角弓反张”疾病症状作了记录等；在治疗学方面，突出的如：提出了用疯狗的脑髓治疗疯狗咬伤，这是免疫法的萌芽；他还提出了多种特效药物和独特的治疗技术，如对多种疟疾病的不同治疗法、捏脊疗法、食道异物疗法、各种食物性、药物性中毒疗法等，不少至今仍是常用的急救方法。因此，葛洪对医学的贡献也是很大的。

当然，葛洪著作也夹有一些神秘荒诞的不科学成份。此外，该传中说葛洪“终年八十一岁”，而乐史《太平寰宇记》载，葛洪享年 61 岁，此问题有待进一步考证。

葛洪，字稚川，丹阳郡句容人。祖父葛系，是吴国掌管朝廷参拜礼仪的大鸿儒。父亲葛悌，在吴国平定以后进入晋朝，任邵陵郡太守。葛洪小时候就爱好学习，家庭贫寒，亲自砍伐山柴出卖，以购买学习用品纸张笔墨，夜晚总是写字读书学习，所以以精通孔孟学说而闻名。他禀性恬淡无侈求，不爱玩耍游乐，不会下棋，也不知道博戏的名称。为人质朴，不善辞令，不追求荣誉利益，闭门谢客，从不交际游玩。曾在余杭山见过何幼道、郭文举，也只是一面之识而已，都没有交谈。有时为了寻找书籍，深入研究问题，不惜数千里长途跋涉崎岖之路，一心想着的是要找到他所需的书籍。葛洪博览群书，通晓典籍，尤爱好道家强身除病的养身之术。他的堂祖父葛玄，在吴国时期学习道教，由于道术精湛，被视为神仙，号称葛仙公，他将自己炼制丹药的秘术传授给了弟子郑隐。葛洪跟郑隐学习，于是完全掌握了葛玄的道术。后来又以师礼相待于南海（今广州市）太守上党（今山西长治）人鲍玄，鲍玄也是擅于道术的人，他能用占卜的方法预知未来的事，鲍玄见到葛洪后非常器重，并把女儿嫁给了他。葛洪继承了鲍玄的道教事业，同时广泛地研究医术。葛洪的所有著述，都很精深准确，富于才华，文辞优美。

晋惠帝太安年间（公元 302—303 年），石冰随张昌起义造反，攻破扬州、江州等地，吴兴太守顾秘担任镇压农民起

义部队的军事都督，和周玘等起兵讨伐石冰，顾秘发文征召葛洪为领兵都尉，攻打石冰的另一支队伍，取得了胜利，被晋升为伏波将军。平定石冰之后，葛洪没有接受战功的奖赏，就直接到了洛阳，想搜集和寻求不易得到的珍贵典籍，以扩大和提高自己的学识。

葛洪看到晋王朝内部的“八王”互相争斗残杀，又看到农民起义，天下已经乱了，他想躲到南方去，于是就去广州，做广州新任刺使嵇含的参知军事，在嵇含遇害之后，他就留在南方多年，对征讨、镇守文书诏命一次也未应从。后来又回到了家乡，按照礼制，朝廷多次召他出来做官，他都没有去。司马睿做丞相时，征召他为属官。因为平定农民起义有功，被赐封为关内侯。晋成帝咸和（公元326—334年）初年，司徒王导召任他为掌管一州文书簿籍的主簿，后转任王导的属官，以后又升迁为咨议参军。当时领导编修国史的干宝与葛洪感情深厚，往来密切，他向朝廷推荐葛洪，认为葛洪的才能完全能胜任编修国史的工作，选他做散骑常侍，兼论大著作，葛洪坚决地推迟不肯接受。以年纪大了，想炼制丹药以求延年益寿为由，他听说，交阯（今越南北部）出产丹砂，便请求派往做勾漏县（今西北流）县令。皇帝因为葛洪资历高、名望大，不批准。葛洪说：“不是想得到荣耀，而是因为勾漏县有丹砂。”于是皇帝同意了他的要求。葛洪便带领着儿子、侄儿一同去了。到了广州，广州刺使邓岳任凭什么也要坚决留住他不让离去，葛洪于是就住在广东罗浮山炼丹。邓岳上表推荐葛洪做东官太守，他又一次推辞不予接受。邓岳只好任用葛洪哥哥的儿子葛望为记室参军。葛洪在罗浮山住

了多年，生活悠闲自得，一直勤奋地著述。他在所著《抱朴子》的自序中写道：

我缺乏进取做官的才能，比较喜欢老庄清静无为的事业。即使展开翅膀就能直冲云霄，迈开双脚就能追风踏影，但我还是想收敛有力的翅膀，立于体小力弱的鹪鹩之群；藏起快捷的足迹，隐身于瘸腿驴群之中。何况大自然赋于我的只是普普通通的短小羽毛，自然界给予我的是最劣等的马和跛脚驴呢？我是有自知之明的，做不到的事就不做，又怎么敢强迫只有苍蝇般气力而羡慕有冲天凌云之举呢？驱赶跛足鳖而去追赶飞跑着的兔子；把极丑陋的妇女打扮起来，求得媒婆向男方夸赞她美丽；将贱质的砂砾，混杂到店肆出售的美玉之中，而索价千金；矮人的步子希望能赶上追逐太阳的夸父那样的巨人足迹，这就是强求才能、名誉的人所以不能成功的原因；不要作那样体弱的人硬要去干根本力不胜任的扛举大鼎的事，这就是秦武王之所以压断了腿的原因。因此期望往往在荣华富贵的道路上破灭，而立志者却安然地生活在贫困破败的环境之中；粗劣的菜食有八种烹饪方法使其滋味鲜美，简陋的房屋中也会有如同在彩绘华丽居室中的乐趣。所以权贵之家，即使离得很近也不要攀富；而对有学问修养的人，即使道路很艰难、离得很远也一定要去拜访。阅读研究的奇异之书，已经不算少了，一般都是隐秘的语言，很难一下子解释明晰，除非极为精明的人是不能探究明白的，也除了非常勤奋的人是不能完全弄清楚的。

道士中多闻博识的人很少，而主观想象揣测、胡思乱说的人很多。至于不时有喜欢道术的人，想要进行修炼，仓促间不知跟谁学习，而心里的犹豫疑问又没有值得信任的地方咨询。现在撰著这部书，概述了长生不老的道理。它的最奥妙之处不能用明确的文字表达，只是扼要地叙述了大概内容以见一斑，希望对苦思冥想又有志于此的人，能受到启发而得到更多的收获。难道说一个不聪明且很闭塞的人能追究细微的事理而求得高远的旨意吗？只不过论述了一些比别人先一步有悟的问题罢了。当世儒生们只知道衷心信服周公旦、孔子的儒家学说，没有谁相信神仙之书，不但大肆地讥笑神仙之学，而且还诽谤神仙之学的真谛。所以我撰著这部书专门论述烧炼丹药点化黄金白银法术之事，称之为《内篇》，其余是反驳质难人间得失、世事评论，对《内篇》的解释和补述，称之为《外篇》，总共内外篇一百一十六篇。虽然还不足以珍藏于各名山之中，姑且将其锁在藏书的金匱里，以便给见多识广、了解此书价值的人看。

葛洪自号抱朴子，因此把该书也命名为《抱朴子》。葛洪其余的著述有碑文、祭文、诗、赋百卷之多，移文、檄文、奏章、奏表有三十卷，神仙、良吏、隐逸、集异等传各十卷，又选抄《诗经》、《书经》、《礼记》、《易经》、《春秋》五经、《史记》、《汉书》、百家之言、方技杂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药方》一百卷，《肘后要急方》四卷。

葛洪博学广识，在江南是无与伦比的，他的著作文章超过班固和司马迁，而且思精善辩，道学思想玄妙深奥，分析

道理深刻透彻。后来他突然给邓岳一封信，说“我要出远门去寻找老师，到确定的日期就出发。”邓岳接到信后，急忙赶去道别。而葛洪坐到中午，浑然如同睡觉一样死去了。邓岳赶到，竟然没来得及见一面。逝世的那年是八十一岁。他的容颜肤色看上去象活着的人似的，身体也很柔软，抬尸体入棺材时，尸体很轻，如同空衣一样，世人认为他是修道成仙了。

（赵慧芝 译）

【原文】

葛洪，字稚川，丹杨句容人也。祖系，吴大鸿胪。父悌，吴平后入晋，为邵陵太守。洪少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诵习，遂以儒学知名。性寡欲，无所爱玩，不知棋局几道，擣蒲齿名。为人木讷，不好荣利，闭门却扫，未尝交游。于余杭山见何幼道、郭文举，目击而已，各无所言。时或寻书问义，不远数千里崎岖冒涉，期于必得，遂究览典籍，尤好神仙导养之法。从祖玄，吴时学道得仙，号曰葛仙公，以其炼丹秘术授弟子郑隐。洪就隐学，悉得其法焉。后师事南海太守上党鲍玄。玄亦内学，逆占将来，见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传玄业，兼综练医术，凡所著撰，皆精核是非，而才章富赡。

太安中，石冰作乱，吴兴太守顾秘为义军都督，与周玘等起兵讨之，秘檄洪为将兵都尉，攻冰别率，破之，迁伏波将军。冰平，洪不论功赏，径至洛阳，欲搜求异书以广其学。

洪见天下已乱，欲避地南土，乃参广州刺史嵇含军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镇檄命一无所就。后还乡里，礼辟皆不赴。元帝为丞相，辟为掾。以平贼功，赐爵关内侯。咸

和初，司徒导召补州主簿，转司徒掾，迁谘议参军。干宝深相亲友，荐洪才堪国史，选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洪固辞不就。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闻交址出丹，求为句漏令。帝以洪资高，不许。洪曰：“非欲为荣，以有丹耳。”帝从之。洪遂将子侄俱行。至广州，刺史邓岳留不听去，洪乃止罗浮山炼丹。岳表补东官太守，又辞不就。岳乃以洪兄子望为记室参军。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述不辍。其自序曰：

洪体乏进趣之才，偶好无为之业。假令奋翅则能陵厉玄霄，骋足则能追风蹑景，犹欲戢劲翮于鷦鷯之群，藏逸迹于跛驴之伍，岂况大块稟我以寻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弩之蹇足？自卜者审，不能者止，又岂敢力苍蝇而慕冲天之举，策跛鳖而追飞兔之轨；饰嫫母之笃陋，求媒阳之美谈；推砂砾之贱质，索千金于和肆哉！夫僬僬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踪，近才所以踬碍也；要离之羸而强赴扛鼎之势，秦人所以断筋也。是以望绝于荣华之途，而志安乎穷圯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荜有藻梲之乐也。故权贵之家，虽咫尺弗从也；知道之士，虽艰远必造也。考览奇书，既不少矣，率多隐语，难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寻究，自非笃勤不能悉见也。

道士弘博洽闻者寡，而意断妄说者众。至于时有好事者，欲有所修为，仓卒不知所从，而意之所疑又无足谘。今为此书，粗举长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于翰墨，盖粗言较略以示一隅，冀悻愤之徒省之可以思过半矣。岂谓罔塞必能穷微畅远乎，聊论其所先觉者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书，不但大而笑之，又

将谤毁真正。故予所著子言黄白之事，名曰《内篇》，其余驳难通释，名曰《外篇》，大凡内外一百一十六篇。虽不足藏诸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识者。

自号抱朴子，因以名书。其余所著碑、诔、诗、赋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隐逸、集异等传各十卷，又抄《五经》、《史》、《汉》、百家之言、方技杂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药方》一百卷，《肘后要急方》四卷。

洪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辩玄赜，析理入微。后忽与岳疏云：“当远行寻师，克期便发。”岳得书，狼狈往别。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岳至，遂不及见。时年八十一。视其颜色如生，体亦柔软，举尸入棺，甚轻，如空衣，世以为尸解得仙云。

虞 喜 传

——《晋书》卷九一

【说明】虞喜（公元 270—346 年），字仲宁，晋代著名的儒家学者。终生隐居，潜心于学术研究。他至少有五次被推荐作官，但他一次也不应召。

虞喜又是中国科学史上著名的天文学家。他在天文学上的贡献主要有两条：一是创立了“安天论”；二是发现了岁差。

虞喜还计算了岁差值，得出结果是五十年相差一度。后来人们又逐步改进，使这个数据更加精确。祖冲之首先把虞喜的数据引入历法，大大提高了历法的精度。

岁差的发现非常重要。有的科学史家认为这是天文学上的一大创新，有人认为这个发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从虞喜的传记可以看出，假如不是他不慕荣利，长期潜心于科学研究，有着严谨而踏实的学风，要作出这样的发现几乎是不可能的。

虞喜，字仲宁，会稽虞姚人（今浙江虞姚人）。是光禄卿虞潭家族的人。父亲虞察，吴国的征虏将军。虞喜从小就有志气和好的品行，博览群书，仰慕古风。诸葛恢在郡里执政

时，他勉强作了个一般的办事人员，察举他为孝廉，州里举荐他为秀才，宰相府招聘他，他均不就任。晋元帝当初镇守江南的时候曾上书推荐过他。晋怀帝即位，朝廷征召他为博士，他仍不接受。虞喜的同乡人贺循当了司空，是他的老前辈，又是高官，每次去拜访虞喜，彻夜交谈忘了回家。贺循自己讲，虞喜渊深，难以测度。

太宁（公元323—326年）年间，虞喜和临海任旭都以博士被征召，他还是不接受。朝廷又下诏说：“振兴教化，以致力于政治，最要紧的是用大道进行教化。宣传崇尚退让的素朴之风。天下大乱以来，儒家的高雅风尚衰落，每当观看《子衿》这首诗，无不感慨万分。临海的任旭，会稽的虞喜，都具有纯洁高尚的情操，任凭世态炎凉，从不更改，对古代典籍研究精深，身居当代，信守古代道德风尚。他们的志气、操行足以教育世俗百姓，渊博的知识足以能够使大道得到发扬光大。虽然以前多次征召都不就任，这次还要以博士征召他。”虞喜推说有病，仍未接受征召。咸和末年，命令公卿举荐贤良方正和直言的人，太常举荐虞喜为贤良，正好遇到战事，没有办成。咸康初年，内史何充上书讲：“臣听说过去高辛氏，高阳氏都任用了八个贤良而有才气的人，致使四方秩序井然；周武王任用了十个贤人，致使天下太平。高明的谋略应能得以发挥，从来都该是这样的。当今圣德庄严光明，想要召募四方的志士仁人，已整顿好了车马，车上插上了旌旗，等待着发现贤才良士，马上出发去接。我个人认为以前的贤良之士虞喜，一直是贞洁素朴，情操高尚，不与世俗同流，从小就有好德行，直到白头也坚持不变，他又知识丰富，广阔

高深。见多识广，渊博雄厚。钻研难题，研究细微，都有别人所不可比拟的勤奋之处。安静处世，认真体味大道，志向从不动摇，守清贫而处之泰然，清高而自得其乐。应该用蒲草裹上车轮把他接来，以表彰他那高尚的志向和杰出的操行。一则可以扶佐那伟大的教化事业，二则可以纯洁那浇薄的世风。”奏疏送给了皇上，皇帝就下诏道：“寻阳翟汤、会稽的虞喜都是遵守大道清廉贞洁，他们不为做官而费心经营，静心钻研学问，风格高尚，操行可以和古人比美。以往虽有征召的命令而没有屈就，是不是因为洁白的纯丝一时难以染上色，征召他们的礼仪也太简单了呢？治国必须有贤才，应将他们召到朝廷之上。都以散骑常侍征召他们。”虞喜又没有接受。

永和（公元345—356年）初年，有个部门上奏说十月要举行每五年一次的宗庙大祭，京兆府君应当迁到后殿，征西将军、豫章府君、颍川府君都刚刚毁掉了神主牌位，内外大臣议论纷纭，不知如何决断。当时虞喜在会稽，朝廷就派遣使臣向他咨询。皇上就是如此的看重他。

虞喜专心钻研经传，兼通讖纬，于是著《安天论》，用以驳斥浑天说和盖天说，又注释《毛诗略》，注《孝经》，作《志林》三十篇。著作达几十万言，流行于世上。七十六岁时去世，没有儿子。他的弟弟虞豫另外有传。

（李 申 杨素香 译）

【原文】

虞喜字仲宁，会稽余姚人，光禄潭之族也。父察，吴征虏将军。喜少立操行，博学好古。诸葛恢临郡，屈为功曹。察

孝廉，州举秀才，司徒辟，皆不就。元帝初镇江左，上疏荐喜。怀帝即位，公车征拜博士，不就。喜邑人贺循为司空，先达贵显，每诣喜，信宿忘归，自云不能测也。

太宁中，与临海任旭俱以博士征，不就。

复下诏曰：“夫兴化致政，莫尚乎崇道教，明退素也。丧乱以来，儒雅陵夷，每览《子衿》之诗，未尝不慨然。临海任旭、会稽虞喜并洁静其操，岁寒不移，研精坟典，居今行古，志操足以励俗，博学足以明道，前虽不至，其更以博士征之。”喜辞疾不赴。

咸和末，诏公卿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太常华恒举喜为贤良。会国有军事，不行。

咸康初，内史何充上疏曰：臣闻二八举而四门穆，十乱用而天下安，微猷克阐，有自来矣。方今圣德钦明，思恢遐烈，旌舆整驾，俟贤而动。伏见前贤良虞喜天挺贞素，高尚邈世，束修立德，皓首不倦，加以傍综广深，博闻强识，钻坚研微有弗及之勤，处静味道无风尘之志，高枕柴门，怡然自足。宜使蒲轮纡衡，以旌殊操，一则翼赞大化，二则敦励薄俗。”疏奏，诏曰：“寻阳翟汤，会稽虞喜并守道清贞，不营世务，耽学高尚，操拟古人。往虽征命而不降屈，岂素丝难染而索引礼简乎！政道须贤，宜纳诸廊庙，其并以散骑常侍征之”。又不起。

永和初，有司奏称十月殷祭，京兆府君当迁祧室，征西、豫章、颍川三府君初毁主，内外博议不能决。时喜在会稽，朝廷遣就喜咨访焉。其见重如此。

喜专心经传，兼览讖纬，乃著《安天论》以难浑、盖，又

释《毛诗略》，注《孝经》，为《志林》三十篇。凡所注述数十万言，行于世。年七十六卒，无子。弟豫自有传。

何承天传

——《宋书》卷六四

【说明】何承天，东海郟（今山东省郟城）人，是东晋、刘宋时代的著名天文学家。

何承天出身于官吏世家。五岁丧父，由叔父抚养成人。母亲徐氏，出生名门，学问广博，何承天从小受到家庭尤其是母亲的良好教育，聪明好学，博学多才，尤善历数。曾任县令、国府参军、衡阳内史、著作佐郎、太子率更令、国子博士、御史中丞等职。曾受命修撰国史，著作宏丰，他的著述为后人所汇集，名为《何衡阳集》，其中最有科学价值的著作是他的《元嘉历》。刘宋初年，沿用曹魏时期杨伟造的《景初历》，该历引用年久，本身又存在缺点，误差显著，急待改历。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何承天献出他制造的新历，经过检验，证实比旧历精密，遂名《元嘉历》，于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颁行，至梁天监八年（公元509年）才由祖冲之《大明历》所取代，先后行用达六十五年之久。这是我国古代名历之一，被郭守敬列入历代最有创造性的十三家历法之中。

《元嘉历》较旧历有许多新发明和改进，如利用月食测定

冬至日度，实测中星以定岁差，创立调日法，以雨水为气首，五星皆以近距为历元，创用定朔算法，定春秋分晷影无长短之差等，都是《元嘉历》的突出成就。在《律历志》中也有所记述。

何承天，东海郟（今山东郟城）人。从祖何伦，为晋朝右卫将军。承天五岁丧父，母亲徐氏是徐广的姐姐，聪明博学，所以承天从小就受到母亲的良好教导，儒学、史学及诸子百家的著作无不涉猎。叔父何朌为益阳令，何承天沿袭叔父为官。

东晋隆安四年（公元400年），南蛮校尉桓伟任命何承天为参军。当时殷仲堪、桓玄等人纷纷发兵反对朝廷，承天担心战祸不断，辞职回到益阳。起义之初，长沙公陶延寿任命何承天为他的辅国府参军，派遣他向高祖刘裕表示敬意，因此而被任为浏阳令，不久离任回到京城。抚军将军刘毅镇守姑孰，官为行参军。刘毅曾经出游，鄱陵县史陈满射鸟时，箭误中刘毅，虽未伤人，却被判了死刑。承天议论道：“断案重在事实，有疑惑之处则应从轻处理。过去有人惊了汉文帝乘坐的车驾，张释之判他犯有惊驾之罪，却仅处以罚款。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此人并非有意而为。所以不以他惊的车驾为帝王所乘而改变法律，加重他的罪名。如今陈满本想射鸟，并非有心伤人。按刑律规定，过失伤人需判三年，况且还没有伤人呢？轻微处罚就可以了。”后来何承天被派出补任宛陵令。赵恢任宁蛮校尉、寻阳太守时，请他出任司马。不久离职。

高祖刘裕后命何承天为太尉行参军。高祖西征讨伐刘毅时，任诸葛长民为监军留守。长民暗藏二心，于是刘穆之私下问承天：“公（刘裕）这次征讨刘毅能否取胜？”承天说：“不必担心荆州的战事不能及时了结，倒是另有一件可忧虑的事。公（刘裕）几年前从左里径直返回石头，非常冒险，这次返回石头，倒是应该采取过去的做法。”穆之说：“只有您才能说出此番话来。但愿不需几日，刘毅就被打败。”何承天后被授职太学博士。东晋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又任世子征虏参军，转任西中郎中军参军、钱唐令。高祖刘裕在寿阳时，南朝宋的禁省建立，召任何承天为尚书祠部郎，与傅亮共同编撰朝廷礼仪。南朝宋永初（公元420—422年）末年，补任南台治书侍御史。

谢晦在镇守江陵的时候，请承天出任南蛮长史。当时有个叫尹嘉的人，家境贫寒，其母熊氏以自身作抵押借钱，为儿子还债。尹嘉犯有不孝之罪，理当处死。承天议论道：“听了官府的通告，大家广泛议论尹嘉所犯死罪的事，都赞同法吏葛滕的意见，认为如果母亲状告儿子不孝，想要杀死他，就应同意她的请求。法律规定，凡违犯教令，不孝敬长辈的人，父母想要将其处死，都应相允。可见判决是根据状告者的真切要求而定。严格探究事情的缘由，依照尹嘉之母的陈述，她是自愿以身抵押借钱，替儿子还债。尹嘉虽违犯了教义，但熊氏并没有请求杀死他的言辞。熊氏希求儿子不死而现在却要杀死他，这并不是熊氏所要求的。开始以不孝之罪弹劾尹嘉，结果却因母亲而使儿子致罪，根据事情的初发与结局，母与子全都罹罪，而葛滕所写的判决文书中，并没有考虑到母

亲使儿子致罪这一条。让尹嘉不死，这点很重要，虽从情理上讲不通，但却能阐明伦理教义，怜悯他愚昧无知。彰明仁德，慎用刑罚，文王所以体恤百姓；审理案件，对死囚采取宽刑，因而《中孚》得以流传。从人情上讲，母亲会为儿子护短，恳求的言辞之恭敬，是礼仪所达不到的。如今不顾请求宽恕的评论，而仅仅根据要求处死的条文，去责备处于饥寒之中的人，要求他们要有恭敬待人的节操，这实在不是宁可不计其有罪而对有疑问的事从轻处罚的作法。我认为免除尹嘉死刑，遍施仁德，赦免熊氏的过错，以表明保护自己的儿子是合适的。此乃蒲亭虽然僻陋，却可与盛明之世的德行相比；仔猪小鱼虽微不足道，也可教化今人。”结果案子还未判决，时值大赦，免除了尹嘉母子的罪。

谢晦晋升号卫将军，后转任谏议参军，兼领记室。宋元嘉三年（公元426年），谢晦将被讨伐，他的弟弟黄门郎谢朏写密信将此事通报给他，谢晦问承天：“如果真的被讨伐，您教我该怎么办？”承天说：“国君以帝王的威名，发动天下的力量攻打一州，双方力量悬殊，对方有利而我方处境艰难，寻求与境外力量联合，此为上策。其次是派心腹领兵把守义阳，将军您率领军队到夏口作战，如果战败，马上撤到义阳，出北境，此为下策。”谢晦思忖良久后说：“荆楚是一用武之地，兵源充足，还是应该决战，再走不迟。”于是谢晦让承天撰写上奏的表章和讨敌的檄文。谢晦认为湘州刺史张邵将来一定会背叛自己，打算派千名兵士去袭击他，承天则认为张邵的意向尚不可知，不应轻易讨伐。当时，张邵的哥哥茂度正在治理益州，与谢晦的关系一向很好，所以谢晦按兵不发。前

任益州刺史萧摹之、前任巴西太守刘道产离任返回江陵，谢晦要将他们杀掉，承天则尽力营救，全都得以幸存。谢晦兵败后，何承天留在府中没有追随谢晦。等到彦之兵进马头，承天自动前往请罪，彦之因他心有诚意，宽恕了他，派遣他做了南蛮府事。

宋元嘉七年（公元430年），彦之北伐，请何承天出任右军录事。彦之失败后，承天则因他虽然在军事上没有才干，但在其他方面才华出众而免于处罚。后又补作尚书殿中郎，兼任左丞。当时有吴兴余杭人薄道举劫盗为寇被处死。按规定，罪犯的同籍亲属服丧一年后需充军。道举的堂弟代公、道生等人都是立了大功的亲戚，不应在充军的范围之内，而判决的结果则以代公等人的母亲作为为道举服丧的亲属，如果这样，则儿子就应以他们的母亲为期亲而充军。承天议论道：“按照判处强盗的刑制，同籍亲属服丧一年后需充军的制度不包括立有大功的人。妇女有三从，即婚后从夫，丈夫死后从子。如今道举当盗，假如他的叔父还健在，按制度应让他从军，而妻子留在家中，本来这是最适宜的。但道举为寇时，其叔父已死，代公、道生等虽同是堂弟，但都是立过大功的亲属，不应该充军。现在如果以道举的叔母作为期亲，命令代公随母亲的名份充军，既不符立大功的人不充军的制度，又违背了妇人遵守三从的规矩。由于主判人墨守服丧一年的亲属充军的条文，不考虑男女有别，远避嫌疑怕担责任，所以造成这样的疑惑，恐怕这不是朝廷放宽刑罚的宗旨。最好还是将代公等母子全部赦免了吧。”原司徒的佐吏孔邈还未将此案的奏章进献给皇帝就死去了，参与审议的人都认为不应再

沿用孔邈的名字,而应用一位现有的官员取代他呈奏此事。承天又议论说:“已死的人的名字不适合上奏,这样做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怕对周围的人不吉利。奏折一耽误,动辄就是一年半载,盛明之世,办事应从简从易,一些不必要的疑惑和细琐的禁忌,都应该荡除。”

承天性格刚愎自用,不能听从朝中大臣的意见,依恃自己的所长,对同僚非常轻视,所以仆射殷景仁对他很不满。后承天被派出任衡阳内史。过去在荆州时,承天与同僚的关系就多不和睦,而且不够公正清廉,所以受到州府检举,被捕入狱,后赦得免。宋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任著作佐郎,撰写国史。当时承天年事已高,而与他共事的各位佐郎既有名望又很年轻,颍川荀伯子因此嘲讽他,常叫他老母。承天说:“你应该说是凤凰带领九个儿子,哪能说是老母呢!”不久承天转任太子率更令,仍旧编写国史。

当时丹阳的丁况等人,家人死了很久也不下葬,承天议论道:“礼仪所说的还葬,说的是暂时可以简单一些,所以允许按照与其财产相当的规格下葬,而不要求有太完备的礼节。丁况等三家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中,下葬总是不用棺槨,这实在是由于薄情寡义,行为如同禽兽了。我认为丁宝等人共同为邻多年,从来没有用道理相互规劝,没有用律法纠正他们的行为。宋元嘉十六年冬,朝廷既没有颁布新的法律条文,又没有郑重申明原有的规章制度,出现什么严重、紧急的问题,就会立即相互推诿指责,或者由于邻里纠纷,也会产生这种现象。听说在东部各地,这样的例子很多,长江西部地区 and 淮北尤其多。如果只流放这三个人,全然起不到整肃的

目的。假如开此先例，百姓就会感到很害怕，街坊四邻和县府，争着用不正当的手段谋取私利。行贿的风气一兴，官司纠纷必然繁多，这恐怕有失皇帝的圣明。我认为对丁况等三家，暂且不必过问，根据这件事情而增定有关规定，如果百姓不依法下葬，邻居应马上检举，三年服丧期满后，不得再追究举告，事情这样处理就比较合适了。”

宋元嘉十九年（公元442年），朝廷设立了国子学，承天以原职再兼任国子博士。皇太子宣讲《孝经》，承天与中庶子颜延之同为学生聆听。不久，承天升任御史中丞。当时索虏侵犯边疆，太祖刘义隆向众臣垂询御敌保边的计策，承天上表（陈述了如何防备御敌，保卫边疆的主张）……

承天一向爱好下棋，经常因此而误事。太祖刘义隆赐给他一副棋，承天上表致谢，太祖说：“棋子之赐，何必非张武之金呢。”承天也善弹箏，皇帝又赐他一面饰银的箏。承天与尚书左丞谢元向来不和，二人分别在南、北台供职，相互检举告发。太尉江夏王义恭一年的俸禄是三千万钱、五万匹布、七万斛大米。义恭生活一向奢侈，常入不敷出。元嘉二十一年，义恭向尚书请求拨发来年的粮饷。可按照旧制，出库如果超过钱二十万、布五百匹，就应向皇帝报告，而谢元则命令考虑拨款二百万钱给太尉义恭。事发之后，谢元于是派令史把仆射孟鸕杀了。当时谢元刚被任命为太尉谘议参军，还未拜职，被承天揭发。皇帝大怒，将谢元遣送回乡，终生囚禁。谢元同时也检举了承天将四百七十束茭白以高价卖给官吏之事，承天被判着布衣兼领官职。谢元字有宗，陈郡阳夏人，为临川内史谢灵运从祖的弟弟，以有才学著称，死于囚

禁。

元嘉二十四年(公元447年),承天升任廷尉,还未拜职,皇帝又要让他在吏部任职,并下了密旨,承天将旨泄密,于是被罢免官,死于家中。享年七十八岁。在世之时,承天将《礼论》八百卷删减并合,分门别类,成三百卷,与《前传》、《杂语》、《纂文》及论文一同流传于世。他又修定《元嘉历》,收在《律历志》中。

(金文馨 译)

【原文】

何承天,东海郟人也。从祖伦,晋右卫将军。承天五岁失父,母徐氏,广之姊也,聪明博学,故承天幼渐训义,儒史百家,莫不该览。叔父朐为益阳令,随朐之官。

隆安四年,南蛮校尉桓伟命为参军。时殷仲堪、桓玄等互举兵以向朝廷,承天惧祸难未已,解职还益阳。义旗初,长沙公陶延寿以为其辅国府参军,遣通敬于高祖,因除浏阳令,寻去职还都。抚军将军刘毅镇姑孰,版为行参军。毅尝出行,而鄱陵县史陈满射鸟,箭误中直帅,虽不伤人,处法弃市。承天议曰:“狱贵情断,疑则从轻。昔惊汉文帝乘舆马者,张释之劾以犯跸,罪止罚金。何者?明其无心于惊马也。故不以乘舆之重,加以异制。今满意在射鸟,非有心于中人。按律过误伤人,三岁刑,况不伤乎?微罚可也。”出补宛陵令。赵悛为宁蛮校尉、寻阳太守,请为司马。寻去职。

高祖以为太尉行参军。高祖讨刘毅,留诸葛长民为监军。长民密怀异志,刘穆之屏人问承天曰:“公今行济否云何?”承天曰:“不忧西不时判,别有一虑耳。公昔年自左里还入石头,甚脱尔,今还,宜加重复。”穆之曰:“非君不闻此言。顷日

愿丹徒刘郎，恐不复可得也。”除太学博士。义熙十一年，为世子征虏参军，转西中郎中军参军，钱唐令。高祖在寿阳，宋台建，召为尚书祠部郎，与傅亮共撰朝仪。永初末，补南台治书侍御史。

谢晦镇江陵，请为南蛮长史。时有尹嘉者，家贫，母熊自以身贴钱，为嘉偿责。坐不孝当死。承天议曰：“被府宣令，普议尹嘉大辟事，称法吏葛滕籤，母告子不孝，欲杀者许之。法云，谓违犯教令，敬恭有亏，父母欲杀，皆许之。其所告惟取信于所求而许之。谨寻事原心，嘉母辞自求质钱，为子还责。嘉虽亏犯教义，而熊无请杀之辞。熊求所以生之而今杀之，非随所求之谓。始以不孝为劾，终于和卖结刑，倚旁两端，母子俱罪，滕籤法文，为非其条。嘉所存者大，理在难申，但明教爰发，矜其愚蔽。夫明德慎罚，文王所以恤下；议狱缓死，《中孚》所以垂化。言情则母为子隐，语敬则礼所不及。今捨乞宥之评，依请杀之条，责敬恭之节，于饥寒之隶，诚非罚疑从轻，宁失有罪之谓也。愚以谓降嘉之死，以普春泽之恩；赦熊之愆，以明子隐之宜。则蒲亭虽陋，可比德于盛明；豚鱼微物，不独遗于今化。”事未判，值赦并免。

晦进号卫将军，转谘议参军，领记室。元嘉三年，晦将见讨，其弟黄门郎矜密信报之，晦问承天曰：“若果尔，卿令我云何？”承天曰：“以王者之重，举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既殊，逆顺又异，境外求全，上计也。其次以腹心领兵戍于义阳，将军率众于夏口一战，若败，即趋义阳以出北境，其次也。”晦良久曰：“荆楚用武之国，兵力有余，且当决战，走不晚也。”使承天造立表檄。晦以湘州刺史张邵必不同己，欲

遣千人袭之，承天以为邵意趋未可知，不宜便讨。时邵兄茂度为益州，与晦素善，故晦止不遣兵。前益州刺史萧摹之、前巴西太守刘道产去职还江陵，晦将杀之，承天尽力营救，皆得全免。晦既下，承天留府不从。及到彦之至马头，承天自诣归罪，彦之以其有诚，宥之，使行南蛮府事。

七年，彦之北伐，请为右军录事。及彦之败退，承天以才非军旅，得免刑责。以补尚书殿中郎，兼左丞。吴兴余杭民薄道举为劫。制同籍期亲补兵。道举从弟代公、道生等并为大功亲，非应在补谪之例，法以代公等母存为期亲，则子宜随母补兵。承天议曰：“寻劫制，同籍期亲补兵，大功不在此例。妇人三从，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今举道为劫，若其叔尚存，制应补谪妻子营居，固其宜也。但为劫之时，叔父已没，代公、道生并是从弟，大功之亲，不合补谪。今若以叔母为期亲，令代公随母补兵，既违大功不谪之制，又失妇人三从之道。由于主者守期亲之文，不辨男女之异，远嫌畏负，以生此疑，惧非圣朝恤刑之旨。谓代公等母子并宜见原。”故司徒掾孔邈奏事未御，邈已丧殒，议者谓不宜仍用邈名，更以见官奏之。承天又议曰：“既没之名不合奏者，非有它义，正嫌于近不祥耳。奏事一郤，动经岁时，盛明之世，事从简易，曲嫌细忌，皆应荡除。”

承天为性刚愎，不能屈意朝右，颇以所长侮同列，不为仆射殷景仁所平，出为衡阳内史。昔在西与士人多不协，在郡又不公清，为州司所纠，被收系狱，值赦免。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国史。承天年已老，而诸佐郎并名家年少，颍川荀伯子嘲之，常呼为妳母。承天曰：“卿当云凤凰将九子，

妳母何言邪!”寻转太子率更令,著作如故。

时丹阳丁况等久丧不葬,承天议曰:“礼所云还葬,当谓荒俭一时,故许其称财而不求备。丁况三家,数十年中,葬辄无棺槨,实由浅情薄恩,同于禽兽者耳。窃以为丁宝等同伍积年,未尝劝之以义,绳之以法。十六年冬,既无新科,又未申明旧制,有何严切,歔然相纠。或由邻曲分争,以兴此言,如闻在东诸处,此例既多,江西淮北尤为不少。若但谪此三人,殆无整肃。开其一端,则互相恐动,里伍县司,竟为奸利。财赂既逞,犹讼必繁,惧亏圣明烹鲜之美。臣愚谓况等三家,且可勿问,因此附定制旨,若民人葬不如法,同伍当即纠言,三年除服之后,不得追相告列,于事为宜。”

十九年,立国子学,以本官领国子博士。皇太子讲《孝经》,承天与中庶子颜延之同为执经。顷之,迁御史中丞。时索虏侵边,太祖访群臣威戎御远之略,承天上表……

承天素好弈棋,颇用废事。太祖赐以局子,承天奉表陈谢,上答:“局子之赐,何必非张武之金邪。”承天又能弹箏,上又赐银装箏一面。承天与尚书左丞谢元素不相善,二人竞伺二台之违,累相纠奏。太尉江夏王义恭岁给资费钱三千万,布五万匹,米七万斛。义恭素奢侈,用常不充,二十一年,逆就尚书换明年资费。而旧制出钱二十万,布五百匹以上,并应奏闻,元辄命议以钱二百万给太尉。事发觉,元乃使令史取仆射孟颺命。元时新除太尉谘议参军,未拜,为承天所纠。上大怒,遣元长归田里,禁锢终身。元时又举承天卖茭四百七十束与官属,求贵价,承天坐白衣领职。元字有宗,陈郡阳夏人,临川内史灵运从祖弟也。以才学见知,卒于禁锢。

二十四年，承天迁廷尉，未拜，上欲以为吏部，已受密旨，承天宣漏之，坐免官，卒于家，年七十八。先是，《礼论》有八百卷，承天删减并合，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并《前传》、《杂语》、《纂文》、论并传于世。又改定《元嘉历》，语在《律历志》。

祖冲之传

——《南齐书》卷五二

【说明】祖冲之（公元 429—500 年），字文远，范阳蓟县（今北京城的西南）人。南北时南朝著名科学家，生活于宋、齐统治时代，他的曾祖台之在东晋，祖父昌、父朔之在宋做官。祖冲之年轻时曾在华林园工作，不久又到南徐州（治所在今江苏镇江市）做官，担任过娄县令（治所在今江苏省昆山东北）。后来调回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担任接待宾客、引见臣下、传达使命的政府官员谒者仆射。晚年主张开屯田，广农殖，又要兴造大业，但都未实行。齐永元二年（公元 500 年）去世，终年七十二岁。

祖冲之的一生，除做官外在科学研究方面也不遗余力，在天文历法、数学和机械制造等学科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他于公元 463 年制成有名的《大明历》，其中有不少改进和创见，如把岁差引进历法，发现交点月等。

祖冲之还是一位卓越的机械制造家，他制造过指南车、水碓磨、千里船和其他运输工具。

祖冲之又是一位博弈游戏的能手，当时没人能和他相比。对古代的《易经》、《老子》、《庄子》、《论语》、《孝经》等也

都进行过研究。

祖冲之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杰出科学家，他在数学领域的重大成就早已得到国内外的公认。

祖冲之字文远，范阳郡蓟县人。祖父名昌，在刘宋时担任过大匠卿。父亲名朔之，做一散官奉朝请。

冲之少年时代就研习古事，思想机敏。刘宋孝武帝把他安排在华林园省察工作，赐给他住宅、车马和衣物。又派他到南徐州任从事史，走上仕途，后来被调回中央任公府参军。

刘宋元嘉时，所使用的历法为何承天所制《元嘉历》，比古代十一家历法为精密，可祖冲之认为还是粗疏，于是更造新的历法。给皇帝上奏说：

我广泛搜访前人书籍，深入研究古代经典，五帝时的躔次，三王时的交分，《春秋》中的气朔，《竹书纪年》中的薄食，司马谈、司马迁的载述，班彪、班固的列志，曹魏时的注历，晋代的《起居注》，以寻求古今的不同，考察总结了华族和少数民族的历法。有文字以来，二千多年，日、月相离相会的迹象，五星行度疏密之验证。我是专门下功夫入迷似的思考，都是能够知道而可讲述的。特别是自己测量圭尺，亲自观察仪器和计时器漏刻，眼睛完全看到毫厘小数，心中进行计算，考查变迁，这就深入掌握了其它历法的详情了。

然而古代历法粗疏错误，大都不够精密，各家互相矛盾，他们未能研究出对它的正确认识。等到何承天所献上的历法，他愿望是要改革，可是设置的法则简略，现

在已经差远了。根据我的校验，看到它的三个错误：日月所在位置，发觉其误差有三度；冬至、夏至晷影长度几乎失误一天；五星见伏的日期，误差达到四十天，留逆进退，有的推移了两个星宿。春秋分冬夏至失去真实，则节气置闰就不正确；宿度不与天象实际相符，则等候观察就无准。我生逢圣明的时候，都赶上好运气，敢于拿出愚盲，再次创造新的历法。

谨提出改变的设想有二，设置法则的情况有三。改变的第一点：按旧法一章，为十九年设有七闰，闰数多了，经过二百年就差一天。节气置闰既然变动，则要相应改变闰法，日月运行轨道的分纪就屡次迁改，是由于这一条。现在改章法为三百九十一年设有一百四十四闰，令其符合周代、汉代之法，那么将来就能永远使用，不会再出现误差变动。第二点：根据《尚书·尧典》所说“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以此推之唐尧之世的冬至日，在现在星宿之左边差不多五十度。汉代初期，仍用秦代历法，冬至日在牵牛六度。汉武帝改革建立《太初历》，冬至日在牵牛初度。后汉的四分历，冬至日在斗宿二十二度。晋代的姜岌用月食检验日之所在，知道冬至日在斗宿十七度。现在参照中星，考查日月交食和朔望变化，冬至之日，在斗宿十一度。通而计之，不满一百年，就差了二度。旧法都令冬至日有固定位置，天文数据既然差错，则日月五星的宿度，就逐渐出现错误。乖谬既然显著就相应改变。这样做止能符合一时，而不能通行长久。改来改去不停，又是由于这条。现在知道冬至所在位置

岁岁微差，回过头检验汉代历注，都很慎密，将来永久施用，不必烦劳屡次修改。还有设置法则，其一，以子时为时辰之首，（从方向来说）子位在正北，卦爻应在初九为升气的开始，虚为北方七宿之中宿。元气的发端，应当在这个“次”。前代学者虞喜，详细讨论了其意义。我的历法上元度日，发端于虚宿。其二，用日辰之号子，甲子日为前导，历法设起算年（上元），应当在此年。但是黄帝以来，世代所用，总共有十一种历法，“上元”之年，没有相当于这个名称的。我的历法上元那年在甲子。其三，以上元之年，历法中的众多条款，都应以此为（计算的）起点。可是《景初历》的交会迟疾，历元的开始参差不齐。又如何承天的历法，日月五星，各自有各自的历元，交食迟疾，也都设置不同起点，剪裁使得朔气相合而已，条件次序纷繁错误，未达到古代的意境。现在设法使日月五星交会迟疾，都是以上元岁首为起点，众多支流有共同的源泉，大多没有错误。

如果对定形进行测量，就得到真实效果。悬挂的星象显著明亮，用圭表等仪器测验可推算，变动的气虽不明显而微弱，可用径寸的竹管候测不会有差错。现在我所建立的，容易使人取信。但是综合研究始终，大多存在不精密，革新变旧，有简有繁。用简的条款，道理上不必自我恐惧；用较繁的意思，不过不是谬误。为什么？就是记闰不整齐，数据各有分数，把分数做为主体，并非不细密，我这样做是特别珍惜毫厘之类的小数，以完成求解出美妙之则，不去掉累积，以成就永久固定的著

述，不是经思考而不知道，也不是明白了还不改。如果所献上的历法万一可以采用，我愿意由皇帝向各部门宣传，给予详细考究。

上报到皇帝，孝武帝令朝廷的官员们懂得历法的提出质难，而不能使他屈服。可是正赶上孝武帝逝世未能施行。派祖冲之出去担任娄县令，又调回任谒者仆射。当年宋孝武帝平定关中时缴获后秦姚兴时制作的指南车，有外部形状而没有机巧，每当行走，使人在车内旋转指向。到宋升明时，齐太祖肖道成辅佐朝政，使祖冲之按古法修造指南车。祖冲之改用铜制机械，圆转不穷，而指示方向保持不变，是三国时马钧以来所没有的。当时有一位北方人索驭麟，也说能制造指南车，肖道成就让他与祖冲之各造一辆，让他们在京城之乐游苑相对同时进行校对试验，结果索驭麟的颇有偏差，于是折毁烧掉了。齐永明（公元483—493年）中，竟陵王肖子良爱好古物，祖冲之制造了一件欹器献给他。

文惠太子肖长懋在东宫，看到了祖冲之的历法，启奏给齐武帝施行，文惠太子不久死去，事情又被搁置。祖冲之转任长水校尉，领本职。他写作《安边论》奏章，建议开屯田，发展农殖。齐建武（公元494—498年）中，明帝肖鸾派祖冲之巡行四方，兴造大业，可以有利于百姓，恰好连年有战争，事情终于没有实行。

祖冲之懂得乐律学，博塞游戏当时独绝，没有能和他匹敌的。他认为诸葛亮有木牛流马，于是制造一件器械，不依靠风、水，施用机关能自己运行，不靠人力。又造千里船，在长江的新亭江段试验，一日能走一百多里。在乐游苑造水碓

磨，齐世祖即武帝亲自到场观看。又特别精通数学。永元二年（公元500年），祖冲之去世，终年七十二岁。著《易经》、《老子》、《庄子》义，注释《论语》、《孝经》，注解《九章算术》，著《缀术》数十篇。

（李 迪 译）

【原文】

祖冲之字文远，范阳蓟人也。祖昌，宋大匠卿，父朔之，奉朝请。

冲之少稽古，有机思。宋孝武使直华林学省，赐宅宇车服。解褐南徐州迎从事，公府参军。

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制历，比古十一家为密，冲之以为尚疏，乃更造新法。上表曰：

臣博访前坟，远稽昔典，五帝躔次，三王交分，《春秋》朔气，《纪竹》薄食，谈、迁载述，彪、固列志，魏世注历，晋代《起居》，探异今古，观要华戎。书契以降，二千余稔，日月离会之徵，星度疏密之验。专功耽思，咸可得而言也。加以亲量圭尺，躬察仪漏，目尽毫厘，心究筹策，考课推移，又曲备其详矣。

然而古历疏舛，类不精密，群氏纠纷，莫审其会。寻何承天所上，意存改革，而置法简略，今已乖远。以臣校之，三睹厥谬，日月所在，差觉三度，二至晷影，几失一日，五星见伏，至差四旬，留逆进退，或移两宿。分至失实，则节闰非正；宿度违天，则伺察无准。臣生属圣辰，询逮在运，敢率愚瞽，更创新历。

谨立改易之意有二，设法之情有三。改易者一：以

旧法一章，十九岁有七闰，闰数为多，经二百年辄差一日。节闰既移，则应改法，历纪屡迁，实由此条。今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闰，令却合周、汉，则将来永用，无复差动。其二：以《尧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以此推之，唐尧世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许度。汉代之初，即用秦历，冬至日在牵牛六度。汉武帝改立《太初历》，冬至日在牛初。后汉四分法，冬至日在斗二十二。晋世姜岌以月蚀检日，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参以中星，课以食望，冬至之日，在斗十一。通而计之，未盈百载，所差二度。旧法并令冬至日有定处，天数既差，则七曜宿度，渐与舛讹。乖谬既著，辄应改易。仅合一时，莫能通远。迁革不已，又由此条。今令冬至所在岁岁微差，却检汉注，并皆审密，将来久用，无烦屡改。又设法者，其一：以子为辰首，位在正北，爻应初九升气之端，虚为北方列宿之中。元气肇初，宜在此次。前儒虞喜，备论其义。今历上元日度，发自虚一。其二：以日辰之号，甲子为先，历法设元，应在此岁。而黄帝以来，世代所用，凡十一历，上元之岁，莫值此名。今历上元岁在甲子。其三：以上元之岁，历中众条，并应以此为始。而《景初历》交会迟疾，元首有差。又承天法，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交会迟疾，亦并置差，裁得朔气合而已，条序纷错，不及古意，今设法日月五纬交会迟疾，悉以上元岁首为始，群流共源，庶无乖误。

若夫测以定形，据以实效。悬象著明，尺表之验可推；动气幽微，寸管之候不忒。今臣所立，易以取信。但

综核始终，大存缓密，革新变旧，有约有繁。用约之条，理不自惧，用繁之意，顾非谬然。何者？夫纪闰参差，数各有分，分之有体，非常细密，臣是用深惜毫厘，以求全妙之准，不辞积累，以成永定制，非为思而莫知，悟而弗改也。若所上万一可采，伏愿颁宣群司，赐垂详究。

事奏。孝武令朝士善历者难之，不能屈。会帝崩，不施行。出为娄县令，谒者仆射。

初，宋孝武平关中，得姚兴指南车，有外形，而无机巧，每行，使人于内转之。升明中太祖辅政，使冲之追修古法。冲之改造铜机，圆转不究，而司方如一，马钧以来未有也。时有北人索驭麟者，亦云能造指南车，太祖使与冲之各造，使于乐游苑对共校试，而颇有差僻，乃焚毁之。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冲之造欹器献之。

文惠太子在东宫，见冲之历法，启世祖施行，文惠寻薨，事又寝。转长水校尉，领本职。冲之造《安边论》，欲开屯田，广农殖。建武中，明帝使冲之巡行四方，兴造大业，可以利百姓者，会连有军事，事竟不行。

冲之解钟律，博塞当时独绝，莫能对者。以诸葛亮有木牛流马，乃造一器，不因风水，施机自运，不劳人力。又造千里船，于新亭江试之，日行百余里。于乐游苑造水碓磨，世祖亲自临视，又特善算。永元二年，冲之卒。年七十二。著《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注《九章》，造《缀述》数十篇。

崔灵恩传

——《梁书》卷四八

【说明】崔灵恩，清河东武城（今山东省武城县西北）人。生卒年不详。少笃学，博通《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尤其精通《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及《三传》（《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他还精通天文，认为盖天说与浑天说实为同一学说。崔灵恩初仕北魏，为太常博士。天监十三年（公元514年）归梁。累迁步兵校尉兼国子博士。他聚徒讲学授业，听者常有数百人。后出任桂州刺史，卒于官。崔灵恩著述甚丰，有《集注毛诗》、《集注周礼》、《三礼义宗》等百余卷之众，其中部分收入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

崔灵恩，清河东武城人。他少年时代即酷爱学习，从师学习儒家的经典，博通《五经》，尤其精通《三礼》和《三传》。他最初曾在北魏作官，任太常博士，到梁天监十三年（公元514年）时才返回梁国。梁高祖萧衍因他精通儒家学说，升其为员外散骑侍郎，接着又晋升为步兵校尉，兼任国子博士。崔灵恩曾招收弟子，讲学授业，前来听讲的常有数百人，

他平时性格朴实无华，但到讲解经文分析义理时却极为精辟细致，当时京城中年长的学者都很赏识他，器重他，他的助手孔奭则特别喜爱他的学说。崔灵恩最初讲习服虔对《春秋左氏传》的注解释义，但在江东地区没有能够流传，后来他立即改为讲解杜预对《左氏传》的释义，对每章每句的训释常常申述服虔的说法而驳难杜预，为说明这些见解，于是他撰写了《左氏条义》一书。当时，有一位名叫虞僧诞的助手，不仅精通服虔的学说，而且也很精通杜预的学说，继崔灵恩之后写成了《申杜难服》一书，用来答对崔灵恩，两书在当时并行于世。虞僧诞是会稽余姚人，当他讲授《春秋左氏传》的时候，前去听讲的也有数百人。僧诞精通《左氏传》义训条例，在当时没有人可与他相比。

过去学者们谈论天文，有些人主张浑天说，有些人则主张盖天说，主张浑天说的人就论证盖天说与浑天说不同，主张盖天说的人则论证浑天说与盖天说不同。崔灵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浑天说与盖天说实为同一种学说。

后来，崔灵恩受朝廷的委任作了长沙内史，归朝后被授官为国子博士，从此以后，他的讲学授业的事业更加兴旺了。其后他又离开京城出任明威将军、桂州刺史，在任职期间去世了。崔灵恩著有《集注毛诗》二十二卷，《集注周礼》四十卷，还撰写了《三礼义宗》四十七卷，《左氏经传义》二十二卷，《左氏条例》十卷，《公羊、谷梁文句义》十卷。

(冯 时 译)

【原文】

崔灵恩，清河东武城人也。少笃学，从师遍通《五经》，

尤精《三礼》、《三传》。先在北仕为太常博士，天监十三年归国。高祖以其儒术，擢拜员外散骑侍郎，累迁步兵校尉，兼国子博士。灵恩聚徒讲授，听者常数百人。性拙朴无风采，及解经析理，甚有精致，京师旧儒咸称重之，助教孔佺尤好其学。灵恩先习《左传》服解，不为江东所行，及改说杜义，每文句常申服以难杜，遂著《左氏条义》以明之。时有助教虞僧诞又精杜学，因作《申杜难服》，以答灵恩，世并行焉。僧诞，会稽余姚人，以《左氏》教授，听者亦数百人。其该通义例，当时莫及。

先是儒者论天，互执浑、盖二义，论盖不合于浑，论浑不合于盖。灵恩立义，以浑、盖为一焉。

出为长沙内史，还除国子博士，讲众尤盛。出为明威将军、桂州刺史，卒官。灵恩《集注毛诗》二十二卷，《集注周礼》四十卷，制《三礼义宗》四十七卷，《左氏经传义》二十二卷，《左氏条例》十卷，《公羊谷梁文句义》十卷。

顾野王传

——《陈书》卷三〇

【说明】顾野王（公元 519—581 年），字希冯，吴郡吴县（今江苏吴县）人。南朝梁陈时代的史学家、文字训诂学家和科学家。他学识渊博，对天文、地理、卜筮、占候、虫篆、史乘、古今文字等无所不通，且造诣很深，并擅长绘画。梁时任太学博士，梁亡入陈后，官至黄门侍郎、光禄卿。

顾野王的著作很多，他曾搜罗和考证古今文字的形体和训诂，于公元 543 年完成字书《玉篇》三十卷，这是我国第一部用楷书字编写的文字字典，其中对一些字字义的解释和所举例证，反映出他具有丰富的科学知识，对后世的字书有较大的影响。此外，还著有《舆地志》三十卷、《玄象表》一卷、《分野枢要》一卷、《符瑞图》十卷、《顾氏谱传》十卷、《续洞冥记》一卷、《通史要略》一百卷、《国史纪传》二百卷，后两部书未出版他就去世了。有文集二十卷。

顾野王字希冯，吴郡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吴县）人。祖父顾子乔，梁代任东中郎武陵王府参军。父亲顾烜，任信威临贺王的记室，兼本郡五官掾，以富有儒家学术而闻名。

顾野王从小就爱好学习。七岁时，读《易》、《书》、《诗》、《礼》、《春秋》五种儒家经书，能略知其大意。九岁时能写文章，曾作《日赋》，领军朱异看了感到惊奇。十二岁时，跟随父亲到建安，便撰写《建安地记》两篇文章。长大以后博览经史等书籍，精记默识，对天文地理、卜筮占候，虫篆奇字，没有不精通的。梁武帝大同四年（公元538年），授予太学博士官衔。后升迁为中领军临贺王府记室参军。梁宣城王作扬州刺史时，顾野王和琅邪王褒都是他的宾客，宣城王非常爱慕顾野王的才华。顾野王又爱好绘画，善于作图书写。宣城王在东府建书斋，就命令顾野王为之作古贤画，又令王褒写赞颂文字，当时的人称他们为二绝。

当梁武帝（公元502—548年）末年降将侯景发动叛乱时，顾野王正遭到父亲的丧事，他回到家乡吴郡，便招募乡丁数百人，跟随义军一同支援京城。顾野王身体素来就清瘦羸弱，身長六尺，又因父亲丧事过度悲痛而伤坏身体，瘦弱得几乎撑不起衣服，他拿着武器，穿上铠甲，陈述君臣之间的忠义、叛逆和顺从的道理，慷慨陈词、表示抗拒叛乱的决心，见到的人无不感慨。京城沦陷后，顾野王逃到会稽（今浙江绍兴），不久又转往东阳郡（今浙江金华），与刘归义军队汇合，共同据守城池，抗拒乱军。侯景被平息后，梁将太尉王僧辩重重嘉奖顾野王，派遣监管海盐县（浙江省北部）。

高祖作宰相时，顾野王为金威将军、安东临川王府的记室参军，不久又转任府咨议参军。天嘉元年（公元560年），皇帝诏令补撰史学士，不久又加招远将军。光大元年（公元567年），授予镇东鄱阳王咨议参军。太建二年（公元570

年)；升迁为国子博士。陈后主在东宫时，顾野王兼任东宫管记，其官仍如原职。太建六年（公元574年），授予太子率更令，不久领大著作，掌国史，主管编撰梁史，兼任东宫通事舍人。当时在东宫任事的官吏有济阳的江总、吴国的陆瓊、北地的傅縡、吴兴的姚察，都才学闻名，而受到重用。顾野王升迁为黄门侍郎，光禄卿，掌管五礼之类的事，此后官职不变。太建十三年（公元581年）去世，当时六十三岁。死后皇上下诏书赠封秘书监。至德二年（公元584年），又赠封为右卫将军。

顾野王从小就专心好学，以毅力坚强而闻名，在物质上无过分要求，言行淡泊，看他的外表容貌，似乎不善于言谈，但做事精明强干，雷厉风行，别人都不及他。他的三弟顾充国早年去世，顾野王抚养其遗孤幼子，恩义深厚。他所撰著的《玉篇》三十卷、《輿地志》三十卷，《符瑞图》十卷，《顾氏谱传》十卷、《分野机要》一卷、《续洞冥记》一卷、《玄象表》一卷，均流传于世。又撰写《通史要略》一百卷，《国史纪传》二百卷，未成书出版就去世了。还有文集二十卷。

（赵慧芝 译）

【原文】

顾野王字希冯，吴郡吴人也。祖子乔，梁东中郎武陵王府参军事。父烜，信威临贺王记室，兼本郡五官缘，以儒术知名。

野王幼好学。七岁，读五经，略知大旨。九岁能属文，尝制《日赋》，领军朱异见而奇之。年十二，随父之建安，撰《建安地记》二篇。长而遍观经史，精记嘿识，天文地理、蓍

龟占候、虫篆奇字，无所不通。梁大同四年，除太学博士。迁中领军临贺王府记室参军。宣（成）城王为扬州刺史，野王及琅玕王褒并为宾客，王甚爱其才。野王又好丹青，善图写，王于东府起斋，乃令野王画古贤，命王褒书赞，时人称为二绝。

及侯景之乱，野王丁父忧，归本郡，乃召募乡党数百人，随义军援京邑。野王体清羸，裁长六尺，又居丧过毁，殆不胜衣，及丈戈被甲，陈君臣之义，逆顺之理，抗辞作色，见者莫不壮之。京城陷，野王逃会稽，寻往东阳，与刘归义合军据城拒贼。侯景平，太尉王僧辩深嘉之，使监海盐县。

高祖作宰，为金威将军、安东临川王府记室参军，寻转府咨议参军。天嘉元年，勅补撰史学士，寻加招远将军。光大元年，除镇东鄱阳王咨议参军。太建二年，迁国子博士。后主在东宫，野王兼东宫管记，本官如故。六年，除太子率更令，寻领大著作，掌国史，知梁史事，兼东宫通事舍人。时宫僚有济阳江总，吴国陆瓊，北地傅縡，吴兴姚察，并以才学显著，论者推重焉。迁黄门侍郎，光禄卿，知五礼事，余官并如故。十三年卒，时年六十三。诏赠秘书监。至德二年，又赠右卫将军。

野王少以笃学至性知名，在物无过辞失色，观其容貌，似不能言，及其励精力行，皆人所莫及。第三弟充国早卒，野王抚养孤幼，恩义甚厚。其所撰著《玉篇》三十卷，《舆地志》三十卷，《符瑞图》十卷，《顾氏谱传》十卷，《分野机要》一卷，《续洞冥纪》一卷，《玄象表》一卷，并行于世。又撰《通史要略》一百卷，《国史纪传》二百卷，未就而卒。有文集二十卷。

高 允 传

——《魏书》卷四八

【说明】高允（公元390—487年），字伯恭，渤海蓍（今河北景县）人。高允出身于官宦世家，少年好学，常担笈负书，千里就学。他博通经史天文术数之学，尤好《春秋公羊传》。初为郡功曹。北魏太武帝神䴥四年（公元431年），征为中书博士，他曾奉诏与崔浩同撰国史，与公孙质、游雅等共同议定律令，并为师以经籍教授太子。崔浩因国史案被杀后，他由于太子的保护，未受株连。高允主张重农积粟，他劝说太武帝拓跋焘解除田禁，把田地分给人民。文成帝拓跋濬时，位至中书令。文明太后临朝，引他参与大政，并采纳他的建议，开始在郡国立学。高允前后历经五帝，出入三省，身居要职五十余年。享年九十八岁。

高允深通天文历算，但很少推步，他认为对天文术数之学不可空论，必须言之有物，谨慎推算。崔浩曾聚诸儒考校自汉以后的日月交食和五星行度，并讥笑旧史中的谬误，另为新历。高允阅后，指出新历所据西汉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东井的天象是错误的，如不能辨别此误，则今天我们讥笑古人，待将来我们的后人就要讥笑我们了。后崔浩更细致推考，

果如高允所言，五星聚于东井的天象应提前三个月，而不在冬十月。这个结果与现代天文学研究相符。

高允一生著述甚丰，有《左氏释》、《公羊释》、《毛诗拾遗》、《议何郑膏肓事》等，又著有算术方面的著作三卷，今皆散佚。明人辑有《高令公集》。

高允，字伯恭，勃海人。祖父高泰，事迹收入高允叔父高湖的传记中。父亲高韬，少年时代即以见识高明、才智过人而闻名，颇受同乡封懿的敬慕。高韬曾在后燕任慕容垂的太尉从事中郎。北魏太祖拓跋珪攻破后燕都城中山后，封韬为丞相参军。但英年早逝。

高允自幼便成了孤儿，人很早熟，有着非凡的气度，清河人崔玄伯见他后极为惊异，赞叹说：“高子内心德行高尚美好，神情文雅明朗，如镜子能够外照一样，将来必能成大器，而为一代人杰，只可惜我恐怕不能亲眼看到了。”在高允十几岁的时候，祖父去世，他为奔丧回到家乡，把家产交给两个兄弟管理，自己出家作了僧徒，释名法净。不久后还俗。高允生性喜爱文史典籍，身背书籍，不远千里拜师求学。他知识广博，对历史和儒家的经典，以及天文、历法、占卜等学问都很精通，尤其喜爱《春秋公羊传》一书。曾被郡守征聘为功曹。

北魏神䴥三年，世祖太武帝的舅舅阳平王杜超临时代行征南大将军，镇守邺城，任高允为从事中郎，这时他已四十多岁了。当时正值春天，但很多州郡中的囚徒还不能处置，杜超于是命高允与中郎吕熙等人分别前往这些州郡，评议刑罚

事务。吕熙等人贪污受贿，都因此而犯了罪，只有高允一人
为官清廉，获得了奖赏。卸官后他回到家乡，以教书为生，学
生有千余人。神䴥四年，高允与卢玄等人一起被朝廷征聘，封
为中书博士。后来升任为侍郎，与太原人张伟一起以侍郎兼
领卫大将军及乐安王拓跋范的从事中郎。世祖太武帝的弟弟
拓跋范，备受宠爱，他在陇西镇守长安时，曾得到高允多方
面的扶正和帮助，大受裨益，深得秦地人民的拥戴。不久，高
允被征召回朝。高允曾作过一首《塞上翁诗》，诗中饱含了心
酸和喜悦，抒发了他离开秦地时的得意与失落的心情。骠骑
大将军，乐平王拓跋丕西征上珪时，高允又以侍郎的身份参
议拓跋丕军中的作战事务。有关的事迹收在《乐平王丕传》中。
魏军平定凉州后，高允因参议谋划有功，被赐汶阳子的爵位，
并兼领建武将军。

此后，魏帝颁诏令高允与司徒崔浩共同著述国史，写成
《国记》，兼任著作郎。当时，崔浩召集了很多通晓天文历法
的人，考证校定自汉代建国以来日食月食和金木水火土五星
的运动行度，并检查旧史中的失谬，另外制定了魏国的历法，
然后拿给高允看。高允说：“天文历法不可以作没有证据的空
谈，要想将距今很远时代的天象推算准确，必须首先检验对
距今较近的时代的的天象的推算结果。况且汉代元年仲冬十月，
金、木、水、火、土五星汇聚在东井宿的说法，实际是对历
法的浅薄不识之论。今天我们讥笑汉代的史官，反而却不能
察觉这种说法的错误，恐怕将来我们的后人会象我们现在讥
笑古人一样地讥笑我们了。”崔浩说：“你所说的谬误指的是
什么？”高允道：“考查《星传》，金、水二星常常在距太阳很

近的地方运行。仲冬十月的凌晨，太阳运行到尾宿和箕宿附近，黄昏时从西南方落下，而东井宿此时正从东北方升起。有什么理由说金、水二星会跑到正对着太阳的最远的地方运行呢？这是因为史官想要把事情神化，所以不再依据天象运动的规律来推算的结果。”崔浩说：“想要改变天象并没什么不可以，您难道不怀疑木、火、土三星能汇聚在一起吗？为什么只对金、水二星的往来运行感到奇怪呢？”高允道：“这些事不可以作没有根据的争论，最好还是深入地研究一下为好。”当时在座的人都感到奇怪，只有东宫少傅游雅说：“高君擅长历法，他的说法应当是有根据的。”一年多以后，崔浩对高允说：“过去我们所争论的问题，我本来并没有认真的思考，后来经过进一步的考证研究，果然象你说的一样，五星应提前三个月汇聚在东井宿，而不是在十月。”他又对游雅说：“高允的学问如此精深，我却不知道，就象钟阳元不知魏舒的箭法高明一样。”于是大家对高允都很叹服钦佩。高允虽然精通历法，但最初并不做推算，而且对于自己的这种谨慎做法很有说辞。只是游雅屡次向他请教有关灾害和奇异天象的问题。高允说：“古人说过，真正了解一件事是很难的，已经了解了又怕了解得不全面，因此还不如不了解。天下玄妙的道理极多，怎么能问这些事呢。”游雅从此便不再提问了。

不久，高允在作本官的同时兼作了秦王拓跋翰的老师。其后，世祖让他教授恭宗学习儒家经典，受到了很高的礼遇。同时又令高允与侍郎公孙质、李虚、胡方回共同议定法令条文。世祖推荐高允参与讨论刑罚和治国之策，他的见解非常符合世祖的主张。于是世祖向他征询道：“国家政务繁多，什么事

应该最先处理呢？”当时全国的土地多遭封禁，而且京城中不靠务农而吃饭的人非常多。因此高允说：“臣小时候穷苦，只懂得种地，请允许我谈论农业的事情吧。古人说：一平方里的土地可开垦良田三顷七十亩，一百平方里的土地则可开垦良田三万七千顷。如果辛勤地耕耘，每亩就可以增产三斗粟米，如果懒惰则会减少三斗。这样一来，一百平方里的良田，增产或减产粟米的总数就可以达到二百二十二万斛，况且天下的良田如此广大，增产或减少的粟米又该有多少呢？如果官府和农户都有积蓄的粮食，那么即使遇上饥荒的年景，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世祖认为这个设想非常好。于是解除对土地的封禁，把良田都授给了农民。

当初，崔浩举荐提拔了冀、定、相、幽、并五州的数十人，初次为官就当郡守。恭宗对崔浩说：“在他们之前已经征聘了很多，也是从各个州郡中选拔的，这些人在职的时间已经很长，勤勤恳恳地工作，但未能得到任何报答。现在可以先把过去征聘的人补充到其他郡县任职，然后以新征聘的人代行郎吏一级的官职。而且郡守县令要管理民众，所以最好任用那些经历丰富的人。”崔浩固执地与太子恭宗争辩，并派遣了他自己选拔的那些人。高允听说此事后，对东宫博士管恬说：“崔公不能幸免了！如果他非要以他的这种错误做法来和殿下较量，并要争个胜负，怎么还能平安度日呢？”

辽东公翟黑子深受世祖的恩宠，他奉公出使并州时，竟收受上千匹布的贿赂，事情很快就被发现了。于是黑子来向高允请教对策，他说：“如果圣上向我问及此事，我是自首伏罪呢，还是避而不答？”高允道：“公是朝廷中的宠臣，回答

圣上的提问时最好说实话。并且要告诉圣上你对朝廷的忠诚，这样你的罪也就不会太大了。”而中书侍郎崔览和公孙质等人却不这样认为，他们都说，一旦自首从实招认，获罪是大是小实在无法测度，因此最好是回避不说。黑子认为崔览等人更关心自己，反怒气冲冲地对高允说：“按您说的去做，简直就是引诱我去送死，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不直说呢！”于是就与高允绝交了。后来，黑子在回复世祖的提问时没能说实话，终于被世祖疏远，最后获罪而遭杀戮。

当时，著作令史闵湛和郗擢因性格奸佞，巧言奉迎，深为崔浩所信任。他们看到崔浩注的《诗经》、《论语》、《尚书》和《易经》后，立即上书魏帝，声称马融、郑玄、王肃和贾逵等人，虽然都注释讲述过《六经》，但都存在疏漏和错误，不如崔浩的注解精辟。建议广泛搜集国内的各种书籍，藏入官府。然后颁行崔浩对儒家经典的注解，让天下人学习。并请求魏帝降旨，让崔浩注解《礼传》，使后人能够了解正确的经义。崔浩也上表推荐闵湛，称他有著述才能。而后，闵湛又劝崔浩把他所撰写的国史刊刻上石，以便万世流传，他的目的是想使崔浩撰写国史时秉笔直书，对拓跋部的事迹记录得既详备又不雅观的情况得到更充分的表现。高允听说此事后，对著作郎宗钦说：“闵湛所做的一切，分寸之间，恐怕就会导致崔家遭受百年不遇的大难。我的门徒中可没有这种人。”不久，大祸降临了。

当初，崔浩被拘捕后，高允则在中书省内值班。恭宗派东宫侍郎吴延去叫高允，并把他留在宫内暂住一夜。第二天，恭宗要入朝拜见世祖，让高允一起陪同前往。走到宫门前，恭

宗对高允说：“入朝后当见到圣上的时候，我自然会引导你的。倘若圣上有事问你，你只管依着我的话说。”高允问恭宗：“为了什么事要这样做呢？”恭宗说：“进去自然就知道了。”入朝后见到了魏帝，恭宗说：“中书侍郎高允自在臣的宫中以来，已共同相处了多年，他做事小心谨慎而且周密，臣确实非常了解他。虽然他与崔浩同做一事，然而高允低微，都是听从崔浩的主张。请饶恕他的性命吧。”世祖把高允叫到面前，对他说：“《国书》是否都是由崔浩撰写的呢？”高允答道：“《太祖记》是前著作郎邓渊所撰。《先帝记》和《今记》是臣与崔浩共同撰写的。然而崔浩多做综合的工作，只是统筹裁定而已。至于史中注解疏证的部分，臣做的比崔浩多。”世祖听后勃然大怒，说道：“这个罪比崔浩还重，怎么能留他活路！”恭宗急忙说：“高允是小臣，见到圣上威严庄重的样子，就语无论次了。臣曾经详细地问过高允，他每次都说是崔浩写的。”世祖问高允：“果然象太子所说的吗？”高允答道：“臣才质平庸，著述写作时谬误百出，冒犯了天威，此罪理应灭族，如今臣已甘愿受死，所以不敢不说实话。殿下因为臣长期为他讲习授课，所以可怜臣，为臣祈求活命。其实他并没有问过臣，臣也没有说过那些话。臣回答圣上的都是实话，不敢心神无主。”世祖对恭宗说道：“正直啊！对一个人来说，这已经是很难做到的了，而且能够至死不移，不就更难了吗！而且他对我说的都是实话，真是忠臣啊。就为他的这些话，我宁愿不追究他的罪，最好还是宽恕了他吧。”高允终于被赦免了。世祖于是把崔浩叫到面前，让人诘问他。崔浩非常惶恐，不能答对。而高允却对每件事情都能郑重说明，有条有理。所

以当时世祖更加生气了，命高允撰写诏书，自崔浩以下，僮仆及小吏以上，共一百二十八人，均夷灭五族。高允迟疑着没有动笔，世祖则频频下令急切地催促。高允祈求再次拜见圣上，然后再动笔撰写诏书，于是世祖把他叫到跟前，高允说道：“崔浩所犯的罪，如果还有除著述国史之外的其他什么原因的话，那不是臣胆敢知道的。倘若只因国史一事，那么，秉笔直书，坦率写作虽然对朝廷有所触犯，但也还不至于处死呀。”世祖勃然大怒，命武士将高允拘捕起来。恭宗赶快恭敬地为高允请罪。世祖说：“如果没有这个人对我表示忿然不满，早就有几千人被斩了。”崔浩最后终于被杀，而且灭了五族，其他人也都惨遭杀戮。宗钦在临死之前，曾感叹说：“高允大概是个圣人吧！”

事过之后，恭宗责备高允说：“人应当能够把握时机，审时度势，不能审时度势，书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那时候，我一开始就引导卿回复圣上的提问，为什么不顺着我的话说，以至于把圣上气成那个样子。每当想起此事，就让人心惊肉跳。”高允说：“臣是出生于东方荒野中的凡夫俗子，本来并没有做官的打算。恰好遇上了太平盛世，在朝廷征聘贤士的时候，也就应选了。于是脱去布衣，穿上官服，在中书省任职，而且还经常在麒麟阁参与校勘典籍。那些白拿着朝廷的奉禄而又不做事的官员都很荣耀，而真正有才干的人却被压制不能任用，这种局面已经太久了。史书乃是帝王行为的真实记录，是为后代留下的一个明确鉴戒，这样才能使今人可以了解古人，而后人也可以了解今天。正因为言行举止都要详细记载，所以帝王的行为才要格外谨慎。然而崔浩一家虽

世代都蒙受朝廷特殊的礼遇，在当时是非常显赫的大族，但他辜负了圣上对他的恩宠，自取灭亡。但即使对崔浩的这些做法，在当时也还是有值得讨论的余地的。崔浩才智疏弱，象蓬蒿一样，却担负着栋梁般的国家重任，在朝中他缺少正直的节操，在家中也不能与亲人和睦相处，个人的贪欲早已使他忘记了作为朝臣的廉洁之本，个人的爱憎早已取代了正直与真理，这些都是崔浩的责任。但是，至于记录朝廷日常生活的种种事迹，谈论国家事务的正确与失误，这些却也都是史书中的要点，不能与事实有太多的违背。然而，臣与崔浩实际上共同参与此事，不论生死荣辱，按理说两人本不应该有什么不同，实在是由于蒙受了殿下极大关怀，才违心地苟且幸免，这并不是臣的本意。”恭宗听后非常感动，赞叹了一番。高允后来对人说，我没有接受太子的引导，是唯恐辜负了翟黑子，因为当初我就是这样教导他的，所以现在我自己也应该这样做。

恭宗在去世前的几年中，对自己身边的人非常亲近，并自己营造田园，靠他们来获取财利。高允规劝他说：“天地没有私欲，所以天能够覆盖着大地，而大地能够生长万物；帝王没有私欲，所以能够包养天下。过去贤明的君主，都以极公正的态度从政治民，所以把金银留藏在山中而不去开采它，把珍珠留藏在深水中而不去捕捞它，用这些事实将自己的无私昭告天下人，用自己的节俭教诲天下人。所以赞美之声四起，万代传颂。今天，殿下作为国君的继承者，四海归心，您的言行举止，将成为天下人效法的榜样，而您却营造私人田园，畜养鸡犬，甚至在市集上贩酒，还与市民讨价还价，以

至于使议论之声到处流布，而难以补救和掩盖。天下乃是殿下下的天下，您富有得享有了四海之内的一切，还有什么想要而得不到的呢，有什么欲望不能满足呢，反而去和那些男女商贾争夺蝇头小利。从前虢国将要灭亡的时候，神从天上降临了，赐给他们土地田园，最后竟丧失了国家。汉灵帝不学习君主的庄重威严，而喜欢与宫中的人摆摊贩卖，自己建立了府库，经营小利，最后使国家发生了颠覆混乱的灾难。前车之鉴就象现在您所做的一样，非常可怕呀。一个作君主的人，在选择用人时必须慎重，仔细观察。所以人们把知人善任叫作哲，这一点对于帝王来说是困难的。《商书》说：‘不要接近小人’，孔子也说过，你亲近了小人，他就会对你无礼，你疏远了小人，他就会怨恨你。武王亲近周公、邵公、姜太公和毕公，所以能称王天下。殷纣王亲近飞廉、恶来，所以国家灭亡了。纵观古今的社稷存亡之际，没有不是由于亲近小人所致。现在殿下总发自内心地感叹缺少人才，实际上贤达之人并不少。近来在您身边侍奉您的那些人，恐怕都不是治国安邦的材料。所以希望殿下能够稍微倾听一下臣的话，排斥奸佞邪恶的小人，亲近忠良，把归自己所有的田园分给贫苦的人，找准时机把畜养和贩卖之事也结束了。只有这样，听到赞美之声的那一天才会到来，而指责之声也就可以平息了。”恭宗并没有接受高允的劝告。

恭宗死后，高允很久都没有入宫进见圣上。后来世祖召见他，高允入宫时，走上台阶就开始抽泣，悲痛得不能自制。世祖见此情景，也跟着哭了，并命高允出使，离开京城。朝臣们都不知因为什么缘故，彼此说道：“高允没遇到什么值得

悲泣的事呀，让圣上如此哀伤，究竟为什么呢？”世祖听到后，把他们招呼过来说：“你们不知道高允的悲痛吗？”朝臣们说：“臣等看到高允不说话，只是哭泣，而陛下为这事很悲伤，所以偷偷地说几句。”世祖说：“崔浩被杀时，高允也应当一同处死，由于太子苦谏，才得以幸免。今天太子不在人世了，高允看到我因此很悲痛。”

高允后来上表说：“前些年圣上下诏，命臣汇集各种天文及灾异现象，并与人间的各种事情相互联系，既要精练又要值得一看。臣听说箕子陈述治国的方略而写成《洪范》，孔子讲述鲁国的历史而著成《春秋》，这些都是宣扬各种治国安民的法规、恭敬地观测天象的例子。所以，根据人们行善还是做恶，天马上就会作出反应而出现灾难或奇异的天象，随着人们的成功或失败，天马上也会应验而降临灾祸或福禄。天与人其实相距很远，但所得到的报应，其速度却象回声一样快，真是太可怕了。自古以来，历代帝王之中，没有一位不尊崇这个天人感应的规律，并以这个法度作为考核的标准来整饬国家，修德行善的。在他们之后，史官都要把那些事情记录在案，以便作为行动的戒鉴。汉成帝时，光禄大夫刘向见国家的命运将有危难，权力旁落外戚手中，所以屡次上表陈述出现了妖异天象，但都未被采纳。于是以《洪范》和《春秋》二书中有关上天已对人间的恶迹有所报应而出现了灾异天象的内容加以解释，希望以此使君主有所触动而醒悟，但皇帝终究还是没有对现状进行治理察问，最后终于导致了国家的灭亡。这难道不是很悲哀的吗！尊敬的陛下，您的神威与武功效法皇天，英明而远见灼识，并以非常恭敬的态度来

考查古代，一切都按照传统的规矩行事，对古代的言论行为，无不深入地鉴别品评，这些都是先帝所不及的。臣才疏学浅，孤陋寡闻，恐怕没有能力为圣上开扩见闻，使您有所裨益，并且恭敬地实现您英明的意旨。今天臣郑重地依照《洪范传》、《天文志》，将其中有关事实的要点摘出，并加以汇集，省略掉那些修饰性的言辞，一共录成八篇。”世祖阅后认为很好，说道：“高允对灾异现象的精通程度，难道不如崔浩吗？”到高宗即位以后，高允辅佐新君，表现出很高的谋略。当时，司徒陆丽等人受到了重赏，而高允却没有受到什么奖励，对于此事，他至死都没有一句怨言。这些事情表现了他对朝廷的忠诚，为人谦逊而不好夸耀的品行。

给事中郭善明，生性机智乖巧，想在皇帝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才能，于是劝高宗大兴土木，营建宫殿。高允劝阻道：“臣听说太祖道武皇帝在平定天下之后，才开始营建都城，但所有的工程，不等到农闲的时候绝不动工兴建。现在国家已经建立很久了，各种宫室都已建造齐备，永安前殿足可以让君主接受万国宾客的朝见，西厢温暖的房间也足可以安置侍奉圣体，登上紫色的楼阁临望，远近可一览无余。如果大范围地修建雄伟华丽的宫殿，目的只是为了奇异好看，那最好还是慢慢地建，不可仓促行事。统计起来，修建这些宫殿，斫制石木材，运送土方，以及各种杂劳役，总共需要二万人，壮年男子承担这些劳役，老人小孩送水送饭，总计则达四万人，而且需要半年时间才能完成。古人说过：一个男人不耕种，就会有人挨饿；一个妇女不织布，就会有人受冻。何况数万人之多，所造成的损失和浪费就太大了。回首想想古代的事实，

再来检验今天，必然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圣上确实应该再考虑考虑为好。”高宗采纳了这些建议。

高宗继承了太平事业，但依旧沿袭着鲜卑的风俗习惯，婚丧嫁娶都不遵循中原的传统仪式，于是高允规劝道：

先帝在世之时，多次颁发圣明的诏令，婚姻嫁娶之时不得演奏音乐，送殡埋葬之日也不得唱歌、击鼓跳舞、杀牲和焚烧祭品，这一切都要禁止。虽然这些规定已颁布了很久，但风俗仍然没有改变。而且由于身居高官的人不能改悔，平民百姓也渐渐习惯而成为风俗，对人民教育的荒废，竟到了今天这般地步。过去周文王在百里大小的侯国中，不论整饬德政民风，还是颁布政令，首先从自己和妻子做起，而后再要求他的兄弟，最后才到天下的百姓，终于占有了三分之二的天下。这表明统治者无论做什么事，都要首先从自己和亲人做起。《诗经》说：“教育你的亲属行善无恶，天下人就都会效仿了。”所以，君主的一举一动不可不谨慎啊。

《礼记》说：有女儿出嫁的人家，三日燃烛不灭；迎亲娶妻的人家，三日不能奏乐。今天各王纳室娶亲，都由乐部供给艺伎，以供嬉戏玩耍，却反而单对平民百姓横加禁止，不许奏乐，这是第一件怪事。

古代婚配的人，都选择有道德节义的人家，细心挑选贞洁贤淑的女子，先要请人说媒，接着再下聘礼，对邀集的幕僚和朋友要注重他们身份的区别，亲近那些乘车的客人，崇尚他们端庄肃穆的仪态，婚姻大事，就是这么难。可是在今天，诸位宗王年仅十五岁就赐给了妻

室，离家单独居住了。然而配给妻子的宗王们，有的长幼不分，有的竟闯入嫔妃的住处胡作非为，而与宗王婚配的人，则尽些些嫔妃宫女。自古以来，违背礼仪之甚，没有比这些事再过分了。近几年来，频频有人揭发和检举这种违礼之事。如果真是诸位宗王因饮酒无度而受到责难，事情的缘起，也都是由于他们的妻子因年老色衰而遭到抛弃，从而造成了这种纷乱的局面。如今皇子所娶的妻室，多出自嫔妃宫女之中，但却反要天下的平民百姓必须依照礼制的规定婚嫁，这是第二件怪事。

万物生长，最终没有不死亡的，古代贤明的先王制定了礼制，用来养生送死，这是符合人情道理的。如果毁灭生命而自寻死路，那就是圣人禁止的了。然而，埋葬的意思就是藏匿，死去的人不可能再出现了，所以要把他们深深地藏匿起来。过去帝尧被葬在谷林，农民并没有因此而迁徙到别的土地上去耕种；帝舜被葬在苍梧，商人也没有被迫到别的地方去做生意。秦始皇倒是营建了地下冥城，把它的基础牢牢地固定于三泉之上，所用的金玉珍宝不可计数，但他刚死不久，尸体就被焚烧了，墓穴就被盗掘了。由此推想，尧舜的俭朴，秦始皇的奢侈，谁是谁非就一目了然了。现在国家营建陵墓，花费上亿的银钱，一旦烧了，不也同样成为一片灰烬。如果奢侈浪费对死者有益，为什么单单古人不这样做呢。如今圣上不停地营造塋域，却坚决禁止平民百姓有所兴建，这是第三件怪事。

古代丧礼祭礼，为代替死者受祭，必须立尸，用来

辨别左昭右穆的次序，使死者有所依凭，致行献食之礼。如今死者被埋葬之后，人们干脆直截寻找一位与死者相貌相似的人，死者是父母，就象对待父母一样地侍奉他，死者是配偶，则与他象夫妻一样相互恩爱。伤风败俗，亵渎人伦，混乱礼制，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朝廷不加禁止，百姓也不改易杜绝，这是第四件怪事。

宴飨之礼可以规定礼制仪式，教诲天下臣民，所以圣贤的帝王都重视它。礼制之严甚至到了酒杯满了就不能喝，饭菜不新鲜就不能吃，音乐不是合乎规范的高雅之声就不能演奏，食物不是纯正的货色就不能摆上宴席。而如今在大宴宾客的时候，宫廷内外的人都混杂在一起，因醉酒而喧闹不休，毫无礼仪可言。同时让滑稽小丑做粗俗表演，玷污人们的视听。朝廷长期形成了这种坏习惯，反到以其为美，而斥责纯洁素朴的风尚，这是第五件怪事。

今天，陛下作为历代帝王中最后的一位，因袭了晋代动乱而遗留的弊端，反而不加以矫正厘定，鞭撻陋俗，臣只怕天下的百姓，永远也见不到传统的礼仪和道德了。”

高允不止一次地这样劝谏高宗，而高宗也都能从容静听，有时因直言过激而有所冒犯，高宗实在不忍再听下去了，就让身边的人将他搀扶出去。只要在不便当众劝谏的情况下，高允就要求到内宫拜见高宗，高宗深知高允的心意，总是预先在屏风旁迎接他。高允得到很高的礼遇和尊敬，早来晚走，有时接连几天都住在宫里，大臣们都不知道他们在议论些什么。

一次有人上书，历陈朝廷的得失，高宗将表章翻看了一遍，然后对群臣说：“一国之君就是一家之父，父亲有了错误，作儿子的为什么不写成表章，在人群之中当众劝谏他，让大家都知道他的坏处，而是躲在家里私下处理呢。这难道不是对父亲的爱戴，而恐怕家丑外扬吗？如今国家有了善举或恶行，作为臣子不能当面陈述，却要上表在大庭广众之下劝谏一番，这难道不是宣扬君主的缺点，而标榜他自己是多么正确吗。象高允那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忠臣。朕有了错误，他常常以正直之言当面辩论，说到朕所不爱听的时候，仍然能侃侃而谈，毫不回避迁就。朕认识到了自己的过错，而天下的人却不知道朕曾受过规谏，这难道不是忠诚吗！你们这些人常在朕的左右，朕却从来没有听到过你们当面对朕说过一句正直的话，只是趁朕高兴的时候祈求官职。你们这些人手持弓箭和刀斧，侍奉在朕的身边，只有白白站立的苦劳，却全都作了王公贵族。而高允手持一支笔，纠正国家的偏失，却只不过是个小小的著作郎。你们这些人难道不感到愧疚吗？”于是，高宗封高允为中书令，同时还让他象过去一样著述校勘。司徒陆丽说：“高允虽然得到了圣上的恩宠，但他家境贫寒，衣着俭朴，妻子儿女身份都很寒微。”高宗气愤地说：“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今天朕要重用他了，才说出他家境贫寒。”当天，高宗亲自来到高允的家，看到他家只有几间草房，房间里是粗布做的被子和乱麻做成的袍子，厨房中也只有咸菜而已。高宗感叹地说：“古人的生活难道比得上这样清苦吗！”当即赐给高允丝帛五百匹、粟米千斛，封高允的长子高忱为绥远将军、长乐太守。高允再三表示坚决辞让，高宗没

有同意。当初与高允一起被征聘的游雅等人，多已拜官封侯，甚至高允手下的百十名小吏，也都作到了刺史郡守一级的职位，而高允却作了二十七年的著作郎，没有升官。当时朝廷中的官吏没有俸禄，高允就经常让他的几个孩子砍柴伐木，维持生计。

当初，尚书窦瑾因获罪而遭诛杀，他的儿子窦遵为避难逃亡到了山泽之中，窦遵的母亲焦氏也因此而被囚禁在县府。后来，焦氏虽因年老而得到赦免，但窦家的亲友之中竟没有一个人愿意赡养她。高允可怜年老的焦氏，把她留在自己家里保护赡养。一晃六年过去了，直到窦遵得到赦免后才将老母接走。高允的行为就是这样敦厚。后来，高允转作了太常卿，同时还继续担任中书令。他上奏《代都赋》，用以规劝讽谏，此文也属于汉代张衡《东京赋》和《西京赋》之类的作品，但内容多没有保存下来。当时，中书博士索敞与侍郎傅默、梁祚讨论人的名与字的尊卑贵贱，著述议论纷纭杂乱，莫衷一是。于是高允撰写了《名字论》，为人们解惑释疑，他引经据典，论证翔实。后来他又在任中书令的同时兼领秘书监，解除了太常卿一职，并晋封爵位梁城侯，加官左将军。

从前，高允与游雅及太原张伟同是同学而成了朋友，游雅曾评价高允说：“爱发怒的人，一生中就不可能不发怒。而过去的史书中记载的卓公心胸宽阔，文饶大度海量，心地狭窄的人或许不相信有这种人。我与高子相交四十年了，却从来没有见过他为事情的对或错而面露喜怒之色，不也就相信了。高子内心文德辉耀，外表柔弱，说起话来迟迟不能出口，我常叫他‘文子’。崔公曾对我说：‘高生博学多才，为一代

佳士，只是缺少点勇武的风度气节。’当时我也这么看。可后来发生的事却并非如此。司徒的国史罪，只不过因一点小事所引起，但到圣上降诏责罚的时候，崔公竟声音也嘶哑了，腿也发抖了，连话都说不出来，宗钦和比他职位低的官员都吓得爬在地上，大汗直流，个个面无人色。而高子却详细地叙述事理，申明是非，言辞清晰明辨，声音高亢洪亮。圣上被他的行为所感动，在场的人也没有不称赞他的。他以仁厚之心对待同僚和朋友，保佑他们大吉，过去一向所说的勇武，比高允的行为又怎么样呢？宗爱依仗着权势，肆无忌惮，名声威振四海。他曾在大臣议政之处召见百官，宗王公侯及各级官员，只要看见他的殿庭就全都下拜，只有高子直到走上台阶后才长揖见礼。由此可见，汉代的汲长孺能躺在床上接待卫青，又有什么有悖于礼仪的呢！过去一向所说的风度气节，难道不就是说的这些吗？了解一个人本来就很难，被别人了解就更难了。我仅了解高允的外表，却不了解他的内心，而崔公竟连他的外表也不了解。钟子期遇见了俞伯牙，从此不再听琴，管仲一看到鲍叔牙，眼睛都亮了，确实是有原因的啊。”高允就是这样为世人所推崇。

高宗很尊重高允，常常不叫他的名字，而一直称呼他“令公”。于是“令公”之名传布得很广。高宗死后，显祖住在守丧的地方，乙浑趁机独揽朝政，密谋策反，威胁着国家的命运。文明太后杀了他，召高允到宫中，参议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又下诏对高允说：“近来，学校长期得不到修建，市肆衰落，学业荒废，青年们的叹息之声，在今天又重新出现了。朕已继承管理了这个伟大的事业，天下安宁，根据过

去的制度，想要在郡国设立学校，使学习这项事业能够得以继续传授。卿是儒学宗师，开国元老，以您现在的名望和多年的德行，最适合与中书省和秘书省的官员参议此事，以便传布。”高允表奏道：“臣听说象筹划治国大事这样的重要事业，必须首先对人民进行教育和培养；所有的秩序以及九类大法，也都是由于以礼德教化进行统治而形成的。所以，辟雍照耀着周代的《诗经》，而泮宫则是《鲁颂》中显要的内容。自永嘉之乱以后，已有的典章制度都被破坏了。乡闾之间再也听不到吟诵《雅》、《颂》的声音，京城都邑再也看不到释奠拜师的礼节。道德沦丧，事业衰落，已经有一百五十年了。每当尊敬的先王想要效法过去的典章制度之时，都要治理和提倡纯朴的风尚，只要制定的方案切实理想，很快就能够使局面恢复。陛下恭敬地处理政务并注意节约，明察是非，建立了丰功伟业，天下安宁，百官都能服从领导。为使祖宗的遗志得以发扬，已绝迹的周代礼制得以复兴，于是大发仁德之声，思考着创立新的礼乐法度及文章教化。不论达官显贵还是庶民百姓，都会为此而感到异常欣慰。臣承蒙圣上降旨命令，将中书、秘书二省的官员召集到一起，披阅览读历史典籍，详细研究典章制度和法度准则，随时随地督促儒者们努力从事他们的事业，重视学问而专心于他们的学说。这个圣明的诏令，综合汇集了古代的理义。遵照圣旨，注重建立学校，以便重振风俗教化。这样就能使先王业迹的光辉照耀未来，盛美之音流传天下。臣请求建立这样一种制度，大型的郡设立博士二名，博士的助手四名，学生一百名；次大的郡设立博士二名，助手二名，学生八十名；中型的郡设立博

士一名，助手二名，学生六十名；小型的郡设立博士一名，助手一名，学生四十名。博士要选拔录用那些广泛涉猎儒家经典，一生的经历忠诚清白，能够为人师表的人，年龄要在四十岁以上。选拔录用助手的标准与博士相同，年龄在三十岁以上。如果道德修养高尚又大器早成，他的才华足以使他担任教书授业的工作，那么则不限于年龄。学生则挑选那些家世清白，受人敬重，行为美好谨慎，能够遵循礼教的人。首先将富贵人家的子弟全部录取，然后再录取通过考试的人。”显祖听从了高允的建议。自此开始，郡国之内开始设立了学校。

后来，高允因为年老有病，屡次上表请求辞官，皇帝没有同意。于是他写了《告老诗》。又因为昔日一同被征聘的同僚故旧，如今多已不在人世，他感叹时光的流逝，怀念故人，于是作了《征士颂》，颂文中只写了那些应聘在朝廷作官的人，其余未能入聘者则没被录入。对这批贤达之士，也只是简单列举了他们的生平事迹。现将颂文抄录于后：

中书侍郎、固安伯范阳人卢玄，字子真

郡功曹史博陵人崔绰，字茂祖

河内太守、下乐侯广宁人燕崇，字玄略

上党太守、高邑侯广宁人常陟，字公山

征南大将军从事中郎勃海人高毗，字子翼

征南大将军从事中郎勃海人李钦，字道赐

河西太守、饶阳子博陵人许堪，字祖根

中书郎、新丰侯京兆人杜铨，字士衡

征西大将军从事中郎京兆人韦閼，字友规

京兆太守赵郡人李诜，字令孙
太常博士、钜鹿公赵郡人李灵，字虎符
中书郎、即丘子赵郡人李遐，字仲熙
营州刺史、建安公太原人张伟，字仲业
辅国大将军从事中郎范阳人祖迈
征东大将军从事中郎范阳人祖侃，字士伦
东郡太守、蒲县子中山人刘策
濮阳太守、真定子常山人许琛
行司隶校尉、中都侯西河人宋宣，字道茂
中书郎燕郡人刘遐，字彦鉴
中书郎、武恒子河间人邢颖，字宗敬
沧水太守、浮阳侯勃海人高济，字叔民
太平太守、平原子雁门人李熙，字士元
秘书监、梁郡公广平人游雅，字伯度
廷尉正、安平子博陵人崔建，字兴祖
广平太守、列人侯西河人宋愔
州主簿长乐人潘天符
郡功曹长乐人杜熙
征东大将军从事中郎中山人张纲
中书郎上谷人张诞，字叔术
秘书郎雁门人王道雅
秘书郎雁门人闵弼
卫大将军从事中郎中山人郎苗
大司马从事中郎上谷人侯辩
陈留郡太守、高邑子赵郡人吕季才

历代帝王治理百官，无不积蓄网罗各种有才能的人，以便使统治之术更加高明有效。所以，周文王因为任用了众多的贤达之士才能使天下安宁，汉武帝因为得到了贤者的辅佐才开创了昌盛的局面。这些事迹都被记载在史籍之中，也都是自古至今最普通的道理。魏朝自神麴年间以来，国内太平安定，诛灭了享有几代非法统治的赫连氏，扫清了在极其荒僻遥远的地方肆意妄为的贼寇，向南攻破了江南的楚地，向西荡涤了凉州之地，域外不同地方的民众，都仰慕魏朝的盛德大义，纷纷前来归顺。从此以后，国家偃戈息鼓，停战罢兵，重建礼教，创立学校，广罗俊才异秀之士，用他们应接咨询国家政事。真是日夜梦想着贤达睿哲之人，恨不得马上就能见到他们，四处寻访，只是为了能够求得才智超群的人。当时，大家都异口同声地称赞范阳人卢玄等四十二人，他们全是官宦的后代，在地方上都享有盛名，有辅佐之才。陛下亲自颁发圣旨，征聘卢玄等人，留着官位等待他们去做，空着爵位等着封给他们，他们之中的三十五人入朝做了官，其余的人虽依照规定而没有被州郡聘用，但其才干也同样不可估量。那时，满朝都是英杰俊士，人才济济，一派美好兴盛的景象。昔日臣与他们一同承蒙朝廷的举荐步入仕途，要么从容出入于朝廷议论政事，要么随意集聚到家中尽情娱乐，大家都以为，千载难逢的机会就从那时开始了。但时间流逝，吉凶相迭，共同被征聘的人中，由于年老或丧亡，如今差不多都已不在人世了。今日尚健在的虽还有几位，但也天各一方，终难相见。往

日的欢乐，今天却变成了悲伤。张仲业东行到了营州，多么希望他能回来一起倾心畅叙，在垂歿之年整装相聚，在桑榆之际感怀情谊。但仲业也不幸去世了。如今，朝中的百官都是晚辈，左邻右舍也都是陌生的面孔，进入宫廷没有寄托自己心意的场所，里里外外也没有让人解颜欢笑的地方。顾盼着自己的这副躯壳，所以只好永远叹息不止了。一篇颂辞可以赞美品德高尚的人的形象，也可以畅所欲言，寄托自己的情怀。我已有二十年没有作文章了，但事情急切，总挂念在我心上，怎么能沉默不语呢？于是为他们作了颂辞，颂辞说：

祥瑞紫气冲九天，群雄并起乱华夏，君王恭谨往征伐，屡驾战车飞跃马。扫荡流寇草莽贼，戡除邪恶与妖霸，四海之内合风俗，八方之中兴教化。刑罚教化量无际，天下安宁且同一，偃戈藏兵息战事，唯建礼教勤思虑。圣帝广求旷世杰，询访荐举能与贤，投竿垂钓山隐士，奇异才人同出现。

勤勉不倦卢子真，器量宏大心地纯，钻研学问德为准，研习六艺依据仁。旌旗弓矢应征选，换上官服除布裙，手提衣襟走上朝，良谋佳策日日陈。自东至南勤出使，跃马扬鞭独驰骋，北燕冯弘来归顺，南朝刘宋和如亲。

茕单影孤崔茂祖，年幼丧亲遭不幸，严于律己多努力，重振旗鼓家道兴。专心勤勉习《六经》，遨游文藻辞章明，高官厚禄终辞谢，平静自保一清心。

燕崇常陟重诚信，言行高尚靡有失，不求苟且升官

爵，任其自然去留职。淡泊谦和又节俭，与事无争善推辞，思念贤哲乐于古，如饥似渴求知识。

宁静致远高子翼，悟性高好李道赐，以礼相约结为友，和谐共处如抚琴。并肩参议万机事，清官为民施善行，悠闲自得度日月，聊以寄托两颗心。

审时度势许祖根，谋深智富逞才能，上仗皇恩功名就，下靠德友情谊重。功勋建树虽然晚，福禄享受实先行，同辈旧臣与故友，位居群后是此人。

孤身独立杜士衡，扪心自问无愧疚，不尚华丽言和语，结交新知不弃旧。计其财产虽贫弱，讲经论道富五斗，所说同僚此一人，实是国家真英秀。

超凡出众韦友规，人品正直心善良，他人长处勤汲取，自己小节善弃扬。禀性有序喜静默，南征北战漂泊郎，虽然屈居王侯下，念念不忘大志向。

赵国故土好地方，代不绝出多奇士，山岳聚集才人众，杰秀贤能推三李。神采飘逸似清风，颜语和悦行谦恭，初九圣贤行隐没，仰慕君王赴京城。李诜拜官治长安，李灵授爵作皇传，垂训皇宫教后辈，肩负处理万机务。李熙早夭寿虽短，官已拜至侍郎署，所存风尚值效取，光明显赫贯终生。

学识渊博张仲业，性情清雅心高洁，礼仪容止仿古式，典谟诰旨理殷切。身处艰险心不改，节操如一贯始终。结朋交友重仁德，训教后辈尽孝道，教化覆盖及龙川，人民归附从其教。

祖迈杰出且贤能，祖侃授官也适选，闻名家邦受称

赞，名声行为同丕显。兼济天下唯其志，独善其身非己愿，冲破束缚无规矩，功勋业迹终未展。

刘策许琛忠职守，鞠躬尽瘁竭力行，出使四方能游说，入见皇帝献其功。驾乘轻车走天下，燕地降服崇屈从，名声彰著映当代，社稷大业更昌盛。

大器早成宋道茂，人小年少远播名，真诚相待结知己，行为处事守信用。怡怡和睦诸兄弟，穆穆温暖一家庭，影响广大且深远，声名高振入云空。常在宫中尽臣责，兼掌天下京都城，量刑罚罪中为准，民风和谐百事平。

壮哉美哉刘彦鉴，艺文礼乐无不善，任其自然为禀性，本领才能自修炼。高官厚禄不崇尚，地位寒微不辱慢，谢绝朱门辞官去，回归山林大自然。

四俊之一邢宗敬，美名赞誉远播扬，辞章华丽似行云，文名洋溢早流芳。道遇路人疾病苦，诗赋相赠了慰问，真挚情感显于辞，人伦事理出于韵。

爽朗豁达高叔民，默识渊通论古今，领新悟异出奇想，发自心胸睿思明，气质堪比和氏璧，文采辉炳善辞章，仕途踌躇坐京城，衣锦还乡归旧邦。

先知先觉李士元，性格耿直不迷惑，抖擞精神入殿阁，为臣尽忠效王国。行端履正榜样好，严循法度守绳墨，心地善良一君子，言行举止无差错。

孔子称许游和夏，汉人赞美渊与云，脱凡逾众游伯度，出类拔萃更超群。校勘经史入秘阁，总领州郡出河汾，移风易俗施教化，梳理疑乱解争纷。怡然理顺通难

义，涣然冰释解疑文，精心研析儒家术，分别九流易辨清。

崔建宋悝二贤人，生性奇伟又英杰，颖脱而出自民间，休名美德漫宫阙。蹇蹇仪态殊正直，邈邈风节且高亮，贤达卓异不自负，白手起家终辉煌。

潘符高尚为典范，杜熙随和性友善，洁身自好不逐流，一尘不染有主见。名望高绝世罕有，只为小吏淡作官，不计得失反逾多，不尚名利反逾显。

张纲温和人谦逊，叔术端正性刚直，道雅洽闻且强记，闵弼博学又多识。隐者之中拔其萃，渐成栋梁展鸿志，发奋进取忘餐饮，雄心岂能足斗食。遵循礼仪行仁义，榜样规范自不失，挫折不悲心坦荡，得志不喜意平实。

郎苗初来入仕途，各种方法受考核，智足谋深超乎众，言论足可安邦国。性与时尚相融洽，勤勉理政不妄说，合乎今日新标准，无异古代之准则。

人求物利性贪婪，惑意乱神沉于酒，洁身自好属侯辩，唯富德义至笃厚。日日饮酒虽放纵，逾受敬重逾温柔，无道身躯藏私室，仿佛跻彼众公侯。

若论季才之性格，执着竞争又文静，长行远抵南秦地，申明皇威施政令。公平诱导权利弊，矫正是非依准绳，帝王事业得发扬，边疆昌盛且安宁。

群贤毕至会一世，声名显赫扬魏国，竭志效忠安天下，各展其能尽臣责。身披体袭红衣裳，腰系双佩扎玉带，荣耀辉煌在当时，风节高尚传千载。君臣相聚难相

伴，古今常理异莫觉，昔日遵奉朝廷合，征举之士能和谐。撩起衣襟独畅想，解带宽衣自舒怀，此时忻乐如昨日，生死存亡忽两乖，沉思默想念故旧，内心翻腾久不平，挥毫赞美诸公德，更增我心悲与哀。

北魏皇兴年间，献文帝下诏命高允兼任太常，并去兖州拜祭孔子庙，献文帝对高允说：“这件事只有人品宽厚、德行高尚的人才有资格前往，请你就不要推辞了。”其后，高允跟随显祖献文帝出征北伐，大胜而归，行至武川镇时，高允上奏《北伐颂》，颂辞说：“昊广皇天真伟大，降赐鉴戒唯仁德，眷恋有魏负重任，居高临下照万国。礼仪教化大和谐，君王满腹多谋略，平息乱事依皇威，严守法则万民协。劫掠旧隶属北疆，承政发令在蕃邦，往昔只因常起事，驾车北去顾逃亡。世袭旧制不遵循，背离忠义违诚信，网罗亡徒聚强盗，丑寇败类真不少。竟敢率领众羊犬，图谋放纵更猖獗，圣帝降旨告上下，兴师挥戈去北伐。跃马扬鞭裹干粮，星驰电掣进军忙，扑伐征讨劫杀勇，横扫千军斧钺扬。斧钺所至人头落，执馘获俘灭敌旅，尸横遍野填沟谷，血流成河可漂杵。元凶敌首狐奔逃，假借陋室暂歇脚，手下爪牙已遭刳，身边心腹也被杀。周人和亲敬老笃，忠厚仁德及草木，英明圣皇世绝伦，古今美德汇一身。恩泽被覆京观下，仁德宏旨又垂临，瘞埋尸骨放俘虏，仁爱施予生死魂。生灵死魂蒙仁爱，天地庇护人且喜，人伦纵贯幽冥界，皇泽圣恩播异土。物归其诚安天下，敬神行祭献其福，远近内外得安抚，率土之滨皆臣服。古代所称善用兵，三月克敌属神异，如今圣上也兴师，告捷不足十二日。大军上下同心战，千邦万国共和协，道义光耀

垂万载，功勋劳绩铭玉牒，颂扬之声久不灭，流传播布至未来。”显祖阅后非常喜欢。

又有一事。当时，显祖献文帝常常闷闷不乐，因为高祖拓跋宏年纪尚幼，所以献文帝想立京兆王拓跋子推为太子，于是，他召集诸位大臣，依次征询他们的意见。这时高允上前跪倒在地，哭泣着说道：“臣不敢多言，只怕烦劳圣听，愿陛下以祖宗托付的事业为重，再回头想想周公辅成王的古事。”显祖于是把帝位传给了高祖，并赏赐高允丝帛千匹，以表彰他的忠诚亮节。高允后又被升任为中书监，兼领散骑常侍。他虽长期掌管著史校史的工作，然而却不能专心勤勉地从事此事，当时，他与校书郎刘模收集了一些资料，大略地对崔浩过去的工作做了续补，以《春秋》的体例为标准，而对崔著时有刊误匡正。自高宗到显祖的事迹以及军事、国政、书志、檄文，多为高允所撰。到了晚年，高允才推荐高闾接替自己。因他评定议论朝政有功，又被晋封爵位咸阳公，兼领镇东将军。

不久，高允又被任命为使持节、散骑常侍、征西将军和怀州刺史。一年秋季，高允巡行疆界，他关怀百姓的疾苦，所至之处，问寒问暖，当行至邵县的时候，高允见邵公庙已经塌毁，便对人说：“邵公的德操，毁伤它而不尊敬它，那么积德行善的人还能敬仰什么呢。”于是上奏魏帝，要求对邵公庙重加修葺。当时高允已年近九十岁了，还仍然劝导百姓学习问业，使得这种风气蔚然成风。相反，当时的很多儒者却只有悠闲自得地四处游历，而不去过问国家政事。多年以后，在北魏正光年间，中散大夫、中书舍人河内人常景追思怀念高

允，亲率郡中的故旧老人，在野王以南为高允修立祠堂，树立碑石，记述他的丰德。

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年，高允又以年老为由，请求解甲归田，他先后上呈了十余份奏章，但孝文帝最后还是没有同意，于是高允以有病在身为由，请假回到家乡。当年，孝文帝就下诏征聘高允，命州郡负责用可以坐乘的安车将他送到京都。来到京城后，封他为镇军大将军，兼领中书监。高允表示坚决辞让，不予接受。孝文帝又搀扶着他走入内宫，修改议定《皇诰》。高允当时上奏了《酒训》，奏章说：

“圣上曾命臣对于历代因贪杯饮酒而带来的种种弊端、败坏道德的事情加以汇集议论，写成《酒训》。臣愚朽年迈，按照常理都是该被抛弃的人了，而圣上却仍然施予臣异常隆重的恩典，在臣将死之年还录用臣，在臣心志衰丧的时候还勉励臣。臣接受皇命，诚惶诚恐，喜忧交加，不知怎样用行动来报答圣上的关心。尊敬的陛下英明睿智，远见卓识，身居高位安抚万国；太皇太后圣明贤达，仁德广大，救治养育万邦黎民。普天之下，无不称颂。尽管到了晚年还依旧忧虑而操劳不止，各种设想和希望总是接连不断，而且喜欢回首往事，总结一生行为的警示和戒鉴。这种至诚至厚的心怀能够感悟百神，更何况百官和庶民了。臣不胜欣喜，郑重地把臣的所见所闻全部写出来，作成《酒训》一篇。但是臣愚笨无知，见识短浅，加上习文弄墨已荒废了多年，所以文辞拙劣，意义鄙陋，不值得阅读采纳。尊敬的圣上慈悲为怀，能够体恤臣的一片赤诚之情，宽恕臣悖理不明的主张。

《训》辞是：

自古以来，圣贤的帝王都要举行宴飨的礼仪以供奉鬼神，由于上古时代还没有酒，当时都是用水来进行祭礼活动，所以帝王在举行飨礼的时候，要将水制的斋酒放置在厅堂上，而把祭礼用的齐酒放在它的下面，这正是崇尚根本，尊重渊源，而将祭品的滋味看得更次要的表现。如果做到这些，那么，尽管是带着酒杯旅行，走到哪儿喝到哪儿，也不至于出现混乱。所以，一个人若能在彰明礼制之后饮酒，人们对他的恭敬仰慕之情就不会降低，若能在处理完事务之后饮酒，一切仪式也就不会出现差错。不遵循这项原则的做法，则是违背正道的。如果这样，又将怎么能作为时代的楷模和处事的典范而永世长存呢？综观古今历代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其吉凶祸福皆在于人，而不在于天。商纣王帝辛沉湎于酒，殷商王朝因此而灭亡；周公姬旦作成《酒诰》，用它来训诫康叔，周朝因此而得以昌盛。春秋时楚国的公子侧（字子反）非常糊涂，纵情饮酒，终致命丧，而汉代的穆生滴酒不沾，却留下一代美名。有些人长期以来一直作为人们行动的戒鉴，而另一些人则被世人万代传颂。酒这种东西能够改变和惑乱人的性情，虽说是哲人，但又有谁能控制得住自己呢。为官者会因酒而懒散地处理国家政务，庶民百姓会因酒而对政令怠慢不执行，聪明贤达之士会因酒而废弃听理，温恭柔顺之人会因酒而使他们发生争斗，而长期狂饮无度又不知悔改，就会使人产生疾病。哪里只是生病，简直就是减少寿命。有句谚语也

说过：饮酒所带来的好处象毫毛一样小，而它对人的损害则象刀切一样快利。这里所说的好处，只是酒的滋味甘美，不也很少吗。这里所说的伤害，则是幼年时代即使你心志迷乱，幼年乱志这种损害，不也很多吗？千万不要因饮酒无度而使自己沉沦，千万不要因饮酒争胜而丧失伦常之道。如果做不到这些，就会使国家发生混乱，迷失方向，使人民漂泊流浪。不学习传统，不遵守法规，违背了这些原则还能继承什么呢。《诗经》不是说过吗，“对待事情要象制造骨器和玉器一样，精心地用刀去切割它，用锉去剡平它，用刀去雕琢它，用物去磨平它。”这就是朋友之间应遵循的原则。作官的人要对君主的错误有所规谏，为君者要对屡次谋划建功的人有所限制，这是君臣之间应恪守的法则。如果一个人所说的话是善良而有益的，就要反复地斟酌审察，并牢牢地记住它，如果一个人所说的话是恶意而无益的，就要哀怜它，宽恕它。这就是先王采纳规劝时所抱的态度。在昔日司马晋的时代，士大夫多丧失了法度，肆意地放荡不羁，以为这样才是不受约束的表现，纵情地举杯豪饮，以为这样才有高尚豁达的气度，吟唱着关于酒的颂歌，互相炫耀。他们声称尧和舜都有千杯万盏的酒量，宣扬诋毁法度的言论，拿伟大的圣贤作例子，来表明他们的行为是在效法上天，难道真是这样的吗？子思说过，孔子饮酒，喝不了一升。由此推断，尧舜能饮千杯万盏的说法都是荒谬不合理的。

今天，伟大的魏国应受河图而统治天下，如日月的

光辉普照大地，教化所及之处，无不归心臣服，仁德之风日盛，遍播于四海。太皇太后以至仁至德教诲万民，不知厌倦，所付出的忧虑和劳苦比皇亲之情还要殷勤周到，政令和教诲广行天下，超越疆界。所以能够使国运与天地和谐，使功绩堪比天地万物。圣上将仁德恩泽降施百姓，于是天下没有不遵守法度的，普天之下，率土之滨，也无处不蒙受着恩利。在朝中供职的群臣，都是些有志之士，他们最好要约束自己，从善而行，行为端正，忠直守一。节制饮酒以便形成法度，顺随德政以便建立标准。使人明白狂饮无度的危害，它会让人明知有害而无法自制，使人知道恭敬谨慎乃是极荣耀的美德。遵守孝道以赡养老人，光宗耀祖而使名声远扬。重蹈孔子的学生闵子和曾子的足迹，把仁德之风传给后人。这样才能向上以报答苍天的赐予，向下以保护所取得的成就。怎么能不努力啊！怎么能不努力啊！”

高祖阅后非常高兴，常把它放在自己身边。

高祖孝文帝后来下诏，允许高允乘车入殿，大臣朝拜时也可不必行礼。第二年，孝文帝下令让高允议定法令条文。虽然他的年纪已经很大，但意志和观察力却丝毫不减，犹如当年身为校书郎，披览考定史籍时一样。其后，孝文帝又降诏说：“高允的年纪已经到了危险的阶段，但他家境贫寒，因而保养也很不够。可以让乐部派出十名弹奏丝竹乐器的人员，每隔五日到高允的家里去演奏，以便使他的心志能得到娱乐。”同时还特别赐给他一头蜀地的牛，一辆蜀地制造的四面开窗的四驾马车，一件素面的几案、一件素面的手杖和一口蜀地

制造的刀。又赐给他珍奇异味，每当春季和秋季的时候，就经常送给他。不久，孝文帝再降诏令，命早晚为高允送饭，每逢朔日初一和望日十五还要致送牛肉和美酒，至于衣服绵绢，每月都要奉送。高允把这些东西都分赠给了亲朋故友。当时，凡地位显赫的大臣家里，都有很多亲属在朝廷内充任高官，而高允的子弟中却没有一人身兼官爵。他就是这样清廉谦逊。后来，高允又被升任为尚书、散骑常侍，孝文帝常常邀请他入朝，备好几案手杖，向他征询治国安邦的大政方针。至太和十年，高允兼领光禄大夫，并被授予系有紫色丝带的金印。朝廷中的重大事务，都要征求询问他的意见。

北魏王朝刚刚建国的时候，法令严明，朝廷中的官吏很多都受过杖刑的责罚。高允前后侍奉了五位皇帝，在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三省供职，历时五十余年，却一点过错也没有。当初，在太武帝太平真君年间，因为狱讼刑罚之事停顿日久，积案很多，于是世祖令高允开始在中书省，根根儒家经典的宏旨审断处理多种悬而未决的事情。高允依据法令评定刑罚，历时三十多年，朝廷内外交口称赞他断事公平。高允深知，刑罚之事关系到人民的性命，他常常感叹道：“古代的皋陶虽具有极高尚的德行，但他的后代英国和蓼国却也很早就亡灭了，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之际，英布虽曾因犯罪而受过黥刑，但也称了王。尽管已经历了很长的时代，但仍然还遗留有刑罚的痕迹。圣贤尚且如此，何况凡夫俗子，哪能没有错误呢？”

太和十年四月，群臣京城西郊商议国事，孝文帝下诏，令人用自己的马车迎接高允赴西郊的住所板殿观瞻察视。行至

途中，马忽然受惊而狂奔起来，车翻了，高允的额眉处受了三处伤。高祖孝文帝和文明太后派医送药，护理治疗，慰问探望。驾车的车夫将要因此事而受到重罚，高允得知后，赶忙上朝，陈奏自己安然无恙，请求免去车夫的罪过。在此之前，也曾发生过一件类似的事情，魏帝让中黄门苏兴寿搀扶高允行走，一次曾在风雪中遇犬受惊而跌倒，苏兴寿为此非常害怕。高允却安慰鼓励他，不许人把这事张扬出去。苏兴寿说，我替高允办事，与他共同相处了三年，从来没有见他发过脾气。他对人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昼夜手不释卷，吟诵阅读。他对亲人的感情极其深厚，对故旧朋友念念不忘。他谦虚谨慎，善于汲取别人的长处。尽管身居高职，地位显赫，但志向却同无官阶无财产的庶民一样。他喜爱音乐，每当乐伎们弹琴唱歌，击鼓跳舞的时候，他总是在一旁敲着节拍称好。他还非常信仰佛教与道教，经常设斋讲习，对生养之事非常喜好，对杀戮之事则极为憎恶。他性格又很简易通达，不随便与人交往游历。当年，显祖献文帝平定青州，收复齐国故地的时候，曾将当地的名门望族迁徙到了代地。当时，众多的士宦人物辗转迁移，长途跋涉，都已饥寒交迫。在迁徙的人群之中，有很多是高允的亲属，他们都徒步而行，一直走到了目的地。高允把自己的财物全部分发给徙民，用来帮助救济他们的生活，并且慰问周到，关怀入微。人们无不为他仁厚的心怀所感动。他招收徙民中有才能的人，然后上表奏请魏帝，请求任用。当时人们议论纷纷，人们都对这些新选用的人员存有疑虑，高允却说，选取人才，任用能人，不宜于压制身份低微的人。在此之前，高允曾被征召在方山写

作颂文，其心气和志向仍与当年相差无几，谈论往事，记忆犹新，不曾遗忘。太和十一年正月，高允去世，享年九十八岁。

当初，高允常常对人说：“我过去在中书省任职时曾积有阴德，赈济民众，拯救生灵。如果在阳间的报答不出差错的话，我应享有百年的寿命。”在他去世前十多天的时候，身体稍感不适。但他仍然没有入寝就卧，请医服药，而是象往常一样出入随意，行动自如，咏诗诵文不断。高祖孝文帝和文明太后得知高允不适后，即派医生李修前往把脉诊病，李修审视完，告诉高允身体平安无恙。而后李修入朝，秘密地向孝文帝报告说，高允的身体机能与气血循环都出现了异常，恐怕不久于人世了。于是，孝文帝派遣使者送去赏赐给高允的御膳珍羞，自酒米到盐醋，共一百多种，包括尽了当时所有的美食佳味，而且还有床帐、衣服、茵被、几案和手杖，东西摆满了整座庭院。侯王官员们来来往往，纷纷前来慰问嘱咐，高允抑制不住自己兴奋的心情，面带喜色地对人说：“因为我太老了，上天降恩于我，馈赠了这么多佳品，这回可有东西招待客人了。”然后只是上表感谢了一番而已，并没有多想什么。就这样又过了几天，高允在深夜悄然离开了人世，平静得连家人都没有察觉。高允死后，孝文帝下诏赠绢一千匹、布二千匹、丝绵五百斤、锦五十匹、各式各样的彩色丝织物百匹、谷米千斛，用来供丧葬时使用。自北魏初年到现在，无论生者还是死者，还没有人蒙受过这样丰厚的赏赐，朝廷给了高允很高的荣誉。将要入葬之时，孝文帝赐赠高允侍中、司空公和冀州刺史等官，他生前担任的将军、公等官爵依然如

故，谥号为文，并赐命服一套。高允撰写的诗、赋、诔、颂、箴、论、表、赞，加上他所著的《左氏释》、《公羊释》、《毛诗拾遗》、《论杂解》、《议何郑膏肓事》等，共百余篇，都分门别类编纂成集，流行于世。高允还通晓算法，著有算术方面的著作三卷。高允死后，他的儿子高忱继承了他的事业。

(冯 时 译)

【原文】

高允，字伯恭，勃海人也。祖泰，在叔父湖《传》。父韬，少以英朗知名，同郡封懿雅相敬慕。为慕容垂太尉从事中郎。太祖平中山，以韬为丞相参军。早卒。

允少孤夙成，有奇度，清河崔玄伯见而异之，叹曰：“高子黄中内润，文明外照，必为一代伟器，但恐吾不见耳。”年十余，奉祖父丧还本郡，推财与二弟而为沙门，名法净。未久而罢。性好文学，担笈负书，千里就业。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尤好《春秋公羊》。郡召功曹。

神䴥三年，世祖舅阳平王杜超行征南大将军，镇邺，以允为从事中郎，年四十余矣。超以方春而诸州囚多不决，乃表允与中郎吕熙等分诣诸州，共评狱事。熙等皆以贪秽得罪，唯允以清平获赏。府解，还家教授，受业者千余人。四年，与卢玄等俱被征，拜中书博士。迁侍郎，与太原张伟并以本官领卫大将军、乐安王范从事中郎。范，世祖之宠弟，西镇长安，允甚有匡益，秦人称之。寻被征还。允曾作《塞上翁诗》，有混欣戚，遗得丧之致。骠骑大将军，乐平王丕西讨上邽，复以本官参丕军事。语在《丕传》。凉州平，以参谋之勋，赐爵汶阳子，加建武将军。

后诏允与司徒崔浩述成《国记》，以本官领著作郎。时浩集诸术士，考校汉元以来，日月薄蚀、五星行度，并识前史之失，别为魏历，以示允。允曰：“天文历数不可空论。夫善言远者必先验于近。且汉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东井，此乃历术之浅。今讥汉史，而不觉此谬，恐后人讥今犹今之讥古。”浩曰：“所谬云何？”允曰：“案《星传》，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没于申南，而东井方出于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复推之于理。”浩曰：“欲为变者何所不可，君独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来？”允曰：“此不可以空言争，宜更审之。”时坐者咸怪，唯东宫少傅游雅曰：“高君长于历数，当不虚也。”后岁余，浩谓允曰：“先所论者，本不注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语，以前三月聚于东井，非十月也。”又谓雅曰：“高允之术，阳元之射也。”众乃叹服。允虽明于历数，初不推步，有所论说。唯游雅数以灾异问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难，既知复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问此。”雅乃止。

寻以本官为秦王翰傅。后敕以经授恭宗，甚见礼待。又诏允与侍郎公孙质、李虚、胡方回共定律令。世祖引允与论刑政，言甚称旨。因问允曰：“万机之务，何者为先？”是时多禁封良田，又京师游食者众。允因言曰：“臣少也贱，所知唯田，请言农事。古人云：方一里则为田三顷七十亩，百里则田三万七千顷。若勤之，则亩益三斗，不勤则亩损三斗。方百里损益之率，为粟二百二十二万斛，况以天下之广乎？若公私有储，虽遇饥年，复何忧哉？”世祖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民。

初，崔浩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数十人，各起家郡守。恭宗谓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选也，在职已久，勤劳未答。今可先补前召外任郡县，以新召者代为郎吏。又守令宰民，宜使更事者。”浩固争而遣之。允闻之，谓东宫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胜于上，何以胜济。”

辽东公翟黑子有宠于世祖。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寻发觉。黑子请计于允曰：“主上问我，为首为讳乎？”允曰：“公帷幄宠臣，答诏宜实。又自告忠诚，罪必无虑。”中书侍郎崔览、公孙质等咸言首实罪不可测，宜讳之。黑子以览等为亲己，而反怒允曰：“如君言，诱我死，何其不直！”遂与允绝。黑子以不实对，竟为世祖所疏，终获罪戮。

是时，著作令史闵湛、郗擢性巧佞，为浩信待。见浩所注《诗》、《论语》、《尚书》、《易》，遂上疏，言马、郑、王、贾虽注述《六经》，并多疏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内诸书，藏之秘府。班浩所注，命天下习业。并求敕浩注《礼传》，令后生得观正义。浩亦表荐湛有著述之才。既而劝浩刊所撰国史于石，用垂不朽，欲以彰浩直笔之迹。允闻之，谓著作郎宗钦曰：“闵湛所营，分寸之间，恐为崔门万世之祸。吾徒无类矣。”未几而难作。

初，浩之被收也，允直中书省。恭宗使东宫侍郎吴延召允，仍留宿宫内。翌日，恭宗入奏世祖，命允驂乘。至宫门，谓曰：“入当见至尊，吾自导卿。脱至尊有问，但依吾语。”允请曰：“为何等事也？”恭宗曰：“入自知之。”既入见帝。恭宗曰：“中书侍郎高允自在臣宫，同处累年，小心密慎，臣所

委悉。虽与浩同事，然允微贱，制由于浩。请赦其命。”世祖召允，谓曰：“《国书》皆崔浩作不？”允对曰：“《太祖记》，前著作郎邓渊所撰。《先帝记》及《今记》，臣与浩同作。然浩综务处多，总裁而已。至于注疏，臣多于浩。”世祖大怒曰：“此甚于浩，安有生路！”恭宗曰：“天威严重，允是小臣，迷乱失次耳。臣向备问，皆云浩作。”世祖问：“如东宫言不？”允曰：“臣以下才，谬参著作，犯逆天威，罪应灭族，今已分死，不敢虚妄。殿下以臣侍讲日久，哀臣乞命耳。实不问臣，臣无此言。臣以实对，不敢迷乱。”世祖谓恭宗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难，而能临死不移，不亦难乎！且对君以实，贞臣也。如此言，宁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于是召浩前，使人诘浩。浩惶惑不能对。允事事申明，皆有条理。时世祖怒甚，敕允为诏，自浩已下、僮吏已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为，频诏催切。允乞更一见，然后为诏。诏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余衅，非臣敢知。直以犯触，罪不至死。”世祖怒，命介士执允。恭宗拜请。世祖曰：“无此人忿朕，当有数千口死矣。”浩竟族灭，余皆身死。宗钦临刑，叹曰：“高允其殆圣乎！”

恭宗后让允曰：“人当知机，不知机，学复何益？当尔之时，吾导卿端绪，何故不从人言，怒帝如此。每一念之，使人心悸。”允曰：“臣东野凡生，本无宦意。属休延之会，应旌弓之举，释褐凤池，仍参麟阁，尸素官荣，妨贤已久。夫史籍者，帝王之实录，将来之炯戒，今之所以观往，后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举动，莫不备载，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荣曜当时，孤负圣恩，自贻灰灭。即浩之迹，时有可

论。浩以蓬蒿之才，荷栋梁之重，在朝无谗谀之节，退私无委蛇之称，私欲没其公廉，爱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责也。至于书朝廷起居之迹，言国家得失之事，此亦为史之大体，未为多违。然臣与浩实同其事，死生荣辱，义无独殊。诚荷殿下大造之慈，违心苟免，非臣之意。”恭宗动容称叹。允后与人言，我不奉东宫导旨者，恐负翟黑子。

恭宗季年，颇亲近左右，营立田园，以取其利。允谏曰：“天地无私，故能覆载；王者无私，故能包养。昔之明王，以至公宰物，故藏金于山，藏珠于渊，示天下以无私，训天下以至俭。故美声盈溢，千载不衰。今殿下国之储贰，四海属心，言行举动，万方所则，而营立私田，畜养鸡犬，乃至贩酤市廛，与民争利，议声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获，何欲而弗从，而与贩夫贩妇竞此尺寸。昔虢之将亡，神乃下降，赐之土田，卒丧其国。汉之灵帝，不修人君之重，好与宫人列肆贩卖，私立府藏，以营小利，卒有颠覆倾乱之祸。前鉴若此，甚可畏惧。夫为人君者，必审于择人。故称知人则哲，惟帝难之。《商书》云‘无迓小人’，孔父有云，小人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矣。武王爱周、邵、齐、毕，所以王天下。殷纣爱飞廉、恶来，所以丧其国。历观古今存亡之际，莫不由之。今东宫诚曰乏人，俊乂不少。顷来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选。故愿殿下少察愚言，斥出佞邪，亲近忠良，所在田园，分给贫下，畜产贩卖，以时收散。如此则休声日至，谤议可除。”恭宗不纳。

恭宗之崩也，允久不进见。后世祖召，允升阶饒歎，悲不能止。世祖流泪，命允使出。左右莫知其故，相谓曰：“高

允无何悲泣，令至尊哀伤，何也？”世祖闻之，召而谓曰：“汝不知高允悲乎？”左右曰：“臣等见允无言而泣，陛下为之悲伤，是以窃言耳。”世祖曰：“崔浩诛时，允亦应死，东宫苦谏，是以得免。今无东宫，允见朕因悲耳。”

允表曰：“往年被敕，令臣集天文灾异，使事类相从，约而可观。臣闻箕子陈谏而《洪范》作，宣尼述史而《春秋》著，皆所以章明列辟，景测皇天者也。故先其善恶而验以灾异，随其失得而效以祸福，天人诚远，而报速如响，甚可惧也。自古帝王莫不尊崇其道而稽其法数，以自修饬。厥后史官并载其事，以为鉴诫。汉成帝时，光禄大夫刘向见汉祚将危，权归外戚，屡陈妖眚而不见纳。遂因《洪范》、《春秋》灾异报应者而为其传。凯以感悟人主，而终不听察，卒以危亡。岂不哀哉！伏惟陛下神武则天，睿鉴自远，钦若稽古，率由旧章，前言往行，靡不究鉴，前皇所不逮也。臣学不洽闻，识见寡薄，惧无以裨广圣听，仰酬明旨。今谨依《洪范传》、《天文志》撮其事要，略其文辞，凡为八篇。”世祖览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灾异，亦岂减崔浩乎？”及高宗即位，允颇有谋焉。司徒陆丽等皆受重赏，允既不蒙褒异，又终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类也。

给事中郭善明，性多机巧，欲逞其能，劝高宗大起宫室。允谏曰：“臣闻太祖道武皇帝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营立，非因农隙，不有所兴。今建国已久，宫室已备，永安前殿足以朝会万国，西堂温室足以安御圣躬，紫楼临望可以观望远近。若广修壮丽为异观者，宜渐致之，不可仓卒。计斫材运土及诸杂役须二万人，丁夫充作，老小供饷，合四万人，半

年可讫。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一妇不织，或受其寒。况数万之众，其所损废，亦以多矣。推之于古，验之于今，必然之效也。诚圣主所宜思量。”高宗纳之。

允以高宗纂承平之业，而风俗仍旧，婚娶丧葬，不依古式，允乃谏曰：

“前朝之世，屡发明诏，禁诸婚娶不得作乐，及葬送之日歌谣、鼓舞、杀牲、烧葬，一切禁断。虽条旨久颁，而俗不革变。将由居上者未能悛改，为下者习以成俗，教化陵迟，一至于斯。昔周文以百里之地，修德布政，先于寡妻，及于兄弟，以至家邦，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明为政者先自近始。《诗》云：“尔之教矣，民胥效矣。”人君举动，不可不慎。

《礼》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烛；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今诸王纳室，皆乐部给伎以为嬉戏，而独禁细民，不得作乐，此一异也。

古之婚者，皆拣择德义之门，妙选贞闲之女，先之以媒娉，继之以礼物，集僚友以重其别，亲御轮以崇其敬，婚姻之际，如此之难。今诸王十五，便赐妻别居。然所配者，或长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作合宗王，妃嫔藩懿。失礼之甚，无复此过。往年及今，频有检劾。诚是诸王过酒致责，迹其元起，亦由色衰相弃，致此纷纭。今皇子娶妻，多出宫掖，令天下小民，必依礼限，此二异也。

万物之生，靡不有死，古先哲王，作为礼制，所以养生送死，折诸人情。若毁生以奉死，则圣人所禁也。然

葬者藏也，死者不可再见，故深藏之。昔尧葬谷林，农不易亩；舜葬苍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为地市，下固三泉，金玉宝货不可计数，死不旋踵，尸焚墓掘。由此推之，尧舜之俭，始皇之奢，是非可见。今国家营葬，费损巨亿，一旦焚之，以为灰烬。苟靡费有益于亡者，古之臣奚独不然。今上为之不辍，而禁下民之必止，此三异也。

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凭，致食飧之礼。今已葬之魂，人直求貌类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损败风化，渎乱情礼，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下不改绝，此四异也。

夫飧者，所以定礼仪，训万国，故圣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饮，肴干而不食，乐非雅声则不奏，物非正色则不列。今之大会，内外相混，酒醉喧谄，罔有仪式。又俳優鄙艺，污辱视听。朝廷积习以为美，而责风俗之清纯，此五异也。

今陛下当百王之末，踵晋乱之弊，而不矫然厘改，以厉颓俗，臣恐天下苍生，永不闻见礼教矣。”

允言如此非一，高宗从容听之。或有触连，帝所不忍闻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辄求见，高宗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礼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积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论。

或有上事陈得失者，高宗省而谓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为不作书于人中谏之，使人知恶，而于家内隐处也。岂不以父亲，恐恶彰于外也。今国家善恶，不能面陈而上表显谏，此岂不彰君之短，明己之美。至如高允者，真

忠臣矣。朕有是非，常正言面论，至朕所不乐闻者，皆侃侃言说，无所避就。朕闻其过，而天下不知其谏，岂不忠乎！汝等在左右，曾不闻一正言，但伺朕喜时求官乞职。汝等把弓刀侍朕左右，徒立劳耳，皆至公王。此人把笔匡我国家，不过作郎。汝等不自愧乎？”于是拜允中书令，著作如故。司徒陆丽曰：“高允虽蒙宠待，而家贫布衣，妻子不立。”高宗怒曰：“何不先言！今见朕用之，方言其贫。”是日幸允第，惟草屋数间，布被褥袍，厨中盐菜而已。高宗叹息曰：“古人之清贫岂有此乎！”即赐帛五百匹、粟千斛，拜长子忱为绥远将军、长乐太守。允频表固让，高宗不许。初与允同征游雅等多至通官封侯，及允部下吏百数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时百官无禄，允常使诸子樵采自给。

初，尚书奚瑾坐事诛，瑾子遵亡在山泽，遵母焦没入县官。后焦以老得免，瑾之亲故，莫有恤者。允愍焦年老，保护在家。积六年，遵始蒙赦。其笃行如此。转太常卿，本官如故。允上《代都赋》，因以规讽，亦《二京》之流也。文多不载。时中书博士索敞与侍郎傅默、梁祚论名字贵贱，著议纷纭。允遂著《名字论》以释其惑，甚有典证。复以本官领秘书监，解太常卿，进爵梁城侯，加左将军。

初，允与游雅及太原张伟同业相友，雅尝论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无也。而前史载卓公宽中，文饶洪量，褊心者或之弗信。余与高子游处四十年矣，未尝见其是非愠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内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呐呐不能出口，余常呼为‘文子’。崔公谓余云：‘高生丰才博学，一代佳士，所乏者矫矫风节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谴，起于纤微，及于

诏责，崔公声嘶股战不能言，宗钦已下伏地流汗，都无人色。高子敷陈事理，申释是非，辞义清辩，音韵高亮。明主为之动容，听者无不称善。仁及僚友，保兹元吉，向之所谓矫矫者，更在斯乎？宗爱之任势也，威振四海。尝召百司于都坐，王公以下，望庭毕拜，高子独升阶长揖。由此观之，汲长孺可卧见卫青，何抗礼之有！向之所谓风节者，得不谓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于心内，崔亦漏之于形外。钟期止听于伯牙，夷吾见明于鲍叔，良有以也。”其为人物所推如此。

高宗重允，常不名之，恒呼为“令公”。“令公”之号，播于四远矣。高宗崩，显祖居谅暗，乙浑专擅朝命，谋危社稷。文明太后诛之，引允禁中，参决大政。又诏允曰：“自顷以来，庠序不建，为日久矣。道肆陵迟，学业遂废，子衿之叹，复见于今。朕既纂统大业，八表晏宁，稽之旧典，欲置学官于郡国，使进修之业，有所津寄。卿儒宗元老，朝望旧德，宜与中、秘二省参议以闻。”允表曰：“臣闻经纶大业，必以教养为先；咸秩九畴，亦由文德成务。故辟雍光于周诗，泮宫显于《鲁颂》。自永嘉以来，旧章殄灭。乡闾芜没《雅》、《颂》之声，京邑杜绝释奠之礼。道业陵夷，百五十载。仰惟先朝每欲宪章昔典，经阐素风，方事尚殷，弗遑克复。陛下钦明文思，纂成洪烈，万国咸宁，百揆时叙。申祖宗之遗志，兴周礼之绝业，爰发德音，惟新文教。搢绅黎献，莫不幸甚。臣承旨敕，并集二省，披览史籍，备究典纪，靡不敦儒以劝其业，贵学以笃其道。伏思明诏，玄同古义。宜如圣旨，崇建学校以厉风俗。使先王之道，光演于明时；郁郁之音，流

闻于四海。请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关经典、世履忠清、堪为人师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与博士同，年限三十以上。若道业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齿。学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谨，堪循名教者，先尽高门，次及中第。”显祖从之。郡国立学，自此始也。

后允以老疾，频上表乞骸骨，诏不许。于是乃著《告老诗》。又以昔岁同征，零落将尽，感逝怀人，作《征士颂》，盖止于应命者，其有命而不至，则阙焉。群贤之行，举其梗概矣。今著之于左：

中书侍郎、固安伯范阳卢玄子真

郡功曹史博陵崔绰茂祖

河内太守、下乐侯广宁燕崇玄略

上党太守、高邑侯广宁常陟公山

征南大将军从事中郎勃海高毗子翼

征南大将军从事中郎勃海李钦道赐

河西太守、饶阳子博陵许堪祖根

中书郎、新丰侯京兆杜铨士衡

征西大将军从事中郎京兆韦阆友规

京兆太守赵郡李诜令孙

太常博士、钜鹿公赵郡李灵虎符

中书郎中、即丘子赵郡李遐仲熙

营州刺史、建安公太原张伟仲业

辅国大将军从事中郎范阳祖迈

征东大将军从事中郎范阳祖侃士伦
东郡太守、蒲县子中山刘策
濮阳太守、真定子常山许琛
行司隶校尉、中都侯西河宋宣道茂
中书郎燕郡刘遐彦鉴
中书郎、武恒子河间邢颖宗敬
沧水太守、浮阳侯勃海高济叔民
太平太守、平原子雁门李熙士元
秘书监、梁郡公广平游雅伯度
廷尉正、安平子博陵崔建兴祖
广平太守、列人侯西河宋悛
州主簿长乐潘天符
郡功曹长乐杜熙
征东大将军从事中郎中山张纲
中书郎上谷张诞叔术
秘书郎雁门王道雅
秘书郎雁门闵弼
卫大将军从事中郎中山郎苗
大司马从事中郎上谷侯辩
陈留郡太守、高邑子赵郡吕季才

夫百王之御士也，莫不资伏群才，以隆治道。故周文以多士克宁，汉武以得贤为盛。此载籍之所记，由来之常义。魏自神䴥已后，宇内平定，诛赫连积世之僭，扫穷发不羁之寇，南摧江楚，西荡凉域，殊方之外，慕义而至。于是偃兵息甲，修立文学，登延俊造，酬谘政事。

梦想贤哲，思遇其人，访诸有司，以求名士。咸称范阳卢玄等四十二人，皆冠冕之胄，著问州邦，有羽仪之用。亲发明诏，以征玄等。乃旷官以待之，悬爵以縻之。其就命三十五人，自余依例州郡所遣者不可称记。尔乃髦士盈朝，而济济之美兴焉。昔与之俱蒙斯举，或从容廊庙，或游集私门，上谈公务，下尽忻娱，以为千载一时，始于此矣。日月推移，吉凶代谢，同征之人，凋歼殆尽。在者数子，然复分张。往昔之忻，变为悲戚。张仲业东临营州，迟其还返，一叙于怀，齐衿于垂歿之年，写情于桑榆之末。其人不幸，复至殒歿。在朝者皆后进之士，居里者非畴昔之人，进涉无寄心之所，出入无解颜之地。顾省形骸，所以永叹而不已。夫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亦可以长言寄意。不为文二十年矣，然事切于心，岂可默乎？遂为之颂，词曰：

紫气干霄，群雄乱夏，王龚徂征，戎车屡驾。扫荡游氛，克剪妖霸，四海从风，八垠渐化。政教无外，既宁且一，偃武歆兵，唯文是恤。帝乃旁求，搜贤举逸，岩隐投竿，异人并出。

孺孺卢生，量远思纯，钻道据德，游艺依仁。旌弓既招，释褐投巾，摄齐升堂，嘉谋日陈。自东徂南，跃马驰轮，僭冯影附，刘以和亲。

茂祖茆单，夙离不造，克己勉躬，聿隆家道。敦心《六经》，游思文藻，终辞宠命，以之自保。

燕、常笃信，百行靡遗，位不苟进，任理栖迟。居冲守约，好让善推，思贤乐古，如渴如饥。

子翼致远，道赐悟深，相期以义，相和若琴。并参幕府，俱发德音，优游卒岁，聊以寄心。

祖根运会，克光厥猷，仰缘朝恩，府因德友。功虽后建，禄实先受，班同旧臣，位并群后。

士衡孤立，内省靡疚，言不崇华，交不遗旧。以产则贫，论道则富，所谓伊人，实邦之秀。

卓矣友规，稟兹淑亮，存彼大方，摈此细让。神与理冥，形随流浪，虽屈王侯，莫废其尚。

赵实名区，世多奇士，山岳所钟，挺生三李。矫矫清风，抑抑容止，初九而潜，望云而起。诜尹西都，灵惟作传，垂训皇宫，载理云雾。熙虽中天，迹阶郎署，余尘可挹，终亦显著。

仲业渊长，雅性清到，宪章古式，绸缪典诰。时值险难，常一其操。纳众以仁，训下以孝，化被龙川，民归其教。

迈则英贤，侃亦称选，闻达邦家，名行素显。志在兼济，岂伊独善，绳匠弗顾，功不获展。

刘、许履忠，竭力致躬，出能骋说，入献其功。辘轳一举，挠燕下崇，名彰魏世，享业亦隆。

道茂夙成，弱冠播名，与朋以信，行物以诚。怡怡昆弟，穆穆家庭，发响九皋，翰飞紫冥。频在省闼，亦司于京，刑以之中，政以之平。

猗欤彦鉴，思参文雅，率性任真，器成非假。靡矜于高，莫耻于下，乃谢朱门，归迹林野。

宗敬延誉，号为四俊，华藻云飞，金声夙振。中遇

沈痾，赋诗以讯，忠显于辞，理出于韵。

高沧朗达，默识渊通，领新悟异，发自心胸，质侔和璧，文炳雕龙，耀姿天邑，衣锦旧邦。

士元先觉，介焉不惑，振袂来庭，始宾王国。蹈方履正，好是绳墨，淑人君子，其仪不忒。

孔称游夏，汉美渊云，越哉伯度，出类逾群。司言秘阁，作牧河汾，移风易俗，理乱解纷。融彼滞义，涣此潜文，儒道以析，九流以分。

崔、宋二贤，诞性英伟，擢颖闾阎，闻名象魏。謦謦仪形，邈邈风气，达而不矜，素而能贲。

潘符擢尚，杜熙好和，清不洁流，浑不同波。绝希龙津，止分常科，幽而逾显，损而逾多。

张纲柔谦，叔术正直，道雅洽闻，弼为兼识。拔萃衡门，俱渐鸿翼，发愤忘餐，岂要斗食。率礼从仁，罔愆于式，失不系心，得不形色。

郎苗始举，用均已试，智足周身，言足为治。性协于时，情敏于事，与今而同，与古曷异。

物以利移，人以酒昏，侯生洁己，唯义是敦。日纵醇醪，逾敬逾温，其在私室，如涉公门。

季才之性，柔而执竞，屈彼南秦，申威致命。诱之以权，矫之以正，帝道用光，边土纳庆。

群贤遭世，显名有代，志竭其忠，才尽其概。体袭朱裳，腰纽双佩，荣曜当时，风高千载。君臣相遇，理实难谐，昔因朝命，举之克谐。披衿散想，解带舒怀，此忻如昨，存亡奄乖。静言思之，中心九摧，挥毫颂德，濯

尔增哀。

皇兴中，诏允兼太常，至兖州祭孔子庙，谓允曰：“此简德而行，勿有辞也。”后允从显祖北伐，大捷而还，至武川镇，上《北伐颂》，其词曰：“皇矣上天，降鉴惟德，眷命有魏，照临万国。礼化丕融，王猷允塞，静乱以威，穆民以则。北虏旧隶，稟政在蕃，往因时□，逃命北轅。世袭凶轨，背忠食言，招亡聚盗，丑类实繁。敢率犬羊，图纵猖蹶，乃诏训师，兴戈北伐。跃马裹粮，星驰电发，扑讨虔刘，肆陈斧钺。斧钺暂陈，馘翦厥旅，积骸填谷，流血成浦。元凶狐奔，假息穷墅，爪牙既摧，腹心亦阻。周之忠厚，存及行苇，翼翼圣明，有兼斯美。泽被京观，垂此仁旨，封尸野获，惠加生死。生死蒙惠，人欣覆育，理贯幽冥，泽渐殊域。物归其诚，神猷其福，遐迩斯怀，无思不服。古称善兵，历时始捷，今也用师，辰不及浹，六军克合，万邦以协，义著春秋，功铭玉牒，载兴颂声，播之来叶。”显祖览而善之。

又显祖时有不豫，以高祖冲幼，欲立京兆王子推，集诸大臣以次召问。允进跪上前，涕泣曰：“臣不敢多言，以劳神听，愿陛下上思宗庙托付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显祖于是传位于高祖，赐帛千匹，以标忠亮。又迁中书监，加散骑常侍。虽久典史事，然而不能专勤属述，时与校书郎刘模有所缉缀，大较续崔浩故事，准《春秋》之体，而时有刊正。自高宗迄于显祖，军国书檄，多允文也。末年乃荐高闾以自代。以定议之勋，进爵咸阳公，加镇东将军。

寻授使持节、散骑常侍、征西将军、怀州刺史。允秋月巡境，问民疾苦。至邵县，见邵公庙废毁不立，乃曰：“邵公

之德，阙而不礼，为善者何望。”乃表闻修葺之。允于时年将九十矣，劝民学业，风化颇行，然儒者优游，不以断决为事。后正光中，中散大夫、中书舍人河内常景追思允，帅郡中故老，为允立祠于野王之南，树碑纪德焉。

太和二年，又以老乞还乡里，十余章，上卒不听许，遂以疾告归。其年，诏以安车征允，敕州郡发遣。至都，拜镇军大将军，领中书监。固辞不许。又扶引就内，改定《皇诰》。允上《酒训》曰：

臣被敕论集往世酒之败德，以为《酒训》。臣以朽迈，人伦所弃，而殊恩过隆，录臣于将歿之年，勗臣于已坠之地。奉命惊惶，喜惧兼甚，不知何事可以上答。伏惟陛下以睿哲之姿，抚临万国，太皇太后以圣德之广，济育群生。普天之下，罔不称赖。然日昃忧勤，虚求不已，思监往事，以为警戒。此之至诚，悟通百灵，而况于百官士民。不胜踊跃，谨竭其所见，作《酒训》一篇。但臣愚短，加以荒废，辞义鄙拙，不足观采。伏愿圣慈，体臣慙慙之情，恕臣狂瞽之意。其词曰：

自古圣王，其为飧也，玄酒在堂而醑酒在下，所以崇本重原，降于滋味。虽汎爵旅行，不及于乱。故能礼章而敬不亏，事毕而仪不忒。非由斯致，是失其道。将何以范时轨物，垂之于世？历观往代成败之效，吉凶由人，不在数也。商辛耽酒，殷道以之亡；公旦陈诰，周德以之昌。子反昏酣而致毙，穆生不饮而身光。或长世而为戒，或百代而流芳。酒之为状，变感情性，虽曰哲人，孰能自竞。在官者殆于政也，为下者慢于令也，聪

达之士荒于听也，柔顺之伦兴于诤也，久而不悛，致于病也。岂止于病，乃损其命。谚亦有云：其益如毫，其损如刀。言所益者止于一味之益，不亦寡乎。言所损者天年乱志，天乱之损，其亦夥乎。无以酒荒而陷其身，无以酒狂而丧其伦。迷邦失道，流浪漂津。不师不遵，反将何因。《诗》不言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朋友之义也。作官以箴之，申谏以禁之，君臣之道也。其言也善，则三覆而佩之；言之不善，则哀矜而贷之。此实先王纳规之意。往者有晋，士多失度，肆散诞以为不羁，纵长酣以为高达，调酒之颂，以相眩曜。称尧舜有千钟百觚之饮，著非法之言，引大圣为譬，以则天之明，岂其然乎？且子思有云，夫子之饮，不能一升。以此推之，千钟百觚皆为妄也。

今大魏应图，重明御世，化之所暨，无思不服，仁风敦洽于四海。太皇太后以至德之隆，诲而不倦，忧勤备于皇情，诰训行于无外。故能道协两仪，功同覆载。仁恩下逮，罔有不遵，普天率土，靡不蒙赖。在朝之士，有志之人，宜克己从善，履正存贞。节酒以为度，顺德以为经。悟昏饮之美疾，审敬慎之弥荣。遵孝道以致养，显父母而扬名。蹈闵曾之前轨，遗仁风于后生。仰以答所授，俯以保其成。可不勉欤！可不勉欤！

高祖悦之，常置左右。

诏允乘车入殿，朝贺不拜。明年，诏允议定律令。虽年渐期颐，而志识无损，犹心存旧职，披考史书。又诏曰：“允年涉危境，而家贫养薄。可令乐部丝竹十人，五日一诣允，以

娱其志。”特赐允蜀牛一头，四望蜀车一乘，素几杖各一，蜀刀一口。又赐珍味，每春秋常致之。寻诏朝晡给膳，朔望致牛酒，衣服绵绢，每月送给。允皆分之亲故。是时贵臣之门，皆罗列显官，而允子弟皆无官爵。其廉退若此。迁尚书、散骑常侍，时延入，备几杖，问以政治。十年，加光禄大夫、金章紫绶。朝之大议，皆咨访焉。

魏初法严，朝士多见杖罚。允历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余年，初无谴咎。初，真君中以狱讼留滞，始令中书以经义断诸疑事。允据律评刑，三十余载，内外称平。允以狱者民之命也，常叹曰：“皋陶至德也，其后英蓼先亡，刘项之际，英布黥而王。经世虽久，犹有刑之余衅。况凡人能无咎乎？”

其年四月，有事西郊，诏以御马车迎允就郊所板殿观瞩。马忽惊奔，车覆，伤眉三处。高祖、文明太后遣医药护治，存问相望。司驾将处重坐，允启陈无恙，乞免其罪。先是，命中黄门苏兴寿扶持允，曾雪中遇犬惊倒，扶者大惧。允慰勉之，不令闻彻。兴寿称共允接事三年，未尝见其忿色。恂恂善诱，诲人不倦。昼夜手常执书，吟咏寻览。笃亲念故，虚己存纳。虽处贵重，志同贫素。性好音乐，每至伶人弦歌鼓舞，常击节称善。又雅信佛道，时设斋讲，好生恶杀。性又简至，不妄交游。显祖平青齐，徙其族望于代。时诸士人流移远至，率皆饥寒。徙人之中，多允姻媾，皆徒步造门。允散财竭产，以相瞻赈，慰问周至。无不感其仁厚。收其才能，表奏申用。时议者皆以新附致异，允谓取材任能，无宜抑屈。先是，允被召在方山作颂，志气犹不多损，谈说旧事，了无所遗。十一年正月卒，年九十八。

初，允每谓人曰：“吾在中书时有阴德，济救民命。若阳报不差，吾寿应享百年矣。”先卒旬外，微有不适。犹不寝卧，呼医请药，出入行止，吟咏如常。高祖、文明太后闻而遣医李修往脉视之，告以无恙。修入，密陈允荣卫有异，惧其不久。于是遣使备赐御膳珍羞，自酒米至于盐醯百有余品，皆尽时味，及床帐、衣服、茵被、几杖，罗列于庭。王官往还，慰问相属。允喜形于色，语人曰：“天恩以我笃老，大有所赉，得以贍客矣。”表谢而已，不有他虑。如是数日，夜中卒，家人莫觉。诏给绢一千匹、布二千匹、绵五百斤、锦五十匹、杂彩百匹、谷千斛以周丧用。魏初以来，存亡蒙赉者莫及焉，朝廷荣之。将葬，赠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将军、公如故，谥曰文，赐命服一袭。允所制诗赋诔颂箴论表赞，《左氏》、《公羊释》、《毛诗拾遗》，《论杂解》、《议何郑膏肓事》，凡百余篇，别有集行于世。允明算法，为算术三卷。子忱袭。

阚 駉 传

——《魏书》卷五二

【说明】阚駉，字玄阴，晋敦煌（今甘肃敦煌县）人，生卒年不详。博通经传，聪敏过人，曾注王郎《易传》，学者借助此书可以通经。蒙逊很器重他，常侍左右。任秘书、考课郎中，给文吏三十人，典校经籍，刊定诸子，三千余卷。撰《十三州志》行于世。加奉车都尉。牧犍对阚駉也很敬重，拜大行，迁尚书。《十三州志》是中国古代地理学名著，有重要学术价值，原书已佚，但清人王昶的《汉唐地理书钞》、张澍的《二酉堂集》中均有辑本。

阚駉，字玄阴，甘肃敦煌县人。祖父名儵，在西凉很有名。父亲名玟，为当时优秀人才，官至会稽县令。阚駉学问渊博，通晓经传，聪明过人，《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史及群言，过目即能背诵，当时人说宿日读过。注王朗的《易传》，学者借助他的注释可以通经书。撰著《十三州志》，流行于世。北凉的建立者沮渠蒙逊（公元368—433年）很器重他，经常随侍左右，向玄阴询问政治损益利害。拜秘书考课郎中，分派文吏三十人，校勘典册经籍，刊定诸子百家书

籍三千余卷。加奉车都尉。牧犍对待他更敬重，授官大行，升迁尚书。姑臧（今甘肃武威）秃发傉檀（公元363—415年）被蒙逊击败后，乐平王丕镇守凉州时，担任从事中郎。王死后回京师。家境贫穷，不免受饥寒。生性能多食，一顿饭吃三升才饱。阚骃去世，无子嗣后人。（李仲均 译）

【原文】

阚骃，字玄阴，敦煌人也。祖惊，有名于西土。父玟，为一时秀士，官至会稽令。骃博通经传，聪敏过人，三史群言，经目则诵，时人谓之宿读。注王朗《易传》，学者籍以通经。撰《十三州志》，行于世。蒙逊甚重之，常侍左右，访以政治损益。拜秘书考课郎中，给文吏三十人，典校经籍，刊定诸子三千余卷。加奉车都尉。牧犍待之弥重，拜大行，迁尚书。姑臧平，乐平王丕镇凉州，引为从事中郎。王薨之后，还京师。家甚贫弊，不免饥寒。性能多食，一饭至三升乃饱。卒，无后。

李业兴传

——《魏书》卷八四

【说明】李兴业（公元483—549年），上党长子（今山西长治市南）人。他性格耿直，师从徐遵明，博涉百家之学，尤其精通算术和历法。后被举为孝廉，任校书郎。北魏延昌年间造《戊子元历》，后以此历及太史令张明豫之子荡寇将军张龙祥所造《甲子元历》为主，综合中坚将军屯骑校尉张洪等七家历，修成《正光历》，并于正光四年颁行。孝庄帝时典仪论，为著作左郎。东魏初年掌制邺都地图。天平四年（公元537年）与卢元明等使梁，与梁武帝答经义。又任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太原太守等职。至东魏孝静帝时，《正光历》已多有乖舛，不甚精密。兴和元年（公元539年），李业兴重修《正光历》，成《甲子元历》，并奉敕以新历呈齐献武王田曹参军信都芳审视，信都芳精于历术，以星辰失次数事驳难业兴，李业兴则以新历精于北凉赵馥之《元始历》、南朝刘宋何承天之《元嘉历》及祖冲之《大明历》，一一出据答对。继而颁用。后获罪而遭囚禁，在狱中撰成《九宫行棋历》，未得施行。最后死于狱中。

李业兴，上党长子人。祖父李虬，父亲李玄纪，都因精通儒家学说而被荐举为孝廉。李玄纪在任金乡令期间去世了。李业兴少年耿直，从小就立志专心致力于学问，身背书籍从师学习，不辞辛苦。他对有关儒家经典的诠释精心研究，并喜欢披览和留心新奇的学说。稍后，李业兴师从徐遵明，在赵魏故地之间学习儒学。当时，渔阳人鲜于灵馥也招收学生教学授业，而徐遵明名望不高，著述也还不多。业兴于是来到灵馥的学校，以生徒的身份听他讲授。灵馥问业兴：“李生长期追随羌博士徐遵明问经，都学到了些什么呢？”李业兴沉默不语。等到灵馥讲解《春秋左氏传》的时候，李业兴向他求教有关此书的数条要旨大义，灵馥却哑然不能对答。于是李业兴抖了抖衣服，站起来说：“羌博士的弟子正是如此！”随后他立即离开灵馥的学校，直接回到了徐遵明的门下。自此之后，灵馥的学生全部离开他而投奔了徐遵明。徐遵明的学说由此大盛，生徒也渐渐地多了起来，这些都是李业兴所促成的。

此后，李业兴广泛涉猎多种学问，凡图讖、风角、天文、占候之学，无不精通熟练，尤其擅长算术和历法。虽然他家境贫寒，但却常常高傲自负，如果待他礼节不周，即使是达官显贵，也休想使他屈服。李业兴后来作了王遵业的门客。继而被荐举为孝廉，任校书郎。由于朝廷施用的赵歆《元始历》，因节气少算而后于天时，渐渐地已不很精密了。于是在北魏延昌年间，李业兴制定了《戊子元历》，上呈魏帝。当时，李业兴及屯骑校尉张洪、荡寇将军张龙祥等九人都各自献上了自己新定的历法，世宗宣武帝下诏，让他们在此基础上共

同编制一部历法。后来，张洪等人一致推举李业兴主领此事，编写了《戊子历》，并于正光三年上奏颁行。此事记载在《律历志》中。李业兴接着又被提升为奉朝请。临淮王元冏征伐南蛮时，推荐他为骑兵参军。后广阳王元渊北伐，又任他为外兵参军。李业兴认为，殷历的甲寅，黄帝历的辛卯，都只徒有一个上元积年而已，方法与内容都已缺佚，于是李业兴又修定殷历与黄帝历，各成一卷，流行于世。

北魏建义元年，孝庆帝降旨李业兴，命他掌管对礼仪的注释论解，不久封他为著作左郎。永安二年，因他过去制定历法有功，赐封李业兴长子伯的爵位。后来由于父母去世，在服丧期间他解职去官，不久又官复原职。在长广王元晔盗用帝号期间，他被封为通直散骑侍郎。普泰元年，宫中裁减侍中常待等官，而李业兴仍然被留任通直，兼领宁朔将军。后来又被任命为征虏将军、中散大夫，依旧留在通直。太昌元年，李业兴改作散骑侍郎，还是因为他掌管礼仪的劳苦，特别被赏赐晋升一级，封为平东将军、光禄大夫，不久又兼领安西将军。后来因出帝刚刚即位之时，李业兴参与实行了礼仪之事，被封为屯留县开国子，并赐五百户封地作为食邑。此后他改作了中军将军、通直散骑常侍。永熙三年二月，出帝以爵祭于神前行拜师礼，李业兴与魏季景、温子升、襄瑗代为选取文章。后入宫作了侍读，为出帝讲学授业。

东魏初年，国都刚刚迁到邺城不久，起部郎中辛术便上奏说：“如今皇城迁徙到了新地，一切都需从头做起，要想将京城修建得繁华富丽，必须以采用适中的方案为宜。向上可以效法古代，向下可以仿照洛阳城的模式。虽然今天的邺都

已很破旧，建筑基础也毁弃殆尽，加之相关的图纸与文字记录多不一致，这些事都需要审核考定。臣虽说有此职责，但学问还不足以研习古事，因此对国家大事不敢独断专行。通直散骑常侍李业兴的学问精深博洽，他通达儒学，见闻广博，纵使是千家万户，也最好去访问。如今要向他救教，请他用图纸来查考核对文字记录，考定是非，再参照杂糅古今的有关记载，取其适中的内容制定出一个方案，召募画工和其他可供调动使用的人员，将全部内容重新绘制成一幅新图，而后呈奏圣上定夺。只有这样，到开始营建的时候，主事和工匠们才不会有疑问。”孝静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东魏天平二年，李业兴被任为镇南将军，不久又被封为侍读。当时，尚书右仆射、营构大将军高隆之奉旨，正在整理五官中郎、左中郎和右中郎三署的乐器、衣服，以及各种散乐杂技使用的器具，于是上奏魏帝，请李业兴也共同参与这项事务。

天平四年，李业兴与兼任散骑常侍的李谐、兼任吏部郎的卢元明一起出使梁朝。当时，梁武帝萧衍的散骑常侍朱异问李业兴：“魏洛阳城外的委粟山是举行郊祀的地方吗？”李业兴答道：“委粟山是祭天的圜丘坛，不是举行郊祀的地方。”朱异说：“北方举行郊祀之地与圜丘的安排不在同一个地方，这是采用郑玄的说法吧。我则以为王肃的解释更适用。”业兴说：“是这样，京城洛阳举行郊祭的地点和圜丘的安排，都只根据郑玄的说法。”朱异问：“如果是这样，那么嫡亲女子的礼制却反常地按庶亲的礼制降低一等，是否也是根据郑玄的说法呢？”业兴答道：“对于这件事，也不能仅从一家之说，如果卿在这件事上采用王肃的说法，那么，丧家除服行的祭礼

应该在二十五个月后举行，为什么在王俭所著的《丧礼》中，除服之祭却是在二十七个月后举行呢？”朱异于是无言以对。李业兴继续说：“我昨天看见一座明堂，它是用四根柱子架起的方形房屋，里面根本没有分成五间或九间内室，这种形制是裴颀制定的。明堂是一种上面为圆形、下面为方形的建筑，裴颀只是取消了其中的内室而已，并没有改变它的整体形状，那么，为什么现在看到的这座明堂的上不建成圆形呢？”朱异说：“上面圆下面方的说法，在经典著作中根本找不到，既然如此，方形的明堂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业兴说：“上圆下方的说法，来源非常清楚，卿只是自己没有看到罢了。我曾见过你集录梁国君主的《孝经义》，其中也说到明堂的形状为上圆下方，如此看来，你所说的岂不是自相矛盾了嘛！”朱异说：“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明堂为上圆下方的说法究竟出自哪一部经典呢？”业兴答道：“出自《孝经援神契》。”朱异说：“这是谶纬占卜之类的书籍，有什么可值得相信的！”业兴反问道：“卿如果不信此书，那么灵威仰、叶光纪之类的神祇在经书中也都没有记载，你又信不信呢？”朱异哑然不能作答。

接着，萧衍亲自向李业兴发问：“我听说爱卿精通五经及其义理，那么儒家学说与道家学说究竟有哪一点彼此相通呢？”业兴说：“我少年时代作学生时，只读《诗》、《书》、《易》、《礼》、《春秋》五经，至于这些书的深奥的义理，则还不能完全了解。”萧衍又问：“《诗经》中的《周南》是帝王的诗歌，却要系在周公的名下；《召南》是仁厚贤者的诗歌，却要系在召公的名下。为什么要叫作系呢？”业兴回答说：“郑玄在注释《仪礼》时说：‘古时大王和王季居住在岐山以

南，他们身体力行《召南》的教导，用以振兴帝王的事业。到了文王的时候，他遵循今天《周南》的教导办事，因而得以受授天命，在酆地营建了都城，然后把他旧有的土地分给了周公和邵公，所以叫作系。”萧衍接着又问：“如果是旧有的土地，应该自己统辖管理才是，有什么理由要分给周、邵二公呢？”业兴答道：“文王在作诸侯的时候，教育感化了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今天已经作了至尊至上的天子，便不可以再守着过去作诸侯时的土地了，所以将其分给了二公。”萧衍继续问：“乾卦的第一爻的爻题是‘藏伏不见的龙’，第二爻的爻题是‘刚刚出现的龙’，至第五爻的爻题是‘飞跃在天的龙’。我看它们最初可以叫作虎吧。”提问稍略转了话题。业兴回答说：“我才疏学浅，不足以回答您的问题。”萧衍又问：“《尚书》记载‘正月朔日，虞舜在文祖庙接受帝尧禅让帝位’。这是哪一种历法的正月？”业兴答道：“这是夏历的正月。”萧衍问他如何得知，业兴说：“查考《尚书中候·运行篇》，其中说到‘日月开始运行’。所以知道是夏历。”萧衍又问：“帝尧时代的历法以哪个月作为一年的开始呢？”业兴回答道：“自帝尧以前，典籍中没有记载，实在不知道。”萧衍接着说：“‘恭敬地迎接刚出升的太阳’，这就是正月。‘在一年中昼夜平分的那一天，鸟星将在傍晚出现在正南方的天空，用这个天象可以确定春分’，这就是二月。这些内容都出自《尧典》，为什么说不知道帝尧时代的历法以哪个月为一年的开始呢？”业兴答道：“虽然夏、商、周三代的历法不同，但人们在谈论时间和节气的时候，都依据夏代的历法。《周礼》说：在仲春二月，让那些尚未成家的单身男女相会相配。此事虽出自周

代的典籍，但月份却是采用夏代的历法。帝尧时代的历法也当如此。然而我研究得不够深入，无法辨别分析清楚，难以回答您的问题。”萧衍又问：“《礼记》记载，原壤的母亲死后，孔子帮助他整治棺槨。原壤却敲着棺材唱道：‘从母亲去世到现在已经很久了，我一直都不能以此木来寄托我的歌声。棺材的木纹象狸头上的花纹一样斑斓，孔子执斧的手象女子的手一样柔美。’孔子是圣人，怎么反而与原壤是朋友呢？”业兴回答说：“孔子自己在当时就已经解释了，他说：“朋友没有大的过错就不能相互遗弃，与我有骨肉关系的亲属，虽然有违背礼仪的地方，但还没有失去他们作亲属的原则，我就仍然要与他们和睦相处。我的故旧朋友，虽然有违背礼仪的地方，但还没有忘记他们作朋友的原则，我就仍然要与他们交往。”萧衍继续问：“原壤是哪里人？”业兴答道：“郑玄在对《礼记》的注释中说：原壤是孔子幼年时代的朋友。所以是鲁国人。”萧衍问：“孔子是圣人，他身上所具有的品行必然可以效法。原壤不行孝道，违背了尊卑长幼之间应遵从的原则，为什么孔子要容忍故友的小毛病而与他交往，却不追究他不行孝道的大罪过呢？”业兴答道：“原壤所做的一切，事情是明白清楚的，孔子与他从幼年时代结下的情谊，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既然朋友没有严重的过失，怎么可以抛弃呢？孔子非常珍视与老朋友深厚的情谊，并没有失理。”萧衍继续问：“孔子是圣人，为什么要写原壤的事迹让后代效法呢？”业兴回答说：“这是后人所撰，并不是孔子自己写的。与孔子父母被合葬在防地一样，象这类事情，《礼记》中动辄就可以列出上百条。”萧衍接着问：“《易经》所说的太极，究

竟有没有呢？”业兴答道：“古代所传是有太极，但我一向不善于道家学说，哪儿敢立刻回答这个问题。”

回国之后，李业兴兼任散骑常侍，又兼领中军大将军。后来议事省被废除，魏帝下诏令右仆射高隆之及其他中央官吏，与李业兴在尚书省共同议定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的礼仪。兴和元年，李业兴又续修了《甲子元历》，当时就颁行使用了。后来他又计划议定《麟趾新制》。东魏武定元年，李业兴被任为国子寺祭酒，并继续担任侍读。武定三年，他受朝廷派遣，出任太原太守。齐献武王高欢每次出兵征讨，常要到他府上拜访，与他商议。武定五年，齐文襄王高澄封他为中外府咨议参军。后因犯事而遭囚禁，于是李业兴在狱中撰修了《九宫行棋历》，以五百为一章，四千零四十为一部，九百八十七为斗分，重新以己未作为历元，与此前行用的历法首尾相接，不需再作调整，此历的内容与方法与当时施行的历法不同。至于节气的交分和影度的盈缩长短，则与当时的历法没有差异。武定七年，李业兴死在狱中，享年六十六岁。

李业兴对古代典籍十分喜爱，汇集收藏从未终止，他常亲手将破旧的书籍补好，然后亲笔书写上题跋，家中的藏书将近万卷。他览读不息，并常有很多新奇的见解，他学识渊博，儒者们对此都十分钦佩。李业兴性格豪爽侠义，重意气。别人遇到急难，委身投奔他，便能得到他的收留和容匿。对于与他爱好相投的人，即使倾其所有送给人家，他也绝不吝惜。但是，如果别人与他有相违戾的地方，便会立即指责人家，甚至厉声厉色地诽谤痛骂。同时他的性格又很急躁狭隘，

每当他与人辩论的时候，总要高声叫喊，排斥别人的意见，毫无儒者风度。他常对人说：“只要对我有利，即使知道别人所说的都是荒谬不合理的话，也比对我不利要好。”他致力进取，妒忌别人的才能和声望超过自己，甚至不顾可能造成的恶劣后果，当时的人们都对他这一点非常憎恶。但说到他学术的精深广博，在当时却没有人能与其相比。

李业兴的儿子李崇祖，于东魏武定年间任太尉外兵参军。李崇祖的弟弟叫李遵祖，北魏太昌年间，李业兴将自己长子伯的爵位传给了他。后来在北齐接受东魏禅让帝位的时候，他们都投降了。

(冯 时 译)

【原文】

李业兴，上党长子人也。祖虬，父玄纪，并以儒学举孝廉。玄纪卒于金乡令。业兴少耿介，志学精力，负帙从师，不惮勤苦。耽思章句，好览异说。晚乃师事徐遵明于赵魏之间。时有渔阳鲜于灵馥亦聚徒教授，而遵明声誉未高，著录尚寡。业兴乃旨灵馥黉舍，类受业者。灵馥乃谓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业兴默而不言。及灵馥说《左传》，业兴问其大义数条，灵馥不能对。于是振衣而起曰：“羌弟子正如此耳！”遂便径还。自此灵馥生徒倾学而就遵明。遵明学徒大盛，业兴之为也。

后乃博涉百家，图纬、风角、天文、占候无不详练，尤长算历。虽在贫贱，常自矜负，若礼待不足，纵于权贵，不为之屈。后为王遵业门客。举孝廉，为校书郎。以世行赵馥历，节气后辰下算，延昌中，业兴乃为《戊子元历》上之。于是屯骑校尉张洪、荡寇将军张龙祥等九家各献新历，世宗诏

令共为一历。洪等后遂共推业兴为主，成《戊子历》，正光三年奏行之。事在《律历志》。累迁奉朝请。临淮王湊征蛮，引为骑兵参军。后广阳王渊北征，复为外兵参军。业兴以殷历甲寅，黄帝辛卯，徒有积元，术数亡缺，业兴又修之，各为一卷，传于世。

建义初，敕典仪注，未几除著作佐郎。永安二年，以前造历之勋，赐爵长子伯。遭忧解任，寻起复本官。元晔之窃号也，除通直散骑侍郎。普泰元年，沙汰侍官。业兴仍在通直，加宁朔将军。又除征虏将军、中散大夫，仍在通直。太昌初，转散骑侍郎，仍以典仪之勤，特赏一阶，除平东将军、光禄大夫，寻加安西将军。后以出帝登极之初，预行礼事，封屯留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转中军将军、通直散骑常侍。永熙三年二月，出帝释奠，业兴与魏季景、温子升、襄瑗为摘句。后入为侍读。

迁邺之始，起部郎中辛术奏曰：“今皇居徙御，百度创始，营构一兴，必宜中制。上则宪章前代，下则模写洛京。今邺都虽旧，基址毁灭，又图记参差，事宜审定。臣虽曰职司，学不稽古，国家大事非敢专之。通直散骑常侍李业兴硕学通儒，博闻多识，万门千户，所宜访问。今求就之披图案记，考定是非，参古杂今，折中为制，召画工并所须调度，具造新图，申奏取定。庶经始之日，执事无疑。”诏从之。天平二年，除镇南将军，寻为侍读。于时尚书右仆射、营构大将高隆之被诏缮治三署乐器、衣服及百戏之属，乃奏请业兴共参其事。

四年，与兼散骑常侍李谐、兼吏部郎卢元明使萧衍。衍散骑常侍朱异问业兴曰：“魏洛中委粟山是南郊邪？”业兴曰：

“委粟是圆丘，非南郊。”异曰：“北间郊、丘异所，是用郑义。我此中用王义。”业兴曰：“然，洛京郊、丘之处专用郑解。”异曰：“若然，女子逆降傍亲亦从郑以不？”业兴曰：“此之一事，亦不专从。若卿此间用王义，除禫应用二十五月，何以王俭《丧礼》禫用二十七月也？”异遂不答。业兴曰：“我昨见明堂四柱方屋，都无五九之室，当是裴颢所制。明堂上圆下方，裴唯除室耳。今此上不圆何也？”异曰：“圆方之说，经典无文，何怪于方？”业兴曰：“圆方之言，出处甚明，卿自不见。见卿录梁主《孝经义》亦云上圆下方，卿言岂非自相矛盾！”异曰：“若然，圆方竟出何经？”业兴曰：“出《孝经援神契》。”异曰：“纬候之书。何用信也！”业兴曰：“卿若不信，灵威仰、叶光纪之类经典亦无出者，卿复信不？”异不答。

萧衍亲问业兴曰：“闻卿善于经义，儒、玄之中何所通达？”业兴曰：“少为书生，止读五典，至于深义，不辨通释。”衍问《诗·周南》，王者之风，系之周公；《邵南》，仁贤之风，系之邵公。何名为系？”业兴对曰：“郑注《仪礼》云：昔大王、王季居于岐阳，躬行《邵南》之教，以兴王业。及文王行今《周南》之教以受命。作邑于酆，分其故地，属之二公。名为系。”衍又问：“若是故地，应自统摄，何由分封二公？”业兴曰：“文王为诸侯之时所化之本国，今既登九五之尊，不可复守诸侯之地，故分封二公。”衍又问：“《乾卦》初称‘潜龙’，二称‘见龙’，至五‘飞龙’。初可名为虎。”问意小乖。业兴对：“学识肤浅，不足仰酬。”衍又问：“《尚书》‘正月上日受终文祖’，此是何正？”业兴对：“此是夏正月。”衍言何以得知。业兴曰：“案《尚书中候·运行篇》云‘日月

营始’，故知夏正。”衍又问：“尧时以何月为正？”业兴对：“自尧以上，书典不载，实所不知。”衍又云：“‘寅宾出日’即是正月。‘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即是二月。此出《尧典》，何得云尧时不知用何正也？”业兴对：“虽三正不同，言时节者皆据夏时正月。《周礼》，仲春二月会男女之无夫家者。虽自周书，月亦夏时。尧之日月，亦当如此。但所见不深，无以辨析明问。”衍又曰：“《礼》，原壤之母死。孔子助其沐椁。原壤叩木而歌曰：‘久矣夫，予之不托于音也。狸首之班然，执女手之卷然。’孔子圣人，而与原壤为友？”业兴对：“孔子即自解，言亲者不失其为亲，故者不失其为故。”又问：“原壤何处人？”业兴对曰：“郑注云：原壤，孔子幼少之旧。故是鲁人。”衍又问：“孔子圣人，所存必可法。原壤不孝，有逆人伦，何以存故旧之小节，废不孝之大罪？”业兴对曰：“原壤所行，事自彰著。幼少之交，非是今始，既无大故，何容弃之？孔子深敦故旧之义，于理无失。”衍又问：“孔子圣人，何以书原壤之事，垂法万代？”业兴对曰：“此是后人所录，非孔子自制。犹合葬于防，如此之类，《礼记》之中动有百数。”衍又问：“《易》曰太极，是有无？”业兴对：“所传太极是有，素不玄学，何敢辄酬。”

还，兼散骑常侍，加中军大将军。后罢议事省，诏右仆射高隆之及诸朝士与业兴等在尚书省议定五礼。兴和初，又为《甲子元历》，时见施用。复预议《麟趾新制》。武定元年，除国子祭酒，仍侍读。三年，出除太原太守。齐献武王每出征讨，时有顾访。五年，齐文襄王引为中外府咨议参军。后坐事禁止。业兴乃造《九宫行棋历》，以五百为章，四千四十

为部，九百八十七为斗分，还以己未为元，始终相维，不复移转，与今历法术不同。至于气序交分，景度盈缩，不异也。七年，死于禁所，年六十六。

业兴爱好坟籍，鸛集不已，手自补治，躬加题帖，其家所有，垂将万卷。览读不息，多有异闻，诸儒服其渊博。性豪侠，重意气。人有急难，委之归命，便能容匿。与其好合，倾身无吝。若有相乖忤，便即疵毁，乃至声色，加以谤骂。性又躁隘，至于论难之际，高声攘振，无儒者之风。每语人云：“但道我好，虽知妄言，故胜道恶。”务进忌前，不顾后患，时人以此恶之。至于学术精微，当时莫及。

子崇祖，武定中，太尉外兵参军。

崇祖弟遵祖，太昌中，业兴传其长子伯以授之。齐受禅，例降。

晁 崇 传

——《魏书》卷九一

【说明】晁崇，字子业，辽东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人。生年未详，约卒于北魏道武帝天兴五年（公元402年）。晁崇精通天文术数之学，初作后燕慕容垂的太史郎，后为北魏军俘虏，赦免后跟随太祖拓跋珪平定中原，官拜太史令，后升任中书侍郎。北魏天兴元年（公元398年），晁崇奉诏开始制造浑仪，他所造的浑仪用铁制成，十分精美，星度均错银，下有十字水平，上立四柱，十字之上，以龟负双规。这具浑仪由六规组成，分内外两重，外重四规恒定，一为地平环（金浑纬规），一为赤道环（天常规），另外两规是子午环和卯酉环，相交而呈南北两极。内重由两规和窥管组成，可以运转。窥管长八尺，可观测星辰行度。北周武帝宇文邕平灭北齐后，曾获得此仪。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国都初竣，这具浑仪又被移置观象台。至唐代仍在使用的。

晁崇，字子业，辽东襄平人。他的祖辈世代出任史官。晁崇擅长天文、历法和占卜等学问，在当时享有盛名。他曾任后燕慕容垂的太史郎。晁崇跟随后燕太子慕容宝征战时，在

参合为北魏军大败，并被俘获，后来得到赦免。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十分赏识他的才学和技能，宠爱备至。此后，晁崇跟随道武帝平定中原，官拜太史令。道武帝并下诏令他制造浑仪，且根据日月星辰的运行情况制定历法。在他被升为中书侍郎后，仍然继续从事制造浑仪和修定历制的工作。北魏天兴五年（公元402年）十月，发生了月晕现象，月亮的左角快要被光气完全遮住了，晁崇急忙上奏道：“依星占的说法，这种天象预示着长有犄角的动物将要死亡。”当时，太祖道武帝统领北魏大军已经在柴壁打败了姚平，因为晁崇陈明出现了不祥的天象征兆，于是命令全军焚烧战车，班师回朝。果然，很快就发生了大范围的牛瘟，军中几百头驾车的巨大的被阉割过的牛，在一天之内都死在了路旁，首尾相接，一个挨着一个。这一年，天下十分之七八的牛都死掉了，而且还死了很多麋鹿。

晁崇的弟弟晁懿，聪明善辩，但才智不如晁崇。由于他北方话讲得好，因而在宫廷内以供听使，作了黄门侍郎，兄弟二人的地位都很显赫。晁懿喜欢修饰仪表容貌，威严有余，穿着服饰常超越他的级别，而且讲话的声音非常象太祖。身边的人每当听到他的声音，都吓得浑身发抖。道武帝得知此事后，对他极为厌恶。后来，晁家的家奴告发晁崇与晁懿兄弟二人密谋反叛，并且与亡臣王次多秘密串通，又与姚兴相互勾结，使得武帝对他们日生不满。恰恰到天兴五年的时候，姚兴寇边，攻击平阳，道武帝亲自统兵大破了姚军。太祖拓跋珪这时才觉得，晁家家奴先前对晁崇兄弟二人的告发应该属实，于是回到晋阳后，将晁崇与晁懿一并拘执，赐了死罪。

(冯 时 译)

【原文】

晁崇，字子业，辽东襄平人也。家世史官。崇善天文术数，知名于时。为慕容垂太史郎。从慕容宝败于参合，获崇，后乃赦之。太祖爱其技术，甚见亲待。从平中原，拜太史令，诏崇造浑仪，历象日月星辰。迁中书侍郎，令如故。天兴五年，月晕，左角蚀将尽，崇奏曰：“占为角虫将死。”时太祖既克姚平于柴壁，以崇言之征，遂命诸军焚车而反。牛果大疫，舆驾所乘巨犝数百头亦同日毙于路侧，自余首尾相继。是岁，天下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

崇弟懿，明辩而才不及崇也。以善北人语内侍左右，为黄门侍郎，兄弟并显。懿好矜容仪，被服僭度，言音类太祖。左右每闻其声，莫不惊竦。太祖知而恶之。后其家奴告崇与懿叛，又与亡臣王次多潜通，招引姚兴，太祖衔之。及兴寇平阳，车驾击破之。太祖以奴言为实，还次晋阳，执崇兄弟并赐死。

孙僧化传

——《魏书》卷九一

【说明】孙僧化，东莞（今山东莒县）人，北魏末期的天文历法家和星占学家。曾任通直散骑常侍。据史书载，于永熙（公元532—534年）年间，他受诏与太史令胡世荣、张龙（祥）、赵洪庆及中书舍人孙子良等人校订天文书，他们集甘、石二家《星经》及汉魏以来的二十三家经占，集为五十五卷。又，“后集诸家撮要，前后所上杂占，以类相从，日月五星、二十八宿、中外官图，合为七十五卷。”他著有《星占》三十三卷（又说，与他人合作，二十八卷）和《后魏永安历》一卷，都已失传。

孙僧化，东莞人。认识星宿名分，依照天象占卜以讲述灾祸变异，时常有所应验。普泰（公元531—532年）中，余朱世隆嫌他多言，因而将其囚禁于掌管刑罚的延尉处，免去官职。北魏永熙（公元532—534年）年间，出帝元修（公元510—534年）召见孙僧化和中散大夫孙安都，让他们共同撰写兵法，未等写完而元修入关，于是停写。东魏元象（公元

538—539 年) 中, 孙僧化死于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南)。

(李 迪 译)

【原文】

(孙) 僧化者, 东莞人。识星分, 案天占以言灾异, 时有所中。普泰中, 余朱世隆恶其多言, 遂系于廷尉, 免官。永熙中, 出帝召僧化与中散大夫孙安都共撰兵法, 未就而帝入关, 遂罢。元象中死于晋阳。

殷 绍 传

——《魏书》卷九一

【说明】殷绍，长乐（今河南省滑县东北）人。生卒年未详。他少年聪敏，喜爱阴阳术数之学，通晓《九章算术》和《七曜历书》。北魏太武帝时，为算生博士。早在后秦时期，殷绍曾遍游伊川求学，遇到当时的著名学者成公兴，从他学习《九章算术》中重要的方法和内容。其后，殷绍被成公兴引见给阳翟九崖严僧徒释昙影，继续求学《九章算术》。而后，殷绍又被释昙影介绍给长广东山道人法穆，两人为殷绍共同讲解《九章算术》诸家杂要等课，涉猎颇广。著有《四序堪舆》一书。

殷绍，长乐人。他从小便很聪明勤勉，喜爱阴阳、天文、历法、占卜等学问，他四处求学，游历八方，通晓《九章算术》和《七曜历书》。北魏世祖太武帝拓跋焘在世时，殷绍被任为算生博士，供职于东宫西曹。由于他技术高超，才能出众，太子恭宗也因此而认识了他。北魏太安四年夏，殷绍上奏《四序堪舆》，他在表章中说：“臣于后秦统治期间，遍行伊川，求学进修，当时遇到了游历的隐士、著名儒者成公兴，

并师从他学习《九章算术》中最切要的内容和方法。成公兴，字广明，自称是胶东人，他久居深山而隐没无闻，在世间很少露面。成公兴如期带领臣一起南行到了阳翟九崖岩，来到僧徒释昙影的住处，然后立即北返，臣独自留下，与释昙影同吃同住，向他学习求教《九章算术》。其后，释昙影又带臣到长广东山，拜见了道士法穆。那时，法穆与释昙影俩人一起定期为臣开设新课，汇集讲解不同学派对《九章算术》的研究要点，揭露阐释章节及次序的概要和大意。又推广到审度五脏六腑和心髓血脉，测量计算体积及工程用工数量，并学习变化天象、土圭测影和《周髀算经》。经过认真地练习和苦心地思考，积累温习了四年，跟从法穆所学到的知识，却也只是粗略地掌握了一个概要。法穆和释昙影富有仁爱之心，对臣表现出了特别的忧虑和怜爱，后来又教授臣学习由法穆的老师公注释的黄帝《四序经》，此书经文三十六卷，总计三百二十四章，专门论述天地阴阳的本源。第一部分为《孟序》，共九卷八十一章，论述阴阳配合的根本；第二部分为《仲序》，共九卷八十一章，解说四季气盛与福祸吉凶的关系；第三部分为《叔序》，共九卷八十一章，阐明日月星宿交会的原理和意义；第四部分为《季序》，也为九卷八十一章，详细具体地解释六十甲子与刑罚灾祸、福禄德行的关系。守护东山的山神非常严厉，绝不可能让你出山，就这样在山中探索研究了几年，也只粗略地明白了些纲要。山居生活既艰险又困难，没有什么东西可供维持生计，臣渐渐地忍受不了这种窘迫的生活，心志也变得懒散起来。甲寅那年，太阳走到了十二次中的鹑火次，月亮走到了十二律的林钟位，景象壮丽，

看着这幅景象，又唤起了臣对家乡的怀念，人心思归，于是向释昙影和法穆辞行而去。自那时至今，已经整整四十五年了。纵观各个时代的风俗、堪舆、医术，由于经历的时间很久，传写中出现了很多错误，吉凶禁忌已不能完全通晓了。有时推算所得的良辰却有恶事发生，选择的吉日却偏偏有凶事降临，而且经常遇上灾祸。此外，司马迁和郝振都是中古时代著名的饱学之士，也都各有著述流传于世。但是对于大小的配合，阴阳的叙述，如依《四序经》比较，似乎仍有不足。臣过去在东宫供职时，曾上表奏明此事，景穆皇帝采纳了臣的主张并颁布诏令，命臣收集著录，汇集其精要内容。臣恭敬地奉命行事，郑重地审阅过去所见的《四序经》文，抄录汇聚其要点大略，将当前需要的有关吉凶行止的内容，合成一卷。上至天子，下及百姓，而且贵贱等级、尊卑差别，凡与吉凶祸福有关的事情，一应俱全，都做了详细收录。但还没来得及呈献给圣上，先帝就安祥地归天了。臣当时的生活与工作十分窘困，几乎遭到不幸。编纂工作自停废以来，已有八年，臣一直希望能让圣上知道，此事依靠臣一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彻底完成了。加上臣年纪已大，牙齿也脱落了，有生之年已经不多，臣常常担心，巨一旦死去，尸骨可被填入沟壑，但先帝的遗志却不能得到宣扬和传播。臣虽日日悲伤忧愤，但自然规律却无法抗拒。现在臣以过去收集著录之文上奏圣上，谨供披览。请求圣上将此文交给宫廷中精通儒学的博学之士，评定其是非。此事如果可以实施，祈请即刻颁行使用。”于是，殷绍的《四序堪舆》在世上广为流传。

(冯 时 译)

【原文】

殷绍，长乐人也。少聪敏，好阴阳术数，游学诸方，达《九章》、《七曜》。世祖时为算生博士，给事东宫西曹，以艺术为恭宗所知。太安四年夏，上《四序堪舆》，表曰：“臣以姚氏之世，行学伊川，时遇游遁大儒成公兴，从求《九章》要术。兴字广明，自云胶东人也。山居隐迹，希在人间。兴时将臣南到阳翟九崖岩沙门释昙影间。兴即北还，臣独留住，依止影所，求请《九章》。影复将臣向长广东山见道人法穆。法穆时共影为臣开述《九章》数家杂要，披释章次意况大旨。又演隐审五藏六府心髓血脉，商功大算端部，变化玄象，土圭、《周髀》。练精锐思，蕴习四年，从穆所闻，粗皆仿佛。穆等仁矜，特垂忧闵，复以先师和公所注黄帝《四序经》文三十六卷，合有三百二十四章，专说天地阴阳之本。其第一《孟序》，九卷八十一章，说阴阳配合之原；第二《仲序》，九卷八十一章，解四时气王休杀吉凶；第三《叔序》，九卷八十一章，明日月辰宿交会相生为表里；第四《季序》，九卷八十一章，具释六甲刑祸福德：以此等文传授于臣。山神禁严，不得亵出，寻究经年，粗举纲要。山居险难，无以自供，不堪窘迫，心生懈怠。以甲寅之年，日维鹑火，月吕林钟，景气郁盛，感物怀归，奉辞影等。自尔至今。四十五载。历观时俗堪舆八会，径世已久，传写谬误，吉凶禁忌，不能备悉。或考良日而值恶会，举吉用凶，多逢殃咎。又史迁、郝振，中古大儒，亦各撰注，流行于世。配合大小，序述阴阳，依如本经，犹有所阙。臣前在东宫，以状奏闻，奉被景穆皇帝圣诏，敕臣撰录，集其要最。仰奉明旨，谨审先所见《四序

经》文，抄撮要略，当世所须吉凶举动，集成一卷。上至天子，下及庶人，又贵贱阶级、尊卑差别、吉凶所用，罔不毕备。未及内呈，先帝晏驾。臣时狼狈，几至不测。停废以来，径由八载，思欲上闻，莫能自彻。加年夕齿頽，余龄旦暮，每惧殒殒，填仆沟壑，先帝遗志，不得宣行。夙夜悲愤，理难违匿，依先撰录奏，谨以上闻。请付中秘通儒达士，定其得失。事若可施，乞即班用。”其《四序堪輿》遂大行于世。

周 澹 传

——《魏书》卷九一

【说明】周澹（公元？—419年），南北朝北魏医家，京兆鄠（今陕西户县）人。多才艺，精医术、卜筮、占验等多种技艺，以医术尤为擅长。曾任北魏太医令。其时太宗皇帝得风眩病，周澹为之治愈，被封为成德侯。后京城闹饥荒，朝廷上下商议将首都自洛阳迁至邺城。周澹表示反对，皇帝因周澹与他观点一致而倍加赏赐。其子名驴驹，他承袭父亲爵位，也传其医学。

周澹，京兆郡鄠县人。他善于医药、卜筮、占验等技艺。尤其擅长医药。官任太医令。太宗皇帝曾经患风眩病异常痛苦，周澹为他治疗才得以痊愈。从此周氏深受器重，官位升至特进，并赐以成德侯爵位。神瑞二年（公元415年），京城闹饥荒，朝臣商议将迁都至邺城。周澹与博士祭酒崔浩（字伯渊）向上建议，论述不可迁都之见解。太宗皇帝大为赞同。说：“只有这两人与我想法一致。”于是下诏书赏赐周澹和崔浩各一名妾及御衣一套、绢五十匹、绵五十斤。周澹卒于泰常四年（公元419年）。谥号为恭。

当时河南有位名叫阴贞的人，家中世代都是医生，他和周澹同时被封爵位。清河有位李潭亦以善于针刺而闻名。周澹的儿子名驴驹，他继承周澹的爵位，并传授其父的技艺。延兴（公元471—475年）年间，官位至散令。

（万 芳 译）

【原文】

周澹，京兆鄠人也。为人多方术，尤善医药，为太医令。太宗尝苦风头眩，澹治得愈。由此见宠，位至特进，赐爵成德侯。神瑞二年，京师饥，朝议将迁都于邺。澹与博士祭酒崔浩进计，论不可之意，太宗大然之，曰：“唯此二人，与朕意同也。”诏赐澹、浩妾各一人，御衣一袭，绢五十匹、绵五十斤。泰常四年卒，谥曰恭。

时有河南人阴贞，家世为医，与澹并受封爵。清河李潭亦以善针见知。子驴驹，袭，传术。延兴中，位至散令。

李 脩 传

——《魏书》卷九一

【说明】李脩，字思祖，生卒年不详。今河北省馆陶县人，出生医学家。北魏太和年间（公元477—499年）为孝文帝和文明太后侍奉针药，治病多获良效。其时他召集一百多位有识之士在东宫编撰《药方》一百余卷。现已佚失。李脩曾预言咸阳公高允脉象欲竭，气息微弱，可能寿命不长。果然高允不久辞世。李脩于北魏朝曾任太医令、中散令、给事中。封下蔡子爵。卒后赠威远将军、青州刺史。

李脩，字思祖，系阳平郡馆陶人。父亲名亮，年轻时学习医术，但学问不精深。北魏太武帝时他投奔刘义隆到达彭城。在那里师从沙门僧坦研习医方，此后医术颇有长进。针灸处方，均获得较好疗效。在徐州兖州一带，他常常救治病人，对他人疾苦十分体恤。各地病人甚至跋涉千里，慕名前来求医。李亮以大厅供病人住宿，准备车乘于厅下，如有病人死去，便车载棺柩送葬，并亲自去吊唁。他就是如此仁慈善厚。后来他升任府参军、督护彭城郡。他与当地士族官僚相互交往亲密。别人赠予他的车马金帛不可计量。李脩的哥

哥名元孙，跟随毕众敬开赴平城。承袭父业，然医术不如其父。他因立功被赐义平子爵位，授官奉朝请。

李脩与兄略同，去魏都代郡平城较晚。历任中散令。因有功赐下蔡子爵位。后升至给事中。太和年间，他常在宫内，高祖、文明太后时常有疾病，李脩便侍奉针药，治疗多取得良效。因此赏赐不断，车辆、衣物、房屋都十分华丽。他召集一百多位有学识与善于书法的人士于东宫编撰各类《药方》一百余卷，皆流传于世。此前，咸阳公高允虽年近百岁，然气力尚康健。高祖、文明太后时常命李脩去探望他，进行诊视。有一天，李脩向皇帝上奏：高允脉象欲竭，气息微弱，性命不久。果然不久高允辞世。后来孝文帝迁都至洛阳（公元494年），李脩任前军将军，兼任太医令。数年后，李脩去世。赠官威远将军、青州刺史。

李脩的儿子名天授，继承父亲爵位。任汶阳县令。医术不如其父。

（万芳译）

【原文】

李脩，字思祖，本阳平馆陶人。父亮，少学医术，未能精究。世祖时，奔刘义隆于彭城，又就沙门僧坦研习众方，略尽其术，针灸授药，莫不有效，徐充之间，多所救恤，四方疾苦，不远千里，竟往从之。亮大为厅事，以舍病人，停车舆于下，时有死者，则就而棺殓，亲往吊视。其仁厚若此。累迁府参军，督护本郡，士门宿官，咸相交昵，车马金帛，酬赀无费。脩兄元孙随毕众敬赴平城，亦遵父业而不及。以功赐爵义平子，拜奉朝请。

脩略与兄同。晚入代京，历位中散令，以功赐爵下蔡子、

迁给事中。太和中，常在禁内。高祖、文明太后时有不豫，脩侍针药，治多有效。赏赐累加，车服第宅，号为鲜丽。集诸学士及工书者百余人，在东宫撰诸《药方》百余卷，皆行于世。先是咸阳公高允虽年且百岁，而气力尚康，高祖、文明太后时令脩诊视之。一旦奏言，允脉竭气微，大命无远。未几果亡。迁洛，为前军将军，领大医令。后数年，卒，赠威远将军、青州刺史。

子天授，袭。汶阳令。医术不逮父。

王 显 传

——《魏书》卷九一

【说明】王显（公元？—515年），字世荣。南北朝北魏医学家。阳平乐平（今山东莘县）人。父安道知医。王显自学通医术，颇有聪明才智。曾任本州从事、廷尉少卿、相州刺史。因诊断文昭皇后怀孕，治愈世宗皇帝的虚弱症而受到重用。任侍御师，于宫内侍奉皇帝，料理宫中用药。以营疗之功，封卫南伯。并奉诏编撰《药方》三十五卷，颁布天下。世宗皇帝驾崩后，肃宗继位，他兼任执法官职。由于仗势逞威，为大家憎恶，后来朝廷以他侍奉皇帝治病无效为托辞，将他拘捕下狱，尔后因受伤吐血而死。曾撰《王世荣单方》一卷，已佚。

王显，字世荣。阳平郡乐平县人。自称原东海郯人，王朗的后代。祖父于延和年间（公元432—434年）投奔南朝，在山东曲阜居住，后迁居彭城。伯父名安上，南朝宋文帝时他兼任馆陶县令。北魏世祖讨伐南朝，王安上为保性命放弃县令职守，与父母一起迁移到平城。以后在朝廷选拔官员时援例铨叙为阳都子爵、授任广宁太守。王显父亲名安道，青

年时与李亮同拜一位老师，学习医学，对医术有所研究，然不如李亮高明。王安上返回家乡乐平，常与有地位人士交往。

王显曾任相州从事。虽自学而通医术，然聪明有决断才能。当初文昭皇太后怀世宗皇帝时，做梦被太阳追逐，并化为龙缠绕太后。太后醒来紧张害怕，于是变成心病。文明太后下令召徐謩与王显等人为文昭皇太后诊脉。徐謩认为有微风邪侵入脏腑，宜吃汤药并加针刺治疗。王显说：“从三部脉候来看，不是有心病，而是怀孕生男孩之征象。”后果然如王显说的那样。很长一段时间过后，王显补任为侍御师、尚书仪曹郎，人们称道他十分胜任这些职务。世宗自幼即有虚弱病，很久没有治好。王显为他治疗，教以摄养之法而显出疗效，从此渐渐被重视。

孝文帝迁都洛阳初期，王显为领军于烈私下制定计划，很有一些不被人知的功绩。于是升任游击将军，且授予廷尉少卿，但他仍然为侍御师，料理宫中用药，往来于宫廷内外。以后王显向皇帝请求去相州，世宗曾予以诺言，然多年未予授任，由此关于此事四处均有传闻。王显常对别人说，圣上已经决定，必定是刺史。最终他被任命平北将军、相州刺史。不久皇帝就下诏书让他返回京城，重新掌管宫中药。以后又派遣回相州。孝文帝第四子元愉谋反，王显对他讨伐不利。后入京任太府卿、御史中尉。

王显前后历任数职，均受到称赞。他判决案件，追究奸邪；掌管财物，出入慎重，精打细算。为国分忧，就象对待自己家里的事情一样。他任职御史台，多次弹劾臣官错误，群臣因此十分敬重。后因中尉下属官员不都称职，朝中有人婉

言提出要求更换。皇帝于是下诏书委托他改选，以便任人唯贤，但王显所举荐之人选中有的系私托人情而来，不十分合适。众人对此议论纷纷，王显的声望由此而受到损害。后来世宗皇帝下诏书命王显撰著《药方》三十五卷。颁布于民间，用于治疗各种疾病。待太子所居东宫建立，授任王显为太子詹事，掌管东宫事务，委任甚为厚重。世宗皇帝每次亲临东宫，王显常常迎送侍候左右。此期间王显仍侍奉医药，进出宫中，不断得到赏赐与升迁机遇。皇上为他建立楼馆，他因受皇帝的宠遇而名振当时。延昌二年（公元 513 年）秋，王显以治病有功被封卫南伯爵。

延昌四年（公元 515 年），世宗于一日夜间驾崩，肃宗继位。王显参与侍奉先帝诏书，随从众人一起于先帝灵前哀哭，并有些担心忧虑。因为他承蒙任命，兼任法官，仗势逞威，被大家所憎恶。朝廷以他侍奉皇帝治病无效为托辞，将他拘捕于宫中，皇帝并下诏书削去他的爵位。临执行时王显呼喊冤枉，直阁将军用刀环撞击他腋下，伤中吐血，至右卫府一夜即死亡。王显最初没有做官，是太学学生，那时有一僧人为王显看相，预见他日后将富贵，告诫他不要做官，做官必然失败。因此世宗皇帝时有人欲让王显进而兼管吏部，他每每恳切辞避。到世宗皇帝驾崩，肃宗皇帝夜里继位，接受先帝诏书，在举行仪式时需要太尉与吏部官员，仓卒之间官员尚未备齐，故以王显兼任吏部处理事务。

（万 芳 译）

【原文】

王显，字世荣，阳平乐平人，自言本东海郯人，王朗之

后也。祖父延和中南奔，居于鲁郊，又居彭城。伯父安上，刘义隆时板行馆陶县。世祖南讨，安上弃县归命，与父母俱徙平城，例叙阳都子，除广宁太守。显父安道，少与李亮同师，俱学医药，粗究其术，而不及亮也。安上还家乐平，颇参士流。

显少历本州从事，虽以医术自通，而明敏有决断才用。初文昭皇太后之怀世宗也，梦为日所逐，化而为龙而绕后，后寤而惊悸，遂成心疾。文明太后敕召徐謩及显等为后诊脉。謩云是微风入脏，宜进汤加针。显云：“案三部脉非有心疾，将是怀孕生男之象。”果如显言。久之，召补侍御师，尚书仪曹郎，号称干事。世宗自幼有微疾，久未差愈，显摄疗有效，因是稍蒙眇识。

又罢六辅之初，显为领军于烈间通规策，颇有密功。累迁游击将军，拜廷尉少卿，仍在侍御。营进御药，出入禁内。乞临本州，世宗曾许之，积年未授，因是声问传于远近。显每语人，言时旨已决，必为刺史。遂除平北将军，相州刺史。寻诏驰驿还京，复掌药，又遣还州。元愉作逆，显讨之不利。入除太府卿、御史中尉。

显前后历职，所在著称。纠折庶狱，究其奸回，出内惜慎，忧国如家。及领宪台，多所弹劾，百僚肃然。只以中尉属官不悉称职，讽求更换。诏委改选，务尽才能，而显所举或有请属，未皆得人，于是众口喧哗，声望致损。所世宗诏显撰《药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疗诸疾。东宫既建，以为太子詹事，委任甚厚。世宗每幸东宫，显常迎侍。出入禁中，仍奉医药。赏赐累加，为立馆宇，宠振当时。延昌二年

秋，以营疗之功，封卫南伯。

四年正月，世宗夜崩，肃宗践祚。显参奉玺策，随从临哭，微为忧惧。显既蒙任遇，兼为法官，恃势使威，为时所疾。朝宰托以侍疗无效，执之禁中，诏削爵位。临执呼冤，直阁以刀环撞其腋下，伤中吐血，至右卫府一宿死。始显布衣为诸生，有沙门相显后当富贵，诫其勿为吏官，吏官必败。由是世宗时或欲令其遂摄吏部，每殷勤避之。及世宗崩，肃宗夜即位，受玺策，于仪须兼太尉及吏部，仓卒百官不具，以显兼吏部行事矣。

崔 彧 传

——《魏书》卷九一

【说明】崔彧，字文若，生卒年不详。清河东武城（今属山东）人。南北朝时期北魏医学家。崔彧青年时期于青州师从一位出家和尚学习医学，精研《素问》、《灵枢》、《甲乙经》等中医古典医籍，于是掌握了医疗技术，尤其善于用针刺法治病。中山王英的儿子患病，王显等诸多名医治疗都未奏效，崔彧施针法，针起病除。崔彧为人性善宽厚，除热心治病外尚招收许多门徒，传授医学知识，并教导他们治病人当尽心而为。弟子赵约、郝文法都是当时颇有名望的医生。崔彧一生历任冀州别驾、宁远将军等职。其子景哲，亦以医术著称。

崔彧，字文若，清河东武城人。父名勋之，字宁国。官为大司马外兵郎。死后追赠通直郎。崔彧与他的哥哥相如一起自南朝入魏。相如因才学出众而闻名，但很早就去世。崔彧青年时曾去过青州，在那里遇见出家和尚，教他学习《素问》、《九卷》、《甲乙经》等医籍，于是擅长医术。中山王英的儿子略曾经患病，王显等名医也没能治好他的病，崔彧采

用针刺疗法，起针后病即痊愈。他初任冀州别驾，后升至宁远将军。崔彧性情仁善宽容。遇见别人被疾病困扰，即热心给予治疗。崔彧还广收门生，传教医术，告诫他们要尽力救治病人。他的弟子如清河赵约、渤海郝文法等都有医名。

崔彧的儿子名景哲，性格豪爽、直率，也以擅长医术著称。官为太中大夫、司徒长史。（万 芳 译）

【原文】

崔彧，字文若，清河东武城人。父勋之，字宁国。位大司马外兵郎，赠通直郎。彧与兄相如俱自南入国。相如以才学知名，早卒。彧少尝诣青州，逢隐逸沙门，教以《素问》、《九卷》及《甲乙》，遂善医术。中山王英子略曾病，王显等不能疗，彧针之，抽针即愈。后位冀州别驾，累迁宁远将军。性仁恕，见疾苦，好与治之。广教门生，令多救疗。其弟子清河赵约、渤海郝文法之徒咸亦有名。

彧子景哲，豪率，亦以医术知名。为太中大夫、司徒长史。

徐之才传

——《北齐书》卷三三

【说明】徐之才（公元 505—572 年），字士藏，祖籍东莞姑幕（今山东诸城），寄籍丹阳（今江苏南京）。南北朝北齐医学家。徐之才自幼聪明好学，五岁背诵《孝经》，八岁即能领会其中意义。十三岁召为太学生，已粗通《礼经》、《仪礼》、《曲礼》、《易经》等。初于南齐做官，后被俘入魏，魏孝明帝欣赏他既通晓医学又机敏善辨而征召任用。武定间（公元 543—550 年）授大将军、金紫光禄大夫等职。皇建二年（公元 561 年），治愈武明皇太后身体不适。天统四年（公元 568 年），徐之才于北齐渐升至尚书仆射，不久又任兖州刺史。武平二年（公元 571 年）封西阳郡王，故又称徐王。由于徐氏医技过人，并治愈武成帝因酒色过度致精神恍惚症，以后皇帝有病即召见他。徐之才所用针药亦每每效验如神。因此徐氏常常在皇帝身边侍奉医药。徐之才为人诙谐滑稽，好戏笑逗乐，言辞风趣，为此亦深受皇帝宠爱。

徐之才撰有《徐王八代家传效验方》十卷、《徐氏家秘方》两卷、《徐王方》五卷，均系总结徐氏家族治病经验，另撰《药对》两卷、《小儿方》三卷，上述诸书均佚。《药对》佚

文见于《证类本草》。据《嘉佑补注神农本草》“所引书传”称，其书“以众药名品，君臣佐使，性毒相反，及所主疾病，分类而记之，凡两卷，旧本多引以为据，其言治病用药最详。”

徐之才博学多艺，不仅善医药，于经史之学造诣颇深，尚通晓天文、图讖。

徐之才，丹阳人。父亲名雄，于南齐供事，官位兰陵太守，于江南一带以医术著名。之才幼时英俊奋发。五岁能背诵《孝经》，八岁即略通其意。他曾与从兄康去梁太子詹事汝南人周舍家聆听讲习《老子》。周舍为他们备有餐宴，遂逗之才说：“徐郎做学问不用心思考，只想着吃饭。”徐之才答道：“我听说《老子》里有一句话谈到‘圣人虚其心而实其腹’。”周舍听后十分感叹，很欣赏他的才学。之才十三岁召为太学生。那时他已粗通《礼》、《易》。彭城刘孝绰、河东裴子野、吴郡张嵊等人常常与他一起讨论《周易》及《丧服》仪式等，徐之才每每应答如流，大家均感叹：“他真是神童啊！”孝绰又说：“徐郎面生燕颌，长似班超，将来会象他那样前程远大。”陈郡袁昂任丹阳太守，他召任徐之才为主簿，无论人事及其他事务都有人请教他。一次，郡公署失火，徐之才起而观望，夜里未穿外衣，身披红服帕离开卧房，火光中被袁昂看见。功曹由此禀告请求免去他的职务，袁昂器重他负有才华，特此原谅了他。

豫章王综出镇江都，又授徐之才为豫章王国左常侍，以后调任豫章王综下属之镇北主簿。后来综叛降入魏，三军将士离走散失，徐之才退至吕梁，桥断无路，最终被魏统军石

茂孙所截止。综入魏朝一月后，授官司空。魏朝皇帝让他收留原下属官僚，于是访问到徐之才在彭泗。他向魏孝明帝禀奏：“徐之才尤为擅长医术，且机智能辨。”孝明帝遂下诏书征召徐之才。孝昌二年（公元526年），徐之才至洛阳，皇帝赐他居住招待宾客的高级客舍，待他十分优厚。他的从祖父徐謩的儿子践劝他回归宅舍。徐之才治病用药多有显效，又涉猎经史之学，言语敏捷善辨，朝廷贤士竞相引用其言论，使他名声越传越远。北魏武帝时，徐之才被封为昌安县侯。天平年间，北齐神武帝高欢征赴晋阳，徐之才于内馆供事，待遇逐渐丰厚。武定四年（公元546年），徐之才从散骑常侍调任秘书监。文宣帝高洋任丞相时，朝廷上下调整官员，杨愔以他曾是南齐人不可胜任主管秘书职务，转而授他为金紫光禄大夫，并派魏收代替他。徐之才为此快快不平。

徐之才还懂得一些天文、图讖等知识。他与馆友宋景业一起参校吉凶，预知庚午年（公元550年）政权必有革易。于是高德政禀告，文宣帝（高洋）听后大为高兴。当时从娄太后至朝廷功勋贵臣俱认为关西宇文氏是一强有力的对手，恐怕他有以皇上名义发号施令的权势，不可先行帝位之事。只有徐之才说：“一千人追赶兔子，唯有一人得到，余者皆得放弃。若要干大事业，怎容得跟在别人后面学。”又引经据典，备好条目证实，文宣帝高洋听从之才建议，于公元550年废东魏，自称皇帝。此后他与徐之才交往更为亲密。徐之才不仅医术精通，且首先倡导禅让制，又诙谐滑稽，能说会道，因此与皇帝很亲近。不久授官侍中。封池阳县伯爵。后徐之才觉察文宣帝政令日渐严厉，于是请求离开京城。皇上任他为

赵州刺史，但他最终未到任视事，仍系凭籍戏笑取宠之下臣。

皇建二年（公元 561 年），徐之才受任西兖州刺史，在他还未上任之前，武明皇太后身体不适，徐之才为她治疗，应手而愈。为此孝昭帝赏赐他彩帛千段，锦四百匹。徐之才医术高明，虽然有时授予外职，不久，即征召返京。这样他更见多识广，于方术尤为精通。太宁二年（公元 562 年）春，武明太后又患病，徐之才之弟徐之范当时为尚药典御，皇帝令他为太后诊病，那时因有俗忌，内史省令大家称太后为石婆，企图以改名来压制病邪。徐之范出来告诉徐之才：“童谣里说‘周里跂求伽，豹祠嫁石婆，斩冢作媒人，唯得一量紫纁靴。’如今太后忽然改名，我觉得很奇怪。”徐之才说：“跂求伽，少数民族方言‘离开’的意思。豹祠嫁石婆，有何好事？斩冢作媒人，即是说必须合葬自斩冢。唯得紫纁靴，是指四月得到，为何如此说呢？紫字是“此”下“系”，纁是熟之意，应于四月。”徐之范问“靴”为何意，徐之才回答：“靴是革旁化，这哪是长久之物呢？”到了四月一日，武明太后果然故去。

一病人患脚跟肿痛，诸医生均不知此病。徐之才说：“此为蛤精所致，因乘船入海，将脚垂入水中所引起。”病人回答：“确实如此。”徐之才切开患处取出二个蛤子，如榆荚那么大。又有一人拿骨头作刀靶，那骨头色彩斑斓，徐之才看后说：“这是人体骨瘤所造成的。”然后问那人从何处得来，那人答于古棺见髑髅额骨数寸长，即试削之，见上面有纹理，就拿来使用。徐之才就是如此明悟多通。

天统四年（公元 568 年），徐之才渐升至尚书左仆射。不久又任兖州刺史，并赐给铙吹曲一部。徐之才医术最高，多

次被皇帝征召。武成帝酒色过度，精神恍惚，曾发作疾病，他自称于空中看见一五色物体，稍近那物即变为一美女，离地数丈远，亭亭而立。不一会儿又变成观世音。徐之才说：“此色欲过多，身体大虚所致。”于是处方开药。服一剂后，便觉那物体渐渐远了。又服一剂，还原变成五色物，服数剂汤药，疾病竟然痊愈。此后皇帝每患病即派人召他，徐之才施用针药，多应时见效，所以他常常在皇帝身边奉侍医药。入秋以后，武成帝疾病小有稳定，不怎么发作。和士开想依次升迁。因徐之才本籍兖州，即向圣上奏请徐之才任兖州刺史，以胡长仁为左仆射，而和士开本人为右仆射。至十月，皇帝旧病复发，就对士开说：“我悔恨让之才外任，使我倍受疾病痛苦。”十月八日，皇帝令使者骑马去召徐之才，十日皇帝驾崩，徐之才十一日方赶到。既然未来得及赶上为皇帝治病，于是他又返回兖州。徐之才在任期间没有侵害他人施展暴力，但也不熟谙法规事理，于工作颇为疏忽漫不经心，用人取舍较为自由。

天统五年冬，后主征召徐之才，不久左仆射职位空缺，徐之才说：“我能重现大禹治水之功绩。”武平元年（公元570年），徐之才重任尚书左仆射。徐之才对和士开以及陆令萱母子极尽奉承，他们二家有人患病，徐氏不仅给予治疗，而且百般照护，由此徐之才升任尚书令，封为西阳郡王。后来祖珽主管政务，任徐之才为侍中、太子太师。徐之才对祖珽不重用他颇为愤恨，说：“子野淘汰我。”祖珽有眼疾，所以他将祖珽比作春秋时期晋国瞎眼乐师旷（字子野）。

徐之才聪明记忆力强，机敏过人，尤其爱好戏笑与用隐

语逗乐，无论公开场合与私下聚会常常相互嘲弄取乐。郑道育常戏称徐之才为师公，徐之才说：“既然当你的老师，又当你的公公，按君、亲、师三种礼仪，我占其两种。”又嘲笑王昕的姓说：“王字加言则为訢，与犬相并就变狂，加上颈足成为马，添上角尾就是羊。”卢元明也因此以徐之才的姓名为戏，说：“徐是末入人，名被字所误，‘之’当为‘乏’字。”徐之才马上对答：“您的姓在亡为虐，在丘为虚，生男则为虍，养马则为驴。”一次徐氏与朝廷官员出去游玩，远望群犬追逐，大家都试着想观看清楚。徐之才应声说道：“这是宋国良犬宋鹊；这是韩国良犬韩卢；这是赶李斯东逃，这是盘瓠狗背负皇帝女儿去南山石室。”一次李谐在大宴席上称徐之才父亲的名雄为熊，戏弄他说：“你爱吃熊背上的白脂吗？”徐之才回答：“你的话平平没有什么意思。”又反问他：“您此言有道理否？”李谐不好回答，于是外出避开他。路上正巧遇见他外甥高德正。德正语：“舅舅你为何看起来不高兴呢？”李谐告诉他先前发生之事。德正径直去坐席，连连要熊白。徐之才问座席上的人：“他父祖姓名是什么？”众人均言不知。徐之才说：“象这样生不被人知，死后不被人忌讳的不足去问他。”唐邕、白建二人于并州一带名声显贵，当时人们均言：“并州赫赫唐与白。”徐之才很看不起他们。大年初一，他对唐邕底下的令史祝贺新年，说：“我看你们与唐、白二人地位相等。”后来又因侍僮喜好嚼笔，徐之才即拿笔管以元文遥之口吻说：“借你的牙齿使使。”徐之才就是这样一点也不谦逊退让。

徐之才侍奉数位皇帝皆因戏狎而得宠。武成帝长智牙时询问医生，尚药典御邓宣文以实情相告，武成帝听后动怒而

鞭撻他。后来又问徐之才，徐氏跪下拜贺：“此为智牙，长智牙的人聪明长寿。”成帝听后十分满意而且很欣赏他。徐之才任仆射时对别人说：“我于江南见徐勉作仆射，朝廷官员无不对他巧言谄媚，现在我也是徐仆射，可没有一个人对我谄媚，我还有何理由活下去。”徐之才的妻子系北魏广阳王之妹，徐之才是从文襄帝高澄处求得她为妻的。和士开知道后，就去调戏他妻子，正巧徐之才遇见，他竟然退出来避开他们，说：“别妨碍少年戏笑。”徐之才就是如此宽恕纵容。徐之才八十岁时死去，赠官司徒公、录尚书事，谥号文明。

徐之才长子名林，字少卿。官至太尉司马。次子同卿，官至太子庶子。之才因他没有学识，常常感叹说：“他恐怕最终会象《广陵散》那样，不被后人知晓。”

弟徐之范，也以医术知名，官至太常卿，被特别准许继承徐之才西阳王的爵位。后来入周，授官仪同大将军。开皇中卒。

(万 芳 译)

【原文】

徐之才，丹阳人也。父雄，事南齐，位兰陵太守，以医术为江左所称。之才幼而俊发，五岁诵《孝经》，八岁略通义旨。曾与从兄康造梁太子詹事汝南周舍宅听《老子》。舍为设食，乃戏之曰：“徐郎不用心思义，而但事食乎？”之才答曰：“盖闻圣人虚其心而实其腹。”舍嗟赏之。年十三，召为太学生，精通《礼》、《易》。彭城刘孝绰、河东裴子野、吴郡张嶷等每共论《周易》及《丧服》仪，酬应如响。咸共叹曰：“此神童也。”孝绰又云：“徐郎燕颌，有班定远之相。”陈郡袁昂

领丹阳尹，辟为主簿，人务事宜，皆被顾访。郡廨遭火，之才起望，夜中不著衣，披红服帕出房，映光为昂所见。功曹白请免职，昂重其才术，仍特原之。

豫章王综出镇江都，复除豫章王国左常侍，又转综镇北主簿。及综入魏，三军散走，之才退至吕梁，桥断路绝，遂为魏统军石茂孙所止。综入魏旬月，位至司空。魏听综收僚属，乃访之才在彭泗，启魏帝云：“之才大善医术，兼有机辩。”诏征之才。孝昌二年，至洛，敕居南馆，礼遇甚优。从祖骞子践启求之才还宅。之才药石多效，又窥涉经史，发言辩捷，朝贤竞相要引，为之延誉。武帝时，封昌安县侯。天平中，齐神武征赴晋阳，常在内馆，礼遇稍厚。武定四年，自散骑常侍转秘书监。文宣作相，普加黜陟。杨愔以其南土之人，不堪典秘书，转授金紫光禄大夫，以魏收代领之。之才甚快快不平。

之才少解天文，兼图谶之学，共馆客宋景业参校吉凶，知午年必有革易，因高德政启之。文宣闻而大悦。时自娄太后乃勋贵臣，咸云关西既是劲敌，恐其有挟天子令诸侯之辞，不可先行禅代事。之才独云：“千人逐兔，一人得之，诸人咸息。须定大业，何容翻欲学人。”又授引证据，备有条目，帝从之。登祚后，弥见亲密。之才非唯医术自进，亦为首唱禅代，又戏谑滑稽，言无不至，于是大被狎昵。寻除侍中，封池阳县伯。见文宣政令转严，求出，除赵州刺史，竟不获述职，犹为弄臣。

皇建二年，除西兖州刺史。未之官，武明皇太后不豫，之才疗之，应手便愈，孝昭赐采帛千段，锦四百匹。之才既善

医术，虽有外授，顷即征还。既博识多闻，由是于方术尤妙。太宁二年春，武明太后又病。之才弟之范为尚药典御，敕令诊候。内史皆令呼太后为石婆，盖有俗忌，故改名以厌制之。之范出告之才曰：“童谣云：‘周里跂求伽，豹祠嫁石婆，斩冢作媒人，唯得一量紫纁靴。’今太后忽改名，私所致怪。”之才曰：“跂求伽，胡言去已。豹祠嫁石婆，岂有好事？斩冢作媒人，但令合葬自斩冢。唯得紫纁靴者，得至四月，何者？紫之为字‘此’下‘系’，‘纁’者熟，当在四月之中。”之范问靴是何义。之才曰：“靴者革旁化，宁是久物？”至四月一日，后果崩。

有人患脚跟肿痛，诸医莫能识。之才曰：“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实曾如此。”之才为剖得蛤子二，大如榆荚。又有以骨为刀子靶者，五色斑斓，之才曰：“此人瘤也。”问得处，云于古冢见髑髅额骨长数寸，试削视，有文理，故用之。其明悟多通如此。

天统四年，累迁尚书左仆射，俄除兖州刺史，特给铙吹一部。之才医术最高，偏被命召。武成酒色过度，恍惚不恒，曾病发，自云初见空中有五色物，稍近，变成一美妇人，去地数丈，亭亭而立。食顷，变为观世音。之才云：“此色欲多，大虚所致。”即处汤方，服一剂，便觉稍远，又服，还变成五色物，数剂汤，疾竟愈。帝每发动，暂遣骑追之，针药所加，应时必效，故频有端执之举。入秋，武成小定，更不发动。和士开欲依次转进，以之才附籍兖州，即是本属，遂奏附除刺史，以胡长仁为左仆射，士开为右仆射。及十月，帝又病动，语士开云：“恨用之才外任，使我辛苦。”其月八日，敕驿追

之才。帝以十日崩，之才十一日方到，既无所及，复还赴州。在职无所侵暴，但不甚闲法理，颇亦疏慢，用舍自由。

五年冬，后主征之才。寻左仆射缺，之才曰：“自可复禹之绩。”武平元年，重除尚书左仆射。之才于和士开、陆令萱母子曲尽卑狎，二家苦疾，救护百端。由是迁尚书令，封西阳郡王。祖珽执政，除之才侍中、太子太师。之才恨曰：“子野沙汰我。”珽目疾，故以师旷比之。

之才聪辩强识，有兼人之敏，尤好剧谈体语，公私言聚，多相嘲戏。郑道育常戏之才为师公。之才曰：“既为汝师，又为汝公，在三之义，顿居其两。”又嘲王昕姓云：“有言则訐，近犬便狂，加颈足而为马，施角尾而为羊。”卢元明因戏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字之误，‘之’当为‘乏’也。”即答云：“卿姓在亡为虐，在丘为虚，生男则为虜，养马则为驴。”又尝与朝士出游，遥望群犬竞走，诸人试令目之。之才即应声云：“为是宋鹊、为是韩卢，为逐李斯东走，为负帝女南徂。”李谐于广坐，因称其父名，曰：“卿嗜熊白生否？”之才曰：“平平耳。”又曰：“卿此言于理平否？”谐遽出避之，道逢其甥高德正。德正曰：“舅颜色何不悦。”谐告之故。德正径造坐席，连索熊白。之才谓坐者曰：“个人讳底？”众莫知。之才曰：“生不为人所知，死不为人所讳，此何是足问？”唐邕、白建方贵，时人言云：“并州赫赫唐与白。”之才蔑之。元日，对邕为诸令史祝曰：“见卿等位当作唐、白。”又以小史好嚼笔，故尝执管就元文遥口曰：“借君齿。”其不逊如此。

历事诸帝，以戏狎得宠。武成生龋牙，问诸医。尚药典御邓宣文以实对，武成怒而撻之。后以问之才，拜贺曰：“此

是智牙，生智牙者聪明长寿。”武成悦而赏之。为仆射时，语人曰：“我在江东，见徐勉作仆射，朝士莫不佞之。今我亦是徐仆射，无一人佞我，何由可活！”之才妻魏广阳王妹，之才从文襄求得为妻。和士开知之，乃淫其妻。之才遇见而避之，退曰：“妨少年戏笑。”其宽纵如此。年八十，卒。赠司徒公，录尚书事，谥曰文明。

长子林，字少卿，太尉司马。次子同卿，太子庶子。之才以其无学术，每叹云：“终恐同《广陵散》矣。”

弟之范，亦医术见知，位太常卿，特听袭之才爵西阳王。入周，授仪同大将军。开皇中卒。

宗 懔 传

——《周书》卷四二

【说明】宗懔，字元懔，南阳涅阳（今河南省邓县东北）人，世居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市）。生于南朝齐永泰至中兴年间（公元498—502年），卒于北周保定年间（公元561—565年）。宗懔少年好学，乡里人都称他为“童子学士”。后官至荆州别驾。梁元帝萧绎于江陵即帝位后，任他为尚书郎，累升至吏部尚书。梁承圣三年（公元554年），江陵被西魏军攻陷，宗懔也被掳北去。他著有《荆楚岁时记》一卷，至隋为杜公瞻所注释，记述了荆楚之地的乡土风俗。原书久佚，今有明人辑本，仅存数十节。近人陈运溶又别有辑本，刻入《麓山精舍丛书》。他有编定成集的二十卷著作，流传于世。

宗懔，字元懔，本为南阳涅阳人。宗懔的八世祖宗承，因在西晋永嘉之乱时讨伐陈敏有功，被赐封为柴桑县侯，并任命为宜都郡守，但是不久即在任职期间去世了。从此以后，他的子孙后代也就在江陵定居了下来。宗懔的父亲宗高之，在南朝梁时作过山阴令。

宗懔少年时代就很聪明勤勉，喜爱读书，日夜苦读，从

不知疲倦。他开口讲话就引经据典，乡里人都称他为童子学士。梁普通六年，宗懔被荐举应试秀才，因为赶不上皇帝和太子在元旦朝见群臣的仪式，所以考试全部被取消了。梁元帝萧绎在镇守荆州的时候，曾对长史刘之遴说：“贵乡有很多品学兼优的饱学之士，请代为推举一位有作为的少年。”于是，刘之遴应命向萧绎推荐了宗懔。当天，刘之遴即将宗懔介绍给萧绎，萧绎让他兼作记室。曾经有一天的傍晚，宗懔被召留在官署，萧绎让他撰写《龙川庙碑》，宗懔只一夜就写成了，第二天早晨呈给萧绎。元帝萧绎十分叹服，赞美他的才能。到萧绎转而镇守江州的时候，宗懔被任命为刑狱参军，兼作掌书记。而后，他又先后担任了临汝、建成和广晋三县的县令。后来，他的母亲不幸去世，宗懔辞去官职，回家守丧。他悲痛欲绝，总是伤心地哭到吐血为止。两旬之内，宗懔哭死过去又苏醒过来，如此这般地反复了三次。当他悲泣痛苦的时候，总有数千只乌鸦落在他家的屋顶上，每次都是等到他哭泣的时候飞来，哭声停止后又飞走。当时的舆论都称颂此事，认为这是宗懔的孝心感动了上天的结果。

梁元帝萧绎重新统治荆州后，任宗懔为别驾、江陵令。到元帝即位称帝时，宗懔又被升为尚书侍郎。后来，梁元帝在亲手撰写的诏书中写道：“昔日在扶柳之地创建国家的时候，受到封赏的人只有故旧朋友，西乡这片帝王用以赐封功臣、酬劳勋绩的土地，原本也由宾客来享用。何况事情涉及到有功的人，怎么能反而不赐爵封赏呢？尚书侍郎宗懔，屡屡表现出其运筹帷幄的谋略，确实深有辅佐之才。他跟随我一直到老，经历了无数的岁月。可以封他为信安县侯，赐一千户的

封地作为他的食邑。”此后，宗懔被接连晋升为吏部郎中、五兵尚书和吏部尚书。当年，侯景之乱被平定后，梁元帝与群臣商议返回建业。多数人都希望在那里定都，只有宗懔一人出面劝谏元帝定都渚宫，因为他的家乡在荆州的缘故。

到西魏军平破江陵之后，宗懔与王褒等人被虏，西入函谷关，到了西魏国都长安。太祖宇文泰因宗懔在南方享有盛名，给予他很高的礼遇。北周孝闵帝宇文觉废魏帝登基称帝后，封宗懔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世宗明帝宇文毓即位，又令宗懔与王褒等人在麟趾殿刊定群书。他还多次蒙受世宗的宴请。北周保定年间，宗懔去世，享年六十四岁。他的著作曾被编定成集，共二十卷，流传于世。（冯 时 译）

【原文】

宗懔字元懔，南阳涅阳人也。八世祖承，永嘉之乱，讨陈敏有功，封柴桑县侯，除宜都郡守。寻卒官，子孙因居江陵。父高之，梁山阴令。

懔少聪敏，好读书，昼夜不倦。语辄引古事，乡里呼为小儿学士。梁普通六年，举秀才，以不及二宫元会，例不对策。及梁元帝镇荆州，谓长史刘之遴曰：“贵乡多士，为举一有意少年。”之遴以懔应命。即日引见，令兼记室。尝夕被召宿省，使制《龙川庙碑》，一夜便就，诘朝呈上。梁元帝叹美之。及移镇江州，以懔为刑狱参军，兼掌书记。历临汝、建成、广晋三县令。遭母忧去职。哭辄呕血，两旬之内，绝而复苏者三。每有群鸟数千，集于庐舍，候哭而来，哭止而去。时论称之，以为孝感所致。

梁元帝重牧荆州，以懔为别驾、江陵令。及帝即位，擢

为尚书侍郎。又手诏曰：“昔扶柳开国，止曰故人，西乡胙土，本由宾客。况事涉勋庸，而无爵赏？尚书侍郎宗懔，亟有帷幄之谋，诚深股肱之寄。从我于迈，多历岁时。可封信安县侯，邑一千户。”累迁吏部郎中、五兵尚书、吏部尚书。初侯景平后，梁元帝议还建业，唯懔劝都渚宫，以其乡里在荆州故也。

及江陵平，与王褒等入关。太祖以懔名重南土，甚礼之。孝闵帝践阼，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世宗即位，又与王褒等在麟趾殿刊定群书。数蒙宴赐。保定中卒，年六十四。有集二十卷，行于世。

姚僧垣传

——《周书》卷四七

【说明】姚僧垣（公元 499—583 年），字法卫，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南北朝北周医学家。自幼博识见广。梁武帝时召入宫中面试，姚僧垣对答如流，武帝对他的出众才学甚感惊奇。中大通六年（公元 534 年），姚僧垣初入仕途，出任临川嗣王国左常侍，以后历任数职。大同九年（公元 543 年），为殿中医师。不久又调任太医正。

梁武帝因发热欲服大黄，僧垣认为大黄系迅猛之药，皇帝年迈不宜使用，武帝未听从他的建议而使病情恶化成危急病症。梁元帝曾患心腹疾病，遂召诸多医生讨论治疗方药，众人一致认为圣上最为尊贵，不可轻意施用攻克之法，宜平和缓缓宣通。姚僧垣说：“脉洪而实，这是有积食，必须用大黄，否则无法治愈。”元帝采纳他的意见，服下汤药后果然泻下积食而疾愈。梁元帝愈后甚为高兴，赐予重赏。他还先后治愈金州刺史伊娄穆腰部紧束沉重、两脚伸展不利之症；大将军、襄乐公贺兰隆的气疾与水肿病；大将军、乐平公窦集的风疾。建德四年（公元 575 年），高祖挂帅讨伐北齐，在河阴患病，口不能言，眼睑下垂不能视物，一脚短缩，不能行走。姚僧

垣用他精湛的医术，使高祖逐步康复。此后姚僧垣倍受重用，治愈的病人数不胜数，故而声望颇高，远近闻名，以至边远外域的病人都来求医。姚僧垣曾著《集验方》十二卷，此书系姚氏将一生搜集的奇方验方，经临床反复验证后筛选整理编辑而成。它体现了姚僧垣的治疗经验。可惜此书现已佚失，部分佚文尚可在《外台秘要》、《医心方》等医籍中见到。另外，他还撰写了《行记》三卷。姚僧垣的儿子姚最继承父业，亦以医药知名。

姚僧垣，字法卫，吴兴武康人，系三国时期吴太常卿信的八世孙。曾祖父名郢，为刘宋朝之员外散骑常侍、五城侯。父亲菩提，任梁高平县令。他曾为疾病缠扰数年，遂留心医药。梁武帝性好医学，每每召菩提讨论医术，言语每多共识，由此梁武帝颇为尊敬他。

僧垣幼时博识见广，居家服丧尽守孝礼。二十四岁即继承家业。梁武帝召他入宫面试，僧垣对答流畅无误，梁武帝甚为惊奇。中大通六年（公元534年），他入仕任临川嗣王国左常侍。大同五年（公元539年），任骠骑庐陵王府田曹参军。大同九年（公元543年），还（一作追）领授殿中医师。那时武陵王所生的葛修华患病很久，采用许多治法均不见效。梁武帝便命僧垣诊治。僧垣回来后，向皇上陈述患者的病状，对病情变化症状增减俱记忆清晰。梁武帝感叹说：“您用心细致缜密已经到这种程度，凭这种态度和医术诊治疾病，还有什么病可能逃脱掉呢？我常因前代有名人士多好医术，所以每每留意医学，颇识一些治病的道理。今听您一番论说，更是

开阔眼界。”十一年（公元545年），姚僧垣调任太医正，并加官文德主帅、直阁将军。梁武帝曾因发热，欲服大黄。僧垣劝他：“大黄系迅猛之药，然您年事已高，不宜轻意使用。”武帝未从僧垣之见，导致病症加重而危。梁简文帝在东宫时，待姚僧垣甚为尊重，一年四季常予以赏赐。太清元年（公元547年），调任镇西湘东王府中记室参军。僧垣青年时爱好文学历史，对章句学兴趣不大。他时常与人论古说今，便为当时学者所称道。

侯景围困建业时，姚僧垣丢下妻子儿女去赴国难。梁武帝因而嘉奖他，授任他戎昭将军、湘东王府记室参军。后来宫城失陷，众官员逃离失散。僧垣辗转回到吴兴，拜见吴兴太守张嵊。张嵊见僧垣流着泪说：“我承受朝廷的恩泽太多，现以死报答。您是此地大家族，又系朝廷旧臣。今日得以相见，我的事可以办了。”不一会儿侯景兵马均至，攻战数天，郡城陷落。僧垣逃窜躲避许久，最终才被拘捕。侯景将领侯子鉴久闻僧垣大名，对他深为器重，姚僧垣因此而释放。待梁简文帝继位，僧垣返回建业，继任原职并兼中书舍人。不久侯子鉴镇守广陵，姚僧垣又随他去了江北。

梁元帝平定侯景，召僧垣赴荆州，改授他为晋安王府咨议。当时大乱虽已平息，然用人不凭借才学，朝政混乱没有纲纪。僧垣深为忧虑，对旧友说：“我看这样的形势，灾祸很快就会出现。当今上策，不如闭关。”旁人听他的话无不私下取笑他。梁元帝患心腹疾病，遂召众医生商议治疗方案。大家齐言皇上最为尊贵，不可轻意施用攻脱之剂，宜以平和药物，渐渐宣通。僧垣谓：“脉洪而实，这是有积食，必须用大

黄，否则无法治愈。”元帝顺从他的意见，服汤药后果然泻下宿食而病愈。梁元帝因此甚为欣喜，赏他银钱十万。当时刚开始铸钱，以一可以当十，所以十万实则百万。

当西魏军攻克荆州，姚僧垣仍不离左右侍奉梁元帝。为军人阻止，他才流着泪离去。不久中山公护派人寻求僧垣，僧垣来到他的兵营，又被燕公于谨召去，并受到隆重的接待。太祖也派遣使者四处征求僧垣，于谨坚持留住僧垣不放，对使者说：“我年纪衰老，重病缠身，今遇见此人，望能与他共度晚年。”太祖念谨功高德重，就作罢。次年，姚僧垣随从于谨到长安。武成元年（公元559年），授官小畿伯下大夫。

金州刺史伊娄穆因病返回京城，请僧垣看病。他说：“从腰至脐如有三道绳索缠束，两脚缓纵拘挛，不能自持。”僧垣为其诊脉，开汤药三剂。穆初服一剂，感觉上端束缚解除；再服一剂，中间束缚消失；又服一剂，三道束缚全无。但两脚疼痛，且屈伸无力。僧垣再予散药一剂，两脚稍能屈伸。僧垣说：“最终要待霜降，此病将愈。”到九月，伊娄穆便能起步行走。

大将军、襄乐公贺兰隆先患气疾，复加水肿，喘息奔急，坐卧不安。有人劝他服决命大散，他的家人因有疑问未能决断，便询问僧垣。僧垣说：“我认为此病与决命大散并不对症。如果你要自行服用，就必不麻烦来问我。”说完就要离去。贺兰隆的儿子殷勤拜请说：“久闻您的大名，今日才来，疾病竟然已不可治。我们的歉意实在无法表达。”僧垣知道此病可以治好，即为其开处方，劝他尽快服用。服后气通疾除，再开一剂，所有不适全都消失。

天和元年（公元 566 年），姚僧垣加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等官职。大将军、乐平公襄集忽然患风疾，精神错乱，对任何事情无所知觉。先为他治病的医生皆断言不可救治。后僧垣来此说：“困难是确实困难，但最终不至于死。如果专门让我治，我将为他治病。”他的家人欣然从命，请他予以施治。僧垣为他调制汤散，所患即痊。大将军、永世公叱伏列椿苦于痢疾已很长时间，仍坚持上朝。燕公谨曾询问僧垣：“乐平、永世二人均有难以治愈的疾病，依我看来，永世的病比较轻些。”僧垣回答说：“疾病有深浅，正气与邪气之间时常相克相杀。乐平公虽然病重，最终可以治愈。永世公所病虽轻，但必定不免一死。”谨又说：“您预见他必死，将于何时！”僧垣答：“不会超过四个月。”后果然如僧垣所说，谨感叹他医术非同一般。六年（公元 571 年），僧垣升为遂伯中大夫。

建德三年（公元 574 年），文宣太后卧病不起，医与巫对此说法不一。高祖在内殿召见僧垣，并与他同坐，对他说：“太后的病势不轻，所有医生一致说不必忧虑。他们的情意我能体察。但君臣之间，应以言语毫无隐瞒为义。您认为如何？”僧垣答：“臣没有听声视色之高妙本领，仅仅以经历很多事情的经验和作为常人的准则，在下为太后担忧害怕。”皇帝流着泪说：“您既然已经决断，我还说什么呢？”太后不久驾崩。此后皇帝再次召见僧垣，问他：“姚公任仪同已有几年？”僧垣回答：“臣愧承皇恩，在此已九年。”皇帝说：“您已辛劳多时，朝廷宜授重任。”乃任他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又下诏书：您年事已高，可以不上朝进谒，若无特殊诏书，不必烦劳进见。

建德四年（公元 575 年），高祖亲自挂帅东去讨伐北齐。在河阴患病，口不能言，睑垂目闭，不能视物，一脚缩短，不能行走。僧垣认为五脏均病，不可同时治疗。治理军队最要紧的事，莫过于语言，于是处方用药，皇帝得以开口说话；然后又治眼睛，眼疾消除；最后治脚，脚也痊愈。等到华州，皇帝已恢复健康。乃命姚僧垣为华州刺史，并仍命他随从进京，不就地镇守。宣政元年（公元 578 年），姚僧垣上书请求辞去官职。皇帝从优待他，下诏准许。当年，高祖去云阳，卧病，乃诏僧垣赴云阳。内史柳昂私下问：“高祖减食多日，脉象如何？”僧垣回答：“高祖上应天意，或者说非我力所能及。如凡人百姓那样，无人不死。”高祖不久驾崩。

宣帝始在东宫，常苦于心痛，于是命僧垣予以治疗，其病很快痊愈。为此宣帝甚为快悦。待他继位，因感恩对僧垣礼仪更为隆重。常语气缓和地对僧垣说：“常听先帝称您为姚公，是这样吗？”僧垣答：“臣担当不起如此称呼，确实如圣上所说。”皇帝说：“此为尊尚老人之称，不是贵爵封号。我应为您开辟域地，建立家园，成为子孙永远相传的基业。”于是封他为长寿县公，封地一千户。下达册封命令之时，又赏赐他金带和衣服等物品。

大象二年（公元 580 年），僧垣任太医下大夫。过不久皇帝生病，日渐加重。僧垣夜里也值班侍奉皇帝。皇上对隋公杨坚说：“我的生命现在只有委托他。”僧垣知道皇帝病情危险，不可能康复。就对他说：“我感受皇恩深重，想尽全力效劳。然而我恐怕能力有限，不敢不尽心而为。”皇帝点头称是。到静帝继位，僧垣升为上开府仪同大将军。隋朝开皇初期，他

进爵为北绛郡公。三年后，姚僧垣去世，时年八十五岁。他留下遗言告诫着普通人之衣入棺，上朝衣服不装殓。灵前只放装香器皿，每天盛清水即可。姚僧垣卒后仍赐生前所任华州刺史，并加荆、湖二州刺史，合为三州刺史。

姚僧垣医技高超，为当时医界所推重，经他一生治愈的病人数不胜数。他名声很大，远至边疆也有所闻，以至边远外域有病者都来邀请他。姚僧垣搜集奇方异方经应用有效者，著为《集验方》十二卷。又著《行记》三卷，流行世间。他的长子名察，在江南。

次子最，字士会。幼时聪明机敏，成年后，博通经史，尤其爱好著书。十九岁跟姚僧垣入关。世宗皇帝广泛收聚有学识的门徒在麟趾殿校书。最也预备成为其中的学士，不久他被授任为齐王宪府水曹参军，掌管文翰。齐王宪待他格外器重，赏赐丰厚。宣帝继位，宪因嫌疑被杀。隋文帝作相的时候，追认恢复宪的官爵。最因陪伴他多年，他给予最的恩情、照顾亦异常深重，于是最将齐王宪的功绩撰写成传，上送史局。

最幼时在江南，直至入关未习医术。天和中，齐王宪上奏高祖，派遣最去学习医术。宪又对最说：“你博学才高，为何象王褒、庾信那样。王、庾二人虽于梁、周二朝名望很高，然而我轻视他们。论才资待人，他二人不及于你。你应深识这些，不可对此不留意。况且皇帝有诏书，更应勉励自己。”最由此继承家业。过十年左右，他的医术甚有长进，常常有人请他看病，治疗经验越来越多。隋文帝继位后，姚最任职太子门大夫。后因父丧辞去官职，由于悲哀过度，姚最身体

甚为消瘦。丧期未满，皇帝免丧，令其承袭父亲北绛郡公爵位，重任太子门大夫。

此后不久姚最成为蜀王秀之友。秀镇守益州，升任他为秀府司马。待陈朝平定后，兄察至。最自认为非长子嫡传，将封位让于察。隋文帝准许之。后来蜀王秀暗中有谋反企图，隋文帝命公卿追究此事。当时开府庆整、郝伟等人一并将罪过推于秀，只有最说：“凡违法之事都是我干的，秀王其实不知道。”尽管笞打审问数百次，最至终未改变供辞，最竟被定罪杀害。享年六十七岁。时人评论他为人重义。姚最著有《梁后略》十卷，流传于世。

(万 芳 译)

【原文】

姚僧垣字法卫，吴兴武康人，吴太常信之八世孙也。曾祖郢，宋员外散骑常侍、五城侯。父菩提，梁高平令。尝婴疾历年，乃留心医药。梁武帝性又好之，每召菩提讨论方术，言多会意，由是颇礼之。

僧垣幼通洽，居丧尽礼。年二十四，即传家业。梁武帝召入禁中，面加讨试。僧垣酬对无滞。梁武帝甚奇之。大通六年，解褐临川嗣王国左常侍。大同五年，除骠骑庐陵王府田曹参军。九年，还领殿中医师。时武陵王所生葛修华，宿患积时，方术莫效。梁武帝乃令僧垣视之。还，具说其状，并记增损时候。梁武帝叹曰：“卿用意绵密，乃至于此，以此候疾，何疾可逃。朕常以前代名人，多好此术，是以每恒留情，颇识治体。今闻卿说，益开人意。”十一年，转领太医正，加文德主帅、直阁将军。梁武帝尝因发热，欲服大黄。僧垣曰：

“大黄乃是快药。然至尊年高，不宜轻用。”帝弗从，遂至危笃。梁简文帝在东宫，甚礼之。四时伏腊，每有赏赐。太清元年，转镇西湘东王府中记室参军。僧垣少好文史，不留意于章句。时商略今古，则为学者所称。

及侯景围建业，僧垣乃弃妻子赴难。梁武帝嘉之，授戎昭将军、湘东王府记室参军。及宫城陷，百官逃散。僧垣假道归，至吴兴，谒郡守张嵎。嵎见僧垣流涕曰：“吾过荷朝恩，今报之以死。君是此邦大族，又朝廷旧臣。今日得君，吾事辨矣。”俄而景兵大至，攻战累日，郡城遂陷。僧垣窜避久之，乃被拘执。景将侯子鉴素闻其名，深相器遇，因此获免。及梁简文嗣位，僧垣还建业，以本官兼中书舍人。子鉴寻镇广陵，僧垣又随至江北。

梁元帝平侯景，召僧垣赴荆州，改授晋安王府咨议。其时虽克平大乱，而任用非才，朝政混淆，无复纲纪。僧垣每深忧之。谓故人曰：“吾观此形势，祸败不久。今时上策，莫若近关。”闻者皆掩口窃笑。梁元帝尝有心腹疾，乃召诸医议治疗之方。咸谓至尊至贵，不可轻脱，宜用平药，可渐宣通。僧垣曰：“脉洪而实，此有宿食。非用大黄，必无差理。”梁元帝从之，进汤讫，果下宿食，因而疾愈。梁元帝大喜。时初铸钱，一当十，乃赐钱十万，实百万也。

及大军克荆州，僧垣犹侍梁元帝，不离左右。为军人所止，方泣涕而去。寻而中山公护使人求僧垣。僧垣至其营。复为燕公于谨所召，大相礼接。太祖又遣使驰驿征僧垣，谨固留不遣。谓使人曰：“吾年时衰暮，疹疾婴沉。今得此人，望与之偕老。”太祖以谨勋德隆重，乃止焉。明年，随谨至长安。

武成元年，授小畿伯下大夫。

金州刺史伊娄穆以疾还京，请僧垣省疾。乃云：“自腰至脐，似有三缚，两脚缓纵，不复自持。”僧垣为诊脉，处汤三剂。穆初服一剂，上缚即解；次服一剂，中缚复解；又服一剂，三缚悉除。而两脚疼痛，犹自挛弱。更为合散一剂，稍得屈伸。僧垣曰：“终待霜降，此患当愈。”及至九月，遂能起行。

大将军、襄乐公贺兰隆先有气疾，加以水肿，喘息奔急，坐卧不安。或有劝其服决命大散者，其家疑未能决，乃问僧垣。僧垣曰：“意谓此患不与大散相当。若欲自服，不烦赐问。”因而委去。其子殷勤拜请曰：“多时抑屈，今日始来。竟不可治，意实未尽。”僧垣知其可差，即为处方，劝使急服。便即气通，更服一剂，诸患悉愈。

天和元年，加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将军、乐平公窦集暴感风疾，精神瞀乱，无所觉知。诸医先视者，皆云已不可救。僧垣后至，曰：“困则困矣，终当不死。若专以见付，相为治之。”其家忻然，请受方术。僧垣为合汤散，所患即瘳。大将军永，世公叱伏列椿苦利积时，而不废朝谒。燕公谨尝问僧垣曰：“乐平、永世俱有痼疾，若如仆意，永世差轻。”对曰：“夫患有深浅，时有克杀。乐平虽困，终当保全。永世虽轻，必不免死。”谨曰：“君言必死，当在何时？”对曰：“不出四月。”果如其言，谨叹异之。六年，迁遂伯中大夫。

建德三年，文宣太后寝疾，医巫杂说，各有异同。高祖御内殿，引僧垣同坐，曰：“太后患势不轻，诸医并云无虑。朕人子之情，可以意得。君臣之义，言在无隐。公为何如？”

对曰：“臣无听声视色之妙，特以经事已多，准之常人，窃以忧惧。”帝泣曰：“公既决之矣，知复何言！”寻而太后崩。其后复因召见，帝问僧垣曰：“姚公为仪同几年？”对曰：“臣忝荷朝恩，于兹九载。”帝曰：“勤劳有日，朝命宜隆。”乃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又敕曰：“公年过县车，可停朝谒。若非别敕，不劳入见。”

四年，高祖亲戎东讨，至河阴遇疾。口不能言；脸垂覆目，不复瞻视；一足短缩，又不得行。僧垣以为诸脏俱病，不可并治。军中之要，莫先于语。乃处方进药，帝遂得言。次又治目，目疾便愈。未乃治足，足疾亦瘳。比至华州，帝已痊愈。即除华州刺史，仍诏随入京，不令在镇。宣政元年，表请致仕，优诏许之。是岁，高祖行幸云阳，遂寝疾。乃诏僧垣赴行在所。内史柳昂私问曰：“至尊贬膳日久，脉候何如？”对曰：“天子上应天心，或当非愚所及。若凡庶如此，万无一全。”寻而帝崩。

宣帝初在东宫，常苦心痛。乃令僧垣治之，其疾即愈。帝甚悦。及即位，恩礼弥隆。常从容谓僧垣曰：“常闻先帝呼公为姚公，有之乎？”对曰：“臣曲荷殊私，实如圣旨。”帝曰：“此是尚齿之辞，非为贵爵之号。朕当为公建国开家，为子孙永业。”乃封长寿县公，邑一千户。册命之日，又赐以金带及衣服等。

大象二年，除太医下大夫。帝寻有疾，至于大渐。僧垣宿直侍。帝谓隋公曰：“今日性命，唯委此人。”僧垣知帝诊候危殆，必不全济。乃对曰：“臣荷恩既重，思在效力。但恐庸短不逮，敢不尽心。”帝颔之。及静帝嗣位，迁上开府仪同

大将军。隋开皇初，进爵北绛郡公。三年卒，时年八十五。遗诫衣白衾入棺，朝服勿敛。灵上唯置香奁，每日设清水而已。赠本官，加荆、湖二州刺史。

僧垣医术高妙，为当世所推。前后效验，不可胜记。声誉既盛，远闻边服。至于诸蕃外域，咸请托之。僧垣乃搜采奇异，参校征效者，为《集验方》十二卷，又撰《行记》三卷，行于世。长子察在江南。

次子最，字士会，幼而聪敏，及长，博通经史，尤好著述。年十九，随僧垣入关。世宗盛聚学徒，校书于麟趾殿，最亦预为学士。俄授齐王宪府水曹参军，掌记室事。特为宪所礼接，赏赐隆厚。宣帝嗣位，宪以嫌疑被诛。隋文帝作相，追复官爵。最以陪游积岁，恩顾过隆，乃录宪功绩为传，送上史局。

最幼在江左，迄于入关，未习医术。天和中，齐王宪奏高祖，遣最习之。宪又谓最曰：“尔博学高才，何如王褒、庾信。王、庾名重两国，吾视之蔑如。接待资给，非尔家比也。尔宜深识此意，勿不存心。且天子有敕，弥须勉励。”最于是始受家业。十许年中，略尽其妙。每有人造请，效验甚多。隋文帝践极，除太子门大夫。以父忧去官，哀毁骨立。既免丧，袭爵北绛郡公，复为太子门大夫。

俄转蜀王秀友。秀镇益州，迁秀府司马。及平陈，察至。最自以非嫡，让封于察，隋文帝许之。秀后阴有异谋，隋文帝令公卿穷治其事。开府庆整、郝伟等并推过于秀。最独曰：“凡有不法，皆最所为，王实不知也。”擿讯数百，卒无异辞。最竟坐诛。时年六十七。论者义之。撰《梁后略》十卷，行于世。

褚 该 传

——《周书》卷四七

【说明】褚该，字孝通。原籍河南阳翟（今河南禹县）人。其祖先于晋末迁居江南，南北朝时北周著名医学家。褚该自幼处事谨慎，为人宽厚，享誉乡里。尤其善于医药，见称于时。曾任梁武林王府参军。后仕周为东平将军、左银青光禄大夫等，并授任医正上士。自北周名医许爽去世，褚该渐渐为时人重视。然而与人交往应酬，尚逊于名医姚僧垣。褚该待人和善，从不自傲，倘有人请他看病或办事，他都尽力而为，所以颇受世人称道。子名士则，继承父业。

褚该，字孝通，河南阳翟人。晋朝末年，迁居江南。祖父名长乐，任南齐竟陵王录事参军。父亲名义昌，任梁朝鄱阳王中记室参军。

褚该幼时谨慎厚道，受到乡里人称赞。他尤其善于医术，在当时颇有名声。他在梁朝任武陵王府参军，并随王府西上。后与萧勃同归周朝，授官平东将军、左银青光禄大夫。以后又调任骠骑将军、右光禄大夫。武成初年（公元559年），授职医正上士。自从许爽死后，褚该渐渐被世人重视，但其宾

客病友之来往，则亚于姚僧垣。天和初年（公元 566 年），调任县伯下大夫。天和五年（公元 570 年），又升职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褚该性情特别温和，不骄不傲，只要有人邀请，都尽他的技艺出力。当时人们称他是一位严谨和善的人。后因病而卒。子名士则，继承他的医业。（万 芳 译）

【原文】

褚该字孝通，河南阳翟人也。晋末，迁居江左。祖长乐，齐竟陵王录事参军。父义昌，梁鄱阳王中记室。

该幼而谨厚，有誉乡曲。尤善医术，见称于时。仕梁，历武陵王府参军。随府西上。后与萧勃同归国，授平东将军，左银青光禄大夫，转骠骑将军、右光禄大夫。武成元年，除医正上士。自许爽死后，该稍为时人所重，宾客迎候，亚于姚僧垣。天和初，迁县伯下大夫。五年，进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该性淹和，不自矜尚，但有请之者，皆为尽其艺术。时论称其长者焉。后以疾卒。子士则，亦传其家业。

裴 矩 传

——《隋书》卷六七

【说明】裴矩（公元？—627年），原名世矩，因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而去掉“世”字。字弘大，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东）人。曾任职北齐，齐亡后入周。北周末年，杨坚执政时被召用。隋王朝建立，先后任过民部侍郎、内史侍郎、黄门侍郎等职。宇文化及篡隋，以裴矩为尚书右仆射，加光禄大夫，封蔡国公，任河北道安抚大使。建德失败，归于唐，授左庶子，转詹事、民部尚书。贞观元年（公元627年）逝世。

裴矩一生最重要的活动是为隋炀帝经营西域，并因而在我国边疆和域外地理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隋炀帝命裴矩到甘州主管关市。大业元年到九年（公元605—613年），他至少四次来往于甘州、凉州（今甘肃武威）、沙州（今甘肃敦煌），大力招徕胡商，并引导西域商队前往长安、洛阳等地直接进行贸易。在与西域各族商人发生密切联系的同时，他尽力搜集西域各邦国的山川险要、君长姓氏、风土物产和人情习俗等资料，除用文字记录下来以外，又绘成彩图，撰写成《西域图记》三卷。书中记载了四十四个国家的情况。可惜原书已佚失。

裴矩字弘大，河东闻喜地方人。祖父叫裴他，北魏的都官尚书。父亲叫裴讷之，为北齐太子舍人。裴矩婴儿时期就失去了父亲，长大后喜欢读书学习，颇爱好文章辞藻，有谋略。伯父裴讓之对他说：“看你的气质才识，足以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想要做官发达，当凭藉为世用的事业。”裴矩从此开始留心于世事。北齐北平王贞做司州牧时，征召裴矩为兵曹从事，后转为高平王幕下为文学之官。直到北齐灭亡。没有得到过迁转。杨坚任定州总管，将他召致来补为记室，颇为亲敬。因母亲逝世而离职回乡守孝。

杨坚做北周丞相。派使者急驰征召裴矩，参与相府记室的工作。杨坚登帝位建立隋朝后，迁升裴矩为给事郎，进掌舍人工作。南伐陈朝时，领衔元帅记室。攻下丹阳后，晋王杨广派裴矩和高颍去没收陈的地图和户籍。明年，奉炀帝命令巡视安抚岭南地区，未及成行而高智慧、汪文进等联合作乱，吴、越的道路不通，炀帝难以遣裴矩动身。裴矩却请求让自己急速前去，炀帝同意。走到南康，召得士兵数千人。当时，俚人首领王仲宣逼攻广州，派部将周师举围攻东衡州。裴矩与大将军鹿愿赴援。敌军建立了九个棚营，屯驻大庾岭，互为声援。裴矩派兵进击攻破，敌方惧怕，放弃东衡州而据守原长岭。裴矩又进击攻破，遂斩杀了周师举，从南海进军援助广州。王仲宣的军队因害怕而溃散。裴矩安抚收服了二十多个州，并继承过去制度署派俚人乱军首领为刺史、县令。返师回报，炀帝非常高兴，召裴矩上殿，亲自慰问辛劳，又看着高颍、杨素说：“韦洸率二万兵，不能及时过南岭，我时常担忧他的兵少。而裴矩能以三千弱兵，直达南康。有这样的

臣子，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因裴矩有功，拜为开府，赐爵位闻喜县公，赏赐物品二千段；授官民部侍郎，不久迁升内史侍郎。

当时，突厥强盛，都兰可汗的妻子大义公主，就是宇文氏家族女儿，因而屡为边患。后因公主与侍从的胡人私通，长孙晟先揭发这件事，裴矩奏请出使说服都兰可汗，把宇文氏明正典刑，处决示众。炆帝听从了他的建议。结果果如裴矩所言，公主被杀。后来，都兰与突利可汗联合发难，屡犯边境要塞。炆帝下诏命太平公史万岁为行军总管；出兵定襄道，以裴矩为行军长史，大败达头可汗于塞外。史万岁阵亡，其军功竟没有叙录。炆帝以启民可汗归附不久，令裴矩去进行抚慰。返京后晋升为尚书左丞。同年，文献皇后去世，太常过去没有有关葬礼制度，裴矩和牛弘就根据《齐礼》进行制定了一套礼制。转为吏部侍郎，被公认称职。

炆帝登位，营建东都，裴矩正任职修府省，九十天完成了营建工程。当时西域诸国，大多到张掖与中国做买卖。炆帝命裴矩负责掌管这件事。裴矩知道炆帝正企望远略边境，凡来往的西域各国商人，裴矩都诱使他们谈论其国家的民风习俗、山川险易等，撰写成《西域图记》三卷，呈奏给炆帝。书“序”说：

我听说夏禹定九州，疏导黄河，没有逾越积石；秦灭六国，修建堤岸，终点只到临洮。所以知道西胡杂种，居处僻远，礼仪教化不易达到，文字书籍也很少流传。自汉朝建国，开拓黄河以西地区，开始称名号的有三十六个国家，以后分立，乃有五十五王。汉朝设置校尉、都

护来招抚。然而叛服不常，屡次发兵征讨。后汉时，校尉、都护等官时存时废。虽然大宛招致后，略知人口户数，但各国山川名称都不知道。至于姓氏风土，服饰物产全都没有记载，世上也无人听说。加之年复一年地过去，年代久远，兼并征战，互有兴亡。或地方是原来国家的，而已改成了现今的国号；或已不是归人掌权，但仍袭用了过去的名号。加之各部落民众交错而居，国界移改，语言不一样，许多事情难以弄得准确，于阗的北面，葱岭以东，考证以前史书记载，有三十余国。其后由于相互攻伐屠杀，仅剩下十来个国家，其余的都沦没了。扫地俱尽，空留丘墟，无法记录识别了。

皇上受天命，育万物，不分华夷，都看作自己的子民，所以四海之内的百姓无不敬慕归化。仁化之风所及，近年来，职方贡物按时敬纳，僻远的地方也到来不缺。我因为做抚纳工作，又监督管理关市，搜集文献，采访胡人，或有怀疑不明白的地方，随时从人们口中弄清楚。依照各国的服饰仪容，王和一般百姓不同的形貌举止，用图画摹绘出来，撰写成《西域图记》共三卷，合计四十四个国家。又另绘地图，极尽其要害。从西顷过去，北海之南，纵横亘贯近二万里。料想由于富商大贾周游经历过，所以各国情况没有什么不知道。再有一些僻远地方，难以访问了解，不可凭空虚构，因而暂缺。二汉相承所撰写的《西域传》，只要有户民数十，就称之为国王，徒有名号，与事实不符。现今编入书中的国家，都有千户以上，利益尽于西海，多出产奇珍异物。山居地区，没

有国名，以及部落小人少的，也多不予记载。

从敦煌出发，到达西海，有三条道路，各有其山川地势险要。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渡北流河水，到拂林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越过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到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槃陀，越过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怛延、漕国，到北婆罗门，达于西海。三道的各个国家，南北交通也各自有道路。像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想要到那里去都能通达。伊吾、高昌、鄯善是西域的门户。敦煌则是枢纽咽喉之地。

凭国家的威德，将士的骁雄，扬旌旗于蒙汜之水上，跃骏马而过昆仑山，易如反掌。何往而不至！不过，突厥、吐浑分别雄踞于羌胡之地，成为障碍，所以朝贡不通。现在西蕃诸国通过商人来秘密表示诚服，殷切希望能作为附从。圣上的恩情雨露，泽及普天之下，应施行收服人心的安抚政策。所以，皇上只要派遣使者，不必动用士兵战车，西蕃各国就会臣服，浑、厥即可攻灭。统一戎夏，就在于此举！不有所记述，无以表示威化之远大”。

炆帝非常高兴，赏赐物品五百段。每天请裴矩来到御座前，亲自询问有关西域的情形。裴矩盛赞西域有各种宝物，说吐谷浑容易吞并。炆帝于是全心全意地把通西域，筹划统治四夷的事情都委托交给了裴矩。

转为民部侍郎，还没有到任，就改任黄门侍郎。炀帝再次派裴矩去张掖，招引西蕃。受招而来的有十几个国家。大业三年，炀帝祭祀恒山，这些国家都参加了助祭。炀帝将巡视河西地区，再次派裴矩去敦煌。裴矩派使者说服高昌王麴伯雅和伊吾吐屯设等，诱以厚利，引他们入朝晋见。炀帝西巡到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设和西蕃胡二十七个国家，人们都晋见于道路东侧。令晋见的人佩带金玉饰物，穿著华丽的锦缎服装，焚香奏乐，载歌载舞，热闹非常。又令武威、张掖的男男女女盛装来观看。交通要道都被人群和乘骑所堵塞，四周亘贯数十里，以表示中国的强盛。炀帝见了很是高兴。最终攻破吐谷浑，开拓边地数千里并派兵戍守。每年输往钱粮以巨亿计。诸蕃畏惧，相继对隋朝纳贡。炀帝因裴矩有安抚怀远的方略，进官为银青光禄大夫。这年冬天，炀帝到东都洛阳，裴矩因蛮夷来朝贡的很多，暗示炀帝下令京城举行大规模歌舞杂技表演。征召各地的技艺奇异，在端门街演出。穿锦绮衣服、插戴金银珠翠首饰游观的人有十数万。又强迫百官和男女百姓，顺次序坐在戏棚里观看，一个个穿著华丽。热闹了一个月才停止。又下令许多街道上店铺设置帐幕，陈列出丰富的酒食，派掌管蕃人事务的官员率领蛮夷与市民做买卖，所到的地方。全都邀请他们就坐，直到喝醉吃饱而去。蛮夷羡慕惊叹，说中国是神仙之国。炀帝认为他们出于至诚，对宇文述、牛弘说：“裴矩非常了解我的心意，凡他有所陈言建议，都是我想到的。而我还没有说出口时，裴矩却提出来了。如果不是一心为国，怎能做到这样呢！”

炀帝派遣将军薛世雄去伊吾筑城屯兵，令裴矩一同前往

治理。裴矩暗示西域诸国说：“天子因为蕃人做买卖去中原太远，所以来伊吾筑一城市。”各国都认为所说极是，不再来争逐。回到京城，炀帝又赐钱四十万，裴矩向炀帝汇报情况，提出反间射匮，暗地攻打处罗的计谋。后来处罗为射匮所迫，终于随使者入朝晋见。炀帝非常高兴，赏赐裴矩貂皮衣和西域的珍宝器物。

随从炀帝巡视塞北，曾到临启民可汗的驻扎地。当时高丽派遣使者与突厥先有往来，启民不敢隐瞒，把使者引来见炀帝。裴矩因而上言说：“高丽地方，本是孤竹国。周代把它封给箕子，汉代分为三郡，晋朝也统领有辽东。现今却不臣服，独立于外，所以先帝憎恶它，长久以来就想出兵攻打了。只因杨谅无能，师出无功。陛下现正在位，怎能不完成此事，而让这块文明国土，仍陷于蛮荒落后吗？现在它的使者来朝见突厥，亲会启民，全国归顺，必然害怕皇上威灵显赫远大，考虑到后降服而先亡。胁迫使其入朝归顺，是可以做到的。”炀帝问：“怎么做？”裴矩说：“请亲自诏见其使臣，放回国，他会传话给国王，令其赶快入朝晋见。否则，就要率同突厥，立即征伐诛杀。”炀帝采纳了他的意见。高元不听从命令，于是筹划征辽计策。隋军到达了，用原来官员率领武贲郎将。明年，再次随军到辽东。兵部侍郎斛斯政逃亡到高丽，炀帝命裴矩兼掌握军事。以其前后两次参加渡辽的军事行动，进官为右光禄大夫。其时朝廷法纪松弛，人们变得没有操行，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内史侍郎虞世基等揽权用事，文武官员多以贪污受贿闻名。只有裴矩仍坚持廉洁清白，没有贪赃枉法的坏名声，因而为世人所称赞。

回到涿郡，炀帝因杨玄感刚被平定，命裴矩去稳定陇西的边塞要地。因而到了会宁，慰问曷萨那部落，派阙达度设袭击吐谷浑，掳掠物资很多，部落富裕了起来。回朝向炀帝汇报情况。炀帝大为赞赏。后来随军队到怀远镇，诏命他总领北蕃的军事。裴矩因始毕可汗部众渐渐强盛，献计分割其势力，准备把隋朝宗室之女嫁给他的弟弟叱吉设，并拜为南面可汗。叱吉设不敢接受。始毕知道后，渐渐对隋朝产生怨恨。裴矩又对炀帝说：“突厥本来淳朴容易离间，但由于它里面有不少胡族人，既桀骜又狡黠，教坏了始毕。我听说史蜀胡悉奸计特别多，得到始毕宠幸，必须把他诱杀掉。”炀帝说：“好”。裴矩就派人告诉胡悉说：“天子拿出大量珍贵物品，现在马邑，想用之为和各蕃国交通往来。假如谁前来，就可得到好物品。”胡悉贪而相信了。不告诉始毕，就率自己部落，驱赶着牲畜，星夜奔驰前进，希望能争先与隋朝互做买卖。裴矩伏兵马邑下，诱而斩杀了他。炀帝下诏通知始毕说：“史蜀胡悉忽领部落来到这里，说他已背叛可汗，请求我方收留。突厥既然是我的臣下，他有背叛行为，我们当共同杀掉他。现在已杀了他，特命人告知。”始毕也知道实际情况，因此不再称臣朝见。大业十一年，炀帝到北方巡视，始毕率骑兵数十万，围炀帝于雁门。下诏命裴矩和虞世基每晚住宿朝堂，以备随时顾问。围困解除，随从到东都。嘱咐射匮可汗遣派姪子率西蕃诸胡来朝贡，炀帝诏命裴矩设宴招待。

不久，随从炀帝驾幸江都宫。这时，四方盗贼纷纷而起，郡县向朝廷告急的文书不胜统计。裴矩反映情况，炀帝大怒，派裴矩到京城去接待蕃客，因有病未能起程。到义兵攻入关，

炀帝命虞世基去裴矩家中请教方略，裴矩说：“太原发生变故，京城不得安宁，远距离作决定处理，恐怕会丧失成就事功的机会。希望皇上早回京师，才能够平定。”裴矩重新出来管理政务。忽然骁卫大将军屈突通被打败的消息传到，裴矩禀告，炀帝惊慌变色。裴矩素来勤恳谨慎，从没有触犯人。观天下已大乱，恐身受祸害，对待别人总是尽量满足其愿望，虽然下至仆役，也设法求得他们的欢心。当时护从皇帝的士兵骁果多有逃散的，炀帝很担心，问裴矩怎么办？裴矩回答说：“当前皇上留在这里（指江都），已经两年。骁果们都没有家室，人没有配偶，就不能长久安心下来。我请求能让士兵在这里娶妻。”炀帝高兴地说：“你真是多聪明才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计谋。”就命裴矩查核负责给将士们娶妻。裴矩命人招徕江都境内的寡妇和未出嫁的姑娘，由宫监集中，又招将帅和士兵等来听任所取。并听犯罪者自行陈说罪行，先有奸通妇女和尼姑、女道士的，也立即配给。因此骁果们非常高兴，互相称赞说：“这是裴公的恩惠”。

宇文化及作乱，裴矩晨起将进朝，走到街巷棚门处，遇到几个叛乱者，拉着裴矩的马去见孟景。叛乱者都说：“不关裴黄门的事。”不久，宇文化及带着百余骑士来到，裴矩迎接拜见，化及用好话慰解他。命裴矩制定礼仪制度，推举秦王的儿子杨浩为皇帝。任用裴矩为侍内，随宇文化及到河北。宇文化及篡帝位后，以裴矩为尚书右仆射，加光禄大夫，封蔡国公，为河北道安抚大使。

宇文化及失败，被窦建德抓获，因裴矩是隋朝的旧臣，待他很好。重新让他出任吏部尚书，接着转任尚书右仆射，专

门掌管铨选职官的事务。窦建德起自群盗，缺少法度礼乐制度，裴矩为他制定帝王临朝的礼仪。一个月内，典章制度即颇具规模，可与王者相比。建德非常高兴，常去拜访并向他请教。窦建德渡黄河讨伐孟海公，裴矩和曹旦等留守洺州。建德军败于武牢，部下许多将领不知投向谁人。曹旦的长史李公淹、大唐使者魏征等，说服曹旦和齐善行归顺。曹旦等听从了。于是让裴矩与魏征、李公淹领着曹旦以及八个皇帝使用的印玺，举山东之地归降于大唐。授官左庶子，后转升詹事、民部尚书。

（范楚玉 译）

【原文】

裴矩字弘大，河东闻喜人也。祖他，魏都官尚书。父讷之，齐太子舍人。矩襁褓而孤，及长好学，颇爱文藻，有智数。世父让之谓矩曰：“观汝神识，足成才士，欲求官达，当资干世之务。”矩始留情世事。齐北平王贞为司州牧，辟为兵曹从事，转高平王文学。及齐亡，不得调。高祖为定州总管，召补记室，甚亲敬之。以母忧去职。

高祖作相，遣使者驰召之，参相府记室事。及受禅，迁给事郎，奏舍人事。伐陈之役，领元帅记室。既破丹阳，晋王广令矩与高颎收陈图籍。明年奉诏巡抚岭南，未行而高智慧、汪文进等相聚作乱，吴、越道闭，上难遣矩行。矩请速进，上许之。行至南康，得兵数千人。时俚帅王仲宣逼广州，遣其所部将周师举围东衡州。矩与大将军鹿愿赴之，贼立九棚，屯大庾岭，共为声援。矩进击破之，贼惧，释东衡州，据原长岭。又击破之，遂斩师举，进军自南海援广州。仲宣惧而溃散。矩所绥集者二十余州，又承制署其渠帅为刺史、县

令。及还报，上大悦，命升殿劳苦之。顾谓高颎、杨素曰：“韦洸将二万兵，不能早度岭。朕每患其兵少。裴矩以三千散卒，径至南康。有臣若此，朕亦何忧！”以功拜开府，赐爵闻喜县公，赀物二千段。除民部侍郎，寻迁内史侍郎。

时突厥强盛，都兰可汗妻大义公主，即宇文氏之女也，由是数为边患。后因公主与从胡私通，长孙晟先发其事，矩请出使说都兰，显戮宇文氏。上从之。竟如其言，公主见杀。后都兰与突利可汗构难，屡犯亭障。诏太平公史万岁为行军总管，出定襄道，以矩为行军长史，破达头可汗于塞外，万岁被诛，功竟不录。上以启民可汗初附，令矩抚慰之，还为尚书左丞。其年，文献皇后崩，太常旧无仪注，矩与牛弘据《齐礼》参定之。转吏部侍郎，名为称职。

炀帝即位，营建东都，矩职修府省，九旬而就。时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远略，诸商胡至者，矩诱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撰《西域图记》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

“臣闻禹定九州，导河不逾积石，秦兼六国，设防止及临洮。故知西胡杂种，僻居遐裔，礼教之所不及，书典之所罕传。自汉氏兴基，开拓河右，始称名号者，有三十六国，其后分立，乃五十五王。仍置校尉、都护，以存招抚。然叛服不恒，屡经征战。后汉之世，频废此官。虽大宛以来，略知户数，而诸国山川未有名目。至如姓氏风土，服章物产，全无纂录，世所弗闻。复以春秋递谢，年代久远，兼并诛讨，互有兴亡。或地是故邦，改从今号，或人非旧类，因袭昔名。兼复部民交错，封疆

移改，戎狄音殊，事难穷验。于阗之北，葱岭以东，考于前史，三十余国。其后更相屠灭，仅有十存。自余沦没，扫地俱尽，空有丘墟，不可记识。

皇上膺天育物，无隔华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风行所及，日入以来，职贡皆通，无远不至。臣既因抚纳，监知关市，寻讨书传，访采胡人，或有所疑，即详众口。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模写，为《西域图记》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国。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从西顷以去，北海之南，纵横所亘，将二万里。谅由富商大贾，周游经涉，故诸国之事罔不遍知。复有幽荒远地，卒访难晓，不可凭虚，是以致阙。而二汉相踵，西域为传，户民数十，即称国王，徒有名号，乃乖其实。今者所编，皆余千户，利尽西海，多产珍异。其山居之属，非有国名，及部落小者，多亦不载。

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跋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帆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以国家威德，将士骁雄，汎濛汜而扬旌，越崑崙而

跃马，易如反掌，何往不至！但突厥、吐浑分领羌胡之国，为其拥遏，故朝贡不通。今并因商人密送诚款，引领翘首，愿为臣妾。圣情含养，泽及普天，服而抚之，务存安辑。故皇华遣使，弗动兵车，诸蕃既从，浑、厥可灭。混一戎夏，其在兹乎！不有所记，无以表威化之远也。

帝大悦，赐物五百段。每日引矩至御坐，亲问西方之事。矩盛言胡中多诸宝物，吐谷浑易可并吞。帝由是甘心，将通西域，四夷经略，咸以委之。

转民部侍郎，未视事，迁黄门侍郎。帝复令矩往张掖，引致西蕃，至者十余国。大业三年，帝有事于恒岳，咸来助祭。帝将巡河右，复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说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设等，啗以厚利，导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设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国，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锦罽，焚香奏乐，歌舞喧闹。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帝见而大悦。竟破吐谷浑，拓地数千里，并遣兵戍之。每岁委输巨亿万计，诸蕃慑惧，朝贡相续。帝谓矩有绥怀之略，进位银青光禄大夫。其冬，帝至东都，矩以蛮夷朝贡者多，讽帝令都下大戏。征四方奇技异艺，陈于端门街，衣锦绮、珥金翠者，以十数万。又勒百官及民士女列坐棚阁而纵观焉。皆被服鲜丽，终月乃罢。又令三市店肆皆设帷帐，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蛮夷与民贸易，所至之处，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蛮夷嗟叹，谓中国为神仙。帝称其至诚，顾谓宇文述、牛弘曰：“裴矩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未发之顷，矩辄以

闻。自非奉国用心，孰能若是！”

帝遣将军薛世雄城伊吾，令矩共往经略。矩讽谕西域诸国曰：“天子为蕃人交易悬远，所以城伊吾耳。”咸以为然，不复来竞。及还，赐钱四十万。矩又白状，令反间射匮，潜攻处罗，语在《西突厥传》。后处罗为射匮所迫，竟随使者入朝。帝大悦，赐矩以貂裘及西域珍器。

从帝巡于塞北，幸启民帐。时高丽遣使先通于突厥，启民不敢隐，引之见帝。矩因奏状曰：“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汉世分为三郡，晋氏亦统辽东。今乃不臣，别为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但以杨谅不肖，师出无功。当陛下之时，安得不事，使此冠带之境，仍为蛮貊之乡乎？今其使者朝于突厥，亲见启民，合国从化，必惧皇灵之远畅，虑后伏之先亡。胁令入朝，当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请面诏其使，放还本国，遣语其王，令速朝觐。不然者，当率突厥，即日诛之。”帝纳焉。高元不用命，始建征辽之策。王师临辽，以本官领武贲郎将。明年，复从至辽东。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丽，帝令矩兼掌兵事。以前后渡辽之役，进位右光禄大夫。于时皇纲不振，人皆变节，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内史侍郎虞世基等用事，文武多以贿闻。唯矩守常，无贼秽之响，以是为世所称。

还至涿郡，帝以杨玄感初平，令矩安集陇右。因之会宁，存问曷萨那部落，遣阙达度设寇吐谷浑，频有虏获，部落致富。还而奏状，帝大赏之。后从师至怀远镇，诏护北蕃军事。矩以始毕可汗部众渐盛，献策分其势，将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设，拜为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毕闻而渐怨。矩又言于

帝曰：“突厥本淳易可离间，但由其内多有群胡，尽皆桀黠，教导之耳。臣闻史蜀胡悉尤多奸计，幸于始毕，请诱杀之。”帝曰：“善。”矩因遣人告胡悉曰：“天子大出珍物，今在马邑，欲共蕃内多作交关。若前来者，即得好物。”胡悉贪而信之，不告始毕，率其部落，尽驱六畜，星驰争进，冀先互市。矩伏兵马邑下，诱而斩之。诏报始毕曰：“史蜀胡悉忽领部落走来至此，云背可汗，请我容纳。突厥既是我臣，彼有背叛，我当共杀。今已斩之，故令往报。”始毕亦知其状，由是不朝。十一年，帝北巡狩，始毕率骑数十万，围帝于雁门。诏令矩与虞世基每宿朝堂，以待顾问。及围解，从至东都。属射匱可汗遣其犹子，率西蕃诸胡朝贡，诏矩宴接之。

寻从幸江都宫。时四方盗贼蜂起，郡县上奏者不可胜计。矩言之，帝怒，遣矩诣京师接候蕃客，以疾不行。及义兵入关，帝令虞世基就宅问矩方略。矩曰：“太原有变，京畿不静，遥为处分，恐失事机。唯愿銮舆早还，方可平定。”矩复起视事。俄而骁卫大将军屈突通败问至，矩以闻，帝失色。矩素勤谨，未尝忤物，又见天下方乱，恐为身祸，其待遇人，多过其所望，故虽至厮役，皆得其欢心。时从驾骁果数有逃散，帝忧之，以问矩。矩答曰：“方今车驾留此，已经二年。骁果之徒，尽无家口，人无匹合，则不能久安。臣请听兵士于此纳室。帝大喜曰：“公定多智，此奇计也。”因令矩检校为将士等娶妻。矩召江都境内寡妇及未嫁女，皆集宫监，又召将帅及兵等恣其所娶。因听自首，先有奸通妇女及尼、女冠等，并即配之。由是骁果等悦，咸相谓曰：“裴公之惠也。”

宇文化及之乱，矩晨起将朝，至坊门，遇逆党数人，控

矩马诣孟景所。贼皆曰：“不关裴黄门。”既而化及从百余骑至，矩迎拜，化及慰谕之。令矩参定仪注，推秦王子浩为帝，以矩为侍内，随化及至河北。及僭帝位，以矩为尚书右仆射，加光禄大夫，封蔡国公，为河北道安抚大使。

及宇文氏败，为窦建德所获，以矩隋代旧臣，遇之甚厚。复以为吏部尚书，寻转尚书右仆射，专掌选事。建德起自群盗，未有节文，矩为制定朝仪。旬月之间，宪章颇备，拟于王者。建德大悦，每谘访焉。及建德渡河讨孟海公，矩与曹旦等于洺州留守。建德败于武牢，群帅未知所属，曹旦长史李公淹、大唐使人魏征等说旦及齐善行令归顺。旦等从之，乃令矩与征、公淹领旦及八玺，举山东之地归于大唐。授左庶子，转詹事、民部尚书。

宇文恺传

——《隋书》卷六八

【说明】宇文恺（公元 555—612 年），字安乐。出身武将世家，但他却非常好学，博览群书，多才多艺，尤其擅长建筑。隋代的著名建筑工程，他大多参与了规划和督造。

隋文帝登位后，要营建宗庙，授宇文恺为营宗庙副使，负责这件事。宗庙建或后，宇文恺被增封为甌山县公。开皇二年（公元 582 年），营建新都大兴城（今陕西西安），文帝又命恺为新都副监。总领大纲，规模计划都出自宇文恺。为便于漕运，开皇四年（公元 584 年）令宇文恺率领水工凿渠，引渭水通黄河，自大兴城东到潼关三百余里，叫做“广通渠”。开皇十三年（公元 593 年），隋文帝要在岐州（今陕西凤翔）兴建仁寿宫，经右仆射杨素推荐，宇文恺被任命为检校将作大匠，以后又被任为仁寿宫监、将作少匠。在杨素主持下，仁寿宫建造得异常华丽，成为隋文帝喜欢临幸的别宫。

隋炀帝即位后，命宇文恺负责营建东都——洛阳，并因建筑得壮丽，而被擢升工部尚书。他著有《东都图记》、《明堂图议》、《释疑》等书，都已失传。宇文恺一生设计和督造的工程中，以两都的营建和广通渠的开凿影响最大。

宇文恺，杞国公宇文忻的弟弟。在北周政权时，因为是功臣的儿子，年龄仅有三岁时，就被赐爵位双泉伯。七岁时，升封安平郡公，授二千户封地。宇文恺少年时就很有才识和度量。其家庭世代武将，诸兄弟都是以弓马而闻名显达的。他独好学，博览群书，善写文章。又擅长工艺，人们称他为“名父公子”。起初，官职为千牛，以后累次迁升做过御正中大夫、仪同三司等官职。

杨坚做北周丞相时，加封宇文恺上开府中大夫。后来，杨坚称帝建立隋王朝，诛杀政敌宇文氏家族。起初宇文恺本列在诛杀名单中，后因他不是北周宇文氏政权的宗族，其兄宇文忻有功于隋王朝的建立，所以被赦免死。以后被任命为营宗庙副监和太子左庶子。宗庙建成，别封甑山县公，授予千户封地。隋文帝迁都长安，因宇文恺有巧思，下诏任他为营新都副监。虽然高颍是正职负责，但所有规模计划都出自宇文恺。后隋政府决定引渭水通黄河，以便漕运关东的粮食到京师，下诏宇文恺负责此事。后被任莱州刺史，以才干见称。兄长宇文忻被杀，受牵连被罢官在家，很长时间没有被调用。直到朝廷因鲁班故道断绝久不通行，才起用他去修复。接着隋文帝要修建仁寿宫，寻问可以负责这项工程的人。右仆射杨素就推荐宇文恺，说他有巧思。文帝同意了，任他为检校将作大匠。过了一年多，被授仁寿宫监、仪同三司，接着任将作少监。文献皇后去世，宇文恺和杨素负责营造陵墓。文帝很满意，恢复了他的安平郡公爵位和千户封地。

隋炀帝即位，要把都城迁到洛阳去，任宇文恺为营东都副监，接着迁升将作大匠。宇文恺揣炀帝的心意在于宏大奢

侈。所以，东都的建制极尽壮丽。炀帝大喜，进位开府，并拜他为工部尚书。及至修筑长城的工程开始，炀帝又诏命宇文恺负责规划度量。当时炀帝去北方巡视，想夸功示威于少数民族，命宇文恺制造大帐幕，帐下可以容纳几千人。大得炀帝欢心，赏赐物千段。又制造观风行殿，殿上能容纳侍卫数百人，可以拆卸和拼合，行殿下面装有轮轴，能迅速行走移动，好像有种超自然的神力在推动。戎狄等部族人看到了，都惊怕骇异非常。炀帝更加高兴，前前后后给宇文恺的赏赐多得无数可计。

自“永嘉之乱”以来，明堂破坏湮没，隋政权建立后，准备恢复古代的制度，可是朝臣们议论纷纷，难于统一意见。宇文恺广征博引古代有关各种经典著作，写出一篇上奏文章《明堂议表》……炀帝赞同他提出的建议和规划。正好发生辽东的战事，建造明堂的事就被搁下来未能施工。

由于在辽东战役中建立了功劳，宇文恺被进封为金紫光禄大夫。就在当年，死于官位，年五十八岁。炀帝非常惋惜，谥号为康。著有《东都图记》二十卷、《明堂图议》二卷、《释疑》一卷，现传留于世。儿子儒童官游骑尉。小儿子温，被叙用为承务郎。

（范楚玉 译）

【原文】

宇文恺字安乐，杞国公忻之弟也。在周，以功臣子，年三岁，赐爵双泉伯，七岁，进封安平郡公，邑二千户。恺少有器局。家世武将，诸兄并以弓马自达，恺独好学，博览书记，解属文，多伎艺，号为名父公子。初为千牛，累迁御正

中大夫、仪同三司。

高祖为丞相，加上开府中大夫。及践阼，诛宇文氏，恺初亦在杀中，以其与周本别，兄忻有功国，使人驰赦之，仅而得免。后拜营宗庙副监、太子左庶子。庙成，别封甑山县公，邑千户。及迁都，上以恺有巧思，诏领营新都副监。高颎虽总大纲，凡所规划，皆出于恺。后决渭水达河，以通运漕，诏恺总督其事。后拜莱州刺史，甚有能名。兄忻被诛，除名于家，久不得调。会朝廷以鲁班故道久绝不行，令恺修复之。既而上建仁寿宫，访可任者，右仆射杨素言恺有巧思，上然之，于是检校将作大匠。岁余，拜仁寿宫监，授仪同三司，寻为将作少监。文献皇后崩，恺与杨素营山陵事，上善之，复爵安平郡公，邑千户。

炀帝即位，迁都洛阳，以恺为营东都副监，寻迁将作大匠。恺揣帝心在宏侈，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丽。帝大悦之，进位开府，拜工部尚书。及长城之役，诏恺规度之。时帝北巡，欲夸戎狄，令恺为大帐，其下坐数千人。帝大悦，赐物千段。又造观风行殿，上容侍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见之，莫不惊骇。帝弥悦焉，前后赏赉不可胜纪。

自永嘉之乱，明堂废绝，隋有天下，将复古制，议者纷然，皆不能决，博考群籍，奏《明堂议表》……帝可其奏。会辽东之役，事不果行。

以渡辽之功，进位金紫光禄大夫。其年卒官，时年五十八。帝甚惜之，谥曰康。撰《东都图记》二十卷、《明堂图

议》二卷、《释疑》一卷，见行于世。子儒童，游骑尉。少子温，起部承务郎。

何 稠 传

——《隋书》卷六八

【说明】何稠（约公元 543—约 622 年），字桂林。祖先本是西域人，因经商到今四川省，并定居于郫县。人们称其家族为“西州大贾”。南梁承圣三年（公元 554 年），何稠十多岁时，西魏攻陷梁的江陵，杀梁元帝。何稠跟随叔父何妥北上到长安。后来在北周做官，先任御饰下士，后补为参军，兼负责管理细作署。在隋朝他做过御府监、太府丞太府卿兼管少府监，多年来一直掌管皇室的舆服羽仪、兵器甲杖和玩好器物等的制造，以及宫室、陵庙等土木营建。

何稠生性机巧，富有才智，用心精细周密。隋文帝在位时，波斯国进献了一件织造华丽的金縠锦袍。文帝命他仿制一件，仿制品比原件还精美。到隋代，制造琉璃的方法中原地区久已失传，何稠用绿瓷为代用品，与真琉璃没有什么差别。据现在考古学资料，已出土隋代的十三件琉璃器皿中，除一件为兰色的以外，其余十二件都是绿色的，与史书上的记载大致相应。大业八年（公元 612 年），隋炀帝攻打高丽，命何稠在辽水上造桥，工程两天就完成。他又曾设计制造“行殿”和“六合城”，一夜之间，就在前线合成了一座周围八里、

高十仞的大城。城的四角有阙楼，四面有观楼，城上布列甲士，树仪仗伏旌旗。第二天早晨，高丽人见了，非常惊奇，以为有神人相助。隋末，宇文化及杀炀帝，任命何稠为工部尚书。窦建德打败宇文化及，也任命他为工部尚书。窦建德失败后，何稠入唐朝，任将作少匠。

何稠字桂林，国子祭酒何妥兄长的儿子。父亲何通，善雕斫玉石。何稠非常聪明，富才智，善思考，用心精密周详。十几岁时，适逢江陵被攻陷，跟随何妥北上到长安。任北周的御饰下士。杨坚为北周丞相时，召补他为参军，兼管细作署。

隋开皇（公元581—600年）初，被授为都督，连续迁升为御府监，做过太府丞。何稠博览古代图籍，多识古代器物。波斯曾向隋廷敬献一件金绵锦袍，织造很华丽。文帝命何稠仿制。仿制成的一件，质量和华丽都超过了波斯进贡来的。文帝很高兴。当时在中原地区制作琉璃的方法久已失传，匠人没有一个勇于着意解决这一问题。何稠试用绿瓷来制作，与真的无异。接着加官为员外散骑侍郎。

开皇末年，桂州俚人李光仕率部众起义，朝廷派何稠召募士兵去讨伐。军队到达衡岭，派使者去劝谕其首领，洞主莫崇撤兵投降。桂州长史王文同锁拿了莫崇来见何稠。何稠假装说：“州县长官不能好好安抚，致使边民骚扰叛乱。这不是莫崇的错误。”于是命人释缚，拉他共坐，并随从的四人，专设酒宴招待，然后遣送他们回去。莫崇很高兴，回洞寨后毫不设防。到五更天，何稠率人偷袭入洞寨。又派出全部俚

兵去攻打余下的叛乱者。象州叛军首领杜条辽、罗州叛军首领庞靖等相继投降。分别派遣建州开府梁昵讨伐叛乱夷人罗寿，罗州刺史冯暄征讨叛乱首领李大檀。叛乱皆平定，并传首军营之门。又按过去的办法置派部族首领为州县官员而还军，众人心悦诚服。有钦州刺史宁猛力，帅部众投降。开始，猛力崛起于边寨山洞，企图叛乱，到这时也惶惊不安，请求入朝为质表示归顺。何稠因他病势沉重，为表示对他信任无疑，就放回州，与他相约：“八、九月间，可到京师相见。”何稠返京汇报了情况，文帝有点不高兴。当年十月，猛力死，文帝对何稠说：“你上次不把猛力带回京来，现在竟死了。”何稠说：“猛力与我共同定了约言，假如他死了，就派他的儿子来为人质。越人性格直爽守约，他的儿子一定会来的。”起初，猛力临死前，告诫他的儿子长真说：“我和大使臣有约，不可失信于他。你把我埋葬后，就立即动身。”长真果然如何稠所说的入朝晋见。文帝很高兴，说：“何稠在蛮夷人当中的威信竟如此高！”因功勋而授开府。

仁寿（公元601—604年）初，文献皇后驾崩。何稠和宇文恺一起参与制定陵寝制度。何稠生性内向少言语，而善于对上观颜察色，因此日益受宠信。文帝病势沉重时对何稠说：“你曾主持过皇后的葬礼，现在我快死了，要好好加以安置。这样嘱咐的好处是使你不会忘记。如灵魂真有知，我们将相见于地下。”文帝就此揽过太子的颈项说：“何稠是用心思的人，我托付后事给他，希望你以后做什么事情要与他筹商。”

大业初（公元605—618年），隋炀帝将幸临扬州，对何稠说：“现今天下安定，我继承了大业，服饰礼乐典章制度，

缺少不健全的还多。你可以检阅图书典籍，制造车乘衣冠章服和羽毛装饰的旌旗仪仗，送到江都去。”当天就授任何稠太府少卿。何稠组织人制作了皇帝仪仗用的黄色旌旗三万六千，以及天子所乘的车舆、皇后的仪仗队、百官的服饰，按期完成，送到江都。所使役的人工达十多万，用的金银钱物以巨亿计算。炀帝派兵部侍郎明雅，选部郎薛迈等考核验收，几年才完成，丝毫没有差错。何稠参考综合古今，有许多改革创新。自魏晋以来，武官的皮冠用结冠的带子，而没有插定皮冠的鬬导。何稠说：“这是古代田猎时穿的服装。现在是入朝参见用，应改变旧有制度。”所以，在冠上使用象牙制的簪导，是始自何稠。又如随从皇帝省察的大臣所著服饰，起初没有佩带的丝带。何稠说：“这是初一和十五小朝时穿的服饰。那有臣下谒见皇帝而不佩带印绶，同时又不佩带玉饰的礼节？”于是加上兽头小绶和玉佩一只。按照旧制，五辂（古统治者使用的五种车子）在车辕上方设置车箱，天子和陪乘的人同坐箱内。何稠说：君臣同在一处，过于狭窄。”于是就把车箱扩大，另外加设竖立栏杆，让侍臣站在其中，在车箱里再设有须弥山式的平坐，使天子独个坐于其上。其他仪仗、旌旗、服饰、礼乐制度，增损改革的极多，炀帝又令何稠制造战车万乘，后宫居室八百连（四里为连）。深称炀帝心意，升他为太府卿。

三年后，兼管少府监。在辽东战役中，他代理右屯卫将军，率领御营弓弩手三万人。由于当时工部尚书宇文恺造水桥没有成功，军队无法渡过，右屯卫大将军麦铁杖因而迁害身亡。炀帝派遣何稠造桥，三天而成。以前何稠制造过“行

殿”和“六合城”，现在的情况是炀帝在辽水东与敌人相对，只能夜间施工。这座城周围八里，城和女墙合高十仞，上面布满穿戴盔甲的士兵，并遍插仪仗旌旗，城的四角建有阙楼，四面则建有观楼，观楼下面开有三个门。到早晨完成，高丽人看见了，说是神功建成的。当年，加官为金紫光禄大夫。第二年，代理左屯卫将军，随从到辽东。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加官右光禄大夫，随炀帝临幸江都。迂宇文化及作乱，用为工部尚书。宇文化及失败，陷于窦建德，建德再次任他为工部尚书、舒国公。建德失败，归降于唐朝，授任将作少匠。逝世。（范楚玉 译）

【原文】

何稠字桂林，国子祭酒妥之兄子也。父通，善斫玉。稠性绝巧，有智思，用意精微。年十余岁，遇江陵陷，随妥入长安。仕周御饰下士。及高祖为丞相，召补参军，兼掌细作署。

开皇初，授都督，累迁御府监，历太府丞。稠博览古图，多识旧物。波斯尝献金罽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既成，逾所献者，上甚悦。时中国久绝琉璃之作，匠人无敢厝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寻加员外散骑侍郎。

开皇末，桂州俚李光仕聚众为乱，诏稠召募讨之，师次衡岭，遣使者谕其渠帅洞主莫崇解兵降款。桂州长史王文同锁崇以诣稠所。稠诈宣言曰：“州县不能绥养，致边民扰叛，非崇之罪也。”乃命释之，引崇共坐，并从者四人，为设酒食而遣之，崇大悦，归洞不设备。稠至五更，掩入其洞，悉发俚兵，以临余贼。象州逆帅杜条辽、罗州逆帅庞靖等相继降

款。分遣建州开府梁昵讨叛夷罗寿，罗州刺史冯暄讨贼帅李大檀，并平之，传首军门。承制署首领为州县官而还，众皆悦服。有钦州刺史宁猛力，帅众迎军。初，猛力倔强山洞，欲图为逆，至是惶惧，请身入朝。稠以其疾笃，因示无猜贰，遂放还州，与之约曰：“八九月间，可诣京师相见。”稠还奏状，上意不恚。其年十月，猛力卒，上谓稠曰：“汝前不将猛力来，今竟死矣。”稠曰：“猛力共臣为约，假令身死，当遣子入侍。越人性直，其子必来。”初，猛力临终，诫其子长真曰：“我与大使为约，不可失信于国土。汝葬我讫，即宜上路。”长真如言入朝，上大悦曰：“何稠著信蛮夷，乃至于此。”以勋授开府。

仁寿初，文献皇后崩，与宇文恺参典山陵制度。稠性少言，善候上旨，由是渐见亲昵。及上疾笃，谓稠曰：“汝既曾葬皇后，今我方死，宜好安置。属此何益，但不能忘怀耳。魂其有知，当相见于地下。”上因揽太子颈谓曰：“何稠用心，我付以后事，动静当共平章。”

大业初，炀帝将幸扬州，谓稠曰：“今天下大定，朕承洪业，服章文物，阙略犹多。卿可讨阅图籍，营造舆服羽仪，送至江都也。”其日，拜太府少卿。稠于是营黄麾三万六千人仗，及车舆辇辂、皇后卤簿、百官仪服，依期而就，送于江都。所役工十万余人，用金银钱物钜亿计。帝使兵部侍郎明雅、选部郎薛迈等勾核之，数年方竟，毫厘无舛。稠参会今古，多所改创。魏、晋以来，皮弁有纓而无鬬导。稠曰：“此古田猎之服也。今服以入朝，宜变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导，自稠始也。又从省之服，初无佩绶。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

有人臣谒帝而去印绶，兼无佩玉之节乎？”乃加兽头小绶及佩一只，旧制，五辂于轘上起箱，天子与参乘同在箱内。稠曰：“君臣同所，过为相逼”。乃广为盘舆，别构栏 楯，侍臣立于其中。于内复起须弥平坐，天子独居其上，自余麾幢文物，增损极多，事见《威仪志》。帝复令稠造戎车万乘，钩陈八百连，帝善之，以稠守太府卿。

后三岁，兼领少府监。辽东之役，摄右屯卫将军，领御营弩手三万人。时工部尚书宇文恺造辽水桥不成，师不得济，右屯卫大将军麦铁杖因而遇害。帝遣稠造桥，二日而就。初，稠制行殿及六合城，至是，帝于辽左与贼相对，夜中施之。其城周廻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阙，面别一观，观下三门，迟明而毕。高丽望见，谓若神功。是岁，加金紫光禄大夫。明年，摄左屯卫将军，从至辽左。

十二年，加右光禄大夫，从幸江都。遇宇文化及作乱，以为工部尚书。化及败，陷于窦建德，建德复以为工部尚书、舒国公。建德败，归于大唐，授将作少匠，卒。

袁 充 传

——《隋书》卷六九

【说明】袁充（公元 543—618 年），字德符，原籍为陈郡阳夏（今河南省太康县）人，后寓居丹阳（今江苏省南京市）。袁充头脑机警，极善揣摸皇帝心意，趋炎附势，迎合圣意，深得杨坚和杨广的宠信。大业十四年，为宇文化及所杀，享年七十五岁。

袁充爱好道家法术，精通星占测候之学。开皇十四年（公元 594 年），他创制晷影漏刻，仪器由晷表和漏刻两部分组成，在平仪上均匀分布十二辰位，中心立表，随日影所指十二辰刻度，来验证漏水的节奏。由于十二辰时间不同，漏水多少也互有差异，如冬至日出东南辰位，日入西南申位，昼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其中子、丑、亥三辰各漏二刻，寅、戌二辰各漏六刻，卯、酉二辰各漏十三刻，辰、申二辰各漏十四刻，巳、未二辰各漏十刻，午辰漏八刻。袁充的数据虽证明了地平日晷的分划不应该是均匀的，但因他不懂浑天黄道去极之数，竟提出用这种不均匀时辰制度来改变旧有的漏刻制度，虽然施用，却并不精密。开皇十七年（公元 597 年），袁充测得夏至日影长度为 1.45 尺，测量的地点可能在

阳城（今河南省登封县告城镇），按当地的纬度计算，误差确实很小。

袁充，字德符，原籍陈郡阳夏人，后移居到了丹阳。祖父袁昂，父亲袁君正，都曾作过南朝梁国的侍中。袁充少年机敏，领悟力强，十几岁的时候，父亲的朋友到家里作客，当时已值初冬，袁充却还穿着葛布做的轻薄衣衫。于是客人戏弄袁充说：“袁郎子穿的除了细葛布就是粗葛布，让风一吹多冷啊。”话音刚落，袁充立刻引用《诗经》的话答道：“唯有这些葛布，穿着才不感到厌倦。”客人们都因此对他大加赞赏。袁充在陈国作官的那年，年仅十七岁，任秘书郎。他先后作过太子舍人、晋安王文学、吏部侍郎和散骑常侍等官。

陈国灭亡后，袁充归附了隋朝，先后任蒙州和鄜州司马。袁充喜欢道家法术，对星占测候之学有着深刻的理解。由于这种才能，他又兼任太史令一职。当时，隋文帝将要废黜皇太子杨勇，正在彻底整顿太子手下的官吏，袁充得知文帝非常相信瑞符预兆后，极力迎合文帝的心意，进言说：“臣连续观测了天象，皇太子应当废黜。”文帝认为他说得很对。后来袁充又表奏文帝，对隋朝建立以后，每日白天的长度日渐增长的现象大加议论。他说：“在开皇元年时，冬至这天太阳投射到圭表上的影子长度为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这时以后，冬至日时表影的长度就愈来愈短了。到开皇十七年，冬至这天的表影便只有一丈二尺六寸三分长了。而开皇四年的冬至那天，在洛阳测量日影，影长却有一丈二尺八寸八分。开皇二年，夏至这天太阳投射的表影长度为一尺四寸八分，自这时

以后，夏至日时表影长度也愈来愈短了。至开皇十六年，夏至这天的影长只有一尺四寸五分了。《周官》记载，度圭用来确定日影的准确长度，那时测得的夏至表影的长度为一尺五寸。郑玄说：‘冬至时的表影长度为一丈三尺。’现在开皇十六年夏至时的表影长度比过去测定的影长短了五分，而开皇十七年冬至时的影长比过去短了三寸七分。太阳距天北极的距离近，表影短而白天长，离天北极的距离远，表影长而白天短，太阳在靠里的轨道上运行，离北天极的距离就近，在靠外的轨道上运行，离北天极的距离就远。《尧典》说：‘白天最短的时候，昴星就在傍晚出现在正南方，这个标志可以用来确定冬至。’根据昴星在傍晚出现在南方中天的时间计算，就可以知道在帝尧时代，冬至时太阳将运行到女宿十度。用历法推算，自开皇以后，冬至时太阳将运行到斗宿十一度，与唐尧时代一样，离北天极的距离都很近。考查《春秋元命包》，书中说：‘日月沿靠近北天极的轨道上升起，北斗才能正常运转，天神上帝才能崇高而有威灵，贤明的君王才能建功立业，光宗耀祖。’京房的《别对》也说：‘在太平盛也，太阳会沿着靠近北天极的轨道运行，天下平安无事的时代，太阳会沿着距北天极适中的轨道运行，在以强凌弱的动乱时代，太阳就会沿着距北天极最远的轨道运行。’如今伟大的隋朝已建邦立业，气数已开始运转，向上感应了苍天，大隋立国之时，恰恰是冬至日影最短、白天最长的时候，这种情况自古以来从未有过。”文帝听后非常高兴，于是告示天下。接着又大兴劳役，动土功，于是增加课税，役丁和工匠们苦不堪言。

隋仁寿（公元601—604年）元年，袁充上奏文帝，陈述

了六十多条有关文帝的本命与阴阳律吕相合的方面，他上表说：“皇帝刚诞生的时候，不仅有神光瑞气和吉祥的征兆，而且陛下所经历过的所有本命年，甚至出生的月份和生日，都与天地日月、阴阳乐律的运转相符，表里如一。这正是帝王诞生时的奇异现象，也是帝王之位的开始。如今万象更新，年号也改作仁寿，这样一来，年岁、月份、日期、时辰又都回到了帝王诞生的时刻，与那时的情景完全相同了，这就明确显示了顺合天地的心愿，符合了仁者长寿的道理。所以我们能够知道，大隋将国运长久，永世不绝。”文帝大喜，赏赐袁充的财物极为丰厚，同辈之中没有人能与他相比。

仁寿四年（公元604年）是甲子年，隋炀帝刚刚即位，袁充就和太史丞高智宝禀奏道：“去年冬至，白天的时间更长了，今年皇帝即位，与帝尧承受天命那年的情况正好一致。从前当帝尧受授天命四十九年后，正好到了上元第一纪中的甲子年，帝王所颁行的历法的正月朔日，正好起于十一月庚戌日，而这一天又恰是冬至。今天陛下继承皇位，这一年也正好是上元第一纪中的甲子年，天下颁行历法的正月朔日也正是十一月庚戌日，而这一天恰恰也是冬至，与帝尧时代的情况完全相同。自帝尧放勋到现在，共经历了八个上元，朝代更迭，时间已经很久了，但却没有一年象仁寿甲子年那样与帝尧时代相合。臣郑重地解释一下，第一纪甲子，太一神在一宫，天目文昌将在武德神位，阴阳历数都与唐尧时代相符。帝尧生于丙辰年，受天命于丙子年，这种配合只能得到三合或五合，不如己丑与甲子的配合，可以使子与丑、寅与亥、卯与戌、辰与酉、巳与申、午与未六合齐整。它顺应一元三统的周期，符

合五纪九章的时间，与帝尧的历数可以相同，与陶唐氏的功业可以相比。这真是所谓的光明伟大的唐尧，唐尧乃是光明伟大的人啊！”而后，他频频委婉地劝说齐王杨暕，让他率群臣百官上奏章祝贺。在此之后，发生了一种不祥的天象，荧惑（火星）在太微垣内竟停留了几十天，当时朝廷正在修筑宫殿，因而征役繁重，于是袁充上表说：“陛下只要修治德政，施德于民，荧惑就会离开太微垣了。”这时群臣举朝拜贺。隋炀帝大喜，先后赏赐群臣的财物数以万计。当时国家的政务军务繁多，袁充等到炀帝想要有所作为的时候，便及时上表，声称天象已经显示了需要有所变更，用这种方法取悦于炀帝。

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袁充升任内史舍人，他跟随炀帝征伐辽东，并被封为朝请大夫、秘书少监。东征失败后，天下大乱，炀帝因最初在雁门遇险，加之盗贼四起，整日心神不宁。袁充又假托天文，上表陈述天有祥瑞之象，向炀帝献媚。他说：

臣听说皇天辅助有德行的人，皇天也保佑谦逊的人，四季与天、地、人的分配都整齐而有规律，日月星辰也都显示了应和的征象。尊敬的陛下掌握着谶纬书而统治百姓，遍施恩泽而化育八极，以造福百姓为己愿，而不以陛下一人的享受为目的，当走在天象前面的时候，天并不违背陛下的想法，当走在天象之后的时候，必定依天时来行事。陛下当初登基为帝，正值上元之纪，占卦得到乾卦的第一阳爻，又与天命符合。凡事总效法圣人冥与契，所以能常常符合天道。我郑重地说，自去年以来，天象显示出祥瑞的星象，不差毫厘，被正式记录下

来的尤其奇异，上天降赐祥瑞，预示着将打败突厥，可以陈述有关的七件事。

第一，去年八月二十日夜，一颗流星大如斗，出现在王良星的北边，正好落在突厥的军营中，巨大的响声象墙塌了一样。第二，八月二十九日夜，又有一颗象斗一样大的流星在羽林星座出现，向北落下，正值北方。依星占的说法，连续两夜流星落到敌营中，敌人必定失败溃散。第三，九月四日夜，连续有两颗斗大的星，出现在北斗星的斗勺四星处，向东北坠落。依星占的说法，北斗星主掌征杀伐戮之事，敌人必败。第四，岁星（木星）主掌福善恩德之事，连续在京城大兴和东都洛阳所属的分野天区运行。依星占的说法，出现这种天象是国家的福善。第五，七月期间，荧惑停留在羽林星座，九月七日已经离开。依星占的说法，这种天象出现后不过三日，敌人必定溃败。第六，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夜，有一颗象火一样红的流星，从东北向西南落入敌人主帅卢明月的营中，砸碎了他的辎车。第七，十二月十五日夜，通汉镇的北面有赤气横贯北方，这是突厥将要灭亡的征兆。经过核定《城录》一书的记载，河南与洛阳都为甲子，与乾卦的第一阳爻及上元甲子年符合。这些地方都是福地，永远不会使人有什么烦忧。回顾历史，静观前朝，过去这些祥瑞的征象只是在不同时期交替出现，而今日却在大隋一朝一齐出现，这难道不是苍天辅助有才德的人，帮他一起歼灭恶人妖孽，将要东夷北狄等众多的异族赶出东豸，沉尸北溟，用捷报上告东岳泰山神

祇，让汾水的河伯清静安宁吗。

袁充将表章录好呈上，炀帝大喜，破格封他为秘书令，对他更为亲宠。炀帝每次打算出征讨伐，袁充总能预先知道，于是他假托星象，帮助促成炀帝的意愿，当朝群臣对此都深为忧虑。后来宇文化及发动兵变，在杀死隋炀帝时也一起杀死了袁充。死时七十五岁。（冯 时 译）

【原文】

袁充字德符，本陈郡阳夏人也。其后寓居丹阳。祖昂，父君正，俱为梁侍中。充少警悟，年十余岁，其父党至门，时冬初，充尚衣葛衫。客戏充曰：“袁郎子絺兮紵兮，凄其以风。”充应声答曰：“唯絺与紵，服之无噉。”以是大见嗟赏。仕陈，年十七，为秘书郎。历太子舍人、晋安王文学、吏部侍郎、散骑常侍。

及陈灭归国，历蒙、鄜二州司马。充性好道术，颇解占候，由是领太史令。时上将废皇太子，正穷治东宫官属，充见上雅信符应，因希旨进曰：“比观玄象，皇太子当废。”上然之。充复表奏，隋兴已后，日景渐长，曰：“开皇元年，冬至日影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尔渐短。至十七年，冬至影一丈二尺六寸三分。四年冬至，在洛阳测影，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年，夏至影一尺四寸八分，自尔渐短。至十六年，夏至影一尺四寸五分。《周官》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之影尺有五寸。郑玄云：‘冬至之影一丈三尺。’今十六年夏至之影，短于旧影五分，十七年冬至之影，短于旧影三寸七分。日去极近则影短而日长，去极远则影长而日短，行内道则去极近，外道则去极远。《尧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据昴星

昏中，则知尧时仲冬，日在须女十度。以历数推之，开皇已来冬至，日在斗十一度，与唐尧之代去极并近。谨案《春秋元命包》云：‘日月出内道，璇玑得常，天帝崇灵，圣王祖功。’京房《别对》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世行下道。’伏惟大隋启运，上感乾元，影短日长，振古未之有也。’上大悦，告天下。将作役功，因加程课，丁匠苦之。

仁寿初，充言上本命与阴阳律吕合者六十余条而奏之，因上表曰：“皇帝载诞之初，非止神光瑞气，嘉祥应感，至于本命行年，生月生日，并与天地日月、阴阳律吕运转相符，表里合会。此诞圣之异，宝历之元。今与物更新，改年仁寿，岁月日子，还共诞圣之时并同，明合天地之心，得仁寿之理。故知洪基长算，永永无穷。”上大悦，赏赐优崇，侔辈莫之比。

仁寿四年甲子岁，炀帝初即位，充及太史丞高智宝奏言：“去岁冬至，日景逾长，今岁皇帝即位，与尧受命年合。昔唐尧受命四十九年，到上元一纪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陛下即位，其年即当上元第一纪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正与唐尧同。自放勋以来，凡经八上元，其间绵代，未有仁寿甲子之合。谨案：第一纪甲子，太一在一宫，天目居武德，阴阳历数并得符同。唐尧丙辰生，丙子年受命，止合三五，未若己丑甲子，支干并当六合。允一元三统之期，合五纪九章之会，共帝尧同其数，与皇唐比其踪。信所谓皇哉唐哉，唐哉皇哉者矣。”仍讽齐王暕率百官拜表奉贺。其后荧惑守太微者数旬，于时缮治宫室，征役繁重，充上表称“陛下修德，荧惑退舍”。百僚毕贺。帝大喜，前后赏赐将万计。时军国多务，充候帝意欲有所为，便奏称天文见象，须有改作，以是取媚

于上。

大业六年，迁内史舍人。从征辽东，拜朝请大夫、秘书少监。其后天下乱，帝初罹雁门之厄，又盗贼益起，帝心不自安。充复假托天文，上表陈嘉瑞，以媚于上曰：

臣闻皇天辅德，皇天福谦，七政斯齐，三辰告应。伏惟陛下握录图而驭黔首，提万善而化八紘，以百姓为心，匪以一人受庆，先天罔违所欲，后天必奉其时。是以初膺宝历，正当上元之纪，乾之初九，又与天命符会。斯则圣人冥契，故能动合天经。谨按去年已来，玄象星瑞，毫厘无爽，谨录尤异，上天降祥、破突厥等状七事。

其一，去八月二十八日夜，大流星如斗，出王良北，正落突厥营，声如崩墙。其二，八月二十九日夜，复有大流星如斗，出羽林，向北流，正当北方。依占，频二夜流星坠贼所，贼必败散。其三，九月四日夜，频有两星大如斗，出北斗魁，向东北流。依占，北斗主杀伐，贼必败。其四，岁星主福德，频行京、都二处分野。依占，国家之福。其五，七月内，荧惑守羽林，九月七日已退舍。依占，不出三日，贼必败散。其六，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夜，有流星赤如火，从东北向西南，落贼帅卢明月营，破其櫜车。其七，十二月十五日夜，通汉镇北有赤气亘北方，突厥将亡之应也。依勘《城录》，河南洛阳并当甲子，与乾元初九爻及上元甲子符合。此是福地，永无所虑。旋观往政，侧闻前古，彼则异时间出，今则一朝总萃。岂非天赞有道，助歼凶孽，方清九夷于东豸，沉五狄于北溟，告成岱岳，无为汾水。

书奏，帝大悦，超拜秘书令，亲待逾昵。帝每欲征讨，充皆预知之，乃假托星象，奖成帝意，在位者皆切患之。宇文弼及杀逆之际，并诛充，时年七十五。

刘 焯 传

——《隋书》卷七五

【说明】刘焯（公元 542—608 年），字士元，信都昌亭（今河北省冀县一带）人。曾任太学博士等职。隋朝初年，隋文帝宠信的张宾修定《开皇历》，仍循古制，并仗势压制刘孝孙、刘焯等人使用定朔法的主张，诬陷他们抵毁天历，惑乱视听，致使刘焯被斥罢官，贬为庶民。此后他悠闲散居于家中，以教书著述为生。隋文帝仁寿四年（公元 604 年），刘焯在研究数学和天文学的基础上，写成《历书》十卷，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皇极历》。但其中内容与员外散骑侍郎领太史令张胄玄修定的新历颇不相同，因而遭到张胄玄及隋炀帝宠臣太史令袁充的排斥，致使这部历法终于未能得以颁行。《皇极历》有着多方面的革新，其中最主要的是为了解决日、月不均匀运动问题而创立等间距二次内插法公式，推算日月食所在位置、交食的始终时刻、食分大小、以及应食不食，不应食而食等，这些方面都是过去的历法所没有的。此外，推算五星也均精密于前历，所用岁差的数值也有较大的改进。他并创有定朔法、定气法和躔衰法（即日行盈缩之差），采用定气的方法来计算日行度数和交令时刻，均为后世所师法。著

有《稽极历书》十卷，《历书》十卷及《五经述议》等，已佚。清人辑有《尚书刘氏义疏》一卷。《传》以刘焯卒于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实误。

刘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父亲刘洽，官拜郡功曹。刘焯生就一副尖而降起的前额，颇似犀牛，背驼似龟，但目力极佳，可以看得很高很远。他天资聪明，思维敏捷，性格稳重深沉，体弱而不喜玩耍。少年时代，他与河间人刘炫结盟为友，一起跟随同郡的刘轨思学习《诗经》，同时又向广平人郭懋当学习《左传》，向阜城人熊安生求教《周礼》、《仪礼》和《礼记》。由于三位老师的学识不能满足他们的求知欲望，因此都未能等到结束学业就离开了。武强交津桥人刘智海一向喜爱搜求古代典籍，家中藏书宏富，刘焯与刘炫于是来到他那里读书，埋头于经典整整十年。尽管艰苦的求学生活常使得穿衣吃饭都无法接济，但他们都感到安祥和平静。经过努力，刘焯终于以深通儒家学说而闻名，作了州博士。刺史赵昺推荐刘焯任从事，并荐举他应试秀才，通过了射策甲科的考试。此后，刘焯与著作郎王劭共同编纂国史，同时参加议定乐律和历法，并且仍然在门下省内值班，以备君主顾视问讯。不久，刘焯被封为员外将军。后又与其他儒者在秘书省共同考核审定群臣的言论。在休假回乡期间，刘焯被县令韦之业推荐，作了功曹。旋即重返京城，他与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国子寺祭酒苏威、国子寺祭酒元善、博士萧该、何妥、太学博士房晖远、崔崇德、晋王文学崔赜等人，在国子寺共同研究古今的疑难问题，这些问题都是过去的贤达之

士所不能解决的。每次讨论时，当刘焯刚一就座，辩论诘问之声顿时响起，势头之猛难以阻挡，但即使如此，竟没有一个人能把他驳倒，杨素等人无不叹服钦佩他精辟的议论和广博的学识。隋文帝开皇六年，洛阳石经被运到京城长安，由于石经历久经年，上面的文字多磨泐不清，已没有人能够辨识了。刘焯奉隋文帝之命，与刘炫等人对其进行考证和校定。

后来，刘焯在国子寺参加释奠告师礼的时候，曾与刘炫讨论礼仪，俩人的谈话大大伤害了在场的其他儒者，这些人都对他俩满怀嫉恨，于是遭到匿名诬告信的大肆诽谤，致使刘焯被罢官去职，废为庶民。卸官之后，刘焯悠闲自得地回到家乡，专以教书著述为生，孜孜不倦。他对贾逵、马融、王肃和郑玄所遗留的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多有匡正，评定是非，对于《九章算术》、《周髀算经》和《七曜历书》等十几部著作，凡涉及推算日月运行的规律、度量山川地理的方法，无不详细考查核实它的来源，彻底揭示它的奥秘。刘焯著有《稽极》十卷、《历书》十卷和《五经述议》，都流行于世。刘焯的朋友刘炫也很聪明，他知识广博，名气稍次于刘焯，因此与刘焯一起被时人并称为二刘。天下有名的儒者，为了向刘焯求教疑难问题或接受指导，不远千里而来的人多得不可胜数。当时有人评论说，几百年以来，凡学识渊博、精通儒学的人，没有能够超过他的。然而刘焯心胸狭窄，且贪图财利，十分吝啬，不向他致送见面薄礼的人就根本得不到他的教诲，当时的人都因此而看不起他。当杨勇被废黜太子贬为庶民后，听说刘焯将要召见他，但刘焯还未来得及拜见杨勇，文帝即下令让他侍奉蜀王杨秀，刘焯并不喜欢这样做，所以很久没

有到任，蜀王得知后大为恼怒，派人将刘焯套上枷锁，送到蜀地，流放到边关充军。后来，刘焯又被任用掌管校勘图书典籍。蜀王杨秀获罪被废后，刘焯又与其他儒者一起编修考定礼制乐律，官拜云骑尉。

隋炀帝即位后，刘焯被升为太学博士，不久即因病辞官。几年后重被征召，以备君主顾视问讯。他曾写过一部《历书》，因其中的很多见解与太史令张胄玄不同，所以被胄玄排斥，未能颁行。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刘焯去世，享年六十七岁。后刘炫为他请求谥号，但朝廷没有同意。

（冯 时 译）

【原文】

刘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父洽，郡功曹。焯犀额龟背，望高视远，聪敏沈深，弱不好弄。少与河间刘炫结盟为友，同受《诗》于同郡刘轨思，受《左传》于广平郭懋当，问《礼》于阜城熊安生，皆不卒业而去。武强交津桥刘智海家素多坟籍，焯与炫就之读书，向经十载，虽衣食不继，晏如也。遂以儒学知名，为州博士。刺史赵熹引为从事，举秀才，射策甲科。与著作郎王劭同修国史，兼参议律历，仍直门下省，以待顾问。俄除员外将军。后与诸儒于秘书省考定群言，因假还乡里，县令韦之业引为功曹。寻复入京，与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国子祭酒苏威、国子祭酒元善、博士萧该、何妥、太学博士房晖远、崔崇德、晋王文学崔赜等于国子共论古今滞义，前贤所不通者。每升座，论难锋起，皆不能屈，杨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运洛阳《石经》至京师，文字磨灭，莫能知者，奉敕与刘炫等考定。

后因国子释奠，与炫二人论义，深挫诸儒，咸怀妬恨，遂为飞章所谤，除名为民。于是优游乡里，专以教授著述为务，孜孜不倦。贾、马、王、郑所传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算术》、《周髀》、《七曜历书》十余部，推步日月之经，量度山海之术，莫不核其根本，穷其秘奥。著《稽极》十卷，《历书》十卷，《五经述议》，并行于世。刘炫聪明博学，名亚于焯，故时人称二刘焉。天下名儒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里而至者，不可胜数。论者以为数百年已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然怀抱不旷，又嗇于财，不行束修者，未尝有所教诲，时人以此少之。废太子勇闻而召之，未及进谒，诏令事蜀王，非其好也，久之不至。王闻而大怒，遣人枷送于蜀，配之军防。其后典校书籍。王以罪废，焯又与诸儒修定礼律，除云骑尉。

炀帝即位，迁太学博士，俄以疾去职。数年，复被征以待顾问，因上所著《历书》，与太史令张胄玄多不同，被驳不用。大业六年卒，时年六十七。刘炫为之请谥，朝廷不许。

刘炫传

——《隋书》卷七五

【说明】刘炫（公元 546—613 年），字光伯，河间景城（今河北省献县东北）人。他通晓儒学及天文历算，少年时代即与刘焯并称“二刘”。刘炫从小有神功，他眼睛明亮、视日而眼不花，口、眼、耳、双手同时进行五种不同的活动，竟无差错。刘炫初为北周户曹从事，隋朝建立后，他奉敕与著作郎王劭等人共同撰修国史，同时还参与修定天文律历及《五礼》，因授旅骑尉。隋炀帝在位时，封他为太学博士，不久即回归河间。后来，他被弟子们延入参加了抗隋起义军。起义军兵败，刘炫重新投奔县城时却被拒之城外，于寒夜中冻饿而死。弟子们追谥为宣德先生。他曾伪造《连山易》、《鲁史记》等古佚书，另著有《春秋攻昧》、《尚书述议》、《五经正名》、《算术》等百卷之众，多已亡佚。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有所辑录。

刘炫，字光伯，河间景城人。他少年时代即以聪明勤勉著称，与信都人刘焯一起闭门读书，整整十年，足不出户。刘炫眼睛明亮，双眼直视太阳，竟不会昏黑发花，他记忆力强，

对所见所闻心领神会，在这方面当时没有人能与他相比。他左手画方，右手画圆，口中诵读，眼睛数数，耳朵听音，五件事同时进行，竟没有一点遗漏和错误。北周武帝宇文邕平灭北齐后，瀛州刺史宇文弼荐举他任户曹从事。后来，刺史李绘命他代理礼曹从事，于是刘炫以办事干练而知名于世。一年多以后，在隋朝开皇年间，刘炫奉隋文帝杨坚之命，与著作郎王邵同修国史。不久，他奉命在门下省内值班，以备君主顾视问询。同时，他还奉诏与其他通晓天文历数的学者共同修定天文、乐律和历法，并兼在内史省参与考核审定群臣的言论，由于他才能出众，内史令、博陵人李德林对他甚相礼待，格外尊敬。刘炫虽然先后在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工作，但最终竟没有获得任何官爵，而只是帮助各县掌管征收田租和征调劳役的事务而已。当时，他向内史省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内史省将他的陈述转送到了吏部，吏部尚书韦世康这才询问刘炫究竟有些什么才能。于是，刘炫自己写成状子，状文说：“凡古人为《周礼》、《礼记》、《毛诗》、《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左氏传》、《孝经》、《论语》所做的注释，如孔安国、郑玄、王肃、何休、服虔、杜预，共十三家，虽然对每个人所做的注释的义理的理解有精有粗，但却都能讲习教授。对于《周易》、《仪礼》和《春秋谷梁传》，用功则稍差一些。除经典之外的史传、诸子、诗文，以及各种善言美事，都已熟记于心。对于天文征验，乐律历法，可以做彻底的核查和精确的推算。至于公文私笺，从来就没有让人帮助代写过。”吏部对刘炫的陈述并没有认真对待，竟然未做详细地考核，然而，在朝的十多名知名人士，都担保证明刘炫所

言与事实相符，于是他被授官作了殿内将军。

当时，大臣牛弘上奏隋文帝，请求朝廷在全国搜购征求古代遗留下来的和已经散失的书籍，刘炫于是伪造古书，共百余卷之多，题名为《连山易》、《鲁史记》等，抄好后送呈官府，领赏而去。后来有人发现了伪书，状告刘炫，刘炫虽经赦放而免于死罪，但由于犯事却被官府除名，他回到家乡，以教书授业为生。太子杨勇听说刘炫后要召见他。刘炫回到京城后，隋文帝下令让他侍奉蜀王杨秀，他拖延着迟迟没有前往。蜀王得知此事大为恼怒，命人将他戴上枷锁，遣送到益州。到达益州后，杨秀把他安排在军幕中充当将佐，并常常令他手执杖棍作为门卫。不久，刘炫得到释免，杨秀让他掌管校勘史籍。当时，刘炫仿照屈原的《卜居》，作成一篇《筮涂》，聊以寄托自己的心意。

蜀王杨秀因罪被废为庶民后，刘炫开始与儒者们一同修定《五礼》，并授官旅骑尉。当时，吏部尚书牛弘提出建议，认为要礼待诸侯，废除庶亲之礼，大夫之礼要降低一级。今天的上柱国，其地位虽不同于古代的诸侯，但与大夫还是可以相比的。其官秩为二品，最好按照庶亲礼制的标准降低一级。对于这些建议，当时讨论礼制的人多认为可行。刘炫则反驳道：“古代入仕做官的人，只有宗族中的嫡长子一人而已，庶子是不能加官晋爵的。由于这个原因，古代先王才重视嫡系亲族，在宗族中，只有嫡长子才有分享爵禄的资格。宗族中的成员与嫡长子的关系虽然疏远，但嫡长子一旦丧亡，族人还是要穿三个月的丧服，这实在是由于家族成员蒙受了嫡长子的恩典。如今做官的人，要根据其才能晋升职位，而不

受嫡亲和庶亲的限制，这一点与古代的情况已有不同，哪有降级的道理。今天所见的那些地位高贵的人，已经很少有近亲了，如果再降低他们的礼制，那么，老百姓之间的关系变得疏远和淡漠，就要从此开始了。”于是，此事就这样平息了。

隋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朝廷将隶属国子监的京城四门学校和各州县的学校统统废除了，只留置太学，设太学博士二人，学生七十二人。刘炫于是上表隋文帝，声称废除学校的做法不妥。所论情感非常真挚，道理非常中肯，但高祖文帝并未采纳。开皇末年，国家财力已很富足，于是朝野人士都图谋进取辽东。刘炫认为，辽东不可征伐，并作《抚夷论》，用来含蓄地劝告人们，但在当时竟没有人能够领悟它的意义。直到隋炀帝大业末年，隋军先后三次征伐辽东都未能取胜，刘炫的话才得以验证。

隋炀帝杨广即位后，牛弘推荐刘炫修定法律条文。在高祖杨坚统治的时代，充任主办文案一类的官更多是小人，他们长期为人为事奸猾邪恶，违抗干扰君命，当时的形势迫使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另外，当时世风衰败，妇人不守节操。于是根据这种情况，订立制度，州县长官的属吏三年一换，九品官的妻子不许再嫁。刘炫著文论争，认为这种做法不可行，最后牛弘竟然听从了。从各州设置学官，直到为九品以下的小官吏按时发放银子和粮食等补给，这些事情都是由刘炫首先提议开创的。牛弘曾从容地问刘炫：“根据《周礼》的记载看，当时贤能之士很多，而管理财货文书出纳的小吏却很少，如今朝廷中掌管文书的令史比过去多出百倍。地方上佐政的判官虽经大大裁减，仍无济于事，这倒底是什么原因呢？”刘

炫回答道：“古人委任官吏，都要督责他必须完成任务，年终要考核政绩，案卷不需要重新校理，公文也不必了解得太多，官府中办事小吏的任务，只是掌握和了解主要的纲目而已。而今天的公文案卷，经常要考虑着重新整理，经过斟酌锤炼后如果认为不够严密，还要回首查证百年之前的旧案，所以谚语说：‘年老的官吏都是怀抱着案卷死去的。’古今的区别，就如同这些事一样，相差太大了，事务繁多是政治之弊，目前形成的这种局面，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牛弘又问刘炫：“魏、齐统治的时代，掌管文书的令史整天都很安逸舒缓，办事不慌不忙，而在今天，事情多得简直让人都来不及休息，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刘炫答道：“齐国设立的州不过几十个，分别由太尉、司徒、司空及中央政府在各州设立的机构依次统领管辖。文书传达下去，只不过十条而已。而如今全国设置的州有三百个之多，这是第一件繁杂的事情。过去在各州只设立负责文书簿籍、掌管印鉴的主簿，各郡只设立辅助守令的守丞，各县只设县令。对于地方政府中需配备的官员，则由各地方长官自己征召，至于接受皇帝的诏令而赴任作官的，每州只不过几十名。今天则不同，无论大官小官，一律都由吏部委任，一点细微的小事，也都属于考核功绩的内容，这是第二件繁杂的事情。精减官吏不如精减事务，精减事务不如人们心地恬静，无忧无虑。不精减官吏，不精减事务，而指望着人人都能安逸舒缓，怎么可能实现得了呢？”牛弘对刘炫的话非常赞同，但是却无法照此实行。后来纳言杨达举荐刘炫，因他博学洽识，文章出色，经射策考核，刘炫成绩优秀，于是被封为太学博士。一年多以后，刘炫因所授官阶低

微，离任去职，回到了长平。后来他奉杨坚的旨令，追到了文帝出行所在的地方。但当时有人对杨坚说，刘炫品行不端，文帝于是打消了继续任用他的念头，刘炫就这样又回到了家乡河间。

当时各地的盗贼蜂踊而起，纷纷起义，致使粮价飞涨，价格昂贵，人们再也不诵文读书了，教师们也不再教学授业了。刘炫与妻子身居两地，相去百里，音讯断绝，因此他郁郁寡欢，很不得志，于是自己撰写了一篇赞文，赞文说：

学识渊博的人如司马相如、杨子云、马季长、郑康成等，都撰写叙述自己生平风范的文章，所以流芳百世。我怎么敢向往着能象前辈贤者一样让世人永记，令后人耻笑。只因我日近黄昏，寿命将终，老朋友都已飘失零落，弟子们也都离我而去，一旦我伴着清晨的露水突然死去，把尸魂埋葬在北方的原野之中，亲朋故友连我的心意都无法了解，后辈来人连我的踪迹也无法查寻，希望在我还能苟延残喘的时候，略抒心意，把它留给来人，让州里中的百姓看看，使将来的俊逸贤达之士能够了解我的心志。

我从小到老，自头发长到可以盘髻直到乌发变白，作为婴孩，总是被慈祥的亲人所宽恕，从未挨过木棒和荆杖的责罚，作为学生，总是得到高明之师的爱悯，从未受到刑具的笞罚。直至能够以宽厚的态度对待人民和亲人，平等地与同辈人结交往来，重物轻身，先人后己。过去在幼小的时候，总能给长者带来欢乐，后来年纪大了，也经常能够接近后辈。作为学生学习新知，能服从老师

的教诲，从不感到厌烦，作为师长教诲别人，能辛勤传授，从不感到疲倦，深远高雅的感情很少去满足它，心中渴望的事情总是未能去实现。反省自己的一生，回顾从小到老走过的道路，有四件事值得大大庆幸，而有一件事却令人深深遗憾。我生性本来很愚笨迟钝，家业贫寒，由于受到父辈兄长的惠益，才勉强跻身于士大夫的行列，于是得以遍览典谟诰文，涉猎学习古今之事，使自己小小的善行能在隐居之地闻名，使自己的名声能在邦国传扬，这是第一件幸事。我在人世间时而隐居，时而从政，与世俗随波逐流，屡屡愧居那些空费心力的职位，长期执掌刑罚事务，自己的名字从未见于御史弹劾官吏的白简，自己的事迹也从未用记录罪人名册的红笔书写过，树立自己的品德修养，树立自己的行为准则，在这些方面还有很多令人惭愧的地方，看看我的心，看看我的脚，名誉与身体已可以保全，将能善终，差不多是可以免于灾祸和刑戮的了，这是第二件幸事。以我浅陋的才能和学识，却屡屡感动了神灵，以我卑贱的地位，却常常能登临祖庙，赤骥、骐驎，良驹骏马并首而驰，鸛鸟、鸿雁，朝官班行比翼齐飞，我在中书省整理书籍卷帙，于麒麟阁记述功臣言行，遇事可以参谒宰相和三公，前往请教百官，享受到了圣上赐予的极大的礼遇和恩典，使我增荣添贵，地位和资望都得到了改变，这是第三件幸事。我的生命就象计算白天时间的刻漏一样快要终了，我年事已高，只有徒自悲叹，于是辞官退職，重新穿上入仕前的衣服，回到了家乡，玩读文学历史以怡乐

精神，观赏游鱼飞鸟以排遣忧虑，出门饱览自然景物，登临园圃沼池种植瓜蔬，缓步代车，平和无祸，以此为大吉，这是第四件幸事。我企盼着美好盛世的来临，对道德教育的衰败深为感慨，我努力继承先辈儒者的足迹，对群臣言论的芜秽甚感悲伤，为了广泛地传扬古代典籍，努力纠正偏失和谬误，我刚刚完成了对法令的修定与撰写，结束了对未来工作的计划和安排，但是上天违背人们的愿望，不给我任何行动的机会。社会动荡不宁，学校都已废弃，学术不能在今天得以丰富和完善，事业不能留传给子孙后代。难道真的就要因为这些事情使我身死黄泉都会心怀悔恨吗？这是我深深遗恨的一件事。

当时刘炫在郡城中居住，由于城中粮尽，他的弟子多投奔了起义的盗贼，刘炫因生活穷困，食品匮乏，弟子们都很可怜他，所以来到城下索要刘炫，郡官于是将刘炫放出城，交给了他们。盗贼带着刘炫，攻陷了一座又一座城堡。不久，起义军被朝廷的军队打败，刘炫饥饿难耐，无依无靠，于是重新投奔到了县城。城中首领觉得刘炫与盗贼相互患通，惟恐日后生变，于是紧闭城门，将刘炫拒之城外。当时季节已晚，夜晚冰寒风冽，刘炫就这样饥寒交迫而死，时年六十八岁。后来，他的弟子们为他追加了谥号，称为宣德先生。

刘炫生性急于与人比高下，争胜负，但也颇为诙谐滑稽，他经常表现得自尊自大，喜欢轻视蔑骂当时社会的人与事，所以深受当权者的排挤，仕途很不顺利。刘炫一生著有《论语述议》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经正名》十二卷，《孝经述议》五卷，《春秋述议》四十卷，《尚书述议》二十卷，《毛

诗述议》四十卷，《注诗序》一卷，《算术》一卷，并行于世。

(冯 时 译)

【原文】

刘炫字光伯，河间景城人也。少以聪敏见称，与信都刘焯闭户读书，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视日不眩，强记默识，莫与为侔。左画方，右画圆，口诵，目数，耳听，五事同举，无有遗失。周武帝平齐，瀛州刺史宇文弼引为户曹从事。后刺史李绘署礼曹从事，以吏干知名。岁余，奉敕与著作郎王劭同修国史。俄直门下省，以待顾问。又与诸术者修天文律历，兼于内史省考定群言，内史令博陵李德林甚礼之。炫虽遍直三省，竟不得官，为县司责其赋役。兹自陈于内史，内史送诣吏部，吏部尚书韦世康问其所能。炫自为状曰：“《周礼》、《礼记》、《毛诗》、《尚书》、《公羊》、《左传》、《孝经》、《论语》孔、郑、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虽义有精粗，并堪讲授。《周易》、《仪礼》、《谷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美事，咸诵于心。天文律历，穷核微妙。至于公私文翰，未尝假手。”吏部竟不详试，然在朝知名之士十余人，保明炫所陈不谬，于是除殿内将军。

时牛弘奏求购求天下遗逸之书，炫遂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后有人讼之，经赦免死，坐除名，归于家，以教授为务。太子勇闻而召之，既至京师，敕令事蜀王秀，迁延不往。蜀王大怒，枷送益州。既而配为帐内，每使执杖为门卫。俄而释之，典校书史。炫因拟屈原《卜居》，为《筮涂》以自寄。

及蜀王废，与诸儒修定《五礼》，授旅骑尉。吏部尚书牛

弘建议，以为礼诸侯绝傍期，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国，虽不同古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傍亲一等。议者多以为然。炫驳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进。由是先王重嫡，其宗子有分祿之义。族人与宗子虽疏远，犹服祭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嫡庶，与古既异，何降之有。今之贵者，多忽近亲，若或降之，民德之疏，自此始矣。”遂寝其事。

开皇二十年，废国子四门及州县学，唯置太学博士二人，学生七十二人。炫上表言学校不宜废，情理甚切，高祖不纳。开皇之末，国家殷盛，朝野皆以辽东为意。炫以为辽东不可伐，作《抚夷论》以讽焉，当时莫有悟者。及大业之季，三征不克，炫言方验。

炀帝即位，牛弘引炫修律令。高祖之世，以刀笔吏类多小人，年久长奸，势使然也。又以风俗陵迟，妇人无节。于是立格，州县佐史，三年而代之，九品妻无得再醮。炫著论以为不可，弘竟从之。诸郡置学官，及流外给廪，皆发自于炫。弘尝从容问炫曰：“案《周礼》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于前，判官减则不济，其故何也？”炫对曰：“古人委任责成，岁终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虑覆治，锻炼若其不密，万里追证百年旧案，故谚云‘老吏抱案死’。古今不同，若此之相悬也，事繁政弊，职此之由。”弘又问：“魏、齐之时，令史从容而已，今则不遑宁舍，其事何由？”炫对曰：“齐氏立州不过数十，三府行台，递相统领，文书行下，不过十条。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纲纪，郡置守丞，县唯令而已。其所

具僚，则长官自辟，受诏赴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从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纳言杨达举炫博学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太学博士。岁余，以品卑去任，还至长平，奉敕追诣行在所。或言其无行，帝遂罢之，归于河间。

于时群盗蜂起，谷食踊贵，经籍道息，教授不行。炫与妻子相去百里，声问断绝，郁郁不得志，乃自为赞曰：

通人司马相如、扬子云、马季长、郑康成等，皆自叙风徽，传芳来叶。余岂敢仰均先达，贻笑从昆，徒以日迫桑榆，大命将近，故友飘零，门徒雨散，溘死朝露，埋魂朔野，亲故莫照其心，后人不见其迹，殆及余喘，薄言胸臆，贻及行迈，传示州里，使夫将来俊哲知余鄙志耳。

余从绾发以来，迄于白首，婴孩为慈亲所恕，捶楚未尝加，从学为明师所矜，榎楚弗之及。暨乎敦叙邦族，交结等夷，重物轻身，先人后己。昔在幼弱，乐参长者，爰及耆艾，数接后生。学则服而不厌，诲则劳而不倦，幽情寡适，心事方违。内省生平，顾循终始，其大幸有四，其深恨有一。性本愚蔽，家业贫窳，为父兄所饶，厕缙绅之末，遂得博览典诰，窥涉今古，小善著于丘园，虚名闻于邦国，其幸一也。隐显人间，沈浮世俗，数忝徒劳之职，久执城旦之书，名不挂于白简，事不染于丹笔，立身立行，惭慙实多，启手启足，庶几可免，其幸二也。以此庸虚，屡动神眷，以此卑贱，每升天府，齐鑣驥驥，

比翼鹈鸿，整缙素于凤池，记言动于麟阁，参谒宰辅，造请群公，厚礼殊恩，增荣改价，其幸三也。昼漏方尽，大耋已嗟，退反初服，归骸故里，玩文史以怡神，阅鱼鸟以散虑，观省野物，登临园沼，缓步代车，无罪为贵，其幸四也。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迟，蹈先儒之逸轨，伤群言之芜秽，驰骛坟典，厘改僻谬，修撰始毕，图事适成，天违人愿，途不我与。世路未夷，学校尽废，道不备于当时，业不传于身后，衔恨泉壤，实在兹乎？其深恨一也。

时在郡城，粮饷断绝，其门人多随盗贼，哀炫穷乏，诣郡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与之。炫为贼所将，过城下堡。未几，贼为官军所破，炫饥饿无所依，复投县城。长吏意炫与贼相知，恐为后变，遂闭门不纳。是时夜冰寒，因此冻馁而死。时年六十八。其后门人谥曰宣德先生。

炫性躁竞，颇俳谐，多自矜伐，好轻侮当世，为执政所丑，由是官途不遂。著《论语述议》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经正名》十二卷，《孝经述议》五卷，《春秋述议》四十卷，《尚书述议》二十卷，《毛诗述议》四十卷，《注诗序》一卷，《算术》一卷，并行于世。

庾季才传

——《隋书》卷七八

【说明】庾季才（公元 515—603 年），新野人（今河南省新野县），秉承家学，精通天文历算。在南朝梁时任太史，封宜昌县伯。梁都破，庾季才被俘后受到优待，任西魏、北周太史，并先后加封上仪同，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临颖伯。隋取代北周，庾季才参与劝进，任通直散骑常侍，封公爵。其一生经历数朝变迁，因长于星象占候，谨慎明断而躲过许多灾祸，得保终身。北周时，庾季才奉命撰《灵台秘苑》一百二十卷，后经（宋）王安礼重修，是传世至今的重要天文文献。他还与明克让等人共同编造了《周历》行用于北周。隋高祖平陈，得到南朝的天文图书仪器和天文学家，庾季才奉命参校南北两朝资料加以整理，画出全天星图（盖图），其中有赤黄二道，内外两规，恒星银河，自此太史观天赖以识星。庾季才父子还奉命编撰了《垂象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是当时天文、地理集大成之作。晚年因为不同意张胄玄、袁充的观点而被免职。

庾季才，字叔奕，新野人。八世祖先庾滔跟随晋元帝过

江，官至散骑常侍，受封为遂昌侯，于是在南郡江陵县安家。祖父庾诜，南朝梁时处士，与同族人庾易同样闻名于世。父亲庾曼倩曾任光禄卿。庾季才小时聪明，八岁背诵《尚书》，十二岁精通《周易》，喜好天文星占。因居丧尽孝而闻名。梁朝庐陵王萧绩让庾季才担任荆州主簿，湘东王萧绎敬重他的学问，请他任外兵参军。御史台建立后，庾季才历任中书郎，兼太史，受封为宜昌县伯。庾季才执意推辞太史职位，梁元帝萧绎说：“汉朝司马迁世代担任太史，魏高堂隆也任过此职。有这些先例，您怕什么呢？”梁元帝也很懂天文历算，曾在一起仰观天象。元帝问道：“我正忧虑祸起萧墙，有什么办法可以平息？”庾季才说：“近来天象预兆政局变化，北方（西魏）将要入侵，陛下应当留重要大臣坐镇荆、陕一带，率领朝廷回到都城，避免战祸。倘若敌寇入侵，至多荆、湘一带失守，国家朝廷可以保全。如果长久在此停留，恐怕不合天意。”皇上当时赞同，但后来与吏部尚书宗懔等商议后，又改变了主意。不久后北兵来犯，江陵陷落，竟和庾季才预料的一样。

北周太祖宇文泰（当时西魏大将）见到庾季才，非常敬重，让他执掌太史职位。每次出征打仗都带着他。赐给他一座房宅，水田十顷以及奴婢牛羊和各种用具物品，对他说：“先生是南方人，在北方不安心。我赐给你这些东西，希望你在此安家，绝了南归之心。你要尽力为我做事，我将用富贵来感谢你。”当初郢都（江陵）陷落时，官吏士绅多半被俘成奴隶。庾季才卖掉所赐的东西，设法赎买亲戚朋友。隋文帝杨坚（当时西魏北周大将）问他缘故，庾季才说：“我听说魏

攻克襄阳，先表彰蒯异度，晋占领建业，为得到陆士衡而欣喜。攻别国以求人材，这是古代圣贤的做法。如今郢都被攻破，国君（梁元帝）就算有罪，官吏士绅又有什么罪，让他们都沦为奴隶！我是外来的人，不敢提意见，但心中实在悲哀，因而设法营救。周太祖大为信服，说：“这是我的过错，做了使天下人失望的事！”于是下令免除梁朝战俘为奴隶的数千人。

北周明帝武成二年（公元560年），庾季才和王褒、庾信同时任麟趾学士。又逐步做到稍伯大夫，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后来宰相宇文护执掌政权，问：“近来天象有什么征兆？”庾季才说：“您对我恩情深厚，我若不说真心话，就象木头石头那样无情无义。近来天象有变，对宰相不利。您最好把政权还给皇帝，请求退休回家。这样可以安享晚年，受到周公旦、召公奭那样的赞美，子孙后代安全富贵，不然的话，我可不敢预料了。”宇文护沉吟很久，对庾季才说：“我本意如此，但辞职的请求得不到批准。您是朝廷的官员，可以依常规朝拜皇帝，不必专门来参见我了。”从此，渐渐疏远，不再私下交往。后来宇文护被灭，周武帝亲自查抄他的书信文件。凡是伪托天命，怂恿篡位的人，都被杀戮。只有庾季才的两封信，通过天象星占，极力劝告宇文护将政权交还皇帝。武帝对少宗伯斛斯征说：“庾季才诚实谨慎，懂得规矩。”于是赐粮食三百石，帛二百段，升任太史中大夫，让他编撰《灵台秘苑》，加任上仪同，封临颖伯，赐食邑六百户。宣帝继承皇位，加封庾季才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增加食邑三百户。

杨坚做宰相时，曾夜里召见庾季才，问他：“我能力不强，担当这样的重任。天时人事，先生认为如何？”庾季才说：“天道的事神秘，难以预料。以人间事看来，改朝换代的事情已定。即使我说不行，您哪能象避让于箕山颖水的许由那样行事呢？”杨坚沉默许久，抬头说：“我如今象骑在兽背之上，想下也下不来了。”赐给彩段五十匹，绢二百段，说：“谢谢您的好意，再慎重考虑一下。”北周静帝大定元年（公元581年）正月，庾季才说：“本月戊戌日早晨，青气如楼阁，出现在首都上空，然后变为紫色，逆风向西行。《气经》说：天不能无云而雨，皇王不能无气而立。如今王气已经出现，应马上顺应它。二月份日出于卯位（正东），入于酉位（正西），居于天上正位，称为二八之门。太阳是皇帝的象征。皇帝即位，最好在二月。今年二月十三日是甲子日，甲是六甲的开始，子是十二辰之首。甲数为九，子数也是九，九是天数。这一天又是惊蛰，阳气萌发的时节。当年周武王二月甲子日定天下，周朝享年八百岁；汉高祖二月甲午即帝位，享年四百岁。可见甲子、甲午是天数。今年二月甲子，应当应天受命。”杨坚采纳了他的建议，废北周自立为帝（隋文帝）。

隋文帝开皇元年（公元581年），任通直散骑常侍。文帝准备迁都，夜里与高颍、苏威商议决定。早晨庾季才报告：“我仰观天象、俯查书籍、卜卦占课，得到迁都的结论。尧都在平阳，而舜迁都蒲坂。可见帝王居处，世代不同。再说自汉朝营建长安城，至今已有八百年。地下水含碱大，不适宜饮用。希望陛下遵照天意人愿，做好迁都的计划。”皇上大为惊诧，对高颍等人说：“怎么如此神通！”于是下令施行。赐

绢三百段，马两匹，加封为公爵，对庾季才说：“我从今后，信服有天道了。”于是命令庾季才和其子庾质撰写《垂象志》、《地形志》等书。皇帝对庾季才说：“天地奥秘，测验方法有多种，见解互不相同，以致造成差误。我不愿意外人干预此事，因而让你们父子共同进行。”书编成献上，又赐米千石，绢六百段。

开皇九年（公元 689 年），派任均州刺史。任命下达，将要动身，又因为众人议论他的学问精通而下令仍留任原职。庾季才因为年老，多次请求辞职，每次都不得批准。这时张胄玄的新历开始执行，又有袁充上书论日晷影长的事。皇上向庾季才询问，回答说袁充谬误。皇上大怒，因而免职，给半薪回家。天象变化、自然异常，皇上常派人到他家里去询问。仁寿三年（公元 603 年）去世，终年八十八岁。

庾季才为人宽宏大量，学业精深广博，讲信义，一向好与朋友同游。良辰吉日，常与琅琊王褒、彭城刘焯、河东裴政以及族人庾信等以文酒聚会。还有刘臻、明克让、柳玟等人，虽然是后辈，也诚恳交往。庾季才撰有《灵台秘苑》一百二十卷、《垂象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流传于世。

（刘次沅 译）

【原文】

庾季才字叔奕，新野人也。八世祖滔，随晋元帝过江，官至散骑常侍，封遂昌侯，因家于南郡江陵县。祖诜，梁处士，与宗人易齐名。父曼倩，光禄卿。季才幼颖悟，八岁诵尚书，十二通周易，好占玄象。居丧以孝闻。梁庐陵王绩辟荆州主簿，湘东王绎重其术艺，引授外兵参军。西台建，累迁中书

郎，领太史，封宜昌县伯。季才固辞太史，元帝曰：“汉司马迁历世尸掌，魏高堂隆犹领此职，不无前例，卿何惮焉。”帝亦颇明星历，因共仰观，从容谓季才曰：“朕犹虑祸起萧墙，何方可息？”季才曰：“顷天象告变，秦将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镇荆陕，整旆还都，以避其患。假令羯寇侵蹙，止失荆湘，在于社稷，可得无虑。必久停留，恐非天意也。”帝初然之，后与吏部尚书宗愨等议，乃止。俄而江陵陷灭，竟如其言。

周太祖一见季才，深加优礼，令参掌太史。每有征讨，恒预侍从。赐宅一区，水田十顷，并奴婢牛羊什物等，谓季才曰：“卿是南人，未安北土，故有此赐者，欲绝卿南望之心。宜尽诚事我，当以富贵相答。”初，郢都之陷也，衣冠士人多没为贱。季才散所赐物，购求亲故。文帝问：“何能若此？”季才曰：“仆闻魏克襄阳，先昭异度，晋平建业，喜得士衡，伐国求贤，古之道也。今郢都覆败，君信有罪，搢绅何咎，皆为贱隶！鄙人羁旅，不敢献言，诚切哀之，故赎购耳。”太祖乃悟曰：“吾之过也。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为奴婢者数千口。

武成二年，与王褒、庾信同补麟趾学士。累迁稍伯大夫、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其后大冢宰宇文护执政，谓季才曰：“比日天道，有何征祥？”季才对曰：“荷恩深厚，若不尽言，便同木石。顷上台有变，不利宰辅，公宜归政天子，请老私门。此则自享期颐，而受旦、爽之美，子孙藩屏，终保维城之固。不然者，非复所知。”护沈吟久之，谓季才曰：“吾本意如此，但辞未获免耳。公既王官，可依朝例，无烦别参寡

人也。”自是渐疏，不复别见。及护灭之后，阅其书记，武帝亲自临检，有假托符命，妄造异端者，皆致诛戮。唯得季才书两纸，盛言纬候灾祥，宜反政归权。帝谓少宗伯斛斯征曰：“庾季才至诚谨悫，甚得人臣之礼。”因赐粟三百石，帛二百段。迁太史中大夫，诏撰《灵台秘苑》，加上仪同，封临颖伯，邑六百户。宣帝嗣位，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增邑三百户。

及高祖为丞相，尝夜召季才而问曰：“吾以庸虚，受兹顾命，天时人事，卿以为如何？”季才曰：“天道精微，难可意察，切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纵言不可，公岂复得为箕、颖之事乎？”高祖默然久之，因举首曰：“吾今譬犹骑兽，诚不得下矣。”因赐杂彩五十匹，绢二百段，曰：“愧公此意，宜善为思之。”大定元年正月，季才言曰：“今月戊戌平旦，青气如楼阙，见于国城之上，俄而变紫，逆风西行。气经云：“天不能无云而雨，皇王不能无气而立。”今王气已见，须即应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谓之二八之门。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为六甲之始，子为十二辰之初，甲数九，子数又九，九为天数。其日即是惊蛰，阳气壮发之时。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汉高帝以二月甲午即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为得天数。今二月甲子，宜应天受命。”上从之。

开皇元年，授通直散骑常侍。高祖将迁都，夜与高颍、苏威二人定议，季才旦而奏曰：“臣仰观玄象，俯察图记，龟兆允袭，必有迁都。且尧都平阳，舜都冀土，是知帝王居止，世代不同。且汉营此城，经今将八百岁，水皆碱卤，不甚宜人。

愿陛下协天人之心，为迁徙之计。”高祖愕然，谓颍等曰：“是何神也！”遂发诏施行，赐绢三百段，马两匹，进爵为公。谓季才曰：“朕自今已后，信有天道矣。”于是令季才与其子质撰垂象、地形等志，上谓季才曰：“天地秘奥，推测多途，执见不同，或致差舛。朕不欲外人干预此事，故使公父子共为之也。”及书成奏之，赐米千石，绢六百段。

九年，出为均州刺史。策书始降，将就藩，时议以季才术艺精通，有诏还委旧任。季才以年老，频表去职，每降优旨不许。会张胃玄历行，及袁充言日影长。上以问季才，季才因言充谬。上大怒，由是免职，给半禄归第。所有祥异，常使人就家访焉。仁寿三年卒，时年八十八。

季才局量宽弘，术业优博，笃于信义，志好宾游。常吉日良辰，与琅琊王褒、彭城刘珽、河东裴政及宗人信等，为文酒之会。次有刘臻、明克让、柳璥之徒，虽为后进，亦申游款。撰《灵台秘苑》一百二十卷，《垂象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并行于世。

耿 询 传

——《隋书》卷七八

【说明】耿询（约公元558—618年），字敦信，丹阳（今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县一带）人。曾任太史丞等职。擅长工艺制造技术，技巧绝伦。

最初，他从朋友高智宝学习天文算术，创制了一具浑天仪。东汉张衡曾创制过这种仪器，但早已失传。耿询创制的浑天仪与张衡当年所制作的一样，不用人力，而是利用漏壶的水力推动齿轮带动浑象绕轴旋转。将其置于阴暗室内，竟与高智宝在室外观察的天象完全符合。文帝晚年，他又制造马上刻漏，即一种骑兵行军携带的袖珍记时器。大业初年，为朝贺杨广登基，制造了欹器（欹器原是汲水用的巧具，周朝时曾作为祭器，古人常用此作为警戒自满的器物）。后又令与宇文恺，仿效北魏道士李兰所创造使用的方法，制造秤水漏器。后又与宇文恺制作测量日影的表针，以便对秤漏的指示杆刻度，并在上面设置盛水的方形器皿。这些时间指示器放置在东都洛阳皇宫内乾阳殿鼓楼下。耿询所造的计算时刻的日晷和漏壶这两种仪器，能测量天地的现象，所以它们是校准浑仪和天球仪的主要工具。著《鸟情占》一卷，流传于世。

耿询，字敦信，丹阳人。为人滑稽善辩，身怀绝人的技巧。陈后主时代，他以宾客的身份随东衡州刺史王勇来到岭南。王勇死后，耿询独自留在岭南，于是结交了很多越人，深受当地人的欢迎。陈被隋灭亡之后，越地的百姓聚众起义，反对隋朝的统治，共推耿询为首领。隋朝柱国王世积领兵征讨，耿询被俘，作为叛乱的首领，罪大难赦，被判死刑。为求免于死，他道出了自己具有非凡的才能，善于奇思异想，并具有制造各种灵巧装置的超人的技术和本领，留下来定会有用处。果然被世积赦免，罚为家奴。过了一段时间，耿询得知自己的朋友高智宝因擅长察识天象而平步青云，主持了太史局，于是也想在天文学方面有所表现，以改变自己的处境，因此跟他学习天文算术。耿询创意制造出一具浑天仪，用水作为动力使它运转，而不假助人力，把它放置在黑暗的房间内，然后让高智宝在室外观测天象，二者的结果竟然吻合无误。王世积得知此事后，将事情的经过报奏了文帝，隋文帝下令将耿询由家奴改为官奴，并分配到太史局工作。其后，文帝又将耿询赐给蜀王杨秀，跟随他离开京城前往益州，耿询深得蜀王的信任。不久，杨秀因谋反案发被废黜，耿询则受株连获罪，又被判了死刑。幸亏何稠欣赏他的才能，向高祖杨坚劝说：“耿询思维敏捷，技巧绝人，简直象有神助的一样，把这样的人杀了，臣实在为朝廷可惜。”隋文帝采纳了何稠的进谏，赦免他无罪。事后不久，耿询制成马上刻漏，极为精巧准确，人们都称赞它精妙。

隋文帝去世，隋炀帝即位，登基之时受到各地官吏的朝贺。这时耿询进献了自己制做的欹器，炀帝非常喜欢，兴奋

异常，因而免去了耿询官奴的身份，恢复了他的平民地位。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又任命耿询为右尚方署监事。隋大业七年，炀帝准备亲统大军征战高丽，这时耿询上书谏阻道：“辽东之地不可以征伐，如果兴师东征，必然无功而返。”杨广闻谏，勃然大怒，命左右将耿询立即斩首，又幸得何稠苦苦解劝阻拦，才免于身首相离。结果隋军兵败平壤。杨广班师回朝，想起耿询的先见之明和忠心谏阻，而事实恰恰应了他的预言，稍起悔意，于是下令升任耿询为太史丞。隋朝末年，宇文化及兵变杀死杨广后，耿询被迫跟随他到了黎阳。他对妻子说：“近观人事的离合向背，远察日月星辰的天象变化，宇文化及必败，李姓之人当称王天下，我现在知道哪里是我的归宿了。”后耿询密谋离开宇文化及，却因事情败露，被宇文化及所杀。他曾著有《鸟情占》一卷，流传于世。（冯 时 译）

【原文】

耿询字敦信，丹阳人也。滑稽辩给，伎巧绝人。陈后主之世，以客从东衡州刺史王勇于岭南。勇卒，询不归，遂与诸越相结，皆得其欢心。会郡俚反叛，推询为主。柱国王世积讨擒之，罪当诛。自言有巧思，世积释之，以为家奴。久之，见其故人高智宝以玄象直太史，询从之受天文算术。询创意造浑天仪，不假人力，以水转之，施于暗室中，使智宝外候天时，合如符契。世积知而奏之，高祖配询为官奴，给使太史局。后赐蜀王秀，从往益州，秀甚信之。及秀废，复当诛，何调言于高祖曰：“耿询之巧，思若有神，臣诚为朝廷惜之。”上于是特原其罪。询作马上刻漏，世称其妙。

炀帝即位，进欹器，帝善之，放为良民。岁余，授右尚

方署监事。七年，车驾东征，询上书曰：“辽东不可讨，师必无功。”帝大怒，命左右斩之，何稠苦谏得免。及平壤之败，帝以询言为中，以询守太史丞。宇文化及弑逆之后，从至黎阳，谓其妻曰：“近观人事，远察天文，宇文必败，李氏当王，吾知所归矣。”询欲去之，为化及所杀。著《鸟情占》一卷，行于世。

张胄玄传

——《隋书》卷七八

【说明】张胄玄，渤海蓼县（今河北省景县）人。生年未详，约卒于隋炀帝大业四年（公元 608 年）。他博学多闻，尤其精通数术。隋文帝杨坚在位时被征为云骑尉，直太史，参议律历事，旋即擢为员外散骑侍郎，兼太史令。开皇十四年（公元 594 年），张胄玄参与修制新历。因大论日长影短之事，隐喻大隋仁盛福兴，深得杨坚赞许，赏赐甚厚。开皇十七年（公元 597 年）新历成，文帝让杨素等人评定其优劣，随后下令颁行。大业四年，又重加修定，故名《大业历》。直行至隋末。

张胄玄初学祖冲之的方法，又受到张子信学说的很大影响。《大业历》考虑到张子信关于行星运动不均匀性的发现，利用等差级数求和的方法编制了一个会合周期中的行星位置表，大大提高了行星运行的计算精度。他敢于破除前人的常规，不牵强附会于数字，而是根据五星运行的真实状况来调整制定历法，无论是五星会合周期还是恒星周期，其观测精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其中金星达到了密合程度，而五星会合周期误差绝对平均值则达 4.702 分，恒星周期误差，木星为

23. 5 分，土星为 39. 7 分，火星高达 4 分，从而使《大业历》成为中国古代历法中五星精度最高的历法。

张胄玄，渤海蓆县人。他学识渊博，通晓多门学问，尤其擅长天文、历法和占候之学。经冀州刺史赵昺的推荐，隋文帝杨坚征聘他作了云骑尉，主持太史局，参加议定乐律和历法等事。在他的同辈之中，多数人的才学都不如他，出于这个原因，太史令刘晖对他非常嫉恨。然而，刘晖对律历的议论多与事实不符，而张胄玄对历法的推算却相当精密，文帝对这种情况深感诧异。于是，杨坚令大臣杨素与术士多人，设立六十一道难题，让刘晖与张胄玄等人一同辩论分析，这些题目都是长期以来运用传统的方法所不能解决的。经过辩论，刘晖竟哑口无言，一道题都答不上来，而张胄玄却能解答其中的五十四道。由于张胄玄学问精深，文帝升他为员外散骑侍郎，兼任太史令，并赏赐了丰厚的财物。而刘晖及其同伙八人却都遭到痛斥，被革职赶出了朝廷。张胄玄重新修定了一部新历法，因为过去使用的旧历出现了一日的误差，已不很精确了。当时，内史通事颜敏楚上书文帝说：“汉代的落下闳在修改《颛顼历》的基础上制定了《太初历》，他曾说过，这个历法使用时间久了就会出现一日的误差。八百年以后必会有圣人来改定它。从那时到现在，已经历七百一十年了，推算历法的人所取的都是整数，因此，落下闳所说的圣人，就出在当代！”文帝看了大喜，渐渐地表现出了要颁行新历的意愿。

张胄玄所制定的历法，与旧历有三点不同：

第一，南朝刘宋的祖冲之首先将岁差引入历法计算，它表现在每年的冬至点沿黄道逐渐向西退行，而不在原来的位置上。每四十六年，冬至点就要沿黄道西移一度。到梁虞门制定历法的时代，他嫌祖冲之制历时采用的岁差值与实际情况相差太大，因此将此值重新改定为每一百八十六年，冬至点沿黄道西移一度。张胄玄认为，这两种学说在年代上相差甚远，而且考查古代的记录与注疏，失误之处也很多，于是折中两家的说法，制定了新的岁差值。即冬至时的太阳位置，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循黄道渐渐西移，每八十三年运行一度，这个岁差值首先可以符合帝尧时代所说的夏至时白天最长，傍晚大火星出现在南中天的记载，其次可以符合汉代历法所定的冬至时太阳位于牛宿初度的情况。采用这个岁差值，古今的各种天象就都可以得到说明，并且吻合无误。

第二，北周马显制定的《丙寅元历》，内容有用阴率阳率求相邻的两天月亮真实运行分値之差，推步加减十二月下所列日月蚀时月亮每天真实运行的度数及分値，建立定蚀大小馀，然后求证相邻两节气太阳的真实运行度数，他首先创立使用了这种方法。当时通晓历法的人，对这种方法多不能了解。张宾虽因袭使用了这种方法，但也没有能够加以考查校正。张胄玄认为，为求定朔而加在平朔时刻上的定朔改正值，究竟是加在合朔之前还是合朔之后，将随着节气的不同各有差异，仅以历月为标准来判断，在道理上讲不通。于是他以二十四节气为准，列出了太阳的盈缩数，即冬至到各个节气太阳真实的运行度数与平均运行度数的累积值同日干元的乘积，实际上是因为日行速度慢，所以月亮就容易追赶上太阳，

这时在合朔时所加的定朔改正值就要早，日行速度快，所以月亮追赶太阳的速度就显得稍慢，这时在合朔时所加的定朔改正值就要晚。张胄玄检查了前代历法中所加定朔改正值的早晚情况，据以制定了损益率，也就是相邻的两个节气间太阳的真实运行度数与平均运行度数的差值同日干元的乘积。他认为，自秋分以后至春分，太阳运行的速度较快，计一百八十二日行一百八十度。自春分以后至秋分，太阳运行的速度较慢，计一百八十二日行一百七十六度。并在每个节气的下面列出了其时的损益率。

第三，自古以来历代的历法，虽然都知道朔日与望日恰值日月交会的时刻，但却并不理会太阳和月亮的位置哪个在内道，哪个在外道，而只要它们进入一定的限界，就认为将要发生交食。张宾建立了一种方法，创造了外限，也就是不可能发生偏食的限度，但是对于合朔时月亮已经进入食限而并没有发生日食的现象，则还是不能明白。张胄玄以为，太阳在黄道上运行，一年的时间在天空运行一周，月亮在月道上运行，二十七天多的时间在天空运行一周。月道与黄道是相交的，每当月亮在黄道里运行十三天多的时间就到了黄道外，接着在黄道外再运行十三天多的时间又进入到黄道里，周而复始，当月亮正好经过黄道的时刻，就叫作交（黄白交点）。在朔日与望日，当太阳和月亮距离黄白交点的度数前后各小于十五度的时候，就可以认为应该发生交食。如果月亮在内道运行，则处在黄道以北，这时多数应该发生的交食现象就一定会发生。如果月亮在外道运行，则处在黄道以南，这时，尽管月亮正处在黄白交点，如果遮掩不到太阳，日食也

不会发生。于是，张胄玄因袭了过去计算交食的方法，同时又另外确定了固定的食限，根据月亮距黄白交点的远近，以气节为准逐次求证食差，校正食分的大小，使所有的事情都清楚了。

另外，新历中有七项内容超过了古代历法，而且具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在古代的历法中，金、木、水、火、土五星的运行速度都被认为是恒久不变的，因而古人对于五星的始见、伏没、意外地速进、短距离的逆行的推算也就全都没有衡量的标准。张胄玄经过推算，分别得到了五星运行的真实速率，他所获得的五星在一个会合周期内与太阳相会和晨夕始见的日数，与古代历法所取得的不同。相差多的，甚至要增加或减少三十多天。以荧惑（火星）为例，根据它的平均会合周期按匀速运动计算，如果荧惑于雨水气晨见东方，这时就要平均加上二十九日的改正值，如于小雪气晨见东方，就要平均减去二十五日的改正值。将这个按匀速运行计算得到的荧惑晨见东方的时间，再加上由于行星非匀速运动所产生的改正值，就得到了荧惑晨见东方的真实时间。尽管每个行星各有自己的运行行度，但它们的计算方法是相同的，只是所求的差数各异罢了。张胄玄虽然运用独特的积候方法得到了五星运动的真实速率和应该增加的改正值，但他和当时的人却不能从根本上解释这些现象和做法的原理。

第二，按照传统的认识，辰星（水星）的运动遵循着在一个会合周期内存在晨始见和夕始见两次始见的旧率，过去所有的历法，都以为这个认识是正确的，至于说辰星应该出

现而没有出现的情况，人们却还不能知道。张胄玄通过积候的方法，认识到辰星在一个会合周期之中，有时只有一次始见，一旦受到其他行星的影响，则与其相随而出。如依据辰星的平均会合周期计算，它应在雨水气晨见东方，此时尽管应该出现，但就不会出现，如果依据平均会合周期计算出辰星应在启蛰气晨见东方，此时它处在距太阳十八度以外，三十六度以内的地方，清晨时就会有木、火、土、金四星中的一颗星，与辰星相随而出。

第三，依据古代历法的推步，五星的运行有着固定的期限，自五星始见之后，都要依照定率来推算，至于五星前进和逆行的时间，则不能知道是多少。张胄玄通过积候的方法，认识到五星运行速度的慢、快、停止和逆行的真实数值，都与古代历法所取的不同，最多的甚至相差八十余日，它们由逆行而转为顺行时所在的位置也相差八十余度。以荧惑为例，如果它开始运行时速度很快，并在立冬初晨见东方，那么在二百五十日中当运行一百七十七度，如果它的真实始见日期是在夏至初，那么在一百七十日中当运行九十二度。依此方法考查推步天象，古今均密合无误。

第四，古代历法中对交食食分的计算，都是依月亮的平均运动而定，因此所推算的食分的大小，与实际情况很少能够符合。张胄玄通过积候的方法，发现月亮与木、火、土、金四星的运行方向是有变化的，有时它们相向而行，有时它们相背而行。当月亮向着四星运行时，它的速度就快，当月亮背着四星运行时，它的速度就慢，月亮只有在距离四星十五度以外的地方运行时，才是它运行的真实速度。于是，张胄

玄通过月亮距黄白交点的远近，用以限定食分的大小。

第五，古代历法所加的定朔定望改正值，在求证定朔和定望时所采用的计算方法都是相同的。张胄玄通过积候的方法，认识到日食所在位置是随着方向的变化而改变的，在旁边，在正中，位置高，位置低，而每个位置所反映的交食情况也各不相同。日月相交有深有浅，速度也有快有慢，因此确定改正值的大小，建立月亮在平朔那天比太阳多走的分数，都需要观察天象。

第六，古代的历法认为，太阳和月亮距黄白交点的远近便决定了交食食分的大小，按照这个原则，当它们距黄白交点十四度的时候，发生的交食被遮蔽的部分即为一分，距交点十三度，被遮二分，距交点十度，被掩三分。每当太阳和月亮接近黄白交点一度，被掩蔽的部分就增加一分，如果正当交点之中，发生的交食就全部被遮住了。但是，在实际天象中却经常会出现一种现象，即本来被掩蔽的部分应该很少，实际情况却反而很多，本来被掩蔽的部分应该很多，实际情况却反而很少，自古以来所有的历法，对这种现象的原因都未能明了。张胄玄通过积候的方法认识到，当太阳和月亮正值黄白交点的时候，太阳并不能被月亮完全遮住，这时日食的食分反而很小，当太阳和月亮在距黄白交点五六时的地方，而且月亮在内道，太阳在外道，这时太阳便能被月亮完全遮住，所以才会发生食既。尔后，如果太阳与月亮至黄白交点的距离比这个度数更大了，那么交食时太阳被掩蔽的部分又会变小了。这种太阳和月亮在黄白交点前后的行度与食分的关系，只在冬至时适用，如果是在夏至日附近，这种关系又

会有所不同。张胄玄所确立的计算食分的方法和所得到的结果，最为详密精确。

第七，古代的历法都认为，春分和秋分的昼夜长度是相等的。张胄玄通过积候的方法认识到，其时的昼长与夜长并不一致，用漏刻来测量，在春秋二分的那一天，昼长比夜长多半刻，这都是由于太阳运行的快慢进退所造成的。

凡此种种，都是张胄玄独自获得的创见，讨论历法的人都佩服这些创见精确详密。隋大业年间，张胄玄在任太史令的时候去世了。

(冯 时 译)

【原文】

张胄玄，渤海蓆人也。博学多通，尤精术数。冀州刺史赵昺荐之，高祖征授云骑尉，直太史，参议律历事。时辈多出其下，由是太史令刘晖等甚忌之。然晖言多不中，胄玄所推步甚精密，上异之。令杨素与术数人立议六十一事，皆旧法久难通者，令晖与胄玄等辨析之。晖杜口一无所答，胄玄通者五十四焉。由是擢拜员外散骑侍郎，兼太史令，赐物千段，晖及党与八人皆斥逐之。改定新历，言前历差一日。内史通事颜敏楚上言曰：“汉时落下闳改《颛顼历》作《太初历》，云后当差一日。八百年当有圣者定之。计今相去七百一十年，术者举其成数，圣者之谓，其在今乎！”上大悦，渐见亲用。

胄玄所为历法，与古不同者有三事：

其一，宋祖冲之于岁周之末，创设差分，冬至渐移，不循旧轨。每四十六年，却差一度。至梁虞门历法，嫌冲之所差太多，因以一百八十六年冬至移一度。胄玄以此二术，年

限悬隔，追检古注，所失极多，遂折中两家，以为度法。冬至所宿，岁别渐移，八十三年却行一度，则上合尧时日永星火，次符汉历宿起牛初，明其前后，并皆密当。

其二，周马显造《丙寅元历》，有阴阳转法，加減章分，进退蚀余，乃推定日，创开此数。当时术者，多不能晓。张宾因而用之，莫能考正。胄玄以为加时先后，逐气参差，就月为断，于理未可。乃因二十四气列其盈缩所出，实由日行迟则月逐日易及，令合朔加时早，日行速则月逐日少迟，令合朔加时晚。检前代加时早晚，以为损益之率。日行自秋分已后至春分，其势速，计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八十度。自春分已后至秋分，日行迟，计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每气之下，即其率也。

其三，自古诸历，朔望值交，不问内外，入限便食。张宾立法，创有外限，应食不食，犹未能明。胄玄以日行黄道，岁一周天，月行月道，二十七日有余一周天。月道交络黄道，每行黄道内十三日有奇而出，又行黄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终而复始，月经黄道，谓之交。朔望去交前后各十五度已下，即为当食。若月行内道，则在黄道之北，食多有验。月行外道，在黄道之南也，虽遇正交，无由掩映，食多不验。遂因前法，别立定限，随交远近，逐气求差，损益食分，事皆明著。

其超古独异者有七事：

其一，古历五星行度皆守恒率，见伏盈缩，悉无格准。胄玄推之，各得其真率，合见之数，与古不同。其差多者，至加減三十许日。即如荧惑平见在雨水气，即均加二十九日，见在小雪气，则均減二十五日。加減平见，以为定见。诸星各

有盈缩之数，皆如此例，但差数不同。特其积候所知，时人不能原其意旨。

其二，辰星旧率，一终再见，凡诸古历，皆以为然，应见不见，人未能测。胄玄积候，知辰星一终之中，有时一见，及同类感召，相随而出。即如辰星平晨见在雨水气者，应见即不见，若平晨见在启蛰气者，去日十八度外，三十六度内，晨有木火土金一星者，亦相随见。

其三，古历步术，行有定限，自见已后，依率而推。进退之期，莫知多少。胄玄积候，知五星迟速留退真数皆与古法不同。多者至差八十余日，留回所在亦差八十余度。即如荧惑前疾初见在立冬初，则二百五十日行一百七十七度，定见在夏至初，则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追步天验，今古皆密。

其四，古历食分，依平即用，推验多少，实数罕符。胄玄积候，知月从木、火、土、金四星行有向背。月向四星即速，背之则迟，皆十五度外，乃循本率。遂于交分，限其多少。

其五，古历加时，朔望同术。胄玄积候，知日食所在，随方改变，傍正高下，每处不同。交有浅深，迟速亦异，约时立差，皆会天象。

其六，古历交分即为食数，去交十四度者食一分，去交十三度食二分，去交十度食三分。每近一度，食益一分，当交即食既。其应少反多，应多反少，自古诸历，未悉其原。胄玄积候，知当交之中，月掩日不能毕尽，其食反少，去交五六时，月在日内，掩日便尽，故食乃既。自此已后，更远者

其食又少。交之前后在冬至皆尔。若近夏至，其率又差。所立食分，最为详密。

其七，古历二分，昼夜皆等。胄玄积候，知其有差，春秋二分，昼多夜漏半刻，皆由日行迟疾盈缩使其然也。

凡此胄玄独得于心，论者服其精密。大业中卒官。

许智藏传

——《隋书》卷七八

【说明】许智藏（公元 537—617 年），高阳（今河北高阳）人，隋代医家。许智藏自青年时代即通达医理。隋文帝时他被授予官职派往外地。适逢秦孝王犯病，皇帝派人急速将他召回。待他回到京城，病人邪已入心。许氏预言病人将发癫狂，不可救治。后来病情发展果如其言。皇帝因此对许智藏的医术甚为赞叹。隋炀帝即位后，许智藏辞官在家，炀帝若身体不适，即派人去他那儿询问。或用小车接他来看病，许智藏给他开的处方亦每显良效。

许智藏，高阳人。祖父道幼，曾因母亲患病而阅览医方，由此研究医术，造诣颇深，世人称他为名医。道幼告诫他的所有孩子：“作为儿子，辨别饮食，品尝汤药，不懂医药知识，怎么能说尽孝道呢？”自此许氏家族代代传授医术。许智藏的祖父在梁朝做官，官至员外散骑侍郎。父亲名景，官为武陵王谘议参军。

智藏青年时自习医术，通达医理。在陈朝做官，任散骑侍郎。陈亡后，隋文帝任命他为员外散骑侍郎。派往扬州。适

逢秦孝王俊犯病，皇上急速召他回京。俊于夜间梦见他死去的妃子崔氏哭泣说：“原本来迎接你，然而听说许智藏就要来了。如果那人到来，必定使我吃苦，怎么办呢？”第二夜，俊又梦见崔氏说：“妾已有计谋，当藏入心中躲避他。”待智藏到达后，为他切脉。智藏说：“病已入心，即将发癫狂，不可救治。”后果然如他所言，俊数日后就死去。皇上惊奇他医术高妙，赏赐他数以百计的绸缎。隋炀帝即位时智藏辞官在家，炀帝每不适，就立即命使者前去拜访问问，或用小车接他进宫，于御床旁诊治。智藏为他的开处方，无不收到良效。许智藏八十岁时于家中去世。（万 芳 译）

【原文】

许智藏，高阳人也。祖道幼，尝以母疾，遂览医方，因而究极，世号名医。诫其诸子曰：“为人子者，尝膳视药，不知方术，岂谓孝乎？”由是世相传授。仕梁，官至员外散骑侍郎。父景，武陵王谘议参军。

智藏少以医术自达，仕陈为散骑侍郎。及陈灭，高祖以为员外散骑侍郎。使诣扬州。会秦孝王俊有疾，上驰召之。俊夜中梦其亡妃崔氏泣曰：“本来相迎，如闻许智藏将至，其人若到，当必相苦，为之奈何？”明夜，俊又梦崔氏曰：“妾得计矣，当入灵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为俊诊脉，曰：“疾已入心，郎当发病，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数日而薨。上奇其妙，赉物百段。炀帝即位，智藏时致仕于家，帝每有所苦，辄令中使就询访，或以舆迎入殿，扶登御床。智藏为方奏之，用无不效。年八十，卒于家。

徐文伯传

——《南史》卷三二

【说明】徐文伯，字德秀，生卒年不详。南北朝南齐医学家。濮阳太守徐熙的曾孙，徐氏家族从其曾祖父熙（字仲融）开始均善于医术。他品学兼备，精通医学，治病疗效与徐嗣伯相近。刘宋孝武帝时路太后患疾，诸多医生皆不识此病，文伯看后认为系结石博结于小肠。于是用消石汤治愈她的疾病。文伯由此被授官。刘宋明帝时宫中人患发症，以油治愈其病。徐文伯还精于妇产科，能进行针刺堕胎。徐氏撰有《徐文伯药方》三卷，《徐文伯疗妇人瘕》一卷。均佚。

文伯，字德秀。濮阳太守徐熙曾孙。熙爱好黄老之道，隐居秦望山。有一过路道士向他讨水喝，且留给他一个葫芦，说：“您的子孙宜学道术救世，如此可做郡太守。”熙打开葫芦，内藏一卷《扁鹊镜经》。于是精心研究学习，遂闻名全国。儿子名秋夫，较他更善于医术，官至射阳县令。秋夫曾夜间听见鬼呻吟，声音异常凄惨。他问鬼有何需求，鬼回答，他姓某，家在东阳，因患腰痛而死。虽然死后成鬼，但仍疼痛难忍，请求秋夫给予施治。秋夫说，“你是鬼没有形体，怎么治呢？”鬼

请他做一草人，按穴位针刺。秋夫按照他所言，灸治四处，且针刺肩井等三穴。然后设祭礼埋葬草人。次日秋夫见一人来谢恩，忽然又不见了。当时世人都佩服他与神灵相通。

秋夫生道度、叔向，他俩均精通医学。道度有脚疾不能行走，宋文帝命他乘坐小车进宫为皇子们治病，无不应验。道度官至兰陵太守。宋文帝说：“天下有五绝，皆出自钱唐。”他指的是杜道鞠的弹棋、范悦的诗、褚欣远的书法、褚胤的围棋、徐道度的医术。

道度生文伯，叔向生嗣伯。文伯也精通医术、品学兼优。且风流倜傥，不亚于公卿，但不以医为职业。友人张融对文伯、嗣伯说：“过去王微、稽叔夜二人有学问但不懂医学。殷仲堪等人姑且不论。做学问必须天资聪颖、眼光敏锐，才能达到至高境界，所以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何况侍中褚澄虽然富贵尚能救人疾苦，你我之辈更是无法达到这个程度。”文伯回答：“只有学识很高的人懂得医学值得尊崇。而没有知识之人多把它当作沉重负担。既轻视医，怎么能不以医业为耻呢。”文伯治病疗效与嗣伯相近。宋孝武帝时路太后患病，医生们皆不识她患的是何种疾病，文伯诊后说：“此为结石博结于小肠。”于是开水剂方药消石汤给她服用，病即治愈。不久徐文伯被授任鄱阳王散骑常侍，还赠予千金，太后对他恩意深重。宋明帝时宫里有人患腰痛，且牵痛至心，每当发作即气息欲绝。诸医生都认为系肉症。文伯说：“此为发症。”以油治疗后，即呕吐出象头发样物体，慢慢牵引长三尺，头部如蛇能动，挂门上正好一人头发那么长，以后病人康复如故。宋后废帝曾于苑门游乐，见一怀孕妇女。皇帝也善于诊脉，为

她切脉后推测：“她怀的是女孩。”又令文伯切脉，文伯诊后回答：“腹中有两胎儿。一男一女，男孩位于左边，又青又黑，较女孩形体小。”皇帝性情急躁，立刻就想派人剖腹验证。文伯怜悯地说：“若用刀斧可能会有所变化，请让我给她针刺，胎儿很快降生。”遂以泻法针刺足太阴脾经三阴交穴；以补法针刺手阳明大肠经合谷穴。胎儿应针而生。正如文伯所说那样，两胎儿相继娩出。

文伯的儿子名雄，亦继承家业，尤其善于诊察疾病。官至奉朝请。能清谈玄理，常常为贵公子们所称善。他侍奉母亲特别孝顺且非常谨慎。母亲去世，他因悲哀而使身体羸瘦，几乎丧失生命。不久兄长亡故，他拄杖参加丧礼，悲痛大哭，最后因哀伤过度而死。

(万芳译)

【原文】

文伯字德秀。濮阳太守熙曾孙也。熙好黄老，隐于秦望山，有道士过求饮，留一瓠芦与之，曰：“君子孙宜以道术救世，当得二千石。”熙开之，乃《扁鹊镜经》一卷，因精心学之，遂名震海内。生子秋夫，弥工其术，仕至射阳令。尝夜有鬼呻吟，声甚凄怆，秋夫问何须。答言姓某，家在东阳，患腰痛死。虽为鬼痛犹难忍，请疗之。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请为刍人，案孔穴针之。秋夫如言，为灸四处，又针肩井三处，设祭埋之。明日见一人谢恩，忽然不见。当世伏其通灵。

秋夫生道度、叔向，皆能精其业。道度有脚疾不能行，宋文帝令乘小舆入殿，为诸皇子疗疾，无不绝验。位兰陵太守。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绝，而皆出钱唐。”谓杜道鞠弹棋，范悦诗，褚欣远模书，褚胤围棋，徐道度疗疾也。

道度生文伯，叔向生嗣伯。文伯亦精其业，兼有学行，倜傥不屈意于公卿，不以医自业。融谓文伯、嗣伯曰：“昔王微，稽叔夜并学而不能，殷仲堪之徒故所不论。得之者由神明洞彻，然后可至，故非吾徒所及。且褚侍中澄富贵亦能救人疾，卿此更成不达。”答曰：“唯达者知此可崇，不达者多以为深累，既鄙之何能不耻之。”文伯为效与嗣伯相埒。宋孝武路太后病，众医不识。文伯诊之曰：“此石博小肠耳。”乃为水剂消石汤，病即愈。除鄱阳王常侍，遗以千金，旬日恩意隆重。宋明帝宫人患腰痛牵心，每至辄气欲绝，众医以为肉症。文伯曰：“此发症。”以油投之，即吐得物如发。稍引之长三尺，头已成蛇能动，挂门上适尽一发而已，病都差。宋后废帝出乐游苑门，逢一妇人有娠，帝亦善诊，诊之曰：“此腹是女也。”问文伯，曰：“腹有两子，一男一女，男左边，青黑，形小于女。”帝性急，便欲使剖。文伯恻然曰：“若刀釜恐其变异，请针之立落。”便写足太阴，补手阳明；胎便应针而落。两儿相续出，如其言。

子雄，亦传家业，尤工诊察，位奉朝请。能清言，多为贵游所善。事母孝谨，母终，毁瘠几至自灭。俄而兄亡，扶杖临丧，扶膺一恸，遂以哀卒。

徐嗣伯传

——《南史》卷三二

【说明】徐嗣伯，字叔绍，生卒年不详。祖籍东莞姑幕（今山东诸城），寄籍丹阳（今江苏南京）。南北朝时南齐的医学家。系濮阳太守徐熙的曾孙。祖父名秋夫，父亲名叔向，均通晓医术。徐嗣伯善于清谈，甚为临川王映器重。当时直阁将军伯玉服用五石散十剂左右，未见对身体有何益处，反而怕冷，夏天常穿数件衣服。嗣伯为他诊脉后断定，此为热气伏于内，必须在寒冬时节以水来激发。后用冷水浇身果然治愈伯玉之病。据史书记载，徐嗣伯撰有《徐嗣伯落年方》三卷、《药方》五卷、《杂病论》一卷。均佚。后人评价：徐氏医术神灵高妙，具有非凡水平，可与古代名医医和、扁鹊相提并论。

徐嗣伯，字叔绍。他也很有孝行，善于清谈，官为正员郎，诸府佐。特别为临川王映所器重。那时直阁将军房伯玉因病服五石散十剂左右，未见对身体有何益处，反而怕冷，夏天常常穿几件衣服。嗣伯为他诊脉，说：“您有热气伏于内，必须用水来激发，而且非在冬天不可。”到十一月，冰天大雪，

嗣伯命两人捉住伯玉并夹住他，解开衣带令其坐石头上，取冷水从头开始往身上浇，浇完二十斛，伯玉便口闭气绝，他的家人啼哭着请求嗣伯停下来。嗣伯派人拿手杖防护阁楼，若有人敢于劝阻即痛打之。又浇完冷水百斛，伯玉开始能够活动，且见背上冒出热气。过一会儿他便坐起来说：“我太热了，不能忍受，请给我饮冷水。”嗣伯给他喝水，他一喝就是一升。疾病就此痊愈。以后伯玉常常发热，冬天尚穿单衣裤，身体更加健壮。

曾经有一老妇患滞冷，数年未见好转。嗣伯为他诊病后言：“此为尸注。应取死人枕席煮服才能治愈。”于是去古墓中取来枕席，枕席一边已腐烂缺损，服后即病愈。后来秣陵人张景，十五岁，患腹部肿胀，脸色黄，很多医生皆无法治疗。因而问嗣伯，嗣伯说：“此为石蛔病。极其难治。应取死人枕席煮后服。”按照嗣伯所言煮枕席，病人服用枕席汤后，大泻一番，共泻下蛔虫五升，虫头坚硬如石。以后病告治愈。此后沈僧翼患眼痛，常自觉能见鬼物。他因此询问嗣伯。嗣伯答：“邪气入肝，可以去找死人枕席煮服。服后可将枕席埋回原处。”如嗣伯所言做，病人又治愈了。王晏因此讨教嗣伯：“上述三种疾病不同，而俱用死人枕席治愈，这是什么道理？”嗣伯解释：“尸注病，是指鬼伏于体内而不起，故令人深重滞着。以死人枕席使魂气飞越外出，不再附着身体，所以能治愈尸注；石蛔是指病程很久的蛔虫症，加之治疗不正确，蛔虫变得坚硬。一般药物不能取效，必须以鬼物驱赶方能散去，所以要用死人枕席；另外邪气入肚，故使眼睛疼痛而如见鬼怪，必须以邪物钩引使之驱出，所以选用死人枕席。邪气随

枕席而去，因此令其埋葬于坟墓间。”又一年春季，嗣伯出南篱门游玩。耳闻一竹席搭成之房屋传出呻吟声，嗣伯说：“此病很重，过两天不治必定会死。”于是前往探视，见一老妇人自称身体疼痛，但见她身体处处黯黑色块。嗣伯返回，煮斗余汤药送去令她服下，服后病势更为严重，病人疼痛之至，于床中翻滚。不一会儿身体色黯处皆拔出一寸左右疽钉。后以药膏涂搽所有疮口，三天后患者康复。此病称“钉疽”。

当时还有薛伯宗善长迁移痈疽。公孙泰患背部痈疽，伯宗发气功为他封闭患处，并把痈疽迁移至斋前柳树上。次日公孙泰之痈疽消失，树边长出一拳头大的疽瘤，二十余天后，痈瘤渐渐长大流脓溃烂，流出黄红色汁液一斗有余。那棵树因此而受损枯萎。

有人评论：徐氏医术精妙通灵，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即使古代名医医和、扁鹊也没有什么本领比他更高。

（万 芳 译）

【原文】

嗣伯字叔绍，亦有孝行，善清言，位正员郎，诸府佐，弥为临川王映所重。时直阁将军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许剂，无益，更患冷，夏日常复衣。嗣伯为诊之，曰：“卿伏热，应须以水发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夹捉伯玉，解衣坐石，取冷水从头浇之。尽二十斛，伯玉口噤气绝，家人啼哭请止。嗣伯遣人执杖防阁，敢有谏者挝之。又尽水百斛，伯玉始能动，而见背上彭彭有气。俄而起坐，曰：“热不可忍，乞冷饮。”嗣伯以水与之，一饮一升，病都差。自尔恒发热，冬月犹单裤衫，体更肥壮。

常有妇人患滞冷，积年不差。嗣伯为诊之曰：“此尸注也，当取死人枕煮服之及愈。”于是往古冢中取枕，枕已一边腐缺，服之即差。后秣陵人张景，年十五，腹胀面黄，众医不能疗，以问嗣伯。嗣伯曰：“此石蛔耳，极难疗。当取死人枕煮之。”依语煮枕，以汤投之，得大利，并蛔虫头坚如石，五升，病即差。后沈僧翼患眼痛，又多见鬼物，以问嗣伯。嗣伯曰：“邪气入肝，可觅死人枕煮服之。竟，可埋枕于故处。”如其言又愈。王晏问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而俱差，何也？”答曰：“尸注者，鬼气伏而未起，故令人沉滞。得死人枕投之，魂气飞越，不得复附体，故尸注可差。石蛔者，久蛔也，医疗既僻，蛔虫转坚，世间药不能遣，所以须鬼物驱之然后可散，故令煮死人枕也。夫邪气入肝，故使眼痛而见魍魎，应须邪物以钩之，故用死人枕也。气因枕去，故令埋于冢间也。”又春月出南篱门戏，闻笪屋中有呻吟声。嗣伯曰：“此病甚重，更二日不疗必死。”乃往视，见一老姥称体痛，而处处有黯黑无数。嗣伯还煮斗余汤送令服之，服讫痛势愈甚，跳投床者无数。须臾所黯处皆拔出钉，长寸许。以膏涂诸疮口，三日而复，云“此名钉疽也。”

时又有薛伯宗善徙痈疽，公孙泰患背，伯宗为气封之，徙置斋前柳树上。明旦痈消，树边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长二十余日，瘤大脓烂，出黄赤汁斗余，树为之萎损。

论曰：徐氏妙理通灵，盖非常所至，虽古之和、鹊，何以加兹。

祖暅之传

——《南史》卷七二

【说明】祖暅之，字景烁，祖冲之之子，后人通常称祖暅。南北朝时南朝梁代著名科学家。他继承父亲的学术事业，在天文历法和数学等方面作出了贡献。据史书记载，祖暅也有《缀术》之作，研究者常认为是他和父亲合作或父亲先作，儿子再续。他还先后三次向梁朝推荐父亲的《大明历》，并被采纳。他在南朝的北部边境进行天文观测时，曾被北朝俘虏，因他是著名学者受到礼遇，后被放还南朝。他经过长期观测，发现当时的北极星距北极不动点有一度多，而不重合的事实。有奉朝请的头衔，担任过材官将军、太舟卿等官职。著有《漏刻经》、《权衡记》等书，均早已失传。

祖暅之字景烁，少年时继承家庭学业，研究穷极到精细致微。还有灵活高妙的构思，达到全神贯注的程度，鲁般、偃也超不过他。当他思考到细微的时候，连外面疾雷都听不见。曾经在行路时遇到做仆射官的徐勉，把头部撞到人家身上，徐勉呼喊才明白了。父亲（祖冲之）所改革的何承天历法当时还未施行，梁朝天监初年，祖暅之再次修改，于是才开始行

用。做官到太舟卿。祖暅之的儿子祖皓，志向气节慷慨，有文武才能谋略。少年时继承家庭学业，精通历法数学。梁大同（公元 535—546 年）中担任江都县县令，后来升为广陵郡太守。

（李 迪 译）

【原文】

（祖）暅之字景烁，少传家业，究极精微。亦有巧思，入神之妙，般、垂无以过也。当其诣微之时，雷霆不能入。尝行遇仆射徐勉，以头触之，勉呼及悟。父所改何承天历时尚未行，梁天监初，暅之更修之，于是始行焉。位至太舟卿。暅之子皓，志节慷慨，有文武才略。少传家业，善历算。大同中为江都令，后拜广陵太守。

陶弘景传

——《南史》卷七六

【说明】陶弘景（公元 456—536 年），字通明，号华阳隐居，谥贞白先生。南北朝时期著名的道学家和科学家。他所著述的道教典籍，如《真诰》、《真灵位业图》、《登真隐诀》等，都是晋、宋、齐、梁时期道教史上重要的经典。陶弘景知识广博，在医学、药学、化学、冶炼、天文、历法、地理等方面都有相当的成就。

在医药学方面，陶弘景系统地整理了东汉流传下来的《神农本草经》，除将书中原载的 365 种药加以订正发挥外，又增补了汉、魏、晋以来张仲景、华佗、吴普、李当之等名医副品药物 365 种，共计 730 种，汇编成《本草集注》。在此书中他打破了原书将药分为上、中、下三品的分类法，而按照药物在自然界的属性分为玉石、草木、虫鱼、兽禽、果菜、米食、有名未用等七类；他还首创了按药物主治作用进行分类的方法，最早提出“诸病通用药”，并将之分成 80 多类；《本草集注》非常重视药性，对药物的性味、形态、产地、采集、鉴别、炮制及应用等方面均有新的论述，对药用的度量衡也进行了研究考订。此外，陶弘景还撰有《名医别录》、《补阙

肘后百一方》、《效验方》、《药总诀》、《陶氏方》等，对保存和发扬我国本草文献古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化学方面，陶弘景的化学成就主要来源于他长达二十年的炼丹实践，这在他的《本草集注》中可略窥一二，例如说水银“甚能消化金银，使成泥，人以镀物是也”，明确提到了水银与金、银的合金——汞齐及其在镀金镀银上的作用；又如指出硝石可通过火焰颜色来鉴别，这实际上就是现代的钾盐火焰分析法。

在冶炼方面，陶弘景是锻铸刀剑的专家，著有《剑经》及《古今刀剑录》。他在《本草集注》中说：“钢铁是杂炼生錫作刀镰者”，这是关于用生铁、熟铁合炼成钢的“灌注法”的最早记载。

陶弘景在天文历算方面也颇有成就，曾造浑天象并著有《帝代年历》。

陶弘景，字通明，丹阳秣陵人。祖父陶隆曾任王府参军，父亲陶贞曾任孝昌县令。

当初，陶弘景的母亲郝氏梦见两个天神手拿香炉来到她家，接着就怀孕了。在宋孝建三年（公元456年）丙申岁夏至日生下陶弘景。他从小就与众不同，四、五岁时，常用芦苇杆在灰中画着学写字。到了十岁，得到一本葛洪的《神仙传》，昼夜研读，便有了养生的志向。对人说：“仰视青云，观看太阳，不觉得远了。”他父亲被妾所害，所以弘景终身不娶。等到长大了，身高七尺七寸，神态仪表俊秀出众，眼睛明亮，眉毛宽广，身材修长，额头宽阔，耳朵肥大，两边耳孔各有

十几根毛长出耳外二寸多，右膝上有几十个小黑痣排成北斗七星状。读书过万卷，一事不知，就深以为耻。善于弹琴下棋，擅长草书隶书。不到二十岁，齐高帝任相国，把他引荐为诸王的侍读，官拜奉朝请。他虽然置身于达官贵人之间，但闭起门来不与外界交往，只以读书为要事。朝廷礼仪，典章制度，一般都向他请教决断。

陶弘景家境贫穷，请求任地方官未获批准。永明十年，脱下朝服挂在神武门，上书辞去俸禄。皇帝下诏同意，赐给丝帛，并命令当地每月给他伏苓五斤，白蜜二升，供他服用。到了他走的那天，王公卿贵在征虏亭设宴送别，因设帐很多，车马把道路都堵塞了，人们都说宋、齐以来还没出现过这种事情。此后，陶弘景居住在句容的句曲山。他常说：“这座山下是道教第八洞宫，名叫金坛华阳之天，周围有一百五十里。从前汉代有咸阳的茅盈、茅固、茅表三君修炼得道来掌管这座山，所以又叫它茅山。”于是在山中建立道馆，自号为华阳陶隐居。和人们的通信，就以隐居代替名字。

他最初跟随东阳孙游岳学习道家符图经法，遍游名山，寻求仙药。陶弘景身体轻灵敏捷，生性喜爱山水，每次经过山涧溪谷时，必定或坐或卧于其间，吟咏盘旋，不能停止。他对弟子说：“我看朱门广厦，虽然知道那样会很富贵荣乐，但却没有向往之心。仰望高山，俯瞰大海，知道这里很难长久停留，自己却一直想要去接近它。况且我在永明年间谋求官职，即使得到了也是违背本心的，不然又怎会象现在这样呢。这不只是本身就有成仙之相，也是缘分使之成为这样的。”当时沈约任东阳郡守，认为陶弘景志节高尚，多次写信邀请他，

他不去。

陶弘景为人随和，谦虚谨慎，无论出仕或者隐居，心里都象镜子一样明亮，遇到事情很快就能明白。话语从不烦琐，即使偶而烦琐也能马上察觉。永元初年，更是建了一座三层小楼，陶弘景住上层，弟子们住中层，客人们住下层。于是便和外界隔绝，只有一个家僮能去他那里。陶弘景本来善于骑马射箭，到晚年都不做了，只是爱听吹笙而已。他特别喜欢松树的风声，庭院中都种着松树，每当听到风吹松树的响声，都很高兴。有时一个人游览于泉石之间，看到他的人都以为他是仙人。

陶弘景本性喜欢著述，崇尚奇异的事物，爱惜时间，到年老时更是这样。尤其熟悉阴阳五行，占卜吉凶，天文算数，山川地理、方图产物，医术草药等，著有《帝代年历》，以计算推知东汉熹平三年（公元174年）丁丑冬至日，在日中加时，而天实际以乙亥冬至，在半夜加时，则约差三十八刻，所以汉历落后于实际时日两天十二刻。又以为历代都采取先祭亡母后合祭地神，认为神理就应该这样。那些很有知识的人，也都不明白。他还曾经制作了一台浑天象，高三尺多，地居中央，天转而地不动，以机械使它转动，都与天相会合。说：“这是修炼道行所必须的，不只是吏官才用的。”陶弘景非常敬慕张良的为人，说：“古代贤人没有可与他相比的。”

齐末有歌中说：“水丑木”合成为“梁”字。等到梁武帝进兵到新林，陶弘景派遣弟子戴猛子绕路去献表。到了那里听说商议齐朝怎样交出政权之事，陶弘景援引图讖，很多处都成为“梁”字，让弟子呈上。梁武帝既早就与他有交情，即

帝位后，对他更是恩宠礼遇有加，不断写信问候，拜访的宾客络绎不绝。

陶弘景既已得到了神符秘诀，认为可以炼成长生不老的神丹，但却苦于没有药物作为原料。皇帝就送给他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原料。陶弘景随后将它们合炼成飞丹，其颜色白如霜雪，服用后觉得身体很轻盈。等皇帝服用飞丹觉得有效后，就更加敬重陶弘景。每回得到他的书，总是焚香虔诚地接受。皇帝命他编制年历，到己巳年即太清三年（公元 549 年）御笔批准。皇帝亲手写诏书邀请他，赐给他鹿皮头巾。以后又多次送去聘礼，他都不出山，只是画了两头牛，一头悠闲地散步于水草之间，一头套着金笼头，有人手里牵着缰绳，用木棍赶着它。梁武帝笑着说：“这个人无所不作，想效仿泥中的乌龟那样隐居，逍遥自在，哪有来的道理呢。”国家每每有了占卜吉凶出兵征讨的大事，没有不前去向他咨询的。每月里都要送去好几封信，当时人们称他为“山中宰相”。太后和皇帝以及王公大臣不断派人前去拜见问候，不断地赠送礼物，陶弘景大多不接受，即使接受的也都布施行善了。

天监四年（公元 505 年），陶弘景移居到积金东涧。陶弘景善于一种不食五谷、呼吸俯仰促进身体健康的道家养生之术，从隐居时起四十多年，年过八十可是容貌仍象壮年人。仙书上说：“眼睛方的人能活千岁。”陶弘景晚年一只眼睛有时会变方。曾经梦见佛传授给他菩提记，称他为胜力菩萨。于是他到鄮县的阿育王塔发誓，接受五大戒律。后来梁简文帝萧纲临幸南徐州，钦佩他的高风素洁，把他召到后堂，以普

通读书人的装束与他相见，和他交谈讨论了几天才离去，简文帝非常敬佩他，认为他很不一样。天监（公元 502—519 年）年中，陶弘景献仙丹给梁武帝。于中大通（公元 529—534）初年，又献上两把刀，其中一把名叫“善胜”，一把名叫“威胜”，两把都是非常好的宝刀。

陶弘景没有什么疾病，但自己知道快要死了，预定了自己死的日子，并作了一首《告逝诗》。在大同二年（公元 536 年）去世，卒年八十一岁。死时颜色不变，屈伸象往常一样，香气接连数日，弥漫全山。遗言命令：“死了之后不需要洗浴，不需要铺床，只要铺两张席子在地上，上面铺垫平时所穿的旧衣服，身上穿生絨裙和臂衣、袜、头巾、法衣等。左肘佩禄铃，右肘佩药铃，左腋下佩道符，绕腰穿环在前面系结，髻上插钗。用大袈裟把尸身整个盖上蒙住首足。随葬品有车马。道人和道士一起在门中，道人在左边，道士在右边。百日之内夜里常燃灯火，白天常焚香火。”弟子遵照他的命令办理了丧事。皇上下诏封他为太中大夫，谥号贞白先生。

弘景精通术数，预先知道梁朝很快会灭亡，预先作了一首诗说：“夷甫放任散诞，平叔坐论玄理。怎想到皇后的昭阳殿，会成为匈奴单于的皇宫呢？”诗秘藏在小箱子里，陶弘景死后，他的弟子才小心将它拿出来。大同末年，人们竞相谈论玄理，不操练军事，后来侯景篡位，果然住在昭阳殿。

当初，陶弘景的母亲梦见青龙没有尾巴，自己升天了，陶弘景果然没有娶妻没有孩子，堂兄将他的儿子松乔过继给他作继承人。陶弘景著有《学苑》百卷，《孝经》、《论语集注》、《帝代年历》、《本草集注》、《效验方》、《肘后百一方》、《古今

州郡记》、《图象集要》、和《玉匮记》、《七曜新旧术疏》、《占侯》、《合丹法式》等书，都秘不外传，还有十部书没有写完，只有他的弟子们得到了他的著作。（单菁菁 译）

【原文】

陶弘景，字通明，丹阳秣陵人也。祖隆，王府参军。父贞，孝昌令。

初，弘景母郝氏梦两天人手执香炉来至其所，已而有娠。以宋孝建三年丙申岁夏至日生。幼有异操，年四五岁，恒以荻为笔，画灰中学书。至十岁，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研寻，便有养生之志。谓人曰：“仰青云，睹白日，不觉为远矣。”父为妾所害，弘景终身不娶。及长，身長七尺七寸，神仪明秀，朗月疏眉，细形长额耸耳，耳孔各有十余毛出外二寸许，右膝有数十黑子作七星文。读书万余卷，一事不知，以为深耻。善琴棋，工草隶。未弱冠，齐高帝作相，引为诸王侍读，除奉朝请。虽在朱门，闭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阅为务。朝仪故事，多所取焉。

家贫，求宰县不遂。永明十年，脱朝服挂神武门，上表辞禄。诏许之，赐以束帛，敕所在月给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饵。及发，公卿祖之征虏亭，供帐甚盛，车马填咽，咸云宋、齐以来未有斯事。于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宫，名金坛华阳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汉有咸阳三茅君得道来掌此山，故谓之茅山。”乃中山立馆，自号华阳陶隐居。人间书札，即以隐居代名。

始从东阳孙游岳受符图经法，遍历名山，寻访仙药。身既轻捷，性爱山水，每经润谷，必坐卧其间，吟咏盘桓，不

能已已。谓门人曰：“吾见朱门广厦，虽识其华乐，而无欲往之心。望高岩，瞰大泽，知此难立止，自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禄，得辄差舛；若不尔，岂得为今日之事。岂唯身有仙相，亦缘势使之然。”沈约为东阳郡守，高其志节，累书要之，不至。

弘景为人员通谦谨，出处冥会，心如明镜，遇物便了。言无烦舛，有亦随觉。永元初，更筑三层楼，弘景处其上，弟子居其中，宾客至其下。与物遂绝，唯一家僮得至其所。本便马善射，晚皆不为，唯听吹笙而已。特爱松风，庭院皆植松，每闻其响，欣然为乐。有时独游泉石，望见者以为仙人。

性好著述，尚奇异，顾惜光景，老而弥笃。尤明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图产物、医术本草，著《帝代年历》，以算推知汉熹平三年丁丑冬至，加时在日中，而天实以乙亥冬至，加时在夜半，凡差三十八刻，是汉历后天二日十二刻也。又以历代皆取其先妣母后配飨地祇，以为神理宜然，硕学通儒，咸所不悟。又尝造浑天象，高三尺许，地居中央，天转而地不动，以机动之，悉与天相会。云“修道所需，非止史官是用”。深慕张良为人，云“古贤无比”。

齐末为歌曰“水丑木”为“梁”字。及梁武兵至新林，遣弟子戴猛子假道奉表。及闻议禅代，弘景援引图讖，数处皆成“梁”字，令弟子进之。武帝既早与之游，及即位后，恩礼愈笃，书问不绝，冠盖相望。

弘景既得神符秘诀，以为神丹可成，而苦无药物。帝给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后合飞丹，色如霜雪，服之体轻。及帝服飞丹有验，益敬重之。每得其书，烧香虔受。帝

使造年历，至己巳岁而加朱点，实太清三年也。帝手敕招之，锡以鹿皮巾。后屡加聘礼，并不出，唯画作两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间，一牛著金笼头，有人执绳，以杖驱之。武帝笑曰：“此人无所不作，欲教曳尾之龟，岂有可致之理。”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谘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为山中宰相。二宫及公王贵要参候相继，赠遗未尝脱时，多不纳受，纵留者即作功德。

天监四年，移居积金东涧。弘景善辟谷导引之法，自隐处四十许年，年逾八十而有壮容。仙书云：“眼方者寿千岁。”弘景末年一眼有时而方。曾梦佛授其菩提记云，名为胜力菩萨。乃诣鄮县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后简文临南徐州，钦其风素，召至后堂，以葛巾进见，与谈论数日而去，简文甚敬异之。天监中，献丹于武帝。中大通初，又献二刀，其一名善胜，一名威胜，并为佳宝。

无疾，自知应逝，逆克亡日，仍为《告逝诗》。大同二年卒，时年八十一岁。颜色不变，屈伸如常，香气累日，氛氲满山。遗令：“既没不须沐浴，不须施床，止两重席于地，因所著旧衣，上加生絨裙及臂衣鞮冠巾法服。左肘录铃，右肘药铃，佩符络左腋下。绕腰穿环结于前，钗符于髻上。通以大架裘覆衾蒙首足。明器有车马。道人道士并在门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内夜常然灯，旦常香火。”弟子遵而行之。诏赠太中大夫，谥曰贞白先生。

弘景妙解术数，逆知梁祚覆没，预制诗云：“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论空。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诗秘在篋里，化后，门人方稍出之。大同末，人士竞谈玄理，不习武事，后候景

篡，果在昭阳殿。

初，弘景母梦青龙无尾，自己升天，弘景果不妻无子。从兄以子松乔嗣。所著《学苑》百卷，《孝经》、《论语集注》、《帝代年历》、《本草集注》、《效验方》、《肘后百一方》、《古今州郡记》、《图象集要》及《玉匮记》、《七曜新旧术疏》、《占候》、《合丹法式》，共秘密不传，及撰而未讫又十部，唯弟子得之。